

高等学校右派言論选編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高等学校右派言論选編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1—1078册

539,000字

統一書号: 3011·66

定价(6): 2.60元

1957年5月，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样，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偉大革命和建設事业，进行了惡毒的誣蔑和無耻的誹謗。这立刻激起了全国人民無比的憤怒，給予了有力的反击。在党的领导下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場轟轟烈烈大是大非辯論的結果，教育了全国人民，也教育了我校师生。

事实証明，階級斗争并未熄灭，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仍将是長期而艰巨的任务，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学，“化毒草为肥料”，將我校及全国部分高等学校的右派言論，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十二題，編就“高等学校右派言論选編”，供我校政治理論課教师进行教学批判时参考。

“选編”中本校右派分子的身份一般都加了注明。其他院校右派分子的身份并未完全注明，有些右派分子的姓名因抄写关系，也未查清，只注明了所屬院校。

本書排印后，又收到和整理出一些材料，未及編入有关部分，这些材料均作为附录，排在書后。

限于時間及我們的水平，匆促編出，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难免有不当之处，望讀者加以指正。

編者 1958年8月

目 录

一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一)人民民主專政	1
1.專政与民主	1
(1)“工人階級有局限性”	1
(2)“無产階級專政不民主是独裁”	8
2.民主与集中	27
3.民主与自由	42
4.自由与紀律	71
5.否定我国政治制度——人代会	74
6.“以党代政”	77
7.法制問題	82
8.对国防軍队的誣蔑	97
9.“新聞不自由”	99
(二)兩種制度	111
1.仇視社会主义制度	111
2.美化資本主义，誣蔑社会主义	131
3.誣蔑新社会产生“新貴族”、“新階級”	141
4.誣蔑新社会有“等級制度”	148
5.誣蔑新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	150
6.誣蔑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152
7.誣蔑历史运动，否定各次运动的成績	154
8.关于党性、人性、个性和階級性的謬論	158
9.关于“不滿现实”的謬論	163

10. 攻击党的有关政策	163
(三) 关于党的领导	166
1. 誣蔑中国共产党	166
2. 誣蔑毛主席	201
3. 反对党的领导	215
4. 誣蔑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和中央领导人	244
5. “党天下”	248
6.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党专政”	256
7. 反对党委制	268
8. “宗派主义”	309
9. 誣蔑党已面临“危机”	316
10. 要杀共产党人	327
11. 攻击、歪曲、誣蔑党的发展组织工作	331
12. 誣蔑汇报制度	343
13. 誣蔑党的组织纪律	345
14. 攻击、丑化党员	347
15. 挑拨党群关系	390
16. 誣蔑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	422
17. 企图组织反革命政党	437
18. 为陈独秀、高岗、饶漱石鸣不平	439
19. 攻击共青团	441
(1) 反对党对团的领导	441
(2) 对团组织 and 团员的誣蔑	442
(3) 誣蔑党对青年的教育问题	445
20. 攻击工会	446
(1) 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	446
(2) 关于对工会的誣蔑	448
21. 攻击学生会	449
(1) 反对党对学生会的领导	449

(2) 誣蔑学生会不起作用	450
22. 攻击党的干部政策	450
(1) 攻击、誣蔑、歪曲党的干部政策	450
(2) 誣蔑党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 (“重德、重資、不重才”)	455
(3) 攻击、誣蔑、謾罵工农老干部	462
(4) “德才新論”	466
(5) 主張开放干部自由市場	468
(6) 誣蔑党的工資政策	470
23. 攻击人事制度	474
24. 攻击、誣蔑档案制度	476
25. 攻击保密制度	479
(四) 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481
1. 关于整風运动	481
(1) 歪曲整風的意义	481
(2) “整風是思想上的解放”	489
(3) 歪曲鳴放政策	490
(4) 誣蔑党的整風是緩和矛盾	493
(5) 誣蔑党对整風缺乏誠意	496
(6) 混淆两种不同性質的矛盾	499
(7) 歪曲矛盾性質的轉化	503
(8) 攻击积极参加整風的人	504
(9) 主張狂風暴雨	505
(10) 要向党算賬	509
(11) 企圖篡夺整風领导	510
(12) 歪曲“三害”产生的根源	511
(13) “消除‘三害’的办法”	535
2. 反右派斗争	538
(1) 为右派分子辯护	538
(2) 歪曲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及其产生根源	546
(3) 攻击反右派斗争	547

(4) 誣蔑、抗拒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553
(5) 污蔑反右派斗争会造成不良后果	554
3. 关于立场問題	555
(五) 过渡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560

二 肃反問題

(一) 誣蔑肃反运动, 否定肃反成績	564
(二) 关于党的领导	587
(三) 关于政策問題	588
(四) 关于群众路綫	591
(五) 关于5% 的控制数字	593
(六) 关于所謂“肃反扩大化”	596
(七) 关于所謂違反宪法問題	603
(八) 对积极分子的誣蔑	606
(九) 关于胡風反革命問題	608
(十) 关于“平反”	620
(十一) 誣蔑鎮反运动	623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一) 关于农业合作化	625
1. 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625
2. 否認合作化的自願原則, 誣蔑合作化“冒进了”	629
3. 否認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	634
(二) 关于統購統銷	634
1. 反对統購統銷政策	634
2. 污蔑“三定”政策	639
3. 否認統購統銷的成績	644
(三) 关于工农生活問題	644
1. 誣蔑工农生活苦	644

2.挑撥、歪曲工农关系,誣蔑党的干部	657
3.誣蔑农村干部	666
4.污蔑党不能代表农民根本利益并主張建立“农民党” 和“农民协会”	669

四 工商業者問題

(一)侮辱無产階級,誣蔑党对工商業和資產階級的政策	674
(二)說“定息不是剝削”	674
(三)反对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改造,主張走資本主义道路	675
(四)反对对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677

五 知識分子問題

(一)否認党对知識分子的領導	678
(二)歪曲、誣蔑党的知識分子政策	679
(三)反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683
(四)反对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对教学改革	690
(五)关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696
(六)反对在高等教育中为工农开門的階級路綫	701

六 少数民族問題

七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八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707
1.歪曲百家爭鳴的方針	707
2.“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710
3.誣蔑、攻击、反对馬克思主义	720
(1) 否認馬克思主义是無产階級階級斗争經驗的总結,否認 馬克思主义是科学,誣蔑馬克思主义“过时了”	720

(2) 誣蔑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宣揚修正主義	722
(3) 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730
(4) 否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	736
(5) 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736
(6) 借口反對“教條主義”攻擊黨中央和黨的領袖	738
(7) 關於“獨立思考”	739
(8) 其他	741
4. 攻擊社會主義文學	742
(二)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745
1. 反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	745
2. 誣蔑黨的統戰政策	749
3. “民主黨派的存亡是由共產黨決定的”	753
4. 攻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754

九 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

十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

(一) 歪曲匈牙利事件的真象	758
(二) 說蘇聯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內政”	764

十一 關於節約

(一) 攻擊、誣蔑“三反”運動	765
(二) 在招待外賓問題上攻擊黨的領袖	767

十二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一) 關於工業化	768
1. 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	768
2. 誣蔑第二個五年計劃	769
3. 否定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成績	770

附 錄

(一) 誣蔑蘇維埃國家、黨組織及革命領袖	771
1. 對蘇聯各項成就的誣蔑	771
2. 對蘇聯黨組織的攻擊	774
3. 誣蔑斯大林同志	775
4. 攻擊列寧、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等蘇聯領袖	781
(二) 挑撥中蘇關係	783
(三) 反對向蘇聯學習	789
附錄一	796
附錄二	824

一 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

(一) 人民民主專政

1、專政与民主

(1) “工人階級有局限性”

“工人每个階層都有局限性，如产业工人，非产业工人有局限性”。“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在业工人、失业工人、工人貴族都有局限性”。“局限性就是由于經濟地位不同所产生的利害冲突，比如在业工人的局限性就是要拚命干活，就使得失业工人增多，而失业工人的局限性就是他們也要求工作就使在业工人不得不拚命干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刘 平)

“工人階級有局限性，我是同意的。党也是有局限性的。但这局限性和过去統治階級的局限性不同，党的局限性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工人階級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真正具有工人階級大公無私的高貴品質，如黃繼光、董存瑞等，但高而不可攀，很难学习，絕大部分是既为公也为私，既为革命也为自己；还有一部分是先私后公，品質惡劣的。”認為工人階級与知識分子在品質上没有什么区别，反而“工人階級是大老粗，穿破衣，拖爛鞋，領導是不行的；知識分子有知識，有文化”因此，主張“誰有能力，誰来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的材料)

“工人階級有局限性，知識不足，知識分子知識多，工人階級有片面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學生 刘达孝)

“从理論上說，工人階級与全人类利益一致，但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代表全人类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易志力)

“工人階級也不能例外，具有統治階級的局限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朱荣庭)

“我不認為我們应向工人階級学习”，“什么工人階級，人民都是抽象的，工人也不都是先进的。”“我在太原工厂工作，看到工人分三班工作，結果中班吵晚班，晚班吵早班，早班吵中班，有什么團結性，紀律性？”“工人为了爭獎金，爭工資眼睛都紅了，又愛喝酒，又違反劳动紀律，这都是我亲眼看見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朱惟民)

“我不喜欢階級斗争和改造人性的革命，我只喜欢改朝换代。”因而对現在的革命沒有好感，找許多理由去反对。說“过去中国的工人人数不多，解放主要是靠农民的力量，可是現在党和政府，硬把中国革命說成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硬把少数工人說成多好，把工人以外的好几亿中国人置于被統治的地位。这是党和政府根本錯了，太不公平，对工人太好，农民太不好。其实工人在过去和我們还不是一样？我認識一个工人，原来是卖醬油的，解放后入了工厂，就成为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技术不高，待遇高，又以領導階級自居。其实工人也沒有建立起新道德，报上也常反映工厂出事，假报成績等。历史上农民打的天下，結果打完天下就忘了农民。人民政府現在也在走这条路，很危險。”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的材料)

“党把工人阶级抬的太高了。几千年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一样发展，没有农民就不行。有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不领导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江澤純）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是有片面性的，这一点我同意林希翎的意见，硬把无产阶级说成十全十美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有片面性，因为（1）子子孙孙都是无产阶级的人是不多的；（2）因为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认识上就有局限性，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呢？（3）现在我们还没有消灭阶级，从阶级利益出发，从维护社会主义利益出发有利的拥护，不利就反对，如对印度对苏联等国的态度，有些话就不能全盘托出，这就是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士杰）

“工人阶级有局限性，并在逐渐走向腐化……”

“工人阶级的局限性表现在：（1）建国后统治者在逐渐走向腐化，违法乱纪，脱离人民群众；（2）对党所领导的工作，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如报刊，总结，文学艺术）；（3）互相监督的方针没有贯彻，党统治一切；（4）党员在国家生活中的特权，而群众没有；（5）工人生活的迅速直线上升，而农民生活提高却是缓慢的；（6）对资产阶级的好东西，全否定了，看不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房文齋）

“工人阶级局限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工人阶级从旧社会来的，受了旧社会的影响；二是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不高；三是工人阶级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有局限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有局限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芝文）

“统治者都有局限性。一个领导阶级与统治阶级没有什么不可逾

越的鴻溝，如果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領導者，不能，就是統治者。共產黨有腐化的可能，有官僚化的可能，匈牙利事件就是由於所處地位決定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鮑子津）

“要求全部發揚民主，國家各部門全要選舉，取消共產黨在各部的領導。政黨的產生是由於各階級和別階級的鬥爭。社會階級很複雜，但可劃分為兩個：基本利益相一致的階級（基本利益——即指這些階級利益和社會發展利益一致），基本利益對立的階級（和社會發展相違背）。很多時候，前者會聯合起來反對後者，而往往是前者勝利。但革命勝利後，基本利益階級起了變化，因為，社會發展了，這個階級變化：一種可能由於基本利益階級的消滅，所以，原來的基本利益一致階級分為對抗的；一種可能是仍為一致的。對於基本利益相違背的解決只有通過鬥爭，而另一種則只有發展生產力，表現在社會政治上即充分協商。社會發展史說明了此問題，如在封建社會，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三者基本利益一致，而和封建主對立；隨著資產階級勝利，資產階級成為和工人農民對立了。在此鬥爭中，政黨在起組織和領導作用（在解決那矛盾時都是一樣的，只是解決基本利益一致階級間矛盾時一直通過協商）。

在每一社會中，階級關係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於最後消滅階級，所以，各階級利益基本一致，因此，在此社會只適用協商，來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下有工、農、知識分子，他們之間在觀點方法上有不同。但一定階級政黨代表本階級利益，而每階級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政黨都有局限性，共產黨不例外。但國家是全民的，所以由政黨領導，一定能產生分歧。工人階級有局限性，表現在：大生產，所以要求社會化；農民則在改造以前要求私有制，改造後，公有制形式仍有兩種，由此不同，所以工农利益要求不同，因此兩者都有局限性。

每個政黨即使在大家中通過一些意見，它不足以消除其階級局限性。如1955年，國家向農民購糧，向農民多購了許多糧食，給農民帶

来了很多痛苦。国家为什么向农民要这些粮食？这是党的领导（虽經过国务院討論）。农民很不滿，他們总怕自己没有粮食，但干部在农村采取各种各样在报纸上找不到的办法。农民大部分是肯卖余粮的，但后来余粮虽卖完，由于数字还未达到，所以还得卖，农民們再三說明没有，但还不行。东北冬天很冷，干部在很冷的房子內把窗子开着，要农民受冻，干部在屋子內順序問，农民非常不滿。我不是在这里造謠。老百姓听到区委有人来开会，都怕。后来粮食不够，又得从城市运粮，来回运输。这說明，政策由共产党制定，虽經大家討論，但結果不免有局限性。

辽宁在推行苞米时，同时推行先进方法，农民最初有顧慮，去年一年，辽宁全种苞米，不管你习惯怎样，但老百姓习惯了吃高粱米。結果在去年一年，由于种得太密，苞米庄稼長得不好，农民只得砍，但政府不讓砍，也不顧老农經驗。有些按老办法却获得好收获。这由于党是有局限性，所以不可避免产生如上的惡果。

我还認為：当某階級、某政党一旦成为一执政党时，其局限性增長，所以矛盾增長，必然增長忽視他階級的利益。如共产党在革命期間和农民同甘共苦，但今天这种共甘共苦已很小了，如將軍的收入和一普通农民收入相比較，其悬殊很大。

但我認為，天下是人民打出来的，其中包括有农民，虽然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及其他階級的利益也应照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統治階級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觀規律，我研究很久，在很久以前不敢講，現在也还不成熟，提出大家討論。我說这是客觀規律，在社会上存在階級时这个規律便起作用；在私有制时，統治階級是對抗性矛盾，矛盾根本不可克服，只有推翻私有制。

对現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規律仍起作用的，当階級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社会主义社会規律可以被人来利用克服規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要有主

要的主觀能动性，在許多条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現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階級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內部矛盾，矛盾本身，表現在統治与被統治之間（領導与被領導），我認為領導与被領導就有矛盾，統治与被統治的地位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沒有不同則是無矛盾的，企业的厂長和工人的矛盾是看問題不一样，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發展下去，由量变到質变会暴發成对抗性，中国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玉門罢工），要看到现实这个規律在起作用，領導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如不加主觀能动性克服的話問題就会發展。不同的地位产生看法不同，本来是統治者，但一旦爬上統治（工人爬到厂長），說話口气也不同了，一切也就变了。”

“統治階級是有局限性这是个規律，這個問題我想的非常不成熟，我認為在階級未消灭前，历史上所有統治階級是有共同点的，有統治与被統治者存在，这規律就存在，但在不同社会起作用形式不同，在資產階級不是很明显的，私有者統治階級即便認識也無法克服，这是剝削与被剝削关系，这局限性是由經濟制度不可能認識和利用这一規律，現在应如何解釋这一規律呢？目前統治与被統治、是領導与被領導关系，這兩者我說的有点含糊，但我觉得公有制經濟制度本身有克服这一矛盾的可能性，領導者有可能認識这一規律的局限性，我們共产党有意識認識利用这一規律，我認為一系列改革（整风）都是克服这一局限性，領導与被領導之間就有矛盾，目前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如不解决，可能轉为对抗性的矛盾。目前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这样说呢？匈牙利、波茲南事件这是教訓，非对抗性矛盾不能解决最后爆發。我国罢工罢課也是有的，前些日子報紙上也有。北大学生会也是学生起来了，也不使用学生会了，我用一些自己見到的一些材料：

去年暑假青年报讓我去玉門采訪，一路上亲眼看見工人罢工，这就是矛盾的轉化，但党委报道亦称是反革命分子煽动結果。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沒有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硬說成反革命分子煽动，是幼稚的。

如何說作領導都有局限性的，因為角度不同，矛盾就在這裡，有些人爬到領導地位，就不同了，原工廠的工人提拔當了廠長後，就是一百八十度轉彎，與工人就隔隔不入了，我舉個例子，如：文藝界一年前向唯心主義開第一槍的李希凡和藍翎。他們是被壓制者，很多人同情，當他們爬至文壇以後就成為壓制別人的人，李希凡批評俞平伯起家，他就以批判俞平伯的觀點打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作者，說中央所在地不應寫出這樣的東西，說批判了黨中央這理論謬誤透頂了，李希凡和藍翎是我朋友也了解些，他們地位的轉化很明顯，我曾寫了“永遠是第一槍第一篇起家的李希凡”，在批判胡風時也是第一槍，後運動展開了批判，李希凡的觀點與胡風相同，後來又說是受壓力而寫出的，以後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發表專論他又是第一槍（“反庸俗社會學”）不久以前李希凡寫王蒙的東西決不是偶然的。當時陳其通一陣風刮來很緊張，和思想界很多相連的。當時人民日報雜文、青年報辣椒也取消了，凡有陰暗面的都取消了，在此情況下李希凡寫了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說明科學也看眼色行事永遠不會有科學，我作為讀者觀望一下如何沒有很好文藝作品出現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是文藝界握實權的我稱之為宮廷愚人，這些人眼睛是向上的。中央開一點門縫下邊就是七、八級風，周揚……等很多時間是跑飛機場，上宴會，當高級招待，他們是握實權的，但沒有什麼作品，僅是作個開幕詞、閉幕詞，文匯報等也有此反映。

實際生活也反映了這個問題，原是團員但一入黨就不同了，過去挨打的人當他爬上去後，打人打的更厲害，如資產階級工人貴族爬上後，更厲害，說明領導與被領導者關係，環境決定人的思想意識，到什麼地位變的非常之快，在同學們生活圈子中都可以找到。”

“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存在，統治者是局限性的客觀規律也存在，因為公有制基礎、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沒有根本對抗，所以領導有可能認識這個規律，黨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見黨認識了利用了這規律，克服這局限性，從黨過去、現在和將來準備實行的措施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程海果〔林希翎〕）

“程海果(林希翎)說：‘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實際上就是領導的局限性。’我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不同的社會制度里，作為領導者卻有其共性(即局限性)，但也有特性(即資產階級領導局限性不能克服，而無產階級領導局限性能克服)。’因為領導與被領導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在同一時間里是領導就不能同時是被領導，故作為矛盾的一個方面的領導者，不能沒有局限性，只是無產階級作領導者的局限性可以克服，而資產階級作為領導者的局限性不能克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 顧佩弦)

(2) “無產階級專政不民主是獨裁”

“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職能中有一條是說組織社會生產，這樣提不對，是為千年萬載不消滅國家打埋伏。”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劉平)

“過去教條主義對我們影響很大，我感到說話不自由，有些人不敢講，如果提出問題，不合領導意思，就說思想落後給人壓力很大。林希翎說：‘發牢騷就是對領導不滿，對領導不滿就是對組織不滿，對組織不滿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對人民不滿，對人民不滿就是反革命！’肅反中就有這種例子。”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謝德鈞)

“整個國家機器都是官僚機構，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從上到下的普遍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佟駿)

“三十多年來，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停止了發展。”“在目前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民主還是目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社會勞動人民的基本要求。”“對於這些少數領導同志說來(指中央政治局同志)民主是充分的；對於廣大勞動群眾說來，民主還是

缺乏实际的保証。”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党常說旧社会少数人統治多数人新社会多数人統治少数人。但几年以来,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当家作主的是少数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达)

“……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問題,無产階級要統治,專誰的政?过去总理中有民主人士,現在沒有,象征着对其它階級(指民族資产階級,农民小資产階級——編者注)的專政統治,統治階級也可以代表被統治階級利益,如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的領袖)上台后,代表被統治者的利益。”

“現在是無产階級專政,但有工人階級罢工,也有党、团员参加,这問題怎样解釋?是什么性質?”

“政府缺乏一个反对派,过去歌功頌德,使党自信心强,抬上去了,离开了五亿农民。說农民不先进,农民思想那一点不先进?过去不許找岔子,現在整风光是找岔。各民主党派只跟着共产党后面走,不敢提意見是不对的,有些民主党派自己找党監視,認為党是馬克思主义,有些党员不許別人监督,就是三反、五反,鎮反时政府中有几个反对派?”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楊維新)

“無产階級掌握政权,是沒有疑問的,为什么还要采取对一些人專政呢?”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中国的無产階級專政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如果搞不好,中国也可能發生匈牙利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教授 王衍臻)

“章伯鈞講資本主義有活力是有充足理由的，兩院制有優越性”。“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蘇聯也是兩院制”，“在民主集中制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沒有差別”。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劉 平）

“在人代會和行政機關的職員上，黨員不應過多，最好由專門人材（如工程師）實際掌握行政權力”，“政府機關（特別是縣以下的）職員，最好是按期調換，不終身做政權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煒）

“我覺得專政對象是少數人，只是黨團員專群眾的政。”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達）

“程海果（林希翎）同志提出解決辦法（指三害 編者注）——革命，我認為就是改良，從基礎上來改革，內核應改變，誰也不能居于統治地位，現在的領導就是統治。”

“國務院副總理是可以吸收民主人士及較公正、有工作能力的工農群眾參加。部委員會沒有權，黨組有權。部委員會是形式主義。部委員會應有決定工資權利和監督工作，任免幹部有參加意見的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肖 楓）

“在政治上，我們看到的是一些什么東西呢？是獨裁，是專權，是繼承了封建時代的統治形式。”

“對過去的政治制度要重新估計，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不一定要共產黨執政，可吸收資本主義一些好的東西。”

“我們現在的統治可以說是中世紀的統治方式，那時是神權，君權，現在是黨權，黨說了就算。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專政，把馬列主義當聖經，聖經上沒有的不許說，只能重複聖經的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大選天下賢能，我們五百万知識分子，中央統戰工作統的是多少呢？應該更放大一些，把所有的有能力的人吸收到合適的領導崗位上來。

在這種競賽中發展黨的組織，用新的血液充實黨。

一、大胆放手，把給黨員的一切權利也給與一切非黨人士（除反革命分子），包括學習、工作……等，使黨員感到有人和他競爭，這樣也有些黨員可能感到不安，但對黨有好处。二、把國法給行政機關，使其確確實實有權力。這不是脫離黨領導，如果黨的政策通過非黨群眾執行，力量是無窮的。三、我不同意以黨代政，我認為現時的有職有權並不解決問題，因為這還是少數。

這樣，全國六億人民就感到當家作主，鼓動人民有當家作主的感覺，不是為共產黨服務。這樣也會使黨感到返老還童，有生氣，將會力大無窮，能克服任何困難。”

“……誰有才能就可能領導誰……這樣做對某些共產黨員來說是痛苦的，不學無術不行了，庸庸碌碌不行了，官僚架子不行了，敷衍塞責不行了，硬搬教條不行了，最使他們痛心的將是打破了昏昏沉沉的美夢，用黨証做墊腳石，幾年一升，多少年後將成為什麼樣的干部的計劃打碎了……就拿知識分子說，那一個黨如果沒有取得知識分子真心誠意的合作，那麼這個黨就會一事無成……”

“領導作用不僅表示某一黨員對某一人的領導，而更重要的是思想領導，方針策略的領導。如果非黨人士領會黨的意圖，把它變成自己的意志……表面上看來是黨外人士在領導工作（他下面可能有些共產黨員），但這不是黨外人士領導了黨，而是切切實實黨領導了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楊 瑞）

“我們國家政權強大和黨的威信的提高，影響民主的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沒制度無保證……”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潘世元）

“民主党派应当有自己的政綱，我同意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国务院在討論成品之先，可以和民主人士一起設計，这是群众路綫。”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盧昱持）

“有人一談到民主就強調資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區別，难道我們現在就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嗎？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誣蔑，現在我們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是党的国家。毛主席說民主是手段，那就應該是全民基础上的手段。”

“若按現狀統治下去，就不会巩固，想說的不能說，想做的不能做，就要反抗。

問題是还政于民，如果党就是政，政就是党也沒有什么，只要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就行。今后党的方針是否能充分反映人民意志，这有困难。

选举是否民主，能反映每个人意志嗎？事实并非如此。竞选坏的一面是收买，二面手法，但这不是不可克服的缺点。”

“資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个性能够發展，比我們好得多。我們現在当然也有民主，自由等，但是很不够，权利是相对的，譬如死人也有权利，人死了，得給他葬身之地。我們現在不是当家作主的权利，我們現在比奴隶好得多，但政治上不平等，党团员能听报告，看內部文件，連看参考消息也要分等級。”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張祖文）

“……無产階級專政有階級片面性，苏联肃反扩大化就与此有关。人民民主專政沒有片面性，但現在尚未充分体现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

“国家机关有权力，就容易把矛盾处理錯……馬克思主义要政权領導建設，但苏联發展官僚鎮压权力，与資产階級国家机关沒有区

別，鎮壓權力的發展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

“無產階級專政是與社會主義相矛盾的。”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憲法是空口說白話，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憲法上規定的權利也沒有保證：八十三萬人不能升高中，這是沒受教育權；三八制在東北某煤礦未實行，農民和普通工人不能去療養，這是沒休息權；言論、集會、游行的自由也沒保證，只能說好，不准說壞，集會、游行只能是反帝(英法)侵略埃及或慶祝‘五一’、‘十一’等，誰也不能來反對政府和高干；新聞也是報喜不報憂，比如蘭州罷工(可能是指林希翎的所謂玉門罷工事件——編者注)未報導。因此憲法是白扯！騙人！”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王憲文)

“中央和毛主席說(民主)是手段，是打算不是給人民民主，以此作擋箭牌，現在所給小小的民主是形式，給民主黨派的職權是為了宣傳是假的，是幌子。外國來中國訪問，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都說有職有權，現在看看並不是。不反對專政，只要說得干脆倒好，就是一黨專政，但不承認。”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韓 楓)

“公安、司法機關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差不多……”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1. 我國沒有民主：

a. 只許說好，不許說壞。

b. 選舉制度不民主，對現在聯合提出候選人總覺得不對勁，而竟選呢？競選人可以提出現存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方法，可以對過去的工作作一個估價，可以向好的方向去努力，創造達到好的後果的條件，可以提出那些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只要能作到這些就可以選他，現在

选举只提候选人过去的情况,这能保证他以后作好工作嗎?

同意兩院制,各个党可以提出自己的綱領和自己党的候选人,誰好就选誰。

2. 宪法是虛偽的,沒有民主。

a. 我国宪法規定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都沒有保证。

b. 言論不自由, 只准講好話, 不准講坏話, 因此对宪法提出怀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社会制度的內容,首先,是基础,所有制問題,在我国即公有制,从私有制轉变到公有制,使我們消灭了很多病毒,另一方面是上層建筑,包括很多,这指基本的政治制度,又有兩方面:一,国体,就是無产階級專政,二,政体,又有兩方面:1,政体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2,政体的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从这几方面来看,都沒有問題。無产階級專政,公有制,都不能否認,不需根本改变制度,問題在于政体的基本原則,基本的組織形式,沒有推广到社会生活每一細胞中去,此即所謂社会制度的个别环节、具体环节、也可称具体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貫徹到許多环节,但目前是半身不随,它从区域系統貫徹下去,生产系統就沒有了,誰是高教系統的代表,就沒有了,我校有代表是海淀区,但海淀区市政問題和我們大学有何关系?看电影自己看,厕所自己有,食堂也有。在高教系統,生产系統这方面即半身不随,在生产系統方面是什么体制——党委制。从生产系統上看,是有头無尾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头,神經無法反映,我發言重点就在此,——在生产系統上,貫徹代表大会制,把党委制,一党代政的情况改变一下,不要党委制,改变成与国家政体相一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来。”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双軌一貫人大制’比党委制优越,那就是:保证群众路綫徹底貫徹。至于‘双軌’,还是‘單軌’并不重要。但‘双軌’比起‘單軌’神經更健全,更能貫徹群众路綫,因專門化能更快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見。

采用这种制度,就能克服党委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点和矛盾。假如党的指示正确,但群众落后,党的决议在人大通不过,这不是削弱党的作用吗?能否说:因党的指示基本正确,就可以用命令主义作法呢?我认为不可以。我认为,党若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善于等待,直到党已说服了绝大多数人相信党的决议正确时为止。鉴别党的决议是否正确,有两个标志:

(1)党的决议本身是正确的。

(2)决议的发布是适宜的(适合时间、地点、条件要求)。

党关于合作化的指示,就是正确的决议之一例。过去‘人大’通过党的指示时,总是全数通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党作决议时,就估计到了上述两点要求。党既然能估计到这两点,那么,有什么必要设人民代表大会呢?

(1)因‘人大’是党的决议的正确性适时性的测量计;

(2)‘人大’本身,就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场所。

但不能马上就实行‘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为此,现在需要加强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现行‘人大’制的前途,就是‘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

但‘双轨’人大制,也并不是极端民主。

我的观点的理论根据,是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77—202页)。

我探讨这个社会政治问题,在立场上是冒着三分危险的。如果斯大林错了,我就错了,如果我对斯大林理论理解错了,那我也是错了。但斯大林主要是在他后期犯错误,我相信斯大林那本书是对的,我也相信自己并未理解错。”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贺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专政与民主都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与毛主席的专政不断缩小的说法不矛盾;毛主席是指被专政的人不断减少)。专政的扩大表现在:(1)参加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人不断增加。以前无产阶级人数比重不大,随着社会主义建成,城乡无产阶级

級加上知識分子几乎囊括全民；(2)从專政所代表的利益看，無产階級的利益越来越小（按文意似应为‘越来越大’——編者）。如中国1949年时專政还不触及資產階級利益，甚至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而总路綫提出后，專政就只代表無产階級利益了。又如羅馬尼亞，1948年前是無产階級、資產階級分掌政权，1948年后国民議會改組，無产階級就对資產階級專政了。……

现在就談談中国民主制發展的具体过程：

从上所說無产階級專政的制度、無产階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等等，这些都是抽象的制度，它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是一种客觀必然性。它必須通过某些人根据这些原則訂出具体制度——国家体制才能表現出来。其二者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是能动的因素，形式是相对稳定的；内容的不斷發展構成了事物的量变，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突破形式，就要用更新的形式代替它，它就構成事物的質变。在我国革命胜利的初期，由于：(1)階級斗争复杂，無产階級力量不大；(2)人民内部思想不統一，覺悟不高，所以民主的范围就小。服从党的綱領政策——代表人民利益的綱領政策——就是最大的民主，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民主的表現形式就是半軍事化的国体，全国分六大軍区，城市由軍管会管理，等等。1954年随着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發展，人民民主專政亦扩大，其表現形式就变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机构亦改变了，人民获得了普选权。这个形式是完全适合1954年的客觀形势的。但是，三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有了飞速的發展，特别是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革高潮以后，1954年那种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像汪洋大海包圍我們的情况已經不存在了，五亿农民实行了合作化，資產階級亦已基本上改造，这就为人民民主專政进一步扩大創造了条件，人民要求更高的民主权，而現在作为人民民主專政表現形式的国家体制却还停留在1954年的阶段。因此，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現在已經不是調整某些制度的环节的时候了，而是要对整个国家机构作較為全面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

“我們國家的人民政權是官僚機構”。並且認為這個“官僚機構”是“三害”產生的根源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曾紀梅的材料)

“農民的生活太苦了，政治上根本沒有什麼權利，沒有民主。農民這樣苦，久而久之就會發生農民大起義的。選舉只是給統戰人物安排的，叫群眾選那一定是不行的，下面的一些幹部黨員因為唯命選舉，民主空氣非常差。”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單思良)

“選舉制度的民主而實際選舉上的不民主”

“……

農村幹部受舊社會影響很深，又加受本階級限制，不容易了解黨的政策，有相當一部分把自己看成是‘村中之王’‘鄉間的老爺’。還有一部分人是過去舊社會的流氓、二流子出身，因為在解放的時候，他們很愛出頭，很容易的當上了幹部。其實，真正老實的農民是不敢當幹部的。在农村中，有的幹部雖不得民心，却是鐵筒江山，一方面是欺騙政府和人民，一方面是欺壓百姓，更利用了舉手選舉的辦法，操縱政權。

但也有個別農民不同意（因為農民是誠心選出真正能為自己辦事的人），但這起不了什麼作用，因為少數服從多數嗎！例如在山東省的某次選舉中，幹部在台上威脅舉手，有一個貧民就堅不舉，那幹部就問：你對我有意見嗎？那貧農還是不舉。這當然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倔強而正直的農民，以後是要遭到苦頭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向春)

“有階級存在，政黨一定存在。由於階級有局限性，所以政黨也有局限性，只能使這些局限性縮小，辦法即通過競選。經過競選後，組織領導。由他們負責國家的領導，保衛國家，做一切事。為什麼競選能削

弱政党的局限性?因为:(1)竞选前提出了自己的綱領,而符合大家要求的綱領,才能被选上,这体现了大家的意見。(2)被选政党因此而会虛心,必須执行綱領。

充分發揚民主,竞选有下列好处:

第一、使全国人民感到自己是国家主人,所以工作积极,而領導由于真正受人民拥护,工作勤懇。

第二、可以防止一党專政,减少‘三害’,因为各政党必須和他党及人民联系。

第三、更好实行‘百花齐放’、‘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而竞选能做到这一点。經各党派爭論,对社会主义有利。

第四、可以將各政党有才能的人选为領導。

第五、在工作中有职有权。

在現在,竞选优越于名額分配,名額分配集中太多,民主太少。因为被选者都由党提出,虽經過討論,但并未有用,选第一屆人民代表,沈阳二中的选区代表选民根本不了解,而以后代表的工作如何,大家也不知道,这是区的代表,尙且如此。农村則更是糟,准备工作不充分。被选的人都听共产党的。近来报上登出民主党派有职無权(虽是由共产党提出)这就表明了这个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雅春)

“工人階級与資产階級一样,工人在工厂为工資也爭吵,为面包也打架爭吵,鬧不团結,中国很少有血統工人,工人階級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書上講的是抽象的工人階級中国沒有……工人农民是搞生产的,他們的知識很少,很难給社会制度方面的問題提供什么改进意見,这方面的改进問題还是靠有知識的人,所以应当很好的考虑林希翎、章伯鈞等人的言論,說不定二百年后人們將否定現在的路綫制度。

……在現社会中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保証,但知識分子与工农不同,工农只滿足于个人物質生活的提高。知識分子除了住洋房,

坐汽車之外，更要求精神生活，要更多的民主与自由。

中国沒有血統工人，老工人也有缺点，工人为工資而爭吵，为面包而打架，鬧不团结，没有什么可学习的，資产階級倒有可学习之处，他們在管理企业和用人方面就是好的，是值得学习的，美国的管理企业就是好，W社会主义就是好。”

（北京鋼鐵学院 章萼飭）

“中国农民比工人多，且农民在革命中的貢獻大，（如紅軍中战士多为农民出身）所以中国革命为什么不由农民来領導呢？”

（北京鋼鐵学院 陈德余）

“我不滿意工人階級領導，四个階級專政，就應該讓其它階級也能領導中国革命。工人階級領導是假的，工人階級字都不識，怎么能領導？！实际上是知識分子在領導。”

（云南大学 郝平山）

“所謂历史条件即是人們的思想水平、科学水平及生活方式，今天的人們不可能完全接受朱元璋时代的統治方法，也正像朱元璋不可能造出今天的統治方法一样，这就是历史条件起作用的体现。至于这一套統治方法，我們認為給他安上一个什么好听的名字都是可以的。因为，任何时代的統治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統治学說，这学說总是把自己說成正确的，永恒的，但是先进的人們总是要向‘永恒’宣战的。”

（云南大学 程荣昌）

“当前的政治制度，不适合于我們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那么是否應該采用暴力手段呢？我以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

（1）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先进的，領導者是共产党，是久經考驗的領袖，而群众的覺悟高。因而，完全有条件通过和平的方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相結合的来一个徹底改革，至少也是速

度不慢的演变；在演变中，依靠的力量是民主派，是共产党中、青年团中、各民主党派中的民主党派，是工人和农民，是广大的知识分子，而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应该而且必然站在民主斗争的最前列。通过群众的压力，通过争辩、说服，必然会使党中央了解到建立充分、彻底的民主政治制度已迫不及待的了。

(2) 如果采用暴力方式，只会使社会主义力量发生更重大的分裂，只会使反革命鑽空子，目前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却完全不允許这样做，匈牙利的經驗已全証实这一点。

最后，談談我的展望，我以为要达到民主政治制度的目的，困难很大，特別从最近的发展看来，困难重重，須要我們有毅力、有办法。坚持不懈的斗争，不畏惧大帽子，不畏惧各种看来可怕的威胁和压力。我們应当理解到，这种斗争对我国发展的巨大意义，理解到它的世界意义，理解到目前还無法估計的历史意义。我們就会勇敢的去斗争，去争取社会主义理应包含的自由和民主。我們要呼喊出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口号，并高呼万岁！”

(武汉大学 胡子雄)

“(一) 制度問題：

(A) 制度是人訂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二面性。制度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完善地步。必須破除人們对具体制度的迷信。”

(B) 無产階級專政体現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聖不可侵犯。……主觀与客觀的矛盾，人的思想意識落后于存在，这仅是产生三害的一方面；而目前官僚主义普遍的現象又如何解釋？历史上程度也不同，这又为什么？这是由于制度不同。

要擴張它还是收縮它，是制度与官僚主义接近还是远离，民主还是独裁。

如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程度不同，既变成社会現象，就要从制度中去找。不然，为什么会变或普遍流行？因为有些制度方便于成長。

在我国1954年宪法出来后，人們乐于歌頌却忘了切实保障。如肃反时对人身侵犯，以后又压制人們發言。公民人权無保障，法制不健

全。

又如选举制度，选举几名提名几个。

政治思想上落后进步在宪法面前应平等。但并不如此，如考大学许多人因政治条件不好而不取。又如政治课必修问题。明明宪法规定有信仰自由，而又规定教徒必修猴子变成人，这平等吗？

(C)不民主的统治方法，人民从何处监督。光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形式主义的签字，权限下放，实际上讨论机关都无权。

(二)可耻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思想懒汉，满足于作应声虫——恶劣的社会力量，对领导盲目服从，对指示盲目推行，对下压制。

若没有这股社会力量，官僚主义不可能到处横行。人们习惯于体会领导意图，以为左倾比右倾好，以为这是自己具有的身份，天生如此，还自认为立场稳。一些人，在以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良心何在？要摧毁这股力量，必须有积极力量对应声虫回击，尤其是抬轿子的人。

(三)思想上的问题。

‘愚民政策’——凡是使人民是非模糊的宣传都是愚民政策。如保密制度，连永利碱厂的产量也保密，有的地方连蒋光慈、黑格尔的书都不许看。

科学宣传的片面性，自然科学方面对摩尔根一棒子打死，对自然科学要谈阶级性，扣上一句唯心，加上一棒打死，把罗蒙诺索夫说成十大家，石像放在图书馆，似乎一切文明都成了俄国的。

人民盲目崇拜领导，便非常欣赏，认为立场稳，于是积极分子提拔成了官僚主义。把信仰代替知识，首先是信仰，把知识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

上述之方面汇成了一股洪流。”

(北京大学 張錫珉)

“好多人坚定不移的以为我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民主，但却又有人发出‘民主已乘黄鹤去’我们不如资本主义民主等各种言

論，我想大胆地把兩個矛盾的意見論一論。

一、民主的階級性，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的意思，做主是一個行動，沒有階級性，階級性來自前面的所謂‘人民’，人民不可能是所有的人，只能是一部分，在美國，主要是資本家，少數人，在社會主義國家（如南斯拉夫）也包括將來的我國，是工、農、知三個階級的大多數人，所以民主的階級性是使用者掌握民主者的階級性，不是民主本身的階級性，民主是個工具，被何人利用，就服務於何人，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沒有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別。

二、民主的真偽：——蛇無頭不行，民主必須集中，把人民的意志集中執行是真民主。集中許多人意見由帝王一人來決定的獨裁，也帶有充分的‘民主’性。

相反的先集中了或者說先基本上決定了才讓大家舉手的民主是假民主。形式主義的民主，帶有獨裁性，美國、英國民主有充分討論競爭，有辯論和不信任票的真民主，而我國不論大小由黨領導，一切事務……先以決定，不許反對，沒有競爭，是假民主，什麼也沒有給與人民愚民政策，便說明其虛偽本性，真是：人民纔是大多數，不能作主也枉然。

帶着三害的人們，被‘階級性’沖昏了頭腦，敵視過去的一切（不是空氣和自然科學都有階級性），拋棄了人類幾千年鬥爭的成果，要創造空前絕後的文明，結果弄巧成拙，搞出個不三不四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形式上富麗堂皇，實質上不如美國的民主，而且某些地方比某些封建帝王的個人專政還不如。

清醒一點，民主只有一種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最廣泛的民主，就是使我國工、農、知三個階級的每一個人民不受競爭限制地享受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本來是屬於人民却全為三害奪去，我們要收回，和三害鬥爭到底。

依教條主義分析方式得出的結論！！？

‘國民黨好得很！！？舊中國好得很！！？’

‘民權是實現人民的權利你說不好封建好！’

‘中华民国不好，滿清帝国好！’

‘你反对国民政府……是反对三民主义，叫滿清王朝复辟。’

‘你看我們不要纏足留辮子，不是自由多了，你去問誰不滿意。’

‘你說我們不好，日本帝国主义好，你反对政府，說(?)三民主义不好，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好。’

是呀，你的話都对，你早出生十几年，我們也用不着革命建立联合政府和現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毛澤东一再說明三民主义是好的，也要反对三民主义的罪坐牢。

共产党应当解散，到国民政府去为虎作倀。‘謝謝！你的理論真好計(?)真高呀，你把我們和国民党比，你是否作第二个毛澤东，把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不敢，現在不必要，如果長期不整风，这样的人不少。”

(北京大学 蔣兴仁)

“共产主义产生在先进的民主的西方，首先成功在落后的、穷困的、不民主的东方，由于东方穷困、落后，因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对比格外鮮明，群众特别乐意接受它。然而东方的不民主傳統，却給共产主义蒙上一層灰，使得錯觉者以为不民主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就太使共产主义委曲了。由于共产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仍然頑强的透过这層不光彩的灰層，对人民，对世界發出了强大的吸引力。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一旦揭开了这層灰，共产主义对于世界的吸引力將不知强大多少倍。”

(武汉大学 胡子雄)

“我 看 民 主”

一切社会都有民主

“顧名思义，民主就是群众自己支配一切影响自己的共同事物。只要有社会，就有民主，因为分工协作的生产劳动，本身帶有互济的性質，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各个形态的社会都有民主，作用

的範圍不同而已，民主生活由来已久，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民主化是社会發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合作的扩展深化，民主生活必然的随之相应發展。因为：第一，个体愈是依賴于集体，对社会共同事务就愈关切。第二，个体在經濟共同体中的地位愈重要，民主要求就愈快得到实现。縱觀社会历史發展大势如此。

民主的階級性

在階級社会中，民主帶有階級的烙印，統治階級允許基本階級的成員，享有較多的民主，以便集中其階級力量，鎮壓被統治階級。对被統治階級則力圖縮小其民主权利，以分散力量，削弱反抗。

不能認為民主只涉及階級斗争。原始公社的集会議事，公选領袖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現，也不能設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消之民主。

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

几百年来‘民主’一直是先进的社会理想，資產階級，喚醒了民主精神，随着轉化为它的敌人，無產階級宣布自己为新的民主旗手，但在已經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却作的很保守。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

人們在生产資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質基础，人們第一次也可能發展个性，自由競賽的均等社会，但是这种巨大的潜能，迄今远沒有充分展开。

在現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作为手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我們的中心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目前民主居于服从地位，但又必須充分利用‘民主’这一有力武器，才能团结全民实现反帝建国任务。

但是也是目的。既然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建立更高类型的民主，就必须承認它也是目的。

民主化問題上的保守傾向

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是存在这个偏向的。表现在人民群众不能确有把握地监督国家工作，法制不够严肃。民主权利如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自由权利沒有徹底实行等方面，这种情况大大束縛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我們的国防威望。

必須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沒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說，要求它的上層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們現有的政治理論、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个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層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日益显露，并尖銳的反映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为了消除‘三害’，發揮全民积极性，單党整风是万万不够的，必須在这个基础上，大刀闊斧的进行上層建筑的改造和建設。

为此首先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实际压力、限制，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輿論来。”

（北京大学 叶于沅）

“我国解放后的政府不是联合政府，而是無产階級專政，資产階級只能服从，听話就要，不听話就一脚踢开。”

（北京政法学院 杜汝揖）

“尼赫魯是当代最偉大的人物，印度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尼赫魯是社会主义者。”当时孙荳和反駁說：“印度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印度沒有無产階級專政。”章文岳則答道：“你們教条主义者就抓住这一点乱套。”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的材料）

“党的最終目的要解放全人类，工人階級是在解放了全人类当中才能解放自己。这兒所指的人当然不仅是指我們所說的大多数，而且也應該包括少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觀點来看，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如喜兒)不僅指勞苦大眾,還把剝削階級變成了吃人血的鬼,這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產物,也總有一部份人作這樣的鬼的,因而新社會同樣有歷史任務把他們變成人。因而大多數人專少數人的政不是不可以,我是認為這種理論指導不是先進的理論,而是以牙還牙的理論,只是階級立場不同,沒有什麼進步作用。”

(北京石油學院 王永常)

“你們不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宗派主義,不要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了黨專政。這種統治是奴隸主統治,是奴隸主專政。黨員不承認別人有人格,黨員沒有革命的人道主義。因此由於宗派主義造成黨外老先生和其他的人都變成了奴隸,只不過我們這些人是沒有帶枷鎖的奴隸而已,受到非人的待遇,是活的奴隸。所以我們現在倒退了几千年。……這種情況嚴重的影響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壽命,奪去了學生的青春。”

(武漢大學 姚梅鎮)

“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必要是可以懷疑的,至少馬克斯沒有強調過,是列寧加進去的。”

(北京大學 楊路)

“兩院制沒有階級性,它可以克服官僚主義,自然界處處存在平衡,社會界也一樣,民主黨派應該對黨起平衡作用,採用兩院制,兩黨制,可以實現這種對共產黨的平衡作用,兩黨制還可以克服獨裁而存在。”

(北京礦業學院 董芳庭)

“人類已經進步到使用原子能了,居然有人還想用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方法對群眾進行統治,我認為這是愚蠢的,也是不會成功的。

任何形式的獨裁政治和特務政治(指黨的政策)都要為世界上洶湧澎湃的民主潮流所沖垮的。”

(蘭州大學 曹覺民)

2.民主与集中

“对敌斗争紧张情况下，必須強調集中，而今天則要求較多的民主，否則就不協調。例如保密制度过去是为了防敌人，今天再用防敌人的办法来防人民就不協調。”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我們的會議多是形式主义的討論。既然事先已开过預备會議，成品既定，何必还要走一个形式的大會討論通过呢？如果不是多此一舉的話，就是給它穿上一件民主的外衣。”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解放后是不是工人当家作主了呢？我觉得一般普通工人仍然是作为盲目分子，只听指揮的份兒，工人做了代表、厂長只是个別的而已，現阶段工厂工人仍不能作主，这个制度不好，只有工人委员会才能使工人真正当家作主。”

（北京鋼鐵学院 彭卓宗）

朱認為学校不民主，污蔑学校討論計劃，評薪，評獎等重大問題都是形式，不民主，是領導拿出成品，大家举手通过就完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数学教員 朱章瑤的材料）

“集中太多，民主太少”，“現在是內部矛盾，應該扩大一些民主，不能以党团员的生活来代替全国的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党团员有民主，群众沒有民主，整风前沒有民主，整风后才有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八大以后只是少数人上層領導，人民有什么权利？談得上什么选举？应給人民充分权利，报上常說‘放寬’民主，民主应是人民享受的权利，为什么操縱在少数人手里来‘扩大’‘下放’呢？好象要‘放’一部分，还要‘收’一部在手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經濟上应是进步的，而且在政治上也要是进步的。”“选举問題我覺得党决定圈定誰，就选誰，这是一种形式的民主，覺得直接选举才是民主，覺得人民沒有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达）

“看到波匈事件，我們的民主集中，太集中不能分散，領導偏听偏信或思想僵化，損失很大。”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陆 戈）

他反对毛主席“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說法，說“人的生活有兩部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二者同等重要，不能偏重偏輕，就物質生活来講，民主自由的确是手段……而就精神生活来講，民主自由的确是人們的渴望，人民不可少的要求，也是人們所要爭得的目的，因此在精神生活方面，民主自由却是目的，不是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芝文的材料）

“我反对有领导的自由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嚮往資本主义自由，去年反对侵略埃及游行时，我在日記上写道：这是党叫我去的，不然我不会去，这种自由束縛了我，現在搞牆报还得党委批准。

选举时，我没有感到兴奋和激动，今天的选举和过去的选举没有什么兩样，提名选举是圈定。

党干涉我的自由和創造性，我起草一个报告要送到市委审查，这有什么必要呢？报告上非有这样的公式‘在党的领导下’，我工作中也没有党员哪！”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李之杰）

“現在形勢變了，民主要多些，集中要少些，要給予人民更多的民主”，“黨要使知識分子能夠自由討論、自由研究”，他反對計劃學習，反對集體，要求個人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的材料）

“我們國家沒有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便於領導控制群眾”。把民主集中制原則說成是便於領導對群眾“各個擊破分而治之，象滿清以十萬人統治全中國一樣。”不滿意我國當前選舉制度，說：“候選人沒見過，划個圈就完了，是形式”。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的材料）

“少數人的集中怎麼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呢？一集中就有困難就不好辦了，就會犯錯誤”。他認為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提出了民主化的問題，認為我們國家集中多了，民主少，特權是有的，人民還沒有民主習慣，群眾的監督作用還沒有發揮，說我們的整風就是黨中央巧妙的向民主化的道路上轉的，提出“委派幹部，統一分配是不好的，可以選舉的地方幹部都要選舉產生”，並說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民主與集中的矛盾，宣揚對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會感覺興趣，認為這種管理辦法可以促進生產積極性，防止官僚化。對這種民主管理方法，黨組織不直接管理企業等方面非常同意，並說：“我反對嚴格的組織，這會束縛一個人、也必然會使某些人過於集中，權力過大。”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楊一楓的材料）

“社會主義民主是有名無實”，“我想到人民代表投票時是不是自己感到有權利呢？沒有，對自己一票的權利感情不濃厚，不實在”。“我們過去沒走過資本主義社會，其實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有些方式是好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 章 起）

“人大是表决的机器”。

(北京矿业学院 何健华)

“一个选一个形式主义，人民代表大会，什么东西都是举手通过，如果共产党提出的意見錯了，人代会也就跟着犯錯誤。”“應該有激烈的爭辯有通过也有否決，吵吵嚷嚷的。象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沒有意思，縣長鄉長雖由人代会選舉但沒有落選的。犯了錯誤，只要黨委提名仍然當選。”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王犁剛)

“任何政權都阻礙個性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也阻礙個性發展。”“我國只有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沒有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即只有集中沒有民主），人的個性自由發展，是人類燦爛文化的源泉。”“一個青年無論在黨和領導面前不唯命是從，我認為是最有高度教養的表現。”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傅鉄城)

“國家機關、黨內、群眾團體等組織中過於強調集中，紀律、下級服從上級、使幹部、群眾不能自己真正當家作主，掌握自己命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榮庭)

“廠長負責制集中多，民主少，這樣生命力就不強”。“高度集中在戰爭中十分需要，今後不能只有集中，民主少了不行。同學們考慮高度集中是否適合。”

“我國民主無保證，集中有保證，如你對評工資不滿，提意見領導說‘考慮考慮’，他可接受，也可不接受。”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人大的領導與被領導就不同於北大，人大的領導是貫徹了民主集中制，有些軍事化的現象，而北大雖也貫徹了民主集中制，

但因馬寅初先生的作风頗有新旧融合，兼容并包的状态，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在人大表现是绝对服从，在北大表现虽也是服从，但在服从中就有些缓和商量的余地，具体到群众关系上說，北大做到了从群众中来来到群众中去而人大仅做到了从群众中来（据上文意可能是到群众中去——編者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授 郎朗天）

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重大政策方針都是在政协商量好之后，才拿来人大作形式的通过，在政协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代表人民，只代表他们自己，所以真正的权利是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人民群众沒有行使真正的权力，所以政权形式要改变，要实行南斯拉夫那样的公社工人委员会等專政形式。”又說，人大代表知識不够，特别是工人、农民来管理国家大事不称职，說我国不該成立象現在的联合政府，認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沒有条件也不必要，民主党派头头最無聊，只是参加些欢迎会，人民不需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参加政府不必要。政权机关沒有真正权力，什么都俯首听党的分咐。党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这样就“不民主”。

他怀疑中国、苏联專政的形式“是否最适合”。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凌国星的材料）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起会来总是歌功頌德，不經過認真地討論就通过一些‘对……表示滿意’的公式化決議”。要求“改变选举制度”，所謂糾正“由党包办提名的現象”。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俞国亮的材料）

“資产階級国家的二院制有可取之处”，主張“实行自由竞选，允許向选人發表受选演說”。他說：“国民党选举时搞得很熱鬧，能吸引人”，而“現在的选举規格死板，簡單得很”，是“形式主义”，“选出来的代表不起代表作用”，“这样的选举不如不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的材料）

“現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許多問題，你看！農村選舉還用舉手的方式，誰要不舉手還得強迫！就是咱這裡（指東四區人民代表的選舉——編者注），不也是那麼回事嗎？選誰早已規定好了，你只不過去划個圈罷了。我們認識誰啊？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東四區人民代表！

今後選舉應該用競選的辦法，讓各黨派（包括共產黨）都一起宣傳，選上誰算誰。”

“各個階級都應有自己的政黨為代表，工人階級由共產黨代表，農民階級由農民黨代表，知識分子由民盟代表，這樣才能充分反映全國人民的願望，才能反映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的要求，這些政黨在‘共同綱領’的約束下實現社會主義，在實現社會主義過程中，實行競選執政。”

“如果當選的都是共產黨員，那麼這也好，這樣他們（指民主黨派——編者注）也甘心！

如果資產階級執政也沒關係，我們用憲法條文規定下來：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單思良）

“國家機構中也要用直接選舉，各政黨可以競選，不是以政黨名義來競選，國民大會和政府機構中職務根據選票多少來分配，國家由國家銀行和計劃委員會來進行調配全國經濟，軍隊中最好也要進行選舉，這是自由的‘中華人民自由國’……”

“經濟公有，法律保護公有制，法院由各民主黨派參加，互相監督”。“行政機構人選需要向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如不好，人民可以罷免”。“軍隊通過民主選舉，可能進行改革，軍隊誰掌握要看選舉，要看軍隊同意那個黨來決定”。“通過報紙公開宣傳理論就能到軍隊去”。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 殷九如）

韓認為競選、議會制度才是民主的，認為我國的選舉制度純粹是形式主義的民主，實際是黨包辦一切。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韓楓的材料）

“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名額相同，事先討論候选人名單，最后沒有問題了再投票选举……是一种形式”。“在选举中党员投票只是向党尽义务，团员投票只是向团尽义务。”“人民代表的产生应自下而上，有些地方‘有领导的民主’實質上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民主外衣，人民多以履行义务，多以信任代替發言权、代替民主权利，而领导也多以‘信任’强加在人民头上。”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我們国家的选举制度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每次选举都是由党組織提出候选人名單来交下边討論，人都沒見就选了”。“在第一次普选时党要求团员必須选党已醞釀好的人，这叫什么民主？这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民主”，“資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时一定不会象我国这样。我要的是全民的民主，叫人民自己来选候选人，选代表，而不由共产党包办选举”。“我国选举上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民主就是不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平希）

“改变国家选举制度，（包括党团工会选举）反对候选全部由领导提名，应讓群众决定自己的代表或领导人，建議候选人除領導上提出外，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如得到一定人数的支持后，应例为候选人。”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一年四班 大字报）

“我主張今后党团干部应認真选举，条件成熟，不应从上而下提名……我主張不仅要开选举大会，也应该开罢免大会，这种权利我們應該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伍士杰）

“党喜欢誰就选誰，党提出誰就一定能选上誰，我不同意定額选举”。“基層选举也是一种形式，到校后第一次选举，我們要有个学生代表沒得同意，这是何等民主！所以我选举时半負責半不負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我国选举也存在严重命令主义,有些农民不愿意选举政府事先提出的候选人,可是在干部命令下也选举了。”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学报)

“不是直接普遍选举不民主”。“人大开会代表們的發言稿一定要经过审查(?)，我認為这种做法不适当，不能說这种做法是充分發揚民主，代表們是經過人民的选举，受到一定資格审查，那末为什么还要审查他們的發言稿呢？也不能充分發揮民主，主張在我国实行兩党制、兩院制，其結論是‘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应吸收資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結合起来創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芝文)

“我觉得人民一方面有权(选举人民代表，宪法上保証的种种权利)，但一方面又没有权利(在基層崗位上)。因为从国务院到自己的頂头上司完全是由上而下任命的，不是由人民选举的，或可罢免的。虽說领导工作时，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見，但究竟不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利，單憑领导人一顆为人民服务的良心是不够的，因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得以生長，我觉得这样做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所以人民不是真正有权的。”“我希望建立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学校一方面由上級领导，一方面可由大家自治，群众可以选举校内各級行政领导(如院長，教務長等)制定重大事項，只要能貫徹国家的政策，不与之抵触即可。”

(北京石油学院 王光燾)

“我最反对說民主集中制只是馬克思倡出来的，其实資產階級政治学者倡导民主时，也特別強調領導，領導就是集中。事实上資本主义国家还不都是有民主集中制嗎？集中是手段，沒有集中，民主权利怎么行使？問題只是資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范围狹窄，只限于資產階級一个階級的民主，而我們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

(武汉大学 曹紹濂)

“民主集中制是助長三害的主要原因”

“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二条原则是值得研究和补充的。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没有可能作到这一点呢？由于人們的主观認識不能100%符合客观，更由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处于不同的地位，應該說这种可能性大大地减少了，也就是說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的集中，这是次要的也是意料中的事，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民主集中制在这一点給予领导者过大的权利，下級对上級只有服从的义务，并没有严格地約束上級的权利，虽然是脱离实际的集中，但是领导者也只好貫徹执行，一直到领导者良心与党性的發現或者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能改变领导者不合理的集中，这样就大大地助長了官僚主义的流行与發展，我們認為民主集中制應該补充和發展也就在这里，給予被领导者更大的权利变成成为关键性的問題了。

我們主張給予被领导者更大的民主权利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办法！有一条原則必須承認‘人民群众有权利决定和选举自己的领导’这原則的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有的领导人物不是自己選擇和决定的而帶有强加的性質，我們現在就应该把这原則广泛用于各个方面，使被领导者在上級的领导下或通过其他形式对本單位的领导，所頒布的決議，指示具有否定的权利，对领导者直接行使罢免权。”

（北京石油学院 叶竟章、侯思明、朱介端）

“論現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摘录）

“目前选举方式是党团提名介紹个人优缺点，投票选代表，再用同样方式选举领导机构，沒有竞选活动不說明被选人怎样工作，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好像选模范一样（其实并不模范），因此實質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理由如下：

（一）提名：提几个选几个，虽說可以选其它的人，但沒有竞选，不知另选何人，几个人想另选某人，也等于廢票。

（二）提名时是介紹候选人人品，如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作

風正派(?) 聯繫群眾(?) 等, 不介紹他將怎樣工作, 百分之百的通過, 表面上是人民作主, 實際上把主權讓給他去獨裁, 選舉實際上成為人民出賣主權的手續。

(三) 這種選舉產生的領導, 其工作合乎人民需要也是自然的偶合, 產生‘三害’確是必然的結果。

(四) 選模範(?) 式的選舉可能選出有德(?) 無才和不願工作的人, 把工作搞糟。

(五) 這樣選舉產生的機構的工作不易得選民的了解, 提意見也不知多數少數, 采不採納, 怎樣採納, 由領導個人決定, 根本不一定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 名義上的主人, 選舉者根本無法干預工作的進行, 實際處於被支配的地位。

怎樣選舉才民主

選舉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體現, 要作到這點就必須實行有以下兩個特點的選舉方法:

(一) 選舉前有競選——由候選人向選民介紹他被選後的工作原則和實現此原則之初步計劃——總稱施政方針說明其好處缺點。

(二) 選舉後被選人必須向選民報告工作計劃執行情況, 困難, 缺點和對當前重大問題處理方法, 舉行辯論會及討論會, 在原計劃未執行和有新問題解決方法不令人滿意時要投不信任票, 罷免改選。

(1) 選舉充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 選民是選自己的意志, 不是選某人的人品。

(2) 保證工作, 代表人民意志不是代表個人意志, 不產生獨裁和嚴重的官僚主義。

(3) 保證選得其人。不稱職不願工作的人, 不敢競選也提不出代表人民的施政方針也不會選上。

(4) 選舉的機構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執行者, 施政方針已得人民同意, 更易深入人心, 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

(5) 直接受到群眾監督便易防止三害。

民主方式执行原则

- (1) 从基層作起，从百家爭鳴已經开展的地方作起。
- (2) 供給任何人竞选的一切物質手段。
- (3) 消除一切顧慮，鼓动人們提出各种意見，竞选綱領，互相批評。

(4) 用法律保証沒有拉攏，收买，威胁人其它任何破坏宣傳和选民选举的行为。

(5) 党的领导体現在提出正确的施政方針，派出优秀的竞选人，不体現在其它制度上，这样的领导才是人民选出的，不是强加的，才能够連系群众，不产生三害。

实行步驟：

(1) 首先在北大試驗民主选举学生会，然后推广到各高等学校学生会，各地群众团体，合作社，工厂等基層單位，以致全国政权。

(2) 在北大实行的步驟：——馬上确定学生会任务，宣布具体选举法，在本学期开始，候选人提名，提出初步竞选綱領，收集同学对学生会的希望和意見，进行初步的宣傳和組織活动，在放假前正式确定，候选人名單，各提出完整的竞选綱領(工作原則和初步計劃)利用各种形式正式展开宣傳活动，下学期初步进行选举，建立民主学生会。”

“反正一样——再論現行选举方式的虛伪本質”

“現在选举不論是选班会，学生会，党团幹部，还是人民代表，在候选人介紹时除个人經歷出身不同外，都是千篇一律，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积极鍛煉，努力学习，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等等，沒有多大区别到处照搬反正一样，而且这些内容既無客觀标准，又是介紹者主观感受，所以你选何人作何事反正一样。投票建立在相信党相信党組織所提出人选的基础上，結果等于履行指派公式，选不选都是一样。而在基層选举上有时指派不令人滿意如其他人另有工作無人可选这幹部只可作此，有缺点可以帮助改正相信党团可以帮助他为借口勉强通过，履行公式假裝民主把旧社会残余裝飾成社会主义形式便歌功

頌德达到固步自封，保持官僚主义个人地位的目的，这是阻碍社会主义现实的方法，民主与否根本不能保证。”

(北京大学 蒋兴仁)

“不同意民主集中制，不同意有领导的民主，如果把民主看做是手段，那是对人尊重，正好给干部犯错误找到了借口，因为用不同的手段，达到同样的目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讲师)

“三害根源是‘主观加权力’，所以仅整风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权力上着手……修改民主集中制，下级不一定服从上级，少数不一定要服从多数。”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组织决议是硬灌，是‘压力加工’，是党员不学无术，不动脑筋。我同意卡德尔关于取消党的组织领导的说法。我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和民主集中制有关。”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官僚主义。在我国只有集中，谈不到民主。”

(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党政权力过于集中，好像下面只是执行，解决问题不及时，这是民主和集中的矛盾，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委，整风中千万条意见都集中在党委九个人身上。(原发言稿上还有：人民只是成为办事员，等待上级安排自己的一切。)应该把权力集中在最反映人民意见的形式中，如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学生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等，不一定要都集中在党。所以权力应下放，使人民真正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思

想。

(原發言稿上還有：我們應採取能充分發揚民主、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形式。

(1)容易全面和從各個角度反映人民群眾利益。

(2)容易使領導接近群眾，減少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

(3)易受人民監督，發現缺點及時糾正，有意見及時提出。

(4)容易從實踐中體驗群眾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力，不稱職可以撤掉，不易產生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過於集中不能發揮群眾監督：(1)會產生主觀片面、獨出心才，把個人意見當作黨的政策。

(2)會產生個人崇拜(原發言稿上還有：和縮小人民群眾的作用)，蘇聯為什麼產生個人崇拜？因為各方面最高領導都是斯大林，什麼報告都要他做，但不一定是他寫的。目前我們一個小單位的首長作報告都是秘書寫的。這樣會把他人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

(3)會產生幹部思想腐化，隨着地位的轉化而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見。(原發言稿上還有：我認為人們思想有兩重性，一種是維持自己生存的本能，使自己如何生存得更好，因而產生個人主義；一是獻身於世界與人類，怎樣為大家多作事，因而產生集體主義。)如果個人利益戰勝集體利益，就會有變質的危險，特別是當前的生產力水平還不能作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往往單憑自己的工資收入不能滿足的消費水平，有些近水樓台先得月，產生古語：‘飽暖思人肉’，所謂特權、優先權。有些人忘本，丟掉自己的養人，不奉養自己的父母。如過去許多幹部在戰場上、敵人的法庭上受得起考驗，但卻受不起糖衣炮彈，如三反、整風都得以証明。

(4)會產生宗派主義，官官相依，群眾是遙遙相隔，不易接受群眾監督，上台也不容易下台。”

(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學生 李光濟)

在“八大”決議一致通過的那天，章文岳說：“有的代表不願意也

不得不举手，有不同的意見也得通过。”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的材料）

“社会主义制度是领导人說什么算什么，領袖有特权，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受到了挫折。”

“社会主义政治不民主，一党制，一个領袖，除了自我批評外，就沒有改进了。”

（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

“人大举手表決是形式，不举手不行，不举手怕当反革命扣起来。”

（北京矿业学院 瞿耀国）

“在各种場合的會議上群众提了好多意見，結果领导一总结，群众意見就完蛋了。決議底稿是事先印好的，当场举手通过也不过是形式而已。如果大家有意見时，就来个原則通过，会后考虑。結果意見并沒被采纳。”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講師 侯大乾）

“我国的选举不民主、不是直接选举，而是党提几个后选人就选几个，这是形式主义、不相信群众。”他主張：“一切領導干部都应由选举产生。”

（北京政法學院 陈述庆的材料）

“候选人名額与当选名額相等不民主，代表由上級指定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样选举的結果，因为代表并不是真正由群众中来，勢必使組織与群众之間造成一条無形的鴻溝。”“按照現在选举方式选出的代表会造成：（1）候选人不是从群众中来；（2）代表不是为群众平日真正信任的，也不会是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的人；（3）代表只对上級組織負責而不对人民群众負責；（4）妨碍对群众中新生力量的提拔；（5）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

“現在基層選舉單位選舉政權代表時所採取由領導提出後選人，以及選幾個代表就提幾個後選人的方式不好不民主，實質上是一種包辦的性質。”

（北京政法學院 陸紹祁）

“等額提名選舉制不夠民主、無可選舉。”

（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一種民主形式（意即形式民主——編者注）7月份才通過1957年國家預算，都執行一年了才通過，這是‘先斬後奏’，這是不民主的。”

（北京政法學院 趙日月）

“我們選舉制度有少數人強制多數人的可能性”。“人大政協是傀儡。”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黨支部提名實際上是強迫包辦，這是大家的事，讓大家自由提名，自由選。”

（北京政法學院 田維剛）

“基層選舉近似包辦代替，候選人群眾不了解，領導上如信任某人，於是把他優點夸大，群眾相信了，投了他票，而選上了。我懷疑這樣，怎能說選舉方法最民主呢？又怎能保證不會出問題呢？候選人要多提些人，而且我認為最民主的方式是讓他們來競選，讓他們與群眾接觸，發表演說，讓大家來鑒別，而目前的形式是包辦代替，沒有真正民主。”

（北京鋼鐵學院 彭卓宗）

“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民主和自由。在美國還有‘工人日報’而我國連資產階級報紙都沒有。自由、民主可以當做目的來爭取。

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根本不代表人民，代表不是人民选举的，也不能代表人民，鋼院就是如此。代表不能代表我，我也是听介紹选举的。民主党派永远也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他們沒有主見，是傀儡。”

（北京鋼鐵學院 章平舫）

“目前我国选举制度是有問題的，沒有貫徹兩個問題：（1）沒有貫徹候選人對黨和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因此候選人片面的強調對黨負責，而忽視了或脫離了對人民群眾的聯繫；（2）沒有把信任黨和選舉代表既統一又分開開來，因此實行選舉時多是單純信任黨而不考慮代表本身，這就易產生官僚主義。‘哭聲’提出實行競選制等，我覺得這些形式可以考慮，這樣做有好的一方面，如聯繫群眾，不靠黨吃飯等。也有壞的一方面，如張三為了當選，就在群眾面前夸夸其談，把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對立起來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盧晁持）

3. 民主與自由

“現在缺乏人情味，父母都搞不在一起，人情是如此淡薄，這是一系列的階級鬥爭，馬上反面不認人，受原則性束縛。”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林希翎說：“歡樂中充滿着空虛。”鄧芳松說：“我完全同意，五年的大學生活，很枯燥，不自由，不能發展個性，過去作團的工作，感到沒作多少好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助教 鄧芳松的材料）

“思想控制是控制了人的個性。黨怎樣說，就怎樣做，不敢自己去想怕离經叛道。”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俞國亮）

“目前階級鬥爭已結束了，形勢有了轉變，所以公安機關，人事制度，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應該取消……”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韓運德）

認為參考消息正確、全面、真實，對黨報的消息卻懷疑；對美國之音很感興趣。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楊學良的材料）

“西歐國家的人民生活並不是一天比一天壞，政治上又感到某些社會主義國家不夠民主自由，可能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要考慮考慮，不一定完全跟共產黨走。”

“資本主義制度下，有很大的民主，對執政黨可以支持或反對，也可以哄他下台，社會主義就只能說政府好話，只能支持不能反對，言論結社集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形成反對政府的政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在法國普通人可以罵政府，不高興就罵，不光資產階級罵，農民也可以罵……在中國和蘇聯，你試試，不把你當成反革命分子才怪呢！”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楊森達賴）

他認為：聯蘇和我國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在不少方面尤其是在思想上的自由民主趕不上西方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要求有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自由，贊同辦同人刊物，要取消各種紀律約束，大學生可以不上課，保證個性的充分發展。

他說：人民大學黨團思想工作束縛了個性發展，磨平了青年人的“稜角”。

又說：“言論自由不夠，新聞與出版自由不夠，有粉飾生活的現象，我們好像對大人物批評是不夠的，而資本主義國家是可以的。我國新聞界關於美國的報道是片面的，美國生活水平好我們應老老實

实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凌国星的材料）

“要在承認美国有民主的前提下批判美国民主，不能用教条主义批判”，“美国是資產阶级民主發展最典型的国家，不能了解为象蔣介石那样特务横行，那样恐怖”，“美国选举有自由”。“不能把黑人看作奴隶似的，只不过白人对他們不客气罢了”。“对我国民主唯一感觉是太少了”。“把民主扩大到最大限度”，“不論什么观点和主張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宣傳、鼓动，不受批評”，“游行示威不应只限于‘十、一’，‘五、一’，人民以大民主方式对待政府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栩）

“資本主义是形式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形式’。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比法国、美国差多了。不过是內容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戴逸樵）

“在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上，既然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應該强調階級关系，應該多有些人性。”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姚永年）

“片面地强調集体主义集体利益，束縛限制了群众特長的發展，这样群众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用牺牲个人个性才能的發展来换取集体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語文教員 白楓）

“片面强調集体主义的結果，抑制了个性發展，成批有特点的青年，在这种教育制度下被磨得圓圓的，死气沉沉的，冲出来的人是极少数，林希翎就是一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新聞自由問題。我認為今天不自由，現在的報紙公式化反映光明的多，陰暗的少，說明只能歌頌看不出不好一面，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資產階級報紙的消息，有些不願公開，但我們有些是從他們那里得來的，如多少人罷工，台灣問題等，相反我國學生鬧事，工人罷工從我們報上看不到，存在這些問題為什麼不暴露？歌功頌德引起我的反感，這方面不如資產階級民主。”有人問他要求什麼樣報紙，他說：“辦成美國那樣的報紙”，“美國能登載對我們政府，對杜勒斯的批評，我們報紙見不到。”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謝德鈞的材料）

“現在言論不自由，還不如國民黨時代，國民黨時代，我還能隨便罵罵蔣介石，可是回國後言論就沒有自由了，有不滿情緒，也不敢公開說了。”

（中國人民大 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我國的‘五一’、‘十一’游行人太多。有些領導幹部站在觀禮台上，把檢閱游行當成一種享受，而這是連封建統治者都享受不到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吳元富）

“美英法在科學文化精神思想上是很民主的。比如他們的選舉法——競選；他們的兩院制；他們的三權分立——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分立，他們的學術思想很活躍，沒有一家思想作為絕對正確的指導思想，迫使其他思想一定要服從這個思想領導。例如英美法有共產黨公開活動，可以辦自己的報紙雜誌，宣傳馬列主義。學校里沒有什麼黨派組織在這里面起主導作用，青年的愛好和個性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張芝文）

“不同意民主是手段的說法，因為民主即人民當家做主，不僅是政治上而且是經濟上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劉平）

“美国是如何一个物質文明的黄金国，在那里工人农民化了很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优裕的生活，还有他們的‘民主’是全世界最全民化的民主，你看他們的选举是多么民主，今天杜威罵杜魯門，杜魯門又撕杜威的竞选标語，民主风气在美国是多么濃厚。”

当我被美国文明的享受思想冲昏的时候，我曾幻想过如果美国来管理中国几年，中国一定会很快的变落后为文明，变弱国为强国。”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言論自由必須得到保證，必須广开言路。思想上的不滿必須跟政治上的对抗区别开来……資本主义国家中还讓共产党存在，讓共产党办报纸，而我們不讓別人背后說話。”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清华(大学)会客要登記，詳細查問，比美国联邦調查局还追得紧，联邦調查局三个月才談一次話。”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 王鉄生）

“中国过去沒有民主傳統，因此，中国老百姓可以多給他們一些民主，也可以少給他們一些民主，他們不会向匈牙利人民那样。”

“一般群众不容易享受到民主和自由。一系列的運動，輕者是自由主义，重者是造謠惑众。”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老爷們，你們想錯了！”

游行示威是人民群众合法斗争方式，現在不是群众覺悟不高而是群众在敬爱的毛主席正确、英明领导下，行动起来了，他們的覺悟更高了，他們要求平等要求自由，反对歧視，你們是阻擋不了，正义的呼声和行动是人民斗争的优良傳統。”

（中国人民大学 人民〔化名〕）（大字报）

“建議拋棄‘大民主’、‘小民主’這些不確切的概念，同時反對把人民內部的民主限制在‘小民主’範圍內，這些違反憲法與壓制民主的錯誤口號，而應當以正確的方針政策與工作作風來教育人民自覺地採取恰當的方式來行使民主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鍾溶華）

“現在還沒有國民黨時代自由，國民黨時代還可以嘀嘀咕咕，國民黨特務抓人還要有一定綫索，現在只要說錯一句話，就要追到底。”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講師 展廣偉）

“過去一階段我感到我國民主生活不夠……遊行示威就是‘五一’、‘十一’，平常為什麼沒有？結社除規定的黨團外，其他沒有！”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汪傳散）

“我國在整風之前，只有壓抑和統治，沒有民主和自由。整風以來開始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中國青年是最不幸的，被鎖在盒子裡，許多人生活在被歧視、壓抑之中”。

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學點火後，他瘋狂地叫囂“社會主義民主在北大大誕生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易志力的材料）

“北大大學生鬧事是由於過去人民的民主生活不夠，學生鬧事就是要民主。”而對北大的反動大學報等，則說是“學生過去沒有民主生活的習慣，開頭偏激總是難免的。”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員 楊讖如的材料）

“我喜歡絕對民主，對領導和集中感情上有抵觸”。

“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形式總有可取的地方，不能一概否定”。

“過去總感到社會主義社會有限制不如資本主義自由自在”。

“我認为不对的我就不执行”，“不服从組織不一定坏”。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講師 朱澄平)

“民主問題：民主目前不够，过去(整風前)許多人不敢暢所欲言，有人怕打击报复。在新社会个性沒發展，独立思考不够，娜斯嘉式的有稜角的人到处碰壁。新聞工作存在：一陣風，圖解政策，报喜多、报坏少的三个缺点，也說明我們民主生活不是完美無缺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房文齋)

“我們的水平可以这样做，要反对坏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資产階級民主的形式来反对社会主义發展的障碍物呢？

許多教研室缺乏民主作风和民主空气，群众变成了木偶，随着团团轉，独立思考很少或者說沒有”。

在会下又大声喧嚷說：“我們这里根本沒有民主自由，只有黑板报才有一点民主”(当时黑板报發表了許多反党文章——編者注)，他并气惱地說：“什么無产階級民主，資产階級民主，什么呀！就是不讓人講話，一講話就扣帽子，說是資产階級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郝正宇的材料)

胡在我校大肆宣揚“走廊議會”是掀起反党的“民主空气”的最好形式。并且說“走廊議會”是公民履行言論自由权利的場所，而言論自由是为宪法所保障的。他还主張开辟“自由論壇”由他做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胡大展的材料)

“在整風开始以前沒有民主、自由，大字报貼出后，才有了民主、自由”。“什么意見都可以放出来才是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几千年来人民流血牺牲就是为了爭取民主、自由，民主是目的

不是手段”認為“整風也是爭民主”，“林希翎是爭取民主的人物”，“人們不會過民主生活（指大家批判林希翎——編者注），要求新聞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江澤純的材料）

“人與人之間不必互相制約，我要這樣搞你要那樣搞都行，滿足各個人的要求這才算民主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于雲鵬）

“我認為：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民主，也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整風是起了資本主義民主的作用。”“先有資產階級民主，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自由，不更好嗎？我認為新三民主義是可以代替（社會主義）的，它虽然是資本主義的，但是可以保留民主，使個性解放，物資供應緊張也可以得到緩和。”“美國有民主傳統。”我國由於“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民主的階段，所以人民不習慣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史教研室教授 王衍臻）

“我們的民主和解放前比較，連形式都不如，蔣介石雖然領導權控制很嚴，但還可以搞刊社，競選，唱義勇軍進行曲。”

“我們的民主實際上連民主主義的民主都沒有……罷工罷課，在資本主義下是可以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則不可以連反對的不滿都不行。”

“我們的憲法加上許多注解，變成對自己的諷刺。實際上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誰隨便集會就是搞小集團，報社封鎖得很緊，只登合口味和擁護話的文章和消息。”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我們現在缺乏民主空氣，……我們是多麼需要民主呵。過分強調組織紀律容易產生死氣沉沉。”

“過去黨對青年教育強調了集體主義，忽視了民主自由。現在又

強調組織紀律，是不是又要回復到過去那樣，如果這樣，將造成木偶似的人”。（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煒）

“社會主義不民主，美國民主，法國最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濮仲文）

“言論自由、通訊自由，包括新聞自由，應當不問階級立場，這樣的民主、自由才是超於一切的，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非常同意資產階級對“民主自由”所宣揚的信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可以犧牲自己讓你說出你的意見”。

“新聞專由新華社塔斯社報導，不夠自由”。他把報紙對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歌頌說成是“報紙報喜不報憂”，又說：“每張報紙消息都一樣，看一張別的就可以不看了。在香港才有真正的新聞自由，在那里有左、中、右的報紙”。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譯員 徐吉貴的材料）

“我要求有個性自由發展的余地，如果說每個人只學了馬列主義就能建成社會主義，那末，只要‘人大’就成了。生活中總要有個公式束縛人的思想，為什麼有人說（林希翎）要爆破式地解決經濟制度問題，就非喊‘社會主義萬歲’不可？唯命是從也是束縛人的，服從不等於党性，這種党性是庸俗党性，個人主義党性。”

“經常開會，動不動就想整人一頓，批評得人很惱頭，很傷心。說服說服，斷送了人的生命，喪送了人的青春，這種無形的鎖鏈壓迫着人。這種情況在康藏公路工程局特別嚴重，那里黨，團，工會動不動就把人抓來鬥一陣，一開口就是‘鞏固國防要吃苦耐勞’如有罷工的，立即逮捕，當反革命分子懲治，這樣鬥死的很多，談死的也不少，這是說服教育嗎？很多人就是被說服教育的給說死了。”

“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就有跳廠的自由，而我們的國家呢？干部想改行也不可能，農民呢？受了災的，要想遷移也遷移不了。學生也應

該有轉校和退學的自由。”

“在舊社會，人們都有這種自由，而現在為什麼沒有呢？正因為經濟命脈掌握在人家手裡，所以沒有自由，正因為吃人家的，所以把自由出賣了。”

“由於唐代制度上的大發展，人們有了自由地發展個性的要求，於是形成了唐詩的大發展，現在人民對個性自由發展的要求更迫切，但制度對人民有些約束，應當加以改革。”

“文化生活不光是喝、吃、玩，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解放，現在的農村，農民沒有思想自由，動不動就給人家扣上一個“富農思想”的帽子。

“人民的言論自由也應當擴大。新聞自由，這個意見不僅在知識分子中有，在工人、農民中也都有這個要求，要求在報紙上開辟自由論壇，使黨走群眾路線。”

“私營報刊太少了，我們青年團想要自己辦個報，就規定要經過這個同意，那個同意，不應當受到限制，在舊社會里，私人辦報的就很多。”

“憲法上雖然已規定了人民有那些自由，但沒有物質保證，總而言之，人民要取得自由，阻礙重重，若是出了點問題，就又要查歷史了。”

“團內選舉制度也不平等，參加三大的代表我們沒有選，新團章也未經我們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岳文伯）

“有些機關以黨委為首的共產黨員、共青团員、老干部、積極分子等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與氣氛，使人不敢發展個性，許多領導人不分青紅皂白把青年的稜角都磨光了……。部隊黨團組織連婚姻問題也要干涉。”

他認為學校不民主、不自由，想迫使校黨委接受大家意見，實行：

“1.課程要選就選，想考就考；

2. 毕业生自由选择工作，想到美国就到美国，想到那里就到那里。”

他認為人代大会代表的选举是形式主义，主張以后实行竞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叶 萌的材料）

“集中只是听几个人的話”，“有了集中就会妨碍民主”。“这几年来我們党内沒有民主或只是形式而已”，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也是“形式主义”，因此，企圖“通过这次整风能爭取到民主”，“主張吸收資本主义民主精神，也搞一个‘海德公园’，要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他說：“前一些时期文汇报光明日报到处点火，林希翎到处發表謬論，就是民主，就是言論自由”。他对百家爭鳴的方針感到怀疑。他認為“执政党就是統治者，执政党的好坏，决定于他是否讓人民‘尽所欲言’，执政党要听取那些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和我这样的人的意見”他主張“只要鳴不要爭”。他認為我国新聞“沒有完全反映现实社会”，因此，主張“除了党报以外，要多办同人报纸和刊物，以利自由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姚永年的材料）

“……社会主义制度的选举，民主自由都不如美国等資本主义国家好。”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达孝）

“苏联不民主，苏联施行恐怖政策，人們沒有自由。”他把斯大林比作“怪杰”，并污蔑苏联說：“苏联很自高自大，保密太严了，專家回国以后不能給我們通信，是苏联政府不允許專家給中国同志写信，因为怕他們泄露国家机密。”

“中国的‘民主’‘自由’太少了，尤其入了党太束縛了，組織性、紀律性把人們变得不活潑、死板。”因此，要写一本小說叫“跳出地球”，“主題思想是：反对人类互相仇視、互相屠杀、歌頌和平与博愛；控訴資本主义制度下金錢的罪惡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組織性与紀律性对个性的压抑，褒揚人类的本性——真、善、美。想拿此書到巴黎或中立国

家去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民主,只允許黨員團員,而不給群眾,都是人民,為何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朱福榮)

“民主又是目的,又是手段,如僅說是手段,就是想不給人民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學生自由太少”

“學生沒有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特別是在學術上,這主要是解放以來社會風氣所致,加上領導不支持。搞這些活動,黨團員不參加,不也不會成為反革命集團。”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報)

“工作有缺點,社會上應否有輿論,我認為應該有,否則就不能推動社會發展,造成一個模子中倒出來的人,沒有生氣的人。”“舊社會不滿可以發牢騷,現在不滿不敢講,憲法雖規定了言論自由,但心里有話不敢講”。

“廣開言路,除脫離社會主義和黨以外的各種言論,如唯心主義等可以在各種報紙上發表,允許黨內外有言論自由,堅決不准大帽子壓人,要採取一系列措施,報紙應發表光明的陰暗的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各種消息,使人們了解社會了解生活,知道好的,也知道壞的才能發揮當家作主的精神,才能發揮積極性”。“建立法制,堅決執行憲法,過去只有條文,沒有條件推行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學生 謝德鈞)

“八年民主的結果,在八年社會主義民主中,群眾對於禍從口出這句話有深刻的體會”。“憲法上的言論自由都忘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历史上的統治者都是利用了民主自由这个招牌，党也是这样。我認为自由就得什么都自由，不要什么保密。”“我不能圍着党的后面轉，只应声，我是人，人生在社会上就有自由的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現在有工薪，有工作，有存款，不失业，有飯吃，但要听命由人，感到沒有民主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有人認为我国的自由很充分，提到不充分就很气憤，是否充分呢？可以研究。”“人民大学选代表提三个选三个，不民主”。“遇事要想一想才是馬列主义的态度”。“現在上層建筑与基础的矛盾是制度不完备和不民主造成的官僚主义”。“学校內是形式上的，不能实现的民主，过去沒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基本群众(?)無权进行充分监督”。“現在学生民主权利表现在那里？能否实行？有选举与罢免权的民主何时实现呢？”

“关于新聞自由的問題可以永久开放爭鳴，香花毒草有本領就放，这时我們要自己选择，通訊、描写等本質(?)作品，不要受到客觀的限制，資产階級也要爭鳴”。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認为沒有新聞自由：

(1) 認为資本主义国家的消息也应当讓群众知道，应当相信群众，他認为赫魯曉夫的“秘密报告”应当公布，林希翎准备宣讀的报告是真的，并且同意林希翎宣讀秘密报告。其实他对赫魯曉夫的“秘密报告”早在美国之音听到，并多次的向右派分子孔剑、黄守礼傳播过。

(2) 他說：“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強調联系实际，但很多不該保密的材料加以保密。美国每年公布犯罪数字，我們認为是十分正确的。資产階級国家敢暴露，为什么我們不敢發表犯罪数字，当然，这可能被

資產階級國家利用反宣傳，難道資產階級國家不怕我們反宣傳嗎？”他又在會下說：“我國犯罪數字不敢公布，這種作法是違反共產黨宣言，因為馬克思說過，共產黨隱瞞自己的政策是耻辱。”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 朱華榮的材料）

“1. 要求充分發揚民主和自由，全部國家機關、工廠、企業、學校……一切領導機構，完全由自由競賽產生，取消共產黨在國家一切部門的領導。

2. 反對共產黨及一切民主黨派的活动經費由國家支出（包括干部工薪）。”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雅春）

“報紙是國家托辣斯掌握，資本主義國家的消息看不到。不叫看只說正面的，不知道反面的。有說好的自由，沒說壞的自由。有說馬克思主義自由，沒有說其他的自由，你寫了稿子都退回來。沒有別的比較，怎么能知馬克思主義好？一定會教條主義。”

“出版不自由，而自由的口號唱得很高。現在史學界鳴的很多，因為這沒多大關係。而其它科學就不行了，要說馬克思主義不好就不行了，馬克思主義成了‘金科玉律’，誰敢說不好？出版的除了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外，就是簡報等。”

“去年的等額選舉簡直是形式，資本主義國家還搞競選呢！現在那個政黨敢和共產黨競選？我認為一點民主也沒有，以後我就不選了，投張崇山一票我現在還後悔，違背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也有權不投票……頭髮絲扭不過大腿。”

“法國人坐電車上說政府不好，而我們沒有人敢說政府不好，現在敢說了。現在有人說共產黨員無才無德就是缺德，過去只有說好的自由，沒有說壞的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楊維新）

“我理想的社会是什么？平等、自由和劳动。我所恨的社会是什

么？用漂亮的字眼同荒謬的‘理論’去欺騙同胞。我要求的人是啥样的？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道路。我对道德的看法？滿足天性要求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只要不違背第三者的利益。我对平等的看法？沒有將軍和主席的国度。我对自由的看法？人間沒有拘束。我对幸福的理解？自己完全的有自己的劳动。我反对的是啥样的人？虛偽、狡猾、拍馬屁、裝腔作勢的人。我理想的人格？只是劳动、同情、真誠、愛!!!用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創造理想的社会。現在我对人的态度怎样？我不理任何人，也不求別人討厭。我处世的方法？自由、平等、相愛（理想的人），恨（虛偽的人）。你如何改造人类？道德的自我完成。你如何揭露一切弊（原为‘僻’字——編者）病？研究現代的一切。你怎样建立自己的体系？精通自然，精通理想，推翻偶像！你的理論基础是什么？經濟法則和世界的未来。你对爱情的理解？灵魂的美丽。你作學問的态度？博、精！你平日的的生活？不說話，思索，动手做，尊重个性。你的格言？去作那自己應該作的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主張絕對自由、脫離現實的民主；要求個性解放反對集體活動。

“理由：1. 我國公民的經濟、政治地位人人平等，我國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二者是客觀條件；2. 可以培養青年人的愛好、興趣和特長；3. 使青年人能更好地洞察事物擴大眼界。

表現在：1. 應該廣開言路，接納各方面意見；2. 在學術上開放唯心主義；3. 在新聞上主張報導自由、廣泛，報紙要有嚴肅性和靈活性、政治性與趣味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孝达的材料）

“……理論脫離實際，一面號召‘獨立思考’、‘大放大鳴’，一面對國際國內的重大事件封鎖消息、壟斷新聞。為什麼高、饒、貝利亞等事件，只有評論，沒有公布具體的罪行材料和判決書？說斯大林‘三七開’，沒有事實。為什麼國家家底、重要政策、國外消息等等只給少數

人知道，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盲目服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愚民政策，还是‘爱民’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蘆 鎮)(大字报)

“有人一談到民主就強調資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區別，难道我們现在就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嗎？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污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應該比資本主义民主更民主，而現在我們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是党的国家。毛主席說，民主是手段，那應該是全民基础上的手段。”

“……个性問題。在旧中国，大学生要考虑很多問題，象前途問題，家庭問題，政治态度問題等等，如今国家一切都為我們安排好了，象衣食住、学习、工作，政治态度問題，也不用我們考虑了。这是好的。但發展个性不仅要有物質条件，而且还應該有充分的自由民主，而我們今天有話不敢說，想做的不敢做，把馬列主义奉为聖經，稍加独立思考就遭到冷潮热諷，这样能發揮个性嗎？！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我看起来实在可憐。”

“关于資產階級民主問題，昨天，前天同志們都說到了，有人將資產階級民主兩党制都归之于具有欺騙性，归之于欺騙工人，跟法西斯一样。这就不对，应当看到資產階級民主好的一面，它能在維護資本主义所有制下，把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出来，否則，法国共产党就不会那样积极地在反对法西斯化。”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張祖文)

“……既然資本主义(原文不清——編者)近于墳墓，而社会主义又使我不滿，憎恨，他象日本的国土一样，火山(原文不清——編者)爆發。

人們有粉飾現實的自由，我沒有沉默的自由，人們有唱廉價頌詞的自由，我有的全部是不自由，那些企圖打劫別人，达到获得特权压迫人民的人，口头高喊‘为了祖国’，骨子里是为着向上爬！人类都变

得这么口甜腹劍？人們都變得这样愚蠢自私？不，决不！这些人跟日本帝国主义时中国的应声虫一样！

我没有‘祖国’，我只有人民。中华民族的五亿农民，除此以外都是濃瘡，自由被人們忘記了，正义被群众忘記了。我如何使最下層的人們重得正义与自由？！

人类的命运啊！明天是怎样的？实现这个明天的力量隱藏在什么地方？人民哟，我已拋棄了自私和幼稚，有了理智，我献給你的：現在是探尋，未来是鮮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这問題（指社会主义民主問題——編者）林（指林希翎——編者）是提出了很多合理意見。她說：社会主义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更高，但对資產階級民主好的应接受或吸收。我們今天不是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遺產，而是封建社会的遺產，因此要考虑接受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要簡單的否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盧晃持）

“南斯拉夫的問題：我很感兴趣，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苏联的民主在斯大林以前，基本上沒有确立，是抽象的东西，沒有产生。赫魯曉夫的秘密报告的事实，現在又否認，这是不高明的。說美国伪造是不对的。这些事实很明显的表現在，斯大林論文集，其他党同志的意見中，是美国間諜偷出的，不过我国沒公布而已。保密需要的，对于国防国家机密給我們知道也無用，而現在的参考消息不讓看，这是不应该。”

“‘参考消息’大学生應該全發，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設上起先进作用，有事情不讓他們知道，这是愚民政策。封鎖消息是封建主义的作法，广大人民要求知道国内外大事，但領導胆小怕事，把人民群众当成阿斗，如果国家領導真正信任人民，是不会这样做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程海果〔林希翎〕）

“……在旧清华，我享受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是当时我們有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多数的教职員及同学，則毫無权利可言，譬如我在旧清华，可以要开什么課程，就开什么課程；买書买杂志，我开张条子，圖書館就照办；有一个时期，我掌握着学校的两个刊物，对于文章的登載与否，我有全权处理；我又担任一些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可以决定学校的重要研究工作。现在看来，这不是民主，而是享受特权。”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統計系教授 吳景超）

“……我有資產階級民主观点，在旧学校受教育，多党制对我印象很深，我过去認為英国的海德公园很好，可以随便罵，但罵是罵，当部長还是当部長。在新社会，部長不能罵三輪車夫，三輪車夫也不能罵部長。季凱夫事件不是把一个市長撤掉了嗎？这問題不是充分說明新社会优越性嗎？”

“旧社会特务很凶，人們还能在家人朋友間罵国民党。新社会經過几次运动，人民甚至跟老婆都不敢說真心話，怕坦白斗争。肃反中明知一个編輯改錯稿子，說是故意破坏，实际如何，我很怀疑。哪个編輯能絕對不改錯稿子？如果說改錯稿子加历史有过問題便是暗藏反革命，証据未免太不足了。运动中，‘內定’要斗争一个人，总是会找得出理由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辞’。大量斗錯人，不承認是偏差。被錯斗，不許申辯。这次整风前，不管党員群众，誰也不敢談国事，甚至不敢談学术問題，实际上是沒有言論自由的，思想是被窒息着的。形成只要党員干部一句話，就是不許怀疑的絕對真理。誰要是不同意見，‘落后’、‘对領導不滿’甚至‘蓄意破坏党的威信’什么帽子都可以扣上来。被扣上这种帽子的人，名譽就扫地了，便为群众所不齿了。沒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沒有批評領導的自由，什么堂皇的話都掩盖不了这个不民主的事实。

解放后搞社会科学的党外知識分子都感到有力無处使，因为資料保密不讓看，他們無言可發。过多的保密，这也是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的一堵高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我到学校后大吃一惊，生活平靜無風波。如开除一个女同学，理由是不充足的，有人这样說，但就平平靜靜地过去了。我認为現在的大学生的生活象托兒所里的一样，生活不要顧慮有補助，这是过去享受不到的，但同學們对教学上有意見就馬馬虎虎过去。在解放前，我們的同学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却充滿了生命力，思想很活潑，对什么事情都非常关心，有正义感。对于本校开了古代史，有的人已經不滿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但不能动，只能听。开始有意見还得保証他的威信，听他的課对于課堂的討論，我对于背教条是討厭的，教師講一遍同学重复一遍，还得补充，最后总结。再如开除学生，解放以来开除了30多人，学生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給党了，但如果有些領導是官僚主义或是恶劣的，造成的后果是不好的；有的課是教条主义的，听得很反感的，教師只說这是錯誤的，那是不对的。教学中只有一家爭鳴，这是同空气作斗，有些問題剛提出来：如战后資本主义長期沒有危机，失业現象在很多的資本主义国家是减退，壟斷資本主义里有很多問題，有工业和原子是發展的，我們的同学是不知道如何研究。在学校里大一統，什么东西都是統一的，一个新聞系，一个牆报，一个文学社，舞蹈歌咏团是全校一个，那些东西都沒有搞好。为什么高等学校学生对此活动無兴趣，这是因为在統一領導下的。学校里的紀律很严，迟到要通报、要記过。还有自上而下，一开始叫我当广播班的班長，生活班長，使我吃一惊，我是业务班的，后来又叫我搞二班生活班長，我認为这是自上而下搞，过去学生会干部是竞选的，可真正为人民服务，可联系一部分同学，他又为大家做些事，現在的学生会的干部有些官僚化。在学校里黨員如何在党的教育下活动，那些地方要受党紀律限制，如古代史不願听，偷看報紙是不得已的，学习保証掩盖缺点矛盾，不是掩盖揭發矛盾，否則是党内統一思想。有些問題は領導上灵机一动，如开古代史、学外文，吳老強調要学，馬上就开，可是我們說就不行，但是那外文老师对学生的目的要求也講不出，法文老师說二年后努力的可以看看報紙，那不是浪費時間嗎？这些問題关系于全体同学的問題，在解决时学生不知道，甚至还不讓学生知道。

我們这些人难道是奴才，一定要在鞭子底下生活。在国民党时是没有民主的，但又有民主。国民党不准我們活动，但在思想上他控制不住我們；我們公开活动是不容易的，但隱蔽的活动是有些的，国民党对学生镇压，我們可以反抗，在沒有民主底下还可爭到民主。現在有了民主，但有些地方在阶级斗争未結束时是統一搞的，如教学改革是用政权力量解决問題，思想改造是用政权力量，靠党、团员，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会引起大統一，思想是不能用硬的搞在一起。我們党团员多，凡是党講的都是正确的，即使有錯也是服从，長期下去腦子机械化了，教条也出来了。在阶级斗争已基本結束时，我認为可給学生以更多的民主、自由，在社会主义底下的学生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言論、出版、結社、思想自由，出版不可大統一，所有报纸都是党报，在学校里可以二、三人搞，到学生会登記一下，学校要是支持大家，壁报欄可以划給大家，結社自由，願搞歌咏团即可搞一个。我願搞牆报，但学校叫我当生活班長，我沒有办法。我和一个同学和得来可以調整住在一起，活动不是政治性的組織是可以搞的，在这种活动中發展友誼，到社会中是終身的好朋友，現在我們为什么沒有友誼，因为临时观点，这是不正确的。

自由論壇以前是很自然很普遍的，在有問題时可以辯論，在今天應該提倡真正的分歧意見，可以發展大家独立思考科学理論，如果辯論是履行公事，是不正确的，开辯論会要学校支持，給予地方。

思想自由，是在学习上選擇的自由，看各种流派的書，圖書館要准备一下，教員要介紹一下，讓大家自己研究選擇，以發展我們的学风。学生应有些权力，跟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問題，应由学生参加研究决定。如开除学生一定要經過学生会同意，学生会有責任提請全体学生討論，使大家相互关心，領導上的官僚主义随便开除就不可能了。在开課問題上，大家要求开些什么选修課、必修課，在开学前就經学生討論；新生到校不了解情况，領導有責任报告和介紹情况。現在是講什么听什么，就有矛盾。如开課問題，撤換教員問題，学生有發言权，有一定限制作用权力，但最后問題可由党委或校务委员会决

定。

在這些問題中，黨如何領導？黨員起何作用，可以受那些紀律制約，黨內不允許有小集團、小組織，在參加這些組織時應受何限制。

堅決貫徹民主的問題，是否大家能想選的人都能選上，但以後不一定如此，可以提出競選綱領來，如做不到請你下台，黨員應抱何態度，據黨的指示競選還是自發的。

這些問題可同新黨章聯繫起來考慮，領導活動方式要改變。”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虞耀麟）

“（一）在新社會中，青年的個性發展受到阻礙，這和國家制度有矛盾。按理，我們國家制度是允許青年的個性發展的，在理論上是無疑的，但在實際上，回顧這幾年來，青年的個性未得到充分的發展，青年的思想情況是：沒有自己的思想語言，沒有領導上組織，不知道怎麼玩法，充滿了空洞的議論，充滿了灰色和空虛，學會了四平八穩的全面看問題的方法，很多青年象小老头子，形成一種氣氛，並且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十八九歲的青年都反映：對機關生活很不滿意，大部分婦女幹部很不入眼，三八婦女節談的都是老婆孩子的事，很討厭。我們的社會好象一個大的熔爐，任何人一踏入社會就變成了一種樣子，所以造成這種現象，是由於：

1. 社會上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調，給青年思想上以壓力，妨礙他們個性的發展。例如：強調政治熱情、政治情緒的問題，雖然很重要，但其內容，不外乎這樣一些：（1）人生觀問題，立場問題；（2）看重大問題的思想方法；（3）對政治生活的態度，是否有自己的幻想，是否和我們的偉大理想相一致。在這樣的前提下，青年人應有自己的思想、愛好興趣、理想，但社會上把政治情緒作很膚淺的了解，隨意的套上個人主義的帽子，多看些書，多寫些東西，多談些自己愛好的問題，多表現一些個人的性格……等都被認為是個人主義，在客觀上要求青年從思想到行動，從面貌到服裝都是一律的；滿口是馬列主義的人就不是個人主義。這種壓力很大。鉄托說：社會主義不是抽象的東西，

就是具体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将来，而且在现在，我很同意这一句话。我认为个人打算是好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为青年开辟了光明的道路，应该有自己的幻想，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和青年的幻想联系起来，否则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力量，对青年不发生作用。如果把青年的前途看成是个人主义是很错误的。一个青年没有理想，对共产主义也不可能热爱，对共产主义也是无能为力的。

2. 青年必须服从组织，青年应该对组织感到亲切，应该服从。但在政治情绪的压力下，服从组织增加了新的内容，要求青年唯命是从。提了意见的人就是最坏的，没有头脑；完全服从命令的干部是被领导欣赏的。有自己的思想，常提出问题的人被认为是最调皮的人。现在对青年的领导好像是封建的家长式的统治，控制青年人个性的发展，被歪曲了的政治口号代替了封建道德，甚至更厉害些，因为它有进步为自己作掩护，使人分辨不出来有马列主义为原则，不但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反而使人习以为常，认为是合理的东西。

3. 在服从组织的口号下，掩盖干部工作上的不合理现象。不管你干不干，硬拉硬扯，好象强迫婚姻一样，这也是抹煞个性发展的，造成了干部水平低，造成大批的万金油干部的根源之一。使不能专门去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且往往是学非所用，学工的拿来作编辑，调动频繁，象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青年人年纪不大，干的事情不少，这兒干一些，那兒干一些。在青年中有许多清规戒律，有的不成文，有的明文规定，把青年的言行划死了，规定一个圈子，把路子堵死了，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结果都成了小老头子，而且成了习惯的人，并以这种榜样去要求别人。

4. 在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上，有庸俗化的现象。党团组织生活的内容就是检讨，每星期来一次就完全失去作用了，往往成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养成青年人谨慎小心不敢大胆作为的心理，左一个原则，右一个政治。

因此，青年的个性发展是受到阻碍的，把青年人的棱角磨光了，使他们安于现状，人云亦云，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

我同意林希翎的二个观点：

1. 青年人應該永远对现实不滿, 如果滿足, 就不能前進了。用哲學的公式來套肯定、否定是庸俗的。我們的环境就是肯定的, 如果对现实滿足, 青年就不能有新的追求了。假如有一天滿足了, 我就停止了, 这关系到一个人做人的問題, 是否感到做人的偉大問題。林提出这問題是意思的, 有些人根本沒有自己的思想, 整天想到地位、老婆, 过的象猪一样的生活, 离开了馬列主义的教条, 就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語言, 滿口的無产階級道德, 但从思想上不懂馬列主义, 什么东西都依賴, 不动腦筋, 一切問題都拿馬列主义为准则。我想, 这些人解放以前沒有馬列主义时, 怎么生活的呢?

2. 青年人應該有偏激,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青年人有赤誠之心, 但沒有知識, 生活經驗差, 就不可能不偏激, 如果要求不偏激, 就是不允許青年人动。这一点我对中国青年报很不滿意, 認為他們很多方面沒有代表青年人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楊 教)

“社会主义民主問題。列宁死后, 这个問題三十年来 停止了發展。我們認為斯大林功七过三, 苏联就沒有同意。苏联对斯大林的了解比我們多得多。我們离苏联那么远, 对斯大林沒有什么了解。苏联的思想水平并不比我們低, 中国共产党根本用不着以和事老的态度出現, 自高自大, 自以为水平高得很。

斯大林的功过不是三七分。一个人有突出的天才, 有供献就能得到人們的崇拜, 这种社会現象到共产主义也会存在。如把斯大林的問題归結为个人崇拜就是唯心主义。

既然斯大林能利用苏維埃制度胡来(中国的制度也有可能, 只不过毛澤东的品質比斯大林好些), 可見制度是成問題的。

社会主义民主問題停止發展的原因, 是有了斯大林这塊絆脚石, 三七分的說法沒什么邏輯性。

民主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只有当把民主已爭得到手以后, 才能說

它是手段。現在民主就是不夠，就是不完整。因此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來說，民主是目的，談不上什麼手段。我們要全民的民主，而不要那一個主席、幾個政治局委員的民主。他們有一點不好就危害到六億人民，這叫什麼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民主的擴大表現在：（1）獲得民主權利的人數越來越多，無產階級的利益越來越成為全民的利益；（2）民主集中制日益發展，民主日益擴大，集中程度日益高。

這裡我想穿插一個小問題，即關於民主的實質問題。主席說：民主實質上只是一種手段，它屬於上層建築，歸根到底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這個定義是片面的（我不妨和主席爭鳴一下）。我認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說是手段，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生，要想使經濟高漲，必須發揮大家的智慧；大家的事，只有用大家來管的方法才能管得好。說是目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文化、物質需要，而每一個公民的干預政治的權利，參加管理大事的權利，亦是人民精神文化的需要之一。因此，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口號，向來是當作一個與爭取無產階級在經濟與在經濟上解放同等重要的爭取無產階級政治上的解放的革命的目提出來的。

但民主絕不是單純意味着普選權。把普選權當作衡量民主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觀。資產階級向來喜歡用普選來掩蓋無產階級政治上受壓迫的實質，因此，不問時間、條件而一味追求普選的作法是錯誤的。在階級鬥爭還尖銳存在，無產階級覺悟不高，人民還不具备起碼的政治、文化知識的情況下，是沒有條件實行民主的。一個達練的專家的意見，要勝過百萬閉塞無知的選民的意見。而真正的民主是不能在一個早晨實現的，必須是一個專長的發展過程。”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鄧先扶）

“其一：馬克斯的自私的逆子們愚蠢的認為只有黨團員才懂得馬列主義，否認非黨團員們的馬列主義覺悟，迷信的信任自己的‘進步性’，對別人否認一切，天天疑神疑鬼，但科學不能壟斷為升官法寶，馬克斯主義是人類歷史遺產。人人有權繼承，我們堅決反對正統馬克斯主義迷信。

其二：非黨團員要民主要權利，要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要做國家命運的主人。我們不要做客人，我們不只要義務，我們不要作庸人政治下的犧牲，我們不要粗暴和野蠻，為民主自由頭會可斷，血會可流，今日決不容許那些不學無術的‘土包子’霸占自己心愛的祖國的命運，獨斷獨行。

其三：共產黨好比一支未熟的桃子，尖上紅、下面青、理論紅、行動青。我們不能滿足他是一支桃子，而要他是一支全紅的桃子，黨要徹底整整。

其四：那些封建的家譜迷者處處接譜點中，不管稱不稱職，有多大本領，品質多惡劣，只要在譜內就可給以信任，提拔，不在譜就是異己。結果造成局部庸人掌權、胡作非為，甚至變成土皇帝操生殺之權。

一、民無權的基本特征：

1. 假民主的選舉權，被選舉權——空話，罷免權=0，代表不受選民意志的約束。

2. 人民對當權者沒有切實監督。

3. 人權無保障，政治上受歧視。

二、還政於民的幾點要求：

1. 真正民主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實際保障，切實的罷免權，代表必須受選民的監督和約束。

2. 保證人民對當權者的監督權。

3. 保障侵犯人權者受法律制裁，政治平等，反對黨員特權。”

（清華大學學生 馬 琦等）

“現在的報紙我只相信20%。解放后社論我一篇也沒有看過。共產黨專登好的不登壞的。”

（湖北醫學院 李建群）

“現在精神上壓抑的痛苦，比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還厲害。”

（山東師範學院 曹亮清）

“國民黨用槍和棍子壓制民主，而我們是用檢討和帽子壓制的。”

（北京大學 李修宇）

“……對民主的看法問題，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只知道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

（北京大學 楊路）

“民主所以是目的是對精神來說，（因精神生活很重要）對經濟基礎是手段。”

（北京礦業學院 尹毅夫）

“剷草要除根”

“斯大林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

是徹底民主化的時候了，要除三害，便要剷草除根。否則‘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信任人民的時候了，沒有人民的絕對權力，沒有人民的民主監督，不論如何整風，整來整去，都不過是一陣風；要真正整風，首先要將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空！

我堅決要求下列民主措施；

- (1) 严格保证宪法的公民权利。
- (2) 人民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评罢免权力。
- (3) 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專橫化，人事工作要受人民监督。
- (4) 除政府、軍事、及特殊部門外一般不濫行保密，以免借保密而干坏事。
- (5) 反对新聞封鎖，压制言論；扩大参考消息發行。
- (6) 干部政策要德才兼顧，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

(北京大学 岑超南)

“如果一党專政，党员不好，引起大民主，为什么不可以呢？从前看来，大民主都是不得已引起来的；鲁迅說的对：要‘以牙还牙’！”

(北京政法学院 王明欣)

“自由就是爱怎样想就怎样想，爱怎样說就怎样說，别人不得干涉。”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我所強調的人性是没有阶级性的，我很贊赏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我希望打破一切束縛让人性自由發展，我觉得一个人在思想上的成熟是要经过他自己摸索和追求的，人性是可以突破无产阶级性的限制的。”

“我所說的自由是指思想上的自由……我所要求的思想上的自由，是在学习了一些馬列主义的詞句，但又沒有真正的接受馬列主义，不那么信服馬列主义(这不是說我不承認馬列主义根本观点的正确，而是希望讓我独立思考和资产阶级思想一番鑒別)。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而又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不喜欢(这些方面我下面要談到)的情况下提出的。我希望我能独立思考(不管这种思考是否背离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受批判，不受到社会风气的压力和党团组织干預，这也就是说不要党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的領

导。我也希望保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那一套生活興趣，而不去進行從立場觀點到情感生活的改造。”

（北京政法學院 康德瑄）

“我們應該有自由支配時間的權力（能力），如果有人強制我們光鑽筆記，光鑽一些參考書（不管他願意不願意）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扼殺行為、扼殺我們才能、個性的發展。”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

“自由就是所謂個人行動、個人負責，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而集體與個性是對立的，我對同志的幫助是敵對的。”

（北京政法學院 林共鳴）

“中共中央發出整風指示後，我認為這是個爭‘民主’、爭‘自由’的好機會，可以把心中的不滿吐出來，攻擊共產黨。”

（北京政法學院 趙日月）

“在舊社會里可以為所欲為，愛搞什麼就搞什麼，愛學什麼就學什麼，愛出國就出國。……能享受到‘自由’。解放後，沒有選擇自己前途的自由，沒有支配自己命運的自由。”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教授）

“我嚮往的是不要領導、不要集中的民主，無限度的自由。”

“我雖不主張資本主義那一套，但資本主義確實可以競選，這就很民主。”

（北京政法學院 趙日月）

我們學校是“暴力統治”“太黑暗”“太殘暴”“沒有民主”“個人專斷”。

“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個性受到挫折，要求個性解放。”“政法學

院看人有問題，不把人當人，不給予起碼的尊重，尤其對青年老批評，老整，不許青年人自由思想，不許有個性，一說話就給扣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帽子，把青年人壓到最低層，真是有冤無處說。”

（北京政法學院 王 革）

“在中國民主、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而是形式，本來就不充分的選舉權，還要受到限制。”

（北京政法學院 陳守銘）

“……競選前各黨派可提出競選政綱，推薦出競選人，並讓各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

某些政黨對另外一些政黨發出攻擊，當然這種攻擊是不合理，但是被攻擊的政黨是可以加倍的反擊進攻者的，我看這是合理的。”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中國人民過去非人的生活太慘重了，使得共產黨一些缺點，人民不易察覺出來，就是共產黨缺點再多一些，那麼沒有習慣民主生活的基本群眾，也是可以忍受的。”

“社會主義+民主=更好的社會主義。這樣別人才不怕社會主義，別國和平過渡，才有可能。

示威遊行它象徵着人民熱愛自由，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依着自己的意志而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願望與氣魄，不甘為錯誤的領導所蒙蔽，而採取的積極行動。表明了人民革命主動積極性，人民的命運要自己來主動掌握，黨只是領導者，不是代替者，人民不是阿斗。

中共的缺點比過去匈共的少得多，可是中國人民比匈牙利的民主主要遲鈍得多。”

（北京鋼鐵學院 張慶瑤）

“民主對人民永遠是目的，對統治階級永遠是手段。”

（北京鋼鐵學院 沈荷新）

“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方式有模糊的好感，特别欣赏法国议会上的激烈辩论，不满我们今天的人代会。在人代会上很多人发言都和共产党一样，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特点，他们的发言是千篇一律的，没有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在我们国家现在说话还是有限制。”

（北京大学 左言东）

“我们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民主，但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有民主的，不但资产阶级有，劳动人民由于组织起来了，也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的（如意大利和法国工人）所以对英国乔来教授的讲话，我就以为是真的。”

（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我国民主化是不够的，人民一直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不参加政治生活，容易受人摆布，领导者个人崇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总有一日人民也会象波兰人民那样的。”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可以用大民主，如波、匈事件。”

（北京政法学院 章天惠）

4. 自由与纪律

“我们的内部参考材料，为什么只有某某级干部才能看呢？他们看不了，但另一部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却看不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能容忍的现象，要求取消这种特权，要求公开我校的禁书，独立思考不是空口说白话，国家大事不能作为党内秘密文件来散发。”

“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我们不要你们少数人所私有的党来专管我们的国家大事。”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濮仲文）

“在我的生活中我拼命的追求这种自由，我要求不要有纪律约束

的自由，要日無組織的自由，隨隨便便的自由；因為這才是真正的自由，紀律就是限制自由，就是不自由。我也想不要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因為這就是不民主，應該是沒有領導，沒有集中，大家說了算，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不夠發揮自己真正的權利……我國民主集中制度，實際體驗中就是不民主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孟繁森）

“人人要求民主自由，我覺得民主自由的範圍很小，如到外國去很難，沒有‘路條’就不能去……上邊布置作什麼，不敢說不做。”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田仲倉）

“人大（人民代表大會）要有一定的自由才行，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國家就得滅亡，學術就得失敗和毀滅。”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劉達孝）

“圖書資料的缺乏，新聞被封鎖。資料是研究工作中重要的東西，沒有資料就沒有新的思想產生，影響研究。說資料缺乏，是指有些為人們所需要的沒有。資料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社會科學，當然在逐步改善，但不等於已解決。有些論文，外國的出版得少，當然不能過多，但目前不是過多，而是過少，當前資產階級學者，對於經濟方面的論文，我們就沒有。科學沒有國界，它是全人類的產物。由於教條主義，除了馬列主義外，認為其他的都沒有價值，就拿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資料缺乏，的確不能令人滿意。對於大膽揭露蘇聯錯誤、教訓的材料很少。在整風中，有些人表現對蘇聯的動搖，就是因為過去介紹的不全面，就是資料缺乏的關係。南斯拉夫是有缺點的，有排除社會主義陣營的傾向，但對南作詳細介紹，過去就少，使人摸不着頭。所以，資料是很重要的，沒有資料就沒法研究。在文學通訊中，也是新制度所產生的新成就，但也應將情況的另一方面，困難的、錯誤的全面介紹，使人的思想全面發展，不致於听到落後面而思想上發生波動。在

我們历史上,从党产生后,有过許多次路綫上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从党史中見到的,而錯誤路綫的著作我就沒看到,为什么会写出这些錯誤的文章,我也不知道,公布了作研究工作,我覺得没什么問題。高、饒反党材料,也应詳細的搞清楚,王明的材料,已过了很久,現在是可以公布。沒有資料,怎么使人思考,有人說可以对现实进行探索,但对现实的探索也需要材料,赫魯曉夫的報告到底怎样,我想可以公布。‘斯大林时代’中就有引証,不公布就使人思想上产生問題。新聞被封鎖,是指有些被封鎖。報紙把困难面报导少,骯髒面应告訴人民。这并不是說明比旧社会还多,而是使人知道在我們社会,还有寒心的事存在。在干部中爭权夺利的情况是有的,陈其通关于揭露高幹中的缺点的剧本,直到現在还不公布,在別人思想上就产生問題。关于美国的經濟現象、文化現象,應該介紹的沒有介紹。我們到底对美国有多少了解?我們不是要將有害的东西介紹,但是是不是有害呢?不要以艾森豪威尔的傳声筒帽子压人。”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刘表兴)

“生活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

生活本身就是概念化与公式化,大学生上課,下午4——6时活动;南京到北京,在欢笑中很空虚,这也是沒有入团原因之一。又如訂学习計劃,是訂給班長看的,外国記者反映‘中国青年真幸福、吃飯、睡覺除作夢以外一切都安排好了’。功課重复太多,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把許多生动活潑东西都給掩盖起来,表面很高兴,內心却空虚。

生活不應該这样公式化,应有事实生活內容,主張多实习、多做社会調查,在温室中培养,歌頌缺乏真正歌頌。把生活缺点掩盖起来是不对的,光看好的一面,不看黑暗一面,現在我們应如何治疗社会病态,多把些实际情况告訴学生,延長生产实习時間,到农村中去體驗生活,可鍛煉意志。”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知識逐漸增加的青年，要求各方面精神食糧，越來越厭倦那種整日開會，批評檢討的生活方式，要求充分發揚民主，要求個性的發展，這在我校‘五一九’運動充分表現出來。”

（北京大學 朱慶圻）

組織的批評是“壓”力“懲辦”和“報復”他說：“精神上的折磨比肉體折磨還厲害。”他還認為：“組織紀律會束縛人們的個性限制人們的自由。”

（北京政法學院 陳守銘的材料）

5. 否定我國政治制度——人代會

“人民代表大會制，如何民主講得冠冕堂皇，結果下邊作的是狗屁，不執行，建議凡不成文法規，均應撤消。”“我們國家機關過去未精簡時，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韋齊）

“人代大會制度是不完滿，有缺陷，甚至可說是形式主義的。”“人代大會是權力機關，但是否掌握實權我懷疑”，理由是：“1. 代表選舉是間接的，人民群眾沒有選擇的余地，2. 代表發言局限於原定的範圍，3. 地方組織不經常開會。”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煒）

“我國現在實行的選舉制度是划圈圈，是投票機器，現在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和選民的关系怎樣？值得研究。只是幾年一次的表決而已。”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政府這是脫褲子放屁。”（意即形式——編者）

“選舉時可有競選團進行競選，在新形勢下實行這種競選比那種

單一式的選舉好得多。”想要各資產階級黨派和我黨平分秋色，排擠黨的領導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 黃守禮的材料）

“我懷疑人代會是民主的形式，還是權力機關？我感覺人代會是形式。人代會中規定51%是黨員，所以共產黨就是決定一切。這樣民主黨派能發揮作用嗎？在人代會中黨提出一切方案讓大家討論，但最後還是原來的我感覺不對頭。”“提案三分之二才能通過，民主黨派的提案，黨不同意就通不過，形式上是民主，實質上是一黨專制。”“民主黨派權力不大只能跟着黨做事，不能起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于雲鵬）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都是黨擬定的。這種選舉跟國民黨差不多。”“如胡風，黨讓他作為人民代表，但發現了他是反革命，黨就把他撤消了。選舉由黨分配，如朱德分配到四川，人民就必須選他，所以選舉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代表不稱職，酒囊飯袋，無能為力。”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楊文極）

“人大是開會機關，沒有實權。”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伍士杰）

“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直接選舉，另外成立一個機構，不直接選舉，可由國家元老、起義將領組成，問題最後經過這一機構決定。英法都有兩院，元老院和眾議院，元老院權力最大。兩院制很好，該換換班了！”“法國有什麼元老院、眾議院，英國有上議院、下議院，下議院或眾議院是民選的，元老院或上議院是由貴族組成，或者世襲的，下議院作出決定，最後要給上議院批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汪同祖）

“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因為成分有限（指工农——編者）文化低。”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傅鉄城）

“人民代表大會，大部代表是上層幹部，民主黨派占的比例太多，要求擴大工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比例。”“有些代表根本不能代表選民的利益。”“代表觀察只不過是形式。”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常學溫）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形式主義，並以自己當過人民代表的“切身經驗”支持林希翎“人民代表大會是形式”的謬論。主張直接選舉。認為章伯鈞所提“成品”問題是正確的。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江澤純的材料）

“我在思想上我總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民主黨派，實際上不是黨派。因為既然是黨領導下的，政治主張又一樣，講的話也一樣，並且它的成員還可以是共產黨員。所以讓民主黨派存在，只不過是紛飾民主而已。所以当看到儲安平大右派分子提出‘黨天下’的反動言論時，感到不謀而合。在我思想里既然把民主黨派看成是形式，所以我就不止一次地說過：‘西方資產階級還允許共產黨存在，還允許共產黨機關報存在，而我們呢是清一色’。所以我思想里認為也應該容納異己黨派存在，也就是讓國民黨等反動黨派存在，也讓他們發表反動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中國人民大學工农速成中學地理教員 梁其璞）

“自列寧逝世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都停止了發展。……

無論在那個國家中民主都不是手段而應該是勞動人民進行鬥爭的目的。我們今天就是沒有民主，民主只屬於中共中央幾個人，一切

問題都由他們決定，各級政權機關的首長都是共產黨員，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是個形式主義的機關。

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這種專政與工農知識分子組成的國家是矛盾的，應當建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合專政。”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6. “以黨代政”

“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共產黨專政，列寧的這個原理不僅適用於蘇聯，而且適用於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提一黨專政。人民政權這是一句空話，是胡說，列寧也這樣說過，因為任何一個政權都是階級的政權，在我們就是無產階級政權。”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張殿鴻)

“‘人大’……實際上是黨的決策表現形式，國務院名義上是執行機關，實際上是權力機關，組織機構重迭，龐大，比國民黨還大。”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我們政治制度上的偏差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共產黨一黨專政等同起來了。”主張建立“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聯合專政”。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的材料)

“我國所有制是公有制屬於大家，就應該由大家管理，把權力交給人民。現在國家制度不是人民執政，而是黨專政，全部權力在於黨，而且還不是黨專政，是黨中央專政，而且還不是黨中央專政，是政治局專政。現在國家制度是黨決定一切，通過組織貫徹，手段就是說服說不服就壓服，壓不服就坐牢！”

“斯大林殺那麼多人，法西斯專政也不一定能這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苏联和中国是一党專政。無产階級專政就是一党專政。”“干部多是黨員，所以就是黨員对人民專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

“产生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权力太集中，斯大林就是这样犯錯誤的。”“共产党壟断全国人事工作，我認為是不对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力量应适当压缩。如国务院十二个付总理都是党内干部，連一个民主人士也沒有，我看这就不合适。”他認為高等学校可以取消党委制，要貫徹党的領導不一定要通过党委制。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虞耀麟的材料)

“党政不分；我国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职無权，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不是人民真正意志选出的。国就是党，党就是国，要人民干什么呢？”

“选举制度：是各党派分攤，不能充分表达民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我們往往以党内紀律代替了国家法制。”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濮仲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好的，但是沒有保証实行。現在人民代表大会有些不象話，民主是真正貫徹的嗎？瞪眼說瞎話。人民代表大会應該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看看实际情况，他的权力是不够的，不相信你在生活中观察观察，是党代替一切，以党代政，明明是客观存在，何必閉眼不看呢？不过我看这倒是小事，應該加强党的領導。……

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我認為为問題不在于形式。团、妇联、人代大会、工会这些紐帶都是形式。实际上公民得到多少权利？选举是安排好的，劳民伤財的布置工作和会

場。”

“目前我国存在以党代政問題，党多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我是学法律的，它是最形式的，根本不是审判員独立，只服从法律，其实不是好象演剧。律师、法官多系党员，至少是团员，实际上是形式，前一时期我实习，毛主席提出案件大检查，公安机关等都开夜車检查，看把统战部指示、党委指示都撕掉了。起訴書都撕了，整天干这些，違法之地都补了，这又何必呢？实际大家都知道無論什么事党委决定了就行了，目前我国以党代政是存在問題，我認为最根本改革，全部問題应讓全民討論，我作为全民中一分子作为一次嘗試，純潔純潔党团的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1）1954年我国建立了按行政区域系統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大、地方各級人大是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不过都是間接民主。我提議今后將共和国正副主席的选举改为全民直接投票，主席候选人应进行竞选。这样，可以加强領袖与人民之間的联系，可以加强党的宣傳教育工作，从而使人民对政府更加信任。

（2）建立生产系統的民主集中制，工、农、商业企业一律实行民主管理，企业领导由民主选出，有固定的任期，同时在中央設立一个与人民代表大会平行的生产者代表大会，有关生产問題要两个代表大会同时通过。这样，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

在（2）点上，改的方法不宜过快，而应当是逐步进行。首先应在那些最大的直屬中央的国营企业改，然后推向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可暂时不改，等条件成熟了再說。目前实行以上改革是完全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儲安平所說的‘党天下’。由于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民主选举是絕不会产生資本主义的，恰恰相反，会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如果說儲安平所說的‘党天下’还不太符合事实，还有許多地方不是党员作头头，那么通过普选將出現一个完全的‘党天下’，不过这个‘党天下’不包含任何特权的意思，而

是‘人民天下’的同義語。”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學生 邓先扶)

“雙軌——分區域系統(省、市、縣、鄉)生產系統(高教部系統,工業系統,農業等等)。

要有二部院:區域院、生產院,兩院同時並行,國家大政方針只有在兩院同時通過才有效,兩院可以發生爭執。如我校成立學工人員代表大會有校、系、年級、班的代表大會,並有常委會。組織形式和國務院差不多,校有校務委員會(具體方案我有一個,時間關係我不念,希望法律系對此感興趣的教員、同學共同研究)。

有些問題需要解釋:

有人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行,而生產方面沒有的原因,因為越往下覺悟越低,給予民主會不會出亂子’全國人民代表選出的是優秀人物,而採用黨委制,校黨委比黨中央水平低,總支比校黨委低,支部比總支還差。這個問題也一樣,而且別忘了校代會黨員也很多,黨員還是能起模範作用,而且能自覺的聯繫群眾,否則群眾就不選他為代表。

有人說:‘現在農業社就是代表大會制’,農民覺悟難道比工人高嗎?不會吧。有人說,‘集體所有制要大家管’,那麼全民所有制更應該大家管。

人事調動,人事權利應交給人代會,主要問題是幹部選擇問題,我們的評薪、學習等問題一定要交代表大會。但交給代表大會的權利有限制,是以不破壞統一計劃為原則,如對工廠說:出廠價格,供、產、銷計劃不能由代表大會決定,不然和南斯拉夫一樣了。

實行這一制度有很多的好處:

(1)可以使內部矛盾得到及時反映和解決。

(2)使整風經常化,我們是13年整一次,這不及時,缺點一大堆。

(3)可以加強黨的領導:使黨的領導從行政工作中抽出來,集中研究決策方針性的東西。

(4)使檢查工作，機構和時間減少，現代表大會去各處檢查工作，如林希翎說的，造成一些假像，半年一次。內部人檢查工作、摸底細。

另外：我說軍隊里目前來說可實行代表大會制，但有一條件，在戰時，時局緊張不實行，在後方如炮兵學校和我們差不多，為什麼不可以呢？能發揮大家積極性。我沒有當過兵，不過我想還可以。

實行這一制度的缺點有一個：黨的軍隊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難實行黨的領導，這是優點也好，缺點也好。

實行步驟：目前已經成熟，孫中山提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時期，我們則：解放前——黨政時期；

1956年前——訓政時期；

現在——憲政時期，開始向人代會過渡，加強人代大會的作用，報上很多反映很好。”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賀 安）

“憲法規定法院獨立，但實際是黨說了算，法律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請示董老、彭真同志就解決了，或者黨組織就解決了，這種作法值得考慮。”他還經常在組內散布“什麼法學不法學，統治階級說了就算”。“法學是不是科學值得考慮。”“法學的任务就是解釋統治階級的意志，任何法學家都是御用的”又說：“法學不好搞，開一次黨代表大會領袖發表一篇文章，就得趕快改變論點，我的孩子將來再也不讓他學法學了。”

（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的材料）

“法院、檢察院都歸一個黨委會領導，這会造成一種局面，如果黨委會本身有了問題，檢察院就無法檢察了。”

（北京政法學院 陳述庆）

“憲法不是共產黨的黨章，是全體人民的法，包括資產階級在內。

过去沒有法制，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沒有个范围依据，做得对不对。有了完备的法制，如果民主党派犯法，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如果共产党犯法，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可約束共产党的領導。”

（北京政法學院 侯振華）

“在決定政策時，黨外人士是怎樣和共產黨協商的，如果共產黨事先做好一套，交給黨外人士照例通過，那仍舊是一黨專政，如果黨外人士在決定政策時，能夠真正參加意見，那才是真正人民民主專政。現在的人代會是有些問題的。”

（武漢大學 曹紹廉）

“改變一黨專政實行名符其實的各黨派聯合執政。

解放幾年來，我國實際上是共產黨專政的國家，其他民主黨派只起了‘跑龍套’的作用，如果說這種政策在過去鞏固革命勝利及進行階級鬥爭取得很大的勝利，那麼在今天從事巨大的建設中就會嚴重的影響了這個事業的發展。”

（天津大學 張金全）

“我國選舉制度不民主，選舉權利掌握在黨的手裡，沒有想到讓人民群眾自己選舉。”“誰敢不選毛主席，如不選他不說你是反革命啊！”

（天津大學 包誠）

“我國最高權力機關不是人民代表大會，而是黨委會……”

（北京政法學院 陳述慶）

7. 法制問題

他誣蔑中央是帶頭破壞法制的，如說：“包括領導同志在內法制

观点也不强，把民主程序看成形式主义”因此他呼吁“中央领导同志在遵守法制上应作出榜样”。此外，吳在整風前就經常對別人說：“我們根本無法可依，談不上法制”，“我們的審判員是憑腦袋辦事，下面是根本違法亂紀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1）“党中央对法制認識不足，竟把連判決都不会写的人放到审判大权的位置上。这太不象話。”“据說县法院院長，只限于十六級以下的干部，再一提升就調走了，使人感到下級法院無人撑腰。”“仅憑政策办事，当然容易出問題，說‘法律是准繩’，而实际上不給干部法律。”“許多法院院長不是县委，是十七級以下的干部或把犯錯誤的人調去。”

（2）“資產階級国家与国民党对司法人員要求是很高的。国民党的司法人員要大学毕业經過高考去担任。而我們基層法院却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法律工作是評定一个国家政治是否英明的重要标幟，而我国的審判員文化水平很低，这怎么行呢？”“審判員、檢察員应由大学生担任，而我們是本末倒置的。”“上海法律專科學校毕业的当審判員，而大学毕业的当了書記員。”

（3）“中央常提到，‘我們工作沒有經驗，因而錯誤是难免的’，但运用在审判工作上，不合适，对审判工作应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否則是不可饒恕的錯誤，造成人家破人亡。由此思想指导，使下級干部产生‘宁左勿右’的情緒。从这次整風揭發的問題来看，很多都涉及到法制不强問題，作事沒有准則，無法衡量問題”。

中央对法律理論工作不够重視：

（1）“法律理論工作究竟有無地位，不好回答，按說法律工作的重要性是不难理解的，但中央有哪些具体措施呢？看不出来！”

（2）“法律系培养目标問題，在系、学校心中沒底，高教部、司法部也迷迷糊糊。”“毕业了几期，搞司法工作的有多少？有的搞行政工作了，有的积压在学校里，下放的很少。”“培养法律系学生有教条主义，

硬搬苏联的经验，如课程的设置有些浪费同学的力量，培养出来的是万金油的干部，而不是专业化。”

(3)“法学研究所迟迟不建立，就缺乏了研究的核心，法律科学到底放在什么地位是不明确的，所以研究的方向也是不明确的”。

对法制思想教育，他说：“每次人代会都提到，尤其许多老干部不重视，以为这是对老百姓的，但问题在于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教育干部守法？我认为措施不多，收效不大，这与重视不够是分不开的。”

他又说：“对于法律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我有些怀疑，我看有些法律是反映个别领袖的意志，领袖说一句话就可以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黄守礼的材料)

“但是我们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也是很严重的，部分案件重判了，对犯错误的人民群众存在着单纯惩办主义的观点，缺少对人民进行守法教育，对工人阶级内部特别是对触犯国家法律的干部太宽了，于是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失去了法律应有的尊严。”

“团县委前任×书记，在大会上偷姑娘的包子(乳房)，受侮辱的全村群众连续几个月罢会抗议，结果只作了党内警告处分……在我们看来这全是生活作风小问题，但群众呢？可不象你们那样简单的看问题，旧社会里有一句俗话：‘十条人命九条奸’，在黑暗的旧社会里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受了侮辱的群众当然只有拿起反抗的刀子，可是现在呢？莫怪群众说：‘我热爱毛主席，我拥护北京的共产党’，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执法者们，你们自己犯法了，由于你们不安分守自己的职责，你们人为的加深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梁彦彩)

(1)“中央重视法制工作，但只停在口头上，没有在立法和理论工作上反映出来。”“刑事立法工作死气沉沉。”“有些应当而且能够颁布的法律到今天未颁布。”他说：“整风运动从政治上看是大民主，从法

律上来看,是个法制的問題,很多东西沒有規格,就乱来了。”又說董老曾說:“在和平时期,法制工作不占第一位,也占第二位,但董老的話沒完全成为现实。我們要向中央大声疾呼法律工作到底占什么地位。”

(2)彭真說,事实是依据,法律是准繩,“而我們就要大声疾呼!我們就沒有法律,到底以什么为准繩?”

(3)“中央認為,沒有法律也可依政策办事,法律早一天,迟一天頒布,無关”他說“中央認為靠政策吃飯就可以了,造成很多干部法制觀念不强”。他又誣蔑我們司法机关是:“一个小偷还未把手伸进別人口袋里,就被判几年徒刑的大有人在,干部違法乱紀,打击报复,逼死人命的却檢討了事。”

(4)“党中央提出,过早頒布法律会过分束縛手脚的提法帶來很大付作用,我認為束縛手脚是束縛干部,使干部不敢違法乱紀,对群众不会束縛手脚。”“領導上总是怕法律束縛手脚、怕本身就是破坏法制,这是中央的大問題,連董老也有这种思想。”

(5)董老說“唐律是經過三个皇帝,三十多年才頒布的,法国刑法典也是如此。我認為不能以此为理由,唐律頒布前,引用了隋律。”从而他說“法律理論工作落后,法律落后与中央有关系”。很多中央負責同志对“法律無所謂”。董老的批評,是“雷声大,雨点小”。

(6)“行政法規起草工作不能統一,許多部門自己頒布單一条例,缺乏統一的审核和編纂,以致互相矛盾,使下面無所适从。”

(7)“党中央有些工作代替了立法工作,如:中共中央十人小組提出的划分反革命和刑事犯罪的标准,許多地方以此为指导,我認為这些应交人大常委会討論通过,使群众有所遵循。”

(8)“有些法律过时應該修改而沒修改,如婚姻法第19条。”“在和平时期这样作沒有必要,似乎賦予軍人一种特权,妇联也因此提出意見,这是不合理的現象。”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黃守礼的材料)

“中央重視法制工作不够，从整个法制状况来看，相当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1)在立法方面从审判工作看，自从檢查錯案以来大家都感到需要法律，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对法律工作重視不够，沒有將这一工作推动起来。这受很多思想支配。有人認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产生法律，这种提法有局限性。不能扩大到整个立法工作。有人認為法律跟现实走，只有經驗成熟才能頒布，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律应走到现实的前面指导现实，宪法就是如此，立法应有預見性，如等总结經驗很多事情处理时缺乏法律，而經驗成熟了立了法，事情却已不存在了。有人認為法律一規定，事情就稳定下来，情况一發展就会脱离实际，束縛群众的手足，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們不了解法律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事实由于沒有法律，發生很多錯案，为了更好的同犯罪斗争，解决民事糾紛，及时的頒布法律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朝鮮很早就頒布刑法典，很注意法制工作，我們处于和平环境都沒有頒布法典，相比之下，看出我們立法工作落后。从現行立法看很多是不合理的，不能起刑法武器作用，实践反映，不能根据‘惩貪条例’判案，‘惩反条例’有的規定不科学或已过时，中央早就發現但迟迟不予解决。

刑法典从1953年起草，从延安时就开始注意，而至今仍未頒布。婚姻法19条不合理，連革命軍人的訂婚关系都加以保护，在抗美援朝时为了巩固士气是必要的，目前已經不合适了，軍官是常业軍人，只准革命軍人提出离婚这是違反宪法的。要是这些法律都不及时修改，影响人民幸福生活，对革命軍人建立婚姻关系也有妨碍。

(2)在司法方面，干部水平低，听說毛主席說司法工作应当是專家的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是專家，連判決都不会写，只是政治条件好，成份好，有一定斗争經驗。只憑这些不能符合人民利益，必須提高干部水平、培养干部应当有计划进行，法律系可以負担起这一工作，审判人員輪流訓練提高业务。

(3)錯案問題。有人滿足于正确案件占90%以上，而忽視錯案数

字,这就是不对的,一个錯案对当事人來說就是100%的錯誤,评价审判工作不能从全部案件的平均数来計算。”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朱华荣)

他污蔑我国法制不强,宪法几乎成为一紙空文,党中央不重視法制。

“(1)党中央和‘八大’号召加强法制,可是言行不一其原因在于中央,如宪法規定的立法权屬於‘人大’可是后来‘常委会’也有了立法权。例如:新疆省建制的撤銷未經‘人大’討論由常委会决定了。国务院不按选举法办事,选举法規定三十天前公布选民名單,但国务院規定二十天內搞完。

(3)又如我們这次实习中有一案件,法院本不拟受理,但市委五人小組有处理意見,于是就按市委的意見来受理了,——可以不根据法律办事。

(4)有次科学小組听王作富老师傳達高院‘55年至56年度复查案件’的报告中:毛主席說,‘依法办事,但不要束手束脚’,这我不理解,好象法律可以灵活运用,随便一些,这样很难讓老百姓遵守法律,故中央对法制不够重視,聶副校長說:‘宪法可以灵活运用’事实是这样。”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鳴的材料)

他認為我国基本上沒有法制,因为“法制是意味着二方面:一方面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有法必依。在我国这二方面都沒有完全做到,表現在:

(1)無法可依;

我国的宪法仅是原則性的东西,而我国沒有民法典、刑法典、劳动法等等,因此判案大部分是按照党的政策及审判人員法的意識办事,伸缩性很大。

国务院,国务院所屬各部、委,各省(市)根据宪法規定所頒布的条例、法令、法規等規范性文件,这是都不能算是法,認為只有最高权

力机关頒布的規范性文件才是法。

(2)有法不依:

1.有一地方,公安机关70多人,而檢察机关3人,公安机关要逮捕人,檢察院不批准不行,因此批准是形式。我們人民大学法律系都違反法制(搜身事件)何况其他地方,其他部門?

2.肃反运动中,檢查肃反对象的信件,这是違反宪法的。

3.肃反扩大化了,錯杀了一个人就算是扩大化。

4.我国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基層人民代表大会,經常不按期召开。

5.搜身事件,学校、保衛科主观上就是違反法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戴逸樵的材料)

“我国目前在省以上机关有法制,而在县以下的基層單位可以說沒有法制”。“在基層干部中没有什么法制观念,常常有侮辱人格、侵犯人身的事情。因而我国的法制是不健全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范喜謙)

“我国法制不健全,給三害造成了条件,宪法規定了人民的权利,但五五年肃反却發生了一些違法乱紀的行为,如私拆信件,以肃反为名干預人民的言論和通訊、行动自由。在农村也有錯誤判刑,监禁的。錯了怎么办呢?沒有正确处理。建議人代会通过人权法,干部侵犯人权一律撤职、降級,建立法制使党员的行为有一些約束……对共产党人多一些約束,群众就需多一些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中国可以說根本就沒有法制。”“惩治反革命条例可以隨便使用,幅度很大,願意讓你死就讓你死,願意讓你活就讓你活,很难說有客觀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森达賴)

“宪法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在实际生活中难以理解。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为侵犯人权、破坏法制。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一有怀疑就进行斗争，象斗争地主一样，运用肉刑，扣押……什么刑都有，一部分人就被逼迫而死，运动中死了不知多少人，在斗争时最大的问题是不准被斗人争辩，只准说‘我是错误，我贪污更多……’来剥夺公民权就限制了自由，监视行动，还有很多变相的人身搜查、压制。”并以他当时工作单位为例：“三反运动在一个小单位里自杀了三个人，打出了一只假老虎，这是运动的成績(?)。在小机关(指基层机关)、在农村，破坏法制的情况更严重。如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干部就是强迫命令，吊打农民。”

“我同意林希翎关于法院没有独立审判权的观点的说法。法院审判处理的案件，由党委书记批准才能最后生效，这使有的人就趁机歪曲、利用法律；这也造成了打击报复的可能；审判员没事干，就助长了官僚主义，这是法制上的不合理。”

“高饶反党联盟在党内是不允许的，应该处理。但从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未看到他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把高岗由国家副主席职位就撤下来了，难道公民就不能当国家副主席吗？这是法制上的不合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黄世君的材料）

“解放后没有‘民法’，‘刑法’，共产党只重视政治不重视法制，又说：由于我国没有健全的法制，宪法只是纯粹的形式，所以干部不受到法律的制约，认为，政府工作全憑领导干部的意志办事，是三害产生的根源，所以目前关键性的问题是要为健全‘民主’和‘法制’（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而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 韓运德）

“一定程度上没有法制，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我国没有做到，干部缺乏法制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我国沒有法制，象公安等机关随时有人身搜查的权力，鎮反到处过火，我国的領導者是受了斯大林公式的影响，人权的侵犯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某些基層干部，認為反对他的就是反党反人民，这当然是他們知識浮淺的悲剧，我們應該尊重每个人民的行为和自由。这种現象比资产阶级的民主还落后，是封建的残余，因为人权的保証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的。我国的宪法制定后对某些党员來說是無所謂的，我們在法律上應該求得人权的平等。我們的运动是經常有过火現象的，今天对李新的斗争也是有过火現象的，領導者可以嘗試一下这种过火的滋味，我們为什么过火对人采取心灵的摧殘呢？”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濮仲文）

“法制不健全，下边乱整人的違法現象很多。外面講遵守法制，內部不执行法制。有些領導喊法制，对人馬列主义，对自己馬虎主义。”党委对法院某些具体案件加以指导或提出处理意見就是“違犯法制”，“妨碍独立审判”，同时他認為这是一种变形法規。且說我国民法等至今仍未制定出来，就是“中央不重視法制的現象”。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章 齐的材料）

“1.宪法規定有迁徙权利，实际上被否定了，华侨不能隨便住在那里，农民不讓流入城市，有些人沒有劳动力到城市来住也不許。

2.公民的选举，游行，集会自由等規定有些成了形式几乎变成了空談。

3.我們經常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破坏宪法，但我們也讓人抓住了小辮子，对無产阶级不利时就可以不遵守，故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实际上也沒有按宪法办事。

4.对宪法执行情况的看法：宪法条文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1）沒有执行的条文（2,18,27,41,55,58等条）。（2）执行不够的条文有20多条。（3）执行很不够的条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張殿鴻）

“在整风中，听到一些揭發出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深感人权無保。五四年通过之宪法已規定了人身自由，居住、通信等諸权利，但以后之漠視宪法、侵犯人权之事实又層出不窮。其中如限制人身自由（肃反中五建公司所为）私拆信件，居住之非法檢查（肃反中一些部局和机关所为），非法拘留，吊打和監察（統購統銷中农村一些区乡干部所为）等确非少数。个别甚至有侮为精神病以監禁之（林希翎之报告）逼死后又侮为反革命以塞責者，試問国法安在？为此我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訂和通过以保障人权、对侵犯人权行为之法律处理和檢查人权案件之期限規定等为內容的‘人权法案’——申明国法以定民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她認為“我国法制不完备是由于党中央不重視立法的結果”。她不同意董老对法制不完备原因的分析。她認為国法不可犯，杀人要偿命，犯罪要坐牢等王法統治已养成了群众的宗法观念，就是干部法制观念薄弱，国家机关不遵守法制，專靠党的政策办事，党委決議高于一切，因而使立法工作緩慢。她还污蔑党对法院工作的領導是“干涉”是違反法院組織法第三条規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鄧淑荣的材料）

“我的意見，通过組織向党中央反映，应真正的保障人权，如报纸上看到，不經任何手續逮捕人。不能打罵犯人；但不如此，打罵者未处理。原單位一复員的共产党员，一天上午即打三人，打犯人即等于打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王文彬）

“法律是形式，罗瑞卿部長有几个圖章，圖章一盖就可以抓人。”污蔑党是破坏了法制随心所欲的抓人。

“檢察長都是公安机关負責干部兼，而公安部門的一切案件都由

党委干涉。”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章 琳的材料)

“現在只有人制沒有法制，国民党时这里偷了东西可以逃到別处，現在不行，現在到处是党，这里偷了东西，到那里还是偷东西，因档案上写着。人制可以制人于死地，死而不能复生，鉄是法制一切是人制，一切憑印象几个人商量，以后应建立一系列制度，沒有制度使人提意見不能明确提，如有規定22級不能睡什么床，他睡了就可以提，但評教授講師就沒法提意見，另外对教員成績的考核制度，某教員好，某教員不好，究竟标准是什么，派了倒霉活就倒霉，沒有派走运，但不上課的是否好呢，因無人提意見就是好了。誰的官兒高誰的意見就正确，都是人制而不是法制，因人制可能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观点，有的听話就好，吹吹捧捧是好，从学校直到教研室都有这种情况，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德才而才的地位很低，过去的德可能包括了宗派主义的德，官僚主义的德，自吹自捧的德，听話奉順的德，而不是辛辛苦苦的德，勤勤懇懇的德。”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韓光远)

“我們从文件和書中常可看到，也常从某些領導同志的报告中听到社会主义比封建主义、資本主义文明。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用严刑拷打、逼供訊的办法来維持他們的統治，而我們則廢除肉刑，不用逼供訊的办法对待犯人，但是从別人(程海果(林希翎))所揭露的事实看来，今天我們仍在用肉刑、半夜逼供、向犯人灌什么湯等等，有的則用变相的肉刑，实在令人痛心，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李金銘)

“中国就沒有法制，在运动中看情形，随时制定，法律是灵活运用。”“我国法制不如日本的法制完备(指伪滿洲国——編者)。”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圖書館員 金大鏞)

“高干不受法律約束，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對老干部寬容，黨紀不嚴”，“過去沒刑法條例，沒法律標準”，“黨員違法了，總要先由黨內處理，才送法院法辦，這裡有官官相護，往往黨員犯了法，黨內不處理，法院就不能辦”，“黨委對法院干涉過多，法院沒有真正的審判獨立，以後黨委只能通過法院的黨組貫徹政策思想領導和檢查政策執行情況，不能干涉法院的辦案和逮捕人”，“黨員犯法，法院應不管黨內處理如何，一律依法辦事，黨內處理是黨的事，不能混在一起，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

“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集會自由，現實生活並非如此。”

“憲法規定是一回事，實際執行又是一回事。”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煒）

“一切審判最後一次要公開進行，禁止秘密處死。給予一切罪犯上訴的權利，法官、陪審員要選舉，光憑口供無人証、物証不能定罪。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要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些部門沒有作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法制觀念也不強，甚至還有不遵守法制的現象，應該堅決糾正，否則上行下效，貽害無窮。”

“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開會聽首長報告，代表舉手通過，這種形式主義也沒有什麼好處。”……認為國家法講課時講到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優越性是“吹牛”，認為優越性是“空洞”的，問題不那麼簡單（在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他認為這就說明了不是沒有問題的，可見他是把匈牙利事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的——整理者注）。又認為在講到批判國民黨的反動制度時是“廉價的批判”。

“中央的法制觀點也很薄弱”，“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尼赫魯到中国要參觀監獄，事前我們就布置，大掃除，叫犯人洗衣服換新衣服，吃好的。尽管如此，事实盖不住。尼赫魯發現一个十六岁的小孩服刑期，尼赫魯很驚訝的問，因偷盜判六年徒刑，已执行五年了，是十一岁开始坐牢。除非沒有，有了隱瞞不了。

賣雞蛋的因沒飯吃打了幹部，事后送到派出所，因他沒飯吃嗎？也沒判刑，勸釋回乡，讓去合作社要飯吃。

法律方面：汽車壓死小孩法院反判小孩父母三年徒刑，他父母已够倒霉的了，为什么不判坐汽車的人徒刑！这样的社会，坐汽車的人坐不稳。”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王德周）

“常委会决定对所有問題要大檢查。很讓人气愤，那些市政公安局、法院，塗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檢查。法院审判的結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貫’的現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領導有意见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組織，反組織就是反党，反党則反人民，反人民則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層領導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繼承过去統治作法，繼承了地主惡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沒有这样的統計，竟有多少人錯誤呢？多少人被害呀？

我到石家庄实习，一个农民很大胆敢說，因为給留吃的不够，而憤怒的發動人民，但被說是反革命，而判刑十五年。質問起来，院長又說不是反革命，但这个小子很歹，一向他破坏中心任务（打魚不打也不下地）給他三年吧差不多了。

在实习中刘錦章还煽声贊成，我就反对……随便定罪名，不打魚这是落后意識怎能定罪？我以教条反教条，反而生产实习成績得3分，以后市委撤其院長但这农民無故坐牢一年。

石油工业部工程师王玉凤，是搞質量的，調来一位老干部拼命要增产節約，王反对他不保証質量，触犯了領導，被評为二等技术員，說

什么中央工程师到地方便为技术员，以后看到其他工程师来了也不是这种情况很不滿，以后又叫他去收票，他不同意幹，結果罪名是違犯劳动紀律。以后又讓他什么也不做，結果更扣上違反劳动紀律。为此，王某气得帶了老婆到昆明旅行，这里便把他开除。他曾写信給‘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派韓同志調查，韓同志很負責任，調查的結果打了报告，对石油工业部提出了意見，而石油工业部具体当权者的党员却置之不理，这样引起了王某的气憤，到部長家中打鬧，而被捕。定了一大堆罪名。我們实习中一天晚上召开紧急會議，說“人大”常委会代表要来檢查时，先想一想他們問什么問題，民主党派是来找共产党的岔的，而对这位韓同志也做了人身攻击，多数我們打話岔，使他們問不好，我看这和欽差大臣一样。样子非常狼狽。我非常的气憤，提出了意見，說明人民代表大会要有实权，你們这样做，反而对統一战綫不好。就这样第二次实习，檢查長就不讓我参加了。这些‘官’对毛主席的报告，并不很好的听，他們是教条主义的馬列主义。第二天我打电话給韓同志报告这种情况。根据檢查長的意見：最初不該逮捕，但这样放出去是对国家机关威信不好，所以宁肯交法院判無罪，再放出来也要起訴。……”

“关于法制問題，我国目前基本上还未建立，审判員量刑幅度很大但‘过于执’这种人却很少，去年我在石家庄实习中，遇到这种‘过于执’这种人，一个普通农民判刑十五年徒刑，定成反革命罪，事实上不是反革命罪，院長还說：‘这小子虽不是反革命，但挺懶，給它判三年’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不应该把破坏中心工作当作反革命罪，后来市委知道了但还是关了一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国民党的六法全書还有可取之处”“资产阶级的意志也可繼承。”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

“国民党的民法是所有資本主义民法中最进步的，集中了資本主

义，所以許多外国学生都研究它。”

（北京政法学院 姚 明）

“今天以前，我国只有原則性法律，下边执行中有很大的偏差，是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还要研究。”

（北京政法学院 張西冰）

“有了宪法，却又沒有具体法律，刑法、民法、違禁法、公務員职责条件等都沒有，这样不制定使人民沒法来监督工作人員，沒有办法来限制他們胡作非为，但即是定了，也是形式，还不是一样像宪法一样到时候超越法律去作。”

（北京鋼鐵学院 彭卓宗）

“一种制度的形成必然經過如下的历程，爭取——宪法——再爭取（爭取立法的实现）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着这样的历程，1919年革命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是第一步；解放后一系列的法制，特别是1954年社会主义根本大法的訂立是第二步，紧跟着第二步而来的第三步，正近在眉尖，1954年訂立宪法的时候，許多人忙于唱贊美詩，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如何实施的問題，所以有1955年肃反中許多地方破坏法制現象的出現；但是在当时却無处訴說，这說明了，仅有書面的条文，如果沒有社会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說这社会已經有了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須有群众的爭取，过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还是如此。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部份和全体的关系，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备，恐作风問題是錯誤的，但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也是錯誤的，三害得以泛濫，是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我們目前的任务是：

爭取宪法的徹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北京大学 陈爰文、江文）

8. 对国防军队的誣蔑

“龐大的軍隊是歷來統治者的必要工具，以毛主席為首的一批人，都和過去歷代的統治者一樣，為了私利，就養軍隊來保護自己，怕軍隊倒戈，就給軍隊很高的待遇，國防部長安上自己的心腹人；彭德懷是毛主席的心腹人”。

“軍隊和民主很有關係，黨和國家牢牢掌握軍隊。軍隊待遇高，……是否以此來壓制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于云鵬）

“部隊質量，政治質量可能高，從科學，文化上看不一定高”。

“……探照燈在現代戰爭中沒有用，是浪費……。有些將軍，沒有將軍風度，不能指揮現代化戰爭，打原子戰爭就不一定適合……。部隊很多幹部蹲在毛坑里不拉屎，一天工作兩小時就做完了……。校官是草包，見到他們也不要讓開，昂頭直走好了……。軍官的孩子送托兒所，是培養新貴族……。知識份子在部隊吃不開……。我們軍隊學蘇聯學壞了，把解放軍許多光榮傳統都丟掉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岳文伯）

“在戰爭中許多朝鮮男人死了，因此婦女大大過剩，志願軍有個營長，強姦了寡婦好幾次，營長以幾斤大米，幾件衣服作為代價，因此被軍事法庭槍決了。由於朝鮮婦女太多，沒有飯吃，許多志願軍的司機，由於遠離祖國的妻子，為了滿足其生活上暫時欲望，就與朝鮮姑娘，年輕寡婦搞起姦頭，有的志願軍司機，還把朝鮮姑娘裝在大木箱里，用自己駕駛的汽車載回祖國，作為正式妻子。”

“軍銜制破壞了官兵關係。”

“復員時，因他們不是黨員，不管他們年紀再輕，業務能力再強，也沒用，只好復員。”“黨需要時找來，不需要時就復員，使許多男女青

年在部队里埋沒了青春，复員后一事無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学习苏联有教条主义，部队采用軍銜后，官兵关系不如以前了，現在部队与老百姓也不密切了，住的地方四周用鉄絲網圍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

“后方部队的軍官，星期天可穿便服，裝飾过美，購買东西过多，經常鬧事，尤其是恋爱方面，学校里星期天軍官均排队接見女同学，用錢，物質引誘，可見軍隊中部份人不与群众共甘苦，將过去的优良品質遺棄，軍官对物質享受方面太高。”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林忠仁）

“解放軍軍官錢多，帶着錢到外闖來闖去，弄得交通（拥）挤，物价都漲了。我去年寒假回家，买火車票睡鋪，就很不容易，优待解放軍，就讓他們先买，而且是半价，我一个老教授，都要在后面排队，在火車上，有一个解放軍，还欺負老百姓。”“青年解放軍也沒打过仗，我想是不是老解放軍打了天下，要享受，不得不分一点給解放軍。”“現在解放軍人太多，軍官待遇太好，道德也不提倡。青年軍官，动不动每月收入就一百多元。我的兒子，現在也是軍官，收入大概一百多元，錢也不寄給家里，自己賺錢自己用。中国向来以孝維持家，現在他給父母寄錢，也許認為是被剝削。現在很多父母都沒人养。”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我国軍隊是用来鎮压民主的，因此軍隊薪金很高，軍官又多，这就加重了人民的負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解放軍都是亡命之徒，不怕死的魔鬼。解放軍不拿群众一針一綫，可是牽老百姓的大牛。”“解放軍把国民党軍官活剝皮，怎能說是

优待俘虏呢(听父亲講的)? 乡下转业軍人乱七八糟我经常跟他们打架。黄繼光是上级給任务不完成不行逼死的。”

(东北林学院 金博文)

9. “新闻不自由”

“我看报纸,报喜不报憂的现象,有些气愤。其根源是在制度中间某些环节还有毛病——共产党领导官僚主义。我过去对党的这种政策是不滿意的,現在不完全滿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章 齐)

“报纸的生动性、趣味性不如以前是否与集中过分有关! 人民日报自己以为代表中央,不敢乱說乱动,社会上許多现象不敢去揭發,不能創造性劳动。”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俞国亮)

“許多記者反对新华社对新聞的壟断,……报纸是公式化,概念化,我們如果看过人民日报就没有必要看其它的报纸了。这不是明明在浪费纸张嗎?”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濮仲文)

当右派分子林希翎要宣讀所謂“赫魯曉夫的秘密报告”时,一位同志說是美联社的消息,是造謠的。田說:“人一有阶级性就無真理可言,共产党也一样,帝国主义的通訊社,报纸为他們服务,造謠,說假話,我們的通訊社,报纸是为我們服务的也都不是真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田仲倉)

“我所指的‘保密扩大化’主要是指新聞报导的片面性,学校藏書的片面性,国家限制太多。

听说：毛主席主张以后转播一部份‘美国之音’，我觉得很英明，处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人的确需要多懂些‘世故’，否则就跟不上时代。新闻报导片面以致使别人看到一点反面的东西就大惊小怪，使人精神僵化。讲课内容保密扩大化引起脑子衰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员 徐京安）

“据云：参考消息，系保密者也

天！共青团员乃党之助手也，吾辈团员××不已者！

余问君：‘参考消息’，对助手保密，无奈何，有手难助。

君莫笑，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吾辈不知彼，徒手赤膊上战场，怎能舌战群敌立勋劳？

敬告吾党，勿将团员作驕子，置于暖室永無！

团员愿冲锋陷阵，暴风雨中逞英豪，快把参考消息拿来参考！

快！快！快！”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革八班一群团员）（大字报）

“参考消息控訴”

“我首先对我在人大的处境感到遺憾，人大有了我，弄得議論紛紛，滿城风雨，事情仿佛禍起于我……成了禍根了，这实在冤枉死我了，上帝保佑，爭鳴的时机来了，所以我也願意在大家面前提控訴！

一、有人說：我是保密的内部参考消息，但是不然，我却在新聞系普遍参考。

二、又有人說：‘十指不能一般齐’，我看也不然，实际上在历史系的‘个别人士’也幸运地得到秘密参考的厚待，的确这些历史系的得天独厚的寵兒們，也实在以此为荣，有人問他：在那兒借的？答曰：这个还能借嗎？……

看！这前后就是多大的矛盾呀！我們实在为这场戏剧性的表現感到难为情，我願意普渡众生，成为普遍参考消息，有人也可能歇斯底里地反駁我，誰願参考你呢？好！我現在公开征求意见，願意參考者請

簽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馬八一群學生）（大字報）

“我國新聞不自由，有關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事情應該讓大家知道。”“報紙報導面過窄，對資本主義國家情況很少提及”，他稱之為“愚民政策”，並得出結論：“政治是有組織的以強力為後盾的欺騙”。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煒的材料）

“楊芹同志說：報紙上只有共產黨的消息，沒有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消息……說是防止我們的思想混亂，會鬧事。限制新聞自由是國家的制度問題……參考資料我們看不到，據說沒有紙，這不成理由……報紙上報導得相當片面……剛解放時蘇聯把東北的一些發電廠機器搬走了，如何報上不報導？”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二年一班）（大字報）

“趙鴻飛同志說：我認為美國比我們新聞自由，美國也登我國的好現象，而美國有好的地方，如生活水平高不能不承認，不登載也是片面宣傳。如說我國地大物博，不說貧窮落后，只宣傳農民生活好，丰收，而不說災區情況……新聞自由與黨的獨攬大權有關，人民日報不一定是黨的機關報，可以各民主黨派聯合辦。”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二年一班）（大字報）

“愚民政策：教師除了黨規定的東西，敢發表意見嗎？學生能分辨是非、獨立思考嗎？青年知識分子，天天看到的是‘人民日報’那麼一點東西，連‘參考消息’也看不到！難道1000多萬黨員，加上義勇隊（指積極分子——編者）就代表六億人民嗎？就他們要知識嗎？使人思想僵化，歌功頌德，這是錯誤的（本人氣憤）！”

建議把問題公布一下，看看哪些該解決了，建議校長徹底地檢查出版社。社會不是世外桃源，我們出版社是世外桃源，領導人是土皇帝。”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助理編輯 齊俊成）

污蔑我國的新聞宣傳政策說：“是教條主義的，只講光明面，不講黑暗面，只講優點，不講缺點。”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傅鉄城的材料）

“新聞壟斷是共產黨國家（起碼是我國和蘇聯）的特點。我國對大學生的不信任，這與把人民當群眾的理論是一致的，各家報紙只好看人民日報行事，我國報紙只宣傳光明面，不宣傳黑暗面，只說農民生活好而不說農民餓死的情況。我國新聞是欺騙性的。54年有幾處宗教組織暴動把它說成宗教暴動是不妥當的，這與農民走頭無路有關，農民生活有一點希望時，他們是不會相信天堂的，同樣的事實在波蘭等事件中不也是被解釋為敵人的活動嗎？”

“我要以林希翎的話向毛主席進一言請你檢查一下你的幹部的工作對你的寶貝（指知識分子——編者）是實行愚民政策我現在是處在半愚昧狀態”。贊成撤銷人民日報總編輯，（當人民日報發表出“老百姓沒有委托葛佩琦發這樣的言”之後徐憤憤不滿地說——編者）“這簡直是用政治帽子壓人”“用斗胡風的一套斗葛佩琦”。“人們思想混亂（包括我自己）就是黨中央教條主義宣傳報喜不報憂的結果。”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徐盛桐）

“宣傳工作同教條主義是分不開的，宣傳工作有沒有只講好的，不講壞的？有沒有欺騙？我當年在西康，西康的地理條件生活是很差的，可是領導上號召大家到西康去時就不是實事求是講的。人民大學招生也是一樣。例子還很多。政策性的宣傳工作就是人民日報也是不實事求是的。如關於統購統銷的宣傳工作就是。這些使人民對共產黨產生懷疑”。他要求公布“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說：“我覺得不把問題告訴人民是不對的，要不就是愚民政策。不能採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新聞消息應告訴人民，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這不能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福榮的材料）

“我們現在新聞不自由。”主張“有关資產階級的消息一律刊登，参考消息同學們都应当看，不应当以級別決定那些同學看或不看，級別并不代表一個人的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趙恒珊的材料)

“為什麼要封鎖消息？‘參考消息’以及敵人的材料只准上層幹部看，不准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的人看。不叫我們看就是不相信群眾！不相信群眾就是反馬列主義！難道解放七、八年我們的覺悟還沒有提高嗎？如果沒有提高，你們共產黨是幹什麼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福榮)

“我們的黨報只會歌功頌德，只會吹牛，從字里行間，都很难找到缺點”，“報紙上的文章都是廉價的贊美詩”。並且認為“我們現在新聞不自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楊森達賴的材料)

“我國的新聞除了個別的，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主要都是新華社的報導，而我國記者都是搞一些零星的報導，所以我不愛看人民日報。”“我覺得現在情況變了，新聞工作可以改變一下。”“新聞工作除黨性和階級性外，還應有其它特點。”“我對於5、6月份的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特別喜歡，就是沒有時間也要看看大標題。”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助教 孫國梅)

“我國新聞基本上不自由……不符合黨中央意思的就不登，跟國民黨，資產階級一樣，這有啥自由？自由不僅要登擁護社會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也要登。”“黨的新聞政策……有使廣大人民不清醒的傾向，加重了教條主義。……人民日報不可靠……報喜不報憂。”“我國的新聞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如很多國家可以登‘再論’全文，但我們對他們的東西不敢照登。資本主義國家有共產黨的報紙，登載社會主義國家的消息，我們卻沒有資產階級的報紙來登載資

本主义国家的消息。”“新聞报导的結果使人認為社会主义完全优越，人民政府好，为什么所看的区乡政府却不好，于是起了惡感。”“很多內部消息不給我們看，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而使很多党團員成为跑龙套的，起打手跑街的作用，往往跟那些官僚主义跑。”他同意“办一种專門翻譯資本主义国家新聞的报纸……建議把‘世界知識’改成完全报导資本主义国家的刊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的材料）

“應該正反什么意見都露头，才是新聞自由。但我們的报纸报导黑暗面少，报导資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少。为了照顧階級性，有些报导不全面不真实。”如他4月×日日記中写的“报上講到波蘭这几天特別緊張，但是詳細的真實的情况还不知道，我們的报纸往往不是完全客觀的真實地报导消息，正象我們講話前总要考虑合不合領導意圖一样……”“我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喜欢看文汇报其原因第一是兴趣，喜欢生动活潑，其次是文汇报和党唱对台戏，敢于大胆批評政府和揭露社会黑暗面。”因而当人民日报批判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时，他感到不舒服，并說“以后又要老一套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王犁剛的材料）

“我国的新聞比資产階級新聞是自由的，但是我們实际生活在报纸上沒有或很少反映，对我国新聞是否自由有怀疑。”“机关报只能表現，貫徹領導意見，对領導很少能进行批評監督，报纸上公报多，會議消息多，新聞八股多，批評科長多。沒有群众、反面的意見、不能成为群众的喉舌，公众的論壇，使报纸不能成为一种活的历史資料，再过一百年，想从报纸上看到我們这时生活，只能看到歌功頌德，看不見工作中缺点錯誤，使人看来社会主义建設很容易似的。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是保密扩大化，有审稿制度，党委卡得过紧，批評很难开展，記者的社会地位低”。“国际新聞登得少，参考消息中很多可以在报纸上登，叫人民比較比較。过去的做法是不相信人民有鑒別能力。”

“建議：1.提高記者地位；2.各省市多辦一些民主黨派報紙，除中央、各大城市外，各省市可以不要機關報，把報紙交給政府辦，或報社成為獨立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曹仲明）

“……新聞報道上報道好的是必要的，但是很少報道壞的，也很少揭發壞的現象，如果在報紙上批評一個廳長，那可就不得了了。另外許多重要消息不給人民知道，這就涉及到一個新聞自由問題。我國新聞是否自由？我回答是有，但是很不够，有一些事人民應該知道的，或是某一部分應該知道的，但是不知道。有些在我們國內發生的事情，外國通訊社都在大談特談，但是我們的新聞封鎖得緊緊的，人民不知道。如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發生的暴亂——武裝衝突，當總理到印度時，外國記者問總理，我們才知道。但是究竟是一回事？不知道。又如北大的整風運動，搞得那麼轟轟烈烈，但是人民日報沒有作一點報道，而路透社報道得很多了。

人民日報對某些新事物是很保守的，如‘鳴、放’的宣傳，人民日報就沒有文匯報積極……

總的說來，我認為新聞自由應該擴大……”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王廷煌）

“宣傳工作報喜不報憂，報紙上只報導合作化的優越性，為什麼不報導合作化的缺點呢？如合作社存在不少問題。報紙上只登紅星社，象這樣的社有幾個呀？（6月11日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時，她又在班會上質問：“農民生活和解放前相比有什麼積極意義？”——編者）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為什麼不介紹？”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韓惠貞）

“人民日報是報喜不報憂，煤礦死了人的事都不登。”他對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報導表示懷疑，說：“這樣的材料

都不符合实际，我过去在山西調查过，就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次陈振兮讀社論，剛念完標題，吳便不耐煩的說：“噢！知道了。”意即又是報喜不報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吳祥真的材料）

污蔑党报报喜不报憂和誣蔑我国新聞不自由。

報紙上公布了广西餓死人的事件后，他在宿舍里提出：“广西省餓死人的事件是去年發生了，为什么到今天才公布？这是被‘檢舉的’。”“我們新聞不自由，工人罢工的消息为什么不發表？光明日报、大公报都有共产党员，党员是便衣警察。”他在七月九号“痛改前非”的檢查中也不得不提到：“我总是覺得報紙有些报喜不报憂，对广西省餓死人的現象最初認為可能因整風在人民督促下报导出来的，否則是不會的……”他在七月十二号班会上說：“……为何只报导抗美援朝中美国死伤多少，而我国死伤多少为什么不报呢？……”这次会上發言中也承認了：“党员起了便衣警察作用”，“我与陈家勛辯論过，我当时認為光明日报与文汇报受党督促，这样不得發揮他們作主人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赵风祿的材料）

“解放后大力宣傳苏联的成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只是报喜不报憂，虛报成績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党的宣傳工作有兩種‘偏向’，一是封鎖消息，要求新聞开放，‘参考消息’要广泛發行。另一是报喜不报憂，只講好的，不講坏的。比如外国对整風的看法，我們只能靠自己猜測。又比如在波匈事件前宣傳波蘭、匈牙利的建設成績非常偉大，但結果却鬧事了，这好像是很矛盾的。过去封鎖消息是必要的。可是現在人民覺悟已經提高了，难道看看外国消息就会去台灣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人民日报也可怀疑，尤其是今天（6月10日）的大标题，这未免使

人感到揪扭，應該懷疑，思考，建議本教研室應該好好談談，暫時不要爭和談立場問題，現在火候尚未到，今后我還有意見要放，如國家大事。”

“對人民日報興趣索然，對光明日報興趣較大，對費孝通的早春天氣很有同感，一點抵觸也沒有，覺得知識分子只要給他幾本書一間房就夠了，文化界對黨的攻擊可以說一點抵觸也沒有。對人民日報則相反，覺得干巴巴的，到北京後，聽他們（黃焘——陸之愛人，吳正民——陸之好友）說，鄧拓挨毛主席批評了，更增加了上述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陸 戈）

“為什麼不發表赫魯曉夫在20大的秘密報告，紐約時報發表的這個報告是真的，希望林希翎宣讀這個報告。報紙上說工人農民比知識分子對右派言論看的更清楚，不見得，這是黨和幹部在下邊組織的，如他們講了葛佩琦殺共產黨這樣工人農民才提出抗議。如果右派向工人農民講話，他們不見得能識得破，而且可能發生農民拿起扁擔打幹部的事，就是現在也有工人罷工，農民鬧事的事啊！而工人罷工農民鬧事的消息就沒有報導。”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羅旭暢）

他對黨報報導的消息和數字認為是“官方消息，不可靠”。“人民歌功頌德，缺點登得很少，編輯早就應該撤換。”他主張“應辦一種專門揭露缺點的報紙”，這樣可以“教育幹部，改進工作”。他還認為“黨對新聞封鎖太嚴”。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向春的材料）

（1）對新聞自由問題：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對，但頑固勢力很大，80——90%是教條主義，無法爭鳴。報紙最近（指鳴放以來——編者）較活躍（指登了不少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編者），我很滿意，可能教條主義者不滿意。過去報紙只是歌功頌德，甚

至連小品、漫畫都不能登，一家獨鳴，只談成績，不談缺點。報紙是幾家托辣斯掌握，資本主義國家的消息看不到，不叫看。只談正面的，不知道反面的，有說好的自由，沒說壞的自由。有說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沒有說其他的自由，你寫了稿子也都退回來。沒有別的比較，怎麼能知道馬克思主義好？”

(2)對出版自由問題，他說：“出版不自由，而自由的口號唱得很高。現在史學界鳴的很多，因為這沒多大關係。而其他科學就不行了，要說馬克思主義不好就不行了，馬克思主義成了‘金科玉律’，誰敢說不好？出版的除了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外，就是簡報等。”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楊維新)

“人民日報本應是為人民服務的報紙，人民要通過他全面了解國內外方面的情況，決定自己行動，管理自己的國家，但是隱惡揚善，一貫歌功頌德，完全忘了自己的任務，在所謂階級性和傾向性的所謂階級理論，把為人民服務轉變成為個別統治者服務的工具。

人民日報社，我問你，你為什麼忘記了自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而去向為幾個資本家服務的資產階級學習。

人民日報社，我問你，人民能否通過你全面了解國內外情況，我們國家制定政策方針是否只憑你的消息可以作出決定的。人民日報，我問你，為什麼不發表北大同學討論我們社會各種根本問題的消息。一封匿名信就大吵嚷，是大批反革命已經動搖我們的政府了還是怎麼的？

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同志，你們根本忘記了你們的職業的特性，你們工作的目的，你們根本失去了作人民宣傳員的道德，根本變成欺騙人民的工具，太愚蠢無知了呀！你要好好學習。”

(北京大學 蔣興仁)

“人民日報只歌功頌德，總編輯應滾下台。”

(中南礦冶學院 李昆侖)

“新聞的內容要經過政府機關的取舍就顯然是不合理了。我竭力主張不論是馬列主義的、非馬列主義的，甚至反動的論點，只要是國際、國內的大事均應報導，否則，只能解釋為不相信群眾。”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現在有牽着走的現象。我國新聞自由比別國少，還不如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我們將美國的消息都報導的話，那麼，我們的人民主人翁感更加强了。因為這樣我們從反面就知道黨中央更正確了。”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助教）

“黨報只是報喜不報憂，如廣西去年餓死500人，報紙在現在才公布，可能還不只餓死500人。”“黨對黨員幹部包庇，廣西省犯錯誤的同志處分太輕了，而且是換單不換藥。”

（中南礦冶學院 鄧榮保）

“民主就是一切事情都經過群眾舉手，否則就不是民主。”

（北京政法學院 尹孝松）

“人民日報報導不真實”。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報導的有关匈牙利事件的消息，他認為：“報導不真實，要了解事實真相必須看反面報紙。”

（北京政法學院 趙日月的材料）

“人民日報對國內情況是報喜不報憂，或少報憂，對資本主義國家好的方面不報導。”

（北京政法學院 陳述慶）

羅曼青（按：羅是章文岳的小說“母與子”的主人公水生的朋友）認為：“政府在欺騙我們，不讓我們全面認識資本主義國家，對它們只

作片面的报导,害怕我們不热爱共产主义社会,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报导也是片面的,只报喜不大报憂的。”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人民日报片面歌功頌德、对缺点却輕描淡写。”“現在的报纸杂志,接受稿件也看人,如你有名望,就是文章差些也会登出,否則就無希望。如果报社、出版社主动来找你約稿时一定会登出,自己找他們那就难办了。”

(北京政法学院 陶和謙)

“高饒事件的詳情人民日报看不到,少数人鬧事在报上也看不到,而对資本主义国家,人民日报只报坏的,使对資本主义国家有魔鬼的感觉,但真正的魔鬼并不象人民日报上說的那样丑惡。”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在匈牙利事件發生时,陈說:“我国新聞不自由,不敢發表事件的真相,是党的控制、封鎖新聞,这比不上资产阶级的报纸。”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的材料)

“人民日报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我国,只是多报喜少报憂,对資本主义国家,則多报憂少报喜。所謂喜,即資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毛主席的言論是重要的,但报刊杂志都登就不必要,这是个人崇拜,如:‘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書‘序言’在体育杂志也登,而且用那样大的字。”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于6月19日發表,而美国也在同日發表,但反过来有关資本主义国家一些东西,我們就很少登。”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人民日报教条主义濃厚。党八股式的說教連篇累牘。”“新聞封鎖的过甚一些，有些东西不肯登，很不應該，有些則登的很慢，不及时。”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目前沒有新聞自由。报纸报喜不报憂，都是歌功頌德的。如現在北大搞得热火朝天，有的提出胡风是否反革命分子。但却外边一点也不提，也沒报导。”

（北京鋼鐵学院 徐蔭如）

（二）兩種制度

1. 仇視社会主义制度

“至于我对社会制度的看法，是有一个过程的。以前想，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嗎？誰也不会相信，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也不能相信。可是观察一下社会現象，产生一系列三害，你能說与社会制度無关嗎？叫人不信服吧，也講不通。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不从制度找不可能。

上次我講得比較模糊，把制度說成具体制度，如官僚机构（这是我从鉄托那兒学来的），另外人事制度。当时我不敢講社会制度不好，所以自己說得比較模糊。

現在我的看法：二种講法一点也不矛盾（记录者按：指具体制度和政治制度）。

但是，現存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最近翻了些馬列主义，自己腦袋想了一想，覺得混淆了一个問題，我們也好，苏联也好，社会主义都沒有建成，都談不上是社会主义。現在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的道理。我一下子意識到这个問題。馬恩講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生产資

料的公有制，生产力水平要完全超过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要非常民主，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的，我们现在是过渡时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苏联1936年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是错误的，也是自欺欺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还说向共产主义过渡？到现在我还不同意。苏联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怎么能是社会主义呢？

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样看，我们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过渡时期，建设时期。

现在制度产生‘三害’，社会主义制度不产生‘三害’。

斯大林的理論：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他推翻了恩格斯的理論，斯大林不是發展了馬列主义，而是歪曲了馬列主义。

恩格斯是正确的囉，世界上沒有大部分国家取得胜利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现在斗争完全消灭了吗？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时就要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叫社会主义。因此，我觉得恩格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成只有在大部分国家革命取得胜利时才能。现在是过渡时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是，也不同于馬克思、列宁說的社会主义。当然囉，这也不是不承認我們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今天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而物質生活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設社会主义有冒进。結果：

a. 除主要大城市外，全国中心城市都衰退了。

b. 农业生产相对减产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社会生活的一些問題”

“1. 歌頌社会主义，掩盖了阴暗面，就会增加人民内部矛盾。‘政

治經濟學教科書’ 社会主义部分沒有一句話真正指出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要对阴暗面进行揭露，不揭露就不能明确社会向那个方向发展。

2. 官僚主义发展到严重程度，领导与被领导就会变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人和奴僕的关系。

3. 上层建筑如果发展到严重程度——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实质上就将经济的性质改变，引起人们不满，起而推翻社会制度。

4. 他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关怀，他要同志们考虑社会主义制度对人们的关怀在现实生活中做得怎样，并探求其根源何在？

5. 說人事制度存在宗派主义。

6. 工业中的奖励制度实际上是集体贪污。”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污蔑和仇恨社会主义制度

①“王子与公主”(其中一部分)

“难道这也是美德，

× × ×

这也叫‘公平’制度？

活着就要惹是攻非，

平民百姓那有权利，

一直到死后入土。

观看你们的表演‘歌舞’。

这是真正人的性格，

× × ×

也是真正人的天赋！

看看金髮公主

× × ×

想到人民之苦。

詩，要为人民喊冤，訴苦！

怎能公平合理，

攻击不合理的事情！

劳动者都享福。

代什么帽子都没有关系，

× × ×

为了广众，吃苦就是享福。

吾兒能觀圖写詩

× × ×

誰能看到真的‘歌舞’？

看看王子公主，

反对宗法制度

搂抱着一塊歌舞，

射击不合理的事物？

看看田間农夫

汗流入田土。

× × ×

劳累一年的农民
生活还是紧促。

安逸生活的王子公主，
穿的是綾罗綢緞，生活是無
限幸福。

1957年7月26日”

②“农民之事”（其中一部分）

“社会主义好，
就是个人受不了！
干部沒有工作，
困难把人包围了。

× × ×

你要找到领导，
他会說你不好。
这个也統購，那个也統銷，
个人的命也在他們手心了！

× × ×

叫活，我可以活，
不叫活，我可以到深山里去
生活。

我也不要社会主义，
我也不經統購統銷！

× × ×

我也当过党员，
对个人要求太严！（对普通党
員而言的，高級人員例外）

可以对吾的生活，
你可以回家生产！

× × ×

我回家生产，

不如去到深山；
我去开荒种地，
建立近代的‘桃园’。

× × ×

在深山中，
無拘無束，
人可用劳动，
生产自助。

× × ×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黑暗遮遍天下。
古人傳說：有十二个太阳，
現在压到那个山下？

× × ×

年成虽然不好，
收成生活总还够了。
为何这个人也困难，
那个人也悲叫？

× × ×

人民生产的东西，
你們回答到那兒去了？
你們的干部也在困难，
也在悲嘆！”

③“太阳出来啊!”

“太阳，出来啊！
你照亮了世界；
世界，太黑暗啦！

× × ×

人生的長河，
人們的痛苦，
人們的折磨，
使人們怎样渡过啊？

× × ×

未来的世界，

是属于純朴勇敢的人民的。
世界的一切敗类，
都将被善良勇敢的人民消灭！

× × ×

太阳出来了！
人們齐欢笑。
折磨痛苦人生的長河，
将变成欢乐幸福之河！

1956年12月 故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王殿彪)

“有那些現象可以說明党有这种錯誤呢？

我国各种机构太多，而每个系統中等級也太多。整个社会搞的像一个复杂的中藥櫥一样，每个人却被塞在一定的格子里。这样龐大的系統指揮就要不灵，中央的指示和意見，逐級下达，每級又都加上自己的主觀偏見，到了下面已經面貌全非了。农民們常說：‘毛主席的“經”是好的，就是叫小和尚念坏了。’而下面的丑事，各級也加以主觀美化，到了中央当然也就不成其什么丑事了。这就是每个工作都是‘成績是基本的’的原因。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并非一般的反对这种等級，我只是反对这种实在太多的等級，例如：教授分六級就大可不必。

更糟的是，現在等級制度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个領域。人分等級，有的地方連茶杯、字紙簍也分等級。分了等級之后，各級的生活条件就有所不同，再加上对下級的权威，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坏現象：个人崇拜、阿諛奉承、吹牛拍馬、竭力上爬、追求名利地位、为工資爭吵不休(有人把这些現象都当做是旧社会的殘余，我坚决反对，因为它们完全可以在我們社会中找到生存的根据)。官僚主义之严重發展也就由此而来，这种等級制度，已在人們的頭腦中打下了烙印，甚

至小孩子們也在那里比較父親的地位、待遇。我主張堅決取消不必要的機構層次和各級待遇的重大差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魯 基）

“甚至恨这个社会，但理想的社会又不是資本主义！無論資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于人类全是枷鎖和鑼銬，明天会來嗎？真理在邪惡面前顫抖嗎？偉大的永恒的真理，光明燦爛的明天，你什麼時候降臨到人類中來呢？”

“社会支配在一个人的意志之下，全国多数在盲目的批評矛盾暴露了，不徹底摧毀生番的制度，怎么能解决根本問題呢？我在想人类往什么地方發展的問題？先寻找社会形态呢？还是先从哲学来解决？我不知道，正在研究。”

“……我只想到社会內充滿了虛偽，并且国家处于危机中，提倡‘节育論’，‘人口过剩’，‘中国用机器’，‘就有人失业’，这是永远不会使用机器的呀！人永远是奴隶，中国人永远是牛馬！幸福的生活？！”

“我不知別的，說不上怎的、我又討厭那些政治人物，見着那些伪君子，道学家，我就感到惡心的嘔哭，伪弊。我可真从心眼里看不起他們。我很沉默。我沉默这个沒有个性的时代，沒有幸福的时代，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沒有幸福，而是全国，究竟誰在幸福啊！？人民是否还願意寻找幸福了啊？！历史还会前进嗎？

我要反抗，反抗这个沒有个性的时代，这个全国的人民都沒有幸福的时代，我要理論亦要实践。”

“……这是什么預兆，使我这么害怕，白色的？紅色的？紅白不一样么？……”“我生活的目的是創造成理想的社会。”他把他理想的社会描繪成“自由、平等、劳动”，認為“平等”是“沒有將軍和主席的国度”，“自由”是“人間沒有拘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很多人有話不敢說，过去思想沒有解放，沒有按自己思想做事，

要造成怎么样想，怎么样講，怎么样做。”“过去有話不敢說，放在肚里，只能往下放。”

“据我的經驗只能說好，不能真正認識問題，人的活力給新社会窒息住，只能講制度的优越性，党是英明偉大，成績是主要的，这是思想僵化直綫思索。党是光荣的，偉大的，正确的，难道沒有錯誤嗎？應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资产階級是腐朽的，作为良心总有个标准，资产階級就一棍子打死。沒有独立思考的条件。”“为什么在青年中会有这样普遍的神經衰弱病，这与有話不敢講，考虑前途有关，怕扣帽子，考虑入党入团前途，志願，專业，恋爱等等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看起来北京的名声虽好，但却是个害人坑。有的人自然是很享福，但也有更多的人愁着沒有办法生活。工資拿到手，沒有房子住，沒有东西吃，因此，鈔票虽亮，正同黄金閃光一样，能看不能吃。”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中国沒有法制，是野蛮的国家。”“知識分子矛盾还是最小的，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工人，第三是軍隊，第四才是知識分子。”“农民矛盾大肚子吃不飽。”“部队里有80%的人員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这些人挨过几整，矛盾很大，报纸上不敢發表这方面的消息，怕动摇軍心。”“现在社会极其动荡不安。”“社会主义又怎么样，还不是吃兩頓飯，到头来还得挨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李万昌）

新社会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看不慣的，他“敌視周圍的一切”。我們參加十一、五一游行他不願參加，他認為大家參加游行是和“农业展覽会上农覽品豆子一般”供給別人“看一看”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为了自己的人格不願參加游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吳汝文的材料）

“这个訛詐的世界和社会里没有立足点。”但他認為这是怪他的运气不好，没有什么真正偉大英雄豪杰都只是走运罢了。“有势力的人放的屁也是香的”，認為他被这不平的社会所埋沒了。

“解放了我們确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是我們却不是解放者，亦不是被解放者，而是当作被寬大了的罪人处理的，是被当作接受改造的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处理的，嗚呼！抗日难道有罪嗎？”（注：其父为国民党特务，在日伪統治时被捕）。“而今天享福的确是那些从前安然作順民的人，是那些放下屠刀的佛——那些改造了的老爷太太們……他們的子女吃得好，穿的好，个个都大学毕业了，而我却当兵打仗弄成了殘廢，耽誤了青春……如果我最初对这‘不平’道个不字就被指为‘个人主义’如果我敢提个意見要求‘民主’就是反党反人民，就弄得千夫所指，群起‘圍攻’。”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的材料）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問題：社会主义究竟能够長久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又如何解釋在建国初期，元气方盛，人們对于战争还記憶尤新的时候，就孕育这么大的风暴呢？”

怀疑社会主义是否能長久、变質、复辟，这是二十大后，国际上發生了許多問題，自己思想上引起了混乱。对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不是痛心，而是牢牢记住，怀疑我們的工作。整风中掀起大风暴的是人民不是右派。林希翎提出对现实不滿，我很同意，假使对现实满足了，猴子不能变成人。报告、报纸只提优点，不提缺点，只提47、48年，不提現在。党这做法夸大优点，掩盖缺点。”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环境（包括班、学校、社会）对于他为什么感到这样‘冷酷’‘窒息’和沒有光明，

鞭打着我走进車中囚犯的牢堡，

耐受着所有的酷刑，……

象把我关进了阴暗的牢监，
沒有一条光亮进来，
这再一長久，令人窒息啊！
严寒的宇宙，
枯冻不了那周身的热血，
顛动的友情，
折磨不去那神聖的一切。”
“这里沒有歌声，
也沒有爱情，
更沒有使你依恋的枝头，
和使你难舍的草地，
只有而且学习的担子，
重重地挤压了你的双肩，
还象有皮鞭，
抽打着你的背。”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应当善变，否則就被淘汰！是的社会是一个無情而多变的奇怪东西，有时是多情温暖，但有时又变成冷酷阴森。”“人們都是那样地学会往上鑽，为了自己可以不惜一切，于是整个地構成一种社会习惯势力，你不由得被它控制，否則你即將受到各式各样的摧殘，以致迫使人离开人生的道路。”“如果你想‘快乐’地生活在物質活动的生活不煩惱，那你就得学会胡說八道，看风行事，学会顛倒黑白，口里說得冠冕堂皇的話，心里想着xyz。”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还我的命来，你官僚主义者。还我命来，你懂得什么是人——什么是‘青年人’，你懂得怎样教育青年人嗎？你把我一个年方十九岁的青年逼上臥軌的死道。你还不去掘墓，还不去自祭，那么还要多少

青年死在你的魔掌下。同志們同胞們，救救青年吧！用我們群眾的雙手，把官僚主義者從此埋葬掉！”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從二十大以後就認為蘇聯犯錯誤是由于制度產生的，匈牙利波蘭的錯誤也是制度產生的，我對南斯拉夫的制度十分感到興趣，人民與領袖間沒有隔閡，不會產生官僚主義，波匈作了制度改革，也是採取了南斯拉夫的一些制度。”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過去胡適曾曰：一口痰滅村滅族，馬克思主義者大笑其謬，吐痰這種簡單的社会現象都要從生產關係（物質）中去找問題。為什麼現在一些馬列主義者，把個人崇拜這樣全國性的嚴重的事件，却在思想覺悟中找問題，而不在物質基礎中找問題。”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我國完全實行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嗎？”

“那还用懷疑，正是憲法規定的，公私合營農業合作化早就進入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更體現了公有制。……

“很遺憾全民的財產中顯然也有我的一份，但却是被凍結的財產，沒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去支配它的主權。集體所有制到今天才高喊把帳目公布，工廠的生產也由廠長和黨委包辦。我們的報刊由于都有共同的觀點，使我們對國家我們的工廠沒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政策方針，發展計劃都由黨或幾個當事人決定了直往下貫。當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學俄語的大學畢業生就多了三千。我們的主權確沒有對現……”

（北京大學 蔣興仁）

“社會主義經濟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就是不能最好的鼓勵勞動者

的积极性，南斯拉夫的工厂集体所有制比较好，彼此相互竞争，能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先进的，但还没有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是理想的，主要是不民主。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其原因：各国社会制度，各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根本性缺陷（不民主），以至于领导代替了群众思维。需要有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南斯拉夫开始了尝试，但也远未成功。”

（北京大学 楊路）

“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制度，要担起双重任务，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要进行对敌国，蒋介石的斗争，阶级斗争的任务给我们的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缺陷也就成为三害的根源，不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彻底根除三害。”

（北京大学 徐克学）

“呼 声”

“匈牙利发生了暴动，苏联有斯大林的独断独行，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情况各有不同，但有共同的社会根源，不只是思想认识和党员作风的问题。”

南斯拉夫的国家领导人，宣称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如果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如果他们的制度真能更多的发扬民主，更符合人民的意愿，何妨向他们学习。

要求：

充分发扬民主!!!

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

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没问题），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领导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 ”

（北京大学 王存心）

“斯大林錯誤主要个人 权力大 大。个人崇拜应从制度上来找根源，是制度造成的几个人的核心形成了绝对的权威，没有人能够监督。在中国，毛主席也有个人崇拜，这主要表现在把毛主席的诗词到处登，实在没有必要。社会主义中，政治理论非常僵化，没有人能够，也没有资料在政治哲学上提出什么新的改进意见，这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提出来。”

（北京钢铁学院 章萼舫）

“为什么现在三害比过去 还严重？国民党时就听不到有官僚主义？而现在到处都是官僚主义，是否新社会更便于滋长？一颗苗是在沙漠里易于成长，还是肥土上易于成长？

学校党委制度产官僚主义。”

（北京钢铁学院 徐繼和）

“苏联20大以来，紧接着社会主义阵营和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这使我想社会主义阵营的毛病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吃力。所以自己对社会主义是否正确，是否在世界上行得通，开始动摇和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性，理论能否发展发生怀疑。……觉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是否发生了危机。”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自己觉得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原编者）不好，但又在学习政法，知道不民主，在课堂讨论时又要讲民主，良心很受责备，因此下年想转学考古，或者教代数 $x+y$ ，避开政治。”

（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憂伤纏綿”

“烏云密集，

憂伤纏綿，

沒有陽光，
沒有暖和的空氣，

我在冷風暴雨中，
追求人生之真理。”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

“余嘗至此，不禁凝思，方今世界，仍有如此之達官顯貴，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不知何也。”

（北京政法學院 吳貴知）

“現在的政法、公安及政權幹部，過去都是拿槍杆子的，不懂得法律，而任意把和自己情緒不對的人拉出來就槍斃，因此造成許多妻离子散，這是多么殘酷啊！這就是社會制度不好，應控訴這種制度。”

（北京礦業學院 李明顯）

“社會主義社會，政治上不民主，分配上不合理，農民生活很苦，黨員工資高，工資改革官僚漲的多，這是只許富人吃肉，不許窮人吃糠，政府領導者月薪高，住的是洋房，吃的是魚肉，坐的是小汽車，同農民比較怎么能叫做同甘共苦呢？”

（北京礦業學院 李一）

“社會主義的矛盾主要是分工，一個是掏毛房（廁所），一個坐小汽車，這個矛盾是怎麼也解決不了。”

（北京礦業學院 趙子功）

“今天的領導，實際上就是統治。今天的社會不自由、不民主，使人麻木不仁。今天的社會虛偽、黑暗。今天社會所行的，許多就是魯迅當年所反對的。”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胡風說得好：我憎恨這個社會及這裡的人。我看透了人生，看透

了这个吃人生番的世界！……人类的文明啊！你如何不痛快地大哭一場呢？

在这种社会压力下，要為誰說几句话是不可能的。解放后的八年呀！是漫长酷情，使人倒置，罪恶含含的八年。

我国的青年沒有前途，个性得不到發揮，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人身獅面……。”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现在物价不是稳定，而是上升得很厉害，增加工資也沒用，不說漲价而說調整，好听一些。”

（北京鋼鐵学院 莫永銘）

“……在目前，我是否應該和现实对抗？是否与现实妥协？我也不知道。我反抗它，因为人們沒有自由与幸福，我暂时妥协，因为我的祖国毕竟在历史上前进！当前，巨大的矛盾醞釀于其中的时候，这个政权便土崩瓦解了！……”

“几天的活动我得出下列結論：

必須推翻現有制度，代替以更新的社会，但決不是私有制的資本主义。……”

“时代动荡！我也在动荡——！

我希望在这样动荡的时代当一个演員！

我并不希望当一个观众！

动荡，我應該沉着、沉着，看看世界將变成什么样？！！”

（原編者注：这正是匈牙利事件的时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推翻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农民社会”的綱領

①“农民之事”（其中一部分）

“任何統治者，

都会甜言蜜語。

在夺取政权的初期，
都会放几个香屁。

× × ×

当它取得了胜利，
就把人民抛得远远的。
又给人民一些工具，
叫他们去服苦役！

× × ×

皇党(上)高坐在殿上，
大喊着：人民该这样，
人民去那样！
权利都压在人民的头上！

× × ×

朝代一个个地过去，
旧的老是由新的代替。
多会才会出现一个公正时代！
权和人民同生死，共呼吸。

× × ×

人们都去劳动，
产品大家享用。
生活都很愉快，
思想都很纯净。

× × ×

农民必须取得天下，
才能保证自己生产发家。
谁的劳动果实，
谁就可以自由地享用它。

× × ×

那就是农民社会，

能给农民带来恩惠。

谁能好好地劳动，
谁的生活更美！

× × ×

社会上各种人员，
都该为农民而干；
因为所有的人，
都是来在乡间。

× × ×

过去所有的朝代，
都坐上农民的脑袋。
历史的各种朝代，
当然一定失败。

× × ×

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给农民服务来！
你们想想自己的祖先，
不正是从那儿来。

× × ×

雨，原来自大海，
终归入大海。
人民来自农民，
终了，归入农民。

× × ×

世上所有事物，
都在不断的向前深入。
社会也在向前发展，
向着更高的顶峰——农民社会进入。

× × ×
美好平等的农民社会即将到来，
人们为什么不赶快起来？
赶快走那些坐在农民头上的皇帝！
取消这个不合理的世代！

× × ×
夜渐渐地深了，
天体在不断地变着。
为什么这样黑暗？
天快亮了！

× × ×
黎明前的黑暗，
人民生活更加艰难。
全中国和世界的农民！
起来干！

× × ×
农民胜利之后，
人人平等自由。
你愿意集体生产，
国家就认真地负责地给马给牛。

× × ×
你想自己单干，
国家也极力支援。
怎样使农副产品产的更多，
咱就建立这样的国。

× × ×
工人是农民之子，
知识分子也是农民之子，

商人和城市居民们，
也都是农民之子。

× × ×
历史上的所有朝代，
都是农民的判(叛)贼！
要不是这样，
为什么农民起义一代接着一代？

× × ×
农民起义的领袖中，
历代对农民都是不忠。
也只有现代的农民领袖，
才能把中外史看透。

× × ×
我们提出战斗的号召，
起来！将不平等的时代打倒！
打倒社会主义社会！
建立农民社会！

57年7月5日”

②“农民军之歌”

“我们是农民的军队，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美好的生活，
我们必须起来战斗！

× × ×
谁要想欺压农民，
我们大家一齐动手！
为农民父老报仇，
把恶棍打个头破血流！

× × ×

我們要碰碎黑暗的时代，
給农民帶來光明、耕牛。
保护农民愉快地劳动，
农民有吃有穿不愁。

x x x

我們是农民的兒子
我們願作农民的耕牛，
平时为父老們耕种，
战时为他們战斗！

x x x

我們手持鉄銚、鎬头，
碰碎給农民的鎖鏈
取消对农民的压榨，
讓我們农民自由！

x x x

我們是农民的軍隊，
平时給农民耕种，
战时为农民战斗，
为了光明，为了自由！

x x x

我們耕种在春天，
收获在中秋。
我們战斗在今天，
胜利在明天以后。

x x x

我們是农民的軍隊，
为了劳苦农民战斗！
不达最后胜利！
永不甘休！永远战斗！

1957年7月6日(章)"

推翻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农民社会”的政治綱領

(1)他的所謂“理論”根据：

1)“农民优点第一缺点第二”，可以充当革命的領導者。历史上农民运动的失敗只不过是“农民領袖叛变而已”。他写道：“整天人家講工人优点那么一大堆……为什么不講点农民的优点呢？”他認為“現代的农民領袖”領導革命是可以避免失敗的。

2)“农民是各界人民的祖先，农民就当然是社会的統治者。”他写道，“工人是农民之子，知識分子也是农民之子，商人和城市居民也都是农民之子”，“人們来自农民，終了，归入农民”。

(2)王殿彪的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綱領：

1)在政治上，他主張“建立天朝制”式的“农民社会”。在他看来那种社会是“人們都去劳动，产品大家享用”，“平等自由”的。他的野心还不止至此，还企圖把“农民社会”推向全世界，他号召“全世界农民！起来干！取消这个不合理的世代！”

2)在組織上他主張農民要有自己的黨，共產黨應是“農民的黨”。早在53年在工农速成中學時他就有過這看法。

3)在軍事上，他主張要“革命”就必有武裝，必須建立農民軍，因此他為農民軍編了“農民軍之歌”，以鼓舞所謂“士氣”。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學生 王殿彪的材料)

“我認為社會主義太不好了，你看為什麼沒有好電影？為什麼上海的球類沒好的？……這些都說明社會主義包含不可克服的矛盾。要用‘否定和否定規律’對社會主義進行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潘世元)

“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通過整風後希望建成名符其實的新社會。”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達)

“章伯鈞在還不成熟，力量還很微弱的時候發起進攻，失敗就不可避免。目前我國新生力量——自由資產階級，富裕農民——的力量還很小，未達到與共產黨抗衡的程度。但是在中国這樣落后的國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迅速發展。依靠這個新生力量，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改變現在的社會，實現自己在小學五年級就有幻想的第三條路綫。現在右派分子雖少，但有社會基礎，還有部分中間勢力可以爭取。首先使上面所述兩種勢力在政府和人大之中取得較大權力，這政府也就是真正的聯合政府。當新生力量與共產黨力量能抗衡時，矛盾就要轉化。這兩個階級之所以可以利用，是因為共產黨的政策，社會主義損害了他們的經濟利益；而且在落后國家，這部分力量也是較強大的。以上是自己的想法，所以找章伯鈞商談，讓章發動這部分力量，也支持了我，我作為這部分力量的代表人物。我承認最後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想到现实給我很多痛苦，所以想造反，并深知必定失敗，但总給你們搞一点乱。反正我放棄个人前途，將來坐牢，槍斃也無所謂，因为我本来就准备自杀，判我时我会說：我是你們工作中的教訓。資本主义社会个人發展自由程度比社会主义大。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关系是表面的，沒有感情。旧大学比新大学好。在旧社会沒有鬧情緒的，不会影响学习，因此学生的最高質量比新大学高。”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五四断想”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出生，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經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發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現象，而新的必然是發展的，能發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的永远是青年。

.....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倒下来攔住去路，我‘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該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說‘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誤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連三的演下的，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

但目前我們用‘挤’来爭取‘悠悠’，用革命来爭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問題，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是得悠悠的变，若是該变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北京大学 譚天荣)

“物极必反，大开杀手”

“这是人們想也不願意想到的事情。但我們不能不想到其可能

性。……显然要是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即会转变为敌我矛盾，党将自己否定自己，人民会不惜再度流血来争取民主和自由，争取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北京大学 刘奇弟）

“告诉你们，你们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失败的，你们的企图一定会破产，你们一定会碰的头破血流的。你们不要对我存在任何的幻想，我一定会胜利的，这一天终于会到来的。”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惹我火了，非与他们（指党——原编者）拚了……在这个社会我呆不下去了，若能允许，我愿自费到日本和美国去留学，学点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好的。”

（北京政法学院 王 革）

“是时候了”

“（一）是时候了

我不害怕做傻瓜

我要重复别人的话

而且还要高唱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为何不是时候？

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

为何不是时候？

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

为何不是时候？

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

（斯大林杀的忠诚共产党员）

为何不是时候？

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

（拉科西种的根）

老兄！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作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他们绝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按照左、右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

（北京大学 严仲强）

“今天军队掌握在你们手里，没我说的，明天军队掌握在我手里，也没有你们说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2. 美化资本主义，诬蔑社会主义

“苏联老说美国不行，这个那个第一，其实美国的技术科学就是比苏联高的多，美国人的生活就是比苏联高。”“美国的氢弹就是厉害，恐怕数量不会比苏联少甚至更多，……若是大战一开始，中国就得吃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杨森达赖）

“对美国要‘积极些再积极些’，我们可以向它多让步，不要老跟他闹对立。如果第三次大战打起来，中国起码要迟二、三十年到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仔细一些说来，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因为，我觉得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对那些劳苦大众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工人不見得比社会主义的工人生活痛苦些，若不，美国的工人，为什么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呢？难道真的没有‘觉悟’吗？”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美国电力生产、工人生活水平平均比苏高。”“工人生活水平高，不会有工人革命。”“又想到人民资本主义問題，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和平長入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美国科学非常發达，鋼鐵产量比苏联大一倍，軍艦吨位也超过苏联，为什么到60年以后有些产量和科学赶不上美国呢？我国的成就与別的国家比一比也不怎么样，当在电影中看到我国成就时想到美国成就更大，科学上美国貢獻更大，第一汽車制造厂只年产量一万辆，原料还不足呢？”

（北京鋼鐵学院 李希达）

“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科学比苏联先进，苏联与各民主国家的鋼合起来也不如美国多事实上苏联不如美国。”

（北京矿业学院 翟耀国）

“20大以后，認為苏联过去夸大成績，有些統計数字是假的，美国也不是在那里睡覺，人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很快，苏联有些工业品就不如美国，有些东西就是美国比苏联好。苏联着重發展重工业，所以輕工业就不如人家。”

（北京政法学院 罗典荣）

“苏联科学技术不一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是吹牛，美国产一亿吨鋼，苏联五千万吨不到。

美国科学生产發达超过苏联。”（蘭州大学 田春如）

“美国有自由，人民生活水平高，人民活跃，思想自由，苏联决不敢和美国作思想竞赛。美国工人生活也很好，共产党在美国吃不开，美国人根本不会起来革命。资本主义国家新武器很多，我们根本打不过。”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危机是无法发展的，但为什么美国在许多科学如导弹、电子计算机等方面比苏联发展的快。发展不能从倍数来看，我国本来就落后，当然可以发展几倍，但美国本来水平就高，当然不能几倍发展，他们只要发展一点就比我们几倍高得多。”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匈牙利事件为何不在美国发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比美国又多些什么民主呢？资本主义没啥不好，说美国不好是宣传，要我亲自去看了才相信。”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资本主义不好，但百年来他培养出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如伽里略、哥伯尼、居里夫妇、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富兰克林、爱迪生，这些人都是以自己的努力，攀登科学成就的最高峰，因而获得全世界的声誉。苏联建国四十年来，培养出几个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来？而在文学方面，能与莎士比亚、列甫、巴尔扎克、曹雪芹比美者又有几人？巴甫洛夫、米丘林固然有世界声誉，但他们是帝俄时代的产物，并不是苏联培养出来的。”

（兰州大学 曹觉民）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出现不了好的科学家和人才。”“社会主义国家出不了人才，苏联没有爱因斯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廿几岁就能当教授，李政道、杨振宇因为在美国才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

（北京政法学院 王革）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实现以后，看了一些事情，不見得比资本主义好，如国营商店不如公私合营的好。”“听到‘农村混乱’的话，起到共鸣，合作化搞的太快太急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图书馆馆员 金大鏞）

“资本主义也有可取之处，人家有新闻自由，有自由和民主，有先进的科学的研究制度，有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制。英国的工党和印度的尼赫鲁也是社会主义。”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讲师）

“希望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经济有一定比例，公有制下的自由竞争。”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自由竞争有它显见的优点，如生产管理民主化促进管理方法、管理作风不断改善；年终分红制，促进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与国家的结合；自由竞争还客观地调节着生产（特别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有消毒作用，能防止官僚主义。它是竞争性的——资本家要生产得好，生产得便宜……因此能节省原料、降低成本，因此生产率高。它的每一件事都争求消费者的意见……资产阶级考虑群众的需要的确是周到的，我们不能闭眼抹煞这些。”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社会主义有经济的自由，每人都各得其所，物质生活不成问题，但政治上不‘自由’，不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不自由，但政治自由，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和召开大会。”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在資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绝对不会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低。”“生产如越發展，則有些較高，有些保持原水平，有些降低，但总的說起来，生活水平是相应的提高了。”“絕對貧困化的規律有問題，不能机械地理解。馬克思在制定这規律时沒有考虑到政治因素，事实上工人为提高工資而进行的罢工会迫使資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資。”“生产水平越高，生活水平越低（指資本主义国家）不是普遍規律，例如英美整个說来，一般生活水平不是一直向下，如果是这样，那恐怕工人們都死光了……”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帝国主义部分要修改。現在資本主义国家都搞自动化，生产力增長很快，危机的周期性显然改变了。原来的理論（馬列主义）已經不能解釋了。”“美国今天的生活还在發展，無产階級貧困化的理論也無普遍意义。”“对于帝国主义部分（指政治經濟学）應該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估計……美共也提出工人工資并不是日益下降。”“我們就是缺乏資料，如果可能讓我到美国去搜集些資料我也願意的。”

（北京政法学院 王 革）

“資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全部被历史否定掉，还大有可取之处。”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

“資本主义国家不好，但有剩余农产品，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好，但没有剩余农产品，我認为有剩余农产品就是优越。”

（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西德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損失很大，但工农业發展很快，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比資本主义国家优越和發展呢？人民生活是否高呢？我怀疑。”

（北京政法学院 王文庆）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論已經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了，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問題，老說資本主义經濟危机就要到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到，这不是証明我們的理論破产了嗎？”“西德和日本的工业虽然遭到了严重的破产，但恢复發展的很迅速，美国工业生产的絕對数量增加得也很多，所以資本主义还有潜力。”“經濟發展有四种方式：英美式的；印度式的；南斯拉夫式的和社会主义式的。”“凱恩斯認識到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原因是盲目生产和工人消費不足，从而提出了国家用計劃指导私人投資，增加工人工資的办法，这样可以解决英美經濟矛盾。”“資本主义竞争推动科学的發展，因为作家写不出东西来就会沒飯吃，工业品不便宜就卖不出去，这就逼着資本家改进生产，利用新技术，厉行節約。……社会主义不准私人投資，干部的錢都花光了，社会主义只有国家投資，表面上看起来比資本主义国家多，而資本主义国家允許私人投資，表面上看起来投資少，但实际上有个統計不出来的力量。”又說：“美国工人生活就是比中国人生活好。”

（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資本主义制度不好，但环节可能有好的，不能完全否認，資本主义生产力高，这是优点；資本家發財，工人也跟着沾光。”

（北京矿业学院 胡友万）

“壟断資本主义的經濟規律不一定使別国人民貧穷，而是援助落后国家，如美国幫助印度。”

（北京矿业学院 李国常）

我們总是宣傳資本主义如何如何坏，听不下去，如果全是这么坏，不早就垮台了嗎？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偉）

我在留德期間，房东老太婆的女婿是無錢电工人，老太婆曾帶我

到該工人家去玩，看到工人的生活很好。住的是小洋房，鋪的是地氈房間也很寬敞。我也看到過去失業工人的生活情況，在政府能拿失業津貼，其愛人幫別人做點事，生活也還好，沒有什麼困難，所以我覺得資本主義制度不錯。”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打敗後，要賠款，馬克大跌，資本家和地主就拿出自己的工廠和地租維持馬克，把德國的幣制穩定了，科學設法維持了，資本家又拿出錢來，搞圖書出版，發展科學，資本家也很愛國。”

（湖北醫學院 朱裕璧）

從林（指林希翎——編者）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她嚮往著一個盡善盡美的、完整無缺的社會，但現實生活會使她失望的。”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我不應該讓政治進入我的頭腦，我不該讓外界破壞我內心的平衡，我要政治、未來的政治。……”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李 德）

“不知道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

人們說資本主義不好，那麼它為什麼還存在呢？

資本主義是否可以讓工人生活得好一點，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水平很高，資本家剝削的錢很多，不能帶到棺材里去。我想，資本家放聰明點，少剝削點，工人的生活水平就高了一些，因此，你看資本主義國家罷工就少了。

資本主義的失業工人穿得不錯，用的東西也不壞呀。

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意賀安的說法，是不可以動搖的，可是誰也不能拊一塊來吃呀？人們必須勞動才能吃飯。

資本主義的工人想必比我們的教授生活得更好。

對許多現象不滿：例如，警察態度不好，東西太貴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王堯文）

“……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全是一样，炮弹在空中的穿行，鸽子在空中的飞翔，对于我全是一样快乐！战争，你是人类进步力量的推动者！战争，你会给人民带有自由！和平，你培养了独裁的政治，和平，你使人们趋于腐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在另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也不是在睡大觉，也是在变化。如美国对外援助问题上，过去我们总认为它援一元要回的是十元、廿元、卅元，是不怀好意的，我们坚决不要。据我看也不是永远如此。如600亿美元消耗在外援上，其中至少400亿元是不要偿还的。在原子能合作上也和三十多个国家订立了合作协定。在外交政策上对埃及问题美国让步就相当大。在美国内部搞人民的资本主义，我们知道得很少，有时是闭着眼睛批判。又如美国主动从西德撤退，并在本国裁军十多万人。”

“现在的福特汽车公司股票很多工人都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家俱、汽车都可以赊购，百十年偿还，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高，人民不会起来革命的”。在谈到言论出版等问题时总认为社会主义束缚太紧，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法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西欧是物质文明的，……世界主义和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世界的统一，只是领导权的不同。……美国国民收入多，军费开支比我国少……”

“中立国家变得相当厉害，如印度提出搞社会主义，我们不信，但他们却不是在开玩笑，他们仍在努力的搞，并取得一定成绩。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缅甸、埃及土改搞过了，印度也在搞土改。”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的材料）

“国家从上到下形成官僚机构，上樑不正下樑歪。

现在是黑暗的，光明即将到来。

今天的气压真高，逼得人真难受，

苏联經濟改組說明制度不好，如果制度好，又为什么要改組？

問題不在於三害，在於党政改变政治制度，健全政治制度。

目前世界正經歷着变动，中国是这样，苏联是这样，苏联这次反党事件是不奇怪的。”

（北京鋼鐵學院 宋亞賓）

“1.今天的社会下，才能不能充分發揮，还不如資本主义社会。

2.今天的社会使我变得圓滑了，將來只要不作祖國的叛徒就行了。

3.只有資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4.我国的軍費开支，占了百分之四十。”

（北京鋼鐵學院 孔庆福）

“在这里的环境不如到香港去擦皮鞋。”

（北京矿业學院 邓克义）

“我們獎勵先进工作者和創造發明者、模範，是和資本主义国家用金錢收买引誘一样。”

（中山大学 楊熙旭）

“說中学生回到生产中去口号，这是个美好的口号，但这个口号的实际內容呢？到农村連三頓飯也难保証。到工业中如能溫飽也不能养家庭，按当前这种發展趋势看来共产主义能实现只是空話。革命和工业建設与合作化并没有解决了中国的社会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蔣济良）

“社会主义制度妨碍自由竞争，限制个人才能的發揮。”“自由竞争好，有刺激性，可以推动前进。”

（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

“我經歷了四个朝代——日、伪、張作霖、蔣介石，就是現在这个

社会太黑暗。”“伪滿时期好。”“过去人家(指旧社会的統治者——編者)可以打、可以罵,也还痛快,可是現在(指新社会——編者)太客气了,客气的倒难受了。”“現在社会上的高血压和精神病者特别多,都是这个社会逼出来的,这不是某些党员这样做的,而是社会上某些运动造成的。”

(北京政法学院 汪天一)

“我理想的国家是这样:英法的民主、苏联的經濟、美德的科学技术、中国的艺术、古典哲学、倫理学和民族性格(难苦朴素)。”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現在的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許二百年后人民会否認現在的制度,历史会証明的,林希翎的論点应当研究,說不定是制度上的改革,几十年来苏中……等在哲学政治方面很少有所进展,很僵化,沒有人敢于提出政治上的改革,制度上的改革,翻开現在的政治經濟学和过去几十年以前的一样,沒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們也沒有材料。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懶人不动脑筋的人是愈来愈多,这还不如在資本主义那里有失业的威胁,人們还不敢于偷懶,我們这里却有鉄飯碗存在,由此懶人愈多而有保障。”

(北京鋼鉄学院 章葛舫)

“共产主义是幻想,一代一代的講下去,不知那年才能实现!不要把共产主义說的太好了,也許有比他更高級的社会。帝国主义也不見得太坏,他們也講將來有更好的社会。”

(北京矿业学院 李国常)

尹孝松有一次在看了反革命罪証展覽会以后对朱寿国同学說:“这里面的东西(指反革命的傳單、标語、口号、文告、綱領等——編者)是反映现实的,容易为人所接受的,而我們現在文艺是不反映現

实的。”他对人民日报也不相信。認為：“一些消息一經報紙加工之后，就不可靠了。”他說：“非要我亲眼看見我才相信。”可是当人民日报發表了葛佩琪、章伯鈞、儲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后，他却非常贊揚、相信。認為：“葛佩琪大胆、勇敢。”

（北京政法學院 尹孝松的材料）

3. 誣蔑新社会产生“新貴族”、“新階級”

“貴族化——官僚化”

（物質生活的貴族化是政治上官僚化的最深刻的根源）

“在我国人民庆祝消灭了階級和階級剝削的时候，人們不能不看到新的貴族又出現了，他們是享受高級待遇的全部，知識分子和將軍們。这些人是不是已經形成階級？我弄不清楚，但是他們在物質上确实已經貴族化了。汽車越来越多，工資越来越高，优待越来越多，高樓越来越高……这些人除去沒私人占有生产資料以外，和真正的貴族还有多少不同？

如果社会上仅有这些人，那就沒有貴族之說了。可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学生和普通工人，他們又怎么样呢？多少农民仍然是食無飽居無安，每人每天一斤帶皮的粮食，各位，咱們都是生在屋子里的白面書生，每天給你一斤粮，你的肚子滿意嗎？要知道农民还要到地里干活哪！这几年农民生活究竟提了多少！现实不容粉飾，土改后的最初几年农村确是呈現着家家有米，戶戶余粮，欣欣向榮的‘盛唐’景象，但这几年农民生活越来越緊張，打了粮食吃不飽，种了大豆沒有豆腐吃，种了花生沒有油吃，摘了苹果沒有苹果吃……美丽的远景不能代替现实問題的解决。

下面是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

部分貧苦农民	32
一般农民	100
一般工人	200—400

一般干部	200—400—600
中級干部	800—1000—1200
高級干部	1600—2000—2500—3000
中央部長以上干部	3000—3200

也許有人說，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得者是因为多劳，其实这并不是完全真实，請問：劳动怎样計算？复杂劳动怎样还原为簡單劳动？一个部長在办公室里坐上八个小时能等于一个农民十天至二十天，‘晨出肆微勤，日入負来还’的劳动嗎？如果不能这样說，那把分配上的級差悬殊仅仅用按劳分配来解釋是片面的。

現在社会上存在一定級差是合理的，但是級差造成部分人的貴族化是不合理的。貴族化必然官僚化。穷和富这对經濟上互相对立的概念必然在一切政治生活中起作用。一家人住一幢楼忘了住露天茅屋人的苦，坐在小汽車上忘了行路人的难是极自然的事，有閑人坐在电扇旁边还喊热的时候，怎么能理解‘农夫心里如湯煮’。

同甘共苦，應該是处理现实生活的准則，而不是挂在口头上的道德經。現在的情况是同甘苦共患难，同甘多而共苦少！

共产主义者要想改造现实，必須首先有勇气改变自己。”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吳 边）

“……現在的等級制度比封建等級为多，造成新的特权階級，党在蜕化，墮落了。”“历来的統治階級都有其共性，当它成为統治者时就出現了局限性，落后性，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党的一部分高級干部已成了官僚貴族，这亦可以說是个階層，有人說‘党徒’，‘貴族老爷’，这样說太絕對了，但有的干部的确不象話，高官奉祿，看不出他花了多大劳动，下边有許多秘書給他做了，上有中央，他只是說說話而已，作报告照念还念不对，不动腦子，但一切荣誉屬于他，获得的劳动报酬很高，住楼房廿多間，象过去的什么

‘府’一樣，出門坐小汽車等于坐轎子。

工資每月說是三百多元，但實際算起來有一千多元，可是一個農民每年才幾十元，和農民比是天上地下，工人沒房子，農民生活苦，而他呢？却享福，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憑資格憑黨員坐在那里，有本領的人上不去，所以仔細考慮一下，稱他們官僚貴族并沒錯。”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張殿鴻）

“共產黨高級幹部都腐化墮落，收入那麼多，出入都是小汽車，連他們的小孩都成了新貴族。”“現在的国家機構都是官僚機構。”“現在一切都按等級，你級別高，享受就好。”“現在調工作帶級別不合理，應按每個人的實際工作能力給待遇。”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朱惟民）

“目前正在形成着一種以共產黨黨籍的政治資料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階級分化。”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再談一般知識分子吧，圖書館工作人員王宗海，工作年限較長的同志，就是因為不是黨團，被宗派主義者認為是‘落后’的吧，評工資70元，養七口之家，七口人擠一間房，最近我同他碰巧閑談一會兒，原話照錄：

‘你（王宗海）今年多大了，三十……’

‘三十五啦……’，‘三十五??’

‘是看着比三十五老啊！生活啊，沒有營養……沒辦法啊！’

‘可是……’

‘我這個月吃了一個月的咸菜了，每天都吃……’

再往下，我就不忍听了，今天看見人大周報，有人揭發李新一次領生活‘補助’800元，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同事王宗海，這就使我更加痛恨李新這流人物，太不公平了，沒有同志的氣息，沒有人情味！

据我所知,李新还是过去教育青年人的人呢!我不知道,这些共产党员們在这里是消灭階級呢,还是制造階級!”

(中国人民大学圖書館 王翼华)

“近日自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論發表后,說我神經質的人們,不摸摸自己屁股,是否神經失常,正像肅反时湊5%反革命一样連忙到北大乱找,如同見猛獸闖入燕園,大声疾呼‘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神經高度衰弱的人們,一听‘階級’就魂不附体,并說:这是在扩大矛盾,轉化矛盾,啊!看官:豈有矛盾能因我之如此認為扩大,如果真如此,那我高呼帝国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矛盾,那么英美法資本和工人矛盾便日益扩大(严格的單調上升)則資本主义立刻就灭亡,用不着工人斗争了,用不着世界和平运动支持了!我認為:客觀事物并不因人們認識不同而變質,不然就是反馬克思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馬列主义’者……”

“言归正傳,写下主要論点,由列宁关于階級定义出發,試看現實:

1.生产資料占有,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因并不握在群众手中,一个工人并無权干預生产。

2.分配不合理,高者有不合劳动应得报酬者(不然为什么要工資改革),多得部分可称剝削。

3.社会地位(詳見報紙,从生活小事到政治权利,我們可只叫万岁,不可叫‘九千岁’,只能称——‘級’——能叫——‘品’从表面条文,口头說到实践,有差距 $d > 0$)。

4.对人民不信任,杀功臣,只要举一例,就大字报來說,为什么崔害記态度冷淡,这是相信群众,有辯別是非能力嗎?就杀鷄用牛刀式的用四人徹夜監視一公民?……这是信任乎……”

(北京大学 錢如平)

“……周大覺关于領導階級正在形成的論点,是可以考虑的,他

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导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1)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对生产关系来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3)劳动组织处于支配地位，它是控制人最积极手段。(4)领导者是一个有组织集团。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

(北京大学 谭天荣)

“从土地改革彻底胜利之后，接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后，旧的阶级关系粉碎了，因此从现有理论上看来，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卫道者们没有想想，1957年的今天理论上大大落后于实践，而你们却以此为满足，高而噪的干叫‘社会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这和佛教徒求菩萨活一千年的唯心愿望有何区别？……

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自然这与旧的不同，它有独特的特点，粗略想来有以下几点：

1.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现在的占有已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少，集体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这点现在一时不易看清楚，如果看一看分配关系就更鲜明。

2.分配，中央一级干部每月薪金500多元，……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为40—60元不等也相差30多倍，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即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他绝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回生产之中，中国许多中等资产阶级他的总资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因此，纵然形式上不是剥削关系，但实质上存在着

不平等交易……

3.我們要問如此悬殊難道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換嗎？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領導者自己对物質享受的感興趣，自己規定的。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等价交換，不可能相差800倍，因为試想象：你周圍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創造如此多財富？毛主席等他們劳动竟如此珍貴？若告知天下农民，贊成者我看寥寥。

4.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論工作、学习、游玩、吃飯……）均論等級，显易可見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斗争，施以肉刑。这和封建統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至多換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

5.官官相护。可見已开始自覺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利益。

6.变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过美其名曰‘通訊員’，实则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优势欺人屢見不鮮，此外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务監視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最凶殘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他們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实为依据，縱然槍杀者也有。可是現在根本没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威胁，一触犯上層貴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上几个月还以一淡淡的道歉。可見这种也可以和剝削階級的統治‘媲美’……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願拚死，不願再存，簡直是牛馬的生活！

7.历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总是为了爭取群众，与人民一起騙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脚踢开群众，借故屠杀功臣，爭夺地位名利。在我国現在，也是伸手找报纸或打听一下儒林内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許多政客投机分子，削尖头皮鑽入政党，荣华富貴有势有权，盛气凌人。

8.馬列主义只是掌权者的招牌而已，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理論指导着。正象辛亥革命流产时一样，現在这样的现实‘万岁’下去，我

認為革命流产了，假如不急劇地扭轉現在歪風的話……。

我國工农收入几年来实际上增加不多，仅过吃饱不餓死的程度。……

資本主义不合理，我反对，但我認為現在也不足美，要改变。真正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真正的人民領袖應該是和人民共甘苦，尊重人民的偉大人格；他們是历史的主人，挂羊头卖狗肉者必須下台。

新的階級矛盾和旧的不同，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和平的方法解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暴力——到無可救藥时。

要徹底改变現在作风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反对口是心非，反对对群众的欺騙、宣傳，反对唯心主义的傳播，反对特权階級的存在，制止屠杀、监禁無故的人民；反对新的变相的階級压迫，人們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現實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哀泣，好的發揮坏的坚决剷除，如果有一个集团坚决違反社会的發展違反人民願望的話，我想人民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历史創造者劳动人民知識分子万岁！一切違反历史發展者的怙惡不悛者应下台！”

（北京大学 錢如平）

“我們对如何改进現在政府領導及党、团地位有初步磋商：

1. 革命者应‘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乐而乐’，建議黨員、团员把一部份錢交給組織，作为社会費用，这样实际收入比同級的其他同志少一些。現在恰巧相反，因此沒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反而助長了对物質享受的無鑒要求。

2. 除个别特別优秀品質的同志外，領導人員應該長換，三、四年改选一次，改选出原来的群众中的典型、模範人物，这样保證不脫离群众，又有个別有經驗的人指导业务，就能把行政工作搞好。

‘人民內部矛盾’此語太抽象，應該說有一定的經濟基础，在分配、社会地位等問題已出現一定矛盾，現在还不甚尖銳，叫內部矛盾也未嘗不可。但必須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問題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發展，而且基本上滿足‘階級’关系的定

义。因此，为了正视现实，重视这一问题，指出新‘阶级’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不能轻描淡写地含糊地说一句‘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它，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解决，其他都是次要的。”

（北京大学 談 論（錢如平））

“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个阶层，处处享受特权。建筑工人盖了那么多楼房，可是他们自己只能住茅屋，享受特权的都是些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吃得很好，与一般人民相差太远。现在没有人敢大胆地来写反映这些现象的诗，因此我产生感慨和怀疑。我也知道党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是为了长远利益，但在感情上却接受不了。……‘谈论’的文章‘阶级社会里的等级制度’，我觉得很有道理，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当然我在本质上是和他不同的。”

（北京大学 左言东）

“在育才小学学习的都是党员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父亲是党员，母亲是党员，将来自己也必定是党员，这是造成一个新的贵族阶级。”

（中山大学 董每戡）

4. 誣蔑新社会有“等级制度”

“给‘等级迷’们写的墓志铭”

“献诗：只因饱食终日，又觉无外用心，

发下终身宏愿，创造等级新论。

在这里合眼看一些可尊敬的人物，他们不愧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灵魂——孔夫子优秀的后代。他们开始秉承孔夫子的事业不很早，然而却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想造一架长梯，据说能够有助通向社会主义，是否如此，且不管，但有一点确千真万确，他们要登着下一级，扒着上一级，爬呀，爬呀，爬得高高的，他们想中国大概有六亿人吧虽这个理想未能实现，但也颇有成绩，他们已出色的

完成了一些工作，創造了奇奇怪怪數不清的級別。他們有一條，齊天大聖的金箍棒一往無不利的武器，反對平均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 小 卒）

“國家對高級幹部的物質生活待遇沒有貫徹按勞取酬的原則，高干特殊化，貴族化了。”“滲透到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遠遠脫離目前人民生活水平，形成了等級制度。”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

“學校對幹部和青年學生不一視同仁，學生住平房，幹部住高樓。”“新聞系（帶薪學生）是地主，調干是富農（指經濟系）我們是貧農。”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楊文極）

“縮小高干與一般幹部薪金差額，堅決降低軍官薪金，他們是不創造社會財富的，戰時可以适当提高，和平時期，生活好了，養成怕死不敢上戰場。”

“由於等級造成的特殊權利，如高干食堂，托兒所，電影院等，如李新不是部長絕不能補助700元，這樣造成脫離群眾，思想腐化。”“有一種無形的勢力逼着人往上爬。”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謝德鈞）

他稱我國現存的級別制度為“等級制度”，並且說現在等級制度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由此產生了個人崇拜，阿諛奉迎，吹牛拍馬，竭力上爬，追求名利，爭工資……而且由此發展了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堅決反對把這些現象當做舊社會的殘余，而認為完全可以在我們社會中找到生存的根據，他還更惡毒地說：“現在的等級制度就是變相的世襲制。”他認為“現在的情況是只要有個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爸爸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章廣延的材料）

“等級制度有也沒有害處，旧名詞有新內容，我對目前真正平等有懷疑，政治上是平等了，但經濟上還有不平等，工農士兵出力干了，而生活很低，農民一年20—30元，而高級首長几百元，如何同志呢。”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東洪濤）

5. 誣蔑新社會里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搞成這樣？這和黨的政策有關。我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滿意，是‘六親不認’，我感覺到同志的關係不正常，不僅一般同志之間缺乏真實，就是黨員之間、黨員和他的愛人之間也是如此。黨團員和同志一套，到組織的會上又是一套，交朋友的準則應是對自己如何，對朋友也如何，政治應該不妨礙與人的接觸。”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達）

“人與人之間臉上都遮一塊布，每個人都有桌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現在生活真沒趣，能吐真心話的只有老婆，但老婆有時還不在一起，只要有老婆陪伴到那兒工作也一樣，反正到處冷冰冰。”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講師 顧 偉）

“中國是強大的，但他本身還有很多濃瘡沒有揭開。”“現在人與人之間無感情，就是制度保證了人們共同工作的原因……人們不敢談真心話，使人互相猜疑。講一句話都要考慮是否會當成材料。”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俞國亮）

“可惡的是為什麼江湖氣淹沒了同志間的友誼，拉拉扯扯成了某些小天地里的風氣；為什麼唯唯諾諾討人歡喜，而‘不求上進’竟是‘踏踏實實’的同義語；為什麼市儈成了寵兒，正直的人都遭到了冷遇；為什麼在有些領導人的目光中閃光的东西就是金子；把高談闊論和‘五十度微溫’都當成是吸收黨員的標準；為什麼今天社會里會有

人出于妬忌把他人的成績来仇視，而在最高学府里不学無术的人当上了講師和教授。”

“解放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虛伪，得不到同志的溫暖和友誼。”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現在人們生活很干燥，人情冷冰冰，談笑的机会很少，活着干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对现实生活不滿，她說：“社会、政治生活不够民主，領導要求的人是唯唯諾諾，按領導意圖行事的。生活中不能有不同的見解，群众对領導不能有不同的意見。”她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描繪成“冷若冰霜”，她認為沒有人陪她去看电影，看戏，看展覽就是“缺乏友誼，沒有共同語言，生活窒息，意志消沉，已成了社会风气，人們不关心周圍事物，失去了生活斗志”。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鄧淑荣的材料)

章起对我党及同志看法常常以孟浩然諷刺唐明皇的詩句“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来描繪他心里状态；罵党是昏君和自己的怀才不遇，新社会人情冷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講師 章 起的材料)

“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国民党統治的时候惡毒陰險，我是敢罵的，当面或背后敢大罵，除非特务在时当面不敢罵。今天連批評都不敢，还敢罵？今天讓講而不敢講，是正常还是反常呢？旧社会还有几个知心朋友，無所不談，今天則不然，什么也不敢講，甚至对爱人都不敢講，互相防备，警惕，是否有問題，沒有！不是个人有問題，而是社会风气如此。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現这种关系？奇怪？什么东西呢？大家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齐俊成)

“現在人與人之間不信任，是共產黨造成的，青年人比解放前消沉，共產黨故意造成互相攻擊。”

（中南礦冶學院 黃紀忠）

“以往從表面上看似乎很平靜，其實下面思想暗流很大。在舊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是虛偽的，可是肅反以後，大家見面也都是馬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其實沒有把內心的話說出來。我和我兒子之間有時都不說真心話，怕挨批評，這是很危險的。人們現在才說出真心話，例如交大遷校的問題，聽說以前人人都說願意搬，服從整體利益，可是今年開會準備如何搬時，三天以內完全翻案了。幸好現在整風，‘吹皺了一池春水’，不然長遠如此還得了！”

（清華大學教授 孟昭英）

“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友誼和同志感情，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

（東北林學院 曹恩邦）

6. 誣蔑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

“個人崇拜產生與存在的根本條件到底是什麼？是否真如‘再論’中所說的：‘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我認為，這當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然而卻也不能無視個人崇拜產生的社會基礎。當然不可能涉及到蘇聯的根本制度，但一定與這個社會制度的某些方面有關。‘再論’這句話如能成立，是否有點唯心主義？”

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決定的力量，不是任何一個英雄所能具有的。只有‘時勢造英雄’而沒有‘英雄造時勢’，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最反對個人崇拜的，然而，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在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国家——蘇聯，個人崇拜會達登峰造極的地步，而統治了蘇聯二十餘年之久？我覺得，這是一個

值得深思的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魯 基)

“个人崇拜,不仅限于对領袖,且扩大到对党的崇拜,在国际上則表现为对苏联崇拜,和对列宁、斯大林的崇拜。”“党员說了群众就不敢反对,領袖說了人民就不敢反对了。”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

“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生产力的發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达孝)

“坚决地展开反对盲从,个人崇拜的斗争,应当作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彻底批判那帮認為中国沒有个人崇拜現象或个人崇拜不严重的論調。”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鍾溶华)

“斯大林悲剧是社会悲剧”

“斯大林悲剧当然是社会悲剧,若用列宁在同样条件下沒犯錯誤作其中解釋之一,我是不能接受,过多地去探討斯大林个人的品質如何,是沒有多大好处的。得認為列斯的客观条件表面相似,實質決然不同,列宁是处在艰苦斗争时期,革命任务和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他处在社会矛盾的积极一面,他最代表人民利益,必然是在時間前面的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时代繼續前进,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限制,社会物質資料分配原則只能是‘各尽所能’,社会物質生活不均衡,必产生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如前所述,領導人物是处在消极一面,客观环境,竟使他不能最代表人民要求,他就不能不犯錯誤,某种环境中讓一个人繼續作領導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达三十年之久这件事本身就不能不鑄成錯誤。”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陈炳勤)

“个人崇拜是不可避免的”

“铁托先生和卡德尔先生在苏联发生了对斯大林后，……說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苏联的社会制度，在他們看来似乎象南斯拉夫的这样的国家制度，將不会产生个人崇拜。我認为……只說对了一半。前者对，但不完全，后者不对，在我看来，在現世界的任何一角落里都存在着个人崇拜，不仅現在存在，过去存在，將來也一定存在。不仅在政治界甚至在科学界，艺术界都存在个人崇拜。只要有任何集团存在，有任何階級存在，有任何有形無形的与人的集团有关的矛盾存在，則个人崇拜無法避免。

要消除个人崇拜……在同一政权，在同一集团內，是不可能做到徹底的。如果換另一个政权，形式則对前期被崇拜者的个人崇拜消除，那是有过之而無不及，前者如赫魯曉夫对待斯大林，后者如毛澤东对待蔣介石。

被崇拜者的受批評和指責，只有在被崇拜者死后，或脫离他的勢力范围后才能自由地办到。前者如赫魯曉夫对待斯大林，后者如綠林好汉对待当局。

在同一政权形式下建立个人崇拜的方法有二。一是捧前期的被崇拜者，認自己是前者的忠实战友和学生。如斯大林对待列宁，另一是稍微或較重地打击前期被崇拜者。如赫魯曉夫对待斯大林这种做法既不可能徹底，所以这样做也是由于前期被崇拜者的威望过高的緣故。

要徹底消灭个人崇拜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世界上消灭一切集团，实行無政府主义。”

（同济大学 鍾亮明）

7. 誣蔑历次运动，否定各次运动的成績

“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簡直沒有完了，今天斗这些人，明天斗那些人，难道就不能用別的方式搞嗎？……对反革命的鎮压……覺得

过火了。另外，我对党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击……觉得三反斗错了好多人，解决问题不大，不要这样反。在镇反、肃反后……自己也有这情绪，值得这样斗……吗？……为什么贴海报，开大会象打落水狗似的。……”

“过去对敌斗争，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如把对敌斗争用在人民内部矛盾是荒谬的，必须彻底的改革。我在笔记上曾这样写过，题目是：‘从六亿人民的立场看解放’，这里边说，党作对的是：赶走蒋介石、土改、抗美援朝、五反、民主改革、统购统销、剿匪、思想改造、整风审干、合作化、经济建设。好的结果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国家安定了，生产改善了。但也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六亿人民的事：1.政治斗争搞错，过火、在运动中破坏法制，不民主。2.思想改造粗暴、教条主义。3.经济建设主观、浪费。4.党员特殊化，党战斗力减弱，党群关系疏远。5.社会道德败坏——政治投机风盛。我认为这些现象很严重，这是因为没有理解大转变。过去好的东西，现在变成荒谬的东西了，如阶级斗争，过去敌人很残酷，不这样不行。现在敌人少了，用阶级斗争公式就荒谬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一种恐怖气氛下进行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把资产拿出来，农业合作化是在强迫下完成的，农民并不愿意。但群众都怕共产党搞运动，怕镇反、肃反落到自己头上。知识分子也不一定倾向社会主义。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如解放台湾的宣言，民主党派也在上头签了字，实际上是共产党专政。”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周绍杰）

“历次运动中停职反省的方式等于拘留，我觉得这是违法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达）

“由于运动中干部水平差、体会政策差、少数干部品质不好，发生

一些偏差。至于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敢說就沒有問題。在这些运动中不少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是宁左勿右，因为左就表現积极，表現立場穩；而右就是落后、反动。在这种錯誤看法下，就有不少的人蒙受冤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李金銘)

“对几次运动的估价認為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至少是不确切的。”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賈 卓)

“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取得农民信任的手段，不是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馬 馨)

- “1. 土改是人杀人的斗争；
2. 人与人之间只有斗争，沒有和平；
3. 共产党和八路軍是最凶狠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

“党的土改方針錯了，为什么不采用孙中山的土改方針，土改不消灭地主肉体的政策有些怀疑，我們土改为什么要打地主，这不是过火了嗎？党有很大的罪惡。”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方炎火)

“土改时穷人看見有錢的人就斗，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的！所以在土改时弄死了不少的人。”“有的地主是劳动起家也斗争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暢)

“土改斗争是貧农地痞流氓斗勤儉起家的地主，土改干部是太上皇。”

(北京矿业学院 宁世友)

“东北的地主一般是斗錯了，对地主斗争是人身侵犯。土改对农民是一种掠夺。地主阶级对现在有功，因为他培养出子弟，有的参加了革命，现在有的上大学。不單是农民受压迫，而且地主也受压迫。”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土改是用机枪扫射地主，不该杀的也杀了。”

（北京政法学院 張敬臣）

关于抗美援朝，李德說：

“中国不应该过早出兵：

美国那边有十多个国家，真理在美国那边；

美国有原子彈，不可战胜；

为什么苏联不出兵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的材料）

“抗美援朝是干涉别国内政。”

（北京矿业学院 宁世友）

“三反，镇反等运动后的总结說成績是基本的，偏差是难免的，总这样来掩盖缺点和錯誤。”“中央不要沉醉于成績是基本的，錯誤，缺点是不可避免的結論。”“镇反的名詞本身就不适用于机关内部。”“镇反者，审查历史者，就是对知识分子，因只有知识分子历史复杂。”（意思是說镇反就是工农整知识分子——編者）“镇反中被审查者是知识分子，工农干部没有什么可查的，镇反斗争者就是知识分子。”

“解放后的多次运动，沒有全面地总结一下經驗教訓，有也是个别别人关門作的，运动是群众性的，应由群众广泛总结……精神上砍了一切永远不能忘。”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經濟系学生 孙 全）

“共产党是‘新三段論’：‘成績、缺点、难免’（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有的，是难免的）。”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王章鴻）

“成績是基本的，錯誤是次要的是公式，是教条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王树才）

“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那必然影响經常工作，运动不能沒有也不可太多，多了就使人人有一种等待运动解决問題的思想。我对在运动中算总賬非常反感，現在在政治上养成了算总賬的习惯，所以有‘过关’的說法。”

（山东师院 田仲济）

“各次运动所以犯錯誤是因为方法是唯心的。說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犯錯誤的根源。宁左勿右是犯錯誤的原因。”

（北京矿业学院 黄明道）

8. 关于党性、人性、个性和階級性的謬論

“当前社会制度束縛了青年个性的全面發展。关于这个問題我进行了思考。社会始終会走向以每个人的自由發展为条件的社会。这个社会已初步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社会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进了一步，但还存在有一些現象，阻碍青年的个性全面發展。应將这些現象揭露出来加以克服。也許这是过渡时期的現象，但我們是人，应当認識这种現象，使这个現象得到克服。我使用当前社会制度是指当前还有阻碍青年个性發展的現象。

对于个性，我給不出完整的定义。它应当是德、智、体、美的全面發展，不是平均發展和畸形發展。

这些現象存在着，但也并不妨碍有些人的个性全面發展。

1. 新的等級制度的發展，我使用等級制度，是因为我找不到适当

的概念說明機構臃腫，層次重迭的現象。這種等級制度象金字塔形的階梯制度，對個性的發展是有阻礙的。一方面階梯過多，產生對兒童不好的印象，使兒童心理上染上不好的東西，使兒童互相比較。我不是要求一概平均，而是反對過多的懸殊。這不能從舊社會的影響來說明，因為這是現在實際情況的反映。另一方面，會造成對新生力量的壓制，表現在客觀上，處於上層的就可能壓制新生力量。有些青年的正當要求，要經過層層手續，如有個學生要求到亞洲學生療養院療養，他寫信給一民主人士，這民主人士轉到有關方面，而回信卻把這民主人士當成要療養者。有些有造就的人才，他們的要求，被來回的推拖，這就造成對新生力量的壓制，使青年很多要求，不能及時解決，時間被拖了，很久沒得到解決。李希凡、藍翎未進入文藝界時，工作分配上我看是有問題。有些電影演員，需要舞台實踐，長期未得到解決，這種現象即是個別現象，也是一種現象。在主觀上，主要是有些人受到新生力量批評以後，會進行打擊和報復，這是可能的。即是提出新見解的人，會受到打擊，而打擊的人，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更加重了他的舊意識。過去文藝報就是，他在編者按語稍加上兩句，對新生力量都是打擊。當然我們相信，社會上總有一天會發現新生力量，但這種現象的確不能令人容忍，所以等級制度容易加強人的特權思想。從最近揭發的例子看，在學術上的問題，用行政手法壓制，不聽取新生力量的意見，再利用這種地位，就可能採取打擊報復。等級懸殊過大的，確給人帶來不良的影響，有滋生特權思想的可能。為什麼新的等級制度得以發展呢？我們的社會是工農社會，而形成很多階梯是否就那麼必要。我看不見得。把級別縮小些，使之和群眾接近是必要的。機構多臃腫，是對生產不利的，對青年人個性發展也是不利的，給人造成人生就要作什麼‘長’。應使青年朝着正常的方向發展。產生的原因，是客觀上需要國家、行政管理機構，但需要不等於無限，有些是人為的擴大，這樣等級制度就會發展，所以要盡量縮減過多的人員，投入生產，等級制度的存在，對人是有影響的，我們應提倡反對特權，當然要劃清必要的權利。對基層組織的權利應該擴大，領導人應該選舉，定

期公布被选人的工作情况，向群众进行报告。任命制度可以考虑。我不赞成任命制度。

2. 統一分配制度，也阻碍人們个性全面發展。統一分配如果征得本人的同意是可以的，否則是不好，因为这对被分配的个人不好，使他的素才，如音乐才能不能得到發展，受到压抑。有要求学新聞的被分配学工去了，要求学这的被分配学那，这种情况都不好，有些大学毕业生改行的是比較多，改行是不好的。对社会也不好，因为个人积极性未得到發揮，整个建設力量就受到影响。这里可能提出兩個問題，如不統一分配，有的單位人不够怎么办，我認為可广泛宣傳、解釋、端正認識，假如宣傳都不行，可使暂时缺着。另外某些人条件不够，如他学某一科，条件不够，應該自己負責。統一分配制度的存在，是阻碍个性發展的。”

“当今的社会制度束縛了人的个性的全面發展。理由如此，新的等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統一分配制度的存在。

人事制度的不合理，党委組織部掌握人事大权之片面性。

个人毫無足够的物質条件(生活来源、圖書資料、教师)。

工作時間过長；思想压力的风气的流行。

報紙杂志一家独鳴，消息之被封鎖資料之缺乏。

团队教育对青少年身心之危害。

党内無条件执行紀律的不合理。

学校理論課之強制性。”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刘表兴)

誣蔑新社会人与人之間的關係为“無非是虛伪欺詐”这是由他的人性論得的結論。他还說：“人都是愚昧、自私、狹隘、庸俗、淺薄、卑鄙的……”由此他进一步的論証到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惡”較之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更确切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吳汝文的材料)

“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曾经写道：‘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过去孟子、告子、荀子等为了‘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争论个不清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们这种社会本质（本性）的阶级差异。

我觉得这样理解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过份浅薄一些，如果一种理论只有相对于某一特殊的阶级立场或者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看才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叫做宗教，不应该叫做真理。人们可以信仰，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指导革命实践。据我所知，关于人性善恶对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写道：

黑格尔指出：有些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就以为他们说出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人性恶的这句话意思要深刻得多！黑格尔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方面，由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神聖事物的凌辱，是对旧的衰頹的但是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之××（字迹不清——编者），另一方面，自从社会阶级对立发生以来人的丑恶的情态——贪欲和权势欲明明作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我想刘少奇同志之所以对中国的古代哲学采取培根式的傲慢，以致对像荀卿那样深透的理论都抱着轻蔑态度，并且完全没有好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因为过去紧张的白区工作限制了学习条件，不管怎么样，黑格尔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有说服力得多，就以这次整风——民主运动及其反面的表现——‘反右派’运动来说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这一历史的‘新的前进步骤’相适应，我们对于教条主义进行‘凌辱’对‘旧的衰頹的’但是为习惯所崇奉的‘三害分子’统治的‘秩序’进行了‘叛乱’因此我们是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如果从另一个意义来理解，那么人的丑恶情欲——贪欲与权势欲分明作了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某些‘积极分子’去表现他们的麻木不仁神经过敏或利欲动心穷凶极恶以帮助人们认识三害的危害，并且最终地推动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相反的，如果認為人們的行動可以簡單地去歸結為他們階級出身所規定的本性，像這樣的腦袋想的那樣，那麼怎麼能說明在這次運動中無論是‘右派’或‘反右派’的積極分子中都有出身各式各樣家庭的人呢？

可見，‘反右派’鬥爭的理論武裝不僅是教條主義而且是修正主義的。”
(北京大學 譚天榮)

“人道主義是最高準則，共產主義不過是實現人道主義的一個階梯，人首先是有其共性——人性，而後才有階級性，我們現在是過份強調階級性而忽視人性。人道主義原則也適用於敵人，例如我們反對給敵人施加酷刑，斯大林、拉科西違反了人道主義，所以不能說他們是正直善良的人。”

(北京大學 楊 路)

“我曾經漫步於人道公德所肯定下來的道路上，在那裡，我不知道什麼是恭維，什麼是諂媚。但，非常不幸，那姍姍的蒲公英，沾滿了我的衣裳，而打擊的刺棘藜，也划破了我的皮膚、我惱怒過，痛哭過，但前進的步伐並未稍停止過。

爽直，不是妄運；豪放，不是丑角；警惕，不是狐疑；冷靜，不是麻木；沉默，不是僵死；……

是牛，就得蒙上雙眼，在磨坊裡拖着沉重的磨子，往復地旋轉着；牛之所以如此，因為它是動物，不會思想，不知反抗。

可是人呢？那怕是奴隸，是墮民，是勞役，也會懷疑到為什麼而忙碌。歷史上的奴隸起義，黎民造反，又有什麼稀奇呢？

不敢懷疑，不敢思想，不敢反問的人，稱之為奴隸，算是抬舉了他。”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邱清輝)

9. 关于“不滿现实”的謬論

“不滿现实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是先进阶级的不滿现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党应该鼓励。”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对现实不滿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同意林希翎的提法。反三害就是对现实不滿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不滿是阶级斗争的前奏,社会中永远存在不滿的,在进步的人来说不滿是应该的,人們就不应安于现状,所以不滿是需要的……青年人对不滿应特别强烈,应天不怕、地不怕,……社会现在进步慢,主要是思想僵化,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主要是对不滿的压制。”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洪維政)

10. 攻击党的有关政策

“经济方面,买白薯一角錢三四斤,买白薯秧喂牛七分錢一斤,在資本論里找不到。买紅果醬西單六角,地安門五角八分,太平桥九角。貿易部干什么的,官僚主义!

回国去的日侨对中国紅十字会說,中国人讓我們回国时,把錢都买了东西,但回国时到海关,讓上稅,沒錢就动員卖给百貨公司,百貨公司收买价格150元,而却以600元訂价出售。类似这些事情,如果是把錢作了国防事情是可以的,官僚們花了就不对”。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講師 王德周)

侨务政策应该面面俱到,千万不要在华侨中分阶级划分右、左、中。

例如在馬來亞，敵人只有一個英國，要做包公；這次華僑資本案錯了，就責備資本案，下次華僑勞工錯了，就責備勞工。

僑匯匯率太低，影响僑胞寄錢回國。這些政策現在雖然已經糾正了，但是已經造成很大損失。

僑務委員會副主任李天民（已故）回國之後，只顧做官，不敢說話；主任何香凝年紀太大了，不能做事。”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我國的對外貿易有問題，廉價出口糧食，高價進口機器，因此造成人民沒飯吃。”

（北京礦業學院 胡友萬）

“我國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是不能以盡是共產黨人從事外交的，宋慶齡訪問西南亞是一個好的開端但沒有繼續下去。”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徐盛桐）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可以對蘇聯更平等一些，以蘇聯為首，我們是老二。有些地方如：馬列主義中國化，這是中國獨創，應當為老大。”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 殷九如）

“由於太信蘇聯，我國外交政策上有錯誤。自斯大林錯誤的揭發，李森科錯誤學說的出現，以及對南斯拉夫態度的轉變，故認為我國外交政策上有錯誤，那就是太相信蘇聯了，同時思想上產生了我國是否是獨立的國家、外交上是否受蘇聯支配的想法。”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陳丘民）

“我們對美國的政策宣傳得過激了些，據說打過長江時，美國要與我們建交，而我們喪失了這機會，這是錯誤的。”

“美國好的要宣傳，要宣傳它的科學成就，要想盡辦法與美國建

立邦交，(在不損害我國主權情況下)要盡量爭取參加聯合國。對美國問題，狹隘的民族自尊心也是痛心的。”

“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必要有意的對立，盡量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岳文伯)

“……聽說南京解放時，美國大使遲遲不走，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拉中國一把，後來因為我們的政策太消極，所以沒成。中央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1949年我們不該放過了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機會，這對人家採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並不去慎重的考慮，既然美國當時想利用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利用它們呢？……要不然我們早就加入聯合國了，我覺得埃及做的很聰明，他們加入聯合國前不敢承認中國加入聯大后就承認了我們，所以這是個策略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伍伯涵)

他攻擊黨的对日外交政策說：“釋放日本戰犯沒有想到群眾痛恨，以民族鮮血換取國際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畢毓琦的材料)

“我國對埃及開始大喊大叫結果只給點經濟援助，失信用，對尼泊爾不應援助，無戰略價值，對柬埔寨援助得不償失。”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凌國星)

“外交工作：對蘇聯不要看臉色行事，要和蘇聯完全平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這種提法不要，改為‘以蘇聯為先驅……’。越南提出‘以蘇聯、中國為首的……’我們不贊成，也不反對，其實應當反對，不要這種不平等。”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我不贊成外交政策一边倒。一边倒不是只有一个朋友，其他都是敌人嗎？我們只是依靠苏联很危險；它要我們打仗就得打。五〇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約發表后，覺得更危險了。中国打仗打了好多年了，現在要建設，实在不能打了。我老了，要安宁，要安安穩穩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我們学校近几年来派了一批黨員干部，去越南幫助他們建設并美其名曰国际主义，事实怎样呢，被派出这些黨員有很多（范公荣、克宁夫）是不学無术，文化水平很低，理論水平不高，业务和知識淺薄，教学經驗缺乏，在校时，工作吊兒郎当。試問这些人怎样能幫助兄弟国家建設，但他們从越南回来以后，却發了一笔大財，很多人却帶回高級的照相机、收音机、手表、西裝、巴黎香水……真是应有尽有，我們不明白，这是国际主义还是發財主义，請宗派主义者公开解答。”

（中国人民大学 群 鳴）（大字报）

（三）关于党的領導

1. 誣蔑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不近人情，怎能治人？怎能用不是人的东西来做事呢？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人，能說是人嗎？”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八年同共产党接触中，深深体会共产党善变。共产党只顧私利，不守信用。”“党組織对人有用时，把杀过群众，杀过党内同志的人都当作寶貝，不用时，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群众对共产党的話不敢信任。”“如果群众不信任我們，群众总会起来反对我們的，这是符合社会發展規律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一个朝代建立几百年总是有原因的，清代少数民族就統治了中国300年，共产党仅統治了八年，出了許多漏洞，現在人民怨声載道。解放时群众对党亲热，現在有輕視，今天共产党已到很危險的时候了，不能馬馬虎虎。到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员官僚、宗派，無惡不作，再下去十天，看看各学校揭發出来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有党团存在，就有小集团的产生，有集团就有宗派，想消灭宗派，那就要消灭党和小集团。”“世界上党都是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研室講師 范政濤）

“党的威信已大大降低，絕大多數的超龄团员都不願入党了。党员水平低极了，‘为政不仁，为富不仁’好人不搞政治的，有权力就有理，有了权力，金錢女人都解决了，‘誰有刀子誰就掌握了馬列主义’，‘党员形成一个新階級，專門整人’。”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李万昌）

“过去我也不敢講話，因为我放大炮吃过亏。几年来領導实际上已把我思想上判了死刑。現在我要講，只要头不掉下来。就怕弄得不死不活。”

“有时有些人受了冤屈，还說別人鑽牛角尖，这真是殘忍。”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黃乃畊）

他認為党一团糟，党员都是唯唯諾諾，并說他不願意入党他說他愛人小鮑也不願意入党，因为党员都乱搞男女关系，党员不工作也照样升級。

“葛（佩琦）接不上党的关系，鬧情緒。在他的發言中只有一句真心話，即党組織对人，有用时，把杀过群众、杀过同志的人当成寶貝；

不用时，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門外。”

“把800万旧人員包下来的說法不正确，这800万旧人員并不是吃白飯么，就算包下来，也是六亿人民包下来而不是党包下来的，并不是一个黨員养活几个旧人員。”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王鉄生的材料）

“黨員都是唯唯諾諾为党性而党性”当报上登出“黨員靠党吃飯”的右派言論时孙看到后說“这話可絕了”。

污蔑我們党組織不民主，不自由，說“这样的党入它干嗎？”“我早就不考虑入党了……不入党倒自由。”对高饒事件認為高崗是搬石头砸自己脚。認為苏共中央最近公布的馬林科夫反党集团問題是“党内爭权夺利的表現”。孙还把党誣蔑成为貪圖私利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宗派集团，把党說成一团漆黑，“党就是由尙黑二字組成”。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助教 孙邦基的材料）

“百分之五十的黨員都是坏黨員，解放后入党的都是拍馬投机的，絕大多数都是腐化墮落的，黨員有特权，吃苦在后，享乐在先，沒有例外，为什么現在大家都想往党内鑽？为享乐。

共产党什么都要掌握。

共产党只代表工人利益，不代表农民利益。工人富，农民穷。共产党不敢到工人、农民中去整风，否則工人要罢工，农民要土地。

党的病已入膏肓，現在又不准揭發，这样下去一定要完蛋。

学习苏联是教条主义，其实中国共产党也是教条主义，只不过我們不知道詳情罢了。

人民日报报喜不报憂，登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論是小題大作，人民日报‘收’是因党估計不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意見，受不了只有‘收’。

黨員可分三种：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沒嘴的，再一种就是投机分子，党团员压死人，有人入党后就脱离群众，以特种人自居。

为了今后不再有人被党逼死，自杀也是情願的。

黨員有特權；群眾有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黨員有錯誤，則輕描淡寫處理一下，如自己姐夫亂搞男女關係，因是黨員沒有受批評，二哥是群眾，亂搞男女關係則坐牢，四哥犯錯誤還可做市委、市長。安子文一人就占十幾間房子，正由於共產黨員在社會上有特權，因此很多人入黨動機就不純，許多黨員拍馬唯命是從。真正共產主義者很少，其實群眾不一定比黨員落後。”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助教 段鉄珊）

“系里宗派主義第一，其次是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僅表現在黨群關係間，而且有裙帶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助教 馬 馨）

“入黨要是沒有好處，就沒有這麼些人往里鑽了。”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助教 李樹屏）

“我有一個念頭想參加共產黨，但是我缺乏信心，我不相信我能够在共產黨內會得到更好的教育，會使我保持這種自卑的習慣，我擔心會因為加入共產黨而目中無人，而成為壓迫者，成為‘教育者’，那我的罪過和我的‘責任’就重大了。”

“共產黨何至在短短的五五年內墮落成這個樣子呢？這不能不令人回憶以往同人民共甘苦的目的和動機不過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而已，一旦握牢了政權便一意孤行，今天來個一百九十九項建設，明天來個五億農民合作化。加上官僚機構的層層強迫命令，使得丰收的農民白白餓死，城市缺衣少食，娶妻生子沒有房子住，難道這都是正確的？”

（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黨和人民的利益可以說99%是一致的，1%是不一致的，‘反黨’與‘反人民’兩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不完全一致。所以

我認為不能說反黨就等于反人民。”

“我不主張無條件的相信黨，而主張有條件地相信黨。這種思想是最近才有的。原因：一是斯大林事件，二是整風中揭露的缺點，三是我在肅反中的遭遇給了我強烈的印象。當時，黨向大家宣布我有政治問題，大家就說我有政治問題，但結果證明我沒有。所以黨現在宣布什麼，我都要想想。

我認為對黨本身也可以用‘兩點論’來看。黨內無正面反面就沒有矛盾，就不能發展，黨是矛盾的統一體。三害存在於黨內，是黨的肌體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是一面，主觀主義是又一面，我擁護前一面，反對後一面。

不能把黨看為真理的化身。我不同意一個人當自己的意見和黨不同時，就肯定自己的意見不對。”

（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員 許惠爾）

“共產黨糟得很，簡直爬到人民頭上來了，組織一個真正的黨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給我最突出的感覺是：黨員可以和任何一個美好的稱號划等號，在教育界就是教授，在出版界就是編輯，在工程技術界就是工程師。黨員資格就是一座萬能橋可以通向一切樂境。入黨是名利雙收，有地位、有權利、可以作威作福，婚姻問題、戀愛問題都好解決，投機者見有利可圖，於是魚貫而入。”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助理編輯 李金銘）

“共產黨成功後，腐化也是難免的，中國在歷史上空前統一好的，但也有不好的地方，一個決定通行全國，萬一出了一錯那就糟了。”

“如果黨真正是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話，有些人就不會要求入黨了。”（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圖書館館員 金大鏞）

“共产党常说，我們絕不限制个性發展，它自己这样說說而已实际上說一套作一套，理論上唯物，实际上唯心。”“几年来我得出这样一个結論，一个人行不行其决定关键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組織的主观决定，党說誰行三日登天，判誰‘缺德’一辈子別想翻身。”

（中国人民大学圖書館館員 徐鐘秀）

“共产党同国民党还不是一样，天下烏鴉一般黑。”“过去国民党不好还可以罵，現在共产党作錯了还得說对。”“想到党就具体想到人大，想到我們学校，与国民党也差不多。”“党是后母，外面很好，对内虐待。”“党内烏七、八糟。”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数学教員 朱章瑤）

“过去一些思想改造运动，是党领导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而整风又是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整自己的黨員。”現在“沒有整了党，先把自己整了一頓”。他把党看成是“一个不容異己，排除異己的宗派集团”。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的材料）

“我認为革命胜利后，党已开始变质，大多数黨員脱离群众，对待人民群众与民主人士的态度与以往不同，党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始离开馬列主义，我認为一个执政的党在执政后，变质蜕化是不可避免或很难避免的。这是个規律。”

“革命胜利后，大部分黨員越来越驕傲自滿，片面性的宣傳，把党的威信絕對化了，如宣傳人民的幸福都是共产党帶來的，我就不同意这种帶有片面性的宣傳，我認为是党领导着人民取得了幸福。絕對化了，就使人对党有这样的看法，相信他在任何环节上都没有錯。另外，很多黨員思想在蜕化，許多黨員本来就驕傲自滿，即利用这絕對化了的威信来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独断專横打掩护，在很多場合下，领导提出的事群众不同意也举手。党在解放后，大多数党

員都不符合八項標準，政治上慢慢蛻化的黨員，他們利用黨的威信壓制民主打擊別人，追求個人名利，黨的組織越往下層民主越少，集中越多，在這些地方越來越滋長官僚主義，一個干部的命運前途被一個領導者一手就決定了。”

“黨在極大程度上和法西斯組織性質相近。”

（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語文教員 白 楓）

“國民黨特務有外圍組織，你認為我們這裡沒有嗎？各部門都有。”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戴逸樵）

“黨員謹言慎行，有很多黨員不敢懷疑，對學術問題也不敢懷疑和離開決議，這是受黨組織觀念約束着了，組織觀念不應否認、行動上可以這樣，看問題不應這樣。”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張康毅）

“中央有教條主義，有些政策貫徹不下去，口稱艱苦朴素，但有些高級幹部不執行因此應該形成一種風氣，與這種不良傾向作鬥爭，但事實不是這樣而是理論與實踐脫節。對高干生活腐化不嚴肅處理，要求不嚴格，對下面則嚴，也是理論與實際不符。”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 啓）

“王子與公主（其中一部分）

記金髮公主舞”

“王子與公主，

荒唐到何種程度！

你們太享福！

說的象似甜言蜜語，

看平民百姓，

平民聞到酸！苦！

那能穿綾歌舞？

× × ×

× × ×

你們的父母，

看你們的調情，

就是國家之主。

剥夺了别人的辛苦劳动，

供儿女享福。”

“② 党委老爷”

“给我们时间，党委老爷！

党委老爷！

你只会说：独立钻研，

别拿同学的命向书钻研，

独立钻研。我没有时间。

应该给我们时间，

× × ×

那我们才能独立钻研。

我们没有假日，

× × ×

也没有过年。

党委老爷！

就是叫我们昼夜读书，

给我们时间！

我们也不能把书读完。

给我们时间！”

× × ×

“③ 喂 狗”

“一条拦路狗，

这比拿石头，

挡道不叫走。

省得又下手。

拿出牛羊肉，

× × ×

把它喂了狗。

狗会摇摇尾，

× × ×

把人欢送走。

狗吃牛羊肉，

人欢狗也乐，

让路叫人走。

省得多费手。

1957年2月24日晨”

原编者注：此诗是属总支书记张庆儒同志的。当时他害怕批评想赶快离校，但张书记没同意。

“④ 回答歌”

“你会断章取义，

这是恶意。

你用夸大口气，

拦路狗，

这都说明一条真理：

总想吃人生气

那些卑鄙无耻的；

× × ×

× × ×

你说得我罪过再大，

这不是批评，

也只不过开除党籍。

这对你这个書記，

有什么光气？

× × ×

我是个正直的黨員，

不怕任何非难。

一条擋道狗，

我不怕你捣蛋。

× × ×

狗总是狗

擋不住人向前走。

你如真攔擋人的去路，

人会下手！

1957年2月23日夜”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王殿彪）

“認為党隱瞞了坏的，光宣傳这个好，那个好，但后来又不断出現坏的。党不願人家提缺点，提了就打击”。

“党内一些問題，缺点，非实在包不住了才提出来，如高饒事件，苏共党的一些情况。党应多提或只提缺点，然后再提优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楊学民）

“統治階級是有局限性的。”“过去党在农村中和农民关系搞得很好，入城后看到干部吃、穿好、坐的是汽車就怀疑了他們。”“党入城后对农民利益关心不够。”因此他認為：“这实际就是指党有局限性。”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范喜謙的材料）

“我对整风期望很大，能够通过整风对某些政治制度进行徹底改革，把党变成考試时回答用的那种抽象意义上的党。”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張祖文）

“党内缺乏民主（‘八大’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表现在党的領導不喜听不同黨員的不同意見，黨員也不喜欢听党外来的不同意見，其原因是因为党和黨員的心胸狹窄，沒有民主风度。”所以他認為：“似乎越进步的人就越狹隘，越不开通。”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的材料）

“剛参加工作的同志热情很高,过后冷落,这与我們党与黨員的作法作风有問題,只要多往領導处跑跑,老老实实干活就不行,在学校几年看到荣誉从来不会落到老老实实干活的人而是落在会吹会捧人身上。”

“同学得四分五分没有什么,如入不了党則睡不了觉,因为你是黨員即使二分也能得高位,因此同学努力方向不是求學問而是做黨員,这样对教学的方針也歪曲了,为升官才入党,是否能为人民服务?但反过来說那个青年不考虑自己前途誰高兴永远当科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結合是对的,但只有黨員才能做到这点,因此大家拚命向党里跑,党以入党可以得高位引誘青年人入党这不是国家之福也不是人民之福,因他使青年在学校里不想好好念書。”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韓光远)

“官官相护的現象亦是有的。犯了严重錯誤的高級干部仅在內部通报一下就行了。封建社会尚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举。而我們以上的現象还不是个别的。”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濮仲文)

“现在看来,共产党不但有缺点,而且缺点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了,并且飞躍地向更坏的方向奔馳着。共产党的优点,已經被缺点所淹沒,优点就象大海中的孤島一样,它失去了对人民的吸引力,它已經不被人民重視了,相反人民憎恨共产党的缺点就象失去船只的旅行者憎恨这無边的海水阻碍它达到自己的預期目的地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薛新卓)

“牆不是党外人士筑起来的,而是党自己搞的,黨員站在教育人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束洪濤)

“我的主題:三害使我們党造成危机,克服党的危机,除三害,徹

底改造党，加强党的领导，讓有才能的人治理天下。这就是我的基本观念。”

“一部分党员的蜕化，向共产主义进取心沒有了，只有一塊招牌。”“我把党员分成三类人：第一类是老党员，文化低，在工作上是不称职的，失去前进的力量，給党造成損失。第二类是青年党员，先进思想不足，特权思想有余，在工作学习方面不起作用，如我們有些人学习勁头不足。第三类是一般党员，衰退思想很大，他們公事公办，按制度办事，混淆了党员和群众的区别。在群众中不起作用，要开除他还不够，不开除对群众影响也很不好，不能起党员先进作用，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同志，有的是站下了，有的則坐下了，躺下了，要人家把他拖到共产主义去似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楊瑞清）

“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还不是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海）

“党首先是为自己党员，特别是为高于謀福利的。这些党员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我怀疑，难道党一点也沒有自己的利益嗎？我認为是有的。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政治集团。我怀疑党到底是不是光荣、偉大、正确的，苏共犯了錯誤，为什么中共就沒有錯誤呢？难道中共沒有个人崇拜嗎？中共就是毛主席說了才算数。党表面上謙遜。实际上中央就自高自大。”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李之杰）

“有些部門和單位……正在形成着以共产党党籍这一政治資料的占有关系为基础的階級分化。”

“机关、学校、团体，由于党员居于领导地位，出身复杂，思想作风毛病較多，科学、文化、业务水平較低……所以关系显得緊張，而且重。”“只要在組織上入了党，不論在思想上是否真正入了党，这种人

就享有升迁快、社会声誉高，甚至找結婚对象也比较容易等等特权。”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党掌握了大权，我想就是那么回事吧！人生一世聪明一世，糊塗一时就算了。过去我家（父亲，叔父）有兩面派作法，坐过公安局，我个人的心情是想把全家变成革命成員，肃反后，对我各种精神上摧殘，打击确实产生了对党的不滿，伤心，离心，离德，（后补充說是对支部——編者）因为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执行者有問題，因此我常說天底下就是那么回事吧！什么党、团都是为自己名利着想，支部書記支部委員都是为了名利才这样。政治上得到信任，經濟上得到补助，什么政治觉悟呀！真正沒有这些（指名利——編者）比我还差！不尽人情的事太多了，什么階級友爱。一般人情都沒有，实际上揭开他（她）們的盖子更骯髒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男盜女娼，做官面文章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田仲倉）

“党的領導階層中工人階級出身的有多少？大部分是农民、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說共产党代表全民利益，代表工人階級的党怎样解釋？到底代表多少工人階級的利益？有时工人沒有知識分子、工商界的生活好，由这想到：党执政后由于本身的成分复杂就有腐化情况上升，在一定时期說对不起农民。过去梁漱溟代表农民利益說話，要走农业社会主义，这与工业社会主义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对？就批判他是資产階級思想。”

“說党代表农民利益，領導打土豪，分田地，可是农民还吃不上，这是耍手腕兒。党会鎮压农民起义，农民分散，無法反抗，如果有法反抗，現在即可反抗。不一定推翻政权。但要推翻这种政策。”“工人是集体的，領導不敢对他們不好，怕工人罢工，农民分散組織不起来，对农民就不好。”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楊維新）

“別人說社会上有等級，我看党内也有等級制，有党亲信的党员，

有党不亲信的党员，一帮人整一帮人，党内有三級，我是第三級中的一个。

群众提意見，說在各个运动中党整群众，其实党内党员也被整得够呛。”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經濟系学生 孙 全）

“我怀疑是否（党支部）給提意見的人穿小鞋，几年来我們班有一半人穿过小鞋。”

“我班党支部錯誤和缺点是基本的，成績是难免的。”

“我班党支部沒有起到堡壘作用，主要原因是党员不起模範作用，使群众不能服气，党员之間相互包庇对群众踢来踢去。”“你們打着党员的牌子不作党员的事。”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經濟系学生 王書樓）

“过去我对共产党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正如我們所慣用的那个形容詞一样：偉大的正确的共产党的大公無私的领导下。既然是那样偉大的正确的共产党，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不对之处。在过去思想上一直受了这个偉大的正确的口号束縛。認為在共产党领导下，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否定加上偉大的正确的几个不切合实际的形容辞。”

“馬列主义有錯誤，實踐中也有錯誤，因而产生对党不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邓芳松）

“党员無个性，党内有很大拘束，使党员發揮个性受到限制，原則性太强，党员死气沉沉，是党性造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赵凤祿）

“在我們国家，在党内存在等級制度，这种等級制度是三害根源之一。”“把人分成了几等几級，这种現象在机关学校中都存在，过去的同学当了大干部之后，也不願与别人接近了，同級干部可以暢談，

下級、上級不能暢談，上下級等級不同，感覺就大不相同。”他以自己的例子証明这一荒謬論點，說他自己在提拔為科員之後，就不願再和辦事員一起學習，討論也不發言。

“黨內誰作第一書記，誰的意見就占上風，就執行誰的意志。”“中國是這樣，各國也是這樣，斯大林在世，誰也不敢反對他，死了之後，就把他的一切都否定了。”“各國工業管理制度不一樣（蘇聯一長制，中國黨委制，南斯拉夫工人委員會）就証明誰是第一書記，就執行誰的意志。”他認為黨內“少數人專斷”。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曾紀梅的材料）

“黨是自由的最大敵人！”“他們（指黨——編者）的內幕非常醜陋，陷害正直的公民，非法逮捕，亂無法紀。紅色恐怖，罪惡滔天。”

在報紙上痛斥了葛佩琦的反動言行後，李德說：“共產黨變成了人民的真正敵人，自由的迫害者。”

“加入黨又能怎麼樣呢？無非跑前跑後，忠實於上司，前途也不過如此而已！我是時代的判吏嗎？我不敢說，最低，我本人並不是這個時代產物。”

“一個大膽的青年，爆發了胸中的怒火，在‘人大’的院內貼起廣告來了（指鐵一號出現的第一張大字報，其中說校領導是‘老爺’——原編者注）大罵共產黨員為老爺！罵得痛快！共產黨在使用策略，什麼‘人民內部矛盾’，多麼狡猾，歷史上沒有這樣聰明的君主！這樣的社會！我想到立身行事。我反抗嗎？只是在內心！我輕浮嗎？確乎如此！我驕傲嗎？真的。以後該怎樣呢？

內心中反抗，表面上是誠實的笑——這是出於‘策略’——表裏不一嗎？對於‘敵人’不能老實！

鑽研真學問，決不耍弄誇大，這是無知的表現。

仔細觀察，不說，不多說一句廢話！對於自己或對於別人同樣有益！”

“必須消滅黨，永遠消滅黨！這是事情成功的根源，也是事情失敗

的根源。当組織力量反对现实时，需要党，当新的社会已产生，需要人民自己来做主。

必須从理論上証明这是真理，真理的解釋世界，合理的創造世界。

共产党人很懂得策略，很会用‘陷阱’，需十分警惕（野心家）。

真正的人，不但掌握人类遗产的全部，而且在思惟中增填新的真理，然后去行动！

共产党员非常不舒服，他們不会自己‘打’自己。古今中外沒有这样的邏輯。

凡是开历史倒車的人是反动。凡想利用新社会代替现实的人是进步。

人生的經驗，只叫人懂得斗争的策略。决不是叫人变成一个爬虫，要用經驗来斗争。

‘共产党人’最虚伪，最無头脑！

青年的狂热本身不可佳。容易吃亏，应利用每秒鐘来学习与生活。当我的体系已成为永恒的真理时，应充分利用青年这种狂热。

注意你周围的‘敌人’。注意保护自身，保卫自己的尊严！

善于‘进攻’和善于‘退却’！

該說的話必須說，不該說的就沉默！

保持哲学家的智慧，保持詩人的感情，保持軍事家的策略，保持政治家的手段，保持辯論家的邏輯，保持作家的語言，保持人格的完整，保持自始至終！”

“我不爱现实的政权，恨它！我更不爱当前的統治的党，因为它自由的最大的敌人！人民幸福虚伪的創造者，人們只能創造自己的幸福，不需要什么党，党派在我看来是必須消灭的东西。不允許結党結社，便是自由的象征。魔术呀！真理呀！你在孕育中，但为什么拒絕分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党要改造自己。农村的基層組織还比較接近群众，而机关、学校

中，正形成着以共产党党籍这一政治资料的占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分化。

国家有两套行政机关：常委会和人民委员会。这与我国体制完全不相符。

党内民主生活：只有高度集中没有高度民主，党员只有小民主，没有大民主（对党的政策不起作用）。党员义务多、权利少，下级对上级接受的义务多，反映的义务少。农业合作化都是由上而下的搞起来的，好像这一切决定于毛主席，没有毛主席，中国就要迟几年才实行合作化。下级组织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动脑子。

农村党员根本不起作用，党中央不听他们的话。如果党中央能发扬民主让他们谈一谈的话，他们能代表农民提出许多意见。

党内各级代表会应当普选。

航院马云凤不该开除党籍，他并没有违犯党章，党中央委员中也有像他这种思想的，为什么单开除他？这样作是限制党内的独立思考。

1948年整党的经验很有用，现在还须要整，有许多人因为裙带风而入了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李德提出消灭党的“具体步骤”是：

- （1）从“理论”上论证党派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 （2）“宗派主义是党产生的”，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让人民恨党；
- （3）“从文化机构到农村、军队、政权，逐步地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取消党的领导”；
- （4）“根本上消灭党！瓦解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
- （5）把个别党的错误夸大为全党的错误，以造成群众对党的极大愤慨；
- （6）“推翻党和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推翻社会主

义的同时，或者党自动瓦解，或者人民来推翻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的材料）

“共产党是否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我怀疑，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共产党，只要它不为人民，我看到了，就要启蒙，就要和它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共产党是虚伪的说一套做一套，共产党处处以‘人民’为招牌，不敢承认自己是统治者，什么‘人民政府’‘人民海军’‘人民大学’‘人民银行’等等还不如向英国那样说‘女王政府’‘皇家海军’‘皇家学院’来得实在些。”“党和军队的纪律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枪斃刘青山，張子善是杀一警百，收买人心。”

“党和资产阶级没有区别，标榜平等自由，不许随便杀人，但三K党可以杀人，共产党也什么都能做出来，延安活埋人（清华大学大字报上说的），秘密审讯，肉刑逼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

“党员五年到十年退党一次，以后可以重新申请入党，但需要通过群众。”

“逐步取消国家对党的经费补贴……用降低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党费、募捐，增加党的事业收入，如党报等来解决党的经费。”

“工人阶级政党敢于公开揭发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是可能性，而实际上党中央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过去不是党刊不能批评党的缺点。现在阶级已经消灭了，应该允许党和非党人士在公开刊物上批评党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鲍子津）

“要清除三害，必须将压力压到中央才行。我自己要一辈子为清除三害而斗争，不愿作‘官’要作水滸中的李逵，并准备丢掉党籍，打

算尝新中国監獄的滋味。”

“党内大部分是好的，少部分是坏的，好的中間懂馬列主义是少数。这样，我們党可分成三种人，一种真正掌握馬列主义的是少数，另部分是坏人，象李万銘类型的，其他大部分是糊糊塗塗，不起什么作用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

“我经常只說爱国，不說爱党，拥护党，不願听到‘党’的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栩）

“党不信任群众，学术討論的东西不發表，資本主义不好，但是他們發表了。”“我們要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胡风說如小媳妇一样，說話怕录音，我同情。”“党的領導希望有一批唯唯諾諾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王鴻章）

“党說的是冠冕堂皇，作的見不得人，如說打击报复者要斗争，但实际在基層中打击报复現象層出不窮。对党內的是先保护后批評，是对的，但在执行中却是先包庇后批評，对黨員的罪名，可以減輕处分或不处分。”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韓 楓）

“党是升官發財的工具，要升官發財就得入党，即他所指的必須得到一張象征着現在衡量人們进步的‘文憑’。”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康毅）

“解放以来，党的数量扩大，質量降低了。党的威信基本上停止在1949年解放时的水平。有人認為是消弱了些。”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只要說共产党几句好話，就可以得五分，只說好，不說国民党万

岁,就可以得三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戴逸樵)

“二个社会二种資本”

“資本主义貨幣資本万能:

荣誉、地位、享受、特权……应有尽有。

階級关系划分绝对明确。

社会主义政治資本通神:

荣誉、地位、享受、特权……全有保障。

党内党外区别毫不含糊。”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黨員内部有某些隔阂,有些問題神秘化,如有些党内刊物,不許一般黨員看,只許16級以上干部看,什么都分等級对黨員的政治学习权力有些損失。”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 大字报)

“見群官儿有感”

“近日——系里党支書、支委、主任、秘書滿地流

因为——整风的緣故才把他們刮出溝

不然——他們会久居深山成木偶

以后——再可別登基上殿坐紅樓。”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大字报)

“虞美人”

“無穷無憂何時了,‘党性’知多少,紅樓昨夜始刮风,官僚胆战惊
慌在心中。压制現象依然在,只是手段改,問君竟有几多愁?恰似万江
濁水滾滾流。(抄录者:这篇主要是对新聞系总支宣委王欽說的)

黨員屎蛋是宝蛋

群众有才也白玩
許黨員放火，不准群众点灯！
黨員压制打击群众
是黨員优越性！”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在財政系当了教研室主任或系主任，似乎就理應脫离生产，好作一个純粹的行政領導，結果有的人陷入了瑣碎事务的深坑，再也看不見整个天日。有的人則大事不懂，小事不干，有职無事（或很少），可还骨气十足，傲若小首長，口袋無學問，蒜瓣却裝滿。”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財政教研室副主任 王亘堅）

“共产党取得了經驗的財富后，就不想什么新的办法了，也就不动脑筋了，成天只是玩着什么經驗，根本就不注意具体情况，坐在人上不去的高楼上，竟閉着兩眼說瞎話。”

“共产党一貫是很敏感的，可是現在我認為有点相反了，現在只維持自尊了，感到这种样式很多只听歌功頌德的响亮名詞，只說自己是完全正确，自己是一色紅，別人总都是一色白，例如：外界人批評我們党說：‘經是正确的就是叫小和尚念糟了’我們党究竟否認不承認人家的批評，真是太武断了，只是自己坐在高高的漂亮的办公厅內認為自己正确，而不和外界联系联系，結果啥也不知。做点啥就会套公式——結果是一攤糟。”

“党在过去一貫的很有預見性，但現在却不同了，就說咱們党吧，現在完全限于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圈子內，結果对客觀的預見性很差，在这方面党已落后于客觀的發展規律，被客觀發展規律推得东摆西幌的，事情發展到眼前竟是随机应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曉 田）（大字报）

“中国共产党挂羊头买狗肉，何必爭鳴，共产党官官相护是沒有

真理的，告到那里也沒有用，黨員的心都是黑的。”

（北京矿业学院 蒙邦盛）

“……抽象的共产党应無条件的拥护，但具体的共产党可以成为官僚主义的化身，例如拉科西—格罗集团，反对这种集团并不能算反对社会主义，中共不喜欢这些論点，因为它是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出發点的，而不是以共产党的最高利益为出發点的，事实上任何具体党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常常不能一致，因此發生党、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在中国三害普遍存在，这是这种矛盾的表现……”

（北京大学 严仲强）

“中央是正确的，下級往往是錯誤的，不信任基層組織不等于不相信党。”

（北京矿业学院 楊步歐等）

“太平天国革命是閏八月，义和团暴动是閏八月，辛亥革命是閏八月，今年又是閏八月。（其意思是說共产党今年也該倒台了——原編者注）

（山东师院 李国正）

“党并不是工人階級的政党。党内工人不多，党中央更少黨員不过是利用工人階級和工农联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已。”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

“我接受了結党就有私的說法，認為組織党派是污穢的坏事情是公开的营私……参加党派是作政治投資，是用党派作升官發財向上爬的梯子……总之我把党派看作行会的發展，扩大了的小集团。我对共产党也是这样看的。”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他屬自己原来工作的机关是“黑暗的地

方，密探多，恐怖重重，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衆點燈”。并且还說：对共产党要“以牙还牙！”

（北京政法學院 王明欣的材料）

“政法學院的黨是皇親國戚，男盜女娼，加馬列主義的黨。”

（北京政法學院 張敬臣）

“增產節約是時冷時熱，周總理太大方，到處送人情，打腫臉充胖子。同意；提高人民生活！打倒共產黨！”

（雲南大學 朱祥亭）

“黨的制度是特務政治、黨棍政治，比國民黨的特務政治還厲害；歷次運動都要死人，不死才是怪事，未必個個都該死。黨委治校流弊很多，黨委應該退出學校，由教授治校。”

（雲南大學 劉文信）

“黨既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那時，任何黨派已經消滅，為什麼要喊共產黨萬歲？難道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要一萬年嗎？學生會會章沒有規定黨的領導，為什麼也要黨的領導？現在是一黨專政、獨裁，那里是無產階級專政。”

（雲南大學 蔣世汾）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虛偽的，是互相欺騙，互相利用，黨利用人民，人民也利用黨。”

（北京体育学院 李金海）

“黨的工作華而不實，很會說話，過去听了覺得頭頭是道，現在听了沒有什麼內容，听報告身邊筆記本也不帶了，從歷史上看凡是剛剛執政的黨都是勵精圖治，但慢慢就驕傲了，黨的三大主義很厚，黨委

不要群众提意見就打回去，今天鳴放都是愛國的愛黨的，不能認為是肅反不高興。”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高時瀏）

“黨獨攬大權，現在是黨的天下，共產黨本身是一個大宗派。黨團員平時在一起或者商量問題都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邢荷芳）

“黨組織是‘局子’。”（即封建衙門）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圖書館職員 孟繁姓）

“國民黨沒有共產黨可恨，共產黨員是陰森森的。”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董金淵）

“俗語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我覺得這是違法亂紀及‘三害’根源。不信請看事實：從中央到地方，機關到學校，農村到城市，那里沒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違法亂紀。一個個別，兩個個別，三個個別，一千一萬個仍然是個別，而個別加個別呢？所以相當部分黨員是否與黨綱、黨章所說那樣，真正為人民服務，很值得考慮。”

（雲南大學 吳斯清）

“向學校黨政提出九點要求”

“（一）擴大校內民主，實行校務委員會制，防止以黨代政的作法。

（二）實行學分制，採取自由聽課制。

（三）取消口試制，取消五級記分制，實行百分制。

（四）選修外國語。

（五）教師講課中貫徹‘百家爭鳴’，全面介紹世界科學成就。

（六）每班由學校訂光明日報一份至數份。

（七）黨、團、群必須一視同仁，除組織內部事務外，一般問題應同

時向師生員工傳達(如五四年棉布計劃供應的報告,先向黨團內傳達後向群眾傳達),避免人為的製造牆和溝。

(八)畢業生分配應以才為先,不以黨團員為先,並根據先生和本人的意見。

(九)及時處理肅反遺留下的評(平)反問題。”

(雲南大學 徐乃寧)

“為人民服務和為共產黨服務在共產黨人看來是一致的,這是因為共產黨人把共產黨作為人民的代表者。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統治人民的政治集團,她之所以被我認為為人民服務的,是因為我看出黨從執政以來確實地無法抹殺地為祖國為人民做許許多多的好事,其一心一意地想為人民造福,使人民的文化、日常生活盡速提高,而不是千方百計地向老百姓撈些什麼來私肥。其所以是統治人民的,是因為她千方百計地控制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表現了十足的統治者的面目。在共產黨看來一切知識分子的名譽、生活地位是由共產黨給的,因而得出結論說,知識分子應該毫無條件地服從於黨。否則在他們看來這些錢就不如用來養狗了。他們忘記了這些錢是老百姓的血汗,擺出了一付老板的面孔,由於在他們看來我們知識分子是他們養活的。說了他們的壞話,批評和指責他們,他們就說我們忘恩負義。

為人民服務和為共產黨服務,在我現在看來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我認為為人民服務同樣地是共產黨的事情,同樣地也是每個中國愛國者的事情。為人民服務表現在對祖國繁榮昌盛出力,如果主觀上認為這也是為共產黨服務,自然可以。但我主觀上不是為共產黨服務而做這些事情的,而是為祖國人民做這些事情。

我不以為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只有忠誠於共產黨忠誠於社會主義才具有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有了上述忠誠的人們,自然能做出很好的事情,就是沒有上述忠誠的人們,只要他有愛國愛人民事業的思想,也同樣能做出很好的事情。這裡所指的忠誠的意思,是指政治思

想观点的看法，不能和党政府一致的意思。”

（同济大学 舒展〔鍾亮明〕）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發展，旧的貴族階級打倒了，新的特權階級又產生，古今同然，良少慨嘆。旧貴族为了維護特權，有旧禮教為根據，在欧洲是經院哲學，在中近東是可蘭經，在文明的中國是十三經。新貴族也有理論根據，斯大林在列寧靈前就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材料特殊，一地就自然特殊了……斯大林創立這一說法，大概為的說明黨員的組織性紀律性，却被后人作為特殊的理論根據了，真是發展了馬列主義。”

（云南大學 李景燧）

“山大黨委的錯誤和罪行有三：1.違反憲法，蔑視憲法。2.造謠陷害，打擊報復。3.欺騙上級，壓制群眾。

至于1.肅反時，山大有有人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如吳大琨。工作組不許我與人往來，尤其不許周北屏和東星北往來。黨委說我原無政治問題或歷史問題，也沒把我當作反革命，但蔣捷夫領導的工作組不許我看人。……

至于2.造謠陷害的事很多。例如說東星北選舉人民代表時選舉美國電影明星。這決不能說是懷疑錯了或輕信，無記名投票根本不能去查見是誰投的，查了就不對，而且群眾無法查，只有黨委才能查；不是陷害是什麼？東平常不附和黨委；這不是打擊是什麼？

至于3.欺騙上級的事一定多得很，如果我們能够大量揭發或者打開黑帳的話。例如最近黨已經號召整風。‘黨委作肅反總結還不老實，想踩踏下面。山大肅反可能百分之百是錯誤，至少百分之九十是錯誤，真的反革命分子是公安局調查出來的，山大並沒有鬥爭出一個真的反革命，都是鬥錯的，包括鬥的學生在內。可能真是百分之百錯。但總結還說成績是基本的，還要居功，起碼的人品也不講，不用說是無產階級品質了。’

（山東大學 許思園）

“我今天曾考虑来不来，为了团结来就来吧，为什么不来？我替党委同志们代说了四句‘顺口溜’：

‘虚心接受，研究研究，
研究之后，基本照旧。’

所谓缘木求鱼者也，但是缘木求鱼还无后患，我还有几句某些党委同志们心里话：

‘你这狗头，三年之后，看老子的手段。’所以还是不来罢！但是为了整体前途，尽尽人事，还是谈了一点，‘手段’就‘手段’罢！末了再奉送几句‘改字唐诗’给领导干部：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前年喊打声，成绩有多少？’末了两句可以具体的改为‘前年一片喊打声，我们党委，除创造发明以外，其他成绩有多少？’（不过不是五个字了，只好算白话诗罢！）稍泄漏‘春光’，劝勿再迷恋于‘春眠’也无可，虽然只换一个党委书记，其余原封不动，但是同志们：‘虚心接受，基本照旧’的‘窍门’现在并不完全吃得开了！”

“其实‘打击报复’不独是‘有’，而且可以证明是普遍的，有人害怕‘打击报复’四个字，有什么关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比这个更严重的还有呢，不过我让他（指党委——原编者注）悔改，暂时不讲。”

“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团结，稍微泄漏一点春光让党委们自己想想也无可。下面几句顺口溜：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有人山下走
不准把头抬’

此指导思想之一表现也。但是‘道德文章’均不能服人，‘敢’抬了头！怎么办？好办！起码已有了三大罪状：

1. 别人都很规矩，只有你‘张牙舞爪’，‘故意捣乱’。
2. 他是党员，代表党；你反对他，实际上是反对党，高呼：‘我警告你，反对党员是反对党！’（当然叫别人喊，自己喊就不‘辩证’了）

3.他是領導，是政府任命的；你反對他，就是反對政府；反對政府目的為的是顛覆人民政府。這就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三論證靈活使用，例如：‘對抗組織’、‘陰謀顛覆’、‘公開罵黨’等等，拉攏打手，巧妙無窮，上可应付官僚主義，下可威脅恐怖的群眾，中又可以应付宗派主義者；無往而不利。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假使還不夠，可以再造點謠言來湊湊，例如選舉美國女電影明星之類是也。這些謠言並不一定從群眾來，所謂‘在運動中，號召大膽懷疑，揭發檢舉時這種情況在所難免’。我們黨委自己義不讓人，並不需要‘號召’，也可以創造發明出來应付門市。誰說我們黨委沒有創造性，我就反對，這些不全是創造么？

決定你要低頭，‘打’之後，怎麼變？有順口溜為証：

‘要你死，你難活，

書籍全搜走，研究不准做，

老婆兒子朋友一齊打，看你低頭不低頭？’

萬一還不低頭，又死不了！怎麼辦？放心，死早準備好了：

‘萬一死不了，頂多我檢討，

凡是推組織，組織包下了。’

三部曲完了，事後‘總結’（這裡也有竅門：頂好趁‘搗蛋鬼’不在青島時來個總結）

‘既然死不了，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弄清楚了些問題，成績是肯定的。限于水平，個別偏差是難免的。有人說‘打擊報復’，這是不可能的，實在是那個人的個人立場問題；當然也只有極少數的極個別的人這樣想。’

還有‘竅門’，再趁開擴大校務會議的時間，在外面來個‘總結討論’，‘萬事大吉’了。

以上是‘打’的一個起因，三個經過，再加上一個‘鬼混’。

只是舉例而已，當然對各種不同情況，要靈活掌握，不可教條呆板（對這方面我們得佩服我們黨委‘辯證法’的應用）。總之，是圍繞

着一个指导思想(暂时保密)进行的,不过这个指导思想絕不是解放前领导抗日战争时的指导思想了。”

(山东大学 东星北)

“总之上级决定总是英明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成绩是肯定的,等等等等,缺点粉饰成优点,错误粉饰成成绩,于是一片颂扬声,便觉得万事大吉,即使做了天大的错事,也觉得对革命有莫大的功勋。

但是这样做却产生以下几种后果:

第一,不能接受错误的教训,三反犯了,肃反再犯;

第二,党委和党员骄傲了,觉得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属于群众;

第三,凡是歌功颂德的,就得到党的欢迎,凡是据实批评的,就是对抗党,可以加上落后的或反动的帽子;

第四,官僚主义生根了,宗派主义滋长了;

第五,党群之间的墙愈筑愈高,沟也愈挖愈深了;

第六,是非不明了……群众敢怒不敢言,空气是异常的沉重——若非‘鸣’‘放’前途何堪设想!”

(山东大学 王应素)

“共产党比国民党要厉害些,国民党官员的丑事被报纸大量刊登,而共产党呢?找一二个小干部、小党员整一下……”

(兰州大学 吴中道)

“党是一个自私集团,其斗争目的是为了几个党员的利益,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给人民一点小恩小惠,使人民为他服务。而对苏联,则只是想从苏联那里得到一些利益,并用向苏联学习来达到维持利益的目的。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阶级的利益。平常喊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欺骗无产阶级,党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是假的。

国民党是腐朽与卑鄙的，而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手段不同，共产党善于给人民群众一点小恩小惠，而比国民党更阴险。”

（蘭州大学 田昌文）

“共产党统治的办法比国民党高明得多，他能尽量想办法团结工人和农民，这样他的人数多，谁也没有办法他。”

共产党是比国民党更厉害的政党，更厉害的统治集团，共产党利用中国人多穷的特点，以马列主义——经济平等主义作武器，得到了工农拥护。”

（蘭州大学 屈健英）

“共青团和共产党都是一气的，我要做个‘正直’的人，因此不入党也不入团。（靠近组织的人是）没有头脑的人，我是公正的人，有头脑的人；共产党的主张是偏激的，不实际的，我很清醒，不愿跟共产党糊里糊涂过日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党的基层组织是公正的，党的政策是好的，但多级组织和党员都不见得是好的，政策也不一定执行得很正确。”

（蘭州大学 馬啓凱）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到质变的，共产党有一天也会变坏的。”

（俄語学院 沈兆予）

“級高有人朱貴送，
朝中有人好作官，
捐来县令無才干，
才智双全是枉然，

×

×

裙帶之风兴，
邪风如不整，

×

×

食用殘茶無人知，
官官相护有牽連，
广吃庶民血和汗，
压在深山永不翻。

×

×

升官耀祖宗，
国家怎兴隆。

×

×

几年石头压在身，死在九泉不平心，
石头搬开把身挺，不公不平向党申。

× × × ×

腹中之言吐出来，矛盾怎样来解开，
以身作责怎么样，要看行动来下台。”

(俄語学院 郝 鈞)

“反党不是反革命。

我現在还是这样認為‘反党不是反革命’。說反党是指反对党的宗派綱領，路綫，‘三害’等一切方面，这都是可以的，不能算反革命，不能逮捕他，法律上是沒有罪的。”

(俄語学院 高 杰)

“急性鼻卡他”

“官僚主义鼻子朝天，一朝下雨，水进鼻管，三天过后發了炎，嗅觉失灵，病齐染。耳不能听，眼不能看，不見花开，不聞鳥喧，面黃肌瘦，后肢癱瘓，还与群众失去关联。無人延医，一命归天。群众欢呼，‘三害’已鏟。

老远看見一座神，走近一看原是人，高高站在云端上，作威作福叫人鳴？”

(四川农学院 郭俊全)

“我疑惑党是否忠实于人民，党口上說：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實質上誰的生活提高了，上層分子提高了，教授、产业工人、大学生、大城市幹部，而那些在冰天雪地作农村工人(包括經濟、政治)的人每人尽能拿二十余元薪金；而那在烈日下劳动的有每月只有三元的生活开支，而那些不停蹄的上了年齡的老小工手，每頓只能喝些稀湯……假若这能說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那簡直是海外奇談。我真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好办法，用經濟拉攏知識分子，这也不外乎是因为高級知識分子有知識，下層的人民愚蠢無知，不知鬧事。”

(西北畜牧獸医学院 刘礼义)

“黨組織有沒有宗派主義，有，而且相當嚴重，黨員犯錯誤，黨內檢查，群眾犯錯誤，當眾鬥爭，有些黨員無德無才，都被無故地提拔了。”

（西北畜牧獸醫學院 繆延雄）

“共產黨是專門整好人……，說共產黨是大公無私，我看就是大私無公。”

（西北畜牧獸醫學院 王霽光）

“給共產黨划個像，就是頭上戴的黨帽子，眼睛上寫上政治兩個字，一只耳聽黨員的話，一只耳聽團員的話，咀里咬着歷史上有問題的人，一手抓著要來進步的人作為爪牙，另一隻手拿著入黨申請書，腰里緊緊被束縛著三害，腳上踢著不忠於他的人。”

（西北畜牧獸醫學院 趙煥之）

“有某些黨員是忠言逆耳的，其心目中所看得慣的是‘老實人’，這種‘老實人’，就是遇事不反對，只舉手，唯唯諾諾百般適從者。據說這就是‘忠誠’和‘進步’；而經常愛向黨員提意見者都被認為是‘標新立異’‘驕傲自滿’，提意見後馬上就有另一個黨員來找你個別談話說‘你是在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弄得啞巴吃黃連說不出來的苦。

前者所說的‘老實人’，也往往最容易入黨，因為很‘忠誠’。發展了這樣一個黨員無形中黨就與周圍的群眾疏遠了一步，因為群眾最恨這種人。長此以往地聽喜不聽憂，寵‘老實人’，不但官僚主義越發泛濫成災，而且所培養出來之人，說句不客氣的話：乃奴才思想也，又何必提倡獨立思考。

被認為‘驕傲自滿，標新立異’的人，好像被打得永世不能超生一樣，這頂不太適合的帽子總是取不下來（因為經常要提意見當然取不下來），有人戴了五、六年，都發霉了想取而被別人按著不准取。說句實言：誰又願意在這樣不好的效果之下來‘表現’自己，來‘抬高’自己，來‘自大’一番呢？非但沒有達到目的而得到的是棍子，……是‘檢查你驕傲自滿的思想根源’，在此迫不得已的境況下只好說一通假話

来过关，而听检查者有时反认为‘还比較深刻，深刻！’所以假話就越来越多。”

“几年来的很多事实使人感到党员享有特权，故背后有一种阴調‘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当然享有特权’。如选拔留学生問題：非党群众要想被选留难于登天，送出去的基本上都是党员，即使有少数非党员也至少是个团员，这是为了保证‘政治上可靠’。無可非議留学者应保证政治可靠，但非党员都是不可靠的吗？据了解提名都是人事科掌握，誠然政治情况，特别是党员情况人事科尽知，但学識程度則未必尽知，而教授呢对于‘此子可造不可造’則無权过問。据說这是高教部規定的，無論誰規定这都不能視為是一种正常状况，如此下去，怎能团结群众發揮一起积极因素来建設社会主义？这里順便問一句：在历史上或在目前有那一个国家，無論是資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选派留学生都是执政党的党员？”

（四川农学院 廖家棠）

“当一个阶级还没有成为統治阶级以前是有威信的，一旦成为統治阶级后，威望就可能降低，就忘了人民，人民将会反对他的。我认为我們的革命是为了少数共产党员，而革命死了多少人都是农民，共产党革命时候很艰苦，穿草鞋。現在住小洋房，坐小汽車的全是那些穿草鞋的人，而农民却住小茅屋。我看共产党好象好了瘡疤忘了疼。”

（东北林学院 陈大耀）

“我要是上前綫就把槍掉过来打共产党，如果有机槍的話那就更好。共产党领导的各項运动是狐狸打狼兩头堵。群众运动不免要犯錯誤，可是每次都是群众运动，并且事后都得糾偏。”

（东北林学院 金博文）

“国民党最初十年还好的，到后来才坏了，共产党統一中国不过七、八年已經搞成这个样子。”

（中山大学 董每戡）

“共产党好？看匈牙利共产党專政十年，到底作了些什么，看結果就知道。”

（中山大学 岑 瀾）

“党是宗派主义小集团，只要服从他就有前途，而不服从他就会打击你。”

“宗派主义像毒蛇，把我們圈在不同的圈子里，党员是第一等級，非党员是第三等級，团员不上不下，正在中間，圈套还有圈套；落后与先进各立陣营，新的老的，分派分班；连环套着连环，彼此立‘牆’立‘山’，看来一个整体，內部分崩离析。”

（中山大学 刘 文）

“有党就有宗派，有官就有官僚，要消灭宗派、官僚，除非沒有党存在。”

（中山大学 江升日）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这話不对，沒有共产党也有另一些人出来搞。”

（中山大学 梁潤成）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匈牙利党为大多数人民所反对，就不能代表人民，反共不一定反人民，像反匈牙利共产党就不是反匈牙利人民。”

（中山大学 林傳驛）

“党好像寡归一样，要別人替他立貞节牌坊，但暗中却偷偷摸摸乱搞男女关系。”

（中南矿冶学院 李幼吾）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組織，这点我有怀疑，因我看到很少工人作领导，而作领导的多是非工人，从中央到学校他們都是吃党飯的，这些人除靠政治靠党员牌子以外，什么也不行。”“你們是代表工

人階級的，那麼工人為什麼會拿起錘子來罷工呢？”

（中南礦冶學院 黃際春）

“只要國家政府機構，撤消黨的領導機構，以節省人和錢來建設。”

（中南礦冶學院 龍用藩）

“這裡我要特別提出一件事使大家警惕，解放了，黨員，爭取入黨，不但為一切正直的人們所追求，而且許多為個人名譽、地位的人也在企圖混入黨內，黨員入黨已經成為一件時髦的事情，這樣的人有的已經入黨，我們堅決要把他們清洗出去，有的還在黨外，甚至被稱為積極分子，他們不惜一切手段向我們的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吹呀！拍呀！他們對待黨內的缺點，也像狐狸對烏鴉式的贊美，他們不惜犧牲群眾的利益討好首長，於是，我們黨的幹部有點飄飄然起來，甚至使自己變了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要警惕，喚起社會上公眾輿論給他們以道義上的壓力。

共產黨絕大部分變質了，要不然怎麼會有90%不同意百家爭鳴呢？

共產黨內部互相不先揭露，先讓別人揭露。世界上哪有這個道理：先聽人家批評，再自我批評。

毛主席若是死了，真危險，現在主要是他的意見，其他的人只不過執行他的政策而已。

黨的病已入膏肓，現在又不准揭露，這樣下去一定要完蛋。

要是我是毛主席，首先把日本干了報仇，早檢討錯誤。

其實中國黨也是教條主義，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詳情罷了。

就從李立三要蘇聯受人來說，就是教條主義。

黨員若不參加體力勞動，就一定腐化，這是鐵的規律，過慣了好日子，再高的理論也沒有用，這就是許多黨員腐化的原因。

這些老黨員仍以為天下是自己打的，現在應該享受了。”

“我不願意呼萬歲，特別是呼個人萬歲，如呼毛主席萬歲。”“呼萬

岁，合理性不强。”

对党的汇报制度不满，认为党团员是告密者，认为肃反，文艺方针之所以错误，都是党中央错误而造成。

（俄语学院 蘭英年的材料）

“现在就是一党专政，儲安平の‘党天下’說的不够痛快，应该說共产党独裁。凡是諷刺党的言論我都贊成。共产党言行不一致，表面上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其实不然，否則匈牙利的工农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呢？‘鳴放’使共产党失去了威信，共产党的面孔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暴露了。”

（云南大学 李維紀）

“邏輯大綱”

- “1. 党的錯誤是个別情况，对它批評就是反对全党；
 2. 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鬧事；
 3. 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 万事保密是警惕高，揭露神話就是毀謗造謠；
 5. 盲目服从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馬列；
 7. 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阴谋造反；
 8. 政治等級是統治杠杆，取消等級就是制造混乱；
 9. 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誰說教条就是挑撥苏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别有用心。
- 凡具上屬性者‘衛道之士也’。”

（北京大学 張錫琨）

在6月19日小組学习人民日报社論“是不是立場問題”时說：“这不是立場問題，这是由于共产党太坏了。在所有总结中，由学院領導、省委、就連周总理的总结，也都是談成績掩盖缺点，把缺点包在共

产党内，怕别人晓得影响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就是有错不改。”

（湖北医学院 李雨亭的材料）

2. 誣蔑毛主席

“这群党的领导都是一群丑角。”“毛主席和刘少奇中间有矛盾，刘少奇是地主出身能行马列主义吗？”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党中央主观上想搞好，客观上没有搞好。社会主义各国都是宝塔式的统治，国家问题一切决定于党，党决定于一个人，从毛主席一直到各级党的第一书记都是小斯大林。第一书记就是对，说一个人错了，全社会不能怀疑，在理论上的根据是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包括中国党）是个人专制。为什么中国没有犯那样的错误，我同意哥穆尔片的文章。主席是否犯过错误，解放后，在工作上有错误。如肃反问题，作了扩大的估计，三反也是这样，搞错一些人不认错，胡风问题是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搞，还有高饶问题。……”

我认为这社会里不容许独立思考，社会科学没办法搞，只有党中央才能搞，别人只能围绕党中央解释，比如毛主席说，重工业与轻工业比重是8:1，就都说8:1，说7:1，就都说7:1，这叫什么科学，这不是思想僵化了吗？在敌人压迫下歌颂革命是好的，在新的情况下老说过去好，不改正错误缺点，这要引起危机。我是同意卡德尔的说法，我感到这不是人的作风问题，而是有这样的环境。使这些东西滋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以后我的思想要经常向党汇报，当作一个镜子，象在上帝面前

懺悔那樣。”(1957年7月1日)“……原來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到了機場……好像能從領袖面前能看出花似的,也好像看了有福,也好像成了以後夸耀的資本”,“在今天的隊伍中任何英雄顯得多么渺小啊!人們在喚毛主席萬歲,實在是人民喊自己的力量萬歲,毛主席不得不脫帽,我們喊毛主席萬歲是在國際友人面前顯示我們民族中華各民族的大團結”(1956年10月1日)。“周總理到莫斯科大學還得了法學博士學位,現人到運來榮都來?你用不着專門去研究學術,只要你有本領,在政權中有成績,誰還不奉承你幾年。”(1957年1月11日)“……共產黨到底是否大公無私?是否為人民大眾辦事?我想假如是的,那末除非是只有党中央的幾個清官……下面是亂七八糟。”(1954年7月4日)“我想大學生,共產黨員等等這些都不是標準,這當中混蛋多得很,腹中問題是在於自己,這個人可以外表修飾得很美,卻是一肚子男盜女娼。”(1957年1月3日)“現在天氣雖然晴朗,但政客四出,总有一天會‘群雄四起’(改成‘困難重重’)今天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團結,明天他要是去世就壞了(改為要是永遠如此就好了),凡是知事者成,失算者熊。”(1957年1月9日)“黨是不斷強大了,但事物都有二面的,俗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誰忘了這一點,這強大是空虛的。”(1957年6月23日)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陳國雄)

“斯大林活着時是好人,死了就有一大堆錯誤,誰又能知毛主席以後怎麼樣。”

(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語文教員 張 偉)

“黨的總書記或主席,最好由適當的人輪流擔任。”“現在對毛主席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

“列寧、毛主席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僅在個別問題是有發展的,而對歷史問題就沒有好好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煒)

“党中央只是毛主席和政治局几个委员说了算，中央委员不过是个牌位，不起作用。”“党是一个特权集团，党对人民是统治，比日本统治的还厉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编辑 齐俊成）

“党中央基本正确，毛主席英明，但也有官僚主义，英明还不够。如以前几个运动只是肯定了成绩，对偏差报喜不报忧。农民生活苦的要命，为什么不纠正？”

（中国人民大学总务处办事员 秦荣兴）

“假如没有个人崇拜，为什么又把毛主席的话当成事实上的‘金科玉律’？‘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这句名言在某些享有很高声誉，居有极高地位的中共中委说来是否还起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薛新卓）

“毛主席、党中央怎样说，下面就怎样说，不能发表创造性见解。如毛主席到外面跑了一趟，回来说合作化右倾了，大家就赶快搞；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矛盾已提到第一位，大家就拥护，换个人说这样的话一定会受到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助教 王铁生）

“毛主席提出大民主、小民主的划分没有理论根据，马、恩、列、斯都没有谈过。”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若繁）

“不应该喊、或少喊毛主席万岁。”“人都一样，光喊毛主席万岁，是否也有个人崇拜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吴元富）

“我討厭那些政治人物（指我們党的領袖——編者）……我可真

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们。”又说彭真“是人类历史上不足道也的小卒，可能会犯荒谬绝伦的错误”。他支持林希翎在“胡风问题”上对毛主席的污蔑，说林希翎“揭露了毛的真实本相”。他还说：“赫鲁晓夫、主席的文章都是作为我批评对象，别有用心读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的材料）

“毛主席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的报告是实用主义。”“大家不要迷信以前的教条否则对科学有阻碍的。”（这里指毛主席的整风报告——编者）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吴汝文认为文章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毁灭……”是“扯蛋”“什么玩艺儿”。当同学驳斥他时，吴则诬蔑同学是“正统”有“和领袖一样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吴汝文的材料）

“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人的利益的维护者。党打着为工农服务的口号为了自己的利益”。“团也是为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人的利益服务的”。……

“知识分子搞革命是为了自己，毛主席干革命也是这样。”“毛主席有多少才能我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中国党内有个人崇拜，这是从‘七大’开始的，不过没有苏联那样严重，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个人崇拜的表现。”“毛主席在党内是个不许别人批评的，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站在党组织之上的特殊人物。”“1956年工作全部冒进与毛主席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多、快、好、省’的方针有关，这个方针要是邓子恢、薄一波提出的一定要受批判的，但毛主席后来提出上马，下马的辩证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畅）

“毛主席是最高統治者，和封建帝王、資本主義國家總統一樣，不過毛澤東不敢稱王稱帝，不敢當總統，因為他看到了袁世凱失敗的教訓。”他認為人們對毛主席太崇拜了，他說：“一句話就当聖經傳誦，其實毛老头子也沒啥了不起的。”并曾多次向同學們宣稱“我可以刺殺毛老头子”，“可以刺殺周總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潘相臣的材料）

“人人都有妄想狂，毛主席也有妄想狂，張中曉觸犯他就發怒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公灝）

“報紙上從來沒登過毛主席，黨中央有一點錯誤，高饒事件，為什麼發展到那樣嚴重，難道與黨中央毛主席沒有關係嗎？毛主席，黨中央要負責任。”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張可治）

“毛主席工資600多元，一般幹部50多元，更不用說勤雜工、挑大糞的了。毛主席住在中南海，嗅到大糞味嗎？清山綠水。”……

“一提就是馬、恩、列、斯、毛，為什麼沒有小權威？”“正如蘇聯捧斯大林一樣，咱們也有些人捧毛主席和黨中央，歌功頌德。”

“黨中央有頑固的斯大林派。”“拉科西是笨蛋，我們呢？”“信任黨的人，教條味太深。”“49年對南斯拉夫的聲明也有謾罵，說人家是叛徒，我們就不檢查。”“我們只看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沒有看到人家的制度……，說明了黨有教條主義。”“對鐵托的宣傳，好的少，一提就是修正主義，鐵托小會也參加，群眾會也參加，而且都講話。咱們毛主席就不夠，每年元旦為什麼不講話？為什麼不通過你那廣播電台，講講你那唯物主義呢？”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毛主席領導下沒有犯過錯誤？犯錯誤就是王明、博古，毛主席有

很大成績，对。但沒有錯誤，这是瞎話，肅反、三反出了乱子，与毛主席無关？把毛主席看作神，报告总是說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把毛主席放在党的前面。”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韓 楓）

“斯大林有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个人崇拜。如臧克家对毛主席的詩吹捧一場，实际上沒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如郭沫若。仅仅这几篇詩（發表在詩刊第一期）根本得不出毛主席是偉大詩人的結論。”“毛主席能在全國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在於領導地正确，仅仅是主席的地位。如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不是主席报告，而是別人报告，必然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子是無疑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毛主席給人以偶像的感觉，神秘化，沒有人能見到他，一出来就跟着那么多警卫員，高高在上，脫离群众，他办的事似乎都沒錯。”“中国也存在着个人崇拜，如对毛主席，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一个人，太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就是个人崇拜。”“艾森豪威尔还經常接近群众，給人以人的感觉，感到很亲切。”“解放前我写信給英国女皇，英国女皇亲笔給我回信，要是写信給毛主席，恐怕連看也不会看。”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朱惟民）

“对毛主席，党中央盲目崇拜，不能怀疑，不能說缺点。几年来对馬、恩、列、斯、毛，只能相信，不能批評，誰提出不同意見，教条主义者就用大帽子扣过来，使人們看不到反面东西，原材料，不能比較、思考，只能相信，好象信神一样，形成人們意識中的信仰主义。”

“党中央沒有公开的自我批評，封建皇帝还下詔罪己，我們为什么不能公布領導的錯誤。

“几年来，批評不敢涉及領導人物，党中央，过去对敌斗争需要，今天就不需要了。事实上中央也出过高崗，毛主席說过，保不住出第

二个高崗，因此，应加强群众监督。”

“中央有否宗派主义錯誤，可考虑(国务院十几个副总理，八个办公室，只有一个副主任是非党人士)。”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唐仲明)

“个人崇拜在中国也很流行，并且很严重。”他說：“一个單位的領導者說一句話，在这个單位是唯一正確的，誰要反对这个意見，很可能把这个人看成落后分子，反动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領導者更可能加以打击报复”，“党的政策不能碰”，“某个地区领导人說句話，在这个地区就是金科玉律，中央领导人說的話在全国更似聖旨一样，神聖不可侵犯”，“党中央和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自我批評很不够”，是“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的不良現象”。他还說：“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这两个口号也是不恰当的”，“是封建的东西”，“老百姓喊‘万岁’就把毛主席看作与过去的皇帝一样”。因此他建議廢除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这两个口号。并建議“中央把反对个人崇拜作为这次整风内容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鍾溶华的材料)

(1)对毛主席的看法：首先他認為毛主席也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据李正德揭發：“最近我和楊学民談話，我說三害一定能反掉，只要用馬列主义方法观察問題，他說：你說誰一直用馬列主义方法观察問題。我說：毛主席。他說：不对。”他还說毛主席在工作中也有三害，他在7月16日檢討說：“文章(指上述材料——編者)基本思想是对党怀疑，毛主席和党都产生三害，認為毛主席不敢提出無产階級也产生三害”7月19日他在小組会上說：“毛主席想到了不敢講，我給公开講了。”

(2)对朱副主席的看法：“他說朱副主席是憑資格当上副主席的，没有什么能力及著作。”

(3)对中央其他負責同志做报告也反感，去年傳達彭真同志一个

报告,他没听,反说:“这些领导人讲话,我不敢相信了,还不是那么一套”,今年听彭真同志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录音,也准备请假不听。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楊學民的材料)

“毛主席的辯証法是世界聞名的,但口头上的辯証法要与实际一致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党有退化腐敗的萌芽:

党有个人崇拜和停滯現象:在党沒有提出个人崇拜以前,沒有想到这个問題,現在感到党提出这問題是英明和偉大的。有人提出要毛主席作檢查,这是胡鬧,毛主席是沒有个人崇拜的。但全党的思想上有个人崇拜,我們大家都敬愛毛主席,实际上是崇拜毛主席,‘敬愛’和‘崇拜’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很多人把毛主席的話神秘化了,从他的一言一動中,也要找出偉大意义来。外国記者說:在中国,毛主席的話就等于法律。实际上比法律的作用还大。中央机密文件有一特点,一般的都用中央指示,有特殊意义的由毛主席亲自批示,后者比前者的意义大。中宣部的学习杂志关于总路綫文章都是联共党史上照抄下来的,全部是教条主义;很多人对文風不滿,但中宣部听之任之,不管不聞;毛主席在农村合作高潮(原書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編者)的一篇按語中提出了意見,才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群众提了許多意見一直不重視,毛主席說了才算話,这难道不是个人崇拜嗎?党内長期存在盲目服从的气氛,参加組織生活,只能討論如何貫徹,不能对決議本身提出什么意見,即使提出了受到批判、責难,用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因而党内思想是不活躍的,是停滯不前的。盲目服从的現象是普遍的,各个党組織的書記就是各該地区的聖人,而且有一种言論:領導者就是党的代表,領導同志就是組織,变成組織的化身;对書記有意見,不同意書記的意見,就是反对組織(党是正确的、光荣的,这只能从三十年的事实来看,而对將來也是正确的那要看實踐)。把党的政策神密化、絕對化了,似乎党委的決定就是絕對正

确的；党委也是人组成的，不可能绝对正确的。很多地方党委是不学无术的，靠自己的资格吃饭，不钻研业务，靠过去的资本过日子，县委书记到工地上很多事情都不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楊 敦）

“党中央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缺点，使我们感到党中央没有一点错误。何以见得，据说：

（1）党中央有许多档案不公布。

（2）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报告录音不公布，因为怕人觉得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有不正确的估计。党中央发表的都是定论性的意见，这样使很多人不敢开动脑筋；党中央的意见代替了大家的头脑。

（3）认为中央首长犯了错误也不公布，如南汉宸、冯文彬、高岗、饶漱石的错误都不公布在群众面前。

（4）认为党喜欢强调客观原因，如三反运动出了偏差，就是‘是运动嘛，偏差难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鲍子津）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农业合作化太快了！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你不要听书本上说什么好，讲的很漂亮，可是并不符合实际。知识分子一天吃饱没事，坐在那里摇头摆尾地说什么合作化优越呀？其实他们是不了解实情的。

我们有些人一谈农民生活，就和过去比。我们假如在国民党时代，农民一天只吃一粒大米，今天农民能吃到两粒了，看来生活是提高了一倍，可是农民仍饿着肚子啊。因此，这样大吹大擂地宣传农民生活提高一倍，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说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是毛主席深入农村调查根据全国广大农民要求而制定的。我承认毛主席到农村去过，可是他去的是什么样的农村？你们想想，主席要到农村去，还不到一个最好的、最富裕的合作社去吗？从这种合作社了解的情况，当然是合作化好了。可是这样能代表全国吗？再者说，农民从来也没见过毛主席，一见到毛主席就

高兴的不得了，因此当毛主席問他們合作化好不好的时候，誰还不說好呢？所以毛主席根据这些調查而写成的‘合作化問題’一書，就不能代表全国农民的意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著作，十分佩服。可是这次‘农业合作化問題’一書，我可不……。”

“……毛主席以前的著作很好，感情上也很一致，是实事求是的。但‘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却不好，我消化不了，这个文件是脱离实际的，这篇文章抓不住我的心。这是因为毛主席过去在山溝里与农民同甘共苦，現在到了北京，只听报喜不报憂的干部的彙报，因此是脱离实际的。生活改善的是有，但这是代表少数人的，全国有几个三戶貧农办社呢？毛主席不是要把合作化推进得这么快，在高潮序言中指出过这个問題。說农民入社是高兴的那不现实，基本上是强迫命令参加的。

农民生活与城市工人、与將軍元帅比較那是非常苦的。毛主席不是完全听彙报的，毛主席去过农村，但到乡下以后毛主席是不自由的，干部会对毛主席講‘某某地方政治情况复杂’，所以他只参观一些好的农村。总之，我是不相信百分比的，合作化是太快了，农民生活太苦了，不改善农民生活是太对不起人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胡志明能戴草帽，毛主席太闊气了。爱講政治上的国际影响，不講实际，外交一来总是摆国宴，和平賓館，花天酒地，太不平等，为什么拿农民的钱給統治者享福。”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楊維新）

“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有四：（1）領袖人物的不（“不”字是編者加的）虛心，驕傲自大，不接受批評；（2）階級斗争尖銳，人民习惯于半軍事状态的政治生活；（3）旧社会封建階級小生产者的家長式領導作风残余；（4）人民覺悟水平低，对領袖盲目信任。从以上原因看，中国除第一点之外，其余三点都存在，所以中国亦有个个人崇拜。它表现在：

(1)对領袖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凡主席說的話就只能絕對正确,大可以批評,認為領袖是根本不会犯錯誤的。其实連‘西游記’中的孙悟空是神仙都犯錯誤,何况毛主席还是个凡人呢!虽然主席早就說过,除了死人和出生的小孩誰都不可避免的要犯錯誤,但人民还是只有歌功頌德,不提批評。这种个人崇拜不是領袖造成的,而是人民自己的封建残余思想造成的。这种个人崇拜不仅限于对領袖,而且扩大到对党的崇拜,对各級领导干部的崇拜,对党员的崇拜,在国际上則表现为对苏联崇拜和对斯大林、列宁的崇拜(特別在二十大之前);(2)辨别是非的标准不从科学出發,不从客观现实出發,而是出于从那一級領導,那一位領袖之口来衡量的。同样一句話,党员談了群众就不敢反对,領袖談了人民就不敢反对。林希翎所举毛主席主張出版蒋介石全集之事就是最好的例証。个人崇拜的危害性是不小的,它造成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人民思想僵化和科学停滞。”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

“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和全国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报告后,我非常高兴,很感动,甚至感动得有些怀疑。就好像一連生了五个女孩子,等生第六个孩子时,是男孩子,也不大信,毛主席的这些話能实现嗎?毛主席講話随随便便,說什么要出蒋介石全集?要叫別人說这話又要給扣上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了。我看他没有經過思想改造,沒尝受讓学生騎在脖子上的滋味。” (山东师院 牟光信)

“我说过‘毛澤东思想’是形而上学到辯証法的‘稳定的、緩慢的、然而切切实实的过渡’,我说过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是敬爱的,但是他对辯証法最多也不过是个半通,我说过康生、邓小平报告中充滿了保守的自滿情緒,我说过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乱与空虚,我说过党中央的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現得分愚蠢,在我看来他們理論水平的确不高,除了进行理論分析以外,誰又能用別的方法來說服我,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絕對权威,这是我自己事誰也管

不著，历史上有过恩格斯，曾經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

（北京大学 譚天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語，說明毛主席也自高自大。”他在团小組会上說：“人都会犯錯誤，毛主席也会犯錯誤。”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的材料）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有些神秘化，既是人民的領袖，不应神秘化，这会引起个人崇拜，一些同志在‘詩刊’上認為毛主席是最偉大的詩人，我看了毛骨悚然。”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毛主席和以前皇帝差不多，一道令下，全国貫徹，故錯誤要先从毛主席算起。毛主席难道沒有一点錯嗎？只是被隱瞞了，要錯一定是領導上的放任，毛主席的放任。”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是陰謀，毛主席和希特勒、俾斯麦一样是陰謀家，其差別只是安排得好，名字更誘人而已，比拿大刀大槍愚蠢已极的东条、蔣介石聪明而已。”

陰謀家希特勒、俾斯麦、杜威……斯大林接着以后似乎應該添上‘大个毛’了。”

“毛主席一知半解，刘少奇懂得一点，康生一窍不通，‘資本論’只讀了一半，中央的馬列主义水平也不高。”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毛主席生得陰險毒辣，他的像看起来就是适合作坏事。宋庆龄是討飯吃的（意思是說宋庆龄先生是靠孙中山先生吃飯的——原編者注）；魯迅若在，一定要反对现实，定会被鎮压；朱德不如刘伯承；林彪以前还吃得香，可是現在不听了；彭德怀之所以当国防部長是由于他很忠实于……，所以毛主席很信任他。”

（云南大学 李維紀）

“斯大林生前偉大，大家崇拜他，死后遭人罵；毛澤東也還不是一樣。”
（云南大学 唐云林）

“世界上沒有一個徹頭徹尾的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者；前者中間有後者的成分，後者中間也有前者的成分。列寧和毛主席還沒有經過充分的時間考驗，其唯心主義成分還沒有發現，其實，也並非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

（云南大学 李維紀）

“毛主席和以前的封建君主差不多，至高無上。誰也不敢批評他。共產黨辦事極不民主，毛主席是個終身獨裁者，不世襲的帝王，只有他說的才是對的。”
（蘭州大学 屈健英）

“我認為人具有兩面性，最偉大的是人，最卑鄙的也是人，毛主席和希特勒都一樣，希特勒以民族主義起家，曾一度給德國人民帶來‘幸福’，但以後他公開走向戰爭，因此成為時代的阻礙，結果滅亡。毛主席以中國人民的解放為目標推翻了舊的反動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幸福，但在革命成功以後便脫離人民，成為時代的阻礙，結果也一定被推翻。”
（西北師院 高德林）

楊志農在引用四川大學有個學生說毛主席是假馬列主義者的話以後，他說，“那位學生為什麼說毛主席是假馬列主義者呢？因為她還不懂得，黨員不能代替黨”。楊志農認為，“現在有許多老黨員已經腐化了，新黨員的品質惡劣，所以四川大學有學生說毛主席是偽馬列主義者”。

（四川農學院 楊志農的材料）

“毛主席觀察陝北農村與農民照相，農民害怕，不敢正視毛主席。

三戶貧農社的代表和毛主席碰杯，毛主席是假仁慈。”

（東北林學 曹恩邦）

“毛主席品質惡劣，亂搞男女關係，沒有一點本事，沒資格當主席。”“毛主席像太陽，那就把他吊在半空好了。”

（中山大學 周濟旺）

“毛主席有個人英雄主義，說沒有人不犯錯誤是為自己辯護。”

（中山大學 劉法生）

“官僚主義是中央造成的，……毛主席的官僚主義不嚴重嗎？”

（中山大學 周仲堅）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作報告，有90%中委中途退場。”

（中山大學 藍力生）

“建立完備的法制保障人民的自由，主要是由毛主席和周總理……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面提出政策，接受批評和質問……”

（中山大學 羅應榮）

“中央撤消高、饒的職務是由于毛主席忌才。”

“毛主席本來是會起來搞革命的，只因過去在湘潭某小學爭奪校長未到手，才到外面流浪，被迫上梁山鬧革命，以至才有今天，否則也不會當上主席。”

“蔣介石在上海當過流氓，而毛主席也是流浪漢出身。”

“宗派主義是毛主席帶頭搞的，毛主席故意把軍政大權都交給湖南人手里，組成湖南集團，這就是宗派主義的具體表現。周總理不是湖南人，這是因為周總理威望高，毛主席沒辦法捺他。”

（中南礦冶學院 李鎮亞）

“毛主席是个大官僚，在位七、八年什么法都不訂，难道要我的兒子来訂嗎？”
(北京鋼鐵学院 徐繼和)

3. 反对党的領導

“……有一个牽涉到人民大学全体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学校，是应当分成兩個呢，还是像現在一样不分家呢？有一个时期听說决定分了，行政人員都配备了兩套。再过一些时候，听說不分了。不管是分是合，只是少数人关起門来商量决定的(重点是編者加的)，我們大多数非党的教員，学生，以及民主党派，从来也沒有被邀去征詢意見过。自从1956年以来，我們受了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偉大方針所影响，开始对于校务采取了一个积极过問的态度，但是由于傳統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过来的，我們能够过問的事还是很少。”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教授 吳景超)

“外語教研室团結得很好，值得其他教研室学习，因为沒有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付教授 汪同祖)

“我所提出的双軌一貫人民代表大会制，目的是代替党委制，而最終結果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領導，但以上同志否認了我提意見的目的，把我所說的三个前提也否認了，他們認為取消党委制就是取消党的領導，是否認無产階級專政，但我認為取消党委制是不是就是取消党領導的本身呢？一些人还不是很有說服力的來說服我。

假設党委制就等于党的領導，那就可以否認我的三个前提，我錯了，我要接受，但即使錯了也不能說我是右派；再假設党委制不等于党的領導的話，那末我的三个前提就成立，我認為前一个結論是不存在的，党委制是不等于党的領導的。

解放初我們实行过工厂管理委員會，后来是一長制，現在又加了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这都是党領導的形式，而党委制也是党領導的

形式，由于党委制是不等于党的领导的。如果有的同志根据錯誤假定也就不能不得出錯誤的結論，未免过早。

什么是党的领导呢？党的领导是‘正确給人民指出斗争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創立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定义，我第一次發言把党比做参謀部，比做吳用的作用就是說帮助，有人就問誰是宋江？有人已經替我回答了，有人說是右派作宋江，我沒有这个意思，我回答是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作宋江，很明显人民代表大会作宋江，不会是右派占上风的，所以党的领导是会有保証的。

有人問，斯大林說‘党是司令部，而你說是参謀部’我想这是不矛盾的，我覺得‘党领导是建立在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無限权威之上，沒有工人群众的真正信任是談不上党的领导的’，人民日报說‘党是社会主义的火車头，永远帶引着人民前进’，这是与我的参謀部沒有矛盾的，党之所以帶引人民前进，并不是因为有詹天佑的挂勾，而是因为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及忠誠的拥护，我們可以看出現在全国起来了一个反右派言論的运动，就說明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斯大林所說的司令部的意义就在于此。

斯大林的意識，是党对人民群众不應該直接下达命令，而是要通过群众組織，这与参謀部不是矛盾的，而不是完全象軍隊和司令部的关系，前者只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組織、人民代表大会，向群众下达命令，如果象軍隊和司令部之間的关系就会产生命令主义傾向——官僚主义的表現形式之一。

‘党的领导必須依靠人民群众自覺的努力，党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党認為只有群众包括党組織本身在內，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創造者’，这是党章的总綱中規定得很明确的。

‘党的一切措施的实现，必須通过群众自覺的努力，当然也要有党的领导，也要依靠群众’（党章第八頁）。

有人說，那对党就象个科学普及协会嗎？我說不是，党是通过一些組織紐帶，合作社、青年团、人民代表大会、归女会等来实现其领导

的。

斯大林說‘当然不是說党领导是代替苏維埃、职工会……等，党是通过一些紐帶來实现和巩固無产階級專政的，不通过这些紐帶决不会实现任何巩固的專政’（列宁主义問題108頁）。

列宁‘苏維埃就是無产階級專政的直接表現’，我国人民代表大會也是，可見我不是否認党的领导和無产階級專政。”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賀 安）

“人沒有不自私的，共產黨員是高級形式的自私主義者”

“黨員和党中央的一致性 is 抽象的，而差異性是具體的，越是發展差異性就越擴大”“我認為党的組織性紀律性會束縛个性的發展，党内不能出現文學家和科學家。”看過外国報上的法斯特訪問記以后認為“法斯特並沒有反对党，覺得他講一句話，比黨員講十句有效，但又覺得只有文學家才能這樣做”。

陶曾對××說過，“我考慮不僅是文學家而且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是否也一定要入党因为党的紀律性對於科學思考總是有些矛盾的，法斯特說得對‘我宁可自由地說錯話再受批評’。”陶又說“我現在考慮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否必需由一个党来領導，是否可以由兩個党代表工人階級，互相監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助教 陶文達的材料）

“每個單位不一定都要有党組織也不一定要有黨員。”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什么事都是党先決定，然后貫徹執行，党在制定政策時沒有群眾參加群眾怎樣对党進行監督呢？”“党只能在政策方面領導，黨員起模範作用，把權力交給人民，把黨員放在群眾中起作用。不要放在人民之上。”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達）

“党的領導變成党的專政，產生官僚主義。因為新的條件下不能採取新的辦法，還繼續階級鬥爭辦法，誰反對就是敵人。”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 曹達夫）

“黨的領導不等於領導一切，控制一切，實際上現在黨的活動已超出領導的範圍，而成決定一切的力量，我對黨的領導的理解和賀安（右派分子）一樣，就是要作參謀，靠正確的方針、政策指引人民前進，靠黨的模範引導人民前進。”對學校的黨委制也極力反對，他說：“對黨派退出學校（右派分子哭聲觀點）……假若黨現在退出學校了，……會是歡迎的，高興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資料員 張紹鴻的材料）

“中央省級的民主黨派人士批評黨的領導對他們的安排多，照顧多，幫助不夠，信任不夠，也許有人認為縣以下的機關學校會好些吧！懂內幕的人知道他們近年來，他們所受到的遭遇更糟糕，黨外人士既沒有對他們作好適當的安排和照顧，也沒有給他們予親切的關懷和更多的信任，以一句南下閉下來的同志的話講到處是冷若冰霜，大有路愈走愈窄的苦惱。”

“……很多同志當他們還沒有入黨的時候工作踏踏實實，如果一入了黨，不少的同志就會鼻子牽得進條驢，處處發號施令，只要是個黨員說了才算話，往往自認為（黨員＝黨委＝中央＝毛主席）……但是既然是一區或一科之長，黨委研究工作，你不能參加，在鄉里支支部開會研究工作不一定找你，如果你對某些工作提出不同的意見，往往會遭來一連串的麻煩。”“舊知識分子＝自高自大＝瞧不起工農領導幹部＝反黨反領導，背起黑鍋，戴上了鐵帽，誰還能直得起腰來，縣政府對區鄉一級領導是往往三年二年也不召集區鄉長開會……。某一科長說得更生氣，‘黨對我輩是利用，限制、排擠、改造’，這個老兄說話是有些沖動了！政治地位也是這樣，經濟待遇也是因果關係聯著的，雖然三年二年有一次級別調整，在大胆破格地提拔幹部方針下，其實

提拔的干部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党员，那么‘职薪’就该相称，20—30%的百分比全给他們还不够分配呢，有人說：‘现在是憑党証提职，憑党証享受，这位老弟說得不够冷靜，也有人說：‘党、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光芒万丈，非党干部前途暗淡無光’，这位先生也过于悲觀了，在这里我未征得說这些話的同志的同意把他們的話公开了，是應該向这些同志道歉的，不过我的动机想借此說明一个宗派主义的問題。”

“在执行干部提拔政策中很多地方是不公平的，先党内后党外且不說，而有党的领导干部中个别的为了追求成績数字达到被领导賞識往上爬的目的，不擇手段違犯政策餓死人命的，只要完成任务，不但受处分，仍能为登云梯步步提升……，有人在背后深痛絕惡地說（他自己說——編者），“官僚主义升官的阶梯疑有人民的血迹”“我絕大多数在农村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好的一方面……，可是也有他的缺点一方面，文化程度非常低，因而对新事物缺乏应有的敏感性，看問題过分的固执而帶片面性，政策水平較低，往往憑着一股勁猛冲猛打，要提高这些同志的水平，必須有計劃地成批集中学习。”

“宗派情緒也很严重。工农出身上無才也提拔，出身差一些的就排斥宗派情緒是个禍根”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梁彦彩）

“今后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不一定要党员领导，应叫党外人士领导，只要貫徹党的思想即可，非党员有能力的可以讓他們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束洪濤）

“班报由党支部领导不合法，思想陣地也全讓党給壟斷了。”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王鴻章）

“三害根源与党的领导社会制度一点关系都沒有嗎？至少是一个可能性，至少是客观条件。敢于驕傲，由于是党员，到底有些什么关系？”

“社会上为什么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这些与党的领导有关，管得太死，一切听命于党员。”

“大政方针通过党的领导我承认，但每一件事都通过党支部，我搞不通。……”

“工作一定要通过党支部，积极性很难发挥，这样就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1)全党应考虑一千二百万党员是我国的主人，还是六亿各族人民是主人？(2)领导者跟恩赐者、解放者、主人翁之间的本质差别何在？(3)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领导党、执政党又跟个别党员间的区别何在呢？”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员 梁其璞）

“党的领导，执行、监督是不同的，党在方针政策上领导，方针确定后由行政执行，党进行监督，执行中党起参谋作用，群众应对党所确定的方针进行监督，使党在政策方针的执行中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行政领导是由上级任命，但要考虑群众意见，行政领导对各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党的监督。”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韩光远）

“党的机构太大……结果工作不深入，工作人员过多，干部待遇高，政府拿出经费给予开支，这是不合适的，应该从自己内部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肖 楓）

“党的这种执政地位（统治地位）的事实本身就可能使我们某些党员害怕新的和现有的意见不一致的事物和人。甚至对他们采取了扼杀的打击的态度，使我们这一部分人成为怕上的腐朽的保守力量。这是企图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我这样说统治二字是我们很多人

都看惯了反对反动統治，甚至有些人还会給我一个罪名为有反动思想情緒，那我尽願和这样的現象习惯势力挑战而不願放棄这二个字。”

“党叫我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又成为什么样了呢，真是可笑。”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濮仲文)

“应效仿南斯拉夫的职工代表大会，此时，党委起參謀部作用。只要党的政策正确，职工会就能通过，党的领导就能貫徹。”

“党委的权力范围应受到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荣 斌)

“党政权力过于集中。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委。应该把权力集中在最反映人民意見的形式中，如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学生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等，不一定都集中在党委，否則就产生个人崇拜，干部思想腐化，宗派主义。”

“对干部的使用重政治輕业务”“宗派主义使很多工作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积极性不能發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光济)

“沒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为什么不成？中国什么时候有的，共产党什么时候有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 海)

“如通过竞选也可貫徹党的领导，党的口号符合大家要求，大家可以选党，党就可以居于领导。这样做对党、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均有好处。如党内發生組織路綫分歧，对国家影响很大，如把党的权力变为真正的人民的权力，党内發生問題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就小了。”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張祖文)

“执政的是共产党，监督检查的也是共产党，这就有包庇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俞国亮)

借口反对简单逻辑，来反对组织领导，他说：“有些人逻辑很简单，如反对领导是反对组织，反对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对国家，反对国家就是反对人民，这样推是害人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王福沛的材料)

“青年人要有伟大的性格，我们都是在共产党的囚笼里长大的，个个庸碌无奇，无主见，僵化了。青年人应过骄傲自豪的生活，不要迷信盲从，青年人起来粉碎囚笼。”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周绍杰)

“共产党本身是好的，为什么他的党员那么糟呢？(一些党员质量差，本领不大，对党事业不忠心闹地位)中国也有个人崇拜如毛泽东思想。我提意见有点火情绪，我们报社的同志来时，我领他看学校的大字报叫他回去起骨干作用，文汇报要把整风搞到基层去，我有些同意。我的动机是为了削弱党的权力。党的权力太大了，这样容易犯错误。”“党和人民的矛盾之一是政治方向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凌国星)

“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代表群众利益”，“党的政策应该经过群众讨论，让人民自觉行动，否则会产生命令主义”

“党不懂科学，怎能领导科学呢？”

“党就是给人民出主意，而且一定能为人民接受，这种说法正确地反应了党群关系。”“出主意当然可以，但接受与否是另一回事。”所以他同意右派分子贺安把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比作吴用和宋江的关系，他说“党的意见正确人代会就能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指能在政治

上代表人民利益，實現領導基本上是說服教育，不能有組織命令”。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學生 李民堂的材料）

“黨是一個為私利的宗派主義集團。不要黨的領導也可以進入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唐 廉）

黨的領導作用應多通過黨員的模范作用，而實際中黨員的模范作用很少，大多數黨領導（班黨支部）包辦一切，行政班長、學生會青年團無關痛癢，說話不起作用，同學們也不重視，只知重視黨的話，這是在工作中包辦一切造成的，沒有發揮行政、學生會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 大字報）

“黨內意見不一定正確，正確的群眾也不一定接受，因此要有中間環節。”他不同意縣委直接領導縣府，並以此來支持賀安的意见。

他說黨不要“明中領導”，而要“暗中領導”（他的暗中領導意思也就是從前台退到後台）。他認為黨暗中領導，不直接發號施令，非黨人士就有权了，少數人說了算的情況就可以改變了，他還說：“我對黨的領導不感興趣，我對黨的直接指揮，特別反感。”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曾紀梅的材料）

“革命時期離不開黨的領導，革命以後，黨應退到政府的監督作用，把政權交給人民。”

“要解放處於蒙昧中的受苦受難者，必須先作一段堅苦的啓蒙工作，一定要啓蒙，為此，首先要作周密的調查，然後……以達到……”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王憲文）

“現在黨的統治應該結束自己的訓政時期，把政權交給人民。”

“黨的統治建立於1949年，從1949—1955年底，統治是必要的，今天黨應該結束訓政。應該把黨的統治去掉了。還政於民，實現真正的人民

当家作主，人民政权万岁！”“党现在还一股劲的加强统治，居然要实行党委制，请别加强统治了——老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楊文极）

“党是食利者，党打天下有功，治天下是否有力呢？”党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领导他表示怀疑不满，“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我国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这是对民主生活的不利。”“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也可以走社会主义。”他主张“各民主党派提出各自的对国家的决策的纲领，参加讨论，谁好就要谁的”。他要求“两党竞选执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达孝的材料）

“没有共产党，人民也不会卖国，工人有枪，也可以自己起来斗资本家。”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王鴻章）

“党的领导，主要通过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来领导。”“组织领导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内容的，因此党也不应有组织领导”。“党为了保证组织领导，一定要把党员放在领导岗位上是不对的”，“组织领导是一个手段……把党委制看成组织领导是不对的”，“单纯的党委制是有缺点的，如我校现在方针不明，是与过去未发挥大家力量和党的包办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洪維政）

“为什么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没有就不行吗？”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王树才）

“党应当继续贯彻民族的精神文明，有人说共产党在实行愚民政策，我不同意，但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拿民间文学来说，在封建社会里它很丰富，而现在反倒没有了，这说明人民的思维停止发展了。”

“現在党有点反对独立思考，在阶级斗争中，盲目服从是必要的，現在就沒有必要了。”

“党的思想领导应当正面些……我国人民生活不如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好，这就可以公开告诉人家嘛！党也不願講。”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岳文伯）

“改进检查、监察机构，不要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检查，这样很有包庇的可能，要吸收劳动群众参加监察院。”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取消党的领导由誰领导？我以为包含兩点：（1）我国建設由誰领导？这由竞选出的代表领导。以做到党政分开。特別工厂、学校，完全可不由党领导。（2）国家由那个党领导？我以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一定由哪一个党来领导，可由人民选出的政党领导，但这与过去的独裁就不同，有些党（如共产党）可在选举中占绝对多数，但也未必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党领导，只有保持‘三害’。只要共产党在参政中提出自己的綱領，得到人民拥护，人們就会相信，代表中国先进阶级的共产党、过去将来都有重大作用，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正确的。（但現在社会主义已基本上胜利）

几年来，由于共产党领导造成的后果說明这些：

（一）1949年以后，党内‘三害’逐漸增長，例子随手可得。

（二）国内公民生活水平相差过分悬殊。在工人阶级内部，生活水平相差也太大。我认为不能相差太多。如果一个农民知道將軍元帅的薪水，一定会有意見。

（三）提拔干部重德不重才，如我校即有。

（四）共产党在胜利面前冲昏头脑，表现在建設上好大喜功，如第一汽車厂，这都是党不实事求是。

（五）党干部作风越来越坏，这与解放战争时的干部相比，差得远。我相信，在延安时的校長，决不会象今天的校長。

(六)党员的生活越来越腐化,你可问问你身边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的比重在他的脑中,占大多数。

上述六点并不是说党在危机中,只说明由于专政,已有变化。但我认为党在改造前的领导是有必要的。上述的例子是阴暗面,而它在成长。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矛盾将会增加,而取消党在各部门的领导就能解决这一矛盾。

我们应走社会主义。我认为国家应由选举的政府来领导,以取消党在各部门领导,来促进社会主义。

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胜利。

我的基本论点:阶级利益决定政党有局限性、一些非对抗的阶级必须互相协商。领导者具有局限性、所以各阶级的一些矛盾可以激化。最好的办法只有竞选,而竞选可以消除‘三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雅春)

“我国所有制是公有制,属于大家,就应该由大家管理。象买电影票,我们要看电影,托一个人去买票,买回来,大家要求不一样,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解决,一是抓纸球,一是分配。管理国家当然比这复杂的多,但是,也可以把权力交给人民,由人民管理国家,现在国家制度不是人民执政,而是党专政,全部权力在于党,而且还不是整个党,只是党中央,只是政治局,现在国家制度是党决定一切,通过组织贯彻,手段就是说服,说不服就压服,压不服就坐牢。

在公有制基础上,我们应该吸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好东西,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好东西,把权力交给人民。

那么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呢?我所指的是真正的领导:一方面不是挂空名;另一方面,不是包办代替,一党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也不是主观要求能决定的,而是客观提出的。国民党人民就不要它领导,将它推翻,今天我们也不要民盟来领导,而要共产党来领导,这就因为党的口号为群众所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把它的口号变为群众的要求,使工人阶级自觉地接受来贯彻。这就要求党的口号须与群众的要求相

結合，真正代表群眾的要求。……”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說，可以有多种形式，除此以外，現在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黨專政，黨說了就算。就今天說，黨領導這個專政是必要的，但也不等於黨專政，還不能就今天的情況作出論結說將來都需要一黨執政。這就為時過早，因為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革命，將來他們是否要由共產黨執政，把全部權力交給共產黨，這就不一定對。象波蘭，和統一工人黨同時存在的還有農民黨，它的影响權力很大，比我們的民主同盟要大，隨着將來革命形勢的發展，會出現許多新的形式，如兩黨制等未嘗不可，採用什麼形式，應由人民決定。我們現在就應當將權利交給人民。……”

“黨權問題。自20大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進入了新階段，同志們對我前天提出的問題的分析有許多我很同意，象吳思偉提出的要從歷史觀點看問題。20大以前，蘇聯處於黨權時期，這在當時是必要的，這裡可以發展一下黑格爾的話。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末，我們可以說，凡是過去存在過的，都是必要的。蘇聯當時的黨權，我國解放以來的有許多制度，也有它存在的必要，說必要，是指它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集權政治在歷史上也存在過，如雅各賓專權，現在的埃及為了鞏固革命果實，集權專政都是必要的，但根據今天國際共產主義的發展和當前的國際形勢，對過去的政治制度須加以重新的估價，並加以改革，否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不能發展。

我們現在的統治可以說是中世紀的統治方式，那時是神權、君權，現在是黨權，黨說了就算。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專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黨對經濟建設的領導，單憑政治，不問業務，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蘆 鎮）

“形式上是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一党包办，这是现在还能看到的東西，青年团的干部是共产党员，学生会的主席、部長是共产党员（当然也有些青年团员和非党团人士，这只不过是点缀而已），党总支那当然是党员了，一切大权都控制在党的手里，形成了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党员以党员自豪，团员以党的助手而骄傲，所以出现了如今的‘三害’，如不彻底改变这种带有遗传性的顽固的统治基础，不以广泛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虽然谦虚，但也避免不了将来出现四害或多害，以至不可设想的后果。

我赞成党的领导，但反对党的统治，这样的统治虽然不同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统治，但究竟还是统治呀！我申请入党，当然是赞成和拥护党的，但我做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绝不能粉饰现状，我见到过由于党团宗派主义‘党员一家之主’统治的恶果，现在形势变了，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了，人民觉悟提高了。

党的‘训政’时期，包办代替的作法应该结束了，共产党代表人民，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权万岁！

人大机构庞大，但一党掌握，其余的人、机构是合理的安排劳动力呢，还是觉着中国人口多呢？或干脆是党员起带头作用，响应党的增产节约的号召呢？

假若党愿意自绝于人民，继续坚持自己统治，那干脆就把学生会、系办公室……必要的组织取消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多没有实权的傀儡组织呢？

这样统治方便吗？我们相信一贯忠于人民的共产党会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这种统治式的领导的。这种统治式的领导，我认为已经过时了。

学生会本是一个学校的中心组织，但现在学生会瘫痪了，……我们绝不允许现今的这种局面存在！我们的社会应该醒醒了，虽然在战火中党拯救了你，但你不能永远放弃自己的领导！

你的优良传统在安静闲逸的生活中丧失了呀！我们齐喊，你应该发挥你的积极作用！！

遺憾的是黨現在還一股勁地加強統治，居然要實行黨委制，這是值得考慮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黨派，今天的統治已造成了三害後果，請勿再加強統治了——‘老爺’。”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政 軍）

他同意北大5302095 學號學生說的黨的領導有兩種方法，一是“行政性領導”，一是“教育性領導”（參看“看！這是什麼言論”）。“共產黨員進行工作時非法的由第二種領導（教育性的）跨進了第一種領導（行政性的），而這正是產生‘三害’的根源”。他同意賀安的“黨不能起司令部作用，只能起參謀部的作用”及“黨委的本身產生以黨代政”的說法，認為“現今一切按照黨員而不是按工人階級意志辦事”。“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化，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在掌握了經濟力量 and 政權的條件下，實行黨委制或者首長（黨員）獨斷，沖淡了群眾在歷史發展上的作用，使群眾很難制約社會的一切活動。黨員緊緊把握住生產物資條件。社會的主人實質上是黨員而不是人民大眾。應該是真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政權應屬於人民。”“工人管理工廠現在只是形式，因為黨委的領導使企業活動上表現為黨員的領導。少數人的權力過大，而且有很大偏見，群眾監督和制約力量又慢又少又不及時，而且容易造成超出思想和政治領導具有一切特權。”因此他主張“黨政應分離，分部門，要各部門的行家去做。可以考慮工人管理工廠、教授治校（非黨員）”。“廢除黨委制，一長制不會產生以黨代政。以一長制代替黨委制，領導者（不論黨員非黨員）進行領導工作不一定非得按黨委的決議辦事不可，否則就會產生以黨代政，章伯鈞等人也應按自己的意見辦事。”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胡仁生的材料）

“同學們，我們提個問題，以供大家爭鳴！

我贊成共產黨為我國執政黨，但政府是由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組織來的，許多民主人士擔任國家重要職務，實際上是有職無權，連

我校及小小的班級，共產黨也包辦一切，請問這實質上與國民黨一黨專政政府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黨內懂業務的人很少，很多學者都集中在‘民盟’和‘九三’。可以讓民主黨派輪流治校，這樣，還可以在各個黨派之間開展競爭。在學校以外，也不妨拿出一個省或一個市，讓民主黨派去管理，像印度共產黨在一個邦執政，並沒有改變印度的社會性質。”

（北京大學 左言東）

“對人民專政的法宝——再論愚民政策”

“誰說沒有把群眾當作群盲看，‘一切歸功於黨’人民無功沒出力量，不如所謂的群盲，很多人不但把人民當作群盲，而且為自私的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把人民變作群盲。你看一切保密你什麼也看不見，是否把人民變成睜眼睛子，你看借口報刊有一定觀點封鎖消息，以蒙蔽事實真相，以達分而治之的目的，……黨報和各黨組織許多做法說明‘愚民政策’不是沒有而是從上而下在各個領域內都存在着的，禁書禁報禁新聞禁聽外國宣傳……不必多舉，這都是向歷代和外國統治階級學來向人民專政的妙計。

‘三害’限制了民主，整風對人民要求民主，要求把政權真正交給人民，……

……所以愚民政策雖未明文規定，但却是各部門三害分子向人民專政的基本政策之一。

多麼高明的政策啊！這是所有統治政策結晶之一，其效果之顯著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文字獄也不能相比，真是：

‘把你眼睛先瞞住，叫你向東不敢西，說聲危險虎來了，你看不見還逃跑不怕被虎吃。’

其方法之巧妙使你受了騙還蒙在鼓里，遠勝過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反革命的靈巧隱蔽，真是：

把好的东西都藏起 留下就是最好的，
說起来合法又合理 还永远谢他好心意。”

“‘党的领导不容分割’这不但早已用于实践，而且是不容怀疑的真理。

但我产生了以下問題：

1. 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不管好坏，不问情况一定是党独占领导，既不讓人民选择更不許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会便利宗派主义产生嗎？

2. 以同样形而上学的推論而認為党过去是正确的，現在是正确的，將來也就永远正确。正确的只有一个，所以沒有能和党竞争的理由，肯定一个党才能领导，不存在竞争問題，但正确从来不怕和錯誤斗争，是怕分割领导，就使人民怀疑党的正确有問題？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錯誤現在还存在分歧，將來也可能有犯錯誤的时候，不讓竞争，排斥異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是不是真正大公無私。党永远有不可动摇的领导权，不管現存领导，認真不認真工作，犯不犯錯誤都穩坐泰山，这会不会成为終日飽食無所用心的官僚主义的培养基础。我怀疑党將來是否还会正确。是否会向李自成和拉科西看齐，不是嗎？現在三害就比1942年多些。”

（北京大学 蔣兴仁）

“我不止一次听人說出‘一定要承認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承認’？

1. 有兩種性質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傳鼓动，發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沒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證的。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沒有把第一种领导給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論多么先进也沒有这种领导的权利，有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否定行政工作时，应以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接受他們的领导，但不能

要求人民群众对它的领导一定要服从，党领导得好，人民群众自动会接受，领导得不好人民群众要起来反对也难免的，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3. ……党员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经泛滥得很厉害，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为什么共产党会出这许多毛病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现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了。共产党一贯的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以致共产党作了好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错误。”

（北京大学 王存心）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主人是全国公民，党只是一个执政党和领导阶级的先锋队的地位，参与国家生活。它可以实行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于各项具体工作可以交给称职的中国公民去作，而不应该包办一切，到处发号施令把党片面的加在任何事物任何人的头上。在这里党员与公民应有同等权利，而不应该把党造成一个官运享通的官僚集团和特权组织，严重的脱离群众，而不是群众是否不信任，而是人民是否信任党的领导。……”

“党如何在国家中实现其领导作用，这关系着我国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当然在革命胜利初期，在肃反完成前，实行党的军事和政治上的统治，是保证革命胜利的根本环节，但随着人民觉悟的提高，和平建设生活的实现，党在国家生活中应该退到一个适当的执政党的地位，而不应该把党的权利渗透到国家生活的每一方面，在人民群众中，更不应该把党和党员提高到唯心崇拜的水平上去，以至造成党员的骄傲自大包办一切。在我国共产党员和‘官’成了同一概念。……”

“党的宗派主义严重程度是空前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没有这样危险过（后来改成，党的宗派主义是严重的——原编者注）事

实际上已發展到一黨包辦一切的嚴重程度，黨和團支部更是包辦一切，一種似是而非的政治氣氛逼迫人心，在全國公民中難道只有共產黨人才是好人嗎？難道只有共產黨人才能管理自己的國家嗎？隨着人民覺悟的提高不應該再只是為了團結的目的，為了照顧一下影響而給‘民主人士’（這已成了一個臭名詞）一些官銜，而實際只是黨員支配下的傀儡，如果承認黨員只是少數，那麼就應該放下黨員們的老爺架子，不再處處專斷，以主人對僕人和嫌疑犯的關係對待非黨人士，可笑的是這些愚鈍的得寵者，早已失掉了共產主義戰士的氣息，因此黨不應該在群眾中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要謙虛，而應該與群眾共甘苦，隨着社會的發展，人民覺悟的提高，黨相對於人民群众的先進時，就會降低，如果黨員的思想感情已經僵化，問題將更顯然，例如某些老黨員大老爺們連自己所代表的階級意見都聽不到了，天天是山珍海味，年輕的老婆，流綫型的小汽車，新黨員小老爺們也漠視人民的要求處處專斷獨行。”

（清華大學學生 馬 琦）

“政法界問題很大，很嚴重。政法部門的領導是宗派主義，高教部的領導是教條主義、司法部也有一部分同志是教條主義。”錢端升認為，改變這種現狀的出路是“開放”。對於所謂“開放”，錢端升作了三方面的解釋：（1）“開放”領導工作崗位，讓非黨人士當“頭兒”，他說：“政法界象我這樣高高在上的人只是鳳毛麟角，”（2）黨要向高級知識分子“開放”，他說：“樓邦彥，于振鵬在政法學院申請入黨多年，我還向黨說過，但就是沒有吸收入黨。”（3）“資料要開放”他說：“過去有許多材料是按黨內系統發的，我們看不到；今後應培養這樣一種習慣，把材料給我們看。”

（北京政法學院 錢端升的材料）

“黨與非黨的牆的問題：牆還是雙方壘起的，但共產黨是執政黨所以要負主要責任。我覺得黨的基層組織直接與群眾接觸，意見多是自然的，但是否牆就是幾個黨員壘起的呢？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我

認為牆是中央黨的基础，各級黨委參加建造，而一般黨員只是搬搬磚提提水而已。

從中央開始就有以黨代政的現象。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發聯合指示影響國務院威信，使有些黨員感到沒有中共中央的指示就不行。有的應該由國務院發的指示而由中共中央發布了。”

（天津大學 林錫恩）

“黨的政策根本問題是：

1. 政治上：沒有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

2. 經濟上：工農業比例不恰當，統購統銷是因為農業出了問題沒辦法才採取的。

3. 文教上：教學改革是由於教條主義地學習蘇聯，致使學習質量不高，不如解放前。

解決問題的方法是：

1. 黨應根本地改變政策，給人民更大的民主和自由，發揮人代會的作用；

2. 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的作用，與各民主黨派共同協商政治上的方案，同意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3. 各民主黨派在政府中應占更多的席位。

4. 黨不要插手管理經濟和文化。只要規定方針和政策，工廠由工人委員會管理，高等學校由校務委員會管理；

為了實現以上要求，應該採取以下的行動：

1, 廣泛地寫大字報；

2, 聯合簽名；

3, 請願，打擊保守勢力；

4, 希望出現社會民主黨。”

（北京石油學院 叶惠民）

“黨的領導是相對的，因為黨可能變質，對黨的政策不能絕對的，

百分之百的信任，因为党說過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党在历史上犯过錯誤，現在也有些缺点和錯誤，所以只能基本上不犯錯誤，所以不能証明党的领导是絕對的，对党的基層組織领导的正确性，信任还要差些，因为基層的馬列主义水平不如中央高。”

（北京矿业学院 李都华）

“学校只要一个党委会就可以了，支部可以不要，青年党员作系主任沒有資格。”

（北京矿业学院 湯伯森）

“革命胜利后，反革命肅清了，是否还需要一个坚强的党来领导？可能并無必要，可以不要党，只要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而他們也就是政府领导人，他們是很好的馬列主义者，各級政府也由好的馬列主义者领导，人民也拥护政府，这样党的支部組織就沒有必要存在了。”

（北京矿业学院 于立仁）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代，無論大学或中学，都有国民党、三青团的組織。这是为了控制思想，实行所謂‘党化’教育（实質是法西斯教育），有不少具有特殊任务的‘党棍’和‘职业学生’在学校里橫行霸道，……

回忆过去，看看現在吧：共产党、青年团同样在学校里有它的組織活动，用人的原則是：‘不问能不能，先看党不党，所以学校的要害都是共产党员鎮守着’。”

（西安师范学院 梁益堂）

“一，党派組織本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現在我国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結束了，党派組織（包括共产党在內）是否还有必要繼續存在，特別是說說，共产党的领导似乎更無必要。

二，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前，为了攏絡人心，争取群众，与群众同

甘苦共患難，頗得人民擁護；現在天下已經打下來了高官厚祿，與人民越離越遠了，就是繼續存在，還能領導人民嗎？還會繼續得到人民的擁護嗎？

三，由於共產黨的存在，就有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及像我們這類白丁之分。前者自認積極進步，高人一等。因此階級雖然消滅了，但人與人之間，隔閡卻加深了，造成不和現象。這樣看來黨的存在，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 巨 丁）

“過去，常常是問題經黨內研究后就做出了決定，和黨外同志商量時常常就這些結論直接搬出來，而不能真正協商，這種作法我認為同樣是全國性的。這樣有兩點不好：一點是黨外同志積極性不能很好發揮，因為結論既已‘內定’，商量提意見客觀上起作用不大，久而久之意見也就不提了。另一點是這樣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因為黨內研究究竟人數少，黨員一般分析水平較高，但情況了解畢竟較片面，特別是常常由於黨員身分的影響，情況的了解，尤其是反面情況的了解，就比較差。”

（北京石油學院 李崇杰）

“要堅決清除這個（指黨支部——編者）黑暗的角落，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黨支部，在平時一點也看不到他的作用，好像沒有黨支部一樣。”

（北京政法學院 吳貴知）

“這很說明問題，叫黨支書為老板，就把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說出來了。”

（北京政法學院 付成章）

“政法學院黨的領導是暴力統治，政法學院太黑暗太殘暴，沒有民主，個人專斷。”

“根本談不上無产階級思想領導，那是用山溝里的方法辦大學。”

（北京政法學院 王 革）

“我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黨員獨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過是形式而已，民主黨派有職無權，實際上是一黨專政。”

“無产階級專政我不否認，但我反對共產黨領導的無产階級專政，無产階級專政不一定要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是全国人民的國家，不是共產黨的國家。呼喚改變民主黨派的地位”。“無产階級專政一方面是無产階級的領導，另一方面群眾積極參加。這就是說，群眾也可以領導，可是實際上屬於領導地位的都是黨員……。”

（北京政法學院 王明欣）

“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很對，因為中國這樣大，共產黨領導不了。”

（北京政法學院 付成章）

“解放後是改朝換代，換了個統治者。”

（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

“把黨的宣傳工作部門取消與行政部門合併，黨只搞黨內工作。”

（北京政法學院 包卓靖）

“班上應該有兩個黨支部，一個是共產黨，另一個是民主黨派，這樣，共產黨支部就不會操縱要求入黨的青年了。”

（北京政法學院 匡紹毅）

“有了完備的法制……可約束共產黨的領導。”

（北京政法學院 侯振華）

“在國家中起重大作用的，不是黨而是知識分子，因此應改變那種過去不信任不重視知識分子的情況，大大提高他們的地位，特別是

在高等学校里，应该由高级知识分子来代替党的领导。”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党支部对学习不重视，大力用于注意坏的方面，党支部在这个面前了解那个，在那个面前又了解这个，这样经常造成同志间的怀疑和不信任，破坏大家的团结。”

（北京政法学院 陈邦剑）

“在中学时，班上没有党支部，工作作的很好，现在有了党支部的领导，工作都作糟了。”“调干不能领导青年同学因为性格不相近。”

（北京政法学院 田维刚）

“官僚主义严重，很多人受迫害，因此也是很痛苦的，我就是个例子，两年来没有得到党的关怀，一些同志孤立我，打击我。又如广西的饿死人事件。”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学校面貌丑恶，情况令人愤然，上自院长教授，下到学生工友都饱受三害流毒。”

（北京政法学院 王文庆）

“党支部的先生们，你们作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脑袋里根本就没有你们这个人的概念，（指党员——编者）。我脱离了你们（指党和集体——编者）也能生活，走着瞧吧！将来报纸上见……”

（北京政法学院 黄文成）

“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进步，但这些不能完全归在共产党的功劳上，而是靠劳动人民干的，过去统治者太坏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没发挥，共产党发挥了人民力量，若不要共产党换个党派可能做

得更好。”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党就不見得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应该提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党为人民服务就跟着什么党走。过去我很信任党，但现在看到人民鬧事愈来愈多了，因而不信任党了。有党派存在，党派之間都是勾心斗角，因而今天的党派間也是勾心斗角的。”

(云南大学 一个学生)

“三害相当普遍和严重，例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外人士有职無权，对本国專家不信任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积极性受压制等等，都和党权过大，民权过小有关。因而要縮小党权，扩大民权。肃反中斗錯了許多人，当时沒有人敢持正义，主要是人民缺少正当的自衛的权力。三害的根源：主觀加权力，要除三害就要縮小党权，扩大民权。权力的利劍应当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才不会遭到不幸和痛苦。(从斯大林問題中得出的結論)。”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党的工作太神秘，鬼鬼祟祟，使得人心惶惶。政治工作就是卖狗皮膏藥，政治工作誰也可做。党对青年没有什么帮助，×××（党支部）象土地爷。为什么非要党员科長领导，他不懂业务应当調离工作，工程师調走可不行。我不同意按党总支的布置进行整风学习，有意見可以自己提。领导上对待干部都是宗派主义。”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职员)

“系秘書專政，教授的命运掌握在助教手里，講課好坏，思想如何，接那些人，都会反映汇报，又常走了样。教授在表面上是领导助教，实际上助教很可怕，把他看元朝的‘家鞑子’，怕反映少接近，助教不听课，但下命令，……。”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杜建初)

“共产党的領導权不应用法律規定，而應該是誰有能力就誰來領導。我們的憲法不應規定共產黨來領導中國人民，而是應該由大家來選舉。

共產黨只能領導軍隊、法律，假如領導其他，就會產生宗派主義和官僚民主。”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魏征成）

“黨的領導，絕大部分不懂業務，而又不虛心，不向黨外同志學習，並且自高自大。”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高時瀏）

“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共產主義事業是全體人民的事業，黨團員不可占為私有。黨來領導，我竭誠歡迎，但黨外人士就沒有有一個有才干當付總理的嗎？當然非黨人士有當部長的，但請問，有幾個有職有權的？……他們的圖章，大概比他們本人重要得多。……國事座談交給大家來辦，不可偏勞少數黨員。用人要以德才著眼，‘黨籍’和‘黨齡’只能作為參考，否則非黨人士永遠有作客和被利用、被監視的思想。這樣埋沒了多少人才？國家受到了多大的損失？……”

“黨的專職幹部太多，他們工作美其名曰‘思想領導’其實是專門整人和監視人的，黨群間的‘牆’，多半是他們砌起來的。”

（同濟大學 張稚微）

“每一班、小組，不一定非要有一個黨員，假如這個單位，群眾比黨員的理論水平高，能力強，就可以不要黨員來領導，群眾也可以領導。”

（俄語學院 周 群）

“群眾組織可以拒絕黨、團的領導，如果黨、團一定要領導，就是不民主。”

（俄語學院 譚紹乾）

“在無产階級中，在党内，在人民群众中都有先进和落后，所以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可以領導，即以此代替党的領導。而大小职务都安排黨員担任則是宗派主义。”說我校（指俄語學院——原編者注）黨委从楊崗起开始腐化了。写大字报反对少数黨員把持学生会，說黨員，学校与高教部一鼻子出气，不能解决同學的問題。在欢迎伏老时說，黨員被組織上分配在队伍中監視群众，說本班黨員全是教条主义，是十八世紀的黨員，罵积极靠攏党的同志是党的狗腿子。

（俄語學院 江維城的材料）

“應該讓所有的党来竞争，誰事情办得好，誰就是領導，又不一定要共产党領導。

叫人家說話的是共产党，不叫人家說話的也是共产党，真是厉害。

只要人能干，私生活犯錯誤沒关系，共产党高級干部也不例外。

其实，这些老干部的历史任务已完成，應該下台，讓年青一代干。他們再干就变成絆脚石了。”

（俄語學院 文啓塵）

“流沙何所写‘草木篇’中的仙人掌是反映了现实；我想推翻共产党，独霸全球。……要实现願望，須長期等待。”一方面挑撥党群关系，另外从党团內瓦解。

（云南大学 朱祥亨的材料）

“我早就有远大抱負，解放前我就想推翻国民党，解放后我又想推翻共产党。我考查了階級力量，农民要求土地，這個問題共产党已經解决了。工人，共产党抓得更紧，資产階級力量小，知識分子又怕死，因此‘革命’条件不成熟。”

（云南大学 刘文信）

“民主牆(指云南大学的——原編者注)出現后，我又担心，又高兴。担心的是共党政权穩，你們这样吵嚷难保将来不遭整；高兴的是风波刮得这样大，現在总可以削弱党的領導。”

(云南大学 侯宗培)

“由民主党派分区执政或輪流执政有什么不好之处。”

(北京矿业学院 卓景星)

“共产党不能再專政再統治，过去革命时期，工人可以牺牲民主，政权集中在工人階級政党手里，革命胜利了，政权必須交还自己的階級。

宪法只規定了工人階級領導和以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沒規定共产党的領導。”

(北京鋼鐵学院 徐繼和)

“現在毛主席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洪秀全一样，由武官們掌大权。

文艺上的一切錯誤，都要归咎于党中央宣傳部，都是党中央文艺方針执行錯了。……

国务院仅仅盖盖章而已，完全是什么都听共产党的。”

(北京鋼鐵学院 張存根)

“(1)沒有共产党領導，也可以建設社会主义。

(2)党和毛主席不可能沒有錯誤，只不过沒有揭發出来，譬如斯大林問題一样。

(3)黨員都是鉤心斗角的人。

(4)对党不能完全相信，不能盲从信任，对党不能感情用事，应当理智一些，对党提意見就应当要罵个痛快。

(5)人生以資本家的生活最为幸福。”

“关于党的理論过去學了很多，但党說一套，做一套，但不按党章

和过去的理論办事,所以以后不再盲从党了,要独立思考問題。”

(北京鋼鐵学院 李吉夫)

“党政领导思想水平跟不上形势的發展,仍然用老一套的工作方式方法,騎在群众头上的上司,或官派观念和作风。

几年来有不少投机分子,包括一部分教师和科学家在內,利用察言觀色,奉承拍馬,夸大汇报手段,蒙蔽党委,以达到其上爬的目的。”

(北京鋼鐵学院 郭楠)

“党处理事情太严酷,只求效果,不講交情,靠近党吃不消,党集中太多,紀律太严,大的原則政策都上边中央几个权威人士决定的,中央权力太大,在現制度下党的权力已大到可怕的程度,它可以左右一切,沒有任何一种团体和社会力量能与之抗衡。

能进行监督,这样就只靠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好心办事了,……党的工作也是生硬的貫下来的,党只信任党員和积极分子,宗派主义很濃,工作包办太多,对周圍的群众不信任,認為是死落后,而积极分子是唯唯听話的人。”

“在現在制度下,共产党的权力大到可怕的程度,它可以左右一切,沒有任何一种团体和社会力量能与之对立,能进行监督,这只能按中央人員的自觉的好心腸办事情。

党的工作是硬貫,执行者不能独立思考,盲从(指积极分子——原編者注),我們的命运都掌握在別人手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北京鋼鐵学院 章萼飭)

“現在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爭論,全面的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环境中苏醒过来。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它是否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則是另外一个問題。共产党只应当有爭取领导权的权利,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北京大学 严仲强)

“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其中有共产党的控制，这样能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发挥权力的作用吗？人代会怎样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北京钢铁学院 沈浩然）

4. 誣蔑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和中央领导人

“教条主义产生于党中央”，“党中央的委员大多在教条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如果在思想上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那是奇怪的”；“一切方针、政策、指示、原则都是党中央发布的，党中央的政策就是东摇西摆地发号施令，使下级干部、群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结果只得强迫命令，所以下级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其来自党中央”；“苏共有错误，中共不能没有错误”，“党中央的政策不一定是正确的，下级干部不一定要执行”，“犯教条主义错误，党中央应作公开的自我检讨，不能推卸责任，责备下边，而自己反以辩证法来掩饰错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中央政策正确，下边执行的不好，是不对的，这是中央对农民政策问题，有些情况中央是知道的，只培养典型来宣传，对坏的便不提，对‘好孩子’照顾很多‘丑孩子’一点不管。对这一问题中央没有纠正。”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林忠仁）

“党中央政策很好，就是下面的干部实行的不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员 崔志敏）

“党中央是正确的，但各级党组织不一定是正确的”；“党的组织是正确的，但党员不一定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焯）

否認黨基層組織作用，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時提出，黨中央是100%正確，但對基層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黨組織是懷疑的，在整風中提出：“基層組織不掌握黨的政策，水平低，執行政策有偏差。”認為他家的地主成分長久不變是社幹部抱私人成見。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張康毅的材料）

“黨中央的高級官員們：

你們為什麼這樣神秘，為什麼不過渡中南海？來听听‘字紙簍’的呼聲和‘萬金油’見見面！？”

（中國人民大學 高大炮）（大字報）

“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工农出身的不多，都是知識分子，因此是知識分子領導，不是工人階級領導。”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最近和同學們辯論“民主”這個題目，我感到吃虧：

第一、和他們辯論損失了我的人格。

第二、他們用彭真來吓唬人，其實彭真不還是人類歷史上不足道也的小卒，可能會犯荒謬絕倫的錯誤。他們仿佛找到了靠山，這只能說明他們在事實面前是何等無能，對真理是何等胆怯（原為“却”字——編者）！”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李 德）

“賀龍靠一把菜刀起家，根本不懂外文，也隨總理出國。”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周揚為中央的宣傳副部長……沒拿出象樣的作品，只是接接外賓，作開幕閉幕詞等等，只是靠黨員吃飯。”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楊森達賴）

“同志們，讓我們再來回望一下那些高貴的首長，那些高貴的領導吧！

他們吃得飽了，肩膀也寬了，他們的身體顯得特別笨重。

因為官僚主義已經形成，他們出門必須乘坐汽車！

連同他的孩子和老婆，有限的辦公時間簽字吸煙！

看來這也非常麻煩討厭！不問德才如何專看是否黨員！

我想這種制度只有在西醫才能看見！

共產黨同志！領導同志！

你們生活和農民生活差得太遠了。你們住着樓房還想着療養院！可是你們是否知道還有農民草房漏着天，你們已經漸漸地漸漸地腐化了！

你們已經漸漸地漸漸地把農民忘了！

共產黨同志你怎么了？我還記得你們穿着補綻衣服。”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向春）

“中央應當公開承認在黨國事務中的錯誤和缺點，不要總把責任推在下級幹部身上。”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賈 梅）

“黨中央過去政策有錯誤，今後要大改變，要走南斯拉夫和波蘭的道路。”

（天津大學 王原強）

“對黨中央也不要太迷信，對毛澤東也不要太迷信，他也沒有什麼。那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那有不自私的。”

（俄語學院 沈兆予）

“黨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一到中央的下層就是亂來的，我見到黨員都是討厭的。”

（湖北醫學院 李建群）

“党的基層組織渙散、疲塌。……党的基層組織是完全被教条主义所扼杀，已淹息，学校發展的黨員試問那一个够資格？黨員标准变成：老老实实無活动能力。”

（同济大学 許長風）

“中共是上層好，中層劣，下層糟。”

（中山大学 董每勘）

“党中央是好的，基層組織中90%都是宗派主义者。”

（中南矿冶学院 黃錦滔）

“共产党不只基層坏，中央也是一团糟，总之共产党是一团黑，党内沒有民主。”

（俄語学院 沈兆予）

“首先中央也是由具体人（？——編者）他們的決議百分之百的正确，就不合‘主观与客观矛盾永远存在’这一馬克思主义的观点。

拿具体来講，双輪双犁型的盲目生产，大学教学冒进問題，职工待遇冒进的問題，三反、五反的扩大化問題，难道都是下面的錯誤嗎？再看看全国普遍性‘三害’問題，难道中央沒有責任嗎？

关于供求不平衡問題，認為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經濟發展中必然規律，但我覺得其中和經濟政策的掌握不平衡有关，若只从‘必然規律’中去探討，就是放棄克服缺点的努力。

聪明人也会犯錯誤，明智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集团也会犯錯誤，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作出錯誤的決定，說出錯誤的話这些事实早先不能責怪，也沒有探討的必要，問題在于为什么錯誤的決議能往下貫徹，人們都受着‘唯組織、唯領導正确的約束’，已不習慣于独立思考，进而人民民主，言論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少数人已操縱了多数人，利害問題的人事制度，使克服錯誤的可能性削弱到微弱的地步，

錯誤的政策一定通過錯誤的組織路線上去找。”

(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 陳炳勤)

5. “黨天下”

“調薪時，李處長說，休養、進修的不升級，但徐偉立說進修的升級，休養不升。但鋼鐵、石油學院休養都升。這是除宗派官僚之外，還是神秘主義，這是和黨的單線領導分不開的。神秘主義和單線領導使黨脫離群眾。現在是黨的天下，這種方式只能脫離群眾。”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十二個付總理為什麼都要由黨員擔任？我看民主人士中有能力的人很多，只因不是黨員才沒有被任為付總理。”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儲安平的黨天下，有參考價值，現在是機構不論大小，人(黨員)無論好壞，都要按上一個黨員作頭。”“黨員吃得開，黨是宗派主義最終根源。”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傅鐵城)

“黨天下思想是存在的，這並非儲安平的發明，而是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早就提到過，只不過沒有用黨天下這個名詞而已。……”

“黨天下思想問題是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這一提法是完全正確的，……把這個矛盾大膽的揭發出來，為什麼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使人心里不服氣。”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劉平)

右派分子儲安平污蔑我們是“黨天下”“是宗派主義”，他替這一

反動謬論証實說：“我們支部也對群眾不信任，表現在什麼工作都要安排黨員做頭”，“連下廠參觀都要黨員來做組長”。

在支部大會上向支部提出質問“為什麼歷年來教研室支部書記都是黨齡最長的人來擔任”，他認為“這是宗派主義、正統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盧梲持的材料）

“共產黨是一個宗派主義的集團，其根據是：我們國家是‘人民民主專政，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也就是共產黨的專政’因此，宗派主義的根源是‘黨天下’的根源。因為樣樣都是黨員，儲安平發言是有道理的，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一科一組都要有黨員是不好的。今天入黨，明天當科長、主任，當什麼長的沒有不是黨員的。在選模範時也多是黨員，有的連選連任。所以，在今後提拔幹部時，一定要提拔非黨幹部，天下是六億人民的，只有黨員沒有人民那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如果說黨員有勞功，我老單也有一分。（本人拍桌）

過去在提拔幹部時群眾很少，大多數是黨員，這當然是不對的。過去曹操還是‘唯才錄用’，今天有才都不行。既是有些群眾被提拔了也是有職無權的。報紙上揭發的中央有職無權，加上我們單位無職無權的情況，才感到宗派主義的嚴重，黃炎培、梅蘭芳、朱學范等都是無職無權。

我校宗派主義嚴重，在我系一切事情都被孫棣（黨總支部——編者）神秘化了。我是團員，馬上就要滾蛋了，遊園只有黨員才能參加，太不平等了（本人拍桌）。難道革命勝利只是靠幾百萬黨員取得到的嗎？現在勝利了，享受的只是共產黨員，而要进行工作，却号召團員這個助手上前。

老干部（指老黨員——記錄人注）擺老資格，建國以後入黨的也驕傲自大，如果有貢獻，大家都有。這些人自不量力，以老資格自居。這次整風一定要整掉宗派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單思良）

“共产党是现今社会的统治者。历代的统治者是共产党的祖宗，有人說共产党光荣偉大，正确，我認为这些人沒有看清共产党的本質，被共产党拉攏了盲目的跟着共产党走，对共产党迷信到近乎痴信了，因此都成了帮助共产党統治的瓜牙，要求入党的都是向上爬，党员就是統治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

“儲安平所說的‘党天下’并沒有什么不对，宪法序言上所說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句话的精神和儲安平所說的‘党天下’的含义是相符合的。”“儲可能就是看到了某些單位上上下下的头头都是党员。”“儲安平的‘党天下’合乎我的胃口，我認为說共产党是‘党主’而不是‘民主’，很对。”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教授 王衍臻）

“依我看，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該縮小，消亡，代替它的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在人民群众享有很多威信的各级人民政府，但是事实却完成相反，党不是在縮小削弱，而是在不断扩大加强，成为名符其实的‘党天下’了。因此弊病百出”。

“說现在是‘党天下’一点也不夸张，完成符合事实……，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判权都集中在党的干部中，政府就成为形式主义，成为党委命令的傳声筒”。

“我認为就是有党天下的傾向，儲（安平）他是从大量社会現象的观察中得出的結論。”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薛新卓）

“社会制度是否产生宗派主义，很难理解这些制度会产生宗派主义。而制度往往被宗派主义者利用、作为借口。非党员不用，那就变成党天下，一些部門机密，政治上要可靠，党员就可靠？問題在人事上，在用人时某些党员带来旧社会的思想意識，党员可以互相帮忙，

今天我提你，明天你可以幫我”。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韓光遠)

“形式上是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一黨包辦，這是現在還能看到的東西！青年團的幹部是共產黨員，學生會的主席，部長是共產黨員（當然也有些青年團員和非黨團人士，這只不過是點綴而已），黨總支那當然是黨員了，一切大權都控制在黨的手里，形成了共產黨的絕對統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學系學生 政 軍)

“論黨天下”

“1. 思想根源——黨天下思想來自早期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請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142頁；

‘……即我們的蘇維埃組織或其他的組織 非有黨的領導便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問題或組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無產階級的專政實質上是它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工人階級基本力量的專政。’

2. 黨天下思想在我國實踐中的表現

(1) 黨領導一切，黨的領導不可分割，國家事務基本由黨決定。

(2) 各機關以黨代政

(3) 黨國不分，不問青紅皂白反黨就是反革命，所以黨專政專了反革命分子也專了部分人民的政。

3. 黨天下的缺點：

(1) 黨的領導成為法定地位：

a. 排斥外黨

b. 排斥人民選擇性加強了宗派主義，脫離人民阻礙人民積極性的發揮。

(2) 肯定只有黨的領導加上黨內和國家內的高度集中，使領導隱坐泰山，為官僚主義滋長創造條件。

(3) 党在和敌人战斗中和其它党派竞争中成长起来流水不腐保证了自己的正确,但现在执政,消灭了敌人,压制了朋友,流水静止有蜕化危险,有不纯分子看上党的势力而打入党内的危险。

(4) 党的变质有使人民前途丧失的危险。

4. 改正方法:

把党放在与各党派平等之地位,通过党员的活动对政府部门加以领导,‘党的领导不可分割’只应用于党内以鼓励党员争取在各单位领导,但在各单位中党不直接干涉。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一样进行领导,也就是说党把领导交给人民,通过党员与人民互相的影响针对国家社会各方面进行领导保证工人阶级专政实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发展。

人民天下,还是党天下

现在国家政策方针,计划实质上完全由党决定,而未充分讨论就算人民决定的政策方针,有人提出异议还会得到反革命的罪名。人民的江山实质上是党天下的代名,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说只专反革命的政而且也专了革命的政。

不,不成,你——党为自己还是为人民! 重大事务——政策方针发展计划应由人民决定,在竞选中通过选举肯定。党的领导只能通过与人民平等的法权范围中进行,工人阶级领导只能在选代表的比例上的规定中体现,在国法面前没有一个特别的党,没有一个特别的人,对领导干部政策方针,谁也可以批评反对和赞成。”

(北京大学 蒋兴仁)

“一、人民民主的政权系统不是实行党委会负责制,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负责制,但是,为什么学校,企业系统却只能实行党委负责制,而不能实行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和校务委员会和工代会,工委会负责制呢?

二、人民政权的人民委员会负责制是合乎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宪法的,但是学校企业党委负责制(是在党外实行)是否合乎民主集中

制原則和憲法？

三、為什麼黨在人委會中可以取得多數來保證黨的領導，而黨在校委會、工委會中，卻不可以取得多數來保證黨的領導呢？

四、誰說逐步過渡到校委會和工委會負責制是取消黨的領導，而不是加強黨的領導呢？

五、人民內部的和風細雨的民主和恰如其分的民主，是一種根本的、基本的、主要的、長期的民主方法，但是，為什麼人民內部的狂風暴雨，過分共事的民主，不是一種枝葉的輔助的、次要的、臨時的、長期的（任何時候都可以臨時採取故也）民主方法呢？”

（北京大學 龍英華）

“共產黨是忌諱說‘黨天下’的，因為這意味着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共產黨人不應當看也不看現實，只要是不合自己的想法，便一言蔽之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把他判為大逆不道罪惡滔天的罪犯，而施以絞刑。而應當高枕靜臥，心平氣和地仔細想一想，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無半點假疵呢？

請共產黨人注意以下嚴重的事實，在政權及一般的機關中，許多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當局一點芝麻大的事情都要請示黨委，逐步發展到以黨代政的地步。人事科（處）等於機關里的公安局掌握生殺之大權，而人事科大多是黨員。一些不學無術的共產黨人高居要職，不分司馬遷是那一朝的當中學校長有之，不識俄文字母當俄文系系主任的共產黨人有之……這樣的事不勝枚舉，觸目皆是的。”……

（武漢大學 鄧儼民）

“共產黨形成了‘家天下’大權在握，孤宗統治；上至中央，下至空鄉僻野，無不在共產黨員的統治和監視之下，什麼人坐什麼汽車，吃什麼樣的飯，穿什麼樣的衣服都有規定，人們被無形地劃分為等級，黨員是一級，團員是二級，普通群眾是三級，官僚地主是奴隸，而在每一級之間又分工人出身，中農出身……你如果不幸降在下等，就命定

永远不能翻身！你在中国就只有过下等人的生活。因为我們的党老爷，非階級論者，已經在档案和鑒定上为你算了命，共产党员成了盛气凌人的高官显贵，你要申訴嗎？到哪里去申？报纸杂志，檢察院也是党老爷，他們会把你当反革命！由于一党專政和盲目的自大狂使共产党变了質、与人民相距一万八千里。中国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真正名符其实者不到二百万！历史証明，沒有任何政党是完全正确的，任何專制統治到后来总会被人民的憤怒所毁灭！一党專政無論如何不能把中国办好的！他們不認識在革命基本結束，敌我矛盾趋于次要的时候就應該大胆地讓群众去干預政治，共同建立新国家！而他們只相信自己，因此一些愚昧的做法就出現了。例如在文化科学上唱單調子等等。中国是 6 亿人的中国，并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每一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然而我們现实生活所告訴我們的，却是一幅怎樣的圖画？我們盼望的生活青春，我們理想的未来幸福，难道就是这样的嗎？”

（武汉大学 陈熹勉）

“我贊成儲安平的发言，现实生活中有‘党天下’的情况存在。一切党员驕傲自居，我看到党外人士都失去了主人翁的感觉。‘党天下’是存在的，提出‘党天下’是有根据的。

現在入党不必要，党很黑暗，入党的人都是粘液的神經类型，老党员靠党吃飯，党即是飯碗，领导一团糟，党黑暗，党压制民主。”

（北京体育学院 李海萍）

“我認為目前是‘党天下’的时代，而共产党又是‘阻碍’时代前进的力量，因此‘党天下’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就是产生‘三害’的根源。”

（西北师院 高德林）

“儲安平的‘党天下’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的現狀，每个小小的單位，都讓一个庸庸碌碌的党员霸占高位……。無論如何，‘党天下’的

說法是有可取之處(意即正確的——編者)，國務院的指示為什麼非要黨中央簽署不可？為什麼黨外人士都說有職無權？

(中山大學 張慶煌)

“‘黨天下’沒有是說不過去的，國務院十二把椅都是黨員坐，這不是黨中央宗派主義是什麼？有職有權的黨外人士只有少數。”

(中南礦冶學院 宋貽全)

“儲安平’s‘黨天下’現象是很普遍的現象，我不知道他是錯在什麼地方。現在好象是明朝末年(應是宋朝末年蒙古人侵入中國建立元朝帝國——原編者注)，蒙古人統治中國人一樣，連分房子住也要搭配黨團員，發展下去夫妻之間也要有一個是黨團員了。”

(中南礦冶學院 黃心欽)

“現在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黨天下，黃紹竑身為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向政府提出批評，這怎麼叫搞了我們一下。”“黨是一個信仰馬列主義的宗派集團，執政以後，封王封侯，大權獨攬，什麼都是黨說了算，因而形成‘黨天下’的局面。”(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

“黨權為什麼過大，同意儲安平的看法，黨領導一切就是黨權過大。付總理不讓黨外人士當，就是政治上的壟斷。在建設時期黨的領導，要么象蘇聯那樣無產階級專政，我國既不象蘇聯，就應當各民主黨派共同領導，就應讓人當付總理，用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高於國務院來解釋這個問題，我不同意，這也是共產黨的解釋權。”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職員)

“黨天下有道理，政府中總理都是黨員，就是不相信民主人士。不論大小事，都放一個黨員是一般情況，未放黨員是特殊情況。”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助教)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在全国范围内，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个科組都要有一个黨員作头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点了头才算数……。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沒有作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紧了党群关系的緊張……。”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學生）

“我很同意儲安平の‘党天下’的提法”。“我早就有这个思想，只是不如儲安平高明，沒有归結为这三个字”（即‘党天下’）“儲安平提出付主席、付总理沒有民主人士，很有道理，自己又看到班上沒有非党人士当班長，因而覺得‘党天下’是事实了。”

（北京政法学院 林共鳴）

陈守銘竭力为儲安平の“党天下”歌頌，說什麼“儲安平很有胆量，不愧为一个有‘革命’傳統的人。”并且还大声疾呼要“結束以党代政的局面。”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的材料）

6.“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党專政”

“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領導力量，但兩者应有界限，应有所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領導，又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政就牽涉到政治制度的問題。……”

“我們現行政治制度，职责权不分明，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我国实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上級服从下級，如黨員科長要非黨員办公厅付主任收回指示，黨員付校長外出，要非黨員校長代理职务。”他还惡毒的謾罵我們国家机关是“黑官”“黑衙門”。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目前党政不分现象很严重愈往下愈是如此，在县里县长听县委的，一切由县委说了算。”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讲师 朱澄平）

“我基本上同意賀安‘以党代政’的意见

（1）为什么会产生‘以党代政’？1.在长期战争条件下，没有民主党派，客观上便于以党代政，易产生党天下思想，以党代政在过去起过好作用，现在看出‘三害’就是‘以党代政’的副作用，2.受苏联影响，在这一点不应学习苏联。

（2）什么叫‘以党代政’？政者，众人之事，除反革命份子外全国人民之事，虽然提出群众路线主张，但仍然产生包办代替现象，党员始终是少数，党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走群众路线并不是由群众直接发表意见，如果党员有问题就很难貫徹群众路线，1200万中只要有1%有问题，影响该多大，何况有问题也不止1%，所以‘以党代政’有问题……”。

“党的领导是不能代替行政的，事无巨细都来过问的作法是不好的，党只能提出建议由行政同意决定，党和行政关系不应当是諸葛亮和阿斗关系，而应是参谋长和司令员关系，要貫徹党的领导通过三方面：（1）党的政策，（2）党员模范作用，（3）某些有才能的党员担任重要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讲师 黃 銓）

“以党代政过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阶级消灭了，应该对党外人士放手，發揮党外人士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章 起）

“县委会说话就算，实际上县政府、区政府，沒起什么作用。”“我校任何一个头都是党员，不是党员就当不上。”“许多问题都是由党决定，大家执行，提意见就是思想落后。”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孔 釗）

“党的领导是在于思想领导，也就是打通思想貫徹党的政策，不能以行政命令来领导。目前民主办校应肯定，党委制是落后了。如果党代表利益为什么还要人民代表大会呢？”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朱华荣）

“实行代表大会制（賀安反动的‘双軌一貫人民代表大会制’——編者）它并不排除党委制，而是比党委制更优越，因为党委制的代表只是党员。”“代表大会也是党的领导（思想领导，政策领导）。”“党作为無形的政权是沒有必要的”。

“不能把党的领导就是决定，决定就是服从，这是以党代政，这是錯誤，这样無形中产生出特权来。怎样体现党的领导呢？1.党委可提出方針，意見，由校代会討論通过。党在思想政策上领导，2.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来貫徹。”“党的领导不一定是占据一定领导位置。这样，可以避免官僚主义，賀安提的意見是对症下藥”。

“如果党委制是优越的話，为什么还会有什么缺点和問題呢？”

“我們現在有‘以党代政’，而且越到县、区越厉害。”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黃守礼）

“以党代政的問題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虛假，苏联有法制組織，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員意志，說了算。”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任免調动干部实际上是党内决定一切，以党代政，如选举的省、市長，一下子就調走了，而指定另外的人来当。撤职免职也是一样，如高崗饒漱石的撤銷职务是党中央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来作。党领导是應該的，但应通过政府。那样做不符合法律規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他認為我們是以黨代政，因此不民主，應該反對。他認為一切東西都通過一條綫（指黨——編者），貫徹黨的一條命令，只對了一半（指黨內——編者），還有一半不對（指黨外——編者），這種方式把人們培養成“應聲蟲”盲目服從。他還說：“黨委、總支，缺乏自下而上的領導，所以只有集中沒有民主。”他對大民主很感興趣。“只要沒有共產黨領導，什麼民主都可，有民主黨派來輪流執政，社會上任何事情都要有民主黨派討論，才能決定，一個時期有一個黨領導，共產黨不能把自己的東西強加在別人頭上。”他建議召開一次政協會議，再制定一個共同綱領。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賀毅的材料）

“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但不是黨的工具，如果是黨的工具，那就干脆黨政一體，不必要國家了。”“國務院與中共中央往往發布聯合指示，我有時對此想不通。”“過去我還想，為什麼民盟不能和國務院發聯合指示？統戰應該平等。”

他強調，黨對國家的領導，應當是通過黨員模範地貫徹黨的政綱，帶動群眾並受到群眾的愛戴，而選入領導機構中去。認為通過黨員貫徹黨的決議，比黨直接“發號施令”好。“黨直接向群眾發號施令是造成宗派主義的直接原因之一。”他惡意地搜集了光明日報等在運動前期所揭發出來的大批材料（大部分是右派言論），引為論據，企圖說明以黨代政，以黨員個人代替黨委是全國性的普遍問題，以攻擊黨的領導。並主張：“（1）用條令把各級黨組織和行政部門的職責劃分開；（2）用條令把每個人的職權固定下來；（3）精簡黨委機構，把過去包辦行政部門的權力交還行政部門。（4）黨中央和國務院今後少發和不發聯合指示。”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葉 萌的材料）

他認為黨的機構龐大，組織過多，有各級黨委、機關黨委會和機關黨組等三套系統，這樣必然會發生嚴重的“以黨代政”現象。他打着

“精簡機構，節約開支”的幌子，提出具體取消黨的領導的建議：“取消黨組織系統中的一些部門，如農村工作部、交通工業部、文教部……等等，以充實和加強國家機關各部的領導力量，原來中共各部的任務由國家機關內的黨組織或黨委會來充担。”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榮庭的材料）

“現在我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我主張民主建國，現在自中央到基層都是一黨專政，上至中央下至基層，不信任民主人士。民主黨派有職無權，這跟國民黨專政實際上沒有什麼區別，只是形式上不同”。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方炎火）

“我贊成共產黨為我國執政黨，但政府是由各民主黨派建立統一戰線組織成的，許多民主人士，擔任國家重要職務，實際上是有職無權，連我校及小小的班級共產黨也包辦一切，請問這實質上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林忠仁）

“社會主義不能一黨專政。黨對現在的統治也別太樂觀了”。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現在以黨代政的現象很嚴重，這是宗派主義。上自部，下至縣，民主人士都有職無權，工廠也如此。如海關總署署長丁貴堂，什麼問題也作不了主，得聽黨員處長的，請問那個大？（大聲責問）一切由黨包辦。就不能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應當讓民主人士有職有權！”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韓惠貞）

“我看組織領導與以黨代政是一回事。例：長沙市市長是由黨委先派去，任職后才經人代會選舉，這是形式主義，就是以黨代政。”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劉平）

“要削弱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缩小到最小范围”，“党应该象夺取政权前一样，只能是依靠党的威信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来领导”。“党与行政关系只能是宋江与吴用的关系，党委作参谋提意见，可听也可不听。”“党委制在党内是直接民主集中制，对群众则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反对党委直接对全体同学发通知，说“这是以党代政”，“是命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杨汝楸的材料）

“现在是工农专政，但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故党是统治阶级的体现，是新社会的一党专政”。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鲍子津）

“目前我国是一党专政，党的权力太大了，大小单位都要派个党员去做头头，这是党天下的具体表现，是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从苏联搬来的。在苏联只有一党专政，可以施行，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其他民主党派，这样做是不尊重民主党派，是以党代政和宗派主义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韩运德）

“现在是党政不分，民主党派无职无权。”“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取消，而让它竞争，要是全民直接选举，不见得他们（指民主党派——编者）就选不上，如果把老底（指党的缺点——编者）揭露出来，那才不见得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杨森达赖）

“现在是一党专政，国务院的决议都是一致通过，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提出一点和国务院不一致的地方，这显然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的人是个牌位。”“国家政权接受一个党领导不好，应该竞选，各党派可以提出自己的纲领，谁好选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潘認為行政干预經濟違犯自然法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的材料)

“……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是以党代政，許多党的組織或党的工作人員，本身沒有行政职务而干涉行政职务，直接以党的名义对群众下命令。这种以党代政虽然不是制度，但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現象。由于以党代政存在，就無形中使党的地位凌駕于無产階級內部民主集中制之上，从而破坏了它。这亦是一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其結果有三：(1)产生三害；(2)削弱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削弱了群众对党的监督，造成了某些黨員的特权思想，使一部分群众把黨員看成特权階級；(3)由于以上兩点，使黨員脱离群众，从而削弱了对資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所以为了维护法制，根除三害，必須反对以党代政。

要想反对以党代政，必須知其产生的根源。以党代政产生的原因有三：(1)党的威信高，三十年来一貫是正确偉大的，人民信任；(2)过去阶段斗争复杂，党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习惯对党絕對服从；(3)法制剛建立，人民沒有依法办事的习惯。所以，克服方法只能是教育，而不(“不”字是編者加的)是改变制度，这应从兩方面进行：(1)党的領導同志应主动不以党的名义对非党群众發号施令；(2)教育群众；每一个公民只应当对他自己运用民主权利选出来的政府負責，服从政府法令，而对党的号召是自願的响应，其中沒有任何强制。”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

“我对共产党宗派主义的看法：县以下的机构以党代政的現象很严重。我是浙江省来的。到了八个县，大部分是在区里，以党代政的現象极为严重。例如区委会比区人民委员会要多。且大部分都是以区委名义出面，形成清一色。

县委与县政府基本上都是那几个黨員，我看与国民党一党專政沒多大区别。”

“我很年輕，对国民党的宗派主义体会很少，但对共产党是体会

很深的。过去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党專政非常反感，极力反对，为什么今天不反对自己呢？”

在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以后，他反对彭真說右派分子是向党进攻，而提出三个論点来証明“党天下”。“彭真根据右派分子三个論点（1.国务院总理清一色；2.教授治校；3.退出公方代表）就說別人是向党进攻，那我又根据三点事实如不是說明党天下，又是什么！我搞不清楚。即：

（1）清一色是存在的，不仅正付总理及办公室主任都是党员而且县区以下干部也都是党员，这样从掌握政权的中央领导到县以下执行具体政策的干部均是党员，在有民主人士的地方，只是沒有实权的中層干部。

（2）中層非党人士有职無权。（指中央各部及省市單位的民主人士——整理者注）

（3）实际工作中以党代政是存在的。难怪乡間的农民說：‘过去是国民党的天下，今天是共产党的天下’。所以实际中党天下已为人們公認了。总之，把这三点加起来，說明什么问题，我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何国芳的材料）

“我們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兩套行政管理机关——党委会和人民委员会”，他主張党委的部門和人員“至少精簡二分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的材料）

“以党代政，使国家机构重迭，龐大，而且形式主义，严重阻碍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發揮；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物質基础，人民已开始对政府不滿。”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薛新卓）

“一党專政問題表現：

1.国家大事都由党包办，材料都成为党内文件。

2.人事制度上表現宗派主义，国务院付总理……校長及各級政府。

3.相当多的黨員年齡是在工作崗位上不积极，变成工作的絆脚石，还少嗎？当然應該給予照顧（物質上的照顧）这是違反社会法則的，新的規律。”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濮仲文）

“关于党政关系，沒有必要由黨員包办一切，以党代政愈到基層愈严重，不要每个單位都以共产党员做头。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当社会上批判儲安平时，他公开宣布“儲安平与葛佩琦不同，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吸收其合理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章琳的材料）

“党在国家机关，特别是基層机关，‘以党代政’，我是不同意的。”他說：“乡的領導一个是党支書、乡長、合作社社長，三足鼎立，各擋一面，書記是头头。党支書高人一等，黨員不願当乡長，願当支書造成党支書的优越感，而乡下不少的党支書犯錯誤，县亦同，布置什么工作，召开會議均是党委。如我們县，县長是我的同学，黨員、县委委員，他代表僮族，当家作主了，但他講在他領導的县，沒有布置过一次工作，被分配到一个社里（农业社）去工作，群众也不知道他，在群众中他的威信不高，他說我当了家可不做主……市里以党代政也是如此，因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領導的，所以他的模型是一样。如市的审判定案，五人小組定了案后（指肃反时——編者）交审判人員决定（判案）。 ”

“下边以党代政的結果：（1）造成下边干部不能發揮积极性。党是領導的，但应考虑你通过什么方法来領導，所以这样做的結果，影响了一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某些干部有职無权。（2）造成了党的那种盛气凌人。……所以形成党第一，無形中把党和群众造成了分离，形成了宗派主义、官僚主义。（3）破坏法制。如我判誤了的案子，为什么不通过审判程序来纠正呢？（4）以党代政不符合發動一切积极因素

建設社会主义的精神。(5)有些事情不考慮群众的覺悟程度去工作，硬以党的要求强加于群众身上。如推广‘小枝密植’，群众不滿，結果造成很大的減产。所以‘以党代政’造成党的特权，脱离群众的根源。”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章 齐)

“(1)事实上許多事情不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决定，而是党决定的，沒有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2)国事是全体公民的事情，不光是共产党的事情。”

“(1)胡风事件。胡风的言行是反革命行为，但直到今天并未公布其判決，我表示怀疑。根据鎮反法令有反革命言行的人，不一定以反革命分子論处，我要求有关部門澄清这一問題。

(2)高饒事件。因为沒有第一手材料，說高奸污許多妇女，沒有指出一个名来，美軍强奸沈崇，还有案可查。而有人問我高饒为什么反党，我不能回答，只好去問党中央。”

唐为了进一步为自己的反动观点辯护，把怀疑論成为自己的方法論，認為認識事物，都是从怀疑到相信，再怀疑再相信。并从毛主席文章找他的所謂“理論”根据。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唐仲明的材料)

“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党組織和大部分党员中宗派主义是很严重的”。他不滿意国家和政府的主席、付主席、总理、付总理等领导人都是党员，他認為这样就产生了“以党代政及党在国家事务中的包办代替現象，大大地限制了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因此，他要求：“在国家领导人中非党群众应有一定比重。”又說：“其他人士是放在人大常委会去了，实际上是擺样子，叫他們說說話，举举手，这是‘形式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鍾溶华的材料)

他說現在人大常委会等于形式，应和党合并，主張省、市委和人

委會相同的部門(如工業、商業部)也應合併,他認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應聯合發布指示,這是黨政不分。他認為在法院有黨委領導,法院就不能做到獨立審判。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趙恒珊的材料)

“我贊成共產黨為我國執政黨,但政府是由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組織來的,許多民主人士擔任國家重要職務,實際上是有職無權,連我校及小小的班級,共產黨也包辦一切,請問這實質上與國民黨一黨專政政府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民大學 A—02)(大字報)

“由中央到地方,黨與行政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黨的工作機構必須減去1/2~2/3。黨主要搞思想領導。”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反對以黨代政,反對以黨包辦一切,堅決主張以人民代表的形式和辦法管理企業機關和學校,以黨代替包辦,只能導致人民內部矛盾,集團與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

(中國人民大學 A—02)(大字報)

“凡民主黨派都是有職無權,有些人之所以講有職有權是因為怕鎮壓,都不是內心話,實質是有職無權。一個民主人士工作,後面都要跟着一個共產黨員監視,說話就有人記下來,將來就可以‘整’。”

(雲南大學 一個學生)

“發生有職無權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體制問題。現在有職無權的直接原因有兩種。一種是黨員單獨搞一套,譬如什麼事情都是黨委單獨搞一套,行政上(黨外人士)無權過問;另一種,是下面組織的黨員只听黨委的話,不听行政的話,工作也無法進行。例如衛生部李德全就有職無權。因為她不是共產黨員,但公安部羅瑞卿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題，因為他是部長又是共產黨員。這一錯誤很難怪下面，而問題在上面，黨到處有一套組織，它當然就要干事，如果不干，黨就會說他沒有完成任務。這是典型宗派主義的表現，是很不合理的。這個問題要解決，必須規定正付職的職權範圍，因為現在很多機關和學校都有這種情況，即黨外人士是正職，黨員是付職兼黨委書記，而實權都在付職手里而正職形同虛設。”

（湖北醫學院 朱裕璧）

“在高級知識分子面前不只是微笑或打哈哈就算執行了知識分子政策，用而不信恐怕是知識分子最痛心之處，隨着用而不信即產生有職無權現象，下面是我和一位教授的談話：

教授：我當這個教研室主任等於當傀儡，有職無權。

我：老師，你要爭取嘛！該你處理的事你就處理，怕什麼。

教授：小伙子你還年青，你不知其中的奧妙。

其實當時我對此奧妙已略知一二，不過不深。

領導經常大聲疾呼對教師說‘不能只教書不教人’。可是實情如何呢？教人的事已被組織科、人事科、學生科、黨支部全部包干，歸而為一都是黨所包干，教師又到那里去教人呢？即使在講課時干巴巴聯系上一點馬列主義，此作用又何足道哉。何況學生對此無絲毫興趣。老實說，老教師要在學生中作思想教育工作是根本沒有威信與根基的，這是因為一貫黨在包辦，更嚴重的是過去不尊敬老教師和有辱斯文的後果。老師無權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教人’二字又從何說起，不免使人感到這不過是一句口號。

要發揮老教師的積極性必須認真貫徹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表里如一，尊重與信任和作到有職有權。”

（四川農學院 廖家棠）

“共產黨黨政不分，黨外人士有職無權，造成牆和溝。

民主黨派，既是黨派，為何沒有自己的奮鬥綱領和目標，這叫什

么党派。”

(俄語學院 文啓塵)

“有些同志負責行政工作，長期以來所謂有職無權的形態出現，在日常工作上推諉敷衍，在關鍵問題上不能果斷，這一方面也許是由于這些同志本身有什麼顧慮，或者習慣於明哲保身的圓滑作風而缺乏正視真理的勇氣，但黨委在領導上遷就此種形態甚而要保持這種局勢……又例如個別黨員同志的權與職不相稱，有的事事干與，權限過大，有的甚而在行政上有權無職與有職無權者相反。我們看到在工作上絕不能以‘有權無職’來補救‘有職無權’的缺陷，相反的倒是造成了權職不清因而機構癱瘓，什麼‘是非不明’與‘宗派情緒’等也就隨之而生。”

(山東大學 劉鴻賓)

7. 反對黨委制

“……我們以為別的委員會也可以擇要設立，特別重要的，就是要成立財務委員會及教學人員聘任委員會，把學校行政最重要的兩個方面，放在民主的基礎上，現在我們大多數的非黨人員，對於學校的錢是怎樣用的，學校中的教學人員調來調去，升級降級，誰在那兒出主意，實在是孤陋寡聞，毫無所知。應當成立這樣的委員會，把內幕揭開一下，看看真相如何，然後再進一步研究如何改善這兩方面的行政。無論成立什麼委員會，我們主張都要受黨政的統一領導。委員會要掌握情況，反映群眾意見，分析問題，作出建議，並把這些建議分送給黨委會及校務會議。任何重大的有關方針政策的問題，都應由黨委會在各個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及建議的基礎上，作出決定，提交校務會議討論通過，然後由學校的行政當局付諸實施。黨委會不對學校行政各級發號施令。這樣，黨與政一方面是嚴格分開的，另一方面黨委會又實現了領導權。……”

“……由于章罗联盟的指示，党委制已经成为一个盟員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我对于这个問題，感到很大兴趣，不久我即提出党委领导，民主办校的主張。这一主張，表面上看去好象是承認党的领导，但其实原則在取消党的领导。我先批評党委过去沒有走群众路綫，許多大事是少数人关起門来决定的。然后提議在校中設立一些委员会，对于学校行政的一些重要方面，如财务及人事，进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任何重大的有关方針政策的問題，都应由党委会在各个委员会的調查研究及建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提交校务會議討論通过，然后由学校的行政当局討論实施。党委会不对学校的行政各級，發号施令。”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教授 吳景超）

“党員对学校是办不下去了，要啓用老專家了。”“党办学校就好像不懂画的人評画，不懂戏的人評戏一样”

“党委書記不能兼校長，总支書記不能兼系主任，支書不能兼教研室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教授 陈文儒）

“如果实行党委制，就会产生三个缺点：（1）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非党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党出面领导，就不要国家机器，但不能这样作，不能簡單地把它归納为党員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等等。（2）党委制具体决定許多事，对加强党的领导沒有好处反而会削弱党的领导。（3）使党委不能很好地貫徹群众路綫。”

吳家麟特別热衷于取消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在教研室討論賀安报告的發言时，他認為討論党对学校领导形式有三个前提：（1）国家的性質——不但是工人阶级而且其他的阶级，他的含意就是共产党不能一手包办。（2）学校的性質——行政领导下的学术机关，这就是說不能由外行人来包办。（3）群众路綫，他的意見实际是指現在的党委制不民主，沒有群众路綫，認為党委制不合乎这些前提，應該加以改变。他說：“党委制是党的领导从后台推到了前台。”因此他主

張：“黨應該從前台退到后台去領導。”吳家麟反對黨委制的“理論根據”，他認為“黨委制在工廠問題不大，因為都是工人階級，工廠廠長是黨員，將來值得考慮，學校不同，主要是知識分子，成分複雜，我的意見是黨在后台領導。”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有人說：接受不了我的意見，說你是要把黨委推出學校，不是。黨委一定要留在學校，但領導方式不同了，不是通過組織手段，而用黨員的模範作用和馬列主義真理來領導，說服群眾，不提真正强有力的領導。共產黨是人民的參謀總部，（如梁山泊是宋江領導還是吳用領導，宋掌握大權，而吳出對策這不矛盾）……”

“……我的發言很不成熟，構思時間很短，我一年多沒講課，一年前講的是‘一長制’，堅決捍衛一長制，去年上半年，周總理有個報告，傳達了黨委制，實行黨委制有道理，比一長制進步些。但沒有進一步研究，因為我不講課了，而且同學們沒有追問我這個問題，從現在來看，黨委制繼續下去有問題，是值得懷疑的。問題很複雜，我作為拋磚引玉，等權威人士來開第一炮……”

“如果說只有黨委制才能是黨的領導，那就沒有缺點，但不是這樣，如果同人民代表大會制比較，那就有其相對的缺點，以黨代政的傾向是在不同程度上，用黨的指示來代替本階級的意志和行動。

黨委制——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我認為這是以黨代政的一種形式，一切重大方針政策由黨委決定，這是正確的，問題產生在，把黨的指示變成行政命令的過程中比較簡單化一些。

有人說我們沒有看到那一個黨委委員在動，但一般領導者都是黨員，作為廠長、校長的黨員必須執行黨的決議（不是黨員首長也會產生以黨代政），這個轉變過程是比較簡單的，所以有缺點。

第一個缺點：這種轉變的簡單化，會產生內部矛盾，領導和被領導，黨員和非黨群眾的矛盾，因為通過這種形式是用黨的指示和命令來維持無產階級內部階級紀律的。我認為黨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鐵的

紀律，是專政所必須的，但只能建立在與人民群眾信任的基礎上，黨不應該是命令群眾而是說服群眾，當群眾根據本身經驗，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時，這才是真正的領導。

第二個缺點：是會使黨員、黨組織忽視政治思想教育，因為通過這種形式，使指示和決議很容易變成群眾來執行，這樣不教育或少教育也可以變成行政命令。

有人攻擊我說我把黨看成是個人小集團，不能這樣看，我說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問題在於群眾覺悟能否跟得上黨的政策，不能跟上是不能否認的，如果忽視了這些，就會削弱黨的領導作用。

如果我們的領導者，都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末制度是無足輕重的問題了。

上次我提到黨委制是‘三害’的防空洞，其用意在於它會被‘三害’鑽空子，我現在認為這樣提是不對的，是把整個黨委制看成是防空洞，但它比代表大會制來說是有缺點的。

第三個缺點：黨委制沒有給走群眾路線的徹底貫徹創造充分的條件，這不是說黨委是宗派集團，但畢竟黨不是群眾組織，黨組織的民主集中制和人民群眾的民主集中制有它的統一性，即因為黨也是代表人民，但也有範圍的不同。

斯大林‘如果把黨的領導看成是人民群眾的民主集中制，那就是以部分代替全體，就是黨始終只能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列寧主義問題186頁）。

第四個缺點：是削弱政治和經濟領導的統一性。”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賀 安）

“對學校制度作一次根本改變，外面對校管理制度很多討論，我亦注意了，我認為實行民主辦校較妥當。基本意見：重大問題由群眾討論，民主辦校具體辦法有以下几項：

（1）應加強教研室全體會議、系代會、校代會的作用（同學方面未考慮）當作我校最高權力機關，這和賀安同志意見基本相同。如把

校系代会搞好可起很大作用，过去校、系代会起的作用非常可憐，只起裝飾品作用，未起实际作用，許多問題要由校、系代会決定，但許多事未經校、系代会通過，應將最高權力交給它。

校代会我沒有參加過，聽說很形式，一個教員參加校代会，這次會的提綱是事先擬好發下來，開會時胡校長宣讀占二小時多，剩下一個鐘頭發言，很受限制及形式上通過。

系代会也形式，如評副教授問題，應系學術委員會通過，但有的同志，系學術委員會沒有通過它，也公布為副教授，說明領導上不重視此機構。

應使校系代会成為最高權力機關。

(2) 這些機構解決那些問題？起碼應解決以下重大問題：（我的知識受限制，不能全面提出來）

a. 應有權選舉、罷免學校各級領導機構，從校長到教研室主任，應選舉產生，據我了解蘇聯及資本主義國家許多高等學校是如此。應選舉產生，當然可以報國務院批准（校長）。

選舉：應對德、才、資有新的看法，主要是德、才，過去對資的照顧較多。聲明一下：

德：是這個人的原則性強否，能否聯繫群眾，辦事是否熱情，反對將德簡單認為只有黨員才有德，非黨員沒有德，即缺德。

資：過去認為，凡什麼時候參加革命即為資歷，而過去在校長期任教的人，即不算資歷，是不公平的，知識有其延續性、繼承性，我認為除參加革命時間外，長期任教也應算資歷。

才：首先是德，其次是才，作為領導者，不一定是業務水平最好的人，學術上最好的人，應讓他少做社會行政工作。

領導者應德才結合，如無才僅有德資亦不能做領導，只有才無德亦不能當領導者。

罷免：群眾應有權罷免各級領導機構，我認為70%群眾通過才能罷免，這樣較妥當，如有70%不滿意則不配作領導者。

各級領導者應領取領導酬勞金，系主任應當兼課，校長最好兼兼

課，這樣才會體會教員疾苦，辦事即不脫離群眾。如校長兼課，即不會推行教員教學工作量制度，這制度是從蘇聯硬搬來的。因他們擔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則應領取職務工資，他作為教員應從地位上和教員平等。

這次提教授、副教授中看出，大都是黨員，絕大部分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是否學術上最好呢？不見得，大家意見很大。

6. 有權決定系、專業的設立，確定各系學習年限、學習課程及時數。目前在各系開專業會議上可以看出問題，但這些專業學習計劃，沒有征求教、學員意見，是從蘇聯搬來的，應交校、系代會討論。

同意決定教員的工作量要系代會批准。

B. 有權通過提級、提薪、提升學銜，過去僅僅幾個人研究，大家不知，宣布後，名義征求意见，實際上是形式。應交會議討論交校、系領導批准，關於提級，提薪應制訂詳細條例，如副教授究竟要什麼水平才能提升，要具體。

C. 這些會議主要應討論學術問題，對每個教員、學生提出的論文，應討論，給予適當評價。同時應負責領導學校的校刊，校刊過去不能令人滿意，清規戒律太多，教員投稿編輯要他按編者的意見重新組織修改，該教員後投稿‘新建設’很快就登了，以後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也登了，校刊編輯不都了解業務，成員應改變。

(3) 各級領導權限，校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根據校、系代會的決議，處理日常，並定期作工作報告和听取大家意見，這樣才能上下通氣，這就要對校系代會委員進行重選，過去委員如何選出來的不清楚，連本人都不知道。應慎重的負責的選出校、系代會委員。

實行的好處：

(1) 可使群眾的意見得到充分發揮，校、系代表為大家選舉，且有決定權，則會提高群眾主人翁的感覺。

(2) 領導能受群眾監督，對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有很大好處。

(3) 各種重大措施經大家討論決定，則更能符合大家利益，同時

使領導與群眾的矛盾減到最低程度……”

他攻擊和誣蔑黨委制：他說：“對黨員來說有民主有集中，但對群眾說是民主少集中多，所以群眾的意見反映少。”又說：“黨的方針政策是否能得到貫徹，不是看幾個人的作用”因此他把黨在學校的領導排斥在“向校系代會提出建議”和“黨員個人在校系代會中起作用”的地位。……

郭振淮多次地強調黨應處在“參謀部”的地位，他說他“不同意黨委有最後否定權，黨的作用只能是參謀部的作用，人民作主也體現在此，校代會否定黨的建議，黨委也不能否決，校代會如只成為諮詢機構，人民作主的作用何在？我堅持我的意見：人民說了算。”他還說：“應考慮是人民作主，還是黨作主。”他還反問大家：“黨說了算，還是人民說了算？”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講師 郭振淮的材料）

“黨委制必然產生以黨代政，與有職有權有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田 放）

“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民主的，但是上下不接氣，我們學校的黨委制與人代會制度不協調，所以才提出民主辦校這個問題來。“黨委制有許多缺點，克服這些缺點就需要有制度來保證。黨委制的缺點表現在黨的決定不能包括黨外人士和老教授的意見，主觀主義大一些，如評副教授問題，黨委有一個角度，教授則有另一個角度，如改為民主辦校，則可減輕危害。”

“黨委可向校委會提出建議，校委會有決定權，黨委的意見在校委會被否決後黨委可以上訴”。當時有同志和他爭論說“在學校如何實現黨委的領導呢？黨委是司令部還是參謀部呢？”他回答說“黨委對校委會來說應當是參謀部的地位，只可提建議”。並舉例說“如人代會不同意黨中央的意見，難道還能取消人代會嗎？”

“黨委制不如校委會更易接受群眾監督，所謂監督就應給監督者

以权力。”

他还提出学校各級組織从教研室主任到校長可由选举产生，他解釋說：“在总理任命校長时，很难知道該校長有無官僚主义，从下面提名，上面批准相結合比單純由上面任命要好一些，这是群众与领导相結合，不是不信任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展广偉的材料）

“党委制的产生一是在部队中，一是在地下工作中，因当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对党員的要求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而不是由业务方面提出的。”“現在揭發出来的很多缺点如評学衡工資高低却和业务有关。党委委員懂业务的不多，这种情况容易使得管理学校搞成运动方式。”

“加强党委制并不是管的事情愈多愈好，执行的权利人人都有，現在党管的太多了管的太多反而会出毛病。”“現在党把監督置于一身，抓的多了一些而沒有充分發揮群众組織的監督。”“不要党委制党委委員都參加到决策机关中去另外再吸收老教授、工会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徐 前）

“党委制民主性不大，……党委負主要責任就不能不对行政进行干預，这就会产生以党代政，因此，賀安的双軌一貫代表大会制，值得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他主張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說“教授治校應該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講師 章起的材料）

“要克服三害，不光是要改变思想方法，更重要的还必須改变学校制度，改变学校体制，要取消以党代政，取消校長負責制，由全校教职員工选出代表組成校务委員會，并邀請有特殊意見的人作特約代表參加校委会，校委会的职权是討論議決学校一切重大措施，决定学

校的方針、任務、工作計劃等交由校長執行。”“現在是集中太多，民主太少，大小事都找校長。取消現在的業務組長，組成教學研究會，由群眾自由選出負責人，現在的業務組長也是培養領導上官僚主義的溫床。”（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語文教員 白楓）

“取消學校中的黨委制，並建議取消預算中黨、團補助費。”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教員 劉紹之）

“黨委制就是家長制，一長獨裁制，都是獨斷獨行，這在組織上使宗派主義產生，應成立校務委員會，吸收非黨民主人士參加。”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系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行政領導一定要第一書記，會造成缺點，前幾年黨政統一是一定要的，現在如果堅持則是后退了一步，意味着對群眾不信任，有些人業務不精，作出決定會削弱黨的領導。不同意黨委制並不等於反對黨的領導，不會削弱，而會加強，這樣可使領導兢兢業業，更好地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助教 陶文達）

“黨委制領導不好，教授治校多好”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公灝）

“黨的領導不是命令，也不是硬貫，領導什麼就應當懂什麼，不懂就容易產生教條主義、命令主義。在不懂業務的條件下，黨委制有一定缺點，不如民主辦校。”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助教 李樹屏）

“既然黨外人士的意見那麼多，他們又多是教授專家，黨可以考慮試行校務委員會形式，實行民主辦校。”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盧晷持）

“在和平环境里，军队也应该取消党委制，只有在战争环境里它才起作用。（接受賀安的双軌一貫制的观点）其他部門工作更不需要党委来领导。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資料員 崔志敏）

“党领导不一定作出决定叫行政执行才是领导。”他說党作出决定交行政执行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他指出党委制的“缺点”实行党委制对于發揮群众的积极性就成問題了。“党委制使許多人不能接受，老教授也产生了作客思想”。

从理論方面看：（1）党委不应当有决定权，因为党是階級的代表不等于国家，而行政是代表国家进行文化活动的，所以党不应直接給行政下命令。（2）党的主張貫徹不是靠命令，而是靠宣傳教育和黨員的模范作用。（3）党委制是以党代政，表現在：第一，党直接向群众發号施令；第二，向行政發布命令交行政执行。党委制在学校里不能实行在机关企业中也不宜实行。

从实际方面看党委制的缺点：（1）党委制不能作出全面的決議，因为党委不懂业务，作出決議难于切合实际。（2）不能發揮群众特别是老教授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因为党作决定只是征求一下党外人士的意見。（3）党作決議使党外人士有职無权。（4）形成了以党代政。（5）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6）党委制使党外群众無法监督，而且黨員享受了权利不等于党外人士也享受了权利。”周育才指出他的方案的出發点是：

“（1）加强党的领导。（2）發揮群众的积极性。”

因此主張“取消党委制，实行代表大会制，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学校各阶層选举产生。代表大会是学校的决定机关，决定学校重大問題，党委沒有决定权，只有建議权（党委对重大方針政策可以討論），提出建議案，若意見分歧，校行政应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党委保留意見。通过黨員校長向高教部提出更改，或者向代表大会里的黨員要求代表大会更改。

代表大會的組織機構，由代表大會選出行政委員會（管理財政人事及行政等工作）和學術委員會（管理教學研究和學術等工作）行政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是執行機關，這兩個機關在校長領導下進行工作，但是這兩個機關作出的決議，校長必須執行。

校長由國務院任命。校長一方面對國家負責，另一方面要對代表大會負責，受代表大會的監督，向代表大會負責和報告工作。

系有系代表大會，學術委員會和辦公室，系主任可選可派，教研室主任可選可派。

代表大會，學術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都要照顧統一戰綫”。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 周育才的材料）

“黨委插在高教部與學校行政之間，組織系統不合理。”“黨委有決定權就不能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黨委不懂科學。黨委討論問題，涉及到具體教學上，是否能保證其正確性是有問題的。”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陳復之）

“黨委制是我們革命經久考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軍隊中立過汗馬功勞，是高度集中高度民主的產物，但是在具體部門，實行黨委制應當具體研究。

黨委制按自己的了解，就是行政管理機構，即是決議學校的直接行政管理制度，一切由黨委決定交由行政執行，假若黨委制是如此的行政管理制度，就值得考慮了。如果黨委制直接發號施令，那就更糟了，那就是以黨代政。

實行黨委制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

1. 工作須要和任務上的須要，即工作本身要求黨直接領導的工作和比較艱巨複雜的工作都應實行黨委制。如軍隊就有這樣的必要性。

2. 工作上的可能性，即黨委不僅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而且有高度的業務水平。如：黨對軍隊的領導，不僅政治上堅強，同時又富於作

战經驗，故有条件实行党委制。但在高校实行就有困难。这种可能性又表現是能为群众所接受。

总的来着，在高校中，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可以实行党委制。因当时处于改造阶段，一系列的運動必須党来领导，同时高校要大發展党必須直接抓起来，党的干部也有經驗抓起来。当时教授們有超階級观点，党领导与否，对他們来說是無所謂的，领导了他們也不在乎，目前党实行党委制是有困难的，因目前高校是提高質量和搞科学研究阶段，党的科学水平低，是难以胜任的，將來党委科学水平提高了，即可实行党委制。

现在如果实行党委制則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

1. 外行领导內行会造成工作上的損失，当前党的领导干部的业务水平低，来搞业务，或者领导不起来，或者是搞糟了。

2. 影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感和形成他們有职無权，高校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集中地，作为他們的工作很重要，首先要他們把事情办好，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識分子觉悟提高了，他們不是为了和党平分領導权，党必須給他們民主，他們对形式上的民主是十分器重的，否則事情尽管办的很好，不給他們說話的机会，他就覺得不民主，因此，当前高校实行党委制是不合适的，硬搬別国的經驗会給工作帶來損失，更重要的是不能發揮高級知識分子的积极性。

3. 因缺乏組織制度監督，發展了三害思想。

4. 由于党直接管理行政工作，必然会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和放松了对重大政策方針的研究、決定。

从几年的事实說明，过去的工作成績，不能归功于党委制，因为他只不过实行了几个月，可是又不能認為党委制不存在缺点，因为報紙上登載了許多学校的党外人士有职無权，而党的干部却很好。因此說明党委制是有問題的。

解决办法是实行校务委員會制，党委委員参加校务委員會，校务委員會是最高决策机关。校長对校务委員會負責，党委的領導意圖通过党委委員在校务委員會中具体貫徹，党委機構仍然存在，以研究工

作方針和重大問題及进行思想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刘文华)

“学校党委制有毛病，高等学校中取消党委制沒有多大影响，系、班党委制沒有必要，实行党委制好象什么工作都要党领导，班上党支部高于一切，党在政治、思想上领导，組織上不一定党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刘 平)

在反对“以党代政”的口号下，他又提出了“师生代表大会”治校方案。取消，否認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

“师生代表大会的具体内容：

1. 师生代表大会的产生。首先成立(以党委为核心，由高教部全权代表参加和有代表性的师生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由筹备会拟定选举規則，全校师生选举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在闭会期间，由大会选出的常委会負責日常工作。闭会后，代表回到系里，組成代表小组，监督检查大会決議的执行，反映意見。大会职权：

(甲)有关全校的大政方針的决策。

(乙)討論研究高教部的決議，命令，指示。

(丙)选举系主任級的人員。

2. 校务委员会，是全校的管理机关，向师生代表大会負責并报告工作。

3. 校長由国务院任命，具体领导校务委员会，向国务院，代表大会，校委会負責。

4. 党委在学校的地位：

党委作为輔助性的机关存在，和民主党派平列，各党派都可以提出提案(如民盟支部)。党可以通过向代表大会提提案的方法，建議的形式，貫徹党的方針，政策，采取统战的工作，党员的模范作用保証党的领导。

師生代表大會，能保證施行廣泛的民主，又能保證黨的領導。其所以能保證黨的領導，是因為黨的提案正確的話，民主黨派和大會就能接受，再加上統戰和黨員模範作用，從而也就保證黨的領導。”

此方案提出後，大家和他辯論，提出很多問題，他作了解答。

(1)將師生代表大會性質變成最高管理機關，將校委會變成諮詢性的和管理機關，學校有高教部領導，代表大會的決議不能超過高教部指示的範圍。

(2)有的同志提出的賀安的生計院，區域院是排除黨的領導的，他說：沒有實行，怎麼知道？實行看看，為他的提案作辯護。

(3)有人提出他的方案不能保證黨的領導，他說：“1.教授、講師都承認黨的領導，在選舉中各黨派不會競爭。2.黨的提案正確為什麼通不過呢？國家的五年計劃黨提出，全國人大都通過。3.黨的威信高，其他黨派不會爭奪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賀毅的材料)

在討論高等學校的領導問題時，他同意黨委領導下“民主治校”主張，由學校選舉產生的校務委員會相當於最高權力機關。校長相當於國務院，黨委相當於黨中央。他不同意校務委員會中共產黨員占50%，只要進步勢力占優勢就可以了。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戴逸樵的材料)

(1)認為“過去一長制是校長決定一切，在建國初期是合適的，但是現在已過時，黨委制比一長制好些，但仍有問題，否則為何產生三害。所以對黨委制發生懷疑”，認為黨委制不是十全十美的，“這種制度是以黨代政因為黨委決定並未經過什麼組織批准，黨的決定應經過全體討論才行，黨的決定僅是某幾個人的決定。最後決定權應交給人民，人民不同意就應提出修改”。

(2)認為“應當擴大校務委員會的權利，學校校務(行政)工作由校務委員會決定，另外關於學術問題由校學術委員會決定，這兩個委

員會屬於校代會，有關全校的根本問題由校代會決定。校長們由任命產生，上面兩個委員會是校代會的常設機關，有關任命教員，提升，課程等都由學術委員會決定，同時還要設立監察機構，有關決定都送它去審查，有違法情況時就提出彈劾”。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 朱華榮的材料）

“學校不要黨委制，用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來治校，根本重大問題由它決定，這個機關是常任制，任期一年，由教師黨、團、工會、學生會系統選舉產生，這個機關與黨委意見分歧時，由高教部決定。”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張殿鵬）

他認為“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會阻礙科學的發展”“實行黨委制會影響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他對黨委有決定權表示不滿，他說：“黨委決定一切問題，校長只是執行，不能發揮群眾積極性”他說：“我主張取消黨委制”他提出了自己方案來代替黨委制。

他主張“學校設立校代會和系代會”“校代會和系代會對學校重大問題可以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然後執行”。他說“系代會，校代會下可設學術委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生活福利委員會”“委員會下面根據需要設立小組”“教務部將來歸納在行政管理委員會”。

“他主張選舉產生”他說“校代會，系代會由教職員工來進行選舉，學生不能參加。學術委員會可直接選舉，其他委員會可間接選舉，由代表大會產生”。

“學術委員會一定要選真才實學的人來組成，這樣才能領導科學，目前一直到系主任都是外行說內行話。”

“今後黨委會討論的問題，要經過校代會討論再通過行政下達。”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王向明的材料）

“黨委制指黨的政治思想組織工作外，對學校的重大方針有決

定权，它的缺点是不能作出全面的決議和不能充分的發揮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出發点是：(1)党委制对学校的力量尤其是对老教授的力量不能很好發揮；(2)适应当前扩大民主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領導；(3)動員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如講師、助教。因此現行的党委制要加以取消。

校委制即在高等学校設校務委員會，校常務委員會，党委是主謀机关，提出重大問題的初步意見，校委討論和作出決定。討論是党委全体参加，作出決議，后由校長提請学术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執行。校委会的地位是各高等学校的决策机关。校委会的产生，一部分是党委委員为当然委員，一部分是根据各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吸收必要的人参加：(1)民主党派，(2)無党派人士，(3)教授，(4)青年教师。任期不定，必要时根据大家的意見，由校長調整，校務委員會一年兩次，由校長主持召开會議。职权：根据党委或校常委的意見，确定學校重大方針，如学校的發展問題，学术科学方針等。

校常委的地位——是校委的常設机关，經常的領導机关，校常委的产生是(1)校党委的常務委員，(2)校長、付校長、教務長，(3)民主党派和無党派人士、教授等，人数是校委委員的十分之一为宜。产生的办法：由校長根据以上原則，經校務委員會通过，校常務委員會的組織由在任的校常委会全体委員选若干人組成核心小組，主持常委的工作，根据需要，校常委会內部作适当的分工。常委的职权：(1)貫徹執行決議并檢查执行情况，(2)總結过去，指出今后工作方向。

相互关系，校長由国务院任命，对国家負責，校委在校長领导下工作，为什么呢？不能將校委会看成是最高机关，否則就否認了校長由国务院任命，校委会是决策机关，校常委是經常領導机关行政学术委員會，分別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和科学研究工作。校委与党委意見發生分歧时，校行政应執行校委的決定党委保留意見，校長根据高教部的意見可以撤銷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党如何領導校委制：(1)校党委对学校的重大方針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意見，不排斥其它党派提意見；(2)党委委員是当然委員；(3)

校委和校常委的决定与党委不同并錯誤时党委可提意見，通过行政（校長）来更改或撤銷；（4）在学校的各級領導机构中，还有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馬孝樵）

“我对党委制不够了解，但党委制如果是党委决定，校長执行，就会助長三害的滋長，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群众路綫的發揮，就容易产生以党代政。”“学校是政权性質的机关，党和政权机关不是一回事，如实行党委制就会产生矛盾。北大馬寅初校長是高教部任命的，但党委則是北大的最高机关，究竟馬服从党委呢？还是服从高教部？究竟馬领导呢？还是党委领导？”

“党委制应退出学校，应由以党为核心的代表大会制来代替。代表大会制与党委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代表大会制可以使民主范围扩大。”

“党对学校的领导應該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及向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方案进行领导，另外，党还可以对代表大会进行监督，至于方案采纳与否代表大会有最后决定权。”

“对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如果代表大会有違反国家政策的事情，或違反党员利益时，党委可以向学校的上級机关上訴，但党委不能改变代表大会的決議，只有上級才能这样作。党委改变代表大会的決議就是以党代政，就是回到了党委制。

为了保証党的领导，党员可以在代表大会中占一定比例。参加代表大会的党员必須是懂学术的人。

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單可由党提出。但党委不能自做决定，应与民主党派及工会協商提出，而且名單要加以公布，讓全校成員討論，然后才能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胡大展）

“党权、人事权、行政命令权、学术权都集中在一个校党委手中，

这样不能發揚民主的，党委应存在，但应吸收各方面的人組成最高决策機構，領導全校。”賀安反动方案發表后，郝竭力頌揚，并說：“學校領導可以選舉，高教部也可選舉。兩院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郝正宇的材料）

“学术上党領導后，学术空气不濃，教育上是教条主义，應該取消党委制，或以其它各类型委员会（群众能參加）輔助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学校應該扩大校务委员会的組織和权力，吸收熟悉自然科学，具有丰富教学經驗的教授、教研室主任和学生代表參加，討論和決定教学計劃和关于自然科学的領導。而党委在校中專管政治思想領導，人事調配和財經管理，党委会和校务会的关系应相同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党委当作最高权力机关是不好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大学生不会那么愚蠢，我同意党委領導的校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王树才）

“要把职工代表大会貫徹到學校……學校可召开全校代表大会，由校長、职工、教研室、学生參加……代表大会的常任委员会为校务委员会，主要貫徹校代表会的決議，校务委员会可分設經濟福利、学术研究、专业教学、招生毕业生分配、学校內部矛盾調解，人事監察等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工貫徹与監督上級的意圖監督各部門……校务委员会監督校領導与決定重大問題，校代会決議首先党委应采用具体措施保証执行，校代会为最高权利机关……”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洪維政）

“班里由选举产生班委会，設班主席为最高領導，主席下設委員，軍体委員受学生会領導，不考虑党的領導。”后改为“班委会由选举产生，党、团不能参加，班委会和党、团是并行的，班委会研究决定工作，党、团可以参加，班主席領導班委会，班委会受系办公室和学生会的領導。”

“集体制(會議)办校，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由各方面的人选代表組成，其下設教学、学术委员会，搞教学与学术研究；行政會議、党委放在这里(即把党委放在行政委员会里)研究行政工作。校長由国务院提名，由校委会选举，校务委员会三分之二通过决定再貫徹执行，党作政治思想工作，但不能作决定，党保証决定执行。”

“校务會議是决策机关，党委不是，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校長相当主席，党委相当党中央……”“党的領導是思想工作，而对某些重大問題沒有决定权。”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林忠仁)

“在科学部門，高等学校里，党領導思想行政工作，科学家專家教授領導业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芝文)

“等条件成熟时，取消党委制，由职工大会选举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来領導或者党委名單要在职工大会上由群众通过，群众有权罢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鮑子津)

主張在高等学校中采用“民主办校”，“政党与政权不是一回事，决定权完全放在党委，这个民主形式还有缺陷，并不十分民主，如人民代表大会既民主而且也貫徹了党的方針政策，决定权完全放在党委，在高等学校中是不恰当的。今后高等学校如何办？我的意見是在不違反高教部的方針政策下主張‘民主办校’这并不是把党看成在野党了，关于党的方針政策是否能貫徹不等于要由党委作出决定……

因中央有控制权，校代会的权利是有限制的，且党员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也会貫徹党的意图。”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资料员 刘运梓的材料）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妥，生产、文化、经济建设上的事情，牵涉面广，关系多，只有党来搞，就会发生很多问题，我们学校的独立思考开展不够，就和党委制有关，它没有系统的很好的吸收群众意见。我们学校到苏联搬了一套，结果使学生质量大大降低。（意思系指同一专业毕业的学生解放后质量大大不如解放前——原编者注）从目前情况来看，民主办校是最恰当的形式，可以吸收老师和学生的意见，党委对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只能作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徐上迈）

“加强学校领导应取消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过去非党校长无权由党员付校长包干。”“党委制存在很多矛盾，目前人民大学教学质量差”就是因为党委制的存在不能发挥教授、民主人士作用因而也不能改进教学。”

“历史系党总支，根本不懂教学，提不出教学计划来。”谩骂党总支委员何干之乱搞男女关系，李中秋靠老资格、喊口号吃饭，刘经宇不学无术，王万军只能搞行政领导，高庆永出身微贱。他大叫道：“这样的总支委员怎么能领导教学呢！”所以他主张必须“以校务委员会代替党委制领导”“党的领导可以通过党员个人来贯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的材料）

“我不同意党委治校。党的领导不一定每个岗位上放一个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党在学校中不能有什么权力，唯一的道路是通过党员起模范作用。现在革命胜利了，搞建设了，党一定要做根本的改变。党员不应

該在上面發號施令，党首先退出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对賀安的双軌一貫制，兩院制我沒研究，不过我認為在基層單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对克服官僚主义，發揮群众积极性是好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应貫徹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对賀安的批評一方面要以真憑实据揭露其面目，另一方面可討論他提出的形式有無可取之处，我認為学代会本身并不消弱党的领导。取消党委制并不等于取消党的领导，党委制是领导的形式問題，按其原来之意，并不等于党的领导，在党委制下再加群众监督会更好，所以学工代表大会并不消弱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李民堂）

“为了加强民主，学校应有一个学工人員代表大会，这是个好形式。”“应有一个制度来保証学生、工作人員能够参加学校的管理，并监督学校工作，学代会有权对学校重大問題通过決議。进一步發揚民主，从制度上給人民权利，保証使人民从各方面监督国家工作，坚决克服以党代政，否則人民感不到主人翁作用。”

“学代会的性質：

学代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利机关，党委可向学代会提建議。

在我們学校里，党委的意見一定要經過学工人員代表大会討論，而且不要走形式，不能党委决定了就算。

党的决定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拿出来，不能由党直接拿出来，如果党委的意見和学代会的意見不一致，可以辯論。

学工人員代表大会是全体学生、教师、工作人員参加学校管理和对学校行政领导有权利进行监督的機構，代表可以分別按一定的比例，由学生、教师、工作人員选举代表向选举他的單位負責，代表如果不称职时，选举單位的群众可以有权随时撤換。

学代会的职权：

(1)听取和討論校長的工作報告。

(2)審查和討論學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研究計劃,基本建設計劃及與此有關的重大問題,討論高教部工作的指示及學校執行的具體辦法。

(3)審查和討論與校教師和幹部使用情況,級別待遇,工資調整情況,對工作優秀的教師、工作人員和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給予獎勵,(大會通過以校長名義發布)。

(4) 審查和討論有關行政事務的事項和全體學工人員的集體福利問題,如房子分配,醫藥衛生,伙食管理,文化生活等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非在大會上討論,也可以交於一專門組織研究)。

(5)在不違反上級機關的指示、命令的條件下,在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就上述討論的範圍作出決議,交學校行政和其它有關方面執行。

校長若對大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可報上級機關決定。……如果行政領導不稱職,代表大會不僅有權給以批評,而且還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建議上級機關撤銷他的職務。

校長也可由群眾選舉產生,學術機關的領導人或教研室的主任都由群眾選舉。”

“學生會應擴大權力,管理學習、教學、考試、科學研究。組織年級學生會。學生會要有選舉權和罷免權。象李教條(指李桂榮老師——編者),姜迷糊(指姜秘書——編考)這樣的可以罷免。把學生會改為學生代表大會,每二月定期召開,系主任向大會報告工作。黨團今後搞思想,學生治校。”“賀安提出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嗎?黨委制只是一種形式,取消黨委制並不等於取消黨的領導。用發展眼光來看,將來不一定要黨委制,雙軌一貫制是新問題,暫時行不通。”

“實行‘理想國家’的具體制度。林希翎感到不是主人翁,我想學校中學生應當成為真正的主人,當時想過學生治校和校務委員會治校、教授治校相比較。學生治校學生委員會掌握全校權力,行政機構要向學生委員會報告工作,此外,工廠中也要由工人委員會管理,和農民一樣自己掌握生產管理權,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選上台後當四

年，下台当老百姓，这样人民才有积极性，自己考虑当个学生委员会的委员还可能，再高一点选上国家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本身的提法就不对，因为非党校长没有向党委负法律的责任，党委的决定，只能通过党员付校长和非党校长商量办事，如果党委决定，非党校长必须执行，就是以党代政，一长制不会产生独裁。我主张以党委通过校长治校，我的主张是一长制与党委的折中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 孙 全）

“党委制是过渡形式，而最好形式是代表大会制。”“过去党发动群众不是发号施令，今天党成为执政党后，中央未变，而基层变了，这就容易形成命令主义，为了克服此种现象，在基层（企业、学校）有必要实行代表大会制度。”主张在班上成立“五人小组”，而不是党来领导。党是“建议性质的党，党委和党支部只有权提出建议交代表大会或班的五人小组讨论通过决定，这种建议性质的党不但不会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反而会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党不应进行形式上的领导（即指组织上的领导——编者），而应进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领导，就是通过党员模范作用和马列主义教育提出建议来实现党的领导。若在代表大会或五人小组中，党员选不上，说明党员工作的不好，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对党员也是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顾佩弦的材料）

“我同意党委制，但以后要扩大民主，属全校性的问题，应该公开给全校师生讨论，吸收群众监督，不了解情况无从监督起，宗派主义提党内还是党外？不清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陈祖武）

“賀安提的共产党‘先天不足，后天失調’是对的。‘先天不足’是指共产党沒有建設的經驗，沒有搞科学的經驗。許多教授也就因此覺得党委治校改为民主办校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何国芳）

“据我的看法如果党员少，群众多的情况下，党员不得不听听群众的意見，可以实行（党委制）。但党员多，群众少，象我系就不能实行党委制，因为党员不能反映群众的意見，党内决定了算……”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徐增明）

“党委制是一种领导企业、学校的方法，不是目的，既然是方法就不是不能改变的，不要党委制不能就說是要推翻社会主义。什么事都由党员去做，必有偏差。”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若縈）

“这样的（党委制的）爭論不必要，很显然，是党员和非党员爭論，党员贊成党委制，非党员就贊成民主办校。”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林忠仁）

“党委决定后，校長一定执行就是以党代政，就是宗派主义。党委制是以党代政的根源，因为人民代表不能直接檢查党委工作，他是有职無权。”

“党委制是党内直接民主，对党外是間接民主，同意賀安提出的党委制的四个缺点。我校党员占半数以上，党委制代表群众意見，但党员少的地方，党委制就不一定能代表群众意見。”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荣 斌）

“我同意双軌一貫制，这并不削弱党的領導……中央有人大，但基層沒有，只有几个党委委員决定，为了扩大民主，在各單位有党委

存在，另還有校委會，它有決定權，黨可建議，中央人大可以建立各個院（教育監察等），校務委員會，可選些民主黨派成員，這也可以促進黨員的模范作用，不一定要把黨員都放在領導崗位上，把他們放在附屬機構去，而讓一些懂技術，懂業務的人來領導。”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束洪濤）

“明確一下領導性質，教學，學術機關，政治思想是不能忽視，高教任務是培養建設人才及研究人才，而方針政策已貫徹了黨的領導，貫徹到具體學校中，黨委決定一切已產生了一系列缺點，黨委治校是有這種說法，成績當然是肯定的，而滿足於現在成績會妨礙科學的進展。”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林忠仁）

“民主治校，把黨擺在一邊，我也這樣主張，如果不是批判了賀安，我寫文章也會把黨放在一邊。”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楊學民）

“黨委制有缺點，不能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老教授的積極性。黨委制也不能做出全面的決定，因為它不懂業務。”所以吳漱玉和馬孝樵等人主張取消黨委制並且制訂了校務委員會的方案，作為小集團向黨進攻的綱領。

他說：“說務委員會是決策機關，黨委是高等學校的主謀機關，對學校的重大問題，沒有決定權，並和其它民主黨派一樣，只有建議權，黨的建議必須通過校委會討論作出決定才能施行，若校委會和黨委會意見有分歧時，學校行政應執行校委會的決定，黨委可以保留意見。”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吳漱玉的材料）

“黨委治校就是民主治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實行時間很短，八大後才提出沒有負于時期的考驗，從哲學上講不能把這種辦法否認，將來黨委治校一定和現在不同。”認為“賀安提出‘雙軌一貫人

民代表大会制’是缺少法律知識的提法，有些小題大作，从思想上說有点极端民主化”。并提出加强党委治校的八点建議：

“1. 党委决定大政方針的問題，一些小的問題由行政部門决定，一切問題应征得校务委员会的同意，加强学生会，工会的权力，把权力下放。

2. 应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在重大問題上应取得各方面的協商（民主党派、青年团、工会、学生会）取得一致意見，它并不妨碍党委治校，在各方面的問題应分別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見。

3. 建議党委会定期檢查学生会、系行政与教师的工作，克服官僚主义。

4. 一定要人尽其才，正确貫徹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知識分子不被重用是很有意見的，总之要發揮他們的才能，事实也証明这一点，如李景汉老教授。

5. 工会、学生会一定要代表老师与学生的意見，不能把学生会变成文工团。

6. 拟定規章制度將具体的东西以規章固定下来。

7. 党委决定重大問題后，一定要通过行政系統下达，以便跳出煩瑣的事务中，有些事交給学生会、工会去搞。

8. 对学术領導应交給有学术的人去領導，学术委员会由有本領的人去搞。”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孙毅剛的材料）

他提議在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度来治校，在他所主張的“校务委员会制度”中，党委的決議只是建議性質，校委会有最后决定权；但在校委会中，他又認為沒有必要保証黨員的比重。他主动找出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中黨員很少的例子，供給和他意見相同的人在大会發言，論証校委会中不必考虑黨員多少。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 陈复之的材料）

“假如党願意自絕于人民，繼續堅持自己統治，那干脆就把学生会，系办公室……必要的組織取消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多沒有实权的傀儡組織呢？”

遺憾的是党現在还一股勁地加强統治，居然要实行党委制，这是值得考虑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消灭党派，今天的統治已造成了三害后果，請勿再加强統治了——‘老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政 軍）

“党委制領導有六大缺点：

1. 宗派主义：黨員不懂科学，沒有办学經驗，宗派主义教不好学生，如工业經濟系毕业学生人家不願要，只懂馬列主义不懂业务。

2. 主觀主义，什么事都决定，学习苏联光学俄文，如历史档案有很多德法英日文件，將來工作怎办。而且看不到別校，党委不吸收別人意見。

3. 官僚主义：片面汇报，只听黨員的意見，民主人士的意見反映不上去。

4. 影响群众团体活动自由，如学生会工作一定要通过党委，但只領導而不帮助，班主任推动不下去。

5. 党委制妨碍發揮自由思想，有时提意見就扣帽子……。

6. 造成黨員的專权和特权思想，有些黨員認為自己了不起了……造成黨員自高自大，如何办？領導科学的發展光靠黨員不行，必須把懂科学的知識分子，吸收来与同学、教授共同办好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楊 芹）

“党委制問題，这只是形式，主要問題是教权下放，交給老教师，更多的依靠他們，才談得上改造，不依靠就不必改造。我們是需要改造的，但离开了工作，改造是不行的。靠青年改造老教师作用不大，他們年青，生硬，以改造者自居，对老教师的自尊心伤害很大，老教师感情上就不能接受。”

学校党的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呢？应当公开。党的小組会也可以吸收群众参加，大开門，使党外团外的人对党团工作有监督作用，同时对群众也是很大的教育。整风的过程就可以把門打开，现在是半開門，光讓党外人士提意見，党员有意見回去提，关門研究。应当開門整，这样才能保証党的純潔，使党员在群众中生根，在学校这样作是有条件的，应当从開門整风到開門作党的工作。”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說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淡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綫（指党的工作——原編者注）总是比你走得快。”錢偉長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長，现在是付校長。記者就問：“这是否牽涉到有职、有权、有責的問題呢！”“当然完全無权也不符事实”他分析了这种值得令人深思的情况。錢偉長說：“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圖貫徹起来很容易，我們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兩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見，决定以后就保証执行，姑且称它謂‘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間是怎样討論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問題就茫然無知了。他还举校务委員會的例子說，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問題时，总是由党内負責干部介紹一下情况，問題分析得很全面，誰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順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資料我們不知道，我們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場合就很难發言。他說，校务委員會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並沒有發揮党外人士的作用。”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誰呢？應該主要依靠老教授。”錢偉長以肯定的語气說。他認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計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問題。他說：“現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兩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牆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發揮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錢偉長認為这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實質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老教

授同青年教授擱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为什么許多老教授不願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而要到科学院去呢？是單純地为了研究工作么？不，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宏靜穆肃的空气实在使人难受极了。”他举了許多实例說：“老教授們認為沒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讓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級等重大問題也都沒有征求过教授們的一点意見，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綫。”他說：“在苏联，一个教授、教研組主任是受学校和人們莫大的尊敬的。在苏联作教授的可以任意挑选助教作为他的助手，如果教授認為他的助手不够称职，也可立即除名辞掉，学校当局是十分尊重的。”

（清华大学副校長 錢偉長的材料）

“学校所有的缺点，是由于党領導产生的，刘昂是不学無术的人，不懂裝懂，至于一些老干部是沒有学問的，不能領導学校。学校要办好，應該讓老教授来办，不可以党来包办，上海一些高等学校都贊成民主办校。”

（北京政法学院 張京华）

“現在該人民向你們清算的时候了，这些坏人坏事的存在發展一定有領導上的支持，这和党委制不是沒有联系的，取消党委制！一切权利归于校行政、学生会、班会，我要求政治上及其他方面扩大民主，那些东西是党内‘英雄’們可以知道的，那些东西还可以讓非党的‘群众’知道，也应有明确規定……”

（北京大学 严仲强）

“党委治校是一种不正确的制度，它以党代替行政，它以机械的一些原則代替了多样的民主生活，它限制了教师积极性的充分發揮，它妨碍了教学質量的迅速提高……有害于党，有害于群众！”

民主治校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它是办好学校的保障，它是使我們真正成为科学人材的保障，它是發展文化科学的保障，它是真正民主的保障。……它大大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

取消党委制是根除‘三害’的途徑之一！”

（武汉大学 李旦初）

“党委制肯定是要不得的。参加党委会的是那些人最多呢？第一是老干部，他們文化低，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更外行；第二是年輕的党员教师，他們有热情，但沒有經驗。这些人組成的党委，要領導这样龐大、复杂的一所高等学校，怎么可能？教授治校也不好。过去有些大学搞教授治校，只决定聘請和教学行政上的重大問題，事情很少，开会也很少。現在問題太多了，至少每周都得开一、兩次会，我們要專心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那怎么吃得消？”

（武汉大学 曹紹瀾）

“学校的政策是要党的領導，但找一些文化水平低的老干部来領導，真是荒謬，总支和支部也找一些业务不高的年青人来領導，也是荒謬。”

（北京矿业学院 楊仲平）

“学校应成立校务委员会，这委员会由教授組成，領導学校教学、科研及教师人事工作，校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会計劃由校务委员会批准，党委在学校中只能領導行政和思想工作。”

（北京矿业学院 梁幼俠）

“学校党的領導不懂教育，用搞軍隊、工厂，打游击的办法搞教育。”

（北京矿业学院 陈华汉）

“党委制在中国不适合，宗派主义与党委制有关。”

（北京矿业学院 尹毅夫）

“党委治校总有問題的，因几年来我校党委成員並沒有熟悉业务也沒有去熟悉之，党委应广泛吸收精通业务者的意見，教授治校主

觀，可能會產生宗派主義，但只是黨委治校也不恰當，贊成民主辦校學校領導核心應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按一定比例組成，黨委與教授各占百分之三十五，其他人士占百分之三十。”

（北京礦業學院 荆元昌）

“學校黨委負責制在我看來就是造成目前高等學校混亂，質量不高的基本原因，因此只能改變高等學校的體制方可能從根本上改進教學工作。基於這種看法我認為高等學校的現行黨委委員制是不必要的，應代之的是教學人員治校，其理由如下：

首先高等學校是科學研究和學術機關，是培養國家高級建設人材的場所，不是一般行政機關，很顯然他的任務是搞教學，而拿我院黨委和其他高等學校也差不多黨委委員中都是些不學無術的‘一介武夫’，學術上全是外行，既然如此，他們只能研究一些一般行政事務，要想搞好領導教學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再則，高等學校是以教學為主，無疑的教授就是核心力量，而且教授有專長並富有教學經驗，是內行人，內行人作內行事，自然駕輕就熟也易于了解和掌握教學規律，所以教授治校是最為適當的。

第三，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領導黨，作為上層建築的教育和學校也是掌握在國家和人民手里。

毛主席說過，我們的高等學校是社會主義類型的，而且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總的來說，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同時高等學校上有高等教育部和黨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還有學校師生員工的監督，難道沒有學校黨委制就不能貫徹方針政策嗎？我看不得。所以黨委制在今天高等學校的存在除了機構重疊外，實無必要。

第四，學校若有共產黨就會有其他民主黨派，它們就有各自的成員，有定期的組織生活，這些是要花費時間和精力的，實際上把所有有限的時間精力浪費了，既有黨派存在就有非黨人士存在，黨派間黨群關係不可能不產生矛盾，黨委的存在這就不是解決矛盾，而且加深矛盾，黨委制存在是不能根除這種現象的。

总之，我觉得我国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了，主要是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学校的党委制存在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楠 木）

“主张校委会治校，校长受校委会领导。校委会由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组织，相当于议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做共产党不必担心会落选，因为很多党员还是受人爱戴的。系会也同样组成，而不是象现在一样，决议先做好了，拿出来走形式。”

（天津大学 杨学澹）

“党委会应退出学校。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载在宪法上，党委会在学校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弊多利少，党员向党报告教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教员怎么积极起来呢？不懂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

（北京大学 胡稼昭）

“党委在学校应以协助形式出现，过去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不应按自己的意图办学校。”

（湖北医学院 李雨亭）

“党委在校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党委领导不能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影响他们进修和教学质量。老干部是没有学术的，他们领导学术是不好的。……党委在校只进行政策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其他行政工作。学校成立院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有最后决定权。委员会由选举确定，以德才兼备为原则，不应看是否党员，院务委员会下面成立学术政治委员会。以党代政的形式是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党是执政党。会产生骄傲情绪，对外不信任，一切自己搞……我院学风不强，与党委领导有关。现在院长左手是党委会，右手是院务委员会，这样就不民主。院长是党委会的，又是院务委员会的领导，这样党委

的決議就很少通不过，等于以党代政。党委会应只管思想不管学术。”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我就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我只知道有个行政，我不属于党领导。”“共产党退出学校，什么党不党，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科学研究，誰也别管誰。学校內搞政治工作的干部用不着，××应当撤职。”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講師）

“党委会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学校，应该民主办校，应该主要由教授，其他是講師、助教来选出一个院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

（北京航空学院两个助教）

“学校党委负责一切（不论什么）的制度，是造成三害的原因。以后扩大民主，也不能保证無三害”。“是不是以后体制改成一半由党委，一半由教职工代表的机构。其中起草的核心组也是一半一半。”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講師）

“学校生活应该进行大改组。机构重新设立，成立三个部：教务部，行政部，事务部。这样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而党团则不直接干涉行政；只起监督保证作用，因为党团活动是党团内部问题，应严格分开。”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教学方针办学校，也同样服从党的领导，何必要在学校里另搞一套组织机构？”

（北京政法学院 侯振华）

“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的，因为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

导,所以不要党委制并不是說党不領導了。”

(北京政法学院 錢端升)

“民主办校正确地党的领导下运用民主集中制,同时应有一个組織机构来集中大家的意見,因为党员同志办校对过去的东西……完全否認。”

“政法学院依靠誰办校,这个根本問題还未解决,現在报上逐漸明确依靠教授办校,政法学院应依靠老干部、老教授办校,而不要是依靠老教授。”

“立即成立院务委员会,結束以党代政的局面(撤消党委会,取消星期六党团活动时间)院务委员会决定学校一切,我們要求給院長以实权,有权(决定)聘請教授。”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目前实行的党委制、党政不分的情况更使民主集中制縮小范围,形成党员有民主,当主人;群众沒有民主,自然自卑。”

我認为党就是党派,代表一定的政治主張,他的主張对,人民自然采納;不对,也無接受之必要。党委领导制沒有必要。党不能干涉行政。”

(北京石油学院 王光墀)

“有党委制的存在,就使民主人士有职無权,例如党委意見与院長意見矛盾时应听……党委的,院長不就不算数了,还称院長嗎?”

(北京政法学院 林道廉)

“民主办校实现以后,結束以党代政的局面,由校內各民主党派、教师、学生、职员、工友选派代表組成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决策的机关,校內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經過征得它的同意,并向全校公布,否則一概無效”

(北京政法学院“自由論壇”編輯部“十意見第一條”)

“無产階級專政不一定要共产党領導，所以建議我們不妨試一試取消黨委辦校。”

(北京政法學院 王明欣)

“學校所以產生一切缺點，其根源就是宗派主義”

(北京政法學院 黃盛業)

“由於黨委制的結果，才產生了以黨代政，不民主的現象。例如去年提升科級幹部，就沒有經過院務委員會的討論通過，而只是黨委決定的，這是不合適的。

高等學校不是‘三害’辦事處，升官發財欺上瞞下，吹牛拍馬，耍把戲、賣手段、投機取巧，販賣學問的地方。”

(北京鋼鐵學院 趙錫霖)

“如果把它(指民主辦校——編者)了解為各種類型的教師參加的院務會議，由這樣的院務會議來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那末，豈不可。”

(北京政法學院 羅典榮)

“黨發展大，但應注意質量，現在造成工農黨員不大懂業務都派去當大領導。在學校中當領導的工農出身的幹部強調單純的政治觀點，缺乏學術空氣，造成學校像‘衙門’的正是這些不懂業務的人。黨委書記應由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黨員或省委書記兼任。學生到有特務氣氛，學校中非學術性質的機構應取消，以取消‘非學術性機構’之名行‘黨委出學校’之實。”

(雲南大學 金若虛)

“黨以前在學校的作用是監督和保證，八大後則提出黨委具體領導，我認為黨委具體領導有困難，因為不了解教學。我認為在學校的作用應是：在總的方針政策方面起領導作用，在政策具體執行過程中

起監督作用，在進行全體成員的政治思想教育，積極完成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起保證作用。至於具體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工作，最好由院務委員會或學術委員會來領導。”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陳 健）

“……覺得黨委制有片面性，會產生‘黨與行政的矛盾’，‘黨與非黨幹部的矛盾’。

不同意黨委制，因為它是最高決策機關，會產生片面性。不同意教授治校，因為它思想性不強。而主張‘民主辦校’，擴大院務委員會，使得院務委員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樣，成為最高權力機關，黨委對重大問題的意見，可帶到院務委員會去討論。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德’‘才’的看法。所謂‘德’即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要再考慮其他問題，如歷史問題。所謂‘才’應到學生中間去找。領導對人不對事，只重德。個人有歷史包袱，入黨問題解決不了，在德的方面無可指望了，這一切都是因為黨委制的片面性。如果決策機關是院務委員會，則可以在提拔幹部時更加重才。”

（北京体育学院 馬志偉）

“山大黨委捏造，說明高等學校黨委最大多數是不學無術，怎能領導高等學校呢？……必須取消黨委制才行，否則學風建立不起來。共產黨員戰鬥意志很強。但現在不打仗，故捏事實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學風當然建立不起來。”

（山東大學 任恩照）

“我要掌握關大並不難，我知道大多數教師和學生是歡迎我們而不喜歡黨的。

干脆不要黨委會，要黨退出學校。

系里因有黨團員作秘書，系主任就發揮不了作用，首先應接替這批人，應由系主任自己挑，如果民盟與九三關，不得已時讓給民盟，也

不要党、团员。”

(蘭州大学 陈时偉)

“拥护共产党领导大学，但必須是通过党员个人在民主的校委会、科委会、系委会等机构，再通过党员个人在工会，在具体工作中的模范表现(包括教书、教研领导，反对‘党委制’)！”

“党如何进一步领导好高等学校，目前的讨论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甚至不能令人理解。如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高等学校看成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独立体’……而不管高等学校的上面已经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与‘党委的领导’，‘党委领导制’、‘党委负责’、‘党委负责制’，混为一谈，……也有些人仍把高等学校，看成是军队，工厂、企团仍用领导军队和工厂的制度或办法，领导高等学校。

我认为，在‘校长负责制’中校长具体领导高等学校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还领导高等学校执行经过他批准并且已经有党的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关于重要校务工作决议或意见，这种制度，在原则上是很好的。他并不排斥‘党的领导’。”

(山东大学 辛学毅)

“为了在党群之间做好拆墙填沟的工作，撤销学校的党委制，建立校长(指正校长——原有的)负责制，是必要的。

……如果正校长不是党员，那一定也是一位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他应该也能够很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如果他不能贯彻，那我们就要不任用他做正校长；既然任用他，那就该相信他，不必用党委制来在他头上再摆一个党委书记。如果解放初期有这个必要的话，在现在是应该改变了。”

其实撤销党委制，是反对以党代政，至于党委会还是可以存在的，作为领导管理学校党员的机构还是需要的，而总的领导，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的领导。……”

“党委制和三害不是兩回事，而互为因果，那么我們在討論党委制的同时，也应揭發‘三害’……”

“看来这个問題（指党委制的问题——原編者注）各大学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毛主席也提出撤銷，可見这个制度是有問題的……”

“学校实行党委制，則是校長沒有最后决定权力，而党委書記有。党委書記如是正校長，这样可以一身二任，自己听自己的話，但如校長为党外人士，則校長要听党委的話……”

“学校中执行党委制必然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在系里則成为秘書專政。……”

“党委制、常委会、党的领导这三者是不同的，不应混为一談。如有人認為党委制不应撤銷，党不能退出学校，要加强党的领导。这就是把三者混在一起的看法。”（山东大学 陆侃如）

“党委制有如下缺点：

- (1)民主空气不够；……
- (2)隔靴搔痒；……
- (3)人事机构龐大；……
- (4)系秘書專政；……
- (5)以党代政，有职無权；……
- (6)教条主义；……
- (7)宗派主义；……
- (8)‘积极分子’路綫；……”

“党委制是有些缺点，民主空气不足，征詢意見不够是其一；党委不熟悉业务，领导隔靴是其二；連系里也党委制起来，恐怕是其缺点之三；民主办学的提法比較合适，民主办系也应如此。”

（山东大学 景振华）

“讓不懂高等教育的人来办高等学校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

蘭大黨委盡是些外行，不學無術。

行外，不懂科學，道理講不通。什麼事他（指黨員校長——原編者注）一個人作主，還不如換個聽話的付校長。從黨員正校長一直到下面所有的黨員都是外行。

現在學校校長是上面派來的，就使多數人向上看，不向上看，看不起教師，不走群眾路綫。

不要由行政上級來決定校長，付校長，總務長，應該由校務委員會選舉，這樣才能發揮廣大教師的積極性，這樣做可以使教師當家作主。

多數學校可以在黨指導下，實行校務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院）長負責制，黨負責政策方針方面的指導，而校務委員會應當成為校內最高權力機關，它由經過革命鍛煉的黨員幹部，學術有根底的教授和少數優秀的青年教師組成，但應以教授為主體，人數以20至40人為宜。負責審查教學計劃，人事編制，經費的預算，以及選舉校（院）長和付校（院）長等重大問題。由校務委員會選舉的校長，付校長，負責處理校內經常性的工作，並對校務委員會負責。”

（蘭州大學 陳時偉）

“我是不主張黨領導一切的，我認為黨不要領導教育系統（高等、中等、小學）和科學院，自然科學部門……黨要領導的則是行政機關與廠礦企業就行了，只要能掌握經濟命脈就行了。”

（蘭州大學 田昌文）

“群眾的怒吼聲，叫不醒我們的黨委委員們，萬丈高牆將我們隔絕了人世，農學院一片冰天雪地，百花不放，百草凋（凋）零，覺醒的人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我們要放！我們要鳴！院黨委不領導，我們還是要鳴，我們是忠心的擁護黨中央的整風指示，我們要以青年的熱情和勇氣，以卡秋莎的威力向官僚主義開火，不得結果誓不收兵！”

（四川農學院 汪樹倫）

“不应把不懂业务的人派到学校去作领导，不要以为派一个党员就能解决问题，不要把党员是特殊材料看得太特殊了，没有党员校长时，我们也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武都师范 赵梓辉）

“党政不分是一切毛病的主要根源，过去党委与党组织的权力驾乎一切之上，非常可怕。那权力究竟是誰給他（指共产党人——編者）的？宪法上有規定嗎？沒有。宪法上只規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没有規定属于党……。国民党时有党天下的情形，现在是否相似，我想不通，有人說党委制是三害的根源不無道理。”

（中山大学 張良修）

“学校党委是喝清茶、躺搖椅、住在深院高閣，把群众的呼声当作散心的微风，閉着眼睛，噴着烟圈，千万条意見，一条也沒回答。”

（中山大学 周爽）

“党委書記没有什么知識，只好回家种田、杀猪。”

（中山大学 刘紹良）

“共产党员水平虽高，不懂科学，也不能办学校。毛主席提出1962年要达到世界科学水平，再用党委制就会有問題，唯有民主办校或者有帮助。”

（中山大学 吳重翰）

“企业中产生官僚主义，是因为党不懂技术，所以党在企业、学校中存在存在就不起作用。”

（中山大学 郑家安）

“党委現在还不懂办校，党委許多事是非行，包攬一切是不行的，

現在高等學校領導人不少是共產黨員，因此黨委制可有可無的。”

（中山大學 董每勤）

“學校一定由黨來領導，但不要黨員來領導。”

（中山大學 吳重翰）

“學校無需黨委制，而要校委會。各民主黨派，黨委參加便可。”

（中山大學 陳世伊）

“黨不懂科學，黨委制在工廠學校實行的結果，必然引起官僚主義……，民主黨派民主力量和共產黨組成聯合機構來管理學校。”

（中山大學 區迅波）

“中共和民主黨派可以通過校務會議來進行監督學校的工作，校務委員會在目前可以採取協商辦法產生，這樣就可以克服黨委包辦現象。”

（中山大學 葉啓芳）

“校務會議的人選應由校長及各級行政負責人居其半數，其餘大約半數則由資歷與學術地位相當之教師輪選之……”

“黨委與民主人士協商辦校成立校務會議並保證校務會議為最高決策之機構”，使“校務會議賦有訂立全校教學行政制度之大權，舉凡學制、課程、招生、人事、教學設備、出版及財務預算等重要問題均必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付諸執行。”

（中山大學 鐘期偉）

“高等學校應該由教授來領導，黨委也可以參加，有事大家商量，商量好了由校務委員會去貫徹執行。”

（中山大學 董每勤、詹安泰）

“黨委制問題在於以黨代政，黨委代替了校長，這種越權的做法

是不妥当的。学校有党委制不要紧，但必須是由高級知識分子黨員党委才行。”

（中山大学 叶啓芳）

“党委負責制將來是可以实行的，但今天这种条件还不成熟，有困难，原因是：第一、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第二、易产生以党代政个人有职無权不好进行工作。因此目前的办法：應該在党委和行政之上建立一个‘核心領導’，由行政方面負責人和党委組成，并考虑民主党派参加……”

（中南矿冶学院 陈新民）

“党委决定一切，我坚决反对系主任不能做决定工作，不同系主任商量就是党天下。”

（中南矿冶学院 黃际春）

“校刊應該由教师和同学来办，党委不可橫加干涉。学校應該取消党委制，讓賢者办校。每个学校可以有自已的特色，不必强求一律。”

（同济大学 張稚微）

8.“宗派主义”

“我現在来談談宗派主义，我来人民大学較早，又是領導，所以对宗派主义知道的多些，自己也沾了些宗派主义的光。

关于評講師升級、待遇問題，……这方面的宗派主义更严重如：机达（黨員）文化水平很低，当时只有小学程度，恐怕汉字还没有小学生認的多，在內蒙做过区長，在本校做了几天学生，后調为研究生，来財政教研室作教員，講課，我曾說过：“机达基础差，又盲目自大，当时有一同志說（今日在座）：‘你別曲解党的政策’。这样我就不敢講了。

后来他不願做教員，就去銀行教研室作秘書，但也不称职的，而經常抄包德列夫專家講稿去新建設登，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典型。”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教研室付主任 王旦堅）

“由于黨員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調，有意無意地产生宗派主义，許多黨員有形無形，有意無意地产生‘党天下’，‘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在很多黨員中，特別在新黨員中，由党委制發展到黨員制，以党代政發展到以黨員代政，黨員說的話就算。党委制是直接的民主集中制，对党外人士和人民來說，是間接的民主集中制，党不能代表全民利益。黨員官官相护。”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賀 安）

“过去組織上对一些个人主义严重和有历史問題的人进行帮助是錯誤的。对这些人應該重新评价，这些人問題的產生是教研室宗派主义的結果。对历史問題的看法，造成人与人間的差別”。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郭振淮）

“一个醉汉在餐桌前的演說(小品文)”

“依靠地球的轉动，兄弟的党龄不断增加，虽然無才但是有‘德’。想当年，打过游击、搞过土改，完全有案可查。（举起酒杯）

× × ×

兄弟‘高小’毕业，你們看問題要全面，不要只看后面的‘小’字，还請注意这个‘高’字。因此‘德才兼备’，組織上讓我做个系主任，区区小官，不值一提。（說話时唾沫横飞）

× × ×

領導为了照顧兄弟，又給我加了一个‘学官’，人称‘副教授’。我最近学会了一个外国字，那就是偉大的 KNTAN，再学会几个字，我就要到苏联去留学。（閉起眼睛）

× × ×

××、×××虽然有才，但是無德，無德就不能入党，不能入党也就是無德，無德就不能升教授，这是兄弟的一点小小的發明。（看看天花板）

× × ×

最后談談私生活。說来慚愧，兄弟虽然立业，但是还未成家。这个問題也必須走組織路綫。兄弟的条件不高，只要对方十八岁（和我参加革命的时间相当）。”

.....

“教研室学校無論在人事安排，教学工作，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存在宗派主义。

研究生有意見，是因为他們好多是黨員，而我口袋里缺少一張党証。

党的宗派主义絞杀了科学，自己不是黨員劳动死了也不行。”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学說史教研室講師 孟氧的材料）

“党組織对群众态度是‘人格上加以歧視’。黨員犯錯誤只在党内处分、通报，群众犯錯誤受处分是公开通报，这是不公平的。派往苏联留学生也是党团员的專利品。群众被提拔是很困难，党的宗派主义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孔 釗）

“党是既得利益的‘宗派集团’。

党是一个宗派主义集团。黨員之間互爭名利。”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党的領導应強調政治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不是直接組織上的領導，如果強調組織上的領導的話就容易产生矛盾，这样就必須要使所有單位必須要安上一个黨員，否則就不易貫徹党的意圖，这样就必然产生宗派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徐 前）

“我們学校对群众，特别是老教授信任不够，应吸收他們办校的經驗，我三个校長沒有一个是內行，部長一級干部(李新、馬紀孔)也是同样情况。(系教研室)主任沒有一个是群众担任的(理化、数学兩教研室除外)。新聞系許孟雄(右派分子——編者)是全国第一流的外文教授，自去年才当上教研室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田 放)

“我教研室和学校党組織的主要缺点是‘宗派主义’，这表现在一切方面，即表现在生产，交換，分配，消費等四方面，(1)生产方面：是党在人事安排上有宗派主义，分配教学任务是按党龄，使他們担負重要工作，对年青教員長期压制，不讓講課，把一些四平八穩唯唯諾諾的人安排在重要崗位上，(2)交換方面：只許領導上和黨員来議論被領導和非黨員，否則是小广播，使其隔膜增大，关系淡薄，(3)分配方面：在評工資上有宗派主义，黨員不論担任工作如何，工資高于非黨員，这样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德劳分配，这对非黨員是消极因素，对黨員养成特权思想，同时他的劳动和所得就不成比例，不劳而获，这就是‘半剝削者’因此，他們就是缺德，(4)消費方面：食堂分等級，这是沒有必要的，它用价值規律来調节。”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濟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財政系宗派主义很濃厚，这是由于党天下的結果，党天下的提出代表了五亿八千多万人的呼声(1200万黨員除外)我反对無才、無能、無德的黨員作領導工作，他們無法領導教学与科学研究，不能使群众心服口服，过去不敢講，講了怕把历史档案翻破，我系領導在工資改革中是官官相护，分贓枉法，对一般黨員也照顧的多、提拔的多，在党群关系中，黨員表現盛气凌人，个别黨員有特权思想，过去群众受到的批評多，打击多，爱护少。”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助教 陈鼎)

“我完全同意王鏡芝(右派分子)把系比成封建統治,我系封建統治已形成宝塔型(也就是金字塔型)这不仅是我校,全国也是这样,不过我校严重一些,这个宝塔型的宗派主义是以高嵐为首在金字塔上,下有四个×(字迹不清——編者),我看不仅四个,我們这些五五型(55年华业的研究生)的在最底下,这个宝塔外面有鉄絲網,其中有很多堡壘,这就是各小集团(指各級領導——整理者)他們利用群众对党的信任为自己謀福利,表现在工資上,学銜上,提拔干部上以及对同志錯誤上,对下面采取了高压手段,我們是处在鉄絲網內,堡壘外的人,我們好象一个小媳妇,奴才,这样的人不少,有意見沒有發言权,跑到那里也是这样,因为堡壘里有机关槍(指批評——整理者)你一动就噠噠噠的打你,你以為离开人民大学这个堡壘跑到鉄絲網外会好点嗎?不然!全国一样,这个鉄絲網外还有堡壘,你又是处在堡壘外,鉄絲網里,在这种場合下把你培养成奴才性,变成一个奴才,把你的棱角都磨光。群众对党的信任,是党的本錢。宗派主义集团,即所謂領導核心的特权小集团,所謂冠冕堂皇的領導就在这里浪费这些本錢。”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助教 汪家祐)

“系的黨員都变了,他們不是分贓,而是公开的,愉快的盜竊。系的領導是家長式的統治,我同意說高嵐是伪君子‘順我者留、逆我者去’,范公荣、克宁夫的出国,与她的排挤有关。部分黨員是消极怠工,曉丘就是这样。我系的黨員什么都是享受在先、工資、級別学銜都是自己先享受。”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助教 梁尚敏)

“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是:(1)一部分黨員把群众看成落后,其实,有一部分黨員还不如群众呢;(2)黨員的恩賜观点,認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認為給你工作作、給你飯吃就不坏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語文教員 白 楓)

“为什么把中国革命史講成党史,这不完全是宗派主义嗎?”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韓洪楦)

“我企圖从这里引伸出取消这人为的障碍,限制个性發展的怪物,宗派主义的老祖宗——取消一切党派,才能永远拆除溝牆。願天下在無党無派的国度里快乐生活,願中国成为极乐世界的先驅者。”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薛新卓)

“党的宗派主义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中央应負主要責任……目前拆牆填溝,首先应当是共产党来拆,徹底克服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集体的自高自大,驕傲自滿,眼光短淺。听报告分等級,一样內容的报告,分成許多級听,这样沒有必要,造成宗派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若禁)

“党派(包括共产党)都是宗派主义,在整风时期要除三害,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应反掉。”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海)

“在提拔方面,不是党员就提不起来,例如我原机关一个青年团员,1950年起就是付股長,一直到1956年就因不是党员提不起来,而其他入党者則早已提拔了。我看,他的文化程度不坏,高中业,工作也不坏。我很为他打抱不平。又一次我在地委工业部开会,部長談到‘在我們專区里还有十几个领导干部不是党员必須加强领导’,我听了很难受。难道不是党员才要加强领导嗎?由此表明宗派主义是很严重的。”……

“我看中央的宗派主义也有,党员部長权力大,党组代替行政也有。例如人代大会有付委員長是党外人士,但国务院的正付总理都是党员,主席办公室的負責人也都是党员。我看这有宗派主义的現象。宗派主义是否是共产党本身有意識的造成的,我怀疑。甚而我認為就

是党自己造出来的。毛主席有宗派主义，因为国务院的正付总理都是党员，而这些任命都是毛主席批准的。

各項政策也是由毛主席批准的，各項政策的差誤，难道毛主席一点不負責任？过去一直归結为：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級执行时出了錯誤。这样說法是否正确？”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何国芳）

“我們班的主要問題，头一个就是宗派主义，党支部决定的事很难变，个别支部委員向总支汇报什么就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王書樓）

“党员只看群众的家庭出身，出身好不管什么问题都好，出身不好的，則思想也必然不好，是群众就一辈子落后，这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現。”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赵乃鴻）

“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党员领导，就难免产生官僚主义，初解放时，党员做领导干部，我同意，但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現，当时是必要的，可是現在則不然。解放后，強調党的领导，以党代政，沒有党委指示，人家根本不理。以党代政，对非党员不相信。1953年以后愈来愈严重，紀委、监委根本起不了監督檢查作用，紀委直接由市委领导，监委由市長领导，真正的搞一些大的案件、大干部違法乱紀案件，就完全没有作用。党委制有历史局限性。”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吳思偉）

6月2日彭化名叫南亟写稿說：“当然，学生对时代敏感，不大客气，……就是老祖宗要敗坏家业也不依，杀祖宗大义灭亲，……决定宗派主义是否还有党性，如再不觉醒，形式和内容，都是要革命，决不改良……。”又說：“七年来，我观察着这一个事实，今天已經發展成完

整的宗派和特权思想”……为什么忍心吃先烈用血灌溉的革命成果，为什么对群众的赤诚忠言，无动于衷……。”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彭程的材料）

“现在共产党已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是宗派主义集团，宗派主义化身，党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的。共产党过去一党包办，青年团也是宗派主义的，团和少先队是向上爬的组织，整风中应该反掉宗派主义，去掉一党包办。党应该由司令部变成参谋部，和各民主党派一样。这样党才‘真叫人民的勤务员’。各级党委是宗派主义化身，应以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代替党委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江泽纯）

“宗派主义产生于宗派……共产党是个大宗派。要消除宗派主义首先得消灭共产党，共产主义是大宗派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吴汝文）

9. 诬蔑党已面临“危机”

“党已到危机的时候了，这次整风要有90%的成效，否则要垮台了。

三年前谈话，只有和处长以上的谈，以下的谈不通，因为他们腰里插着红白刀子。现在处长以上的也不行了，得司、局长以上的才能谈了，这不是我王德周退步了，而是党、团员退步了。他们‘要用政权而顾小利’。对提意见的强用其法，而还治其身，这还算好，还没到‘用其法，治其人’的地步。

乐松生，是我的同事，问问他为什么维持几百年的财主，他说‘宗教’，‘与其雪中送炭，不如锦上添花’，这是他维持财富的哲学。

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对党员高看一眼，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是吃厚生，快吃垮了。共产党

是先天不足，后天不足，不是有强大的解放軍的問題，甚么时候都是武力战胜武力，但武力一定包含正义，毛主席說閘事架上机枪，这还好，麻煩的是机关枪倒过来打。‘五四’运动时学生起来斗争，調来一个师，把赤手空拳的学生压下去，这并不可靠，只有公理才可靠。

特权思想，馬克思沒有，只有特权者維護特权者，互相幻結，構成特权的宗派。矛盾有些可以存在，有些不能讓其存在，如豆腐和汽車的矛盾。市委蓋磁磚大樓，西單区也蓋大樓，現在又蓋区委会，書記和区長都有汽車坐，老百姓要做多少工，給他們这样享受呀！老百姓沒豆腐吃，乡下吃帶皮粮食，一天一斤，不够吃，这里蓋洋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我們教研室給同志們以思想上的压制，精神上的奴役……只許黨員議論非黨員，不許党外同志議論黨員，如果要議論就說你反党，造成一种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他們把这个叫做小广播，这是一种法西斯統治。”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濟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我們接触的黨員是解放后入党的，就是新的，这些人是唯唯諾諾不起作用沒有威信的人，不敢与組織違抗，缺乏独立精神，因此林希翎的講話，有部分真理，咱們的一般青年黨員我是看不順眼的。而一些老黨員和老干部又是不好的。他們几年来究竟提高了多少水平。他們文化水平不高，沒有业务，只憑黨員資格吃飯，不适合教学工作应干脆調出去做其它工作，某些支委象惡霸，粗暴、專橫、打击、报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頂帽子加在他头上都合适，是三个主义的化身，怎样刻划他很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

“党团员都是騙人的啃人的，党蜕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資料員 崔志敏）

“在解放时党员穿得破破烂烂，吃的乱七八糟，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在这些人面前我自己感到惭愧，但现在我不感觉怎么样，有的党员做的事我就不会做，如拿800元，党是好的但已不是个别党员了，与人民距离不是因党员多而接近反而愈来愈远不仅生活上高人一等。做官不怕大，但坐车就怕大，要坐小汽车，这种情况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比其系数多大，值得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韩光远）

“一切部门都有党员做头头，说党员一切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名利，党员提拔得多。对民主人士不相信，团结民主党派和衷共事，我觉得是假话。原来的民主政府三三制还象个民主，现在副总理都是党员，这算什么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士杰）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要一党专政，12个副总理为什么都是共产党员，这是否为了排除异己分子呢？全国各单位都有共产党员作领导者，说‘党天下’清一色也是有道理的。国务院付总理问题：过去政务院有黄炎培，郭沫若，而现在没有，十二个都是党员，这个我认识还是不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赵凤祿）

“为了阶级斗争的胜利，党不能不组织庞大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自觉不自觉地被腐蚀着，逐渐脱离了它的生命的源泉——人民。

我们现在的党员，没有领导群众的能力，没有能力，就去作个普通的公民，现在起领导作用的只是党中央和某些党委会。

党的危机的因素不仅是三害，而是：（1）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最上的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是不健全的。例如：没有一个适应它的伦理、道德。上层建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現在，没有多大变化。（2）经济建设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在中

国,农民的貧困將使任何事业癱瘓。(3)人与人之間的經濟,政治地位过于悬殊”。

“党現阶段的危机是它历史上多次危机中最严重的,因为这次是党脱离了人民,和人民有矛盾,假使不解决这些矛盾,人民的不滿,將比武裝敌人的攻击的威胁大至千倍万倍,因为党再沒有力量反抗了。

应当帮助党脱离險境,作为一个公民,我除有責任向党出要扩大整风范围外,还要:(1)徹底整頓領導机构,改造官僚机构,不称职的官員要做掉,清除人为不善的一切党员……。(2)党的錯誤要向人民公开,除去任何怀疑,怀疑在人民内部是比導彈更可怕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岳文伯)

“党员,高級干部有优厚的待遇。为什么高干与人民生活差别这样大?这是不是党的蜕化?讓党中央来回答!外汇少,为什么还要买这么多小汽車?正因为中央腐化,所以下面也腐化,造成人民,特别是农民不滿。这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領袖唐太宗后来变为封建統治者在本質上有什么区别?讓党中央来回答!不要一般干部回答。”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在大字报上一开始就写道‘党腐化了,正在腐化着’,可是那些神經衰弱者就怕了,惊慌了,不是惊慌失措,而是惊慌有措,于是馬上出头为党伸冤,說我这是‘歪曲党’‘污蔑党’‘攻击党’,甚至也不能不為我的出身操心了。

我所說的‘党腐化了,正在腐化着’,不是說党完完全全整个腐化了,沒有一点好地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真那样的話,那可就严重了。假若真的那样,那我說共产党中国早就不存在了,正因为不是这样,而是刚刚开始,我才在‘腐化了’后面接着又說‘正在腐化着’表示这种过程正在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整风的吧。

第一、‘腐化了’是指从未腐化到腐化这个过程的完成,正像俄

文中未完成体動詞的含义一样；是表示某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完全‘腐化了’。

第二、‘腐化了’，不能同‘正在腐化着’分开理解，我反对象顧群那样只引‘腐化了’而不和‘正在腐化着’相联系，所以这里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

反对党的‘腐化論’的同志們，所持的主要理由是說，个别黨員的腐化不能說是党腐化了，是个别的，这我也承認，如果是普遍的，那党早就被人民推翻了，党早就不存在了。况且党还没有这种可能。可是我觉得个别黨員的腐化也不能忽視的，也不能說不是我們党里所存在的。这些个别的腐化者，又是些誰呢？如果把他們分分类，提提公因式那么他們就很整齐的站在我們面前了，是拿着几百塊錢的，是什么什么‘長’們，这些人在党里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重大的。我觉得这样是最能代表党的。这不是所有有錢的長們都腐化了！往往在某次會議結束时，走到講台前‘我代表党……’这里，它們能代表党，那么换个地方就不能代表了嗎？在好的方面能代表党，在坏的方面就不能代表党了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党的危机的說法有道理，我們不应再粉飾太平了……。过去党的干部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但解放后，牆台高筑，老百姓說‘牆高入云霄，溝深得沒底。’老百姓把党团员認為是八旗进关。”

“烈属說：‘把孩子搞走了，叫上个烈属，說是照顧生活，結果連土地也沒了，指土地已入合作社。年老的农民說：‘一生沒有过过这样的苦日子’。”

“×胡同肉店由十几斤減为几斤，老百姓問：‘肉誰吃了。’現在只有工人，党团员得到了好处，咱們党沒有搞好与农民的关系，要鬧危机了。”

“老百姓說：咱們党团员是統治階級，享特权。历代开国几个帝王都很英明。以后就腐化了，咱們党可惜腐化得太早了，象關王进京一

样。毛主席和党中央几个领导人是好的，但他们死后，就完了。下一代坏了，不知一点艰辛，一些高干的子弟，吃糖还嫌不甜，认为玉米是树上长的。几个五年计划后，群众要革他们的命了。”

“过去党员称号光荣，现在党员称号变臭了，北京很多老百姓，有房子也不愿租给党团员和干部，人家怕党团员给上政治课，怕扣帽子，晚上开会很晚不回家，人家还得看门。”

“现在农民有许多意见，已百孔千疮，要赶紧除三害，不能胜任的领导干脆撤下来，不合理的现象赶快改变，不彻底反，危机就解决不了。现在党提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是适时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郎宝田）

“解放以来革命者的任务已经从‘战争和革命’转为‘建设和统治’了。因此目前‘天上天下唯党独尊’，‘官气森严’。穷人的党，穷人救世者的党和上层党员已垄断了世界上最好的享受。‘先天下之乐’是事实，‘与群众同甘苦’的说法已经成了‘讽刺’。腐化堕落的人们处处可见，遗弃前妻，杀死爱妻，历朝‘贵时易妻’的规则重现，未受到批判。甚至毛主席也是好象升向我过去在台湾时代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那些坐着小包车的神秘的人物中间去了，高得不可攀，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

“生活的特殊差异，已引起了普遍愤慨。‘教条主义’窒息了人们思想的活路，怨声叹气不仅是群众中普遍存在，在党团内部也是普遍现象。党内和群众中的不满和牢骚正在发展！总之现实中的许多事实及其发展趋势是和当初的革命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党正在为多数名利企图的人所霸占，向上爬的人入了党，党内混进了一大批混蛋，他们成了‘统治’最适合的人物，甚至党内只有赤裸裸的统治欲望。伪装的最好的人成了党的最好儿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蒋济良）

“党的领导阶层中工人阶级出身的有多少？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

階級知識分子……說共產黨代表全民利益，代表工人階級的黨怎樣解釋？到底代表多少工人階級的利益？有時工人沒有知識分子工商界的生活好，由這連想到，黨執政後由於本身成分複雜就有腐化情況的上升，在一定時期說對不起農民。”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楊維新）

“共產黨危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者都是農民出身（後又說是知識份子——整理者），有局限性，必定走太平天國洪秀全的道路。統治階級都有局限性。工人階級也有局限性，對農民利益不能照顧，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共產黨官官相護，不能自己監督自己，要民主黨派掌握檢察機關才可以監督。”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公灝）

“共產黨已變質了，失去吃苦在先，受享在後的本質，而走向腐化。解放後共產黨逐漸走上一黨專政；共產黨不能容才是致命弱點，甚至不如李世民，連國民黨的銓敘人材的辦法都不如。”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助教 馬 驊）

“不整風黨就要變質，變成剝削人民的黨，那時人民就要起來推翻它。”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福榮）

“黨和國家經歷了一段悲劇的道路，許多人由革命者變成了官僚特權者。特權意識侵蝕着黨，特權使黨的隊伍不可能純潔，許多人被特權吸收入黨。黨幾乎已經成了一個特殊階層，由革命的地位轉變到保守的地位。一些黨員都已僵化，沒有人情。”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易志力）

“三害已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整風不解決問題，共產黨這樣下

去，不得人心，一定要灭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杀共产党人我不赞成，但也说明矛盾的严重性，共产党要很好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是什么都好，自己有些蜕化，能否进步要看整风结局如何而定。现在即使请我入党，我返要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邓芳松）

“我认为党有两个优点：（1）正直无私，（2）使中国强盛。但我对党有下列怀疑：（1）党员在逐渐变质……（2）党的领导权是否巩固……（3）是否可以党政合一。”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生 饒松齡）

“99%党的中高级干部都腐化了，据去年有个统计资料，县级以上干部有20多万，党员有1000多万，现在人家骂我们共产党员腐化，那我们一般党员简直太冤枉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魯 穆）

“（一）共产党腐化了，已带有反动性质。共产党自全国解放以来，由于变成了执政的党而腐化。逐渐走向衰亡了。把过去统治阶级的作风如封建性、买办性、法西斯性都承袭下来了，作风已三分之一国民党化了，南京军事学院（他特别仇视该院——编者）的军官们，每人都有一个漂亮的姑娘，他们的生活舒服极了，整天玩乐，他替这些姑娘们难以为情，因为她们嫁了个老头子。为什么她们嫁给老头子？因为共产党有特权，是组织给介绍的。开舞会时一车车的女学生拉到军事学院去，士兵不能结婚，去逛窑子，在大街上用小便顶妇女，结果被枪斃，为什么？因为他们无特权。同意程海果（林希翎）的说法，人分三六九等。南方的老百姓生活苦极了，住的是黑洞洞，干的是无聊的营生，毛主席承认王蒙的作品，因为它是反映现实的，说明无产阶级的

中心也有灰塵。有些干部以老办法办事,落后了,結果在共产党内出现了反动的东西,阻碍了生产力向前發展。共产党可分四类:(1)以老买老,拍上压下,这部分人占統治地位。(2)相見一团和气,是非不明。(3)飽食終日,無所用心。(4)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周紹杰)

“党的宗派情緒就全党來說是有問題的,以現在和1949年比相差很远,进了城掌握了政权就驕驕了,是有危机的……。”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束洪濤)

“現在絕大多数党员腐化了,他們穿的呢絨衣服,吃的胖胖的,他們不懂裝懂,党员現在是挂名元帅!党员現在成为貴族,比我們發展的快。党员处处吃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楊文极)

“党存在危机总的情况是,一部分党员腐化了,沒有向共产主义奋斗的劲头了,只剩下一塊‘党员’的牌子了,这些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中有的是已經止步站下了,有的干脆坐下来了,有的是已經躺下了,簡直是要人家把他們拖到共产主义社会去,具体情况分三方面:

(1)老党员:沒文化,有資格,占着高(大)地位,又不鑽研业务,‘一朝权在手,竟把令来下’粗暴地干涉业务工作,却美其名曰‘政治领导’。

(2)年青的党员:沒有經過艰苦斗争的鍛煉,自以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有特权思想,既不能努力向共产主义社会奋斗,也不能接老輩人的班。

(3)一般党员:有个‘公事公办’的公式,以为‘照章办事’共产主义就会到来,其实,真是麻木得什么事物也不能推动他了。

这种党员可总是最多的。

而問題的严重性是在于党的制度保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具体的說，就是党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党有了一些蜕化与腐败的萌芽：

1. 党内个人崇拜与停滞现象问题。
2. 官僚主义与腐朽的官僚作风问题。
3. 宗派主义与党员招牌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楊 敦）（大字报）

“党号召一事，常常名义上是‘自愿’，而实际上是强迫。即是‘必须自愿’，这样作风，就不够率真，不好。

号召节约，一变而为三反。反胡风反胡适，一变而为肃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变而为整风。发动一大事，事前必举另一事，声东击西，故作神秘，所以群众敬而远之。

讲课（指党经常对群众的教育——原编者注），实习（指肃反——原编者注），经常教育说要学政治，作社会活动家，肃反给人教训是‘是非只为多开口’，是‘自扫门前雪’，互相矛盾，岂有不放多开口的人而能成为社会活动家的？

给党外人一件工作，但不放心他派一个党员作助手，但实际上党员在主事，作事，这党外人士不但无权，而且连过问都是多余，简直是要傀儡戏。

艺人常宝堃牺牲在朝鲜前线，消息传到天津，大家私下相传，不敢明说，盖不知当说不当说也，后来政府给他开追悼会，大家又都喊口号，可见，群众已不会自己辨别是非，而是看政府许不许，形成了，非分内之事不敢问，非官方消息不敢谈，怕问不及，畅于何有。”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杜建初）

“1. 全国解放后党的许多好传统都大大减色了，不如胜利以前。

胜利前干部生活很苦，军民关系很好，政府和人民关系很好，干部与群众差别主要是工作上的。全国胜利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2. 党是否經得起胜利的考驗？李自成的慘痛教訓今天對我們還是有現實意義的。黨執政後內部的保守勢力就可能滋長起來，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在解放後，黨有些僵化的趨勢，不能提不同的意見，提了就是落后，反動。……

3. 黨是階級鬥爭的產物。當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黨的作用應當加強；現在階級鬥爭減弱了，黨的作用也應相對地削弱。”

（北京大學 左言東）

“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為它腐化透頂，我們才把它打倒。如果共產黨再像這樣下去的話，我們同樣也有權利把他推翻掉。……如果有誰要在今天發動游行，我首先舉手贊成。”

（湖北醫學院 徐方慧）

“黨在現階段是一個統治者，從前（解放前）在紅區共產黨員與人民共甘苦，可是解放後，他們都少與人民接觸，而只追求呢子衣服，小汽車，舞會，宴會，我覺得黨利用了人民，革命前便與人民在一起，革命勝利後一切特權都由黨享受，一切事件都由黨包辦，現在這些高級幹部每月拿那麼多的薪金，而普通老百姓生活提高的那麼慢，這只是給一個甜頭給大家，另外名貴手表，小汽車，外國的呢料誰買得起？普通的工人職員一月幾十元是買不起的，農民更不用說了，這些都被老爺們搶空，我認為他們是高高在上忘了本了。”

（北京鋼鐵學院 彭卓宗）

匡供認，他組織第三黨的目的就是為了與共產黨分庭抗禮，並進一步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他說：“共產黨變質了”，“快完蛋了”，認為“這是時候了，應由他組織第三黨來執政了”。

（北京政法學院 匡紹毅的材料）

“假如共产党墮落下去，人民可以打倒他，这样說是可以的。”

（北京政法学院 陈广櫟）

10. 要杀共产党人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国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受發牢騷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們，杀共产党人。推翻你們，这不能說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党的領導者，被歌頌冲暈了头腦成为朦朧憧憧，由于官俸不薄不缺，由于深院大宅的养尊处优……而腐化了，由于习惯了發号施令而脫离了群众。”

“对于这認為‘朕即国家’的人，葛佩琦杀共产党的攻击‘却是一支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講師 章 起）

“不好的党员應該清除，工农信任党，执政党只能做好，不准做坏，做坏就杀你的头哩！”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束洪濤）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你們干不好，群众就可以杀你們！沒有共产党人家一样爱国，就是这样。”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 海）

“將來農民問題一定會嚴重，農民大起義，是無可異疑的，將來出一個宋景詩就好了。農民起義，我家首先響應希望農民起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等我得勢時，把共產黨殺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潘相臣）

“要向中央算帳；看黨員利用宗派主義和特權害死了多少人，一些黨員該殺的殺，該處理的處理。”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我認為葛佩琦不是要把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殺，而是殺那些無惡不作的黨員。”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王樹才）

“葛佩琦說殺幾個共產黨員，這也沒什麼。”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延年）

“黨員是死魂靈，活菩薩，入黨受組織紀律約束，思想不自由、僵化、喪失個性，黨性和個性有矛盾。黨員是地下工作作風。黨員落在團員後面了。同意林希翎所說‘解放後入黨的90%是‘混蛋’解放前入黨的老幹部‘腐化了’。葛佩琦所說‘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句話沒有錯。共產黨不好就應該推翻，就應該殺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韓平希）

“假如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我首先積極參加，並且非殺死他幾個不可，先把咱班上的，全部黨員打死。

要作‘匈牙利’事件的先鋒，要推翻共產黨。”

（蘭州大學 杜秉智）

“進大學幾年，同學間不團結，是黨團員建築牆和溝，到處都是鐵

絲網。我升到三年級以後，看到毛主席像就嘆氣，對他的熱愛打折扣，我沒有得到溫暖。……黨過去作好事，現在也許作壞事，黨中央政策不是這樣，但下面的黨員高高在上，統治着我們，騎在我們頭上。……共產黨是犯了錯誤，大家就買不到豬肉；吃肉的，穿毛呢的都是黨員。肅反中對我是那樣搞，今天我們就可以攤牌了。如果匈牙利事件發生在中國，我也可以干幾個！解放後我的精神上思想上沒有解放，現在黨提出整風，春天來了。”

（雲南大學 李紹清）

“我不歡迎國民黨也不歡迎共產黨，而要走改良主義的道路。三害根源在於黨中央，任何政黨都有它光明和腐朽的一面。”

（雲南大學 吳斯清）

“共產黨人反對鐵托就要殺光，斯大林反對他，斯大林也要殺掉。毛主席講什麼領導核心是共產黨我就是不同意。”

（北京政法學院 付成章）

“黨員太可恥了，引蛇出洞！以前要大胆鳴放，不要顧慮，現在別人放出來了，又要整。依我就把黨員殺了，反正中國人口多，殺兩億還有四億多，還是世界上第一。黨員只有一千多萬，殺了不夠殺團員，還不夠殺隊員！

依我就殺二億人，殺爛工人、爛農民。”

（雲南大學 楊××

“我要殺共產黨人！燒實驗室！我要殺五百個共產黨員！你們去告，我不怕，拉我去勞改，我有的是力氣。

我就是見不慣黨團員我就是反人民。只想蔣介石從台灣打回來。我就是要當反革命，堅決走反革命道路！我是反動的，你拿我去勞改，去鎮壓。”

（雲南大學 王吉光）

“……我是千万弱者中的一个。誰說达尔文的生存競爭學說不能用在人类社会，今日社会正是强者世界……

共产党做錯了，是要杀哩！

为了以后不再有人被党逼死，自杀也是情願的。

……人民群众是最講求实际的，誰好就拥护誰，沒有共产党中国也鬧过革命，像过去洪秀全、孙中山等。”

（俄語学院 胡道生）

“渴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發，一旦战争爆發，我要杀尽我看不順眼的人。”

（俄語学院 国維城）

“他媽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把共产党杀光，中国也不会亡。”

（蘭州大学 田青如）

“毛主席沒有什么了不起，……

他媽的！我要把首腦杀光，我看这些領袖們都該杀。”

（蘭州大学 肖开国）

“我曾收集过蘭州工人罢工的情况，我所以这样做，因为我恨共产党，我要消灭共产党。”

（蘭州大学 丁恒武）

“共产党大权在手，就可以压人，而且他也代表不了人民。

共产党要是不好，人民是要杀他头的。”

（俄語学院 沈兆予）

恨黨員，尤其是工农出身的黨員，連黨員之間关系好也看不下去，給黨員提的意見越狠，心里越痛快。看見有人要杀共产党心里痛快。”

（俄語学院 文啓塵）

“葛佩琦了不起，道出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也道出了我内心抑郁已久的东西。”

（中山大学 陈庆煌）

“暴徒袭击法共总部，能把共产党人杀尽最好。”

（中山大学 陈寿彭）

“国民党有20年才腐化，共产党只有七年这样腐化了，共产党腐化了为什么不可以杀。”

（中南矿冶学院 宋垣温）

“这几年来我不敢，因为专政很厉害，我一动人就知道，尽管我对党不满，但我能把它‘埋掉’，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不适应这个社会就不行。”

（俄语学院 文啓塵）

“葛佩琦的发言有道理，勇敢，勇敢骂共产党，只不过有些地方形容过火。共产党不好的话，群众就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也有道理。更不好的话，群众来个大民主，有什么不可以。中国历史四千多年，共产党历史三十多年，以前并未亡国，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11. 攻击、歪曲、诬蔑党的发展组织工作

“入党象等公共汽车，未入党的在车站等，车到了要上车而车上的人说太挤了，连门都不开。”

我入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工作，因为我是教研室付主任，没有党员的资格人家不听话，不好领导，给了我党员的资格，便好领导了。人家入党时总喜欢说‘为人民服务’等等，我是不愿意说这种空话

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付教授 汪同祖)

“建議：(1)吳老要干就干，不干拉倒。(2)胡校長應檢查教條主義，聶校長應重視法律，鄒校長應檢查事務主義。(3)黨委應一律放棄特權。(4)系主任腰別一把刀來談話，來，咱們談談吧！我不敢去談，這話怎麼能談呢？系主義調一調，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換。(5)調薪前很多人升了講師，應徹底檢查黨團員是否够條件？教育界和社會比，不平，人民大學更不平。這次加薪，政府失去十分之五信用，應根據18.5%平均分配。(6)物價上漲，十分困難，科長以上加薪的應減少18.5%，提升學銜的應自報公議，適當減少。我六十歲的老講師，情況可以調查，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要求和吳校長談話。可不可以對新社會輿論做個調查？”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發展黨員唯一標準是‘唯唯諾諾’‘唯命是從’”。解放後入黨的新黨員，革命勝利了，就不害怕了，鑽進來沒有坏处，按勞取酬的實行，有利可圖，越往上爬，生活待遇越高是些投機取巧的人。”“權力會腐蝕一個人”。“執政了忘記群眾”。“地位越高，個人主義越大”，咒罵黨員領導幹部是“新官”，“有混官，半混官，有基本上是清官，但還帶點混”。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講師 賀安的材料)

“自我批評是亂扣帽子，是把自己罵的狗血噴頭，入黨就是賽馬，是磨圓了滑進黨內的。”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徐前)

“宗派主義也反映了在組織上的關門主義，林希翎提出入黨應由70%群眾通過，我認為對，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當然她的具體辦法值得考慮，現在入黨不是八個條件，而是一個條件（唯唯

諾諾)整風運動中很多人顧慮鳴放後將來難以入黨,所有黨員應互相監督,將來批准黨員時不要只批准唯唯諾諾的人,以後也不要把人搞成唯唯諾諾的不提意見的人,如黨組織以行動證明這不是入黨的條件,則群眾也敢於將正、反面的意見都告訴組織。……”

“黨對群眾不真實,光看群眾的缺點,發展黨員不是八個條件,而是一個條件即:不說話!只會說:‘擁護、是是是’,這就是僵化。”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講師 王鏡芝)

“現在總是那些說什麼干什么唯唯諾諾的人才能入黨,獨立思考的人即不予考慮”,他說這現象在建黨工作中很普遍的存在,說做組織工作的,一方面掌握“最後一張王牌”“當釣餌”,另一方面“用入黨來造成壓力”,“黨組織對歷史問題看得太嚴重,不關心大家搞清歷史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 章起的材料)

對解放後,黨吸收了一些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入黨一事很反感,說“這是黨拿著黨籍在送禮。”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楊織如的材料)

“現在的人們對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麼情況,知道得很少。……這樣我就懷疑,連共產主義都不大清楚,很多人就入黨了,這是不是應該呢?這是為了什麼呢?”“真傷腦筋,就我自己的經歷,在生活中還沒有見過不打折扣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我就懷疑這樣的人是不是有。”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助教 陶文達)

“一些新黨員是‘拍馬屁’和‘裙帶關係’入黨的,而對於積極分子的選擇培養是靈機一動給點上去的。有的新黨員奉承培養負責人,使人看到肉麻。”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孫國梅)

在發展組織工作上，“某一個領導人的喜好起決定作用”。他認為“自己一切不壞，就是因能批評領導，領導不喜歡，所以入不了黨”。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田放的材料）

“入黨有‘裙帶關係’，這種事情黨內不是沒有的。

入黨有時很容易，靠碰運氣。”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助教 王佃保）

“入黨、入團應該有70%以上群眾表示同意，入黨入團不僅是要黨團批准，而對不起作用者群眾還可以罷免他。黨團不應有任何特權，他的特權應是人民給的信任，應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要在物質上給以特權。這樣使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入黨多好？否則，他可以不入黨。”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農村黨員多數是故特汗奸，多數是壞蛋，入黨容易出黨難，我要會拍馬的話早就入黨了。”

（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學生 張炳鈞）

“吸收黨員問題：90%黨員入黨是使人誠服的，但也有問題，有人奉承領導，則易入黨，我不能入黨，就因為我不願這樣。有的人入黨，都是不夠條件的，吸收黨員不能宗派主義，最後征求一下群眾的意見，不能由少數人決定。”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王文彬）

“1952年以後展組工作有偏差，第一種人是幸運兒，得天獨厚有一定關係的能入黨，另一種人掌握展組的特點，吹吹拍拍，哼哼哈哈的人，象這樣的人應很好教育，減少特權思想。說黨員有特權可能不太恰當，但可說‘有利可圖’。”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展廣偉)

“(1)过去入党吃树皮、草莖，冒生命危險長征，那才是为了革命。現在入党的人是为了向上爬。

(2)發展組織不够健康，歪风表现在有些人为了入党，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吹噓拍馬，应声虫，为了个人名利就捧領導，如任金隆的發展就是如此。

(3)兩個班新黨員的品質都不好，發展四个黨員我只佩服一个，三民是鬧进去的，不入党就不学习了，党是被吓住了，这种人入党动机不純，別有意圖，过瓊、金隆是拍进去的。

(4)我参加革命十年不能入組織，組織对我帮助不够，入党問題十年不能解决，党排挤我，我不入党，我要做紅色的民主人士，党外的布尔什維克。”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郝 赫)

“党的發展工作应放在群众监督之下，以往誰老实，唯唯諾諾，就是發展对象，誰爱提意見，就不能入党。一商校党的領導同志对她說：‘小韓呀！你要是少說几句话，少惹些事，早就發展你啦！’商校党組織發展的对象都是些唯命是从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惠貞)

“黨員入党先要群众‘表决’——群众在組織上有监督党的权利，黨員入党时，先由本單位群众表决通过，本單位中凡年滿十八周岁的都有表决权，但表决結果是供党参考的，最后是否吸收仍由党决定，如群众未通过，党則可能吸收，也可能不吸收。他認為只有这样才能保証党的質量，过去党在吸收新黨員入党时也征求过群众意見，但沒有一定組織形式(如表决权)則不能更好保証党的質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 顧佩弦)

“过去机关發展党、团员时，领导找爱人，只要答应，就很快入党，而真正老实的工作人员，只要对领导不是百依百顺，要入党很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 吳思偉）

“我班党支部在發展工作上，就是条件再好，如不向支委拍馬屁就不能入党。”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王書樓）

“發展党员偏听偏信严重，介紹人說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八項标准是橡皮尺，可伸可縮。吸收党员象用橡皮尺买貨，也象姑娘挑女婿，不培养，只挑够条件的，最符合橡皮尺的是軟圓滑（經常不提意見，不批評，服从领导，对党员同志团結得好）。考驗是無限期的。考驗就是折磨，使我非常痛苦，現在我連积极分子也不是了，党組織也要考虑是怎样培养的，我在想將來有人組織大批青年加入的一种党我去参加（指不能入党的超齡团员組織的党——編者）。如果我有变态，这是考驗的結果。”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房文齋）

“……党员和一般团员群众間有一道鴻溝，……容易入党或被列为發展对象的团员多是这样几种：（1）家庭成分較好（这是对的）（2）能够符合党员党支委意志的随风搖摆的和支委同志或某些权威同志关系好的团员，（3）所謂老实不好提意見或根本看不出問題的人，都有入党的幸运，……支部不考虑吸收一个党员的目的……而考虑是否忠实于‘我’，……。”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柏玉肖）

“發展党员有矛盾，爱人是高干照顧，社会知名人士有点进步就可以吸收，小干部問題不見得多，可是不吸收。”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束洪濤）

“黨組織的發展冒進了：

1. 唯成分論，只管大力發展工人積極分子。
2. 只願意吸收覺悟不高、安分守己、老老實實、不得罪人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李之杰）

“……現在吸收黨員是為了維持正常秩序出發，任何與領導意見不合的人，都被認為是不好的，這種情況會促使人民與黨的矛盾和對立……”

“我們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為什麼有宗派主義呢？與他們地位的轉化有直接的聯繫，過去黨員大多數是優秀的，解放後入黨的人大多是唯命是從，完全變得和領導一樣就可以入黨了。”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濮仲文）

“成分不好低人一等。

鳳維是同志流淚痛述他幾年來的經過，他說：成分家庭不好，不能入黨。到人大當標兵、參加晚會也不准去。我懷疑對人有兩種對待，難道我到天安門會一榴彈嗎？……我只有再投娘胎了（流淚）。

文常同志說他從1950年申請入黨，小組通過了到支部沒有結果，共‘考驗’了八年，他在敘述這一段過程時，淚流不止。他甚至這樣想，等將來不能入黨的青年多了另入新黨。他舉例說明宗派主義發展到何種程度：有三個同志同樣文化水平，同時參加工作，其中兩個黨員一個是縣級，一個是區級，另一個團員，現在卻是一個辦事員。”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發展黨是看黨需要，感到循規蹈矩就行，黨章是形式，沒有什麼標準。”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不解放台灣不能入黨！”

“殷夢舟說：我有一個哥哥在國民黨國防部，一碰到運動，總要一再交代，一再認識，試想我當時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怎麼可能了解他的全部歷史呢？但是黨員就說：‘你考慮考慮’。這意味着你不老實想隱瞞。

弭秀玲在原單位由於哥哥在台灣而未被吸收入黨，他氣憤地說：‘台灣沒解放，除非我到台灣去做地下工作，就不能入黨！’由此推論：有社會關係在帝國主義國家的，那大概要等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徹底勝利時，才能參加黨！恐怕就要‘三’投凡胎了。”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抗議發展黨員的唯成份論

只因我父親是一個被鎮壓的歷史反革命分子，雖然我只同他生活一年半，而且關係並不好，但這就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永遠受歧視，永遠不是黨的自己人，更使我傷心的是我這一生只能向‘黨外布爾什維克’的目標邁進。

我對黨的這種規定抗議！打倒唯成份論：應該具體分析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根據他本人所表現出來的對黨的忠誠吸收黨員，不要把表現並不好，而成份好的同志硬拉進黨里來，而把表現好成份不好的同志永遠排斥在黨外。”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發展黨員偷偷摸摸進行，不敢公之於世。最後系里發展黨員不完全根據黨員八項標準，主要根據一個條件：一說話不提意見，而那些敢於提意見，敢於批評的人都被關在門外。”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 王鏡芝，劉召之，麥廈康）

“高書記吸收新黨員的四大標準：

（1）家庭成份好，（2）表現一貫正常，（3）對黨組織唯唯諾諾，對黨員喜皮笑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給刘振江信中写道：“談一下我何时入党的問題……这四年我認識了这个东西，我仍不能低头，毕业出去我会因能辨認而不与它打交道，走自己的路不入深山，不被虎追，目前不是我不滿乃是“士可杀不可辱”，你是称赞硬气的人，該能支持我，……我不會去讓他們杀，真理不能向無理低头”(見信第四頁)。这里表明了她对党組織不發展她入党的极端不滿与仇恨。并以“閑談灰色党証”为題写了一篇稿，誣蔑支部所發展的党员是：“又要領灰色的党証”，接着又說新党员“如何是斗争性强？將正义者和被侮辱者的呼声就是造謠。我們只有撕毀灰色的党証。憑什么力量？背上妒忌的罪名”(見稿八、九頁)。

“吞吃民主，树立培养对象威信”“發出了一部分灰色党証为自己找到了心腹，却为党增加了累贅，在群众中树立了眼中釘，活象黃世仁身边的穆仁智，連人性都沒有，那里談得上党性——”培养与發展的对象是“对自己順从”“作介紹人的走狗”“裙帶关系……”(見稿十六頁)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彭程的材料)

“發展党员有宗派主义，入党都由于裙帶关系，發展的党员均是会捧会吹的人，不动腦子，唯唯諾諾，”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講師 陈用权)

“西安初解放时党员有一千多，現在有四万多，質量也就受了影响。……目前入党，正如魯迅說的，‘既英雄又穩当’，起碼可以作个領導。所以，这几年来学校所吸收的党团员，照已揭露出的情况看，坏学生多于好学生。因此，建議吸收党员要：(一)在学生中应尽先在前十名成績中挑选。(二)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应不偏重学自然科的，……。 (三)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因形势脫了党的人，今天民主人士中很多，

究竟大多数还是一貫进步的，人望也好；听说入党偏很难，我不懂，我以为应再多吸收他們。”

（西安师范学院 王捷三）

“党在發展組織与培养积极分子是唯成分論，成分決定一切，党培养干部重德不重才，党对有才干的人不加重用，現在的干部低能，”

（中南矿冶学院 陈凌生）

“現在党的組織建設工作，就是个人崇拜和發展私人勢力，这样的党就成为宗派主义和不受欢迎的集团。”

（蘭州大学 方文信）

“吸收党员应由群众同意，党吸收的人是在耳边說來說去的人，开会形式，支部中別的人根本不了解情况，还是由接受汇报的人来介紹，如張秀荣入党就是这样。

积极分子的汇报是拍馬，是为了取得組織的信任。

党员沒啥了不起，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党员掌握了你的材料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党员有特权。”对污蔑党的“新八条”認為“很深刻”。

“我班支部吸收的党员尽是些积极汇报別人的党员。”

（俄語学院 文啓庵的材料）

“我院入党的八項条件”

“1.学习不好沒关系。

2.能起监督同学活动的作用。

3.能把終身献于院党委会。

4.規規矩矩絕對服从領導。

5.成为党委的好耳目，得了‘情报’向党委汇报。

6.是党委的傳声筒，不能有主見。

7.严格保守我院工作的‘秘密’。

8. 富有黨員的‘优越性’。”

(俄語學院 大字報)

“1. 行政、黨、團布置的工作和任務，不管是否恰當，只要舉手贊成，不要提出意見，這樣做可算得百利無一弊，如果布置得不當或有錯誤，這自有領導負責，贊成意見的沒有錯，倘若是對了，那就可為你記上功。

2. 周圍的情況尽可能地不管，關起門來不聞不問，假如你有意見最好不提或少提，若是要提也得多加考慮多加小心，以免觸犯領導尊嚴，否則，就會惹火燒身，自找麻煩。

3. 在群眾中少發表意見，多加附和，或不言不說，把在群眾中聽來的意見作為向領導的匯報的材料，張三之流發表什麼謬論，李四之輩，有什麼不滿，這樣一方面表示對領導的關心，另外，又表現你向組織靠攏。

4. 多作思想匯報，三天一口頭匯報，五日一書面匯報；今天檢查個人主義思想，明天批判群眾觀點不強，後天再挖組織性和紀律性差的思想根源，遇事首先痛心疾首地承認錯誤，多說自己不是，這樣做就能讓領導上知道，你要求自己很嚴格，日以過夜地開展思想鬥爭，勇于承認錯誤。

如果你具備以上四點，首先你就算得上個好幹部，以後再串串領導，黨員的門，和他們關係搞好，那末入黨之期也就不遠了，這時你可以穩坐釣魚台，等待組織來發展。

黨的發展工作是秘密進行的，如地下黨一樣，積極分子是從事地下工作入黨的。

新鮮事——Фискал入黨（指該班吳慶華入黨——編者）說：吳慶華入黨，我先是驚異萬分，後又覺得氣憤萬分，簡直另（令）人難信這樣一個典型的 беликов 居然能夠入黨，對上阿諛奉迎，對下打壓，報復，暗中告密就是他入黨的資本，在原69班黨員夏之柱、虞莉英等人面前卑躬曲膝左吹右捧，這些人放個屁就成為他的聖旨，不

敢有半个不字，正因为如此，才博得他‘主子’的欢心，于是步步高升，由一个無名小卒一躍升为大班長，大权在握，作威作福，压制民主，在‘主子’的聖旨下控制全班，在同學們面前將班長大架一摆，哼！你們怎敢不服从組織紀律？有时見到同学奸笑，哈，哈，哈——实际上都是笑心藏刀，把別人的話向組織上汇报，邀功請赏，于是这位有功之臣，在‘主子’們的庇护下無声無息地入党了。”

（俄語學院 譚紹干）

右派分子吳青阳給光明日報的稿件中写道：“有一張大字報題名‘什么人能入党’，下注新八条（應該打括号）。对某些黨員說来，虽不能說是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倒也确实可以說是十分近似了。筆者認為那新八条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姑引在下面：

（一）具有捉摸不到的階級覺悟；

（二）靠近組織，經常和黨員唧唧咕咕（此意即脫离群众，所謂只走上層路綫）；

（三）立場穩，对組織唯唯是从，能往下貫（此意从其他大字報上看，可以理解為：对上善于吹拍奉迎，对下則是作威作福，粗暴專橫）；

（四）群众关系好，对人不冷不热；

（五）迁事謹慎，模稜兩可；

（六）学习工作好，成績不太妙；

（七）优点不明显，缺点不突出；

（八）出不了大乱子，起不了大作用。

当然，并不見是每一个黨員都是完全具有这八条的，但是八条齐全的或只有几条的，則他們党群关系就很不妙。他們中有的为群众記仇恨，被認為фискал（告密者）、двуличный（兩面派）；他們往往把有和自己不同意見的人看作落后分子，輕則疏而远之，加以封鎖孤立；重則打而击之，使之永远抬不起头。其中为领导所‘賞識’的，就成为‘人上人’、‘黨員貴族’，三好学生未經群众討論批准，也都有他們的份兒。”

(北京俄語學院 吳青陽的材料)

“入黨靠送情報和打擊別人作為手段。”

(中山大學 顧綬昌)

“中大發展黨員都是那些唯唯諾諾的，不敢批評黨的人，歷史系發展的黨員都是走私人路綫。”

(中山大學 端木正)

“我院(指北京體院——原編者注)入黨的同志都是老老實實的聽話的人，好提意見好說話的人都不能入黨。黨組織應該解釋這種老老實實是什麼意思？黨組織把好說話的都看成異己分子。我嫉妬黨的威信這樣高，我很擔心毛主席是否會犯錯誤。”

(北京體育學院 張世杰)

12. 誣蔑匯報制度

“匯報是情報的發展。匯報全是黨團員，我住的對面有個助教要求入黨，他就匯報。匯報很危險，正確還好，否則就是有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 卻祖平)

“向黨組織匯報的黨員是‘小官僚’，而听取匯報的人是‘大官僚’。小官僚匯報情況不正確，而領導人員听下面匯報，而匯報只是抓群眾的小辮子，以作為‘整人’的材料，這種不正常的匯報使平時正常的同志關係也不好了，這樣匯報形成了官僚化。”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孫國梅)

主張取消匯報制度，“利少害多造成同志關係不密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吳思偉的材料)

“我認為汇报工作就不对，好象搜集反革命材料，自己是很反感的，而且有抵触情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芝文）

“汇报制度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反映，因为一定要汇报才能了解情况，而不能作知心朋友，这說明不站在群众之上，好象就不是一个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共产党什么都要汇报，这不象国民党的便衣警察，又象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段鉄珊）

“看党员的成績，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这些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們作情报，所以責任在党组织。”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向党组织汇报是小特务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

“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不需要汇报。有的党员連别人上街、上厕所也要汇报。”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楊露如）

“鑒定只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是否可靠，对党员來說还比較好些，有組織生活互相比較了解，对那些不正确的批評和扣帽子，会給予反击和解釋，对群众來說，被扣了帽子还不了解，可能使他們背上了包袱。”

（北京政法学院 錢端升）

13. 誣蔑黨的組織紀律

“蘇共黨與我黨思想控制太嚴，有斯大林錯誤殘余。”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 章 起）

“黨只喜歡听话的人，實際上這是唯唯諾諾，組織上紀律上強求一致其背後掩蓋着‘听话’，因此工作上推推動動，这样就使积极性沒有了，不能爭鳴，不能独立思考。”“对敢于提意見的人是扣帽子一頂‘反抗領導’、‘对党有不滿’、‘和党对立’、‘反党’，……我不好意思再作下面的結論了……”（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徐 前）

“对組織生活兴趣等于零、支部会就是那样半瓶醋的会，都是大家談体会，人云亦云，沒有爭辯，我对所謂体会很反感，斯大林問題后，觉得要独立思考，这就是思想僵化，至少是思想僵化的趋势，不仅对政治思想，政策問題如此，业务問題也如此。对教研室这个集体就認為是思想僵化，神經過敏，教研室就是这一批貨，工作誠誠懇懇，但路綫不对头。反党思想和狂妄自大思想糾纏在一起，觉得在教研室生活，是被人忽視，是个死角。可以說在大放大鳴前，思想上已經把自己放在党之外了，对組織沒有兴趣。另外，又覺得反正沒有人来了解我，个人第一，相信得起自己。有我自己的天地——家，对报告，政治生活兴趣等于零。”“党内有民主，这一点小黨員也会感觉得到。这些小黨員是否敢向大黨員或黨的組織提意見呢，我說是不敢提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孫國梅）

“共产党沒有人情味，太死板，社会主义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紀律、專政、集中太粗暴，可不可以飄飄悠悠就到社会主义。”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党内民主不够，选举时提几个候选人就选几个，有形式主义。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检查缺点少，争论少都是一致通过。因为党的代表不敢在中央面前提意见，党员意见要向上反映很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

“党要求党员服从决议，为什么这样不民主呢？我认为党内不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希望党员把党内生活活跃起来。自己将来要靠本领吃饭，决不要以党员资格的招牌吃饭。”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孙毅刚）

“党内组织生活有许多清规戒律，如不许背后议论人，不能道听途说，不能夸大，不能片面，应治病救人，实事求是等，这样把棱角都磨光了，还有什么用？”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总支、支部选举不民主，应完全进行无记名投票，同时领导上不要提候选人，党章不经过党员讨论，也是不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顾佩弦）

“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全部国家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一切领导机关，完全自由由选举产生，取消共产党在国家一切部门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 哭 声）（大字报）

“党内只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民主，只有小民主没有大民主（讨论党的政策的权利）。党员的义务多，权利少。马云凤被开除党籍是不合理的，是限制党员独立思考的表现。党应该实行普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14. 攻击、丑化党员

“党内是有些个别同志老觉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党外人士坐享其成实在是恨死了，具体到物质待遇，不由得生了妒嫉之感，于是忘了团结，忘了工作而注意到个人地位、待遇打算，见到党外人士就有些憎恨，由憎恨进而找茬子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恨不得将党外人士推出去，这样个别同志是只看到个人利益，是把个人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把党的利益放到了第二位，只看到局部利益把全体利益放到第二位，这是从个人打算出发，他所关心的是个人地位，个人享受，个人待遇，好出风头，在工作中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企达到个人企图，对政策不了解，不了解个人与组织关系，这既是宗派主义的温床，也是个别同志党性不纯的表现，这样发展下去将造成极坏的后果，党内外是存在着矛盾的，且还很深，但这是个别人，特殊的，一般说来党内外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授 朗朗天）

“人民大学的特点是党员多，好也好在他们身上，坏也坏在他们身上。人民大学组织层层密密又压压。……按大家庭的统治系统说，系主任可比我父亲，人事处可比祖父，教务部可比曾祖父，校长可比高祖，最高的是高教部，可比太皇上，我校领导对太上皇三跪九叩，奉圣旨，照办照传，一直貫徹下去，谁也不敢说一字‘不’。”“党员在工作上爬在我们头上了。老教授苦，工程师苦，苦得不想活。党员都作了我的爸爸，叫我们作小孩的难了。”“青年党员没什么，只是清白，对这些党员，爱他，因为他年青，恨他，他爬在我头上，当主任。”“外交部派出的外交官，倒还是按才遴选的，当然，也有不行的，把事情办坏了，原因就如储安平所谈：‘大大小小都是你们。当我批评一个党员时，九十九个党员不同情我这是条件反射。是否党党相护？’”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 许孟雄）

“解放后入党的党员90%都不行，可是不行还要当领导，怎么能
不官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汪同祖）

“要求党员多一点人性”。“希望党员同志在党性以外再加上一些
不太违反马列主义的思想习惯，希望党性与群众性不要距离太大”。

“党员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今党
不但要洗脸上的灰尘，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李景汉）

“党群关系怎么才能搞好呢？新闻系是特殊的系，外语教研室也
是个特殊教研室。举我所触及的一个小例：从西郊乘车来城内，当你
坐在座位上时，即使旁边还有一空位，党员也不会坐在你身旁。为什
么呢？因为我们是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汪同祖）

“现在党员是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我即组织’，
‘我即毛主席’，在国际上‘我即斯大林、马克思’。解放后幼儿园是各
式各样的，但街道幼儿园却最差。少了两个东西，即法律感和道德感。
一次某副校长作报告时说宪法可以灵活应用，袁世凯都不敢这样说
呀！在北海文史馆的一个党员，几次犯强奸罪，只判刑一年，该机关还
直接写信说工作需要呀，离不开呀！结果一年徒刑还是缓期执行。以
上这两多两少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吗？毛主席拿出整风来，但
老百姓的心只有一个毛主席，老百姓也想天下太平，老百姓与党的距离
是远的。这次整风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险的。”

“现在某些人在思想上有优越感，这是第一号。第二号是帮凶，捧
场混饭吃，给党员特权，做领导，到处是独立王国，老百姓受不了，好
像元朝时，各家住的蒙鞑，到处是，到处发号施令。”

“有人说我们像私塾先生，我说不是，而是像前清的教官，教授到

操場呼一聲‘請大人立正’、‘大人早安’！我們是干的這個！來了六年了，有的學生畢業當系主任。有一次上課作習題，我改正學生錯誤，他說，哼，真他媽的！做私塾教書只有東家‘哼’，我們是誰都可以‘哼’的！系主任、秘書、連工友也‘哼’，因為他是團員。”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黨員中有三種人，一種是唯唯諾諾，一種是善于體會領導意圖，看風使舵，還有一種是掀風作浪的能手，吹牛拍馬的專家”“而最後一種黨員最得領導上的信任。”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

“老黨員不學無術級別高、工資高，是廢料，缺德無才是靠德吃飯。新黨員雖有熱情，但無真才實學，是些唯唯諾諾，沒有稜角的人。”

“積極分子是些看領導眼色行事，是稜角磨掉還不算，還要拍在地上能夠跳起來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說史教研室講師 孟 氧）

“我覺得我校黨員均有些神經過敏，好象養成這種習慣了……”

“我們要暢所欲言，除三害，一切表明，要求一切黨員換腦筋，林希翎能動腦筋，說出一切，這有什麼不好？大部分黨員（從工統教研室看到的）還是過去一樣的教條我已要求與校長談話，黨員應該換腦筋。”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陸 戈）

“黨是包庇黨員，黨員享有特權的宗派組織。黨有兩套原則，黨是一套，而黨組織和黨員又是一套。黨組織對待群眾不平等，口頭說黨的利益只有一個（意思是說黨只有人民的利益），但是黨組織對黨員是包庇的，把黨員看的高一些，黨組織對待黨員的錯誤是姑息，而對非黨群眾則是一次兩次的整。”“評薪時，只憑黨員資格不講業務，可

是提意見不解決問題，對於提意見的人還說是個人主義，例如單憑資格那麼差不多都是黨員，故黨員的級別比別人高就此形成一條溝一道牆，我認為溝和牆是存在的。”“黨員住房也有特權。”“社會企業內對人不象我們學校黨、團、群分寸分得那樣明，比如我們學校每一工作，團員也可以參加的，非要黨員參加不可，這就加重了人們的思想負擔。”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孫國梅）

認為共產黨是宗派集團，既不能代表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利益，也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老干部進城以後腐化了，新入黨的黨員又都是唯唯諾諾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解放後，入黨就會四喜臨門，提拔快、光彩、找愛人容易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吸收黨員一定要搞清申請入黨者的真面目，不能只憑一時積極便吸收。否則便會有大批動機不純的分子混入黨內。這些年發展黨太快了。現在中國共產黨有一千二百多萬黨員，恐怕不少是不夠格的，否則群眾意見不會這麼大。如我校出版社有一個同志，在三反運動中為了自己不挨鬥，捏造許多事實，誣陷另一個同志貪污，並在幾次全校大會上坦白，被黨看成是‘起義’的勇士。利用這種誣告同志的行為，她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政治上的積極分子，而被她誣陷的同志則被當成‘大老虎’投入監獄，蒙冤九個月，吃盡苦楚，直到追贓定案，才證明所謂‘起義者’原不過是‘誣告者’，而所謂‘大老虎’原來是‘替罪羊’。象這樣的事情原屬運動中的常事，無足為怪。奇怪的是在真象大白之後，‘誣告者’卻很快被吸收入黨，行政上連升三級，今天成為出版社的一個黨支書。舊社會反動法律還規定誣告罪加一等，新社會誣告卻成為晉身之階。難怪運動一來，有許多人積極於‘誣告’的事了。從道德上說，實在是人心敗壞。我親眼看見，許多人就是在運動中靠積極於錯誤鬥爭無辜的同志而成為所謂對黨‘忠誠’的骨幹分子

的。有的人入党前积极，入党后目的已达到，万事大吉，工作松劲了，甚至不如群众。这样的党员，再有五千万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党的坚强不在量多而在质好，匈牙利党员是号称九十万，不也在几天内便垮了吗？……”

“我就是党，党就是我，党员特殊化。党员只要政治可靠，是心腹人，可以飞黄腾达，老干部再不行（党员）也占一个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专制，一切决定于党，而党又决定一个人，宝塔式的统治，从毛主席一直到各级党的第一书记都是小斯大林。第一书记就是对，说一个人错了全社会不能怀疑。党已腐化变质了，党内出现了许多想靠党牌子吃饭的人。一千二百万党员，不少是不够格的。党员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挥霍先烈流血斗争和人民群众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这样的党员，再有五千万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说，党已面临危机了。消除危机的办法是什么呢？曹达夫说，“我认为要靠有良心的党员和受三害压抑的人，搞一个真正代表全民利益的，受群众拥护的，真正民主集中制的，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党”。……

“党的威信和群众对党的信任变成了宗派主义。……只对党员培养、提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的材料）

“党员是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员 崔志敏）

“党员的称号使他们骄傲起来了。他们不再和群众在一起，象抗战时那样同甘共苦，自认为比群众高一头。日常生活中使人感觉党员总是教育群众，这是把貫徹党性的原则简单化了。在欢迎外国元首时，事先不告诉大家去做什么，似乎党团员以外的人都不值得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翻译室译员 李鹤亭）

“解放后入党的党员水平质量较差。

干部政策的一些缺点和工资制度中的一些缺陷，加以党处在领导党的地位和今天所处的和平环境，在客观上从某种程度来说，入党的确意味着某些‘特权’（政治，物质上的），于是，解放后有一部份覬覦这些特权的投机份子就用尽千方百计蒙混过某些党领导干部的耳目，鑽进了党内，把入党看成是取得个人名利的跳板。

由于提拔干部工作中和工资政策中党员享有的优惠条件，我确认为今天多数的情形下，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口号已经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我赞同把党员分成三类：布尔什维克、不好不坏不起作用者、投机份子——坏蛋。这种分类法并不构成‘污蔑党’的罪名，对于第三类名不符实的党员应清洗，野心份子应清除。”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员 徐京安）

“党、团中央应该在整风基础上要抓紧整党、整团。整党问题不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因为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是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由许多等级制造成的。还有一批人中等的不坏不起作用者，没有什么思想，过去的党员强调‘老实’，给爱人写封信也要汇报，成天谈思想，我看这些人可真没有思想。对于不起作用者，动员他们退党、退团。”

“按我的看法我认为党内混蛋应清洗出去，即使1%也是党的不好，报纸上揭露很多，如：我校教务长李新一次补助800元，太太二次去百货大楼二次花光，这些人我认为比国民党还坏，我认为党内应清洗出去。还有一部分人未起到党员作用和群众一样，如，思想僵化，应动员其退党，我建议以后吸收入党入团不仅要党内通过也有本单位70%群众通过，漫画中也说明了。有人动员我靠近领导，还有彙报制度，屁大点事也彙报，甚至爱人来信也向领导彙报，这样吸收入党

起什么作用，相反的这个党员如不能起作用群众50%通过即可罢免这一党员，另外党团员不能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很多人入党入团是周围空气迫使其不能不这样，有人动员我说不入团以后怎么办，法律工作、婚姻问题也解决不了，特权表现党团员可提级，可欢迎外宾，有一次很伤我的心欢迎毛主席不让我去，因为我不是党、团员。还有在政治待遇上有些报告也是党、团员听，文件‘参考消息’也看不到，为了要听到、看到这些不得不往上爬。

为巩固党，保证党的纯洁，党员不应享有任何特权，唯一特权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使爱名利者，不能钻进党的队伍，可以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开开了党的大门。这样退党退团在党团数量上少了，但真能起到党的作用，用这样的人领导我们国家。……”

“我对整党的药方开的可笑，我把党员分成三种，一部分蜕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有一部分不起作用，一部分是真正布尔什维克。党要纯洁自己的队伍，党内的坏蛋不清洗是有害的。我从来没有说都是坏蛋，我是说特别是解放后入党的占很多，但有人马上得出结论说我是说解放后入党的全是坏蛋，把我的意思歪曲，其实没有意思。”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新闻系整风有没有障碍？”

有！

障碍在那里？在共产党员的大脑皮质上。

何以为证？

昨天二班开了党员大会，会议是紧急的。为什么紧急？听说北大的同学要来活动，共产党员得赶快商量对策，对策想出不少，比如请客喝茶之类。可是主要的却是这样一条：

如果他们说出荒谬、反动的话来，我们就把他们轟出去。

会议是在这样激昂慷慨的气氛中闭幕的。可惜北大的同学结果没有来，酝酿好了的轟也吹了。

但是我却为这些同志感到惭愧。北大离开人大有一二十里，他们

的同学很关心我們的整风，而二班的那些共產黨員呢？却把北大的同志看作是異端邪說，要把他們轟走，这是什么問題？

这是不願意傾听不合自己的話，是用宗派主义的情緒来对待整风。

难道共產黨員在整风运动中要做絆脚石嗎？”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虞耀麟）

“很多干部进城后貪圖享乐，生活腐化，思想僵化了，搞不了什么工作，高干的生活待遇太高太特殊了。

在中央部長一級干部中不知有多少呢？这些老头子（指高干）可以保留他們的职位，但应取消他們共產黨員的头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

“現在，有这样一些黨員，他們看到群众动起来了，开始鳴放了，他們不是衷心地欢迎，不是鼓励大家更痛快地把意見說出来，而是摆出一幅‘馬克思主义的保衛者’的面孔，只要听到一句不象馬克思主义的話，立刻提起大斧直砍下来，在他們看来，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毒已經漫山遍野，馬克思主义已經到了死亡的边緣，他們再不起来大砍草大杀一番，大地就要为之变色，社会主义也將完蛋。

这种人無以名之，名之曰：‘衛道者’。

‘衛道者’們的神經是特別灵敏的，他們听到林希翎同志說現在政治制度不够民主，大腦立刻开始工作：‘现在的政治制度不好，那不是想回到資本主义嗎？’‘呀！这人可能有政治問題’，我要探討你这个有天才的人，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新聞系八班貼出了一張广告，宣称要講党的危机，‘衛道者’一見，吓得發抖了，‘什么，党还会有危机，那不是說党要垮台了！’这时候，他覺得党的存亡，全靠他的挽救了，于是，人家的报告会还没有开成，他的法宝已祭起：把那張广告用大字报团团圍住，上面有咒文是：这是誣蔑，党沒有危机！！‘衛道者’胜利了，党被挽救了，講演忽然宣布無限期延期。

这样的‘衛道者’到处都可以發展，并且面孔都差不多，用不着介紹的，可是他們并不是全是一样的人，他們的来历可以說多种多样。

我知道，有一种‘衛道者’倒确实是对党忠心耿耿的人，可惜他們忠心則忠心点！却太不相信党，他們以为党是經不起风浪的，他們以为馬克思主义是經不起考驗的，他們以为如果看到几根毒草不立刻鏟除，則亡国亡党便在旦夕。他們不知道，如果共产党是那样一个党，馬克思主义是那样一种主义，那么，即使有他們那样的英雄保衛，也無济于事，而他們今天的这种英雄业绩，除了障碍党的整风运动以外，別無其他作用和付作用。

我知道，有一种‘衛道者’，如果对他們过于苛求，那也是不公平的。要知道，他們的腦袋非常現代化，已經有点象电子計算机了，他們是按照一定的現代公式思維的。林希翎說官僚主义是政治制度造成的，鉄托也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那么，林希翎——鉄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我知道，有一种‘衛道者’是具有堅定立場的人，他們的一切行动完全依照上級的指示，上級来不及下达新的指示，他便用老办法办事，比方說，用斗争敌人的办法斗争同志。他这样作是理直气壯的。因为，他沒有自由主义，他是無可非議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的‘衛道者’实在太多了，不过，尽管他們是这样形形色色，我知道，他們在整风运动中却只能起一种作用：吓唬群众，掩盖党的缺点，使党内确实存在的某些腐朽东西，不能被清除掉，讓他們在党的机体內發展，危害党，危害人民。”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虞耀麟）

“宗派主义的党员招牌問題：党员对地位很感兴趣，尤其是宗派主义造成了党的特殊优越条件。非常干部的积极性很高，把能干的記者調去当編輯，把下面的不懂新聞写作的党员調来当記者，党员到处

吃得开，有能力的非党干部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黨員有權的沒有本領，很不合理。應徹底的廢除等級制度，按工作職務有不同的待遇，廢除只能上不能下，有什麼本領幹什麼工作，沒有本領的就給滾蛋，不能憑政治資本吃飯。人的生活各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一切都蒙上政治色彩，影響人的正常關機。解放後除了愛人就沒有知心朋友，政治代替了一切，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婚姻問題上。黨員如果找了團員還馬馬虎虎，如果有成分或是歷史問題，就會受到責難。黨內的婚姻要求比天主教的規定還要厲害，教徒不能和非教徒結婚，還可以冒充，黨員不能和群眾結婚，群眾不能冒充黨團員。黨員結婚要找組織批准，這也是宗派的情緒。人民日報曾發表社論說：黨組織沒有規定黨員一定要和什麼樣的人結婚，這是騙人，過去黨內就宣布過能和那些人結婚。

我是黨員，工人出身，家庭沒有被鎮壓的，對黨沒有偏見。我的發言稿寫到十二點，看到黨的這些缺點，我痛心，可能提得較尖銳些，但都是從愛黨出發的。”

“腐朽的官僚習氣：很多黨員做了官，有了官僚習氣。地委書記即使下鄉也只在鄉政府聽彙報，不到農民中去。黨氣越來越少，官氣越來越高，聽黨的報告也要分等級，尤其是學生，就沒有這種必要，造成黨內等級狀況這是很腐朽的等級觀念。有些負責幹部犯了錯誤就有照顧，一般黨員犯的錯誤就不一樣，黨內有兩種不同的待遇，象艾青的處理就不公平，就太寬了。換了一般的黨員，早就不在黨內了。在招生上，中宣部把一些不合格的人招了進來，政府的法令對黨不起作用，這和國民黨的買考簽沒有什麼兩樣。”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楊 敦）

“現在各村中講毛主席還好，說共產黨就不高興，因為那些黨員太不好了，要不是熱愛毛主席，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單思良）

“城市浪費現象很严重，为什么这次沒有反浪費？共产党是执政的党，認為可以享受一些，十七級以上的干部多是黨員，做机关領導。办公室很講究，买沙發等，我对此感不平。可以节省买沙發的錢給农民买拖拉机。这話过去不敢說，怕別人說我富农立場……”

“……黨員入党時間越長，就越不注意群众影响，……有一种因循苟且的情緒。……批評与自我批評脫节，覺得群众沒資格批評黨員。”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楊維新）

“党团员講話很不自由，在这次整风中黨員不敢对党提意見，現在多少黨員成了盲从者，成了中級小伙計，而不能自覺的創造性的工作，有很多黨員見机行事，沒有自己的見解，堅持紀律性。黨員一登龍門就身价十倍，以改造者自居……班上除李思以外，都不像黨員。

怎样挽救党的官僚化呢？現在是工农專政，但是通过党来实现，故党是統治階級的体现。咱們是新社会的一党專政……統治者总有局限性。

党的领导需要，但党的地位使它可能脫离群众并官僚化。不同的地位看問題就不同。

时代永远在前进，人們总是要落后，黨員也不例外。过去有自然淘汰，現在沒有了……

他还向党提出了所謂的“建議”，即“一定时期的申請入党制”。他建議說：

“黨員五年或十年退党一次，以后可以重新入党。但需要群众通过。因为时代前进着，人可能跟不上时代，黨員也不例外。过去在艰苦环境中可以自然淘汰，現在沒有了。有人入了党不起作用，又長期留在党内，就妨碍了党的先进性。这样做可以使黨員不看領導臉色行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鮑子津的材料）

“……遣責別人的人一定是最不道德的人——如果道德存在的

話，道德永远是束縛人的規範。

……真正的道德是对人类的爱，对爱的忠实，最不道德的人，是那些口是心非的人，‘爱国者’，‘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干部，他們是最不懂得道德的人！”

“共产党员的本色，怀着最卑鄙最自私目的加入党派，为的压迫别人，为的当便衣警察，为的当官，欺騙人民，出卖良心，友誼，这是介乎生物与微生物之間的东西，不是人！真的为人民服务嗎？完全为自己，真的接受批評嗎？完全是陷阱！自私，渺小、卑鄙、愚蠢、欺騙。如何对付他們：我不会玩弄兩面派手法，而且是卑鄙的，我公开卑視他們，我唾罵这些自私的大混蛋，他們侮辱了最崇高的字眼：爱人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关于党的問題。抽象的說，党是无产階級先鋒队，永远具有战斗力，代表时代的呼声。但党是由具体的党员組成的。有一些党员是思想不僵化，永远向前看的，有一些是思想僵化，光听上級指示，还有一部分是为做官而来的，特别是解放后入党的。这样的党就不象抽象的党那样。斯大林时代的苏共，就不能說还是无产階級的先鋒队，代表时代的呼声；我們的党就有一部分人来做官的，还有一部分思想僵化，这种人占的比例不小。在前一段时期揭發三害中，有許多党员就怕，因为他们怕自己的官做不成，还有些党员就是光向后看，不向前看，看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只看到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那一套，認為反对这一套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而真正辯証唯物主义的党就應該是向前看的党。我們党的党綱、总路綫、方針是体现人民利益的，而具体貫徹及它的政策、步骤就不是这么回事，如在农业方面推广新式农具及其它措施中就有不少問題，这是光由上而下貫徹所帶來的，犯錯誤的，一部分是因为想做官，另一部分則由于不懂。凡是貫下去的都称作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中固然有好的，但也有許多坏的，他們投政治之機。如費孝通过去我在天津日报上看到他一套吹捧的話，而今天却發表了許多右派的言論。这部分人是党

的最危险的敌人，党应该能区别好人与坏人，对这部分光唱赞美诗的人应该加以警惕，真正依靠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党依靠前一部分人就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呼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 張祖文）

“党现在存在的问题：老党员以为老子打天下享福是应该的已形成一种风气，新党员入党动机不纯，遇到艰苦环境经不起考验，而在评级时却有上一条。

党员以改造者自居的身分过于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党员入党都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党员和普通人没有两样，许多党员官僚主义，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共产党善变，要人提意见，又来整人，要政治手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朱惟民）

“党员从概念说是伟大的，但党员做的事却是卑鄙的，老头离婚找爱人。”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韓 楓）

“(1)个别党员利用党的威信作人民的老爷，作威作福，违法乱纪，如侵犯人权，生活腐化等。

(2)反对寄生虫，寄生虫实际上是不劳而获，不应得的东西比他付出的劳动多就是。高干的子女，妻子是典型的寄生虫，也是主要的。

(3)反对特权，特权是比普通人享受了，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如补助不合理，迎接外宾很多人去不了，特权的享受应由制定这种制度的干部负责。

(4)建议：党中央如何实现领导问题，解放前党员不能享受特权，但也能实现党的领导，因党的纲领是正确的，而不是发号施令，而

現在出現的這些東西，值得深思，以後應貫徹黨員吃苦在前，不應給過多的物質獎勵，應按勞取酬，這樣為了升官發財的人就不能入黨了。”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張康毅）

“黨員是政治符號”

“老黨員不學無術，級別高，工資高是廢料；年青黨員唯唯諾諾，雖有熱情但無真才實學。

黨內外都有二種人，黨外有積極分子和落後群眾，黨看不起群眾；黨內有一種人是當權派，有一種人是反對派，我雖然是黨員，但在黨內處境是與你一樣的（意即反對派，這種觀點還表現在對黨組織的看法和行動上——原編者注）。

黨內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黨內不允許個人友誼，看到有人比較接近就認為是鬧小圈子，黨要允許黨員按照個人的愛好自由發展，允許自由交朋友。

說共產黨員是便衣警察，我說團員也是便衣警察。”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共產黨員在運動中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袖手旁觀，臨陣逃脫是可恥行為。”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 周育才）

“我校新入黨的黨員，都是恭順的，無原則的維護黨的領導的。盲從、唯唯諾諾，由於害怕紀律，而不敢陳述己見。結果形成了一個維護少數領導者的宗派集團。”

“黨員不該特殊，讓黨員和群眾自由競爭，政治資本不是萬金油。他們所以敢於強迫命令群眾，就是因為有黨在維護他。”

（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地理教員 梁其璞）

“黨的偉大正確大家都承認，但正是這樣，黨進城後，有些人創造

条件爭取入党,同时是照‘政治扒手’創造条件,用吹、捧、爬等为阶梯要求入党。有些党的领导干部,被这些人麻痹了,看他們靠近党,拥护党,結果吸收了。入党后脱离群众摆架子,使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降低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韋 齐)

“党員干部对定产問題估計过高,官僚主义的决定了农民的定产甚至逼出人命来結果給党員干部警告就算了。”

总支大衙門式,分支小衙門式沒事不联系只到有事才联系。衙門式的作风用教条主义办法进行工作就害了同志,同志們有苦無处訴。

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員‘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历史呢还是现实的口号呢?如果是现实,在物質上他們优于人民,在精神上党是执政的党,恐怕每一个党員不会受誰的压迫吧?那么究竟比人民苦在什么地方呢?这不給共产党員挂上一个名不符实的荣誉帽子嗎?我認为这口要名符其实就应当从物質領域去解决。”

“对共产党員不要有特殊的照顧,不要光憑党員的称号吃飯……”

“在我們不少共产党員身上,他們都往往將党的決議(具体的話这包括各級領導人的言行)党的紀律来代替了自己的思考,因为他們的任务就限制在只是解釋和說明(重复)这些言行……完全缺乏了他們自己的主观性,創造性……久而久之,这种重复成了他們的习惯的思想以致很难糾正,真是可悲。”

“許多党員不根据社会法制,光憑主观办事,往往他們把損害社会主义的行为当成是必要的,这是他們的悲剧。”

“党内純粹的好干部是个别的。”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濮仲文)

“党員的特权影响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構成向党内鑽营的主要动力,因此,不憑一技之長,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全憑党証取得高官厚祿的混世魔王与日俱增。”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薛新卓)

黨員有蜕化變質現象，小汽車高干子弟學校是合法的盜竊國家財產。黨員有特權如高干子弟學校培養了一些公子……入黨以後可以被提拔，可以參加歡迎貴賓，被信任，使一些青年把入黨當成向上爬的資本。”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束洪濤)

“有這樣一些同志(黨員)口是心非，說的條條是道，很會教訓別人，但作起來卻不是很好的。對上級号召積極響應，心裡有意見。這難道不是口是心非？有些人對整風冷淡得很，尤其是平常經常教導別人的人，這次運動都不是象以往那樣積極起作用。也許他們認為這次運動和以往不同，是整風，好象給黨提意見就會喪失黨的威信，提意見真是和風細雨，輕描淡寫！”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若榮)

“黨團關係不平等不自由，黨員有特權思想，入黨是為了要向上爬，黨團員相處，黨員對待團員只是找談思想，查歷史，解決問題，沒有平等相待，這是宗派主義根源，為什麼要這樣，沒有黨員的幫助，同樣可以進步，認為解放後人們之間相處，毫無人情味，是冷酷無情的關係，我要作黨員，就要作布爾什維克式黨員。現在許多人入黨是為升官發財，所以我不想入黨，老干部昏庸無能，不能起作用，有的黨員說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這是極端無恥的說法，天下是人民打下來。‘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說法，是宗派主義產生的理論根源。”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韓運德)

“解放後入黨的黨員大部分是平庸無奇的，是為個人利益的，也要革命的一面很多黨員沒創造性，黨叫他反右他就反右，黨叫他反左

他就反左；有的黨員思想僵化，靈魂死亡了；有的老干部不犯大錯誤，但又不能开除他。黨是越來越大了，只能巩固不能發展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俞國亮）

“林希翎提出的百分比吸收與罷免黨員，目的是使黨員在群眾中起作用，出發點是好的，當然方法不對頭，這是邏輯上的錯誤。”“現在有些黨員沒有具備共產主義人生觀。不夠標準的很多。黨員分為兩部分：一、解放前入黨的現在蛻化變質了；二、解放後入黨的動機不好。現在黨不同了，變成了執政黨，脫離群眾了。”“黨的機構不應另搞一套，應合并到行政上去或起碼應調整一下關係。”

（中国人民大学檔案系學生 殷九如）

“黨員幹部同一般學生的待遇相差太大，表現出黨員有特權思想。‘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說法，是錯誤的或反動的。這種錯誤和反動性，是給黨員造成特殊感覺。黨員的墮落腐化行為主要是由這個理論產生的。”

（中国人民大学檔案系學生 姜玉成）

“無數個野心家，做官迷在拚命敲打黨的大門，把思想改造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各種明的暗的制度上都給予黨員種種特權，入了黨就提拔快，領導信任等什麼都方便，這樣無形中就在入黨問題上就實行了‘物質利益原則’……”“今天黨已經被一群蒼蠅似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緊緊圍住……”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學生 鄧先扶）

“現在沒有好黨員，我由四川到哈爾濱到人大就沒有看到好黨員。這樣入不入党也值得考慮。”

“解放後入黨的黨員，質量愈來愈低，原因是入黨動機不好檢查。”

“賀安的平均党性降低是有一定道理的。”

“过去总叫人相信党，党首先应相信人家，人家才会相信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盧傳忠）

“党按八項标准来要求，完全合乎标准的很少，林希翎說90%我說99%不完全合乎标准。这是我国現在狀況决定的，我国真正的产业工人太少了，党紀太寬，一些老干部居功驕傲的應該开除出党；解放后吸收新黨員条件太寬，有許多是抱着个人目的而入党的；班上黨員不起作用，水平也不怎么高。許多黨員都是教条主义只講漂亮話的人。”“在整风中我班黨員只有二个及格。不起作用的，没有战斗力的應該清除一批。認為自己早該被吸收入党了，因为肃反时不积极沒有打人所以未能入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王犁剛）

“許多黨員常常被‘条文’束縛死，不敢大胆談自己的看法，怕出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資料員 刘运梓）

“黨員無思想，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唯唯諾諾。”“黨員有局限性，要听組織的話，不能自由講。黨員不說心里話，不正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公瀨）

“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队……照理不应站在工人階級上作威作福，必須实行‘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口号，但实际上我們党、团员、高級干部的政治待遇以及許多殘存的特权是太多了，过去群众的呼声被压抑着，或因为借革命先烈們的流血牺牲，而容忍他們高人一等的享受着……”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洪維政）

“区乡干部狗臭屁，村里干部土皇帝，胡作非为。党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改变了，思想就会改变。过去干部和群众一起睡觉吃饭，群众当然满意，现在高高在上，连过去救过他的人来找也不理了，党员的思想已起了变化，与‘党员’二字已不相符合，象闖王进京了，过的是小姐，太太贵族生活方式……”

“一说是党员，不管实质如何，就要提拔，在农村中这种情况更严重，党员的特权思想浓厚……”

“党并不是神聖的东西，但党员并不是这样去理解的，一部分人入党有个人成分，未入党前什么都讲，入党后都了不起，谈的话都是正确的，党员说的话你要服从，不然过不去。”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韓 楓）

“有些党员表面上是为党为国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大部分是想升官发财，因为入了党，就信任，就提拔，党员入党是为了统治人，‘领导人’。”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方炎火）

“建党建团要70%群众同意，虽然百分比不一定照林（指林希翎——编者）的提法，但她提的精神是好的……使党员没有享受其他特权。党中央可以统计一下：解放后党、团员群众那一部分人升级最快？这是否也是造成人们追求名利地位的原因。应取消党员一切特权现在党员的特权两天两夜也说不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献给那些所谓党员”

“可嘆！ 可嘆！	宗派主义
竟有这样一小撮人胆敢	主观主义组成的
在光天化日之下	青紗帳
借着官僚主义	搖身一变，成了党员

使尽了阿諛奉迎
阳奉阴違
嘩众取寵
投机取巧
吹騙拉打……等

各种卑鄙骯髒的本錢
便換来了榮祿双全
从此就無法無天
向你們大喝一聲
赶快改邪归正!!”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李庆时)

“党的先进性是不够的,現在黨員中有許多男盜女娼的現象,这种現象甚至已成为合理的了。”

“作一个共产党员容易,作一个正直的人就不容易……这样的人(不正直的人)在党内并不占少数。”

“党既然是领导者,那么,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就应当精銳再精銳。”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岳文伯)

“老爷、少爷、太太、小姐們:

你們享受的特权,把党看成你們的特权集团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你們把入党做为个人野心活动的目标,把黨員的光荣称号做为个人卑鄙活动的政治資本,將一去不返了,它將被人們的巨掌所粉碎。”

(中国人民大学 原子炮)(大字报)

“假如土包子利用过去的光荣骑在人民头上,这个是不允許的。是嘛,历史的车輪是向前的,革命并不是說得到了政权就完了;我就作部長了,作局長了。就完了嗎?不是的!老干部要長进,真正要有党性的話,我告訴你,历史是前进的。否則你要被淘汰。作爸爸的作媽媽的,不懂得这个話,你的兒子会革掉你的命。过去的光荣是过去的,但是好多人自己不長进,周总理在杭州机场欢迎伏老的那篇文章,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大概你們都看了,什么紅領巾那个,周总理說假如我們不消灭官僚主义(大意是如此,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到杭州去应该接近人民,假如我們想在北京城牆的話,这是很明显,假如他長大了,

那么等待以后这小孩子是会革掉我們的命的。

这个很正确的，同學們可以从这里看出周总理的眼光，一个領導者最重要的是看的远，不是看的近。但是我們很多老干部是沒有知識的，眼光看的远这的确要有知識，当然我們不能怪他，要历史的看問題。在战斗中他們怎么能上大学呢，怎能像你們現在呢？但是的确他們应当自己認識到这一点，应当自己要有長进，应当要学习很多东西，不应当摆老資格。我举一个例，我們建八的一个同学，他是个老黨員，他叫沛旋，就是像老爷式的在肃反时訓我的那个。他怎样呢？他僵化了，他們班上要他發言，在整风运动中他一句話也不說了，不發言了。他在班里的确是像皇帝，一貫是像皇帝，他的話就是法律。他一發言大家就不敢發言了，那就是肯定了。但是他是很严肃的板起面孔，我見他就躲他，怎样呢？上面的人不管他，底下的人不敢管。他是什么？——独立王国。班上的独立皇帝。在整风中他一句話也不講了，为什么呢？生鏽了。是不是？同學們已經生鏽了，所以这个整风啊，我再講一次，像这种人，你叫他自我批評，他能不能自我批評？不能够了，那个要用群众了，除了群众沒有別人。”

（清华大学 馮国將）

“黨員的个性高于党性，偏爱胜过良心。黨員有許多阴暗的东西，黨員是愚蠢的、是字紙袋、是彈簧、是麦克风。几年来我的心中充滿着若干个为什么，党团組織除了給我們帶來心灵上的創伤和不團結外，沒有什么，四年来感覺到的只是昆明四季如春。”

（云南大学 蒲茂光）

“党团员都是挂牌的，其目的是为了找爱人，向上爬。”

（北京矿业学院 湯伯森）

“黨員使人望而生畏，党的門禁森严，难以靠近是党群关系强化的原因。”

（北京矿业学院 賈佑庸）

“党几年来培养了一批盲目的崇拜者，說着清一色的話，包庇党的錯誤，党员只听上级领导布置，而不开动脑筋，不追求真理。”

（北京矿业学院 馮国大）

“党员威风凛凛出现于群众面前，批評別人是能手，整別人思想是家常便飯。”

（北京矿业学院 一枝梅）

“党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指示，党员是木头人，不会独立思考，党员和组织的关系好比狗和主人，主人給些吃的就跟着跑，而不管它主人是好是坏，都是忠诚的。”

（北京矿业学院 閻林森）

“……我們全国有一千二百万党员，我看水平高的不到二百万，老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很多，文化非常低，很多解放后入党的，質量也不高，全国这么多单位，一处派一个水平高的党员就很困难。应该赶快提高党员的水平，并且在今后发展组织时，应切实注意質量，发展真正的优秀人物入党。”

（武汉大学 曹紹瀾）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提法，显然就包含了另外一个概念，即广大的非党人士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主要是决定于每一个人的革命实践，而不是决定于他有没有党証。沒有党証而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战士，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他們倒是普通材料制成的……且不說这个提法不科学，不合于事实，就算真是如此，在中国六亿人口中，只有一千多万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其余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我看，將这个事实記在历史上，也不見得多么光荣。”

（武汉大学 程千帆）

“我看見的共產黨員象老爺一樣。與黨員交談必需用交流電，用直流電是不能與黨員交談的。”

（天津大學 張達聚）

“入黨的人，只是歷史較清白、扮正面角色的人，在思想上甚至比黨外人士更落后。”

（湖北醫學院 任 渠）

“不懂裝懂，外行充內行——一些黨員一竅不通，却裝出一幅博士相。”

（湖北醫學院 陳 達）

“在黨內的許多案件，都是受害人控訴和上級調查處理，屬於黨員群眾提出的，就非常少，幾乎沒有。”“為什麼黨內明辯是非，追求真理，堅持正義，仗義執言的風氣竟是如此的薄弱？在產生問題的那些地方的黨員為什麼那樣毫無原則性？”他還說，在他的工作中“其他涉及面較狹的黨員違法亂紀現象更是數不勝數”。

（北京政法學院 陸紹祁的材料）

“坐小汽車的都是黨員。

現在的共產黨員一點苦都不吃，而樂處都享盡了。”

（中南礦冶學院 黃心欽）

“性格剛直的人就不參加（黨）。”“共產黨員中有少部分是好人，但絕大部分都是壞的。”他看到報上揭發某些黨員的錯誤事件，就對人說：“你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

（北京政法學院 王明欣的材料）

“黨員不了解青年。黨員落后於形勢了”。“黨不了解（他的意思是支持——原編者注）我這一套（指資本主義的思想和趣味——原編

者注)是不对的,党因为不了解我,因而有脱离青年群众的危险。”“觉得党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的人性的美……我觉得党员什么事都强调阶级性,缺少人性,……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党员看人重德不重才……党员所了解的和我不同……党员有些冷冰冰的,思想干巴巴的,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创见,……在一年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我就觉得很多党员思想保守了,抱残守缺。”

(北京政法学院 康德培)

“国家不需要党员了,因为群众的觉悟程度与共产党员差不多了。”

(北京政法学院 章天惠)

“共产党部分干部居功自傲,有特权思想,是国民党作风,享乐腐化。一般干部是认为作领导,下面就应服从,下面说些别的话,就认为是发牢骚,予以打击报复,盲目维护自己的威信。”“党员领导居功自傲,对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莫大的兴趣,清醒些! 党委会不再包庇你们(指党支部——原编者注)了,同学们再不再盲从了。你们还要什么‘王牌’呢?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才能可以炫耀?在我看来,你们既缺德又无才。靠功劳吃饭是行不通了!你们的出路是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端正革命的动机,好好学人,学一些真实有用的知识。我厌恶个人崇拜。我以为一个人的好坏,他的道德上的强大与否,不决定他是个党员;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好坏决定于他对人民的贡献,决定于他的学问,他的出身和历史,我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借着‘党员’的牌子作威作福,我鄙视这些人。

这些人沾污了党的纯洁,我是决不会向这些人妥协的。”(章文岳给钱瑞升的信)“什么参加党啦!参加革命啦!都是个人主义者。”

当郭翔反驳他并问道:“像志愿军抛妻离子到朝鲜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如罗盛教,黄继光等人,也是个人主义者吗?”章文岳说:你怎样知道他们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为了名誉、地位,为了回国高升。”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的材料)

“我院宗派主义的老祖宗是武士(指前副院长武振声同志——原编者注)”。他认为武是以粗暴压服出名的。杨又说:“教务长刘昂,前党委书记王润,总务处长修恒生等同志都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者,他们的言行几乎都是符合这种思想的。”

(北京政法学院 杨鹤皋的材料)

“党员是戴金牌的,团员是戴银牌的,群众是戴铁牌的,不小心就会生锈。”

(北京政法学院 林共鸣)

“入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奉承拍马,一条是积极斗争。党支部吸收党员征求团员对入党的意见时是玩弄民主、虚伪的一套。党支部是麻木不仁。党发展组织是根据支委的主观意断,独断独行,党支委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党的八项标准。”

“党支委卑鄙无耻,一贯欺上压下。党支委的讲话没有人性,是滑稽戏的丑角。”

“基层委员为非作歹,支委老爷无法无天。”

(北京政法学院 吴贵知)

“党员对人说话,除去党性外,再无别的可说,党员也是一根棍,不是党棍而是一根‘冰棍’,这怎么能敲出别人的热情来呢?”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按照我的理解,‘党棍’一词的含义,是指那些抱着为个人利益的野心,钻进党去,挂上党员的招牌,骗取信任,欺上压下,为非作歹,用党作梯子往上爬,缺德无才,不是憑本領而是只憑党员这个头衔,坐高官享厚祿,混党飯吃的人。”

“党团员不能真正说明一个人的觉悟,党员不仅不等于才,而且和德也不完全一致。”

(北京政法学院 赵明)

“任永泰同志代表党支部在会上的讲话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达到个人卑鄙的目的，是杀气腾腾，是野蛮，是冷酷无情，是恼羞成怒，是压制。我们与他好像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一样。”

（北京政法学院 吳貴知）

“党支部发展党员是唯成分论。发展的党员都是工农速成中学来的。”当别人写申请入党志愿书时，他说：“你还想入党，看你那样子，你还是加入其他党派哩！”

（北京政法学院 匡紹毅的材料）

“支部吸收党员是宗派主义的认为吸收的人是‘老实’实际上是拍马屁的……现在掌握一条规律，只要想入党入团，首先得拍马屁。”“党支部发展组织……以接近支委为标准，欣赏捧拍，从印象去出发。进步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北京政法学院 張京华）

“党组织，包庇党员，对群众却很严，好像家丑不可外扬，党员偷东西就不处理。”“党支部对我……完全不信任。”“提意见越尖锐越好，不要四平八稳，在整风中群众最积极，团员次之，党员最落后。”

（北京政法学院 姚 明）

“确实他们（指二年一班党员——原编者注）并不把党委会，党纪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党委会不会去处分他们要处分的是非党人士。”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我院党内严重的问题是宗派主义，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党内有革大派与非革大派、地方派；各单位的本位主义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之一。”

（北京政法学院 陶和謙）

“从党委到党支部都把我們看做一团黑，只是对那些唯唯諾諾，善觀气色，不动脑筋的人才被称为原則性强和善于領会領導意圖的人，因为領導上特別賞識这种人，那么，入党的是他們，提級的还是他們……只有挨整时才沒有他們。”

（北京政法学院 楊鶴皋）

“党团内部的事先商量問題是宗派主义，团员同意党员意見也是宗派主义，团员是不講真理的，只知道跟在党员后面跑，党团员向組織彙报是故作进步，是打击群众，”

（北京政法学院 罗典荣）

“有些人很善于看风使舵，鑒貌辨色，看領導上或者是党员們怎么說，即使意見和他的本意并不太一样他想也不想，也就做个小嘍囉，跟着后面唱几句，做个人之亦之的应声虫。”

“入党沒有意思，不必入党。走党这条路沒有意思，应憑真才实学吃飯。我可不会为了要入党而阿諛奉承于誰。”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积极分子是阿諛奉承、拍馬屁的人。积极分子分三类：一类是唯唯諾諾的；二类是天真幼稚、工作方式簡單生硬；另一类是看領導眼色行动的人。”

（北京政法学院 林共鳴）

“来自革大的党员成了我們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一般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說了，市委有决心在整风中打散革大的核心。”

（北京政法学院 錢瑞升）

“党员發現群众有問題不帮助，把他記在日記本上，收集起来整

人，或者是列入档案，一直跟随到死为止，党员又不走群众路线，连这个教条也没有，他们与群众格格不入。”

（北京钢铁学院 張振祥）

“……大学生活是軟禁生活，党团组织和群众的关系，是人与奴隶的关系，共产党迫害青年，相杀人，党员今日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党员口袋里装着党証以执政者自居……当我见到党的干部时，就好像见到敌人一样。”

（北京钢铁学院 文兴伯）

“(1) 对共产党员特殊材料作成的这句话，很有反感……不合乎事实与邏輯。

(2) 現在的矛盾自然存在的是一小部分，而党制造出来的是一大部分，如历次运动，宗派主义，主要由党来解除这鴻溝，解除青年之間矛盾。

(3) 赞成教授治校，反对党委治校，解放前清华是教授治校，办的多好，而今天党委治校，学校办坏了。”

（北京钢铁学院 徐滌如）

“……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叫党员先知道，党员一知道一彙报党中央也知道了，互相勾通，使我们达不到預計目的。

政治教研組是靠党吃飯的。

現在人和人之間表面一套关系都是虛伪的。”

（北京钢铁学院 朱 倫）

“共产党在每个崗位上都安上个警察——‘共产党员’，农民象怕老虎一样的怕共产党，因为搞錯了，要捉去劳改。农民叫党员为諜报員，叫团员（共青团員）为湯圓。在我们这个国家內共产党员好找工作，可以做官（官官相护）。在宪法上虽然規定一律平等，但實質是不

平等，非黨員就找不到工作。黨員分配工作時可以找學生科，同學分配工作就只有服從。黨員入黨的動機有三點：(1)是做官，(2)是好玩工作，(3)是有錢。黨員積極只是開會積極，學習積極，迎接外賓積極。”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黨員……是不及格的陰謀家——狼、豬、烏鴉、臭蟲、狗屁！黨員有特權……是些善於隨聲附和，吹牛拍馬，是些重複別人話的應聲蟲。”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黨團員有特權，什麼事情先給自己安排好，而後別人。鄉村幹部，黨團員大部是壞蛋，自高自大，看不起群眾，只會貫徹國家政策，堅持原則，不照顧農民，特別是青年黨員。過去想入青年團，但絕不參加宗派主義的集團。航院的黨團員太多，任何活動都黨團作(如開摩托車等)。”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黨員是唯唯諾諾的人。我不能入黨，就是因為黨看死了，如果自己逆來順受，也許早就入黨了。自認為並不比一個黨員差，你們這樣作完全是一種宗派主義的情緒。”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一些黨員對待一些非黨群眾是冷酷無情，入了黨就六親不認。”

(中山大學 曾紀經)

“共產黨里有一些人，喜歡聽好話，這風氣很盛。有些人在會上喜歡發言，常常說我聽了院長的報告體會很深刻，這些人工作不見得好，但受到重視。對提反對意見的人，就扣帽子，尤其是黨員，表現得最利害。黨員都是奉承領導的人，這不能怪黨員，怪領導喜歡奉承。黨員總是先假定領導是對的，然後盡量來體會它的正確，往下貫，據說這是黨的組織性，我認為黨首先應是人民性，而不是首先組織性，

不能把人民的利益来服从組織性。”

(北京石油学院 史鎮华)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葛佩琦)

“党的质量不高,党员都迷信馬列主义,入党的人疯狂了。共产党员六亲不认,党员什么都不懂,好象吃了迷魂药。党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在群众中消失。”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 范政濤)

“人大宗派主义严重,学生都是党团员。”

“党团员起特务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李錫三)

“党员是靠牌子吃饭,党员沒有人性。”

“对党员是否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表示怀疑,和人一样,一半天使一半禽獸,一半为公,一半为私,党又偉大又不偉大,又光荣又不光荣。”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员 張紹鴻)

“共产党员沒有个人主見,缺乏独立思考,不敢講真心話,唯唯諾諾,是教条主义者,是奴才。”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

“……党员积极分子监督別人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然后便指着田耕三(预备党员,团宣委——編者)說,“这不能怪你們‘中間人’

怪上边”。

“中間人，假积极分子以及抱皇上大腿的人，什么寵儿，是使人最受不了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田仲倉的材料）

他辱罵党团员是“特务，狗腿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的材料）

罵班党支書是“官僚主义的崇拜者”团支書是“跑龙套的”，党組織領導人是“小霸王”“傻瓜”“政治特派員”罵我系二年二班党支書是“生了濃瘡的人”，罵系行政干部是“狗官”。

罵所有一切拥护党的人是“小嘍囉”，“卑鄙的人”“想不憑一技之長而削尖了腦袋向党內鑽的人”。罵拥护党委的人是“卖狗皮膏藥的人”是“愚蠢、喪失理智的伪(?)道者”。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薛新卓的材料）

“共产党員都是土包子，什么地方都有土包子，土包子什么都不懂。”

、（中南矿冶学院 楊福寿）

“共产党是特务机关，共产党員汇报是特务行为。”

（北京政法学院 李涵林）

“除了参加二万五千里長征的人外，大部分共产党員都是混进党的投机者。今天的社会，共产党是主人，我們是帮工。”

（云南大学 程先寿）

“毛主席是土包子，党团员是混旦，王八旦，拍馬溜鬚的人，是坐探，走狗，和特务。”

（北京矿业学院 尹毅夫）

“三·一”党是反动政权下的一个反动組織，我也不了解它的底細，据說他們一貫在青年中进行暗探工作，將进步的青年向反动政府告密，他們还到处听消息，釘梢，在青年中制造一种不团结的空气。

問題在于我們有一些同学不信任同学和反社会主义活动已經掀起了的誤錯思想下，在向国民党学习，在向‘三·一党’学习，而且个别干部和领导同志主动的帶头我想也不是絕對沒有的。清醒一点吧！这又何必。”

（北京大学 蒋兴仁）

“最專政的也沒有共产党專政这样严密。共产党员象便衣警察、特务似的監視同学的言行。共产党制定法制（指宪法——原編者注）又破坏法制。肃反的錯誤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共产党遵守法制的話。共产党总喜欢把誤錯、缺点說成是个别的，总是好的，有什么根据？”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停課反右派是‘超級整风’，是暴露了共产党丑惡、猙獰的咀臉。院長出的有关反右的布告是粗暴，是命令主义……是俾斯麦鉄血宰相的显灵。共产党干部利用肃反，奸淫少女，私設公堂，拷打逼供，党的手法是橡皮包着鋼絲，外伤看不出，內伤却無可救藥。‘黨員階級’出現在目前社会下，十八世紀的侯爵也不过如此，不同的只是更加盛气凌人，隱藏罢了。”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团支部是森罗殿，党支部是活閻王。党的档案制有如国民党的特务制度，組織上可以随便給你鉴定几条。”

（云南大学 賀 斌）

“秦檜的坏作风对他講来倒不为奇，因为他就是一个大奸臣，而今天的一个黨員领导干部有了严重的坏作风，我認为比秦檜还严重。老干部有長期的工作资历应当把工作做好，并不能用来要价錢，否則

这种‘資’是不值錢的。”

(北京体育学院 赵秉毅)

“党培养党员成奴才，凡是要求入党的，都是拍馬屁的，我根本不想入党。现在我体会不到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

(北京体育学院 生世輝)

“党员是黑警察，是維持秩序的人，我們生活不民主、不自由。”

(蘭州大学 陈得章)

“有些党员冷酷無情，总是摆着一付党的面孔，有些党员則六亲不認，拋妻棄子是現在的陈世美，这些人連畜生都不如。”

(蘭州大学 曹覺民)

“革命先烈如李大釗等人以鮮血换来的胜利，現在叫这些党內的敗类分子糟踏了，無怪有人說：胜利后党成了‘便衣警察’。”

(俄語学院 宋玉波)

“一些共产党员沒有人性，一些积极分子踏在被斗錯人身上爬上去了，入了党。”

(北京俄語学院 王繼昆)

“他們(指党员——原編者注)中有些却像猪和魚一样(这几个字后被牆报編者刪去——原編者注)，只是呆在家里不出一声，对党的政策心中無數，不作宣傳解釋，不从政治思想上去团結群众，于是他們的党群关系就表現为平平淡淡、冷冷漠漠、不好不坏、庸庸俗俗，哈哈，这真是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雅得很，可又俗得很！”

(北京俄語学院 吳青阳)

“現在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吏没有什么不同，高高在上，騎在人民头上，無惡不作。”

（中山大学 李煥添）

“全国惊人的变化，这就是党员的变质問題。这些党员把从前先烈同志的流血奋斗都忘記了，他們現在只考虑个人得失、名誉地位。要入党就要学会迁就、盲从、阿諛、奉承，就要違背良心做事……。

党员的專权思想严重，党支書特別專橫。某些不合乎党员条件的应把他們开除出党，党委書記不够条件应自动退出。我們号召正义的，有良心的青年和青年团员起来进行斗争！”

（云南大学 牛××）

“党员特权思想严重，發展到了專橫的地步，党员‘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党员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党员碰不得，碰了就倒霉；党员都是靠抱着金字招牌吃飯的人。党内宗派主义严重，不見他們互相有斗争。党员飞揚拔扈，已經是既不可敬，又不可爱了。如果取消党员的称号，他們与群众沒有区别。”

（云南大学 秦鴻謀）

“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为什么現在划分党、团员、群的阶级？在朝鮮是党团员冲锋在前，現在有些党员是在受享上冲锋。”

（云南大学 王孔淵）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內云：帶來剩余价值的貨幣謂之資本，根据这点，我認为一个人入党后就可以叫党员資本了，因为党员这一块金牌子可以获得許多剩余价值：

- （1）有牌子就有一切——名誉、地位、待遇。
- （2）有牌子可以进行各种冒名頂替的活动成为各种代表。
- （3）可以用牌子去感动利誘女朋友。

(4)可以随便干涉别人生活。

(5)可以迎接外宴。

(6)总之,宪法上规定的人民所享受的一切权利,是指有金牌子的人而言的。惨哉!痛哉!群众的地位何在!”

(云南大学 李寿国)

“很多共产党员,都是阴森森地看别人,听别人讲的,拿本子记别人的。别人一批评就面红耳赤,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局限性,党外人士提意见就不接受。”

“有些主任、科长(指党员干部——原编者注)不称职,坐在办公室里发号令;见大的,唯命是听,行、行、行;见中的,指手划脚用公式来行(新建学院+艰苦奋斗+精简节约+克服困难+全面照顾=○);见小的,呼风唤雨用压力,就是合理也不行。有人说来不称职,唯有中共党员才相称。”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关强赫)

党员讲一样的话,是一鼻孔出气,党员是官官相护。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邢荷芳)

“有不少的党员,
把自己的金字招牌,
当着‘天方夜谭’上的‘神灯’,
想一辈子受用不尽。

这金字招牌的用法是这样:
如果你需要点甚么,
你就把它敲出噹噹的响声,
你面前马上出现了你的僕人。

“你要甚么？我的主人，
是小臥車？还是洋房？
是要天上的那个月亮，
还是要月宮中的那个姑娘！
一切你都用不着悲伤，
一切都象你想的那样。”

但是呵，我的主人！
你要小心，
不要把金字招牌，
敲得过响过长。
如果敲得过火了，
它就会發生破响。”

（云南大学 張 熙）

“黨員三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获得了巨大成績，在人民群众中有了更高的威信，产生了驕傲自滿情緒的結果。因此要克服三大主义的危害，必須打击黨員干部的威信。”

（北京体育学院 張士杰）

“人們的印象是：黨員不以誠待人，而是以政治手腕来治人，所以都畏而避之……現在每个机关里几乎有十分之一这样的人，他們业务不懂又不学，憑着一紙‘党証’和‘老子革命十几年’的吓人招牌在拿高薪，享特权。”

（同济大学 張稚微）

“領導有居功享乐思想，黨員是鉄飯碗。假如采取自由選擇职业，‘鉄飯碗’就打破了，那些‘土包子’憑‘革命資历’吃飯的人就完蛋了。”

（北京体育学院 姚 以）

“只喜奉承，不听批評，久而久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別人，眼里只有少数人而沒有群众，加之权力在手，就可任意恣行，尤其在运动中，就显威风凛凛，把一些心中不乐意的人不顾死活地大打一通，說什麼打击党员就是打击党，批評領導就是攻击政府，凡事既不信任群众也不与群众商量，把一切問題神秘化，利用群众对党的忠誠，来扩大打击面，对群众实际乃是一种：‘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对一些趋炎附势者則大加賞識，遇机会就提拔，造成一种特殊的威力，党员更与人不同，自成一派，新入党者，一入龍門身价十倍，自覺与众不同，党员干部更是权力至上，包攬一切，說了就算，这样就脫离了与人民办事的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而形成一個集团王国了。”

（山东大学 王应素）

“党员可以分成三类：就是有的为党增光的；有靠党吃飯的；有供党害人的。凡善于联系群众，鑽研业务，推动工作的，是为党增光的；凡不善于联系群众，鑽研业务，推动工作，甚至驕傲自滿，脫离群众的，是靠党吃飯的；至于供党害人的，就其主观意图說，也是想把工作做好，不过由于不懂业务或者思想方法不对头，就客观效果來說，是使人民教育事业受到損害了……靠党吃飯的占絕大多数。

党里也曾出現过大貪污分子、叛党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腐化墮落分子……我看一个人不看他的招牌——党员、团员、社員、盟員，而看他的行动和成績。因为招牌是很不可靠的，我只求自己作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蘭州大学 曹党民）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名言，竟被个别党员尤其是解放后新参加党的青年党员所誤解、所沾污了。他們認為入了党，就馬上成了特別人物，應該作‘人上人’。只覺得自己是真革命，別人都配革命。他們的臉只朝着天，群众只能看他們的下巴。”

（山东大学 赵省之）

“黨員高上高上高到玉皇頭上來跳舞，
群眾底下底下底至小鬼腳下挖煤。”

（蘭大一個會議廳前的對聯，未署名）

“黨員的革命自覺性，這是組織壓抑和盲從的結果。

黨員有局限性，受組織的束縛和壓抑，黨員是打邊鼓者，受黨的支配和限制，沒有‘個性’，也沒有‘自由’，党性限制了黨員的個性，絕大多數的黨員都是偏激的，只會象機器一樣執行偏激的指示，而是盲從，沒個性，沒有頭腦。”

（蘭州大學 馬啓凱）

“黨的全部威信就在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

.....

非常遺憾，在我院（指俄語學院——編者注）人們看到的是不少的共產黨員是怎樣從自己的日常行動表現他是掛羊頭買狗肉的，黨組織是怎樣的在措施上破壞黨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神聖原則。舉例說明：

1. 由黨領導制定的人民憲法，規定公民的神聖權利與義務，在我院究竟實現了那些，鬼知道。言論自由變成連批評一個惡劣的黨員的正確的言論的自由都沒有，言者有罪，聞者報復。自由選舉，則是實行包辦，強奸民意。

2.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首先就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的絕對平等，但我院在人為的製造新的階級，共產黨員是新的貴族，可以無法無天，從道德人蔑視別人‘不進步’（因為沒資格入黨），橫行霸道，打擊報復別人，損害群眾利益，侮辱人們的人格，以共產黨員的‘牌子’到處招搖撞騙，男的以此找老婆，女的以此找丈夫，更有甚至象教師們揭發的連一點人性都沒有的朱久一之類的人民公敵，還逍遙法外。

共產黨員享樂在先，吃苦在後，一切有利益的名譽的事由他們包

办。他們既享利益，还享名誉。还要人們称他們偉大呀，光荣呀，而群众被他們客观上剥夺了正当权利，利益；申冤，还被污蔑为个人利益，个人主义。

他們集体利益就是損害集体利益，申請补助金，大吃大喝，十足的敗类。

3. 他們在發展黨員中，物以类聚，好人入不了党，吹牛拍馬屁的無耻之徒被視為亲信，的确这类人是为了維護他們卑鄙的特权所需要的，历史上所謂狗腿子之类正是这样的人。

4. 共产党员所以發展到破坏党的威信到如此猖狂的地步是由于院宗派主义的保护与發展，他們損污了这些还可以教养的进步的黨員的灵魂，对不起为人类平等而牺牲流血的先烈。一切有良心、有正义、酷爱真理和能辨明是非的人，能为此不痛心么？能不奋起向三大主义中最大一害宗派主义进攻么？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真的共产党员，难道还不願放棄在剥夺別人合法权利的基础上的渺小的可耻的特权么，难道这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党所自夸的偉大道德原則相容么？……”

（俄語學院 徐英）

“黨員有职有权，敢作敢为，甚至有些黨員無职無权，有些人有权無职，群众無职無权，因此群众抱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态度。”

（蘭州大學 段子美）

“在解放前共产党打游击的时候，黨員是唯恐怕特殊，唯恐怕脱离群众，現在則是唯恐怕不特殊，唯恐怕不脱离群众。”

（蘭州大學 方文信）

“我們領導有这样一条工作經驗：什么事情都喜欢来个：党内——团内——群众这一个‘三步曲’……

这样給群众帶來这样一个錯覺：黨員有特权，凡事总是先由他們

知道。同时这样的做法往往有神秘的色彩，容易使群众觉得我們都有宗派主义的作风。”

(俄語学院 李步楼)

“在我們学校中‘人’的确被分成了好几等，党员永远是站上风，他可以随便給你帶上几頂帽子——‘思想問題’，‘政治不开展’，甚至会說你‘和党团閤对立啦’。說真的，誰不怕背这些黑鍋呢？此意見只好化作‘沉默’，矛盾也一天天更多。

某些党员經常往党团办公室跑跑，拉拉关系，便担任起工作。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建議把某人調班，把某人当作斗争对象。有首长报告和游园等活动他們自然更有优先权了。甚至有的班連到苏联教員家里去玩也有政治条件，他們說‘这得由校長办公室批准誰去誰不去’。

肃反运动以后領導上給同學們作了报告，并向一些同志道了歉，事情总算不了了之，但竟有些党员同志說：‘老实說，沒有点問題还不斗争他呢！’我不明白，說这句话的同志目的在于掩飾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否認这个道歉呢？發展工作也是有缺点的，有这样一些老好人，他們功課并不好，教員叫起来他們經常不会，而工作呢，他們只会随声附合，并不敢坚持真理（因為他們也怕背黑鍋），可是他們入党了。据說他們成績虽然差，那是因为腦子不好，实际上是很用功的，不相信，你瞧，他們成天在念書。我認这值得研究，尽管他整天抱着書本，誰能保証他鑽进去了呢？如果为了党的事业，那他为什么不改进学习方法使成績提高呢？如果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是为入党而入党的話，那他为什么要随声应唱呢？

有一次一个同学給一个党员提意見（包括对班上工作的意見），这位党员說：‘这提得很好，我感到象这样的意見很少。’可是，事实呢，工作並沒有改进，宗派主义仍然原封不动，受歧視的第三等人仍受歧視。最奇怪的一个党员甚至这样說：‘哼！这要在肃反中非好好整他一頓不可。’原来她是把肃反当做整人的工具的。

有人說，專修科善于培养‘人上人’，我認为这并非捏造，例如，夏

之桂，李恒等同志就是他們成了‘人上人’，其實他們的德才並不見得那麼高明，並不能為‘人上人’。

，‘人上人’出現，拍馬屁的人也隨之大增，但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如表面上那樣和諧。

我憎恨同志們的歧視，因為‘同志’本身是意味着平等，我懇切地希望通過這次運動，這種歧視遠遠地消滅，讓我們直起腰來，大家團結得更好，共同進步。”

（俄語學院 劉堯華）

“黨員黨內處分就是行政上升級。

我們的憲法只用於群眾，黨員可以例外。

黨委領導整風有錯誤不管，我們有錯誤了就要整。

現在文壇還是被那些老爺壟斷，真氣人。

我們的校長和其他校長甚至高教部幹部，有缺點彼此彼此，所以不會互相批評。

院刊領導人、工作人員清一色都是黨員，人家北大就是學生會搞的，說明俄院不民主。”

（俄語學院 林文遼）

“同學們！不能作新時代的洗耳翁，把耳朵洗洗，听听，把眼睛睜開看看，現在的黨員是否有這樣的‘八項標準’：不說不笑；不吵不鬧；不喊不叫；不跑不跳；老老實實；聽說聽教；規規矩矩；吃飯睡覺。呵哈！情況如此，現在黨員，積極分子正在睡大覺。”

（四川農學院 徐孔鈞）

夏定友發言中送出三頂帽子，“第一頂是清朝一品官戴的紅頂帽，送給省委書記、部長戴；第二頂武弁帽（據本人向四川日報記者解釋：武弁帽是戲台上跑龍套的人戴的。一般黨員對上是唯唯諾諾，對下威風凜凜就像戲台上跑龍套的人），這個帽子每個黨員都可以戴，

第三頂主觀主義的帽子送給校黨委趙書記戴，戴上滿適合”。夏定友對老黨員很有意見。在他看來，農學院搞得不好，就是因為老黨員多了，什麼事都是老干部犯錯誤。他認為院領導對老黨員的照顧方式不對，“給老黨員住好房子，擺在正位子上，就好像一朝皇帝一朝臣”。

（四川農學院 夏定友的材料）

“學校中存在着矛盾，這些矛盾就是黨與非黨、領導與被領導、老師與學生、老年教師與青年教師之間的隔膜，這些都是人為的，所以拆牆和填溝的工作，主要應由黨員來作，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黨員多處在主要的和決定性的位置上，要使與群眾沒有距離，拆牆填溝，首先要從黨員作起，因為黨員就是牆和溝的主要製造者。如果若不承認這一點，那就否認了存在決定意識的論點，所以我們要根据事實的存在來決定，而不是空泛的理論。”

（東北林學院 王業蓬）

“黨員領導干部的工資級別一般就是偏高的……對於某些闊地位，闊待遇的干部院領導一味遷就姑息，於是他們就青云直上，率一鉞而動全局，更是雞犬升天，於是就形成了一個龐大重迭的官僚機構……群眾呼之曰：暴發戶。這些眾多長官們就在此臃腫的機構的大本營里官官相護，營私舞弊，作出種種不端的事來……他們的共產黨員的品質也是在逐漸褪色，他們變相貪污，貪圖小利，國家補助金簡直就是處、科長級干部趨之若鶩的香餌。總之，他們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尤而尤了！”

（北京俄語學院 吳青陽）

“對共產黨我擁護，對某些黨員我憎恨、鄙視，黨員自以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有斯大林主義的話，那便是所謂特殊材料論，我不把黨員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中山大學 楊支毅）

“黨員是兩副面孔，平日是一副封建時代的寡婦臉孔，態度嚴肅，冷若冰霜，有時也笑笑，但我這個搞戲劇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面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有人說，某人入黨前很活潑，入黨后就毫無生氣；運動時是一副屠夫臉孔，凶惡異常，知識分子經過幾次運動，確實可怕。”

“黨員的‘辯証法’學得很好，一反一復，總有一番大道理，講得別人無話可說，結果大家表面上信服，心裡不服。過去事實使人害怕，放長綫釣大魚，誘敵深入，記帳、報復，‘三部曲’。”

“兩種法律：黨員犯了錯誤甚至在運動中把人搞死，也只是檢討了事，多次檢討的黨員依然坐‘直升飛機’一路升上去，群眾犯了錯誤就不得了；整風是整自己，所以‘和風細雨’，整別人就‘狂風暴風雨’了，因此黨員是不怕犯錯誤的，反正檢討罷了，品質惡劣的黨員，可能會準備檢討把別人整死再說。”

（中山大學 董每戡）

“現在是官官相護，一個黨員儘管是很壞的，一樣可以當官，拿的錢比日夜辛苦的人多得多，且有‘生殺’之權。”

（中山大學 陳乙華）

“新黨員入黨條件是：1.把肅反中被鬥的同學當做自己進步的墊腳石，是肅反中的‘積極分子’；2.家庭成份好；3.能說會道，能夠向上級彙報的人。”

（中南礦冶學院 周宰星）

“我建議來個自覺運動，那些奴才們不配做黨員團員者應自覺地退出黨、退出團，那些不適于搞高等教育的應自覺地退出高等學校，例如顧付院長（黨員——原編者）注就不适于搞高等教育工作，只能當勞改隊長，若有良心的話，應自覺的退出，陳信（團委書記——原編者注）更不适合于搞高等教育工作，只能去看勞改犯。”

（中南礦冶學院 黃際春）

15. 挑撥黨羣關係

“中國有句民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很可玩味。僅靠左手拿着馬列主義書本，右手拿着蘇聯武器，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黨員要和我們推心置腹，最近報刊常帶這句話，真是太好了。但是只要有黨，黨群就不能在一切問題上推心置腹。”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教授 李景漢）

“主要的中心問題是宗派主義，牆是什麼？黨員多。”

“教育事業被黨員看成黨的事業，與群眾無關。我仍用主人翁態度對各方面提出‘意見’，這是主人翁態度與否定主人翁態度的鬥爭，即宗派主義。”

“今天大家公認缺點比成績嚴重得多，這缺點是誰的責任，是80%人的責任（指人大有80%的黨、團員——編者注）。

技術學教研室中黨外人士多，很多被打入冷宮，有的被打擊，很畏縮。那些人是我們應解決的問題。要相信20%中的每一個人。（指人大大的群眾占20%——編者注）”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教授 陳文儒）

“黨員有親娘，我們群眾是沒有親娘的人，碰到個別的好組織，好黨員，也最多是好后娘。黨對黨員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過去整群眾是狂風暴雨，而現在整黨員却是和風細雨，不開大會，只開小會，很怕黨員受了委屈。”

（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史教研室教授 王衍臻）

“今天黨群關係比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

搞糟了，所以物資供应緊張，“肅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錯誤，领导人應該自請处分。猪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干部。說良心話，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錯誤。猪肉那里去了呢？被干部們吃光了。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壺漿’‘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民就要反对他們。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1945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們。現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見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險的。”

“群众不敢徹底鳴放反映什么問題呢？怕鳴放得不恰当，受到打击报复。党組織在整风動員时，一再交待不会报复。但現在在会上談的，总还不如在会下談的多，不敢徹底鳴放，至少反映兩個問題：（1）这反映八年‘民主’政治的結果，在八年‘社会主义民主’中，群众对于‘禍从口出’这句话有深刻的体会，另一方面，对宪法上的言論自由都忘了。（2）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說的話，不敢信任。希望党对这一点，特別重視，因为‘民無信不立’。我觉得，如果群众不信任我們，群众总会起来反对我們的，这是符合社会發展規律的。

群众为何不敢信任共产党呢？毛主席說群众99%信任我們，1%不信任我們。但信任程度如何呢？群众不敢信任，不是群众顧慮多，而是共产党八年教育的結果。剛解放时，我和做部長的旧同学来往，現在再不往来了。八年同共产党接触中，深深体会共产党善变。因为：（1）共产党遇事能灵活运用，犯錯誤能迅速改，这是好的。（2）共产党顧私利害，不守信用，去年为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工資，說工資改革是提高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今年为了多积几个錢，而提高物价。工資提高指数和物价提高指数比較一下如何？我不得而知，据我体会，加薪后反面亏空，我觉得这是实际工資降低，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可以分

析。

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校部派公務員送飯送菜打水，配給彈簧床，今年實行精簡節約，取消公務員，三位校長為首帶頭，但胡老六十多歲，用公務員大家不會有意見，這樣大家的公務員都取消，以前送飯送菜，現在取消公務員，連掃地打水的都沒有人了，彈簧床又要收費，我堅決反對。

黨組織對人有用時，把殺過群眾，殺過黨內同志的人都當做寶貝，不用時，把流過汗流過血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少數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母親寫信稱同志，被退回。有一個同志說，我感覺共產黨同我是好朋友，今天他們是白人，我是黑人。有的低級黨組織領導人，把自己說的話當做真理，有指鹿為馬，弄得是非沒有客觀標準，使群眾牢騷滿腹，有些黨員也感到如此。有的黨組織辦事不近人情，有位團員母親有政治問題，從監獄接出來病故，該團員大哭一場，到肅反時整他是立場問題，我覺得大義滅親是對的，但母親死了都不哭，沒有人性，這樣不近人情的人，在國家危急時能赴湯蹈火，是不可能的，不會有志願軍黃繼光那種勇敢。

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人民大學是黨員第一，團員第二，民主黨派第三，群眾最差，打掃廁所的都是舊人員，沒有青年團員，這是歧視群眾，把群眾劃在圈外，現在群眾把黨劃在圈外……”

“去年評級時黨員連升四級，在舊社會也只能連升三級，過去是軍閥、官僚、政客統治，現在軍閥沒有了，官僚主義就是官僚、政客對民盟來說還合適。這與三十年前一樣。選舉市代表時有的群眾說：選什麼？就是分贓罷了！現在黨員是兩多兩少，多了特權思想和优越感……少了兩個東西即法律感和道德感。

以上這兩多兩少結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嗎？毛主席拿出整風

来，但老百姓的心只是一个毛主席，老百姓也想天下太平，老百姓与党的距离是远的。这次整风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险的……”

“一个朝代建立几百年，总是有原因的，清代少数民族就统治了中国300年。共产党仅统治了八年，出了许多漏洞，现在人民怨声载道。解放时，群众对党亲热，现在有轻视，今天共产党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候了，不能马马虎虎。到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员，官僚、宗派，无恶不作，再下去十天，看看各学校揭发出来的情况。”

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列主义是立国基础，但马列主义已放之脑后，今天是找权和利，今天群众认为党员是特殊阶级。

先烈的血是为人民流的，不能用先烈的血来为自己找权利，在政治上经济上要手段，学古希腊的诡辩术，把它说成是唯物辩证法。如“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共产党是“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你们是党员划小圈子，人民群众划大圈子，把党员划在外面，党员垒墙群众在墙外挖沟，只有党员先拆墙，群众才肯填沟。党员恶化了，人心恶化了，造成了很坏的风气，“亡国才知”，国到亡时，自己才知道。我强调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可救药，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否则很危险。

对党员的两个要求：

1. 守法律，2. 讲道德。中国历史上，先立法将自己捆上，做榜样给别人看，人民才守法律。”

“市委盖白磁砖大楼，老百姓买豆腐要排很长队，买了走一段路，豆腐就碎了。豆腐质量低了，汽车是数量又多、质量又好。两个老百姓坐电车，走到北京饭店门口时，一人说‘那么多汽车，要是豆腐就好了！’另一人回答道：‘豆腐？豆腐都换了汽车了！’军閥时代还有豆腐！群众在八年中也毕业了，就是不敢说，怕打击。”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党员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也有关起来的门。不少人感到党员和群众相处时是客客气气，冷冷冰冰。见面时多谈身体如何，天气好

坏，很难談的深和广。为什么同志們有这样的感觉呢？主要是有些黨員甚至領導干部，对待群众（特别是对待老教师）不够了解，認為群众落后，不好改造，老了、没有用了。”

“关于分校問題，非党教师反映应讓他們知道，但黨員回答：‘这是保密的問題，只准黨員知道，因黨員历史被审查过。’黨員找非党人員談話多半是因为：（1）有問題了；（2）惹禍了；（3）审查历史。有时群众找上門来了，黨員还強調工作忙，就躲开了。”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講師 侯大乾）

“目前党群关系不好，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过去几个非党同志談得很徹底，与黨員一起就不徹底，这究竟是什么？还可以研究。我認為是过去把人分为几等：黨員，团员，群众。人为制造牆和溝。”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展广偉）

“黨員都是整別人的，而非党群众都是被整的，在馬研班大大小小的思想檢查，典型多是非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

“解放后几个运动基本上都是黨員整群众，我亲見有的人从三反到現在，总是整人，而他自己的一些錯誤，始終得不到群众有力的批評。只要是黨員便絕對可靠，群众对黨員提意見便是打击积极分子。分明領導錯了，錯了也是对的。領導者們無原則地在群众面前互相包庇，官官相护，党党相护，以为不向群众認錯便是維護領導威信，我校三反、肃反有很大偏差，冤屈許多人，校長作起總結来总是‘成績巨大，运动健康，毫無缺点。’誰要是含冤自杀，还背上个叛党叛国經不起考驗的罪名。許多知識分子解放时衷心拥护共产党，現在对党滿

怀怨恨,为什么?宗派主义过火斗争把一些人逼得太苦了!我参加工作八、九年,几乎没见过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在群众面前检讨过,一味叫群众检讨。真的人一入党便成了圣人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我们党目前管得太多,限制也多,我们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是要批判,而且还要造成强大的群众舆论压力,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却不象我们这样。我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大多数人统治,而限制反比资本主义国家多,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不相信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講師 盧冕持)

“现在群众与党矛盾很大,有人说过,现在穿黑衣服(呢子衣服)的有钱,穿蓝衣服(干部)有权,穿黄衣服的(部队)天天过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语文教员 張 偉)

“有人随声附和,结果不是领导走群众路线,而是群众走领导路线。旧社会说吹牛拍马是可耻的,而新社会是靠攏组织,有人说,鸡蛋是树上结的,我说,还有人說看到鸡蛋有把呢!”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圖書館員 金大鏞)

“咱们这是党员与党员一塊兒,群众与群众才通风,中間有一堵牆,这堵牆可不小,長八百里,高万丈。”

(中国人民大学圖書館館員 徐鐘秀)

“一些上級领导干部,就是一眼开,一眼闭,开的是群众的缺点,闭的是党员的缺点。”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王鴻章)

“把我国多阶层人民分为四个等级，好似封建的塔形等级制度。第一等是党员，有职有权；第二等是团员半职半权；第三等是民主党派有职无权；第四等是群众无职无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可治）

“党对党外，上级对下级都保密，形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造成神秘主义，使人们糊里糊涂过日子。使党员群众养成一种天下太平情绪，经不住风吹草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唐仲明）

“党员与非党群众同工不同酬。许多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能力差不多时，薪水地位往往比非党干部高。提拔时也总先提党员。”报载北京农业大学党员负责干部自动减薪，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群众逼上来的！为什么只登好例子，不登坏的？为什么不合理的提拔就不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朱紹武的材料）

“青年报登的‘五四’青年游园晚会，有人说放屁！（拍桌）是党员游园晚会。相信党员而不相信群众，连团员也不大相信。”

“党群关系在1953年以前好些。土改以前人民是如何的全心全意拥护党的领导，党群关系是比较好的。1953年以后就差多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把党员描绘成满脑袋的“硬帮帮的教条虫，灵魂深处是漆黑一团”。说群众对党员是“敬而远之”，党群之间是“咫尺天涯”，说党员是“把反说成正，戴色镜看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平希的材料）

“跑腿买电影票挨骂的，日夜辛勤抄黑板报的，带头参加义务劳

动的究竟有几个是党员。单纯业务观点不愿做社会工作的，游园联欢迎送外宾的，作各种番号施令头目的，以伟大的‘改造者’自居的，言必称马列、善扣大帽子的，究竟又有多少不是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鲍子津）

“党团支部都是对上负责（这是对的），唯命是从机械的教条的执行上级指示，不考虑群众疾苦，班里的负责干部……都必须是党员……无形中竖立起党员的特权，党支书，支委……其特点：（1）喜欢歌功颂德，凡是能大胆指出缺点的人，都要受到歧视……因之党群之间都带上一个虚假的面罩，见笑脸不见真诚，见人不见心……有的人看透了这条门路，于是随声附和，阿谀奉迎，结果当上了‘亲信’从而封功的受录，党团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各人内心都有一本帐……，（2）喜欢落后保守，反对积极因素，有的党员和支书，还抱着土改时贫农观点，一些新事物新现象都觉得扎眼刺耳，本班有的同学甚至党员提出某些人的观点主张和党支部支书及其‘亲信’的‘观点’不一致时，不但不加考虑，反而歧视，说这些人‘有问题’从精神上压力，有的党员叙述他所以在党内是‘光荣的’孤立，主要由于他和党支部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有些党员脑子里本来存有大量的落后保守因素，但支部从未加以分析批判，反认为‘忠诚’‘可靠’，从而更加使这些人是非不明，感觉迟顿，鼠目寸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治压力大，政治空气薄……不谈吃就谈穿……但一涉及到政治问题每人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失言难追！”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柏玉肖）

“意气骄满路，鞍马照光芒，把反说成正，戴色镜看人。枯藤老树浑鸦，小桥流水人家，不合理哟！党群间咫尺天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杨子伟）

“对群众的看法严重的表现出宗派主义情绪。我不否认党员应时

刻記住自己是黨員，嚴以律己，但是我們的黨員却是把自己看成高于群眾之上，瞧不起群眾，認為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認為比群眾強，平常的事情分成這是群眾之事，這是黨員之事，這就是宗派主義情緒。在一切事情上對黨員和群眾提出不同要求，事實上就是把一切群眾看成不如自己（黨員）看不起群眾，降低群眾、把自己抬高一等，把自己看成是一小撮人”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學生 陳家驥）

“黨員與團員象白人与黑人关系一样。”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黨存在危機，其表現是比過去大大脫離了群眾，解放前黨聯繫群眾是一種自發的要求，現在取得政權了就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強迫命令，獨斷獨行，擺官僚架子，以老爺自居，割斷了與群眾血肉不可分的聯繫，已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章廣延）

“宗派主義的黨群關係是不行的，國家這樣會亡的，歷史上的東漢、武則天便是如此。歷史上證明不廣開言路，不相信群眾就得垮台，客觀的精神是好的，劉瑾為什麼亡了？……”

“我懷疑共產黨是否把自由和幸福作為招牌，取得群眾的信任，在得到政權後把群眾一脚踢開。”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于雲鵬）

“黨群之間有溝有牆，主要責任是黨員，因為黨員有优越感。我們支部在群眾中是否有威信呢？真正有威信的人也是最平凡的人，群眾心里擁護他。我們支部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群眾見了害怕象見了希特勒一樣，有很多意見却在心里罵，請問這樣的支部能領導群眾嗎？因此，我們班里的群眾對組織是敬而遠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陈家驥)

“(1) 党对非党人士不够信任，解放前党地下組織对他們是信任的，而解放后則是監視群众，象監視反革命分子一样，一个宿舍二个群众就要調开。

(2) 党对群众不相信，如每个宿舍里都有党员，这是对群众的監視。

(3) 党员对群众冷冰冰的，这样算党性强，而能和群众接近的党员就是落后。”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郝 赫)

“旧社会里人的地位高低，是看有錢沒有錢；現在呢？要看是不是党员。党员地位就高，到处受欢迎，这对非党人士說来，确实是个很大的压力。团员就不如党员的社会地位高，民主人就更甯說了。不入党，甚至連对象都找不到。”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李之杰)

“社会主义成員在政治待遇上分党、团、群三派，党员各方面比团员高一級，团员比群众高一級。

党群关系有一条洪溝，有人入党后觉得自己了不起，压在群众头上。可以作为打击別人抬高自己的一种新形式，以达到使上級信任自己，提升自己。可以暢所欲为的騎在人民头上作土皇帝。党员的統治法宝是誰对他不滿有意見就是对党組織不滿，因此政治上有問題。群众象小媳妇样，党外人士思想受到压制造成精神上的奴役，群众有冤無处申訴。共产党只代表一党的阶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光济)

“党群間牆有三种，一种是鋼骨水泥之牆，一种是磚头瓦塊之牆，这两种牆要拆已經很困难了，但另外还有一种糞土之牆，其臭不可

開，拆也沒有人願意拆 要拆的話必須拿自來水龍頭沖洗才行。”

“我熱愛共產黨，尊重、相信黨，我與黨間有牆，按理講對黨的心情應該很接近，如果有牆應該是一邊唯心，不為人民服務，一邊不唯心，為人民服務，但通過這幾年學習，耳聞目睹，如果這牆是唯物，唯心，沒有拆的可能，只能爬過去，就知識分子講願意爬，黨在接，可是事實上沒有爬過去，誰也沒有爬過去，感到這牆不單是牆，而是牆上有人，占牆為王，是牆頭主義，危害性大，比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砌牆砌得快，高而大，與后兩者有關係，后兩者是前者基礎，沒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沒有牆頭主義，因此整黨過程中真正能把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去掉，牆頭主義就沒有了，牆就抵倒了。”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韓光遠）

“黨派存在束縛了人民性格的自由發展；口是心非的偽君子特別多，把人民分成黨、團、群等小集團，並開展着集團之間的鬥爭，使人民天生的友誼交往的性格被這人為的障礙所抑制與破壞。”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薛新卓）

“黨對非黨群眾不信任，芝麻大的事也派黨員領導……黨員是偵察兵，是監視群眾的耳目。非黨群眾的積極性很難發揮，別人只好看黨員臉色行事。”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汪傳散）

“黨內官僚主義習氣的人和唯唯諾諾的人太多。黨內高級幹部幾年來脫離群眾是嚴重的，只听匯報，只根據匯報來決定政策。黨內一般幹部水平低，又不大動腦筋，上面布置什么就搞什么。真正深入群眾的幹部是少的，甚至是個別的。無論黨內黨外大家都是為自己多，相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唯唯諾諾的人就是接受黨的領導努力学习，不輕易發表意見的同志”，把他們看作是“唯唯諾諾”、“糊塗”、“沒有思想”、“起不了作用”的人。他主張對這些人進行“改造”，

要把他們“變成不要完全相信黨的政策，不要完全相信馬列主義，要能獨立思考、憑自己的想法得出結論”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姚永年的材料）

“黨之所以有危機，是因為在不少原則性的重大措施中脫離群眾，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直接危及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黨從聯繫群眾到脫離群眾，由先進到特殊。”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盧 鈞）

“到處是任命和變相的任命，黨員除支書外，擔任正班長、付班長、團支書，只剩下一個班主席不是黨員，因為黨員已不夠分配了，為什麼不信任群眾呢？”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應該明確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不是共產黨一個黨的，要是這樣的問題搞不清楚，以黨代替一切，早晚会垮，那時人民便不會給共產黨飯吃了。

共產黨常常從‘人民如何如何，來貫徹黨的要求，可是在某個黨員、某個黨組織不能代表人民利益而錯誤地執行政策時，他們就不配以人民代表者的資格出來吓人！’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說等級，道等級，黨員製造了新階梯，黨員是第一級，阿諛諂媚的團員是第二級，一般團員是第三級，有家庭歷史問題的是第四等級，這種等級制度是未公開宣布，各種不同待遇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沒有偉大的性格就不會有偉大的成功，我們都在共產黨的籠子裡長大的。

所以個個都平庸無奇，碌碌無能。

严酷的清規戒律，窒息了多少天才的生命，僵硬的規格教条把人塑成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不是出模于希特勒，也不是列宁，而是怕风怕雨謹小慎微。

毫無主觀的应声虫，我們应当过驕傲自豪的生活，決不要迷信和盲从，共产党的一套东西，有很多是瘟疫和癰病。”

（中国人民大学 妖詩）（大字报）

“我們都曾热烈地、卖力地参加了劳动节的游行，但不平的参加。五四游园都是少数党员和‘积极分子’（注意着重号），他們接受‘秘密通知’去‘代表北京青年’。难道这些人掌鼓得响嗎？实在：这應該象某个同学所說的‘靠近領袖身边站沒有你的份’。

也許还有人不知道，传达毛主席报告复杂的程序呢，首先是‘主要’干部听录音，然后是党外传达，最后，相当長的时期后，才是一般同学，先后事小，打折扣（还有什么？）事大，自己家的事，还不讓自己人知道，这就不信任我們。”

（中国人民大学 大华）（大字报）

“那次‘五四’游园晚会，为什么光讓党员去？

誰都記得，那时多数同学极为不滿，至今仍憤憤不平，据說，这事是党委会布置的。請問党委会有什么理由不讓我們去？！党员有什么特权！？

有理不怕講，無理，不敢講。

为什么当时不講清，事后不解决？至今不吭声。

推倒这堵牆！”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党员的特权

我們認為学校党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气息，形成了党员的

优越感，处处与众不同。

例一：去年欢迎苏加諾时，据说上级布置，党员有优先权，若人数不足的话，另作打算，而群众呢！又怒×夫不足了（这是事实）。

請問，为什么对群众这样不信任？为什么要筑上这道厚牆？”

（中国人民大学数人 大字报）

“我班党员大多老大多居，高人一等，具有無限的优越感，和团员群众接触动辄馬列主义，以教育者自居，党群交談中沒有真正的思想交流。党员同团员群众之間隔着一道韌性的水晶牆，彼此隔阂，新党员一入党便立地成佛，今非昔比，盲目断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的联系，認為超过了团员十万八千里。”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班内工作方式一元化，党内包办一切，党内商量好了取得了一致意見再下达，团支部学生会跟着跑，群众沒有發揮积极主动性的余地，更沒有提意見的地方和机会。凡事保密，好事党员占光，五四看伏老和毛主席，团员也只能从报上看到消息，参加联欢的同志，守口如瓶。

在党员气焰高漲的情况下，团员只能自愧弗如和感到不被信任而退避三舍了。”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党员与群众不平等，比如一部分党员碌碌庸才，工作吊兒郎当，却插着党员的牌子，身居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职，逐年升級，升講師，出国留学和当專家。有些党员犯了錯誤，不敢拿到群众中批評，不了了之。而群众只有錯誤，則大会小会批評。系里分配房間时，向阳的房子先是主任，后是党员，一般群众則打入‘冷宮’。

严重的关门主义，首先对群众的积极性認識不够，夸大群众的缺点，因而党总支几年来沒有發展几个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等級制度”

“第一等級	黨員	有職有權	特殊待遇	信如迷信
第二等級	團員	半職半權	有些待遇	可信
第三等級	統戰物	半職無權	有些待遇	不信
第四等級	群眾	無職無權	無有待遇	懷疑”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一等黨員、二等團員、三等群眾。

最可笑的參加‘五一’‘十一’游行的同志也是分等，也要作为机密，也要总支批准，我們要推倒这堵牆。”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我觉得一个严重的問題是党的整个領導方式沒有跟着群眾的政治覺悟提高而改变。党委的領導方法还是象剛解放以后的那样，有时甚至于沿用着在地下作斗争时的方式，动不动就是‘階級’、‘道路’，摆陣对壘，我是社会主义道路，你是資产階級道路。教学討論就是一例。非党人員都一心一意地跟着党走，但是党委黨員却如此对待我們，要問一問牆主要是从哪一边搭的？这不只是一个系的問題，而是全校全國的問題。”

(清华大学 孟昭英)

“有些黨員談起公事来很熟悉，离开了公事就好像不認人，把我們看成病菌。有的黨員干部态度粗暴活像个官僚架子。”

(北京矿业学院 袁 通)

“今天的党群关系的矛盾，主要是党内新知識分子和党外旧知識分子間的矛盾。我国旧知識分子数量上占很大比重，但对他們的安排

却沒有給予一定的重視。在我們校內對舊知識分子劃了很多圈子，其中有先進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明星’幹部，他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永遠是進步的，什麼代表都是他們。另外，也有些後進分子和落後分子，他們是怎樣造成的呢？其中很多人是由於他們歷史比較複雜，或者是他們愛提意見，他們經常被一些‘積極’分子作為向黨匯報的對象，在每次運動中都要搞他們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只看見他們缺點而不注意到他們的進步。我們中間有很多人在這八年中辛辛苦苦地搞了許多教學工作、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但是我們有些黨內同志都仍然說他們好表現，夸夸其談，或者說是假積極，而就法定了他的命運。這種看法不能不說是‘宿命論’，有些同志談某一些人時就常常牽涉到舊知識分子的歷史問題而凍結起來，看不到他進步的一面。某些同志在這一問題上不採取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而是變成了‘唯物歷史論’者，這就造成了黨群之間的很大隔閡，我們今天應該從團結500萬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給予進步的舊知識分子以更大的鼓舞而不是採取永久凍結的看法。”

（天津大學 朱秉澤）

“我校肯定有三個主義，通過這次整風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為我們的領導機關——國家的政法部門和高教部有嚴重的問題，一個是嚴重的宗派主義，一個是嚴重的教條主義，必然影響我們的工作，如果上級不嚴格去掉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難的。例如政法部門使用知識分子方面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大學畢業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高級知識分子更受歧視，積極性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地方的政法部門較負責的非黨同志很少。黨員總是少數的，應該依靠大家，政法部門有什麼道理把門關得那麼緊呢？部隊中和外交部門中還有較負責的非黨人士，難道政法部門一定要這樣緊。我校五四年畢業生去天津的幾乎全沒搞政法。”

（北京政法學院 錢端升）

“黨組織把群眾分為三等——先進，中間，落後。如果這種分法被群眾知道了，這是对人格的污辱。”

（北京政法學院 陳述庆）

“群眾是崇拜黨員，群眾眼睛被屎迷住了，群眾眼睛亮个底，他們就是靠黨員資格混干事。”

（北京政法學院 席成德）

“我們學校里入黨都給几个人卡住了，都是唯唯諾諾的人入黨。如白××、黃××，特別是白。白入黨就是听話，因为肅反中肯抄抄寫寫，在涂繼武面前必恭必敬！”

（北京政法學院 王 革）

“……从已揭發的材料中知道宗派主义已深入到各个角落，但是現在还没有人揭發：在吸收黨員中的宗派主义。很明显，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今天吸收那些唯唯諾諾的人入黨，絕不会吸收那些正直的、敢于对宗派主义做斗争的人入黨。”

（北京政法學院 杜汝楫）

“黨組織对华侨照顧不够，另眼看待，甚至把华侨当作客人，不願和华侨接近。黨支部認為华侨落后到無可救药。黨支部破坏了华侨政策。”

（北京政法學院 林共鳴）

“按理說对黨員應該要求严格，对群眾可以寬些，但是恰恰相反，講課出了問題时，对非黨教師是吹毛求疵，对黨員教師則輕描淡写，各教研室都是这样。”

（北京政法學院 杜汝楫）

“不管黨外人士怎样，都不可能和黨完全一样，不能一条心，不然

便不符合馬列主义的辯証法。”

(北京政法学院 汪天一)

“葛佩琦的發言，我看了好几遍，我認为他的發言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有些气愤，但也不算过火。就拿党群关系來說吧；不但葛先生，就是广大群众亦有这样看法，認为党群关系搞得实在太坏了。这是党员一些坏作用造成的。我先声明，我不是替葛先生辯护，我認为应该为事实辯护。”

(北京政法学院 王明欣)

“在学生中，党员学生和非党员学生有界限，这个界限竟到了这种程度，党员考試不及格时，教务長要教員尽量給及格，刘教务長說：‘我們对工农学生要寬，这是阶级感情。’我和刘聖恩都是一肚子气，翻卷子罢，这一个3分，那一个3分，結果碰到了一个党宣委的卷子，党支部宣委政治課不及格还行嗎？后来还是提上去了。請看給分數怎么还有人情！还有这种事！……这是前几年的事。專家来了以后，他主張以卷論卷，就沒有人再持这种意見了。这說明了宗派主义的严重。”杜汝楫抓住了这个捏造出来的事实一再进行一系列的煽动活动。他又說：“刘昂同志的对工农学生要寬(指考試評分)是出于阶级感情……这件事情的錯誤不在于他的出發点，而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主要是：(1)他沒有認識到高等学校中的考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2)他对教員評分的权力不够尊重；(3)他不認識到这样做对工农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好处，正如父母溺爱子女并没有真正的好处一样。从这件事來說，我認为刘昂同志对于怎样把高等学校办好，这一問題的認識是不够的。”

(北京政法学院 杜汝楫的材料)

“关于主观主义，表现在对非党同志的看法上总不全面，不客观，他們总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能和他們就事論事，不能暂时不翻成分，不翻历史，总是一下就联系到他是什么出身，什么学校来的。現在不

能就事論事，所以有些問題很難解決，很難展開互相通氣的討論，……青年黨員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中較嚴重的教條主義，不管什麼問題一下就提到原則高度；即使對方是錯誤的，也難對人家有所幫助。

“為什麼會產生以上問題？（指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我覺得有三個原因：一，對非黨同志多年來積累的知識認識不足，老同志對革命有功是事實，但他只知道自己過去的經歷，覺得知識分子沒打游擊沒經驗，對革命沒功勞，他不知道，沖鋒陷陣是一時的勇氣，積累知識則需要長期的努力，老同志如果知道了錢學森的級別會不會驚惶其級別高呢？我說不高，在科學上費腦筋不亞於打游擊！二，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況估計不足，只停留在以前的情況，忘記了幾年來的進步，甚至連以前的情況都估計不足。此問題明顯地表現在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問題上，知識分子一般是愛國的，解放前就游行示威，支持解放區的革命鬥爭，但總被懷疑他和國民黨的關係怎樣，其實國民黨員也恨國民黨，問題並不那麼嚴重。如談到資產階級思想，應該承認他們有，但是並不嚴重，中國資產階級思想也很軟弱，知識分子對它的政治觀點是半信半疑，如果說知識分子有了堅定的信念，肯定認識到走那條路，那只是在解放以後，一般老同志考慮此問題是較片面的。三，功臣自居思想，天下是老子打出來的，我愛人能力雖不強，但我給他幾級你管不了，劉昂同志看到中老胡同教授生活很好，氣憤的說：“過去也是他當教授，生活好，孩子漂亮，太太摩登，現在他們還是這樣；這正表現了宗派主義思想。知識分子憑自己的勞動，公平交易，你有什么嫉妬的。（何況現在知識分子也是為人民服務）。工人農民生活提高了，一般老同志容易搞通，為什麼對知識分子的勞動報酬就看不慣。”

（北京政法學院 杜汝楫）

“要求黨委會讓正直有學問的人入黨。而黨委會中有些同志，往往把正直的人看作是不服從領導，缺乏組織性的人。”難道我院黨領導在這方面就沒有問題嗎？希望領導深入檢查，並且希望大家大力揭發。”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

“春風一吹杏花开，非党群众哭的哀，
都是同根生的啊，为啥白眼把咱待。

× × ×

党员拿钱不费难，咱们穷死没人管。
补丁罗补丁啊，谁来怜惜咱。

× × ×

党员打人不算数，咱们的通报飞满天。
秋风扫落叶啊，谁来教育咱。
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的座位党员占。
无职又无权啊，何时把身翻。”

(北京政法學院 田本陆)

“我感到有一种干部专门在运动中打击别人，为自己搞政治资本，这种现象在我校很普遍。”

(北京政法學院 林道廉)

“为党工作就是靠党吃饭。听从党的话就是脑子生锈。不会独立思考，就是生锈。独立思考就是把反面意见提出来，敢怀疑党会不会变质，敢对斯大林、毛主席批评找毛病，敢对党支部大闹，敢贴大字报，敢作敢为……一些靠近组织的人就是不会独立思考。”

(北京航空學院一个学生)

“提起‘德’便认为党员没问题，下一年党龄高了，更没问题。党员越老越好，非党员越老越坏。在‘德’这方面，看样子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为全民所有。……过去对群众看的低，要求太高，以为他们旧思想永远改不了，而自己好像从来没有旧思想似的。为什么自己可以有进步，而群众就不能进步呢？是不是迷信自己是‘特殊材料造成’

的呢？

過去對群眾要求，比對黨員要求還高。黨員、特別是領導，怎麼說都有理，群眾說話便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用一句話演義和推論的結果，便能扣上大帽子。又‘聯繫群眾’是黨員美德，但群眾便不能聯繫群眾，聯繫多了便會引起懷疑。這也是群眾築牆自守，老死不相往來的一個大原因。說黨群之間有一道牆是不很符合事實的，事實是群眾都居住在各自為界的蜂窩中。黨員就可以來去自如。”

（北京航空學院一教授）

“我同意陝西師院王美一講師把我國現在分成四等級的看法，共產黨員第一等，共青團員第二等，民主黨派第三等，第四等是一般人。我並不是說四等人之間關係是剝削壓迫的關係，不是黨劃分的，而是客觀社會制度事實存在這四等人，我說的是因在政治上、經濟上、道義上、生活上的不同而自然不同的。”

（中南礦冶學院 楊福壽）

“歷次政治運動，群眾參加鬥爭多半是盲目跟着跑，另外一些人則是怕批判右傾和不鬥爭別人自身難保。群眾是共產黨利用的工具。共產黨搞運動，有功歸於黨，有罪歸於群眾。”

（中南礦冶學院 周世偉）

“黨員犯錯誤後批評也是秘密的，沒有在群眾中公開，而群眾則會公開批評。”

（中南礦冶學院 黃存紹）

“黨內搞什麼收集材料、布置、開積極分子會，還不是那一套，積極分子還不是服從領導，共產黨搞運動有功歸於黨，有罪歸於群眾。”

“黨每載的‘兩套法律’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黨群處在兩個階梯上，黨員犯錯誤最多跌到人民的階梯（如開除黨籍），群眾犯錯誤就要

办罪。”

(中山大学 林傳驊)

“……官僚主义的极端表现,那就是独裁专断了,譬如我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却原来是党委‘钦定’的……無怪乎群众对此极为激愤,认为党委把群众看作了‘阿斗’,强奸民意……”

(北京俄语学院 吳青阳)

“现在主要是对待专政者,以后是否受到打击报复呢?因为档案材料全部掌握在专政者手里,又是不公开的。

群众的顾虑是多种多样的。条文式的报告,不可能打消顾虑。要想大放大鸣,只有看党委领导放的决心。”

(东北林学院 冰里花〔化名〕)

“所谓要求‘体会领导意图’,就是要求独断独行,窒息民主。体会领导意图的这种事实和现象,在中国每个角落里都是普遍存在的。在领导上说,能体会领导意图,就是依靠组织依靠党,大有‘朕即国家’的派头。在个人来说,能够被认为是能够体会领导意图者,必然是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这种人往往是在党员面前一套,是鞠躬如也;对一般人又是作威作福,开口政治,闭口思想,对别人帽子一大堆,罪名也不小,这是新社会上的旧作风,名亡实存而已,事实说明这种作风有广阔市场,有的党员确也欣赏自得。这就是党群关系。”

(东北林学院 王业蓬)

“水是世界上最
软弱得没有骨头的东西,
你把它倒在茶杯里,
它就象个茶杯,
你把它倒在水缸里,
它就象个水缸……”

可是，如果待它太冷酷了，

它也會翻臉無情，

脹破茶杯

撐破水缸！

‘水’揭發了人們的痛苦，引起了療救的注意，如果說作者以水比喻人民的話，那麼的確有一部分群眾（那怕很少），表現得很軟弱，他們在‘三害’的重壓下忍氣吞聲的討（空一字不明——原編者注）生活，唯命是從，逆來順受，毫無主見，作者正是喚起這些人的覺醒，使他們去和‘三害’鬥爭。

其次，‘水’給那些‘三害’的老爺們敲起警鐘，要他們悬崖勒馬，不然就會官逼民反，‘水’就會脹破茶杯，撐破‘水缸’……人民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會揭竿而起，古代是這樣，而今後也不例外。”

（俄語學院 白鶴飛〔化名〕）

“現在看起來黨團員好象是一家人，院黨委是家長，黨員是兒子，團員是女兒，而我們群眾是兒媳婦。把黨群關係分為四等，認為自己在班上好象是舊社會受欺壓的兒媳婦，低聲下氣，常用熱×去碰黨團員的冷屁股也不討好。”

（俄語學院 俞祖菽）

“為什麼黨群關係搞不好？”

總起來有兩個原因：黨員不說真話，平常沒有能力幫助別人。

我們班上（三班）的黨群關係很不好的，黨員對群眾的估計非常低，有看不起群眾的現象。平時喜歡老好人，對好提意見的人不喜歡並對他們有固定的看法。同樣，四班的黨群關係是‘近而不親’，也就是一團和氣。黨員沒有知心朋友，因為黨員不能從思想上和大家見面。經常不和群眾說真心話，總是打官腔，好教訓別人，不談自己真實情況。翁作韜做得較好，因為他能把自己的實話談出來。須知，能說實話的人，才能換來別人的實話。

有種現象，黨員與黨員的接觸神秘化。任何一個接觸都是怕群眾，一切行動都是秘密的，給群眾的印象是：不信任群眾，好像又是在說誰的壞話。

因此，黨員不說真心話是黨群關係不好的重要原因。其次，黨員沒有能盡到教育、幫助群眾的責任。

黨員放棄了對別人的關心，更重要的是黨員沒有資格、沒有本錢來教育別人，因為要教育別人首先要做別人的知心朋友，要在群眾中起一定的模範作用。恰恰黨員在這方面做得很差。現在我們可以理解匈牙利事件了，無怪人民起來反對政府。假如我國發生這樣事件，參加的群眾也不會少。解放後黨和群眾的關係不好了。”

（俄語學院 宋玉波）

“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就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如這次學習，停課反右鬥爭由黨委通知同學這是不對，應該由院長辦公室出面，這是不是黨政不分？如果不通過行政，對我沒有約束力的，可以不執行，這次停課院長辦公室沒有發通知，後來教務處出了個緊急通知，這還可以代替，不然的話黨委決定停課反右派對黨外同志說來沒有約束力的，我听政府行政的話，可以不聽黨的話，因為我不是黨員。

肅反時五人小組直接處理問題，是不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俄語學院 林文辽）

“黨委有意製造黨群隔閡，如學習‘再論’時黨員（空一字）學，第二次學習時造成黨員先教訓別人，使人感到黨員都是諸葛亮，別人都是‘阿斗’，又參加游園，歡迎外賓等活動經常是某些‘政治好’的人去。”

（俄語學院 鄧連娣、謝厚淳、關捷、賈拍青）

“‘群氓’（指人民群眾——原編者注）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有一個‘先知者’出現，他們就會跟着這位‘先知者’走，若有另一個‘先知者’

出世‘群氓’就会放棄前者，而跟上后者。”

（蘭州大学 屈健英）

“群众都怕他們（指黨員 一原編者注），因為他們操有生杀大权，所以当他們一有吩咐时，群众自然唯唯遵命。”

（同济大学 張稚微）

“部分黨員同志也經常以党的化身出現，处处表現出我就是党，党就是我。你們（群众）不同意和不支持我的意見，就是反对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反革命还了得，不槍斃也要坐監牢。同时这些黨員同志，时时刻刻以領導者自居、教育者自居，平日不交朋友，不談知心話，不商量問題，遇見意見分歧时，就举着一大堆帽子来談思想問題，批判你这是敌对思想，那是个人主义。这样的談話，怎么能使人心服口服呢？怎么能不造成党群之間的隔阂呢？”

“党的領導同志，一向不深入基層，接触群众，只坐办公室，偏听彙报。彙报内容虽也有些原始材料，但大部分都經過彙报人的‘加工’，不是夸大，就是縮小。許多私人談話和一些不成熟的意見，都被加上帽子彙报了。領導同志偶而下来一二次，接待人也只是那个單位的領導、秘書和党團員，不是群众，他們向領導談了些什么，群众不知道，遇上运动算总帳，群众被整得慘了。这样的日子久了，群众一听说运动来了，便感到人人自危，领导和群众之間的牆形成了。”

（湖北医学院 莫楚屏）

“我在考虑这样一个問題，党在学校里倒底是怎样工作的？是怎样在教育群众的？是高高在上呢？还是在群众里做工作呢？我認为现在是高高在上。为什么自己在系里做工作，一陣愉快一陣消极，情緒很不稳定。这就是因为党在群众中工作做得不够。我知道其他教研組的同志也有的是这样，这是一个全校性的問題。

三反以前还不是这样子。当时党是在群众中做工作的，三反以

后，蔣校長來校以後，這種情況起了一些變化。為什麼有這樣子的變化呢？我認為是在幾次運動當中，黨員有了特權，黨員代表黨來接待群眾，這種特權一直留到平時，黨員的這種特權在幾次運動里得到了鼓勵，黨員就這樣高高的在群眾之上，脫離了群眾，使得學校工作垮下來了。”

（清華大學 常 迥）

“現在黨相當嚴重地脫離群眾了。當黨在地下作鬥爭的時候，與群眾的聯繫是非常好的，因為不然不但不能取得勝利，連腦瓜子都會掉的。在黨掌握政權取得很大成績之後，很容易脫離群眾。推行黨的工作時，細致地作思想工作很麻煩，就很容易採取 Path of the least resistance（阻力最小的道路）。這樣推動工作有時是 polite（客氣）的強迫命令，有的地方就是露骨的強迫命令。”

（清華大學教授 孟昭英）

“黨和非黨人士之間，似乎隔了一道牆。黨員多半和黨員湊在一起，有時正在談笑風生，進來一個非黨員，空氣就立刻變得嚴肅起來，而有些非黨人士也不大願意主動去找黨員來往，于是就無形中演變成黨員與非黨員之間只有共事關係，沒有私人友誼，見面客客氣氣，背後嘖嘖咕咕。”

（天津大學 趙今聲）

“有人反映，武大黨員與群眾的關係，似乎有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這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似乎只有黨才是‘我’，黨外都是‘敵’，對老教授不尊重和蔑視，實際上也是如此。在某些黨員心目中，似乎凡是舊社會來的都是階級異己分子。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但事實上，有些黨員總以統治者自居。

當然，老實說，我現在的處境，還沒有遭到其他老教師一樣的待遇，而且還受到某種程度的‘尊重’，但是大勢所趨，瞻望前途，也不免有‘冤死狐悲’之感。”

（武漢大學 姚鎮梅）

“新‘九品’釋”

黨員	元老黨員	永遠正確,小事不管,大事一句“金言”幕後決定一切。
	當權派黨員	道貌岸然榮譽永屬自己,錯誤永屬別人,群眾和落後黨員。
	新入和預備黨員	小心翼翼,由群眾中來,但不到群眾中去。
團員	黨培養對象的團員	以唯唯諾諾歌功頌德,吹吹拍拍,以小彙報甚至打劫別人為入黨之階。
	一般團員	沉默寡言,只知舉手贊成,跟着說,跟着走,有不平亦不敢提。
	“落後”團員	愛提反面意見不但被視為落後,而且與組織對立。
群眾	團培養對象的群眾	看准風頭,一味吹捧。
	一般群眾	對入團心灰意懶,埋頭干看書,寄情于音樂。
	“落後”群眾	其中有被開除的團員,肅反被鬥錯的,他們永被摒棄于千里之外,無人過問。

(北京大學 朱承立)

“党内有一种人，根本不听党外人士的话，认为我们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采取打击方式，有挖墙角的，有向上级乱汇报的。在学校里主要矛盾很象宋仁宗同八贤王的矛盾，不过今天的八贤王手里没有那棒子罢了——这是党内的矛盾。党外人有冤枉，所以就不能很好团结。”

（蘭州大学 陈时偉）

“党团员是以‘教育者身份干涉群众’，有监视群众的行为。党有用人唯党的宗派主义作风。

建国八年来，基层的党组织和党员就已经骄傲自满，以征服者或功臣自居，另外有少数趋炎附势的投机者，伪装进步，窃取党的信任，蒙上欺下，造成了党与群众间的严重矛盾。

吸收入党的问题，以前是很严的，现在有这样的趋势：有些唯唯诺诺的人吸收进去了……我们学生当中的党员也很成问题。

现在的党群关系是铜墙铁壁。”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高时瀏）

“党群关系之所以不好，是由于第一：部分党员同志……从思想上对非党群众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没有把群众看成是自己人，因而对群众则不够信任……第二是由于部分党员同志，不能从思想上和大家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面对真理。而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有时偏听偏信，不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同时有的党员同志在作风上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甚至有的自居群众之上，发号施令，把自己看成是改造者，盛气凌人，使人大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官清泉）

“党团集团和群众非党团集团，前者从高级到低级，再从低级到高级，决定一切策略，处理大小事务，上下呼应，层层貫徹。始终是居于领导的一方面，后者各做各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即有鳴有放，由

于呼声微弱，下情不能上达，是属于被领导的一方面的。二者声息不能溝通，有时發生冲突，有溝有牆。

这是我院客观存在的一种党群关系，党的各級领导在这次鳴放的具体事实中可以得到証明，平牆填溝主要的是领导上的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片面性。”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

“群众觉悟低，巴不得搞出几个反革命出来，拚凑出一个反革命来，現在又巴不得搞出几个右派分子来。忠誠老实运动教乖了，得出一个經驗，就是老实人吃亏。”

（云南大学 王安長）

“新生进校，查查档案定标准。

党员——大大的好。

团员——基本上也行。

群众——当心你的狗命。

嗚呼！蒼天有灵，同是人，为何把我們划为下等？为何不把生的权利交給我們？公开打击未得逞，孤立誹謗詔害人，我說此話如若假，中二（指云南大学中文系二年級——原編者注）来寻受难人。”

（云南大学 釘 人〔化名〕）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現在好”

“党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經過一些演变的。在解放初期，党和党员在群众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而今天呢？党的威信当然还是很高，但是由于下面要談到的种种原因，党群关系惡化了，党员和群众之間堅起了一堵堵的高牆，群众見了党员有一种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跟党员不談真心話。”

“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

“首先，这几年来，党员……对于群众漸漸由最真誠的人而变成

虛假的人。他們戴着一副假面具，裝出改造人的道學面孔；在會上專等別人暴露思想問題，好給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在對任何問題不發表個人的意見，從來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問題。……不肯暴露，只是表現他們的虛假而已。群眾覺得黨員跟他們不是一樣的人，……因此對他們敬而遠之。另一方面，黨員同志壓抑着自己的人性，不讓它跟群眾見面，他們和群眾只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一點也沒有，更談不上友情。有的人入了黨便跟以前無所不談的朋友疏遠起來，見了面僵得無話可談；有的黨員原先和群眾格格不入，群眾關係惡劣，但因為某種原因取消了黨籍，反而變得很可親，也和大家交起朋友來了。這是一陰森可怕的风氣，它扼殺共產黨黨員的人性，好像黨員有了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我黨黨委會中不少年紀很輕的男女同志，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一群小和尚和小尼姑，一個個沉默寡言，老成持重，仿佛都已看破紅塵，和五情六欲都已絕了緣似的。把生氣勃勃的年輕人弄得這樣暮氣沉沉，這能說不是扼殺人性嗎？其次，今天有些黨員的特權思想頗為嚴重。今天共產黨員大權獨攬，包辦國家大事的情況相當普遍，從最高政府機構到機關、學校、農村、工廠、軍隊，在在皆是。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職無權，報紙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機關主管人是黨外人士，副的是黨員；有的正的是黨員，副的是非黨員。但無論正、副，權總是在黨員手中。”

“有些黨員對本門業務一竅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

“還有一種更糟糕的风氣，對黨的威信大有損害。那就是今天有些黨員借着共產黨這塊招牌吃飯。他們對於本門業務一竅不通，不學無術，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當之無愧。今天黨內似有一種按革命資歷封官的风氣，比如說，一個1938年參加革命的黨員，分配工作時就要看看他同時的黨員是個什麼長，如果一般都是司長，那他也得封個司長；……這種風氣對學生黨員也有影響，有的學生黨員業務不行，但毫不感到恐慌着急，仿佛畢業後做領導幹部滿有把握似的。共產黨員享有的特權還不止於此，比如說出國留學生就是他們的特權，非黨

員是沒有份的。當然，共產黨員如果扳起面孔來算帳，說老子革命這么多年，享受這點權利還不應該嗎？如果今天的問題單是論功行賞，那你尽管享受特權，大家沒有話說。不過，共產黨還要不要保持為一個‘先天下之尤而尤，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呢？你還想不想維護黨在人民大眾中崇高的威信呢？這種特權思想如果發展下去的話，就會形成另一個脫離人民大眾的統治階級，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在學術上，讓專家們去領導不是更好嗎？”

總之，這幾年來黨員居功自大，排斥黨外人士的宗派主義作風是相當普遍而嚴重的。共產黨員的表現，叫知識分子有一種做僕從的感覺，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為祖國和人民服務，而是受雇於黨員似的；黨員似乎不相信知識分子有主動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願望，仿佛他們非要共產黨員拿着鞭子在後面監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

是不是說全國的科學及高教機構每一個單位行政、學術上（除了黨委）都必須是共產黨員直接領導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這些地方讓各該行的專家們去領導不是更好嗎？難道這就不是黨領導了么？難道今天知識分子不是在黨領導下進行工作嗎？”

“年輕黨員做領導工作不如回到業務單位做點實際工作”

“這些年來年輕人（主要是黨團員）與老年人之間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輕黨員領導的直接後果。首先，這種領導關係不自然。拿我們系來說，這幾年來黨員系秘書、黨支部書記及委員們大都是剛畢業的學生，畢業前受先生們的教誨，對老師很尊敬，一畢業就大模大樣對系主任及全系教師擺出一付領導面孔，這怎能自然呢？他們無論在業務、經驗、常識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們，即使在政治覺悟方面，高得也極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第二，年輕人居高位易助長青年得志、目中無人的官僚作風。第三，年輕得志，還會助長不知艱苦，不肯老老實實去鑽本門業務的歪風。凡此種種說明年輕黨員居領導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對他們自己也是一種害處。為了愛護年輕的共產黨員，不如叫他們回到自己的業務單位上老老實實地去

刻苦鑽研，做点实际工作。”

（北京大学 黃繼忠）

“党群关系問題，主要是宗派主义問題。”

（武汉測量制圖學院 張儒杰）

“非党干部不起决定作用，样样都由党来决定，因此，就象馬車的第五个輪子，可有可無，不發揮作用。……因此干脆依賴等待，等党安排好，再下去吃現成飯。”

（武汉測量制圖學院 董金淵）

“每个系里都有党团员，也不知道搞什么？实际上是做偵緝工作，天天彙報，弄得群众根本不敢說話，無形中造成了党群关系的‘牆’和‘溝’，依靠这些人，党群关系只会越搞越糟。奇怪的是領導上以为每个人不說話是馴謹，組織性、紀律性强。”

（中山大學 詹安泰）

“我对你（“致朱志英同学”公开信——原編者注）說过我想組織一个受过伤害的同学組成的团体，問过你是不是願意参加。我是这样想的：按照我的體驗受过伤害的人懂得什么是生活，比方說患过失眠症的人懂得別人稍一不經心給他帶來的將是什么，因此他会格外爱护外人，我和他們可以找到共同的語言。”

（北京大学 譚天榮）

“去年，山大新生中党团员人数較多。許多負責人就常說：‘这批新生中党团员占70%，政治力量很强’等等。這句話，如果說明白一点，就是‘只有党团员是政治力量’，非党团员則不是政治力量，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政治的力量。所謂政治力量，大概是指改造者，而其他人，大概是被改造者吧。界限分明，区别显然。这样做，怎么能不

助長党團員高出群众一点的特殊思想呢？又怎么能不加深党團員与群众之間的鴻溝呢？

正是这种把自己列为政治力量的特殊思想，也就是宗派主义思想，冲昏了某些黨員的头腦，使他們睜着兩眼，看不見群众的力量，覺悟。也正是这种宗派主义思想，使某些黨員不把国家，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看成六亿人民的共同事业，而把事事都看成是‘我們的’，你們少过問！而你們干，你們就老老实实听話地干，其他，不容过問。实际上，不过問也不成。你不过問，埋头苦干，那你就是純技术观点，因为你太老实了，光去干活，而沒抽出時間去跟他們叫叫喊喊，沒有去奉迎他們一陣。看看吧，这般黨員老爷，多么难以使他們滿意呀！”

（山东大学 任恩照）

16. 誣蔑黨員和党的积极分子

“党入城后，一些不三不四的，半通不通的知識分子得着空前的进身之阶。他們利用党领导的业务上的真空，一躍而成为中級領導。他們一方面討好領導，一方面欺压群众。

党入城时，党内业务还比較外行，于是一批半生不熟的学者鑽了空子，混进学校形成領導黨員的外圍，这些人取得中級領導地位后，进而包圍黨員，同化过来，吞吃进去，因而形成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大合唱。罗隆基同志說：‘在知識分子中，有人善于錦上添花，有人善于火上加油’。錦上添花指知識分子中伪积极分子流，抬高自己；火上加油指他們打击別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与某同志談到东北工学院情况，有人說：‘入党的人是拿我們的血染紅的’对这种說法也無可無不可。”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陆 戈）

污蔑黨員干部为“权威人士”“老爷”“幕后指揮”“壟断一切”。謾罵黨員为“死气沉沉，干面包，沒有水，沒有感情”“不講政治，不能生活”。罵党的积极分子是“阿諛奉迎”“靠汇报別人思想起家”。

謾罵揭發他，批判他的同学是“借我的肉体，作为你們向上爬的阶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的材料)

“待月西廂下，迎风戶半开，察顏觀色动，随风慢慢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子偉)

“党团员缺点是主要的，是主观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傳声筒，是很事故，品質恶劣的人，是只对別人唱正气歌而肚子里另有一套的人，因此要象牛虻一样来‘刺’他們。”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現在有些人提意見，都把党团员提在一塊兒是不恰当的，其实黨員对团员也有宗派主义，团员并不象黨員那样被重視、信任。在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見时，最好把党团员分开，不要并提。和黨員相处沒有共同的語言。”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

“我們絕不能再以党团员做为衡量一个人政治水平高低，我們應該(唯一的标准)造成一种社会风气要对非党人士的尊重，号召人民做一个真正的正直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共产党员，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濮仲文)

他把积极爭取入党入团的人都看成是“找政治資本”“向上爬”。他还說：“自己要求入团是为了考大学方便。”同學們在批判他的反动思想时，他罵积极分子是拿他作为入党入团的垫脚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的材料)

“积极分子就是兩面派，就是昧良心办事的人。”“我打过人，捆过人，在法庭上审过人，开除过团员，当过积极分子”。他所以“落后”“言多必失，禍从口出”是领导思想上对他有了坏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吳祥瑞的材料）

“在机关、工厂……中有一批混蛋，不敢發揮自己的个性，沒有思想，唯命是听，还有部分人拍馬，他們可能入党入团，有些思想真正沒有問題，然而不会表现，这些人不被重視，不能入党入团得不到大伙的尊重，有些人入团入党的动机不純，党团客观上就起了釣魚勾和蚯蚓的作用，党团员就是吃香，积极分子有些是假积极，应給与無情的打击，我校分配学生中的干部就是档案袋对相片。”（意思就是不認人，履历表和相片对起来——原編者注）……”

“人是个自私自利的动物，因为人也是动物的一种，黃繼光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很大一部分人把入党入团当作目的，达到到个目的进步就慢了。”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李維左）

“拥护党的积极分子是‘唯唯諾諾’的衛道者，党团干部是‘唯命是从’的絆脚石。”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荣 斌）

“唯唯諾諾的盲目是为了取得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濮仲文）

“党员不要上面号召甚么就作甚么，不用脑筋，只报喜不报憂。不动脑筋就是木脑袋。要独立思考，要忠实地反映情况，这才对党有真正好处。不要把不动脑筋的人看作是党性强，其实这些同志并不是真正党性强。張澤瑜、陈綱等同志向党反映群众的真实情况，才是真地党性强，才是有覺悟。要注意不要只相信有些所謂‘党积极分子’，如

果只相信这些唯唯諾諾的人是十分危險的。有些这样的人入了党，他們入党的动机就不会純。这样的人在群众里关系非常不好，入了党是給党帶來很大的損失。这样的人就应当在整風后清洗出去。”

(清华大学教授 孟昭英)

“吹：吹牛腿，报成績。提：提关系，排異己。裝：裝洋蒜，古来稀。罵拍：罵团员，对上級拍馬屁。”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老虎和蒼蠅”

“老虎有肉食的天性，它要喝人的血，吃人的肉，当然还要嚼人的良心。蒼蠅它棲息于虎首，以分享一些虎威，經常給虎鳴些贊美詩，王上聖明，嗡嗡嗡嗡，臣罪該万死，嗡嗡嗡嗡。

“以从虎口边舐些殘羹，它們吃得飽飽的，当老虎听厭了嗡嗡声时，它們就向众布道曰：‘子曰詩云嗡嗡嗡嗡……’当然它們其中一些还只会嗡嗡嗡嗡。人們对老虎早就恨了，对蒼蠅早已厭了，但是在以前虽已恨，也只好忍气吞声，虽已厭也只好‘洗耳恭听嗡嗡嗡嗡’。

“現在是时候了”人們对虎群起而攻之，所以它不得不深居簡出，可是，蠅則不然，它們的嗡嗡嗡嗡，不仅有子曰詩云，还有反对，反对嗡嗡嗡嗡。

我們要打尽老虎，我們要消灭蒼蠅，但是我們要消灭还得用不用的利器，幸而近代的物質文明已給我們創造了利器，不但有‘六六六’、‘DDT’，还有臭藥水，可以弄得他們絕子絕孙。”

(北京大学 魏 巍)

“由于人民日报下了討伐，北大气氛一变。到处都是反击‘反动言論’保衛社会主义之声……有些人太可憐，腦袋空空，思想僵化像机器人一样，一上弦便会活动，唯一的本領是捕風捉影，会嗅‘反革命

味’(算了,給这些人以民主是浪費)。”

(北京大学 李修宇)

“牆和溝是黨員造成的,积极分子是築牆控溝的义勇队。”

(云南大学 張鉄波)

“积极分子有兩重性;当党的助手也当党的打手。”

(中山大学 吳重翰)

“我校所謂‘积极分子’所犯錯誤:

- 1.單純幼稚的階級感情——
- 2.不多体会政策,过火过左——
- 3.既犯錯誤,事后也不承認——
- 4.被提拔被獎勵还居然問心無愧——
- 5.以教育者,改造者自居——”

“偏听偏信走所謂‘积极分子’的路綫——培养盲目附和,不講是否,不講正义,不講人道,不講人格,不講最起码道德水平,不講法律的歪风;只要喊打就打,宁左毋右,报喜不报憂,奉承阿諛,善于体会領導意圖,善于發言觀色的都是所謂‘积极分子’,包括少数黨員在內,走这样所謂‘积极分子’的路綫,怎能使运动健康得起来?怎样能使好人坏人分得开?有多少反革命分子是經過这样所謂‘积极分子’路綫打出来的?可相反地,有多少国家人民的之氣是經過这样所謂‘积极分子’路綫葬送了的!”

(山东大学 景振華)

“……知識分子都是毛澤东的好兒女,不应把它分成所謂积极和落后。

……好象业务努力并不是积极,只有政治表現才算积极一样,因

此,形成这种情况:嘴巴响是积极,大响大积极,拍桌子摔板凳更积极;兼而打人积极,公开打人更积极,总之,东边敲敲,西边打打,就算积极。”

(山东大学 殷煥光)

“所謂积极分子,多半是冒牌貨,所以今天叫誰积极分子,已成为最不客气的諷刺。实在,有些积极分子靠近党是別有用心的,他們为騙取党的信任,不怕卑躬屈膝,巧計拉攏,进而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他們一取得靠山,就挾党以自重,来驕傲人,吓唬人,打击人……”

(山东大学 赵省之)

“我們有些‘积极分子’,不是搞好工作,而是破坏工作,造謠誣蔑,冒充馬列主义者,看不起知識分子,打击人,卑躬屈膝以求荣。今天撻,明天罵,这样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有何用?”

(山东大学 唐郁南)

“有些积极分子与国民党特务無区别。当时,我有旧画报,包了書皮,上面有希特勒画像,他們抓住了这点,說我崇拜希特勒,反苏。”

(山东大学 李 蘊)

“一些运动起家的所謂‘积极分子’,不憑工作,不憑业务,不憑科学研究,不憑联系群众,不憑最起碼的道德水平,只憑运动中领导叫打就打,就能躡身一变而为政治觉悟高的偶像人物。积极分子政策对,积极分子是需要,我自己就当过好几种积极分子,但所謂‘积极分子’,就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了……”

(山东大学 景振华)

“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間、落后三种。……这种标准是人为的,應該撤銷。党员被認為是进步的,但現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設的因素又怎么能說得上进步

呢，而那些拍黨員馬屁的所謂積極分子則是牆和溝的建築者。”

（北京大學 胡稼昭）

“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一)個人崇拜在歷史上產生的原因，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之際，由於某些人有傑出的勞動生產的才能，因而被大家所尊重這很自然，因人總是想生活得到改善。隨著剝削關係的形成，少數領袖們為了滿足自己無厭的欲望，就在原有群眾信任的基礎上，加上一種威力，因此就有‘威信’之說了……領導者為了唯護自己的‘特殊’地位，必然是十分凶殘鎮壓反抗者，此外還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直到蔣介石，今天的教條主義者，能和上列的人‘媲美’他們不許有人對政策的懷疑，不許有人對現實問題的切實的討論，同樣以政權的力量保證他們在思想鬥爭中取得專橫的獨裁的‘勝利’表面上說的一套是‘科學，發展，真理’實際上做的是：‘頑固，唯心，愚民政策’這些只是表面現象，下面就深入其產生的根基。

(二)從歷史上看，中國革命之初就存在着許多嚴重問題，不崇拜者要說話，許多講道理者的遭遇不會很好，就黨內來說，幾次重換中央機構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出嚴重的互相爭權傾軋慘景，美其名曰：‘黨內鬥爭’……這是為了爭得個人超人‘威力和信任’的一種初級形式的表現，因為在1930年前前後後幾年里整個革命隊伍很少，不能有很大的威力……

(三)不完全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給個人崇拜的產生留出了肥沃曠野……

(四)更重要的是深刻的經濟基礎……因為上層建築的產生決不是憑空而來的，必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基礎……問題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實——就是體現在分配上的合理化，現在，經濟上以各種名目，照顧之類，較高級官員過多地，實際地占有社會勞動產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實際上極不平等，這些現象決非一個國家，一地，半載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長期存在，這就是……‘新階

級'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備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長起來的。決不能簡單地,唯心地說成是'人們的思想問題'。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崇拜。

(五)'個人崇拜'者的理論基礎:

首先他們強調了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個黨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而當把黨的地位異常特殊之後,再就進一步推崇個別高級領導人員,以至發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話,全部理論基礎是:歷史主要由個別政黨所創,而政黨由領導者所創,一切及時指示奉若神明,否認了群眾的主要作用。

(六)……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有十分嚴重的缺點,它只能在書本上,講台上反對個人崇拜,絲毫沒有物質的力量來保證……

(七)消滅個人崇拜的辦法。

必須調整經濟懸殊,社會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吸收勞動人民參加政權,建議領導定期換人,各省政府主席等也應輪流擔任。勞動人民中杰出的先進人物(勞模先進生產者)應做領導工作,領導者必須實質的參加體力勞動,而不是形式的去幾次,……真正的領導者,應以自己勞動等各方面才能忠誠取得群眾信任。”

(北京大學一群同學)

“目前的積極分子有三種:一是真正的積極分子,自己有頭腦;二是沒有頭腦的積極分子,別人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三是幼稚的積極分子。”

(湖北醫學院 劉劍明)

“在舊社會叫做向上爬,在新社會叫做靠攏組織。”

(湖北醫學院 任 染)

“在解放前和解放後初期,在思想上人的類型的劃分是具有進步

意义的。但是逐漸的由于有了物質經濟基础于是‘向上的心’就鼓勵着产生了一批鑽营吹捧，拍馬屁的，看臉色的积极分子，打击別人，在系班上作威作福的人虽不見得是白痴，但也只有凡事乖乖听話，正如胡适所說的，任人打扮的千嬌百媚的姑娘才行的。

他們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古語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上升到了一个高的等級，就有着許多的特權和物質利益在引誘呀！’

（北京大学 談論〔錢如平〕）

“党团员可做大官，我們一輩子也只是个小小的技術員，不打倒奴才（指党团员——編者）我們讀書何用。”

（中南矿冶学院 黃际春）

“現在的党团员比过去差，1949年前共产党員、团员我还佩服，1949年以后共产党員、团员質量差，大多都是抱着卑鄙的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入党团，对那些党团员應該憎恨、嘲笑。我既不要求入党又不入团，我只做个真正的人。”

（中南矿冶学院 雷玉柏）

“积极分子是奴才，党团员是特务。”

（中南矿冶学院 武士德）

“从胡风事件中可見許多党团员都是反革命分子。”

（中南矿冶学院 奚士良）

“物質上享受不平等現象，在資本主义国家是严重的存在，而在我国也有的，如毕业生分配、考学校，党团员就有好的享受，因而非党团员有自卑感。”

（中南矿冶学院 陈惟洋）

“在过去解放前是經濟剝削，現在地主富农消灭了，党团员則是政治剝削。党被这些坏分子(指党团员，积极分子，肃反干部——原編者注)包圍起来。”

(中南矿冶学院 鄔明清)

“党团员口头上講馬克思，心里是法西斯，肚子里是托拉斯，伸手就要打拉斯(\$).”

(中南矿冶学院 李幼吾)

“党团员是特殊阶级，好的都是自己享受，剩下的給我們。”

(中山大学 夏希堯)

“一般人怕党员，更怕团员，最怕积极分子，难保沒有以打击別人来抬高自己的人，有人称这种人員‘吃反映飯’的‘反映派’。”

(中山大学 林楚君)

“坏事都是党团员做的，党团员敢做坏事因为有組織做后台。”

(中山大学 林啓汉)

“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慣于在領導面前唱贊美歌的人，是阿諛逢迎，虛伪彙報的‘党棍团棍’。”

(中山大学 程万里)

“党团员是沒有感情的人，沒有才华的人，有才华的人是不会參加党团的。”

(中山大学 熊鄂貽)

“有的人入党后即不苟言笑，甚是‘严肃’；和群众談話無一点生

活气息，教条连篇，口号占多数好似和尚念经。有人將此面孔与言談結合起来而統称之为‘灯塔面孔’我看不算过份。更可笑的是未入党而正在爭取入党的人也摆一付‘灯塔面孔’，这不能不說是受了某些黨員的傳染。有三兩人經常一道者被批判如‘小圈子’‘脱离群众’，我看这种‘小圈子’在黨員中也是屡見不鮮的。与群众交談要有‘原則’，不能随便說笑，我看黨員相見又未必不罵娘罵老子。党群之間的‘溝’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四川农学院 廖家棠）

“解放前有特务，解放后也有特务，那些專門作彙报工作的党团员就是屬於这一种。”

（蘭州大学 曹文正）

“不要跟他們走（指党、团员），跟他們走是特別危險。黨員和团干部是“統治者”，党支部書記是陛下。”

（蘭州大学 秦效斌）

“学生党团员在分配宿舍中起着監視群众的作用，党团员是便衣警察。”

（蘭州大学 張繼武）

“看那，太阳东升，

呵，新的人种——‘太阳族’誕生。

这是怎样的种族啊，——

瞧，肩窩上摆着一颗僵化了的腦袋，里面裝滿了馬克思、列宁主义a,b,c,外加恩格斯，斯大林；

为了填补可憐的空虛，再塞进了毛澤东思想x,y,z。

您看，他帶着甜密微笑。

志得意滿地死抱住几根寶貝的教条，夸耀說：‘战無不胜，攻無不克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毛澤东思想体系，武裝了我的头腦！’

他成長起來了，

急不可耐地開始了工作，他善長用鷹樣銳利的眼神，獵犬樣靈敏的嗅覺，

尋覓着那所謂的‘階級異己分子’

和‘形迹可疑的人’！

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

辛勤的追求呵，

得到了丰收

……”

“僵硬的，機械的思想體系

憑空建立——

而據以傳道的方式

與穆罕默德真是‘衣鉢相傳’，‘一脈相依’，

左手執着：‘社會主義的‘可蘭經’，

嘴中喃喃宣稱——

馬、恩、列、斯是絕對真理，

毛澤東思想是不會錯的！

右手握着：“××‘思想批判’”，殘酷的‘思想圍剿’的新型‘寶劍’！

……

以‘強制貫徹’，‘獨家經營’，來代替‘自願改造’，‘追求真理’。”

（山東大學 王馥宇）

“黨團員是特務，凡是具有特別任務的就是特務。黨員是大特務，團員是小特務；學校是特務機關；政治課教研室也是特務機關；先生不僅有個點名冊，而且還有黑名單，就是給同學分類。黨、團員，你們自命為特殊材料，特殊什麼？就是自命為特殊階級、特殊地位。

你們喊堅持真理、正義，堅持個屁……所有在座的黨員，你們就不配是黨員，那個曉得你們是怎樣入黨的。不要看你們滿口馬列主

义，仁义道德，表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干的就是男盗女娼。”

（云南大学 張××）

“苏联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我国一切政权归党团员。党团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無論那时斯大林的提法如何，都是有問題的。——这是新貴族的理論根据。”

（云南大学 朱祥亭）

“党团员不享特权，誰又想入党入团呢？国民党时入了党团就能升官發財，現在完全一样。請你們党团员想一下，我們入党入团是不是这一目的？天下烏鴉一般黑，在我所到过的地方都是如此，假洋鬼子（按：引自‘阿Q正傳’）回来后，农民对他尊敬，他就盛气凌人，因为他們認為有特权，可以驕傲；阿Q想参加革命党就是因为有特权。你們入党入团那一瞬間是不是想一步登天呢？！”

（云南大学 徐××、邓××）

“昔者，以血緣門閥、财产多寡划分等級，致使‘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想来陈涉、吳广揭竿而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乃至辛亥革命、解放战争，其原因不無在此吧。

今日中华非昔可比，然仍有所謂‘党员’‘团员’……之分？群众是称不起什么‘員’的，姑且把他們喚做：教‘員’、职‘員’……可又有什么实际权利？

党员、团员作得领导，群众作不得；党员、团员講得恋爱，群众講不得；党员、团员犯得法，群众犯不得……党员、团员得！得！得！群众不得！不得！不得！……嗟乎！豈非‘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么？

有人說：‘天下苦秦久矣’！确也有些道理……党团员不是口口声声在嚷着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嗎？不是一向自命为最經得住风霜……？怎么竟会非领导机关不去，非研究工作不去……不去了呢？

党团员說：‘我当了国防部長，一定要派兵打錫蘭，解决中国橡膠不足’。——没有关系？而群众因为对学校伙食不滿說了个‘跟猪吃的一样’，就要作为开会斗争資料，予以‘揭發’！

‘民主！民主！’如此而已！長此以往，宪法所示‘言論、集会、結社、出版、游行示威自由，等等，豈不成了一紙空文？

我恨那些一面唱着要消灭階級，一面又忙于制造出許多人为界限的，敗坏党团名譽，欺压本国同胞，怀着發財升官企圖的‘出类拔萃者’。試問你們居心何在？

數千年国家还要千祀垂鑒，万世永存！真的猛士，請耐心地在这思想变革的大浪中承受些許出乎意料的震蕩吧！”

（云南大学 李文宪）

“对党員我觉得他們为人虛伪，而又阴險表面上与你一套，背地里来个彙報，我觉得以前所接触到的党員他們都是这样，他們在群众面前高喊口号是虛伪，他們入党只不过为了得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有联系群众的党員，但是他們不受領導上重視被压制不敢說話，不能和群众談心，我認為党員都是講漂亮話，如前面喊粮食够吃，背后却又买餅干充飢。

我觉得那些团员漂亮話說完了，而实际上每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团组织对要求入团的青年要求高，可是对入团后的团员反而要求低，而且团员入团后也不見得怎么进步，甚至作坏事說怪話的还是团员。”

（北京鋼鐵学院 彭卓宗）

“政治上不平等，党团员有特权，群众無社会地位，我們不要同情，而是要呼吁群众的社会地位。

政治上能保持絕對的平等地位，甚至不給經濟权利也是心滿意足，失去政治权利等于失去灵魂。

群众無权力与雇佣一样，你出錢，我賣力，只有党团员才有权利。

对同学根本不信任，彭真報告不在飯厅听，据我估計还有站崗

的。

團員包辦一切，什麼事都看團員的顏色。

開老干部班是對我們的不信任。

團支部先在團內討論反右派鬥爭，是對群眾的極大不信任，把群眾當傀儡。”

（北京鋼鐵學院 張魁先）

“積極分子是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帽頂子。”

（中南礦冶學院 夏忠烈）

“只要有政治資本，業務不懂到處行，開口閉口馬列主義，這就代表政治水平。話到口邊留半句，未可全拋一片心，如果你把真話講，運動一來話不成。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別看他口頭進步，其實是一顆黑心。美不美，政治家；親不親，政治人。知心朋友交不得，‘落後集團’是罪名。見到黨員‘九十度’，碰見團員笑盈盈。黨員如要上廁所，急拿草紙隨後跟。要是稍有不願意，低下來賠小心。要是碰見‘落後者’，狐假虎威嚇吓人。捕風捉影找材料，忙向主子去反映，主子一見心歡喜，覺得這人還得行，於是決心培養你，青雲直上穩把穩，有朝一日登‘龍位’，唉，傷心，傷心。”

（雲南大學 姚 忠）

“一天到黑想入團的人動機不純，能入團的人會吹、會捧、會拍馬屁。”

（雲南大學 印任宏）

“積極分子甘願作奴隸是傀儡，反右派中積極分子有的是投機分子，好多積極分子是吹牛拍馬的，肅反中好多積極分子都達到了個人目的，班幹部是老爺是大官。”

（北京鋼鐵學院 陳煌華）

“积极分子都是被一个框子套住了的缺少活的思想的人，都是一些唯唯諾諾的大教条。

工农干部学生都是老党，沒有头脑的盲从者。

积极接近党的同志，都有着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做积极分子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能成天当人家的尾巴就行，积极分子都是沒有骨气的。”

（北京鋼鉄学院 張存根）

“我是不申請入党，因为我喜欢提意見，根本也入不了党。”“他們（指要求入党者——原編者注）会赶高潮，赶时机。人家会拍一拍，我不会这一套。”

（北京政法学院 田維剛）

“你們是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和護护者，教条主义者，我是自由主义者。你們进步想入党。民主人士揭發材料是向党討好，要批判接受。党团员有組織，不敢提反面意見，会上总沒有錯誤意見，作正面人物，有反面意見就咬一口。干部进行工作不是对人，是对木偶。”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肃反中的积极分子沒有良心，是不得已才积极的：都是木头群，小特务，抬轎人士，是些野獸不如的人……其次是学生（指首先投入反右斗争的——原編者注），其实这只是小特务罢了。再次是盧郁文之流（無耻之尤为虎作倀）……报纸上滿是工贼（这是他辱罵工人的詞——原編者注），小特务，無耻之尤的……血口。”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17. 企圖組織反革命政党

周在团內超齡后，要將超齡团员組織起来。成立“社会主义者劳

动联盟”，提出以“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目的”。其發展对象是超龄团员，和無党派民主人士，發展方法是“以亲劝亲，以友劝友”。并提出找“有声望的郭沫若当主席，自己作組織工作”，把經常和他在一起說怪話，發牢騷的陈克仁，陈廷凱作为謀士，爭取張本忠，以他們的愛人等七个人为“盟員”認為“这样就有了組織基础，最后想經中央批准，在政协会上有个席位，而我这个‘联盟’的組織者之一，也可以出席参加政协會議，聞名全国”。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周治德的材料）

“現在国务院十二个总理都是黨員，今后工厂应由工厂委员会領導，学校由教授來領導，可以民主办校，充分發揮党外人士的力量，我同意成立社会主义联盟，这对拆牆是有好处的，对最后消灭党是有好处的。”（据束解釋：社会主义联盟不包括共产党，而是把各民主党派組成一个社会主义联盟，这样共产党员領導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就行了——原編者注）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束洪濤）

“团员有自己組織，我們群众沒有自己的組織，可以組織一个自由同盟，也可开会……”

（北京矿业学院 昌延寿）

“党整风像一陣风不能解决三害，为了保证党以后不再犯錯誤，应成立一个有綱領的又具有最高权力的群众組織的党。这个党可以任免無論多高級的共产党员干部，并可以搞大民主来反对共产党。”

（中山大学 龔伯璽）

“我国的上層建筑不适合現在的經濟基础，目前的上層建筑不太好，所以要扩大民主，我們也可以吸取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可否成立一个党也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也搞社会主义，可以和共产党

竞争一下。如办两个食堂，那个办的不好就会挤垮。”

(北京矿业学院 于立仁)

郑瑞超组织“中国民主工党”招兵买马，准备反革命活动。

(北京大学 郑瑞超的材料)

18. 为陈独秀、高岗、饶漱石鸣不平

“党对陈独秀是过火一些。陈独秀是党的领袖，士大夫出身。如果党对他温和一些，也许他不致走上反党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楊繼如)

“高饶事件，也是党内闹个人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讲师 朱澄平)

“对高岗、饶漱石问题我怀疑，我想过去他是在很残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把他的思想错误说成反党反革命，说他诬蔑党中央，这理由也是不足的。因此我想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是否把他斗过火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高岗饶漱石是否反党集团值得怀疑，他们不会犯错误，只是与刘周(按指少奇与周恩来同志——编者注)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是否就是反党呢？若是，刘周与高饶有不同意见，那么刘周是否也是反党。过去党中央有过陈独秀、张国焘的宗派主义，现在中央是不是也有宗派主义？”“我怀疑高饶是否为反党集团，根据有三：(1)高饶本人是多年革命的老干部，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若没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也不会有今天。因此，高饶本身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2)在客观上，也没有材料证明他们与帝国主义有联系，(3)党内准许有不同意见的保留，不同意见不等于反党。”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郝正宇)

“毛主席到延安喧賓奪主，高崗不服，开除高饒，这是統治集团內部的爭权夺利，”胜者王侯，敗者賊，“苏共中央处分莫洛托夫等，他說这是宗派斗争，赫魯曉夫等要对斯大林的功臣將斬尽杀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

“高、饒是资产阶级代理人，从那里提出来？不服从中央就是叛徒嗎？是否不尊敬毛主席，就是犯錯誤呢？性質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疑问，为什么提出这問題，高崗要自杀，分明有冤屈。”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韓 楓)

“高饒反党集团只是向上爬的思想問題，既不反对党，又不是反动，为什么說成是反党反人民的”。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方炎火)

“关于高饒联盟問題，我沒見具体事实。要不就相信党，要不就不相信有联盟。我們要相信事实，不能盲目相信党，但党沒給我們事实……，我們要知道高饒何以落得如此下場”，“胡风、潘汉年的案件究竟因为什么‘特殊原因’不能公审？人民不知道，党中央要負責。”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叶 萌)

“关于高饒問題長期以来沒有敢講，我对高饒問題怀疑并非怀疑处理錯了而是我覺得不能說服人，中央是否有宗派主义情緒值得研究。高饒問題的本質是較王明严重。但从其后果看王明、李立三比他們严重的多。但处理不同。王明、李立三在‘七大’‘八大’中央給講情，选为中央委員而高饒却开除党籍，高崗清除出党我沒意見是應該的。但饒漱石是值得考虑的。关于王明对其錯誤的認識如何，这一情况應該使黨員知道作些解釋，否則会产生一些模糊認識。”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學生 賈 卓)

“党中央对高崗、饒漱石的处理是粗暴的，为什么对斯大林的評價是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对高、饒在革命中的功劳就全部抹煞掉。高崗在东北是有一定成績的。”

(蘭州大学 梅成瑞)

“对高饒事件，只知道結論，但‘人民日报’不把詳細情况告訴我們，党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在爭权夺利呢？”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19. 攻击共青团

(1) 反对党对团的领导

“我們班团支部四个支委三个是黨員，其实团支部不一定要黨員領導，团员并不比黨員差。”

(北京政法学院 包卓靖)

“我們有信心搞好团支部工作，不需要黨員来。派黨員来是对团员的不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傅鉄城)

“共青团員們，我們看看我們的总支委员会到底是个怎样的機構？是党总支或是团总支？如果是团总支，为什么九个委員中竟有八个黨員，如果是团总支，又为什么都是些老气横秋的官气十足的小老政委式的人。是否是因为党总支过分的‘老練’与‘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大字报)

“党领导团是以党代团，反对党员任团支書，党员应提出团支部工作，党支部一定要把党员安在团內，不但是袁吉甫同志要退出团的工作，我还主張所有的共产党员退出团的工作，这絕不是反党，要給青年人自己管自己。团总支發的文件，支書不給支委看，是典型的以党代团。”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王文彬）

（2）对团组织 and 团员的誣蔑

“青年团的工作象特务工作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李維左）

將班上的团员划成三类：一类是头脑清醒，但是道理講得不多的（即积极分子）；二类是有顧慮沒有“放”完的（即中間分子）；三类是沒有很好投入整风的，对于这三类人，他們制訂了分別对待的策略，即利用团的支委会的职权，打击第一类，并鼓励第二类人“大胆鳴放”，以便同他們一道向党进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鮑子津的材料）

“团支部是党支部的尾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

“青年团与过去的‘三青团’沒有区别，开黑名单……”

（云南大学 譚东北）

“党团存在，造成了一些人思想上的消极情緒。‘六一’节有人提出少先队的存在，給了不能入队的小孩子造成心灵上的消极情緒。这在党团問題上可以类推。”“我們二年級团员入不了党就很消极。有的人入党轉不了正，就感到政治上的破灭，这就因为有組織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俞国亮）

“这次运动使我認識了几点东西；……对团的态度的改变，無論如何我再也不想入团了，这是一个沒有战斗性的組織，許多团员是典型教条主义者（当然有一些团员是好的，有政治敏感性如中文系），他只会教条式地讀書工作，沒有任何独立思考是思想上的懶汉，对党委的話沒有任何的思考唯命是从，那副奴才相一看令人討厭。”

（武汉大学 吳宋光）

“团的紀律約束青年个性發展，党团员都是机械化，自动化的失去了独立性格的沒有主見的人，党团员好像奴才一样。祖国的第一批共青团员这句话我为你們感到羞愧，团搞得很糟，你們看有的团员要求退团，写了申請書的要求退申請書，团群关系是油水分离，支部每收吸一个团员，团与群众就拉了一个距离。”

（中南矿冶学院 古維章）

“青年团员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假积极分子，只知書本，念几条馬列主义，不知真的馬列主义是什么。假如党员在做打手，团员可以称为帮凶，肃反中这种帮凶很不少，自己（指积极分子——編者注）沒交待过了問題（对別人？打的挺凶，結果自己爬上去入了党，我看这种党员根本無耻。”“在青年团里爭取入党的都有好动机么？太天真了，不懂裝懂的人不少，人不为己，天誅地灭虽是不对，一个人不为了自己自己来干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建团的目的与作用何在???

鄙人趁整风之际，提出下列問題，望众人助我認識：

（1）团员与非团群众有何区别，团员是否以特殊材料制成的？建团为了什么？

（2）鄙人淺見建团不必要，“建团”的本身就是有意的把青年群众划分楚河汉界，挖掘鴻溝，这不是把青年划分为“团”与“非团”兩派

嗎，這難道不是宗派主義？我認為作為一個國度的青年，不必這樣劃分。

(3)入團並不意味着政治覺悟高，思想進步，非團群眾並不比團員落后，不少人把入團看作是雄厚而有保障的政治資本，作為將來上進爭地位的政治條件，因此建團就是助長那些人野心活動而創造條件。團只成為他們野心活動的障地而已。

(4)如果有人說：入團後覺悟提高，思想進步了，團員在建設祖國中起了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力軍，突擊隊，那麼我試問一下：請計算：每個團員在建設中作用究竟多大？非團員在建設中作用多大？二者試一比：能否斷言團員作用大？作為同一個國家，同一時代的青年，為何要這樣劃分？團員與非團員不是同樣在黨領導下積極建設社會主義？非團青年不是隨祖國進步而進步？難道落后在團員後面？團內出現了不少的先進模範英雄，非團青年不但有也許更多，非團青年會犯錯誤，那麼團員也會犯，如果說團內群眾基本上是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那麼我可說非團青年也是基本上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再者如果說團是青年的知心朋友，團員時刻以模範行動去推動廣大青年，為什麼有團員吊兒郎當？不守紀律，甚至有的與群眾吵鬧？因此我認為團員在群眾中、在建設中不起特殊作用與非團群眾一樣。正因如此我認為，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國青年，只要是愛祖國的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青年，應該一律對待，統一接受黨的教育而不因建團而把廣大青年減色。

(5)如果把團當成黨的助手，這顯然就輕視非團青年的力量，加深了“團與非團”之間矛盾，造成了難以填補的深溝裂縫。

所以我認為應該把全國青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完全不必要分“團員與非團員”。

我表達不清楚，希大家爭鳴。

(中國人民大學 小朋友〔化名〕)(大字報)

(3) 誣蔑党对青年的教育問題

“党对青年的教育方針政策錯了，是強制的奴才方式的教育，把青年都搞坏了。”
(北京矿业学院 李国常)

“如何正确对待个性發展問題：目前我們团对青年（主要是新团员）管理的太严了。……象这种操心并不比前一种更好些（放任自流），相反的，它的用心是好的，所以就更容易欺騙人和麻痺人。”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濮仲文)

“青年一代是幸福的，但現在青年人思想是唯唯諾諾，党对青年要求的方式是小牛学耕地，牽着鼻子走，稍离开就是一鞭子。”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康毅)

“我們党要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大有疑問。
党的领导只喜欢那些唯唯諾諾、光而滑的所謂‘老实人’而那些有稜角(当然也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都往往被一棍子打死，领导上根本不看他們的本質和主流，他們要想入党更是困难。

党对青年的思想教育是片面的，它起了很坏的作用。只管強調“謙遜”，而对那些有朝气的，所謂‘不好领导’的人，却一棍子打死，把他們的稜角被磨掉，使得青年人逐漸虛伪起来，正义感不断减弱。

娜斯嘉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在中国青年中大大發揚？这就是共青团工作的大失敗。”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李之杰)

“团队教育的危害性方面。我不是否定团队成績。我只談危害性方面。說我們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是有道理的。团队在培养有組織紀律方面是有成績的，但有危害性，十八岁以下的人不够成熟，在我

們日常生活中，有一種壓制青少年的情況存在，壓制青少年身心的發展。團員，培養他積極向上，應肯定，但在團內虛偽的、言之無物的檢討會是存在的，比較流行，這種風氣是不好的，當然我們不反對對青少年犯了錯誤進行糾正、誘導，而是反對人為的擴大，一檢討就是要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這一套是不好的。這使每個人作事時，都要為這個圈圈所束縛。因在革命鬥爭中無可懷疑，而在現在狀況下，青年人需要更多的關懷，卻形成着整思想的狀態，把自覺的認識化為檢討，而青年人更加活躍的方面是少了些。

少先隊，解放初期，對組織少年是有好處的，但是使少年成為小老頭，活潑氣氛被壓制，這不正常。兒童不僅要紀律，而且要活潑，並且超過紀律的一面。這也使少年身心發展受到影響。

是否由此就得出團隊不要了呢？我沒考慮，而有些不合理的东西，應該拋掉，我們培養的是以個性自由發展為目的的人。

黨內是需要紀律的，但無條件執行紀律，在當前條件下，是不好的。我在報告中聽到：上級指示錯了，也要執行。錯了為什麼還要執行呢？這不合乎普通的道理。”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劉表興）

“在青年中進行群眾鬥爭根本就不對，1.摧殘青年人的身心健康；2.使青年人不敢暢所欲言，不好的話不一定不對，鬥了就不敢講了；3.對青年人的特點只能正面教育，不能採取鬥爭方式。”

（北京俄語學院 徐康年）

20. 攻擊工會

（1）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

“1. 教育工會在学校中如何接受黨委的領導，目前沒有明確規

定。2.工会可以“过問”党委的發展工作，我校有一會員，自从来政法学院以来一直要求入党，但未得到解决，这时工会組織应起公断作用，客观公平地向党委提出意見。3.工会領導機構以民主集中制选举办法产生是不民主的。党委不应提出初步候选人名單……我校工会这些領導機構的产生是勉强的……过去名單是校党委指定的。”

（北京政法学院 錢端升）

“党包办一切，如对工会工作，不給人民自由，工会的計劃工作必須由党作出决定，如果工会代表了群众意見，就是經濟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韓 楓）

“工会应当进行根本改革，过去工会是行政的尾巴，今后工会应有一定的独立性，應該把教育工会的监督权限明确起来”“今后工会监督权要比以前大，不仅有建議权，而且还应有决定权，建議权是不成問題了，要爭取的就是决定权。真正的重要問題，如提講師問題、評副教授問題、重要的学术問題，評級調人等問題，工会应有参与决定的权力”。“工会做出决定，行政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員 潘靜成）

“口头上总是說，工会代表群众利益，是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可以监督行政。事实上，工会只是行政工作的一个附屬品。难怪群众說工会是买电影票的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工会工作。1952年把李立三弄下了台，党把他一棍子打死。現在工人要罢工，工会起不了紐帶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說得不好听过去工会只是行政的尾巴，或者說是听差的。工会沒有真正反映群众的利益。它起了一些緩冲式为行政作解釋的作用。当然它还做了許多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有許多假如不由工会而由行政派人去做，也一定能行。过去強調了工会和行政的一致性，說沒有矛盾；現在看来，矛盾是有的。我个人認為工会應該为群众說話，对工会會員的思想工作，也只有在为工会會員解决生活困难和創造生活条件的同时才能进行，否則是否召不起来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教授）

“……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虽然受剝削，但也有很大的自由，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决定罢工。我們的工会就不行(?)（着重号和問号是張祖文本人看后加的——原編者注）。社会主义下的工会变成替行政辯护的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張祖文）

（2）关于对工会的誣蔑

“工会号召多，保証多，对行政監督少，無能为力，工会提意見，行政不接受，也沒办法，就是工会干部斗争性强，把意見反映到全国教育工会，和吳老一研究，吳老說我回去研究研究吧，也就完了。資本主义国家工会起很大作用，到社会主义国家沒有工会豈不是笑話，要工会是个点綴品。工会是工人的組織，但这組織沒有力量，国家沒給工会权力，工会的权力就是打着牌子号召工人卖力气。工会会費不能不拿，不交会費就說你落后，每月拿兩塊錢算是打發‘要飯’的。报上登的政協委員的發言，我每天看，他們都是吃飽喝足了在歌功頌德。有誰能去真正反映群众的要求？政協开会，外面摆滿了汽車，这样的人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很多發言都提到避孕問題，过去怎么不說？是毛主席沒說。过去話都压在肚里。許多問題都是这样。”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目前工会起了两个作用，一是給会员搞福利，二則是党委的傳声筒”。

“工会工作是穿小鞋的，要低人三等，負責工会工作的人处于从屬地位，出一篇黑板报的稿子都要請示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展广偉）

“党不重視工会工作，行政不重視工会，甚至有的單位工会是行政的“尾巴”，工会工作是“下等”工作，是不被重視的“第三等”工作。許多工作不給工会，重要的事不找工会，有些干部不搞工会，党的會議不叫工会。”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潘靜成）

21. 攻击学生会

（1）反对党对学生会的领导

“反对党领导学生会，几次煽动系学生会軍体部長安靜說：‘你們不应当老跟着党总支跑，学生会應該發揮它的“独立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学生会是一个学校的中心組織，但現在学生会癱瘓了，我們学生会應該醒醒了，你不能永远放棄自己的領導，我們齐喊：‘你应当發揮你的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楊文极）

“在工厂黨員担任了工会主席……他往往代表了党，不能代表群众。”“黨員担任了群众团体領導工作时，應該暂时脱离党的組織关系，可以不受党的拘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鲍子津)

(2) 誣蔑学生会不起作用

“要改进学生会工作与人选,能充分反映同学意见及监督学校作用,解放前学生会起了很大作用,一切社团活动都由学生会来稿,但我们现在的学生会作用不明显,只能起传达工具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士杰)

22. 攻击党的干部政策

(1) 攻击、誣蔑、歪曲党的干部政策

有的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当时),又缺乏起码的理论基础和业务基础,却被选派出国留学。

有的人只靠吹吹打打,有学无术,却当了教研室主任,继而付系主任,继而出国当专家,回国后又当了一个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办公室主任。

有的人终年悠游步月,松懈懒散,却当了教研室付主任,当了付主任“不理朝政”,正因为“不理朝政”,权当了教研室主任,当了正主任马马虎虎,正因为马马虎虎,才又被选出国当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副主任 王亘坚)

(大字报)

1.有些老干部憑过去的汗马功劳,不求上进,却能稳居高位,直到老死或犯严重错误为止,阻碍工作,压制了新生力量。

2.所有大小干部走进革命大门后,就有了一个敲不破的“金饭碗”,这样免除失业之憂,固然能使人安心工作,但亦使许多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蜗牛式的前进,甚至长年累月悶情緒,不

好好工作。工作效率既低，機構就不得不越來越大。

3. 庸庸碌碌，唯唯諾諾的所謂对党忠誠的人得到信任和高官厚祿，這些人的唯一任務，好象就是訓導監督那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外人士”；而有知識有才華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

4. 干部的“爵位”既是上級封的，因此干部意識上往往只會有上級，對上級負責，而忽略首先要對群眾負責。

5. 既干部等級只能“升”不會“降”，干部（特別是比較高級的干部）質量就必然會出現一些虛假成份，有些干部有13級薪俸，却根本沒有13級的本領。有些人升上去後，優厚的物質生活和特殊待遇，把他們提前送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為什麼不躺下來休息呢！

6. 對某些干部特別是較高級的干部，體貼入微，左加照顧，右予便利，人為的製造出許多等級差別，使得這些干部心安理得的享受特權，漠視法紀，脫離下級，脫離群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憲平、周維魯）

（大字報）

“干部的提拔一定要群眾同意。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資格吃飯。資產階級國家的部長們可以辭職，可以罷免。這我看好。我們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過去往往下放好像是犯了錯誤，升上去就高高在上，這樣繼續向上升，還能都當毛主席嗎？干部經常換一下也好，資產階級的兩黨制到可以競爭一下。在我們國家里，當然這不需要。但這說明能多提意見是好的。部長們調換一下和人民一起參加勞動是很好的。

等級制，高干的太太和子弟特權不少。例如：法律系的一位女同學是高干的愛人，有的人去看她（這個人也是高干）其兒子說：‘你為什麼不穿呢子衣服？你還不及我爸爸的警衛員呢？’干部為什麼要特權？高干的子弟被懲的要死。這樣免不了培養出一些敗家之子，高干的子弟經常打別的同学，這麼一點小孩就成了小惡霸，欺人。在‘中國婦女’上刊載了媒姆的話‘人家是高干的兒子、部長的孩子。’這些

事情是不能容忍的。这毒害了下一代，这等于叫下一代不要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现在有这样一条规律‘学而优则仕，仕不优则学’，那些有才有德，学术上有修养和成就的都逐渐从学校过渡到外面去作官，而那些無才缺德的工作中犯了严重錯誤或受处分的老干部都从外面实际部門調到学校中当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
陶文达）

“国家重德不重才，故产生官僚，舞弊瀆兒，假积极分子，我提倡重才不重德，（如果都是人民的话）重德不重才全国都有。农村干部都是党员，在农村一入党就能当官，一入党就能升官發財，党员評級評薪比非党员高。一、二篇文章就把李希凡抬上去了，应效仿，‘堯舜禪讓，选賢以能’。”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田仲倉）

“出身不好的跟美国黑人一样，受歧视，有才也不能提拔，工农干部無才也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翔）

“干部有两种：一种是搞政治的，他们勾心斗角……，要成分好，我没有条件；一种是技术业务干部……他们光搞业务技术，有了技术，什么也不怕，党自会去找他们……我就是向业务技术方面努力，所以一点不重视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黃世君）

“党的干部政策就是：党员第一，团员第二，群众第三。”

(北京政法學院 王 革)

“人事制度問題，‘由黨掌握’也存在着缺點——三大主義、唯成分論、唯資論、不相信革命知識分子，中央機關有專、縣、區這問題更嚴重，造成幹部唯唯諾諾看領導臉色行事，靠近人事組織部門提拔快，這是主流，是基本的。官官相護中央有，專、縣更為嚴重。薄一波犯了嚴重錯誤，不久又作了經濟委員會主任，實際上是調換工作，就是官官相護，今天對現實不滿有反對意見的不敢講，否則帶上思想落後的帽子，檔案里寫上一條，以後影響提級提薪，成為一生的絆腳石，作為提拔根據，不憑本事，只憑資格，名譽，拍馬，阿諛來提拔，與領導意見不合就落後。這就使我們只能變成老鼠，不能變成獅子，因此，他主張改變幹部考查評級，提拔等制度，應以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和忠誠出發，不能以對領導唯唯諾諾為標準，他們是為了向上爬，是政治上的壞蛋，提拔了他們，就產生三害，評級評薪（包括領導幹部）要本部門90%以上通過。”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謝德鈞)

“有些領導幹部的愛人狗屁不是，也通過人事關係介紹工作，每月亦領不少錢，工作也做不了，但因是縣長、區長的老婆，所以把機關工作鬧的烏煙瘴氣。……過去對這些人才用的不適當，有些才有的人未被很好的利用和發揮他的作用，有些人事制度單憑主觀喜好出發，去提拔使用幹部，這也是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章 齊)

“我們學校不論提拔幹部或選拔研究生都是任人唯親（親者黨員以及老干部的老婆也），對研究工作有決心有力量有志趣的都不讓干，綉花枕頭（外花內草）硬往上捧。”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員 徐鐘秀)

他最反感的一些黨員和干部的特權思想，說裙帶關係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說什麼很多“肥缺”都被官太太闊少奶奶，公子，小姐們占了，他們吃得腦滿腸肥，但根本不稱職只能在那里尸位素餐，他帶著仇恨的心情說：“可惜老百姓每年用血汗換來的貢獻給國家的一點點東西都養了這些東西！”“他們的老子拚命掙出來的人民江山將會被他們斷送”。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章廣廷的材料）

“使用干部時往往不是‘任人唯德’，而是‘任人唯親’，或叫做有些‘裙帶關係’；對親屬應該照顧，但現在照顧得過分了。我校有一些高級干部家屬被安插在工作和學習崗位上，工作不稱職，學習學不好，入學時也未經過正式的入學手續就入學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黨的干部政策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縣委書記一換，下面的干部就不一樣，隨縣委書記調來一批紅人……。雁北煤礦、印刷廠和修配廠三個單位，50%的干部都是裙帶關係拉上去的……”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吳祥瑞）

“提拔干部有裙帶風，有的女干部和首長結了婚提拔就快了，有很多干部是不稱職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延年）

“領導上對干部，只管使用，不管培養，不關心教師，尤其是他們的工作學習前途問題。對待教師象買來的鞋子，好就穿上，穿破為止，不好就扔到牆角里。對教課有成績的就無原則地捧，對差的就厭煩之情溢於言表，好象對待戲子一樣，唱好了就喝采，唱不好就冷嘲熱諷。領導上既然不關心，不了解同志們的情況，評薪評獎不犯錯誤才怪呢！”

（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語文教員 白楓）

“1949年以来，学校培养了不少‘自己的干部’。为什么要說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呢？这不仅是名詞的涵义問題。而且，在实际上是將老教授排斥在‘自己’之外的。由于排斥老教授，所以也把对付資產阶级的那一套用于老教授身上来了。这就是‘利用’他們。知識分子对‘利用’兩字很有反感。”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副教授 汪同祖）

“你要用我时硬拉着不放，不用时一脚踢开，就是我跪下来你們也会不要我的。……目前利用我一番，將來也会把我一脚踢开。”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地方干部級別乱七八糟，提拔得大快。”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龐秀珍）

（2）誣蔑党的干部政策有嚴重的宗派主义

（“重德、重資、不重才”）

“以上現象（指党的干部衰退蜕化現象）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現象是党的干部政策决定的，共产党以党代政，党的干部政策實質上是只重招牌，这实际上是公开的秘密。……

党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并重照顧資，但如果求其实質，乃偏重黨員招牌也。有何为証：全国各种机关組長以上的领导干部中，非党人士有几个，而在这些非党人士中有职有权和共产党员同級干部，享受同級待遇的又有多少？我說是微乎其微。难道党外千百万人士中都是既缺才又缺德的嗎？（說到‘德’如果是指共产党员招牌他們确实缺）。……这是我認為危机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造成危机？什么样的危机？上述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惡果之一，是严重地打击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尤其是党外知識分子的积极性，我們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可概括为：‘照顧他們的生活（也不是所有的），改造他們的思想，利用他們的知識建設社会主义。’好

象很全面，但根本的一点沒有，那就是沒把他們当作新社会的主人，直到現在还是这样，我們把他們当作滿天飞毛，他們的积极性不能發揮，完全归咎于他們的思想落后，而党的宗派主义情緒擋住了他們去参加建設，則根本看不到。現在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看来熱鬧……但如果根本的干部政策不改变，那么党和知識分子的矛盾則不能全部解决。这一政策（指所謂‘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的第二惡果是：造成黨員的特殊身份，共產黨員只要不犯大錯誤，不管工作能力如何，思想是否可（与）光荣称号相称，反正过一个时候升一級，步步高升，高官厚祿，不称（职）的干部占据高位，使工作造成無法弥补的損失，問題的严重性不在于这种現象，而在于：由于共產黨員的特殊地位，使他們处在沒有竞争的地位，他們干不干可以一样升級，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去学习去工作呢？揭露出来的普遍的官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則是这一政策的必然惡果。这种現象現在还在蔓延。……但我要說，如果这种政策不徹底改变，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主要的基本的現象。現在我們搞社会主义建設。急需干部，我們对知識分子不信任，知識分子就会真心誠意为党工作嗎？党内呢？黨員缺乏前进的刺激，我們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將受到严重的損害，生产力將因此而不能很快提高，而生产力的不能提高，將削弱和最后抽掉工农联盟的物質基础，这难道不是危机嗎？”讓賢者，能者〔包括共产党在內〕来治天下。”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楊瑞清）

“提拔教師單憑資格不憑才，不學無術上講台，魚目偏把珍珠充，誤人誤己大不該。”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野夫）（大字報）

“我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国家在选拔提升干部时，只是看是不是黨員，是黨員那在工作中，各方面都便利，受領導信任，不是黨員，則不被重視，就是有事也無权，我就覺得国家政府对重視學問这方面

很不够，这种作法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差不多，处处考查門弟，不考查學識，使得一些寒門之人在我看来就是那些有职無权的人，得不到真正的权利和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孟繁森）

“提拔干部有不合理現象，不少非党群众忠心耿耿有工作能力，但在提拔时就因为他不是黨員而未得到提拔，这是不合理的，是否一切部門我們黨員都要做头头，才算党的領導？肯何月下追韓信，当时統治階級还这么爱惜人才，我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建議应發揮一部分人的工作能力，特别是知識分子对工农干部应主要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知識不丰富看問題就有局限性。”現在有些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簡單生硬，动不动給別人扣大帽子，有些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公开地鬧名譽、鬧地位，对工作不好好干，甚至違法亂紀，这些情况党的組織和上級党委都了解，可是不但不处理，反而被提拔了，……所以我把党看成似乎保护这些同志，他們有了过去的功劳，和‘黨員’作为护身符，就什么也不怕，簡直是鉄飯碗一样，又想到国民党即使不民主，他表面还要处分一下，还有个‘銓叙部’，难道我們今天可是工人阶段領導的政权，还应该对这些問題迁就嗎？”

“黨員里面提拔干部多，非党群众提拔少，我覺得这既是名又是利，如果拋棄了名利观点，这个事是不存在的，空講不要名利，这实际不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伍士杰）

“德才兼備”的准則是對的，但党在执行中有偏差。

重德不重才。我以前当學生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學是班內唯一的黨員，但以學習成績論，也是唯一差的，就是他，被选中去苏联留學了。再說周揚，他在‘左聯’時犯過錯誤，後來領導延安的文藝工作，解放后担任‘作協’付主席。周揚的東西很少，寫過一些小東西，其中還有很多雷同，轉印的，最大傑作是編過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但這

只是編的而已，且其中教条主义很多，起了不好的作用，除此他没有什么可貴的經典性的东西，沒搞过創作。而沒搞过創作要來搞文艺理論是較困难的。他是沒有真才实学的，但他現在却領導着整个文艺战綫。”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使用和提拔干部不是以德才为准，而是要清一色，一些行政重要領導职务均为黨員，其他工会、体协都是群众，我看也是宗派主义”說連分配向阳的房子也是‘先主任，后黨員，一般群众則打入“冷宮”。’”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講師 王鏡芝）

“我国的干部政策实际执行中德和資最重要，什么是德呢？一般理解为是否共產黨員。要变为領導就必須是共產黨員，入党成了晋升的办法。入党簡直和鯉魚跳龍門一样。黨員以上的人如何評德呢？以党齡衡量和看這人对中央領導的信賴态度，对中央政策执行情况。这就使人們只能盲目崇拜。另就看人們的資历……革命時間愈長領導地位愈高。所以根据标准实际成了看是否黨員和党齡長短。这种制度就为宗派主义的滋長創造条件。他提出应‘唯才是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何世芬）

有些黨員对那些唯唯諾諾，缺乏独立思考，思想僵化，做工作不用頭腦的人認為是好同志，可以信任他們，并为党組織，上級干部所器重。唯唯諾諾的人不等于朴素踏实的人，有些人就混淆起来，还有一些人虽然有自高自大的缺点，但他們却有一定能力，可有些黨員在批評缺点时，而一概否定了他們的才能，因而就看不起他們，不信任他們，这样的信任标准是否正确？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報）

“提拔干部要根据德和才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只強調德，而且只

強調宗派主义的德。只要所謂政治可靠，是心腹人，合领导的胃口，不管怎样不行，也可以飞黄騰达。相反有些人能力强，工作也积极，只要不是黨員，就一直压在下边。旧社会有升有降，現在老干部級別与年俱升，有升無降，再不行也得占个领导地位，而且官越作越大。同年参加工作，工作一样努力，政治上被信任的便提成六級、七級，而且多方培养，一意要把这批人变成紅色專家。历史上有問題的便認為沒有培养前途，不提拔，把这批人当成社会的渣滓，到处扔。結果有靠山的人飽食日終無所用心，只要领导信任，仍旧步步高升，甚至連升几級；而被看成渣滓的人抑屈不伸，积极不起来。經過肃反，干部历史基本上弄清了，弄清了历史的干部，在工作上应当得到同黨員一样的信任，只要他們有能力，干得了，就應該讓他們干。党的领导不一定要通过把不称职的黨員硬安在领导崗位上的办法来体现。非党人士也完全可以执行党的政策方針，为党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对于提拔干部我看领导只注重德不注重才，就是这个德也有問題，所謂德只不过是历史簡單，黨員資格。我們可以看到在教育界小学程度的人可以当教授，只是因为他在革命队伍中多混了几年，而解放前的一些教授、系主任現在則作講師。在出版界譬如本校的出版社，业务水平、理論水平、文化程度都很低的人，因为是黨員都作了編輯，而且还是一等編輯，而那些具有相当业务水平、理論水平、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却作助理編輯。在工程技术界恐怕业务不如技术員，因为是黨員也要作工程师吧？领导对干部的信任不够，有的竟輕易地怀疑人家是特务，把干部当作机器使用他、磨損他，連擦油都吝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李金銘）

“在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学校中需要大批師資，而社会上現有的師資，在当时的高教部领导看来，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是可以怀疑的。于是小学沒有毕业的，中学沒有毕业的，大学沒有毕业的，只

要是黨員，有過革命的經驗，經過蘇聯專家短期訓練之後，也就在
大學中當起教師來了。在大學中當教師，但本人從來沒有進過大學，
這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所以只可以稱它為過渡時期的反常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教授 吳景超）

“幾年來派遣留學生，都不是公開招生，並且都是黨、團員才能
去，這是不合理的，我認為只要‘忠於社會主義’的就可以了。”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戴逸樵）

“學校的宗派主義首先表現在對黨外老教師的看法和提拔上，選
拔幹部不少是強調政治條件的例子，如38年的老干部，不管行不行都
當了系主任，較晚一點的是教研室主任，甚至有的小學程度、中學程
度的，也當了副教授，如翟良超同志當工會主席時談到，‘勞衛制’將
‘衛’字解釋成為‘衛生’。

黨員提拔快，去年提拔的副教授都是黨員，其中有的水平很差，
教貿易的小學程度，文字不通說勞衛制是勞動衛生之類。另外黨外教
師十八年未提的也有，有的解放前是副教授，到人大變成講師。另外
評工資問題，先黨員後團員。”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講師 侯大乾）

“黨的幹部政策是宗派主義的根源。對幹部的使用培養連封建社
會都不如，因為科舉制度還能選擇出真才實學。”

（湖北醫學院 楊則俊）

“現在有共產黨員貴族……不是舊社會遺留的，而是人為的，可
以改變而沒有改變。特權思想，在一些黨員思想中已經形成，同樣才
能、工作級別比別人高，提拔快，過去我很氣憤，我在氣憤中走進了大
學，走出了險境。”建議：“人事制度應該規定共產黨員的10%由群眾
評級（最少有一批人是這樣），因為事實上有一批黨員中不作那么多

工作，而拿那么多小米，过去不是不能改变，而是党沒有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王文彬）

“旧社会埋沒千百万天才，而今天由于政治条件依然可以埋沒人才，这能說是新社会嗎？这就是我对新社会的仇視。不是党团员，做群众的就容易被埋沒才能。”“我觉得誰能負多少責任，就叫他們做多少事，行使多少权利，可以不必問政治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达）

“（1）过去德、才兼备适当照顧資的政策是正确的，但90%沒有貫徹，提拔干部是論資格，資就是党、团员，最重要的是党员。

（2）过去执行人事制度的后果：

a.有能力的人听沒有能力的人指揮，沒有能力的人占着茅房不拉屎，有能力的人英雄無用武之地。

b.造成社会不好輿論和入党动机的不純，因入党后可当官享受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入党，解放后几年来升官發財的思想增長不是無原因的。

c.把当官作为进步的表现，因为提拔干部和党龄，参加革命時間有密切联系，当官和党龄就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东西。

（3）建議：

a.这样做不信任群众，不能發揮群众的积极性，今后再这样做違反馬列主义原則。

b.今后人事制度应公开，只要是人民不是反革命，拥护社会主义，可以担任国家一切职务“包括主席在內”。

c.今后人事制度应主要是才，然后是德，資。

d.对过去因照顧而設付职，多的应取消，不管是否民主党派，因民主党派也不願受这样的照顧。

e.对沒有能力的老干部，不应因照顧而設一个职位，而应由国家予算撥出一笔款做社会救济，这也就是照顧了他过去的功劳。”

“人事制度不合理，資第一，德第二。資老就是黨員，黨員就是德，黨員有才就重用，非黨有才就是利用。因此，它是產生“三害”的基礎。其結果：

- a. 使各級領導職位被少數人壟斷。
- b. 激發了升官發財的思想。
- c. 使青年人不能進入上層領導。”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4 攻击、誣蔑、謾罵工农老干部

“現在干部水平低得驚人。特別是大批轉業干部，他們搞土改、打游擊有經驗，他們級別高、職位高，但現在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領導崗位上不但不能作事，反而坏事。要知道，現在的工作光憑勇氣是不行的。現在工农干部与知識分子的矛盾就在这里。例如有的打游擊的人當付院長，他又無知識又自高自大講享受，這個學校怎能办好呢？周總理為什麼能和大學教授談得來，就因為他是留學生，他懂教授的話。而現在我們這裡有些干部則大不相同，和他談真是牛頭不對馬咀，你要講衛生問題，他說他的祖宗三代在鄉里沒有講衛生也沒有少活！你怎麼和這種人講話。必須把這些人調走，叫他們去學習，待有了知識後再出來工作，而把他們的位子讓給有知識的人。黨必須了解，在延安蹲了八年的干部受到的鍛煉是可貴的，但是解放後八年知識分子受的鍛煉比他們更可貴，比他們好得多。應該放手讓他們辦學。現在是干部決定一切的時候。”

(湖北醫學院 朱裕璧)

“老干部是頑固保守、用地下工作、打游擊的辦法來辦大學。不能吸取別人經驗。有些老干部，象張崇山部長可以調出去作省主席和副主席，或者到國務院當個部長……因為資格老，沒法安置，就給一個

什么長。”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我国干部政策德是資格，才是能力……提拔干部过多照顧資，……我同意照顧老干部，但为什么不送到养老院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吳元富）

“总务处人事处不应由黨員来領導，其他学校都是教授付教授，因为黨員他們什么都不懂，干部沒有專門化，鼓励干部向上爬，系办公室換了很多入。”

（中南矿冶学院 黃存紹）

“現在广州市科級以上干部都是飯桶、無能、只知享受、坐小汽車，連公章都不知盖在那里。”

（中山大学 国靜文）

“农村干部是惡霸”。

（中山大学 苗訓君）

“文艺領導干部沒有本領和才华只是占党籍的便宜。”

（中山大学 国建文）

“党团干部什么都不懂，上級叫他作什么就作什么，什么理論都不懂。”

（中山大学 希堯堯）

“工农干部不懂业务，不学無术，虽然过去有血汗功劳，但是發个獎章給点獎金讓他們回农村生产就行了，工农干部不講理，脫产干部增加人民內部矛盾。”

（天津大学 盧 綱）

“人事工作掌握在一些工农干部手上，他們只重‘德、資’，看不到人們的長处和短处，对才不重視，这样是搞不好的，对于一切人事安排都要通过党組織来计划……限制了个人的前途，沒有發展，沒有竞争的可能，工农出身的干部是‘吃閑飯的人’，他們能力不强、文化不高，办不好事，又担任負責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姚永年）

你是那一級？啊十六級，那年参加革命？“三八”式，啊！那么你来当教研室副主任吧！三年級的課程也由你来担任，至于，你去年才毕业，学习也多是三分，而且也尚無学术經驗，不过，那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你是最可靠的“老干部”！！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国家經濟机关之所以会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和使保密制度扩大化是因为“我国国家經濟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老干部”，这些老干部都是“缺乏經濟科学的修养”沒有“管理大經濟的經驗”工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与經驗主义，并已成为“习惯”。国家經濟机关的中下級干部是只能照章办事而不能“独立思考問題。”“老干部党员，有了既得利益，他們把老資格当作招牌变成特权变成了升官發財的資本。”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講師 朱澄平的材料）

“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只会强迫命令。这是跟国民党官老爷学的，引起农民严重不滿。現在农民对党不滿比知識分子还厉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大干部高高在上，怕苦不下去，不关心群众疾苦。許多人靠老資格吃飯，不懂业务又不学习，坐在領導崗位上降不下来，根本不象个干事的样子，就象旧社会的开国元勋一样，創業有功，以做官当报

酬。”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我校领导是：有职有权而無能。自己沒有办校經驗，又不依靠中国的專家。我校的老先生当中当过校院長和系主任的不少，领导上不去請教他們，而对联苏專家的每一句話就当作聖旨。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样子呢？我認为学校领导上有个包袱：兩万五千里長征都完成过，蔣介石的八百万軍隊都被打垮了，这有什么困难呢？再有困难也能克服。結果是頑固保守，用地下工作、打游击的办法来办大学。不能吸取別人的經驗，只靠一部分党团員；而党員也各有各的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有的领导对批評与自我批評并不誠心、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领导对持有不同意見的人，态度粗暴，指导思想是，反正你造不了反，有軍隊、有国家机器，这种思想不是个別的。党的干部政策之所以在执行中会产生偏差，这与大多数党員出身于农民有关，处理問題难免帶有封建專制思想，他一生碰到到的就是地主对农民的关系，資本主义民主在他們腦子中根本不存在。领导干部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向上級也只报喜不报憂，因为报告缺点多了，就不能被提拔。”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吳思偉）

“老干部水平低，馬列主义水平低，对群众不了解，更不了解知識分子特点，連思想工作也做不好，如×××就是飯桶。有些老干部，由于資历，虽沒有能力，也按在高职位上拿高薪，这是一种剝削。……不称职的干部可以給他們补助，讓他們去休养，不然，往上提是誤事。”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做政治工作的人，只是憑一張嘴在吃飯，沒有什么真本事，他們沒有科学知識，因而也学不了馬列主义，而所有基層领导都是这一类

人。这类人除了依靠行政命令外，是做不了任何工作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我院的领导和西游记上的猪八戒差不多，不务正业，好睡觉。是醒的时候了，先生們，我們不要不务正业的领导。”

（北京政法学院 陈广梁）

“他們（指老干部，下同）原只是一丘之貉，

他的言語之中只有官級和官阶，

重要的是：

从今后我們要学会生活，

用D.D.T.去对付臭虫和蝨子，

要珍惜我們的血和淚，

为澆灌人民的后代。

世上只有那些自甘不学無术的人們

才不懂得知識劳动的尊严，

只有那些特权和官气熏人的老爷們，

光天化日下光看屁股也不知道羞慚。”

（北京鋼鐵学院 曹厚霖）

“調来的老干部，沒有一个是好的，老干部抗日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搞社会主义建設他們不行的，應該交給青年人接班。”

（北京鋼鐵学院 馮 英）

（4）“德才新論”

“我認为‘尸位素餐’的現象也确乎存在；至于是否普遍，我不敢輕下断語。为了工作着想，我是希望那些高居要职而不称职的領導干部‘下轎’而另請高明的，——如果有更高明的人可以代替的話。

我觉得有必要把‘德、才兼备’的公式顛倒回来，成为原来的‘才、

德兼备’(見毛选二卷514頁),把‘才’并非与‘德’对立地放在主位。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这是干部政策,‘干部’二字顧名思义不外乎是有能力有才干之士也,所以干部政策中‘才’恐怕应是主要的。

曲解‘德’的概念,把伪德看成真德。把‘唯唯諾諾’看成‘眞实可靠’,把‘碌碌無为’看成是‘踏踏实实’,把好提意見的人(不是指有意找岔子的人)看成‘組織性差’、‘好發牢騷’。‘德’的概念如此不清,自然就会造成干部政策中的錯誤,助長庸俗的伪君子作风。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木头人’,这真是一种殊为可悲的現象。”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党在干部政策上只重德不重才,不禮賢下士;現在形势变了,必須德才兼备,而且要首先重才。”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白湜)

他主張按才任用。才就是聰明、能說会写。工农干部少才。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叶萌的材料)

“应对德、才、資有新看法”,德:是这个人的原則性强否,能否联系群众,办事是否热情,反对將德簡單認為只有党员才有德,非党员沒有德,即缺德。資,过去認為,凡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即为資历,而过去在校長期任教的人,即不算資历,是不公平的,知識有其延續性,繼承性,我認為除参加革命時間外,長期任教也应算資历。才就是业务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講師 郭振淮)

“……應該徹底改变学校对待下部的政策,應該是才为第一,不改矛盾还会尖銳,憑資历不能吃飯,你告訴同学自己是三八式的,同学也不会欢迎你講課。”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助教 梁尙敏)

(5) 主張开放干部自由市場

“贊成分配毕业生时公布要‘人’單位需要人数，工作性質、內容、地点，和要‘人’条件讓同学直接与工作單位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广泛討論充分協商，由用‘人’單位根据同学自願决定分配結果。

其好处如下：

(1)發揮同学主人翁思想。易和集体利益結合。

(2)徹底消灭官僚主义。

(3)同学直接联系可以了解情况……更对口徑。

(4)同学充分協商可以加强团結。

(5)可使工作單位选择机会，工作困难有志士自願前往。

(6)可以限制个别觉悟低同学对祖国無限要求，于有限实际范围之內暴露其無理要求于大庭广众之中。

(7)可以使同学了解国家情况，提高政治觉悟。

(北京大学 蔣兴仁)

“我同意开辟职业自由市場，因为統一分配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弊害，大才小用，小才大用，不願干的也得干，干不了的硬干，不安心工作，領導就給打通思想，結果思想通不了，工作不帶勁，思想苦悶，对自己对国家都沒什么好处。‘职业自由市場’开辟后，开始时可能有些乱，但不久就会安定下来，而且会比統一分配更安定，因为人人各得其所，各干所好，誰还去搖搖不定呢？各个部門通过考試按才录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無才不用，工作符合他的志願，适合他的水平，干得高兴，尽其所能，对自己对大家都有好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李金銘)

“反对毕业生統一分配：

反对包办婚姻式的分配毕业生的工作。

包办婚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在我国廢除已久，但是在我們目

前，分配工作时，却有其广泛的活动余地。毕业生好象奉父母之命的姑娘在临嫁之前还不知道丈夫是誰，他們的性格、脾气如何，可是她却沒有权利过問，如果有不同意，違反了父母之命，則就常常戴上一頂不孝之道——个人主义的紗帽，或者思想落后对抗組織，可惜我們暑假毕业，戴上这頂帽子未免太大太热，說不定会中暑。”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四年級 大字报）

“在以后确定职务和职位时，應該提出才德并重的口号。所以提才德而不提德才是因为工作是要靠能力而不是靠思想或馬列主义教条，更不是靠党吃飯。一定的职务必須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如大学校長必須是教授，中学校長必須是教員，工厂厂長應該是技术或經濟工程师。

人事的工作必須由內行人来担任，要調动一个教授或工程师的工作，只有教授或工程师才能知道是否合适。讓不懂业务的人来做調动业务工作人員的工作，不出毛病是怪事。例如以后学校的人事处就应该由教授、講師、教員代表参加工作。

人事調动上必需在統一的調配下，开辟自由市場可以有兩大好处，首先可以人尽其才，因为統一分配的工作往往不可能照顧到每个人的特点和特長，另外需要質量較高的机关和学校就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得到較有才干的人。其次可以防止官僚主义和迅速改进工作，如果某一机关的官僚主义太严重，工作人員的流动一定很大，这就便于揭露矛盾和改进工作。

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最好采取分配、征聘和自由选择三种办法相結合。个别工厂和机关可以直接到学校招聘和挑选，学生也可以自由应聘，对無处应聘的人，国家应提出方案，由同学自由选择，保証每人都有职业，最后如果所有工作都不願去或不合适，即可以自由选择其他职业。一些对用人質量要求較高的机关学校，在选聘人員时要经过考試，当然这些机关学校的工资也要相应的提高。

在实现人力自由市場时，工会和劳动局的作用必需重新加以估

計。这些机关必需站在工作人員的立場，維護他們的利益，在这个矛盾中起一个調節作用。”

（北京石油学院 楊延昕）

“可以試行职业自由选择，这样做边区是不是没人去，不会的，党团员可以帶头，还有的人为了搞自己的专业而願意去边区。如果不想干的工作非要别人干，是絕對安不下心去的。”

（天津大学 楊学澹）

“許多干部脱离群众，工作不好，群众有意见，是人事制度造成的。人事选拔由党委领导会产生官僚主义”。因此他主張“自由竞争”“由群众推选”，采取“招聘的办法”这样就可以改变“有些领导干部虽然無能但不犯錯誤，就老是下不来的”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曾紀梅的材料）

（6）誣蔑党的工資政策

“1.在工資标准上，目前表現的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德分配，按‘宗派主义’分配。因为工資是由党、团、工会进行評定的，这些負責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分配必然是宗派主义的。

2.有些老干部無才，但憑資格可以多拿工資，这是‘缺德’。这些人是不占有生产資料的半剝削者’，是‘超經濟的掠夺’。

3.分配上的宗派主义，使全民的劳动成果被少数宗派所占用，再加上政治上的干涉，使全民所有制發展成为宗派所有、少数集团所有，这就会引起公有制的变化，使社会制度的性質發生变化。最后被奴役、被压迫者就不能不以对抗的形式来解决。

4.国家干部的分配原則是‘德、資、才’，这三个比重怎样？是否取消？要同學們考虑。”

“少数高級干部与一般工农的工資相差悬殊，他們可以說是一种半剝削者，如果長期是这样，从實質上来看，高級干部就形成一个特

权阶级，处于剥削劳动群众的地位，而生产资料就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权力，归他们占有。”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顺）

“调薪前很多人升了讲师，应彻底检查党团员是否够条件，教育界和社会比，不平，人民大学更不平。这次加薪政府失去十分之五信用，应根据18.5%平均分配。物价上涨，十分困难，科长以上加薪的应减少18.5%。提学衔的应自报公议，适当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听人家谈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式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但是，今天我们最常看到的译法和最常听到的说法却简单多了，那就是‘按劳取酬’。

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公式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似乎它们之间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首先，如果只说‘按劳取酬’，那么没有劳动力或丧失劳动机会的人怎么办呢？比如说老人、孺子、病人、残废、灾民、失业者等等，这些人不是没有劳动能力，就是没有劳动机会，但是他们都会有生存的权利。所以，从这点看来，前一个公式是比较完善的，因为它强调了各尽所能。

说到这里，我顺便插句闲话：听说农业合作化之后，有些农村青年竟遗棄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父母，理由是‘按劳取酬’；还听说在工资改革之后，有些人嫌自己的级别太低，因而采取所谓‘按酬付劳’的办法——消极怠工。

根据这些，我更感到有必要把‘各尽所能’这句话重新拿出来，并且加以广泛地宣传，使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其次，我看第一个公式中的后半截又不如第二个公式好。因为它只是标明了‘各取所值’，而值者，仅仅表明了劳动生产物的抽象的量而已。究竟这种抽象的量（这些值）是米面还是油盐，它却不能解决，

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劳动生产物的分配一般并不是直接从使用价值(实物)的分配开始，而是从价值(主要是貨幣)的分配开始，人們要想真正得到自己欲求的消費品，还必须通过买卖。所以，在这时，买卖才能解决自用价值的分配問題。

說到这里，我再順便插一句閑話：听说在农村有个別地方，由于粮食統購过紧，留給农民的口粮不够，这时，各戶农民虽然按照劳动的質和量取得了应得的价值，但却沒有得到应得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对于人民的生活來說却最具有实际意义。

根据这点，我又想到，前一个公式的后半截也有缺点。

似乎这样去表述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式最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国人民大学財政教研室副主任 叶华实〔王亘坚〕）

“任何一代都沒有現在小臥車多，一个臥車2万元。如以五千計算即一亿元，这就是国家用費的十分之一，中央机关說凡是坐汽車要拿汽油費，据了解一个也沒拿。”他認為高級干部特殊化，“高級干部实际工資等于原工資3、4倍，故生活腐化的問題很多，对高級干部工資沒什么意見，但其他照顧太多，如住房不給租也是变相貪污，現在貪污已成为一种风气。現在高級干部生活檢討会都不开，不了解群众痛苦，有事靠秘書汇报”。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啓的材料）

“党内领导干部的特权，表现在选举和人事上掌握在党手中。同样工作待遇不一样。軍隊中找爱人穿衣服都是有等級的……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实际不平等，形成分配利益上的对抗的矛盾，沒有真正貫徹按劳分配原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李光济）

“工資政策不是按劳取酬，拿工資高的，不是首長老婆，就是‘正

牌’(指黨員——編者注)。評級不是实事求是，只是几个人搖頭擺尾一說就決定。”“人為什麼發牢騷呢？就是有不合理的問題存在。”

(中國人民大學總務處辦事員 秦榮興)

“在社會主義社會下，以按勞取酬而公開的得到汽車、洋房、高工資等，在舊社會下是公開貪污。這又有什麼區別呢？”

(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地理教員 梁其璞)

“剝削永遠不能消失，領導幹部薪金比工農高出幾百倍，而其創造的價值不見得那麼高，所以仍然有剝削存在。”

(北京礦業學院 李國常)

“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生活苦，而在於太懸殊。有差異就有矛盾，國家現在不是有犯罪嗎？根源就在於生活太懸殊。不消滅懸殊，也不能消滅犯罪。”

(北京政法學院 黃盛業)

“我認為有些不合理的分配……有錢的人生活水平高，沒錢的人還是餓肚子，還有資本主義思想殘余者，當上了高級幹部，生活水平很高，而農民還是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農民喂豬者，吃不上豬肉，這種統購，那種統銷，這種限制，那種是資本主義剝削，弄得各處是包辦代替，而有些是包而不辦，限制過死、過嚴，人民是敢怒不敢言，糧食問題這幾年非常緊張，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當然是我們工業化，但也不能突出的這樣快呢？應當放鬆一點，否則限制過死，會暴動起來的，那時再壓一下，更不好，當然上級考慮到了，但終是不太好的，應特別注意，並且降低幹部生活才好。

(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學生 張炳鈞)

23. 攻击人事制度

目前我們的国家里很流行一种名誉長官制度，这个制度几年来为大力培养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們的吳校長这个在这种制度下培养成長的典型的官僚主义者，身兼数职，無暇兼顧，挂一不周，一事無成，校長数职，四面八方，出路不明，这样一来名誉長官制度應該撤消，挂名校長應該不干。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現行的人事制度也有問題，只強調觉悟高，很少考虑工作負責与否，反正干好干坏都是一样报酬，現行人事制度是憑资历、鉄飯碗。”

“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会助長官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展广偉）

“行政机构比那个国家都龐大，原因在于人事制度，非生产人員太多，人民生活如何不苦。”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人事处好像在群众之上不受群众的监督，是掌握別人，支配別人的机关。”

（北京政法学院 林道廉）

“……如果說宗派主义是造成高等学校中党群关系不好的主要原因，那么，目前高等学校中的‘人事处’又可以說是培养宗派主义情緒的‘温室’。人事处是了解和管人事的，按理也应该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一个干部必須經過充分了解以后才能得到应有的信任和合理的使用和安排。可是，現在高等学校中的人事处，却变成了一个极

其神秘的組織，它有生杀予夺之权，掌握着所有师生員工的命运，但群众对于它究竟如何进行工作，却絕不許过問。教職員工的任聘迁調、賞罰以及毕业生的分配等，事前非黨員的（或非屬黨員而非亲信的）教务長不知道，系主任、教研組主任不知道，一般教職員工更不知道。人事处……的‘材料袋’实际上也已成为每个人的沉重包袱。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材料袋中裝了些什么东西，从而不免时时怀疑和顧慮領導对自己的信任，加以有些人事工作者，态度冷酷，作风生硬，他們把所有党外的教職員工都看成被拿获的階級異己分子。有的人事工作者，甚至利用职权，作威作福，濫用私人，排除異己……总之，今天在高等学校中沒有比人事处更为脫离群众，更为不得人心的組織了，如果說高等学校的党群之間真有一道牆，那么，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人事处就是这道牆的主要建筑者。”

（武汉大学 栗寄滄）

“目前各个具体制度的毛病，这与公有制，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事实是不符合的。我們国家管理制度中存在着用人唯資和过度的相信档案袋等情况。这种只憑档案袋的人事制度不克服，就不可避免重复出現李万銘事件。”“目前我校管理制度中，最根本的缺点就是各級領導非选举产生，而且領導者权力过大，甚至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广大群众对領導的意見沒有一个机构，使他充分表达出来，这种情况使得很多不学無术的人，会担任領導，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評級評薪評学銜产生这么多不合理現象，而教学計劃改来改去越搞越糟。”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郭振淮）

“人事工作都讓党团員做，民主人士提意見，要求民主人士也參加人事工作，我看也对。”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海）

24. 攻击、誣蔑档案制度

“現在的档案制度我們認為有如下的流弊：

一、档案材料的内容大多是干部的一面之詞，很难反映一个人的实际。因此档案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乃是严重的。

二、由于档案的神秘化，替乘机打击报复等开了方便之門，不能認為干部中沒有恶劣分子，他們利用职权和档案神秘化，来达到其卑鄙的目的。

三、由于档案的神秘化，替官僚主义开了方便之門：反正被鑒定的人不知道档案写了什么，掌事干部就可能不慎重的对待档案，不进行細致的分析，对証，調查，而憑印象草率从事。

四、档案神秘化是人們积极性难于發揮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有可能使人背上一个無形的包袱。

五、缺乏群众监督的档案制度与党設置档案的目的不相容。党設置档案的目的是在于使党更正确了解每个人，从而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們的队伍，更加純潔，使每人發揮更大的积极性，但是，上述理由說明了这个目的极难达到，甚至还背道而馳的。

六、現在的档案材料的重要性已經到了这种程度，它几乎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但对被鑒定者却始終不能發表意見。作为制度是不民主的。同时也違背了基本人权，在法律面前誰也不能剝夺对自己的个人辯护权，但在档案面前却被夺了。

基于上述理由，我們要求改进現行的档案制度，具体建議如下：

每个人有权知道自己的档案材料，只要本人要求，就应准其閱本人的档案材料，如果有異議，有关方面应按其要求进行复查。

如果不能作到有要求就能看，那么至少要給每个人看二次：現在一次，毕业时一次。

一切光明的做为总要比神秘的甚至有点鬼鬼祟祟的作法好得多。我們相信共产党永远是光明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大字报)

“我所以要查档案是認為档案是一个人的秘密，是本人的問題，無須掌握在領導手中，这不公道，自己命运应自己掌握，所以每个人在一定时期都有权利要求看一看自己的档案。我看档案的目的是看看党团对我的看法，怕別人冤枉我，我要求看档案，不是要求我自己看，而是每个人都看。”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我們要求廢除秘密的政治鑒定，廢除几个人乱評論一个人的品質，一石头把他压住，并且使他自己对自己是个什么人也莫明其妙。有时背着‘黑鍋’到处跑，受一輩子冤枉。”

(山东师院 大字报)

“人事档案应当公开”

“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基于兩方面的作用：

一、系統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历史情况、工作經歷，优缺点及受过獎懲等，作为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二、审查干部的政治情况，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内部。

前者是内部問題，属于民主范畴，后者是敌我問題，属于專政范畴，前者对本人可以公开，后者必須严格保密。可是現在国内敌我矛盾基本結束，經過肃反、审干，干部政治历史情况基本弄清，人事档案制度第二方面的作用也基本結束了，因此档案材料对干部本人就可以而且應該公开。

至于發現个别干部有反革命嫌疑的，應該由公安部門建立档案进行偵察，这样做的好处：一、可以迅速証实材料的真假，及时破案；二、怀疑未証实以前，不会影响干部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如果把这些材料放在人事档案里边，由于人事部門沒有偵察破案的力量，对于坏人，不能及时查出，对于好人，則使他長期蒙受莫須有的嫌疑，产生

了消极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产生下列主要消极后果：

一、造成人事干部及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

二、不与本人核对，造成某些诬告及误会的漏洞。

三、由于某些领导者对干部的片面的评语，及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影响了对干部的正确了解和使用。

四、形成干部对领导的隔膜和怀疑。

我们要求以理服人，不要以‘令’服人，在新的时期下沿用旧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正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变这种过时了的制度，正是整风的目的。”

（北京大学 江 文）

“档案材料是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品质等方面的综合资料，它是每个人的‘灵魂’，然而灵魂却自己永远不能认识，它却掌握在别人手里。

新的办法是：一、每个人的档案材料应该公开，档案材料应由本人签字同意；二、领导不得私自填写各人的档案材料；三、关于每个人的鉴定，必须公开讨论，取得与本人一致才下肯定。”

（北京大学 张强华）

“今天人都有两个影子，一个是太阳照的，再一个就是人事材料，它不仅跟着你，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命运。……行政部門的人事机构不要特殊化、党化、神密化，应该和其他行政机构完全一样。人事档案和公安系统的档案不应混在一起。公民有权随时看本人的人事档案。”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彙报、档案制度、实际上是特务加黑名单，说了话就放在口袋里（指档案），实际上为了使群众不敢讲话，这是党的政策。”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档案掌握在党的手中，领导上抓住了我們的小辮子，便于进行打击报复。

对党提了意見后，說不定在档案中再加上一条什么，而且一直跟着你跑。”

（北京鋼鐵学院 孙明久）

“档案制度可以不要，并把档案交还给同学。”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25. 攻击保密制度

“一切文件、活动都应该公开，沒有秘密的必要，因为大規模的阶级斗争已結束了，不必先党员，后团员，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 朱荣庭）

“向宗派主义冲去”

“我們要丰富知識！我們要更多的書！

資料室旁有滿房子的所謂‘內部資料’一日本人無知撞入，竟流連忘返，次日又欣然前往，不幸为保管大員看見，盤知我是学生后，把我驅將出来，并疾声厉色曰：‘內部資料’。

退一万步來說所謂‘內部資料’亦不外‘毒’与‘密’。‘是毒’！而毛主席要我們識‘毒’为何‘毒’以决策而攻‘毒’，‘是密’高等学府人大的学生，然而館中的科学文献却对他們‘密’起来，豈非荒唐乎，‘內部’激我憤慨！我怒斥宗派主义是陆薄，是时代的遺塵！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大字报）

“更屢見不鮮的是很多應該能够給党外人士看的文件，而他們不能过目，因为这些文件是內部文件，有些文件(?)非党同志不必要看是对的，我贊成，但我不明白这个‘內部’的含义是什么和他的外(?)是怎样确定的，难道維護党和国家利益并为其奋斗和工作的內部人

仅是(?)那些用秘密的内部文件中只言片語炫耀自己的少数黨員和积极分子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大华)(大学报)

“保密範圍太寬，很多政策都要保密，連實習的工作，時事政策的抄錄都作為保密本收回去，我們是司法工作者，為什麼不信任我們，簡直沒有把人當人，干脆別培養我們，送到邊疆去開荒。”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學生 魏式昭)

“國家統計局過去所搜集的資料，多在保密的招牌下凍結起來，以致人民對於這些材料，無法利用，實為一大損失。統計局的內部資料，幾乎全部可以公開，而不會為國家招來損失。(個人意見，除國防及外交資料外，其他都可公開)現在對於公開這些資料的障礙，是思想上的障礙。即若干領導，思想中還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殘余。(我不說是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我們所說的許多保密資料，都是公開的)這就造成在人民內部，有一部分人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們看得到這樣或那樣的資料，而另一部分人則什麼資料也看不到。我建議，首先把統計局內部人手一冊的那本統計手冊，整理付印，然後把內容逐漸加以豐富，使全國人民，都可享受統計的果實。”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統計系教授 吳景超)

“保密應放寬，不要限制太嚴了，實際有許多並非保密的東西也保密了。許多材料一般幹部不能看，只有黨員才能看，使教員很難聯系實際，也是造成教條主義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王 新)

(四) 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 关于整風运动

(1) 歪曲整風的意义

“整風的意义是：党和国家消亡的开始，任何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消亡过程，党也是一样，那么党將怎样消亡呢？一方面民主逐渐扩大，另一方面需要集中于党的方面事情逐渐减少，最后將达到这样的境界，即党和国家的消亡，这消亡是在国内阶级消灭开始，现在是轉折点，整風是这趋势的开始，整風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講師 章 起）

他污蔑中央頒布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是假的。他說：“校長参加修馬路，也是假的，既然家里有保姆，为什么不帮助保姆工作，来表現自己劳动好，干表面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孟繁森的材料）

整風能否整好，看党組織自己，民主人士說这次整風是种牛痘，我認为是莫大的諷刺。我認为这次整風要‘括骨疗毒’，领导要学习包公那样的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整風是好的，犹如洗澡。但是，我們比外边差的多。党需要好好地洗洗澡，我想借这个机会替党员同志擦擦背，搓搓脚。

我对人民大学整風前途的看法是悲觀的。人民大学是个党员很多非党同志很少的一个大学，所以党群这座牆就很难推倒。

我們从4月份就开始了，小组会开的也不少，但是，除了在談予

盾的性質，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外，根本就未接觸到實際矛盾。我們學校有幾個‘大炮’，但‘大炮’放的也不多。5月16日在北京召開的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有人說他本打算寫稿揭發人民大學的問題，但因‘檢查’很嚴，不能發表，所以，也未敢寫稿外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付教授 汪同祖）

“每個新事物的成長總是受到一定阻力的，現在的整風運動和大‘鳴’大‘放’的阻力，我以為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1. 在國際上，是蘇聯和其他一些國家教條主義式的冷淡。據我所知道蘇聯‘真理報’僅只轉載‘人民日報’一篇社論，關於這個運動轟轟烈烈的情況卻只字不提，或者他們也以為中國大亂了。赫魯曉夫最近在和美國記者的談話中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也不表示明確的態度。

2. 來自中國的一些領導者，現在還有許多高級幹部對整風運動和大‘鳴’大‘放’政策抱有抵制情緒，陽奉陰違，現在人民日報已開始發表一系列的捕風捉影有阻‘整風’的文章。據說（上帝保佑，但願是假的）陳毅等人就是反對‘鳴’‘放’的。還據說（同上）有人製造緊張局勢說‘天下大亂了’，以此要挾毛主席，聲言要毛主席下台，這時目前的整風運動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和沉重的壓力。

3. 來自群眾之中（包括黨員和非黨員）。許多人思想還處於凝固狀態，不理解整風的偉大意義，不能很好的幫助黨整風，反而自相傾軋，製造不和。還有一些投機人物，懷着利己的目的，企圖利用整風這一群眾性運動來滿足個人的欲望，向國家討價還價，不能以國家社稷為重，絲毫沒有主人翁的態度。

還要指出，整風一定要徹底邊整邊改的方針，可是，現在有許多可以立即做到的建議都石沉大海了，這是不應該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魯基）

“從黨中央起就對整風駭怕，不等人放完就布置要‘爭’，李維漢

說：‘很多意見是正確的，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須要研究。’這話不合辯証法，從句子來說，語法也不通，是對全國鳴放的威脅。黨中央如果真正要鳴放，要使李維漢檢討，並給他處分。

修正主義對鳴放來說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這個名詞本身就要修正，教條主義利用它作為手榴彈來與一切創造性的馬列主義拚死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我對整風原來期望很大，能夠通過整風對某些政治制度進行徹底改革，把一部分為做官而來的黨員去掉，把黨變成考試時回答用的那樣抽象意義上的黨。在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前，也的确看到党中央是这样的决心，当时發表許多社論鼓勵鳴放，對許多言論不加批判，周揚就說過一百個文汇报也不怕。当时我想党中央有决心徹底改革。

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特別是六月八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后，我很反感。盧郁文接到一封恐吓信就写社論，林希翎接到的恐吓信也不少，又該怎樣呢？！社論說什麼“物極必反”，“从階級斗争观点重新作結論”，我很反感。实际上恐吓信中批評盧的很对，我不知道盧本人怎樣，但在我們社會上的确有不少那種向党奉迎的人。当时我想写篇大字報，題目是“老爺發怒了”，后来未写，因為想到一個人写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会引起許多人批判，借此当作政治資本往上爬。現在看来，整風最多只会引起某种改良。实际上我們可以容許各种言論發表，因為我們有前提：政权非常巩固，絕大多數人拥护公有制。”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黨進行的這次整風，是在什麼條件下提出的。目的是什麼，

今天黨處在什麼情況下呢？黨掌握了領導國家的最高權力，黨的队伍已經擴大到一千二百多萬人，黨在人民中享有無限高的威信，特別是黨已經領導人民取得了兩個革命的勝利，現在，國內階級已經消滅。

这样历史就向党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它要知道党在几年中领导人民取得了两大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用多少代价换来的，如果别个民族走我们这条道路能不能付出更少的代价（这里插几句话，有人老爱钉着人问，你说说党的工作到底是成绩是基本的？还是缺点是基本的？这实在好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有了这二个事实，还问这些干吗呢？在今天，还逼着问这些问题，我无以名之，名之曰：‘好心的神经衰弱者’）。

也许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你说整风为了总结二个革命胜利的经验教训，这在‘八大’不是总结了么？不错，总结了。但那只是在理论问题上作了总结，至于内容更广泛、经验教训更具体、意义更深刻的总结，却是今天整风运动，并且只有今天的整风运动，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党现在的情况是权力大，组织强，功劳高，人民拥护，这当然都是好事情，可是也有副作用，由于党执了政，掌了权，它的机体和成员也容易沾染和产生官僚主义。由于党的功劳很大，它也就容易骄傲起来，再看不到缺点，由于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在过去大规模阶级斗争中，他们更是把自己的全部命运都寄托在党身上，党有错误、有缺点他们都可以原谅，而在大规模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中，又容易发生错误。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止这一些）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历史的新阶段——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阶段——到来了。党在新阶段中领导人民继续前进，但是要继续前进，就要继承一切需要继承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我们找出党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否定一切应该否定的。然而党今天的地位却使党有很大的局限性，单靠一千多万党员，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于是党提出了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的问题，并且明确说明：所谓帮助就是揭发党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改进建议却不一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来，如果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也不妨拿出来研究、研究，集思广益，党知道任何个人和集团看问题都有局限性，只有发动全体人民从一切角度提出问

題，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才能得出最接近真理的結論。

當然，總結過去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是前進，是發展社會主義，而在階級消滅以後，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從幾千年階級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黨面臨的任務就是這個。這個任務完成的好不好關係着六億中國人民用什麼速度前進的問題，也關係到前進中少犯歷史上已經有過的錯誤的問題（如斯大林的錯誤），並且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建成以後，沒有很好的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對全世界勞動者負有責任。我們要通过這次整風運動，把我們的經驗教訓大大豐富馬克思主義寶庫。

好吧，我的論點大体上是這麼一個東西，現在，我在這個基礎上提幾點意見，請你們參考吧！

一、整風既然是這樣的運動，那末每一個黨員應該象中央所公開聲明過的：只要求人民群眾批評黨，不要求他們作自我批評；只虛心傾聽、研究人民的批評，而不作反批評，既然這樣，在大鳴大放中，我們這一方面應該怎麼辦？大概是嚴陣以待鏟除毒草吧！

二、那麼黨員參加整風就是坐在那裡只聽不講嗎？當然不是。黨員的任務是用自己的積極行動引導群眾大鳴大放，黨員也要揭露黨的缺點，也要公開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不是教條主義的提，而是創造性地力圖發揮馬克思主義，黨員在這些方面應該是最勇敢、最積極的力量。

三、如果是非黨同志不喜歡人們對黨的批評，特別是聽了一些片面的、錯誤的批評，為黨打起抱不平來怎麼辦？這倒是個難辦的問題，也是黨組織對黨員的考驗，看黨能不能在這些黨員中間貫徹整風的精神，誘導大家集中力量揭露缺點。

四、大家都只顧揭露，到處都是缺點，天下不是要大亂，毒草不是要怒放，而敵人不是要利用這個機會來破壞我們嗎？親愛的同志！我們當然不會那麼傻，我們採取今天的辦法整風是有它的物質基礎的，那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家的經濟、國防力量大大增強了，人們馬克思主義水平提高了。特別是階級鬥爭已基本消滅，反革命分子也基

本肅清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怕什麼？怕幾枝毒草嗎？如果幾枝毒草能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敗馬克思主義，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根本不會出現，而馬克思主義也恐怕早被我們扔入垃圾箱了。當然，我們並不喜歡毒草，不過我們今天可以用百家爭鳴的辦法來和毒草競賽，甚至讓毒草起點積極作用，醫醫教條主義的毛病。

鄭天倫等同志們！你們提出的具體問題，好象不只這幾個，可是有些問題我不回答了，我覺得我在上面的意見中實際上已回答了那些問題，當然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還僅僅在開始，你們有興趣再提出問題來，我一定奉陪，實際上可以提出來的問題還多得很。比方說：在整風中，黨員能不能發表‘必須徹底改造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言論，我認為可以。並且要禁止其他黨員給他戴反黨的帽子，而要和他一起用尋求真理的態度去探討，老實說：林希翎在那天會上雖然說了很多看來是不正確的話，她的根本論點我却大力支持。並且我正在研究，林說在鞏固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上層建築和政治制度等許多方面要徹底改造，我說：‘對極了’！為什麼要改！因為基礎變了，並且是根本性質的變，階級社會變成了階級消滅的社會了，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在於變不變，而在於怎樣變，在變當中，是為了鞏固和發展公有制，這就要大家研究，這也是整風要解決的問題。整風為什麼要和風細雨，要準備花上幾年的時間呢？道理在這裏。至於研究得好不好，變得好不好，對於我們這些共產黨員來說，首先要擺脫教條主義束縛，要從實際到理論，從感性到理性，而不是反過來用教條湊事實。有些同志硬要說林希翎想回到資本主義去，因為她說要改變制度，其實她一再強調改變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改，而改變又是發展不是倒退。這些被林希翎吓得膽戰心驚的同志，知不知道‘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看來林希翎的頭腦與有些被教條主義捆住了的同志比起來，要活潑、敏銳得多，她在具體問題上雖然錯誤百出，她却真正感到了時代脈搏的跳動，我堅決支持她到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虞耀麟）

“我們現在正处在各种發展的質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馬克思主义复去复来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諸如此类，在世界範圍內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兩条战綫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滲透，在这偉大的轉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組成百万大軍：

(1)那些認識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那些無辜的被損害者。

(3)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

現在要分清楚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們自会分道揚鑣。过早的作各种猜測怀疑是最坏事不过的。

这支百万大軍在一切領域內各有自己开辟的道路，誰要攔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

我們——青年同學們應該屬於第一种人。我們有責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們亲爱的毛澤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們有責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領導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北京大学 譚天榮)

“‘五、一九’运动(北大右派分子1957年5月19日、开始点火到处貼大字报——編者注)，是新的‘五四’运动，是現阶段的馬克思主义啓蒙运动，它是在‘二十大’号召下产生的，它是在‘匈牙利革命’（卡达尔領導工人階級，推翻拉科西和西方反革命走狗）号召之下發生的，它是在我們的‘人大’和英明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声炮响下發生的，毛主席的兩個报告給我們送来了現阶段的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 龙英华)

“有人怕放是‘誘敌深入’，寻找整的对象，而不敢放，不敢鳴；也有人怕放了不好收，怕別人借放的机会来报复，給平时爱扣帽子的积极分子潑冷水，打击他們的积极性。所以現在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势，

群众又想放，又不敢放；领导也准备放，又怕出乱子。现在是演三岔口，领导与群众都在黑暗中互相摸索。

（湖北医学院 花信良）

“整风——民主运动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反映，这场运动就其主流来看是一场‘三害分子与民主分子’的斗争，在前一种力量中有正直而受骗，奴役的人，后一种力量中也打入少数真正的右派份子，例如李康年，此乃对立之相互渗透这一普遍规律的表现。

现在整风——民主运动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三害分子借右派分子为名，对民主分子（例如储安平）实行反扑是以缺乏理智为特征。”

（北京大学 谭天荣）

“整风还不是那么回事，整来整去，三害反正存在，到共产主义还存在。

在延安整风以后，就杀了一批，什么整风，分明是抓反革命。

要反右派就反右派，何必要整风的花招。”

（俄语学院 丁北海）

“目前主要问题在党中央，矛盾这样多，中央看到了，但根本无法解决，整风是缓和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整风运动不能推广到农村，否则非乱不可。”

（北京钢铁学院 张志芳）

“有人认为党这次开展整风运动是出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统治者基于统治危机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借此缓和即将到来的崩溃，我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外古今都没有看到这样政权，便衣警察遍地皆是（某教授的发言）不准人民发言，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可是还说这是什么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宪

法是一紙空文，早已被某些統治者丟掉了。”

(武汉大学 張洪麟)

(2)“整風是思想上的解放”

“49年是政治上解放，这次(指整風——編者注)是思想上解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展廣偉)

整風开始后，他写日記說：“我的心情才感到可以自由呼吸了，在我国真正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今天才开始，这种自由的获得是以不自由为前提为代价的。”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的材料)

“这次整風党給我們言論自由，过去言論自由不够，現在党的威信不是無限增長，而是停止着，黨員的言論行为引起人民不滿。整風眼光应放远，因为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真沒有想到整風象今天这样的开展，当时是說和风細雨，欢迎群众参加，今天是不用欢迎自己搞起来了，声势真是浩大，从北大到人大，大字报的形式，火力真足呀！諷刺的針药注射到大腦皮質立刻見效，只有这样才能攻倒‘三害’的老巢，挖根哩！这种形式恐怕中央都沒有想到……形势还要發展，要發展……学生搞起来比民主人士厉害，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还不摸底，他們熟悉历史上执政党的脾气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宗派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彭程)

“現在只讓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帮助党整風。我相信人民大众对党比知識分子更有意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榮)

(3)歪曲鳴放政策

“这是繼匈牙利事件而进行的，鳴放政策已提出很久了，为什么現在还没鳴起来，主要是几次运动使人不敢講話，怕一棍子打死。鳴放可能是策略，是釣大魚，是聚而歼之。”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整风是一种策略，‘誘敌深入，一棍子打死’。

整风开始时，党委請大家講，打躬作揖，不講还算落后。既然講嘛，当然原形毕露，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反党的，都講了出来。言者無罪嘛。現在却来了这样一下子(指反右派——編者注)，这太‘那个’了。同目的、手段等等联系起来看，党連信用都可以不管。”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許惠尔)

“要把真实情况告訴人民，徹底改革發动人民来討論，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讓全民提意見尽情的提。現在的‘鳴、放’这只是上層，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說，为了巩固他現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鬧翻，要广大群众討論提出意見，再綜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現在开始鳴、放了，但阻碍非常之大的。民主人士座談后，鄒副校長召开了会，說这对同学是很好考驗与鍛煉，可分三部分，对群众是很好考驗与鍛煉，共青团三次會議也提出了。我們帮助党鳴、放这是帮助党改正錯誤，这当然是考驗。我認为对領導也是考驗，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提出鳴放問題时有90%不同意，在民革小組会上有人退席，說明主席提出的方針阻力非常之大的，作为党中央決議这90%人在对此問題是否通了呢？說明我們目前还存在很大压力。目前鳴放除南对我们还感兴趣外，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很冷淡的。我們知道陆定一报告苏联即未翻出，說明主席方針并未为全国人民所了解。联系到我校情况对此方針亦理解不够，鄒副校長报告中还要求

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我校同学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北大先搞起来了，交流一下經驗为何不可以呢？無怪前一时期北大来人找我傳達室又打电话又干什么的不知是否与保卫科联系的，这说明是有因果联系的。我校党员多在此运动消沉，彭真曾講党内無爭鳴，这話不知彭真講了沒有，学生鬧事，現在不是鬧，是帮助党除三害，如不讓整的徹底，干脆別整，这需要大家斗争，需要举起党中央的旗帜，每个真正爱国者应在运动中积极参加不应冷淡。

还有一种謬論应反駁，有些人向党中央乱彙报，說乱的很。北大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当然大字报中也出現了些偏激現象有人說这样下去会發生像匈牙利事件，这些种精神衰弱的人需要吃一粒定心丸，大家知道匈牙利事件錯誤有其内外根源在，在我国根本不可能發生此事件，神經衰弱的患者們可放心！”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党中央办公厅轉

毛澤东同志：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两天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今天在我們中国人民大学，党不是在發動群众帮助党整风，党是在整学生的思想。

我們学校中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是5月27日开始的，到今天才是第四天。从整风开始的第一天起，同学们就表现了极高的热情，每天深夜十二点鐘，还可以看到許多同学在写大字报，揭發党的缺点。可是，也就在这几天里，我們学校的整风运动，遭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

在学生参加整风运动以前，我們的學生党员并没有很好地、有組織地学习党的整风指示，党委也沒有教育党员怎样参加整风（当然一般性的号召鳴放的會議是参加过的）。不仅这样，在整风开始前一天，当校内接到‘北大同学可能来人民大学活动’的消息时，校党委竟錯誤地布置：‘如果北大同学要不講理，散布反动思想，可以把他們轟回去。’在这以前，聶真副校長也在大会上宣称：‘北大整风搞乱了，出了

偏差，各种反动口号都出来了’等等，对北大整风方式，完全否定。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是很多党员在整风到来时，缺乏思想准备，不仅不倾听群众意见，鼓励群众消除顾虑，大胆鸣放，一般地却是处于备战状态，严阵以待，一心一意除‘毒草’。

于是校内到处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人贴了一张广告，预告某日某时将在某室举行演讲，题目是：‘党的危机’，还刊出了简要提示，可是講演还没有作，不少党员（也有非党员）已经在那广告旁边贴满了驳斥的文章，大喊‘党没有危机’。不少党员看到不合心意的大字报，脸立刻铁青起来，在群众当中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冷嘲热讽，嘔嘔不絕。

在这样的空气中，同学们的顾虑不是日益消除，而是日益增加了。人们只能对学校里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意见，至于严重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就很少人敢说了。

不过，学校中也有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勇敢的人。法律系的同学林希翎，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揭露了党的工作中不少比较严重的缺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的意见中，有不少正确的东西，也有极多看来是不正确的论点。但不管怎样，她那种大胆揭发、独立思考的精神，正是整风中特别要提倡的，坚决支持林希翎，就能启发同学们进一步打消顾虑，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然而，我们的校党委却不这样做，而是接受了一部分同学的意见，让学生举行了一二千人参加的辩论会，辩论林希翎的思想。

实际上，这怎么能算辩论会？！林希翎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又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看问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她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接触的问题，涉及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要驳斥她，当然有很多可以驳斥的地方。我们就这样在一二千人的大会上，一字一句的去驳斥这一个非党非团的姑娘。并且很大一部分驳斥者，还常常歪曲林希翎的原来精神，断章取义的批驳。于是，辩论会基本上成了斗争林希翎思想斗争大会。这个会开了两天，其后果是给许多想鸣放的同学的心头籠上了暗影。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整个情况。

敬爱的毛澤东同志,我建議中央立刻派出檢查組,檢查高等学校中的整風情况。在我們人民大学,在很多黨員中,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緒,仍占着統治地位。这情况不改变,整風运动無法开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虞耀麟)

“整風来得好(即鳴放来得好——編者注),你看过去領導上害死好多人,要不整風(鳴放——編者注),領導上將會害死更多人,解冻社的鳴放来得过癮,一声稱贊好,以后多来几次鳴放,以便对領導提出意見。”

(中南矿冶学院 段昌孝)

“大鳴大放,就是叫一批人下台,叫另一批人上台。这次大鳴大放,凡是提出有缺点的,都要下台,如果只作一番檢討,干啥的还是干啥,我們还鳴它干啥?”

(西安师范学院 王捷三)

“大放大鳴是讓我們有吐出心中苦水的日子,讓曾經被所謂积极分子任意折磨摧殘过的人們得到重見天日的时候。”

(中南矿冶学院 符致芝)

(4) 誣蔑党的整風是緩和矛盾

“整風是共产党緩和矛盾的一种方法。共产党企圖通过整風来維持一党專政。党和人民有距离,人民是要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在人民的压力下才提出了整風,矛盾已經达到頂点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对共产党看透了,党的整風是为了緩和一下矛盾;摸摸知識分子的政治面目(意思是整風是一个阴谋,党讓反对自己的人暴露出来,再处理他們——編者注)。这是为以后鳴放开辟道路。整風后不知

要捕多少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 江譯純)

“人民覺得黨不對要整風，大勢所趨，民憤很大，壓制不住，應放放冤氣。”“多數黨員和‘大黨員’的錯誤就等於黨的錯誤。”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這次整風很必要，黨現已面臨危機，如當年太平天國的末期一樣。”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整風聽說這是為了把共產黨整好，這自然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已經壞了，至少是有的地方壞了，或者是一部分壞了，究竟壞到什麼地方，壞到什麼程度，這都是保密的。說什麼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我看最確切地說是腐化。

我無味地參加了‘提意見’的座談會，似乎可以理解共產黨的一片良心，他們願意把自己的缺點改掉，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為着不在人們面前丟臉”。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黨這次整風是不整不行，是群眾的要求，是客觀形勢逼出來的。”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許惠爾)

我認為黨碰到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這個危機是與絕大部分的黨員的變質聯繫着，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如不整風，就沒有辦法解決這一危機，因而整風不是黨的正常的政治生活，而是解決危機的一種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學語文教員 白楓)

“現在(整風初期)好象處於波蘭八中全會前夕。毛主席的百家爭

鳴方針沒有得到党内90%的高干支持，因而拿到群众中来讓群众討論支持”。現在許多問題要重新估計（意思是說过去对許多問題都估計錯了——原編者注）。

“整风运动實質上是我們領導的，人大之所以搞起来是由于法律系搞起来了，而法律系是由于我們貼了几張大字报，运动就搞起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胡大展）

“49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見，現在有这么多意見。

三害除不掉，汜濶即到，挽汜濶即到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是被汜濶冲走，贗身魚腹。聶校長說报复不能保証沒有，但發現有报复，党組織要制止的，即便將來受到报复，我們为了国家，也要大放大鳴，孙中山先生和李大釗都是不怕牺牲的。

經過这次整风，党内同志都会清醒的，不会破坏党的諾言，如果要打击报复 应想一想，結果如何？那是自絕于人民 同时再要打击报复也不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今天共产党变质了，如同各个封建黃帝一样，开始好，以后就要变质了。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能为老百姓着想，現在就完全不同了，共产党如果不整风，不發劲大家鳴放，就会垮台的。”

（中南矿冶学院 欧阳淳）

“再不整风中国將非常危險。农民有許多是吃不飽的，如果逼得他們起来，問題就非常严重，党员們的性命都有危險，應該猛省。不要苟安。”

（北京大学 胡稼昭）

“今天不整风不行，不然到处都是罢工。現在三风比国民党还厉害。”

（北京矿业学院 崔連凱）

“为什么那时肃反呢？现在为什么不肃？整风是历史發展的必然性，是有波匈事件的血，而不是恩賜。”

（北京大学 楊 路）

“匈牙利事件对中国影响很大，再不整风不行，整风可以使人喘一口气，和緩一下矛盾。整风领导沒有决心，应对领导加压力。”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5）誣蔑党对整風缺乏誠意

“听聶校長报告有感（虞美人）”

“小脚男人何时了，春風知多少？

昨天广场又动员，运动尚在虛無漂渺間。

障碍顧慮依然在，只是語調改。

問君何时下决心？

是否要留‘英名’重‘丹青’？”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我們支持到社会上去这一意見，到社会上去并不意味着去游行，胡說乱道，而正是因为我校整风运动的开展落后了，要到社会上去学习整风經驗，取長补短，以利我校整风运动，所以我們支持他們。

要沉着，要有准备，要建立基地，要抓住主要方面，不宜操之过急，我認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充分揭露我校矛盾，冲垮我校的堡壘，用大炮轟醒还在酣睡的人。

要大胆揭露党的缺点和錯誤，但需要大家都动起来，揭露的才深刻广泛，不要只指手划脚，就請你动起来揭露吧！

人大整风明明落后，鄒校長死不承認。如众目所共睹北京高校已进入高潮阶段，到处风声鶴唳，草木皆兵，三敌为之惧怕，庶民为之高兴，而我校却死气沉沉，毫無风声，党委抱定自己‘计划’，唯恐‘乱放乱鳴’，光明报、文汇报、大公报、广播电台都已向我校提出批評，校領

導諸首腦置若罔聞，前日北京日報向我校大聲疾呼‘人民大學趕上去’，試問我校領導作何反應？

昨日鄒校長為‘市委決定’所逼，為形勢發展所趨，不得不發布學生開始整風，但始終對我校整風落後不敢承認，一二九時代你出生入死，抗日戰爭時也曾衝鋒陷陣，試問今日整風中又為何如此‘畏首縮尾’。”
(中國人民大學 火箭)(大字報)

他認為校黨委領導上對整風“缺乏誠意”，強調“整風就是只提缺點，否則就不符合中央整風精神”，主張設“自由論壇”，並貼大字報，要求“拋棄大民主小民主的不恰當的概念”，“反對把人民的民主限制在小民主的範圍內”，“壓制民主的錯誤口號應該以正確的方針政策與工作作風來教育人民自覺的爭取恰當的方式來行使民主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鍾溶華)

“和風、細雨，細雨、和風，有意見你提吧！領導上保證接受，什麼時候改，這需要領導上慢慢來，安心學習吧！——讀書就是愛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童金懷)

“整風中黨不放手，壓力大，整個社會對黨有意見。現在，是不是能放手發動群眾提意見，是考驗黨的時候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福榮)

在青年報上有文章說小資產階級看問題有偏見，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資產階級的片面反對官僚主義。我看偏見只要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都有。主席沒有偏見還革不了命，赫魯曉夫的報告沒有偏見嗎？工人罷工沒有偏見嗎？工人最有偏見。工人對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滿。我國五億多小資產階級，五億人不反對官僚主義，什麼人反對官僚主義呢？五億小資產階級總比官僚主義好的多吧，五億人總是寶貴的，除開五億，剩下一億，這一億中真正的產業工人沒有許

多，工人和小資產階級有很多聯繫，這樣歸根到底只剩了領導者。這個論調等於不讓大家反官僚主義，我說：反官僚主義人人有責，甚至是反動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粉碎清規戒律”

“我們堅決反對在整風運動中用各種方式方法，別有用心的為黨的缺點作掩護‘御林軍’，他們雖（提）出‘集中問題’‘明確重點’等等形形色色的清規戒律，他們企圖把黨員存在的嚴重缺點與黨組織機械地割裂開來，而自封為運動的指揮官。偽‘君子’們！‘趨炎附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站起來的群眾，必將用正義的巨掌，揮真理的利劍，來粉碎你們顛倒歷史的幻想。”

（中國人民大學 當頭炮）（大字報）

“反對‘兩階段’論”

“前天鄒副校長報告中說，我校整風分兩階段進行：

一、大放大鳴階段；

二、和風細雨的处理阶段。从我校刚开始揭發的問題來看，有許多問題是既有可能，又須立即处理的。如主張‘兩階段’，就會失去對問題处理的及時性，並會成為官僚主義者的擋箭牌。”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鄒校長聲色俱厲，大會上宣布了三條戒律‘第一不可參加遊行’‘不要把事情鬧到校外去’嗚呼！這多么荒唐的邏輯，憲法規定了公民有遊行的自由，毛主席說必要時也可以採用這種形式，為什麼鄒校長別出心裁，想出了這絕妙的主意，莫不是怕家丑外揚，莫不是怕暴風雨打翻了官僚主義者的坐椅。

鄒校長宣布第二個戒律‘不許停課，不許耽誤學習’，同學們听此言面面相覷，看不透校長的神妙玄機——上課時想整風，整風時想

学习，真所謂学习整風兩不悞，我們的办法具有典型意义。

鄒校長宣布第三条戒律‘不准打架’，叫人听了好笑又好气，我們是毛主席时代的青年，十余年来党把我們撫育，把这一条算作戒律，那是多么可笑，滑稽！

多亏鄒校長煞費心机，想出了輝煌的戒律。”

(中国人民大学 刺蝟)(大字报)

“要求和風細雨的人是俗人，是封住人們的嘴。”

(湖北医学院 陈 达)

“党委整風沒有决心，他根本不想領導好这次运动，它之所以这样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以前在各次运动是他整別人，而这次运动要搞在自己头上来了。整風是群众自觉的运动，现在是群众推着党团領導走。

.....

高院長講百家爭鳴，实际上是二家爭鳴（馬列主义与非馬列主义）是压制大家鳴放。”

(北京鋼鐵学院 沈浩然)

“十天中，我校运动是民主运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它自下而上的一方法，这运动是符合党的利益的，党中央是同情的。目前民主运动已处于沉靜状态。根本原因是感情高潮已过去了。自由空气的形成，自由权利的获得是十天来的主要成績。林希翎对造成自由討論的空气很有帮助。

我是唯心主义者，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應該同意我們的。”

(北京大学 楊 路)

(6)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

“……葛佩琦与王德周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講師。我們与他們的

矛盾，应当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我們应当帮助他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們还是应当从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出發，来做这一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教授 吳景超）

“对毒草应說服，即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以理服人。我看人民日报的社論有压服的味道。”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許惠尔）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發表后，田認為左派能从报告中找到論据，右派也能从报告中找到論据，并說：“放鮮花者不一定是劳动人民，放毒草者不一定是右派和敌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田怀玉的材料）

“右派分子是思想問題，是人民内部矛盾應該說服教育，和风細雨来使右派改变認識。”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海）

“社会主义与等級制是分不开的，一切根源在于經濟上的不平等，在一个人的經濟狀況极为富裕远超过群众的情况下，他的意識形态也比常人不同，……正像自己比別人物質財富多一样，人們通常把取得地位名誉做为富的手段。人与人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矛盾，当一个人富的形态建立在另一人不富形态时，矛盾就具有对抗性，必然以对抗性方式解决，而經濟的矛盾是各种矛盾的基础，要解决根本問題，只有在經濟上的真正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胡仁生）

“我們和右派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階級斗争，所以根本不应该提到判罪不判罪。”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是组织上的反革命我们都应视为同志。右派分子的言论可以批判，但对其人还是我们的同志。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原编者注）。批判章罗没意思，他们是政客，我们又不想做政客。批判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过火啦！谭天荣是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他自杀了怎么办？人民日报揭发黄绍竑、龙云的罪恶历史没意思。这几个右派分子不值得一驳，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反三害。我校反右派斗争方式简单，态度粗暴，只会扣帽子，喊口号，党委做法过火了，毛主席一定不同意社论，社论搞错了。”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应该是合作的，不应该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将共产主义发展到最理想阶段，人与人之间都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

（北京大学 杨路）

“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之点，1949年后，共产党有忘本的倾向，其原因是由于死扣苏联的教条，甚至比这种教条更严重。”

一切阶级社会都有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他们的具体利益有矛盾，如：谁的生活先提高？提高得快？工人阶级大权在手，农民权力不大，工人就提高得快。

共产党片面地考虑了工人的利益，对农民照顾不够，农民又没有党。

工农的矛盾体现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党内党外的矛盾。

工人阶级有本身自发的经济要求，工人阶级不能等于马列主义，工当人阶级的弱点得到发展，而马列主义受到教条主义的歪曲时，工农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南、苏、波、匈的事实均表露了这一原理。

党有其具体利益。沒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党员与其他党员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经济成份，农民党员与农民同甘共苦。而其他党员中，一部分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部分是等人家把天下打下来了，来个先天下之乐而乐，他們有各种特权。

工、农之間有着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可能根据其历史經驗教訓来解决工农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發展为农民暴动，因为工、农的长远利益一致，同时农民最有忍耐性，不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是不会暴动的。

应当發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少利用农民的弱点（不会暴动，不会提意見，沒有党）……

高級知識分子薪金高，他們与工、农的差别应当降低，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民主人士有职無权，宗派主义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总务科办事員 秦荣兴）

“現在可怕的是个人崇拜問題，从好的方面說，行动起来有力量。但有个人崇拜問題，人民内部有些問題就不好解决，这是共产主义向前發展中碰到的問題。如把人民内部問題当敌我矛盾問題解决，当被鎮压的人錯了，還沒什么，当被鎮压的人对了时，他們就不能反映正确意見。苏共是这样，中国也有类似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人民（劳动人民）内部也有对抗性矛盾，例如人民与官僚主义者之間就有对抗性矛盾。”

（北京航空学院一教授）

“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与群众之間的？为什么人民内

部可能成为对抗性的？而这种对抗性只产生在领导与群众之間，而不在工人与农民之間？为什么矛盾产生在經濟問題上最突出……答案只有一句話：由于领导与群众不是属于一个階級，因而产生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独特部份即階級矛盾……怪不得有些人認為目前我国公民分成三个等階級：一等是有职有权的‘当权派’，二等是有职無权的，显赫名流’，三等是想呼‘小民’矣！特別器重，‘显赫名流’（或者說成热衷于‘树立旗帜’）的作风不能算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官僚主义，無以名之，名之曰：‘大头主义’。”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我国除了工人階級和非工人階級的矛盾外，社会上还存在着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由于經濟地位不同或其他因素）和分化后彼此产生先进和落后的性質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現在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工人階級分化出来的领导人是工人階級中的先进者，是矛盾中的先进方面……但矛盾要發展，由于經濟地位的不同等原因，这些领导人又可能發展轉化为矛盾的落后方面（个别品質墮落除外，只談全國的），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發展（例如匈牙利事件，斯大林个人崇拜……）……工人階級中絕大部分就突破这种生产关系的束縛，甚至这种突破以对抗形式表現出来（例如波兹南、匈牙利事件）。”

“矛盾只有程度不同，任何矛盾都是对抗性的，毛主席提出有非对抗性的矛盾，不是事实，而仅是一种手段。顧名思意，矛和盾就是对抗性的，如果不是对抗性的，就不能叫做矛盾。馬列主义有时就是不实事求是。”××說：“毛主席这样提又是自己打嘴巴嗎？”赵說：“那当然囉。”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的材料）

（7）歪曲矛盾性質的轉化

“有人提出我們現在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沒有領会我的意思，我沒有这样說。現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長期不解决就会成为对抗性矛盾。如波匈事件，我国的工人罢工等，就說明了这个間

題。我是希望在未轉入對抗性矛盾時，就把它解決。現在我國是穩定的囉，我認為這穩定是相對的，如果不整風，不克服，發展下去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格羅、拉科西就看不到這點，我們毛主席看到了，赫魯曉夫到現在還不承認人民內部矛盾，承認不承認吧，客觀就是存在。”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8）攻擊積極參加整風的人

“黨對黨員不應給任何約束，黨員應以百家爭鳴的身份參加整風。”“整黨沒保證，放到一定程度就要收，收了就要整。說話要小心。”

“人大領導整風沒有決心。被整者領導整風有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是歷史上沒有的事，是天大的笑話，也不合乎邏輯。”主張成立“人民內部矛盾委員會”要求中央派代表團領導人大整風。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潘世元的材料）

“整風主要是解決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為什麼不讓黨員提意見，先黨外後黨內的決定是錯誤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潘靜成）

“黨內外有五種人對整風不積極：第一種人是老干部，怕扣帽子；第二種人是得寵的，過去也許是放大炮的，可是一旦得寵就患得患失；第三種人是犯過錯誤或有歷史問題的，因為自己有小辮子，怕被別人抓得更緊；第四種人是新黨員，怕人說剛入黨不懂什麼就給黨提意見；第五種人是想入黨的，也不敢談，怕入不了黨。”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黃乃畊）

“那些說舒服話的人說：‘放夠了’，這是給黨送桔子汁，甚至是給黨同志捶腿。有人還是說沒有牆溝，不知動機何在，已是司長參事還要往那兒爬？……這種參事應該處理。”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教授 李景漢）

(9) 主張狂風暴雨

“向党提意見不能要求实事求是，應該有什么講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惠貞)

“由于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經濟基础發生了深刻地变化，与此相适应的上層建筑已不适合基础，解决的办法要根本改革，‘要拆房子’，改革的方向同意賀安的双軌一貫人民代表大会制。”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

“这是第二次‘五四’运动，是爭取民主的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在一定时期可以采用暴风驟雨，对中央施加压力因为中央很多高級干部对大鳴大放想不通，有抵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

他反对整风和風細雨的方針，提倡“非掀起一个轟轟烈烈的大运动才能解决問題”，光講和風細雨不行，要象‘三反’，‘五反’肅反那样該綁的就綁起来”，并說“用游行示威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栢的材料)

“现在是整风，提意見主要是提缺点，可以不提成績，提的話只加个帽就可以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

“这次整风主要是大‘放’大‘鳴’向党提缺点。‘爭’就是压制群众的积极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

“党的整风运动是群众揭發党，过去教育人的人，今天得被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整风运动应该坚决，象三反一样的进行，一个单位搞不起来要处分。”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束洪濤）

“整风不该简单的理解为提提意见，要闹就闹个痛快。整风就是谈缺点，不要教条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紹鈞）

整风运动开始后章認為这是爭取“民主、自由”的“好机会”，認為和风細雨不行，必須来一个狂风暴雨“給党施加压力，給党一些顏色看看”迫使党讓步，以达到“民主、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章金怀的材料）

我校整风以前，田对北大采取“狂风暴雨”形式很感兴趣。鄒校長在我校做了兩次整风动員报告后，田很不滿，認為这是‘釣魚上勾的餌’，不滿意校長号召“大爭”，反对反批評，及提出共青团員的立場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田怀玉的材料）

“有一部分人心里害怕，怕自己黑暗被人暴露，如北大扩展打手，象三青团一样。如去年到玉門有人污蔑說沒有去过，說我肃反时放过反革命分子，真是卑鄙。另一部分可憐光听党支部的話，不听毛主席的話，我的意見‘应开三害控訴会’揭起大家对三害的痛恨，鏟除其根，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如果不鳴放，可以發展到亡党亡国的危險。

如果再不整风，社会发展下去真是危險。

有一部分人是偷偷支持我，不敢署名，希不要做胆小鬼。”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我觉得这次座谈，风不足，雨也不暴。諸位同志，可爱的盟友，昨天有位民盟同志主张收，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李景汉）

“我們学校，对批評層層包圍，步步設防，真是小心翼翼，困难重重呀！批評被一道高牆禁錮在國中，不能乘风破浪，那里还談得上掀起巨浪，刮起狂风。”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和风細雨，不解决问题，过去斗争地主就不講和风細雨。”他要求以暴风驟雨方式停課整风。

（北京政法学院 張敬臣的材料）

“数风来（指武汉大学五月間开始大鳴大放之时——編者注）本人感情已达总爆炸的程度。回忆数年来官僚老爷們的殘酷屠杀，拍馬屁的走狗們（官僚老爷是指党的領導者，走狗是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原有的注）对無辜的人們的迫害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今天还是記憶犹此，血腥未散，真可謂之血洗的时代矣！今天是受害者說話的时候了，我們要报复。”

（武汉大学 陈焘勉）

“过去是暴风暴雨，这次为什么这样‘压’，我們学校的党很坏，运动搞別人很起勁，搞自己就不干。”

（湖北医学院 李雨亭）

“过去土改、三反、肃反都是狂暴雨地搞为什么偏偏这一次提倡和风細雨呢？这样作是阻碍‘鳴’‘放’，只会使邪气上升。”

（湖北医学院 袁肇金）

“帮助党整风等于作‘电休克’，要刺激党的精神，可能治好，可能治死。”

（湖北医学院 朱裕璧）

“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訴苦运动，共产党把我们当牛马，当奴隶，这几年来压得人不能抬头。我们不是馬列主义者，只要是思想上想到的就提，向党进攻。”

（湖北医学院 潘其隆）

“过去是有苦沒处訴，今天真是到头啦！党不整风真难保不發生匈牙利事件。”

（湖北医学院 罗秀蘭）

“以前干部彙报，现在是我們的天下，該論到我們来整他們（指干部——原編者注）了。”

（湖北医学院 吳允鑫）

“肃反是党整我們，現在整风是我們整党。要提意見就要搞垮，不搞垮会报复。打蛇要打死，不打死还会要咬人。”

（中南矿冶学院 蔡承云）

“党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須用暴风急雨方式，一棒子打死才痛快。”

（中南矿冶学院 符澤华）

“要整就先整头子，其他嘍囉就不敢講話了。”

（中南矿冶学院 張耀华、朱德君）

“我們这一回把党员搞下来几个，……科以下群众我們不管，我們的目標是对准党及党员。”

（湖北医学院 袁肇金）

“整風是改良……整風只能緩和矛盾，不能根本消除三害，要解決問題必須大風大雨……”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10）要向黨算賬

整風開始即認為是其“出頭的時候了”。他曾寫詩：“五分誠可貴，時間價更高，若為整風故，二者皆可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韓平希的材料）

“組織對我不公平，多次整過我，現在我就該整你們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助教 孫國梅）

“關於整風態度問題。在整風中我們不是向領導要求什麼？而是要看一看今天主人作的事情滿意不滿意。如果領導作不好，不僅應受到批評，而應受處分。校長做錯了可以辭職或自請處分。科長也是一樣。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領導幹部、校長是經理，現在是東家向經理算帳的時候了，是分清責任的時候了，而不是像校長在整風動員大會上說的那樣，大家提提意見，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就解釋所了事的。我認為校長整風態度不僅是扭扭捏捏，而且是穩坐秦山。我希望胡校長表示態度，不要坐在上面安然不動，而要動起手來，帶動各系，

高教部整風應開門，我校整風也應開門。”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提起整風，叫我想起47年的整風，因為那時我小，不知道這是整風，而事後才知道的，不亞於衙門的官老爺和差役在對待犯人，拳打腳踢是輕的，皮帶抽打也是家常便飯，吊打活埋是不足為奇的，假如那時你流一滴眼淚，就會遭到同樣待遇，被認為階級異己分子，那時的人們是由南海北來的青年，集聚在山地都是為了參加革命，但都

遭到此后果，愚梁自挂者日有所見，当然这是也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而大多数是好人，而今天我問到他們当事人往事时，他們說：單位領導上的錯誤，而肅反又何常不是如此呢？都是自己人，却指狗罵鷄。我不指責过去，只提醒人們，不要輕辱一个人。当然，不只是一个人問題，这关系到我們祖國的將來，因为对人的教育是細心的長期非常复杂的工作，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干部實用这些原始的遺留下来的吹、打、罵呢？”

（北京鋼鐵學院 張兴旺）

（11）企圖篡奪整風領導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宗派主义領導反对宗派主义，而宗派主义是不能領導反宗派主义的，三害分子不利于領導整風，必須从运动中积极分子里选拔……”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学生彭程）

“現在党怕群众起来，已不能領導整風，我們应建立自己的組織，發揮大學生的力量，研究整个社会三害产生的根源，青年对国家負有責任，不能辜負历史使命，应尽最大的力量去做，行动起来，到校外去發動群众，

組織機構：报名就算参加，根据不同兴趣，編成各种性質的研究小組，写建議給党中央。

要研究的問題：社会平等問題（高干、低干之間、干群之間、党与非党之間的不平等問題）；民主自由的問題（选举制度、人代大会的权力、法制、工人管理工厂等問題）；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問題、肅反扩大化、保密扩大化問題、胡風問題等）；社会歪風問題（个人主义、入党、吹牛拍馬、向上爬、高干思想腐化过程包括找爱人問題等）；社会制度問題。

步骤：分准备阶段、爭鳴阶段、行动阶段（到社会上去發動群众）；先在本班活动，以后可以吸收他班、他系、他校以及社会人士参加。

注意事項:1.和党团联系;2.和林希翎联系,和校外联系,3.不应在反对宗派主义时产生宗派主义,要吸收党员参加,4.要自信、不驕傲,要做一个政治宣传家;5.适当时机发展扩大组织;6.最后向党中央提出社会改革纲要。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王鸿章)

“如果党没有决心克服三害,不能领导整风运动,所以应该由各民主党派所组成的政协性质的组织来领导监督这个运动。

整风是新的工作,我们没有经验,各种偏差的出现不应归罪于群众和右派分子,而应归罪于党。”

(北京体育学院 李海萍)

“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监视党整风,消除特权,达到整风最高效果,这是合乎宪法的……由中国历史来看,旧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好统治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12)歪曲“三害”产生的根源

“三害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人民大学教员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王。林希翎的报告很大的弱点是概念上非常模糊,概念和逻辑这两个东西是科学的文法语言,概念模糊,容易引起混乱,引起误会。林希翎有的地方观点也有问题。

三害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他们的关系,三害好像一棵树,例子不见得恰当,宗派主义像树根,官僚主义是树干,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都是树枝。现在从我校和全国范围来看,整风锋芒指向宗派主义是对的,把根拔掉,树干、树枝就不再能生长。

三害就是三大害,除此外还有许多小害,不是整风重点。其中值得提出的小害有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在中国不如苏联厉害,苏联厉害

得要命。主要原因，功劳应归毛主席，他非常谦虚，因此，问题没有大发展，但中、小型的个人崇拜还是存在。如林希翎报告揭发指出臧克家到处写文章说，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这例子举的还是很妥当。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讲课时讲到‘工资增长要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听说毛主席说过‘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报章上到处引用，不知这话那来的，讲了好几年。最后，总工会因这八字，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个别同志犯了经济主义，这是中型的个人崇拜。这问题在党员中传达了，有的教员是非党员，结果学生知道了，教员却不知道。这等于打教员嘴巴，这也是保密扩大化的害处，在这点上，个人崇拜完全同意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贺 安）

“我觉得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我不同意把原因归结为旧意识，归结为资本主义残余，那再追上去，资本主义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封建主义还可以追到奴隶社会残余，当然不对。

头脑清醒些嘛，如果说三害与现有制度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拿小孩说吧，他的特权思想能说是国民党蒋介石给他的吗？当然是特权、等级制度他给造成的，可见与现存制度有关。不正视制度问题是不公平的。整风，提小缺点就高兴，提出根本制度上谁也不愿意听，就说是反社会主义。其实这没有好处，三害与现有制度是有关系的。

我国经济基础不是完全公有制，还有私有的残余，我说过，我坚决反对章乃器、李康年之流等右派资产阶级分子定息二十年的主张，现在已经是取消定息的时候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不完全是公有制，分配存在很不合理的现象，还不是完全按劳取酬的。当然囉，生产力低是客观的，有历史原因。

上层建筑中我觉得制度不是空洞的，是具体制度组成的，我现在明确一下，具体制度是有不合理的，应该彻底改革。很多人害怕听彻底改革，其实是神经衰弱，不要怕嘛，党内的文件里可找出多少彻底改革来，这次中央提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制度就是微

底改革一例。以后还要改革好多呢，党对党员教育也需要制度，以保证不产生‘三害’，否则就不行。

革命用不到害怕，革命要革‘三大主义’的命，可怕的不是‘三害’本身，而是产生三害的根源，治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许多人开了好多药方，需要中央最后决定，但是方向必须肯定，方向途径应该是彻底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結合到刚才对我提出的問題：总的制度、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我也给你们一篇文章看看，6月10日沈阳日报二个同志写的‘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论点很好，可以看看……

我国上層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層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緣故。目前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各領域都表現教条主义非常厉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談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人事制度，等級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特别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亲身体会官僚机构的害处，象我的案件就是这个官僚机构的产物，直到现在不能解决。如，北大法律系学生×××曾在过去学生运动中被国民党逮捕十次（指梁質华——原編者注）被当时‘北大’开除，解放后参加解放军，来北京到北大看到某某（开除他者）还是北大的领导者，抓住他要到法院去，但法院为搞统一战线，法官說理不服，使他憤怒的發傳單要求为‘七五惨案’同胞报仇，这样便把他捕起来，押了一个时期，無法判罪又放掉，他还不es服，又發傳單，又被捕，在牢中受非人的待遇，絕食16次（41天），拳打脚踢，逼他自杀，他自己也曾自杀过，但未死，灌肚子，把他放在死刑房內，对他秘密审讯，审讯所是非法的，他是学法律的，懂得一些問題，所以采取对抗便受惨害，曾調查是否反革命，但結果又不是反革命，又不能釋放他，所以說他是精神病作借口，他曾得到四个医院的著名教授証明不是精神病，但被迫到精神病院进行电疗，这是很惨害人的，对这件事情直到现在还未处理好，还在德胜門外精神病院，他給党中央、北京市直屬机关写了多少信，几十万字，抗議北京公安局，但这些材料却轉到原来害人的

机关——北京市监察院，当然問題是不会解决的，我發現这事情写信給中央、吳老、人民日报、刘澜濤，通过了关系才能把信給刘澜濤，这样成立一个專門調研会，直到現在还没处理。

这个有精神病的人却談的很好，邏輯很好，对某某的問題認識清楚，現党中央經過調查答复說：据医生說是精神病，我看这些医生是無天良的，所以以后还要再研究，并將这案交給最高檢察院处理。一个問題是互相包庇、互相推托，秘書真是不办好事，把有些問題压下来許多，不能反映到領導手里，这是破坏。非常不象話，首都如此，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个官僚机构害人不淺，分工不明，这些問題中央看到、牽涉到北京的大領導，無法处理而轉到最高法院。

人事制度，不合理現象，宗派主义反映在此明显，并不是以德才衡量品質，而是資格是否是黨員、团员，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不是現象本身，而是这些現象的懲重者和产生这些現象的条件，有些人把不好的东西归于旧社会，但是就是在新社会里青年提高也很少，希望求知，如听报告、看材料但有等級，为什么青年中存在虛荣、名利和現存制度有关，有些黨員是为了享受特权，而却跑到党内，不入党就沒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团，說你不入党、入团，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决，我听了很生气，要这样我一輩子也不入团。

等級制度：干部發桌子、紙箋都分等級，等級制度已深入到各个方面，我有病要治，但要十三級才行，我憑什么爬到十三級，也不願爬到十三級，有人劝我通过私人关系看去，我不願这样作，产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級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这些小的制度（等級、人事、保密扩大化）組織了总的制度，具体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适应的，是私有制的产物。

我国教条主义的統治在这些方面只是宣傳光明的一面，現在有些人还說夸大黑暗面，說王蒙是歪曲事实，有人說：‘我們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嗎？’这样使單純的青年到了社会，看到这些問題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苦着臉而消沉下去了，教条主义害人一点也不奇怪。

基础改变但思想意識仍是以前的，三害和过去的封建性、买办

性、法西斯性有关，如宗派主义和封建主义性法西斯性有联系，教条主义与买性有关，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谊不可破，但把苏联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讲话就象个打字机，医学苏联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组织疗法害人不浅，无痛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这都是由于处在迷信的状态。

军队学习苏联很多坏处，本来军队是人民最爱戴的，但现在部队改成军衔制，军官薪水大，还不要女同志，我反对这种学习苏联，等级制使官兵关系很不好，这些东西可以举很多例子，现在部队老战士都很有意见。共产主义要根据民族特点，要有民族自尊心。

党中央提出这‘鸣、放’受到很大阻力，主席说90%以上的高级干部就反对，现在也是很多人在应付，口是心非，国外也不支持，除了‘波、南’。主席说：‘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喜欢社会主义’，苏联不赞成我们的整风，不登陆定一的讲话，大登陈其通者的文章，在‘放、鸣’问题上苏联不如我们先进，他们应向我们学习。

我不赞成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隶思想也出现了，要在巩固基础的前提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现在也认识到这点，如现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但这不是唯一方法，这不是根本解决，群众不一定是需要他们来干活，而是需要他们来办好事，当然整风是良好的开端。

.....

上层建筑：我国总的说是社会主义性质，指导我们党的是马列主义性质。我说上层建筑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与公有制根本不相容的地方，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与此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庞大的官僚机构，这是产生官僚主义根源之一。很多问题未得到很好处理，公文旅行，报纸上揭发很多，官僚机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保密扩大化、这是产生三害的根本原因，我们这一代青年基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的，试问在社会主义成长下的小孩他们的思想那来的呢？特

別是高干小孩，四年級有位少將太太小孩比爸爸，成了小霸王了，高干托兒所、高干子弟學校、培養特殊，事實在特殊環境下培養的小孩會成為敗家子，我們看了蘇聯‘審判後的談話’這是生動的例子，我要說明出現三害這與現存制度分不開的。

等級制滲透到各方面，痰盂、茶杯、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表現了比封建制相比不知多了多少倍，這是產生三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層建築方面制度。我認為是具體制度構成的，我不講抽象的，抽象的是回答考試時用的，我認為不要改良主義，要徹底革命，我的‘改良主義’是暫用的名詞。這次整風我認為應徹底、應進行根本改革，要除三害的命當然不是革犯這三個錯誤的人的命。我們要在維護公有基礎上，觸動產生三害的根基，這樣改革我認為已開始，如黨中央提出建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根本制度，這不是唯一方法，這一措施是很英明的領導和群眾能密切聯繫起來。具體內容馬列主義教研室應研究的。我們並不要求市長與我們一起種田，但這仅是良好的開端，以後要建立類似制度。像這樣的國家大事應讓全民討論，把無產階級國家專政陰暗的一面揭露出，想克服辦法應讓人民去想，不要停留在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中，但如不讓群眾討論是不行的。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是老头，老头是比較慎重的，特別是青年人讓青年人說。

與公有制不相容的產生三害的上層建築的某些地方是意識落後於存在的表現，這方面提到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提出蘇維埃政權是在空地上建立起來的我認為是錯誤的，好像是先有上層建築後有經濟基礎似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我國的上層建築，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上層建築包括基本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是優越的，但上層建築和基礎是有矛盾的，上層建築還不能完全反映公有制的，如我國的法律制度。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它有一定的相對穩定

性。

基本政治制度虽好，但制度的某些环节是有缺陷的，如公有制是非常好的，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客观规律，但在实际上貫徹有不合理，如少劳多得的現象，在工資改革后我認为仍不能达到按劳取酬的。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造成社会制度某些环节的缺陷，造成該部分上层建筑与那部分上层建筑不协调。三害从裂縫中产生（但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是复杂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章 齐）

“三害产生的根源是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制度某些环节不适合基础，某些具体制度产生三害。具体制度是：官僚机构龐大，党委有部，政府有科，机构重迭，职责不明，形成無人負責，领导不深入下層，不做实际工作，演說、总结等都是秘書干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謝德鈞）

、“上层建筑某些部分不适合经济基础，应根本改革。如我国国家机关机构中，机构臃腫，人浮于事……等是事实。如国务院有办公室，下有部、司、局、处、科、組、台等，这是太臃腫的机构。机构大，办事能力低，公文旅行是普遍的現象。几个月办一件公文的事实是不少的。这就是官僚主义产生的温床。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可是貫徹到下面就一定会打折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并不完全是老爷們、少爷們、小姐、太太們的自覺行为，而是归根罪惡的制度——把人民分成三部分（党、团、群）分別治理形成不同集团矛盾的結果。”

（中国人民大学 火箭）（大字报）

“‘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具体制度。三害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而且今后永远也不能消灭，到了共产主义也存在。思想認識上的局限性，任何人都有，都有产生三害的可能。共产党内的三害，不是由級級根源产生，某些不同的制度是由三害产生的，反过来，又助長了三害的發展。有領導和被領導就会有三害。”他在檢討中，也承認說：“林說各种具体制度产生三害，这些具体制度，構成了一系列的我国制度，听了她的講話后，我同意她的說法”。他还認為龐大的机构产生三害，三害反过来反影响国家机构，并散布这些反动謬論。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楊盛元的材料）

“为什么党内三大主义有时多有时少呢？这应由党所处的周圍客观条件（如社会制度，党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成就……）去找。社会制度（人为的），有些制度是有毛病的，有的或者有很严重的毛病。这些能助長或减少三害的产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楊学民）

“‘三害’的产生是与制度有关。‘三害’是种子、是根，制度是土壤；沒有土壤种子不可能發芽，根也就要枯萎。”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韓洪楸）

“思想根源主要是主观主义，而与社会制度也有关，有人說只与小制度有关，而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無关，这是不妥当的。小制度还不是根据大制度制訂的嗎？所以三害的产生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呢？硬把社会主义制度說成一点缺点也沒有，这是不对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伍士杰）

“产生三害的根源与具体的社会制度分不开，和党委制分不开，党專权过去战争时期可以，現在应縮小專政，扩大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束洪濤)

“官僚主义产生于官僚机构，现在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现象是普遍的，特别是党委会、团委会、人事部门，许多人没有事做，再没有比他们清闲的了。机构重迭也很严重，这种官僚机构就造成了官僚主义，造成了官僚群，造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惠貞)

“阶级、政党都是为私利服务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阶级专政，宗派主义就难以避免。八大指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就是党的专政。这是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

在我看来，阶级斗争存在宗派主义就存在，阶级斗争消灭了宗派主义就会消灭。因为阶级终究是代表它本阶级私利服务的。说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这对。但是这一事实反映出来就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从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的，如一些党员提级提的特别快，连升三级等。如工人阶级恐怕就不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这是大宗派与小宗派的矛盾。当然，这个宗派是好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何国芳)

“我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封建社会最厉害，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再次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特别突出。因为有它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是以马列主义作指导，这种思想指导是带有国际性的，共产党也是国际性的，尤其是社会主义首先在苏联胜利，人们容易搬他的经验。

从今后发展看，三大主义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消灭，有领导和被领导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是如此，因有这一集团和那

一集团存在。所以经过这次整风就把三害整掉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几百年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在国家机器沒有消灭以前，官僚主义是根本不能消灭的……有小资产阶级的优势分子存在一天，官僚主义就根本不会消灭……

在新型的国家政权下，是一种具有阶级属性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因今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还占优势的关系，现在正在自发的发生着，同时由于某些党员或某些人，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不高，还没有起码的馬列主义武装头脑，不走群众路线，缺乏民主精神，便居功自傲，不管客观情况如何，自以为是的作福作威，高高在上，命令一切，这种新型的官僚主义其危害性是更强……这种官僚主义发展下去，轻则造成本位主义，重则发展成惟我独尊的‘土皇帝’”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郎朗天）

“三害总根在那里？……我认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現存的特别庞大的国家机构的产物，住的楼房太高了，下楼就困难了，当然就会憑汇报电话指导工作發号施令。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的产生是受了历代的統治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好大喜功，不顧人民疾苦的思想反映。”

“但是产生三害不能說与现在的制度没有一点关系，如人事制度是应相信可靠的人，但是光靠党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总的来說，三个主义是和现在的环境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梁彦彩）

“反对官僚机构，是否等于取消国家机构呢？这根本是两回事。也許我的脑子太笨吧！就是不能理解，反对官僚机构本身，就是为了建立健全的国家机构，国家机构应体现民主集中制。比如說‘公文旅行’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呀！还是机构重叠，职权不明等。所以我說官僚

機構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这是不成問題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1.只要有主觀与客觀的矛盾就有主觀主义。

2.只要有宗派存在就有宗派主义。

3.只要叠床架屋的国家機構存在,只要有領導者之分就要有官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章广延)

“公有制会产生官僚主义,集中的計劃經濟产生主觀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我校三大主义,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宗派主义是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温床。解决宗派主义,其他主义就解决了一半。領導上官僚主义,下边有許多人支持。問題在于領導喜欢听好的,对不順自己意願的話不喜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就是領導本身有問題才造成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产生原因是領導不負責任。工作作不好也無关系,反正上級相信我。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就不会这样。”

“宗派主义不是指固定形式的宗派,而是指有些領導喜欢唯唯諾諾、吹吹拍拍的人。所以宗派主义不仅是党群間,党内也有宗派主义。”

“党有不正确的組織路綫,即有些人唯命是从便是好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黃乃畊)

“只要有执政党存在就会有官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若綦)

“‘三害’产生的条件是在現社会当上領導后,即掌握一定的政治經濟力量,而就具有‘三害’的物質条件,使得有可能表現出来。‘三

害’的产生是由于党员领导者享有特权。”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胡仁生)

“三害根源问题与社会制度关系，宗派主义是与以党代政有关。到处都是党员，这样使其他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了。”“我国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我校就是一个大的官僚机构。妇联、工会这些组织实在没有发挥作用，是形式。党过去是与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取得了领导权了，就犯了官僚主义，领导者站在领导角度看问题，这当然与群众不一致，因此，党变质了，不象过去那样艰苦朴素了。”“教条主义的产生和学习苏联有关。一切都是引用了马、恩、列、斯的话，不能独立思考，光是苏联好，这样当然会产生教条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馬 馨)

“‘三害’根源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那兒有組織，那兒有就宗派主义。成立一个組織，它首先就要考虑它的組織利益。这就产生了排外性。党内有了意見分歧，就有了排內性的集团。党就有自己的利益，干部政策是对党、团员照顾多，信任多。官僚主义是与强迫命令有什么我們党执政前就未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没有执政。原因就是关，有了行政权，可以‘命令’。”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俞国亮)

“無产阶级有局限性，也在于论证党不好，找三害根源应从党中央来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士杰)

“‘三害’的根源是——整个党的馬列主义水平不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三害’产生的根源：1.以党代政。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兩套机

構，各級黨越到下層就越以黨代政，妨礙了政府工作的積極性，雖然政府領導大部是黨員，但黨對政府工作人員不相信，什麼東西都要拿到黨委去批准，每一中心工作來到黨委要抽各部門的幹部，要什麼幹部就給什麼說是統一領導，這是黨委的特權思想，龐大的組織機構，重復，造成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今後精減機構出發應把黨的領導和政府工作的能動性結合起來，使兩套機構成為一個機構，也可以發揮黨的作用。2. 等級制度。我們這個社會里等級制度是以政治為基礎，分為黨員、團員、群眾，黨員感到自己高人一等，有些人沒有入黨以前勤勤懇懇，入黨以後高高在上有人說‘三害’有經濟基礎，我想不通，如果要說，是共產黨的領導權，在提拔幹部上黨的宗派主義就不少，對舊知識分子，只是當工具使用，工作有他們，提拔評模沒有他們，使他們悲觀失望，這是人為的等級制，這與中央宣傳工作有關（中央宣傳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3. 三害”是黨員的缺點，黨是由黨員組成的，所以黨員的缺點也是黨的缺點，黨員有缺點不改正人民不是提出來打倒黨員。而是打倒共產黨，今天說來黨的‘三害’是很利害的，黨員的缺點是很嚴重的，為什麼黨不經常整風呢？4. 同意‘三害’是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但制度不完善也是促進和容納了‘三害’。”

（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學生 饒松齡）

“黨的‘宗派主義’是在革命反對反革命的鬥爭的必然產物。”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蔣濟良）

“在階級鬥爭時期，人民為三大敵人壓得窒息，因此為了共同利益人民內部矛盾十分緩和，人民服從貧困，民主範圍狹小，人民不但接受，而且出於情願。但是在目前敵人已經打垮，人民雖然被解放了，然而人民的利益在相當程度相當範圍內受到‘三害’（其實何止‘三害’）侵犯，倘使不解決這些矛盾，人民的不滿，將比武裝敵人的攻擊的威脅大至千倍萬倍，因為黨再沒有力量反抗了。”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現今共产党是否100%的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如果100%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又会有人民内部的矛盾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楊文极）

“党、团、群之划分，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由于领导的文化程度低，来领导文化程度高的，就会产生宗派。如果高的领导低的，就没有问题了，低的领导高的，被领导就不服气。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王福沛）

“……共产党在使用策略，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多么狡猾，历史上没有这样聪明的君主！这样的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还有矛盾，如：1.輕重工业的比重不适合，現在輕工业很多方面落后于重工业，如日用品减少了。工人在生产中是奴隶性等。2.农业方面的矛盾，少数民族組織起来的农业社有的垮台了，說明我国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着。3.商业方面——工农生产品剪刀差很大，使农民吃亏，价格政策不能馬上改变，使生产力發展不能在直綫上升。

三害产生原因：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如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新的与旧的矛盾，这些矛盾从各方面造成圍牆，从而产生三害。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及基础与上層建筑的矛盾，至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还会产生三害嗎？

至共产主义时（世界都是）無共产党了，那时宗派主义無法产生了……即使有也到不了三害，因社会組織面目已改变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章 齐）

“党委制在过去是必要的，現在却不然了。因为共产党是个执政党，一切重大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一切功劳也都归功于党，而作

為他的成員和各級領導人員成為光榮的表現形態。現今社會條件下，經濟的全民掌握表現為執行黨的掌握，而具體是黨委和個別黨員的領導所體現。”“由於是領導力量，一切大權直接掌握於黨委和個別黨員，……群眾是能夠批評它，而他可以檢討，作了檢討就完了。群眾一般對黨員尤其是領導人員沒有制約力。”“現今一切按照黨員而不是工人階級意志辦事。由於生產資料國有化，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在掌握了經濟力量和政權條件下實行黨委制或者首長（黨員）獨斷，沖洗了群眾在歷史發展上的作用，使群眾很難制約社會的一切活動，黨員緊緊把握住生產物質條件，社會的主人實質上是黨員而不是人民大眾。”因此他要求取消黨的領導，說什麼“應該是真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政權也應該屬於人民”。他要求“黨政分立”，“經濟與政治割斷聯繫”。因為“黨委的領導在企业活動上表現為黨員的領導……容易造成超出思想和政治領導而具有一切特權”。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胡仁生的材料）

“分配不合理使人滋長向上爬，升官發財的思想。黨為了保證幹部質量就要盡量使用黨員，于是就引起人們把入黨看成晉升的手段，入黨客觀上也成了晉升的必然步驟。因之掌握權力的黨員就無形中有了特權。加上舊思想殘余就可能利用權力地位擴充勢力排除異己。群眾不敢提意見，無疑與自身利害有關想往上爬，起碼要保護自己的地位。这样就發展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裙帶式的形成與宗派主義總是有關的，這一切直接間接地擴大了官僚機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何世芬）

“簡言之，黨的主觀總是不能百分之百地與客觀相符合，既然黨的主觀與客觀的矛盾永遠存在，那麼主觀主義也將永遠存在，只有黨消滅了，黨的主觀主義才能消滅……既然在黨未消滅前黨內主觀主義將永遠存在，那麼黨在處理黨和其他各民主黨派和黨外人民群眾等等方面的關係就不能正確或不能完全正確……这样黨必然會犯宗

派主义。官僚主义也如是。在私有制社会里，由于人們所处的經濟地位所限制，也就是由于他們所处的周圍的客觀条件的限制，使他們对同一客觀事物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認識……各階級对客觀事物的認識都有一定局限性……無产階級对客觀認識的局限性与非無产階級对客觀事物認識的局限性也仅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仅仅是局限性量上的差別，就各階級都有局限性这一点來說，其本質是一样的。由此可見，我們在找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就不能把三大主义都归罪于非無产階級思想。認為都是党内非無产階級思想作怪的结果是錯誤的，也是不公平的。正确的認識應該說三大主义的产生和党内各階級思想都有关，或者說三大主义是由党内各階級对客觀事物認識的局限性造成的……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有理由說，假如現在在党内一点非無产階級思想也沒有，那么党内三大主义也还会存在……因此，三大主义对党來說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老伴侶，而且会与党長期共存。”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學生 楊學民）

“党有特权思想，在政治、物質、生活上都有，成一种风气或工作路綫。党和群众矛盾很大。党是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等級制度与特权思想，我觉得是今天社会的兩大污点，是一切不合理現象的源泉，而特权思想又和宗派主义密切相关。党远远脫离了人民，尤其农民，已对共产党抱极大不滿，甚至义憤，因之，觉得共产党已經得病，做一个群众，要向党提出忠告，共产党啊！你应当記取国民党的教訓，以国民党为前車之鑒，要警惕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資料員 張紹鴻）

“国家机关的官僚化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都機構龐大，人浮于事的現象很严重，而且存在着党委和政府二套平行的機構。这就更显得機構重迭臃腫。

因为以党代政問題很普遍，这样很多事都由党委作了，政府行政

部門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事可作……

……行政機構是可以大大削減的。現在的一個部有幾千人，一個廳有好幾百人，縣里一個局也有好幾十人……越到上面的領導幹部也就越高高在上了。他們怎能不官僚主義？我看中央的領導機關簡直比以前的故宮還難進。這樣就脫離群眾，驕愈來愈高……”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通過斯大林的問題，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直得懷疑。專政和民主的關係搞不清，斯大林的錯誤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是有關係的，這與官僚主義是產生於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樣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專政的本身值得懷疑的，為什麼監督和法制不能糾正斯大林的錯誤呢？我覺得鉄托提的是有道理的。”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楊一楓）

“黨員以黨員自豪，團員以黨的助手而驕傲，所以出現了如今的‘三害’，如不徹底改變這種帶有遺傳性的頑固的統治基礎，不以廣泛人民當家作主，共產黨雖然謙虛，但也避免不了將來出現四害或多害，以致不可設想的後果。”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政軍）（大字報）

“三害產生的根源。即產生的原因，即找因果關係，應從三害產生的內因和外因來加以研究、考慮。內因是基礎，外因是條件，僅有內因沒有外因不會發生結果，僅有外因沒有內因也不會發生結果，必須內、外因同時存在，才能有結果。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用雞蛋孵小雞，雞蛋本身具有變成小雞的可能性。但不是在任何條件下可變成小雞，要有適當溫度，就是內因和外因可能存在，但雞蛋如沒有公雞受精，給予溫度也不能有結果。

三害產生的內在原因，就是人們的思想狀況，‘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已提到；三害產生的外因有二：一、是環境，二、是制度。環境是城市還是鄉村，是領導還是被領導，待遇是幾級，是七級還是八級。制度就是包括整個基礎和上層建築。現在也有一些人，對三

害产生原因，做过分析，前天人民日报，儲安平的分析三害产生原因，揭露了新的环境，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先天的弱点，这分析基本符合辩证法，但不够全面、确切，有的同志仅仅看到外因和外因的某方面，如铁托同志认为官僚主义，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制度，这提法本身有两个缺点和错误：一、只看到外因——制度。未看到内因，同时看到外因时，仅看到外因的一个方面——即制度的一方面，环境这一方面没有看到。二、另一错误：在南斯拉夫有这样的论点，集体所有制或集团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而我们说，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因全民所有制是和生产力的社会性完全相适应，而集团所有制，是和生产力的社会性基本上相适应，我想这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他们主张把所有权力不管是否影响计划的统一性，都交工厂管理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林希翎的看法和铁托一样。

有的人仅看到内因，在他们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与新社会没有关系，第一次，林希翎报告辩论会中一个教员是这样谈的，我认为这看法有片面性，只满足于社会主义国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旧社会来的，反它干什么，这就容易胜利冲昏头脑，自我欣赏。我们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分析，正是从两方面来分析，内因外因来分析（看“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从思想状况和社会制度两方面来分析。

产生三害的内因，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在这个问题上，林希翎的解释就不同，她用统治阶级的共性——局限性来解释，这解释在观点上是错误的：一、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来说无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与大生产相联系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二、因为无产阶级是受压迫的，是最下层的，只有全人类得到解放，只有群众得到解放，自己才能得到最终的彻底的解放。

问题在于无产阶级队伍，工人、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天上掉下，而是从旧社会成长，因此在每个党员身上，无产阶级队伍中每个成员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程度不同，那就是说，对党员对工人不用说农

民就有先天不足的病症，他参加革命后，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就会造成后天失调，这样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滋长，个人主义特权思想，家长式的统治作风得到滋长，所以三害产生的原因，不是无产阶级的局限性，而是非无产阶级的局限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表现，有这弱点，当环境变化时，就会表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弱点，如李闖王在进北京后就变质了，不再代表农民利益，这点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具体表现，这是从内因来看，从外因来看，从环境看是它执政了，环境变了，阶级局限性得到表现，即变质，这为外因，有人说得好，‘权力会腐蚀一个人’，这只对有个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而言，这一个人如全是无产阶级意识，就不会腐蚀。

1949年毛主席在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毛主席估计到有些党员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地位环境的变化，同人们思想状况的变化有一定关系，是互相联系的，可能有两种情况：一、自己要求很严格，自我修养、自我改造，这样的人随社会地位的升高，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会下降成反比。还有一种人，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入党动机不纯，地位升高等等，和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发展成正比，地位愈高，个人主义愈大，最后发展成为野心家，如高饶，这是极个别的。还有一些人某一段时间内地位升高，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下降，有时地位升高，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又上升，但总的趋势是两条线，三害的产生即从这种人身上带来。

看看这种人由于地位变化，为什么思想会发生变化，忘记了群众，如一人由科员升为科长，自己生活很舒适，有了保障，这种情形下，非常容易忘记群众的疾苦，过去都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入党前后思想上有很大变化，有的更进步，有的落后了，有保障了，组织性也差了。团员时组织性强，入党前群众关系很好，入党后就脱离群众，也有的在入党前本来就脱离群众，这是支部发展工作上的缺点，发展的唯一标准，是‘唯命是从，看领导眼色行事’，这是好干部，有的人入党前后不一样，如我校资料员当了人事科长后，走起路来鼻子朝天，像

一个小杜鹃；如上汽车前后就不同，上车前喊：‘再挤挤’，上车后喊：‘不行啦，挤的要命啦’，反映个人主义思想意识，就差一尺多高的地位变化，思想就变化，我不是诗人，要是诗人就可以把这些标题作成讽刺诗，画家可画些讽刺性漫画。

另一方面是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好坏，合理否，是产生各种病毒，各种细菌繁殖的条件。在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中，和社会主义不可比，三害数不过来，是各种病毒的發源地，因私有制和生产力相矛盾，所以观念，上层建筑，文化都不合理。在新社会中，很多病毒被消灭，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疾病也一样，鼠疫已基本消灭，因社会主义不同啦，社会病态，剥削和被剥削的现象基本消灭，所以三害是旧社会的遺留物，但如看不到新社会制度的缺点，即可高枕無憂，請問旧社会遺留物为何在新社会得到滋長、發展、起作用，这就屬於制度問題啦。”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賀 安）

“机构龐大产生官僚主义，是事实。右派言論也有对的，如賀安的發言說：三害根源有內因，外因，內因是主要的，外因起一定作用。所以，机构龐大就有产生官僚主义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馮 海）

“專政太厉害了，讓人人对領袖实行偶像式的崇拜，对領袖的言論，当做金科玉律似的崇拜，其結果必然产生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解放前我国上层建筑是有买办封建性，三害我認为与教条主义买办性有联系的。解放后提出一边倒，我不反对学苏联，苏联很多东西过去現在將來都要学，苏联很多地方有教条，而我們就搬来了，教学中，人民大学別人說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窩，我認为是教条主义的策源地，很多馬列主义教員是人民大学出去了。我在人民大学四年深受

教条主义之害不淺，我們四年課程二年就可学会，四年浪費我們青春，念講稿，实在难受，潘靜成講‘为了滿足壟斷階級最大限度利潤’這句話一堂講了七、八句。有人問我為何有這多時間寫東西，我只利用了上課時間，很多同學生了小孩回來一背筆記三、四分不成問題，這說明這種教条主义学习方法有問題，法权史我仅記住了哈木拉比法典一詞其他什么都忘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三害本來我們中國是沒有的，是斯大林帶給我們的。從‘彼得大帝’小說中看到二百多年前的俄國，太野蠻，這種野蠻遺傳，到現在不見得完全能克服。”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打掩護，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知不觉的，過去從理論上說不是以黨代政，解放前就是以黨代政，這是完全對的，否則革命就無法勝利，所以以黨代政這種體制，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至今已基本上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在當時的黨政本身就會存在副作用，當時副作用很少，甚至表現不出來，在解放區內部矛盾几乎看不到，大家穿一樣的衣服矛盾很少，考慮有以下四點原因：

（一）當時無產階級還未掌握政權，而是為奪取政權進行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他如忘了群眾，任何工作不能作，如在群眾中大搖大擺的走一走，地道就得自己挖。

（二）當時分配原則是供給制，基本上是共產主義原則，有些平均主義，當時是正確的，當時一些個人主義人物，不願向革命隊伍里鑽，鑽進去也沒有意思，無利可圖，記得在正定時，吳老去華大身穿布面的皮大衣，交通工具是膠皮輪大車，因吳老身體不好，就在大車上綁上一個沙發，這時沒有什麼享受，而且當時參加革命有掉頭的危險，所以個人主義者不願向革命隊伍里鑽，黨的队伍相當純潔。

（三）人民覺悟很低，不知對不對，我是這樣想的，革命初期，那時

大家所以拥护党，跟党走，主要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党提出正确口号，能恰当的满足群众的当前利益，在苏联是和平、土地、面包，在我国如土改、减租减息，工农兵就站起来，现在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整风指示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已从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于新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主义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思想意识也在变化……变化内容很多，我只想谈与这问题有关的：

A.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且从根本上巩固了。

B. 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上完成，公有制已普遍建立，阶级正在消灭，故我矛盾退到第二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第一位。

B. 现在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

Γ. 人民觉悟程度提高了。经总路线学习、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三反、五反等等。

Δ. 党的组织迅速扩大，带来副作用，全国党员的平均水平降低了，即平均党性降低了，不是指党中央水平。

执政了容易忘记群众，革命胜利了，就不害怕了，鑽进来没有坏处，按劳取酬的实行，有利可图，愈往上爬，生活待遇愈高，所以以党代政副作用就大了，入党以前检查动机，但我怀疑，所有的人是否把他真正的入党动机谈出来，事实证明，有很多鑽进来，事实也不可能入党前，把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全部肃清。

随这个变化党中央已觉察到这个问题，提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比一长制前进一步，十个、八个拍脑袋比一个人拍脑袋好的多，党委还了解民意，群众呼声，但了解的很不够，这仅是量上的进步没有根本适应新的环境。以党代政，继续存在下去会产生缺点：

(一) 对党内来说，党委制是直接的民主集中制，对党外和人民来说，(包括党员)是间接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没有权利监督党委，人民代表能直接监督人民机构，而只能是党员代表大会，监督党委，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得到充分的及时的反映，我校从1950年到現在，

据我所知，我校开了兩次党员代表大会，討論何問題，非党人員压根不知，我校党员比較还算多的，我們揭出来多少問題，当时党代表大会未揭發这些問題，如其他学校党员少，那問題有多大，党委制在党内來說，完全的、永远是正确的，这是列宁的建党原則，但对党外來說一定条件下是合适的，在殘酷敌我斗争中是合适的。

(二)由于形势發展，由于党员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調，有意無意产生宗派主义，許多党员有形無形，有意無意产生了党天下，‘普天之下莫非党組’这是指个别党员來說，不是指党中央。国务院的个别組織中也有，表現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联合發布指示就可就有用，国务院指示为什么有很多不管用。因此产生宗派主义，故有官官相护，和旧社会的官不同，这和本位主义也有关，这些官是新官，如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虛报成績，县也向上虛报，是屬於官官相护，官僚主义者犯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有全混官，特別少，有半混官，有基本上是清官，次要的还帶点混，發展的结果，在很多党员中，特別在新党员中，由党委制，發展成为党员制，以党代政，發展到以党员代政，党员說的話就算。

(三)党员易脱离群众，因执政了，大家都听你的，發号施令，又管事又省事，發下去就干，党团员帶头，群众有意見就批判，省事不动腦筋，这样容易脱离群众，而且群众沒有直接監督的权利，如教研室，党员犯錯誤，不在群众中批評，怕影响党员威信，群众犯錯誤要在大会批判，党员犯錯誤为何不在群众中揭發，群众如何監督，其实群众看的很清楚。

(四)削弱了党的政治工作，党委忙于行政事务，如教員爱人搬到北京，也要党委批准，这样党委还能办大事嗎？这样就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斯大林談过政治领导与經濟领导的統一問題，不能牺牲政治领导来促进經濟工作，也不能牺牲經濟工作，来促进政治工作。經濟领导有專門機構，不能包办，领导不等于包办。

整风到現在不到一个月，所揭發出的缺点应引起深思，不要以社会主义成績永远是基本的来安慰自己，这样不能改进工作，不能前

进,特別需要研究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要光喊热爱祖国。社会主义不能光靠热情,热爱应揭發缺点,否則的感情冲动。”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賀 安)

“三害的根源不能从人的思想上去找,而应从社会存在中去找。

1、經濟原因——党成为統治階級后有了权和錢。过去党只和群众共甘苦,解放后党掌握了經濟命脉。人民生活提高較少,干部生活提高太多,和人民悬殊太大。特別是高級干部,家屬也过着貴族生活。这样就無法体会农民的甘苦,以毛主席为例,每月工資加上其他照顧折合現款一共有二千元,而一个灾区农民一年只有十九元,相差太远了。

2.政治原因,

(1)过去在革命战争中,需要高度集权,但階級斗争基本结束后,如仍保持高度集权,对国家發展就会造成很多障碍。多党制可以防止一党犯主观主义的錯誤。过去各党未能發揮作用,他們的意見千篇一律,变成了党的附庸。

(2)人事制度有問題;对党員的提拔比別人快。如不真正按德才提拔干部,就会使党員变得不学無术,而使有德才称职的人不能为人民作事。这样就产生了宗派主义。

(3)思想原因: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一事实使得人們只能引馬、恩、列、斯、毛的东西。只要引經据典,对方就啞口無言。至于普通人正确的話也不能得到重視和信任。

馬克思主义处于絕對統治地位,別的思想不能与之勢均力敌,而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在战斗中前进,因此革命胜利后思想發展較慢,甚至可以說是停滯。

总之,三害是与我們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有缺陷有关。如:干部脱离生产实践,分配制度不合理,行政机构龐大等,这就必然脱离群众,不能不产生官僚主义。”

(北京大学 左言东)

“資本家管理工厂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产生于公有制是少数人支配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效率高，一个化学系只有一个办事员。我们用些老干部不懂业务，当然效率低。”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13）“消除‘三害’的办法”

“三害根源是生产力低下，总的趋势是三害和生产力水平成反比，但三害表现出来是波浪式的发展”。

“按不同的制度美国的三害比我们多的多，但在一个独立的垄断组织之内的各个企业，互相协作的水平就比我们高。因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官僚主义比我们企业间协作的官僚主义少。三害产生于人们的思想方法，但是思想方法是人们脑力劳动的工具，思想意识是思想方法在人与人之间的运用，都属于生产力范畴，而思想意识在文字上，语言上的运用，才是上层建筑物，故克服三害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对于马列主义的掌握会随着生产力提高而自然提高。基本矛盾（按指主要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编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客观可能性，三害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如果没有三害，也就没有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顾佩弦）

由于他主张“三害”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有一定联系，因此他主张大鸣大放政府永远不要收，为了克服党群脱离为了使领导与群众结合，应该给人民以充分发言的机会，应该设立起根本性的制度如：

“1. 目前高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没有很好实行不过是‘装洋相’，应动员群众监督。

2. 允许公民公开集会谈论国家大事，国家政策，批评领导人，学生可以对群众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章广延的材料）

“……那么如何来防止三害，即把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准变成法律的条文，变成物質的力量来控制坏人性。只有法律还不行，人还可以不遵守（如斯大林），故需从权利的‘分配’上实行竞争——即‘民主’的問題。权利的集中只有在战争环境中才不会引起‘腐化’‘停滯’，只有打破‘鉄飯碗’才不会有‘官僚主义’。飯碗不要光靠上級給才会有群众观点。解决办法：

（1）新聞自由問題；（2）学术自由問題；（3）文艺創作自由問題；（4）政治公开；（5）选举民主問題；（6）民主法律問題；（7）人事制度問題；（8）多党政治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蔣济良）

“‘三害’是党統治的結果。我反对党的統治式的領導，包办一切，希望党改变自己的統治式的領導系統方式。我想不这样做党就是反馬列主义，党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統治者。”“如不徹底变革这样帶有遺傳性的，頑固的統治基础，不以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免不了將会出现四害或多害，以致于会产生不可設想的結果。”“現在党的統治应该死亡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楊文极）

“党派是溝牆的建筑师。只有使这些建筑师轉业，才能徹底剷除宗派主义根基，消除这人为的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薛新卓）

“克服三害要用一种物質力量，我所指的物質力量是：徹底革命，革党的命，革一部分党员的命。”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張祖文）

“三害是什么病狀，——三害不是狼虫虎豹，而是在人民身上的寄生病毒，所以治疗时，不应一棒打死，否則会把人打死，而且你还打

不到三害，治疗是長期的，不能以这点就認為我們慢慢改。

病疹特点：

a,傳染性很強烈，像麻症，有資本主義殘余者一見就得。

b,繁殖率高，如宣傳花衣服一个时期像一陣風一樣。

c,死亡率少。

d,不能終身免疫。

e,潜伏期長。

f,具有遺傳性，如爸爸有，兒子女兒也就有，如說服教育可少一些。

治疗方法：

从根本上治疗，即長期治疗，因社会意識，永远落后于社会存在，从長期根治，与目前采取預防措施相結合。

特效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要長期教育，長期用藥，除此外，要有較好的疗养条件：

a,生活要有規律性——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活动范围受法律限制，超过这范围，你錯了不管黨員非黨員，錯了就要受法律制裁，这是人民向三害进攻，和自由的武器，不能因对黨員有意見而認為有問題，認為向黨員有意見就查历史，祖宗三代搬出来，目前很多違法乱紀，即因無法制，或因法制不健全。

b,新鮮的空气——百家爭鳴，民主的空气，無論党内外都应百家爭鳴，据說彭真說过：党内只有一家独鳴，我不同意，党内爭鳴，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在执行黨員決議上，只有一家独鳴，但可保留意見，一家鳴容易产生个人崇拜，誰先鳴、毛主席先鳴，但只能原則上鳴，不会鳴到工业經濟。工业經濟小黨員不敢鳴，則有大黨員鳴，小黨員重复一字不差。

c,要有丰富营养——民主生活。这是預防措施，就是要从組織原則上，貫徹人代大会制到政治各个細胞中去，病情严重，即动手术，我把它称为双軌一貫人民代表大会制。”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賀安）

2.反右派斗争

(1)为右派分子辩护

“右派分子是否有組織有计划，这一点不敢肯定，因其無正式的反革命組織綱領。章伯鈞、罗隆基在民盟中的組織活动，那是屬於他們的工作範圍。”

“右派所提出的問題，有些的确也是党的錯誤，他們（右派分子）所講的也有一些事实。例如他們引用經典著作，根据人民日报上揭發的材料，这些部分是合理的。对右派斗争不能过火，缺点不应夸大，也不要搞死他們，今天还是思想認識問題。我們要面对事实批判右派，右派言論中有合理部分，我們只批判其反党的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教員 賈 岩）

“要吸收合理的內核才是对待右派言論的正确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薛新卓）

“对右派言論，应持‘兩点論’。对右派分子的言論势必研究吸取出一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大字报有些是有个人情緒，我認为不要考虑这些，对每个發言的也不要考虑他的动机，大放天鳴不仅对党有很大帮助另外对群众的积极性的發揮亦有意义，例如老教授都起来了有主人翁感覺。积极提意見这問題很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資料員 刘运梓）

“我認为右派是政治概念，而林希翎是思想問題。政治概念是要

从动机、出身历史来考虑，……林希翎沒有說要取消党，她的論点也得不出这个結論，从其历史出身来看，林希翎沒有反党的阶级本能。”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汪傳散）

“在学生中不应划右派份子……他們都是善良的，和右派的共鳴只不过是年輕偏激沒有經驗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平希）

“整风六大标准發表的太迟了，知識分子在运动中無一定的尺度，因而在鳴放中出現一些錯誤。”

（湖北医学院 孔 麒）

“林希翎勇敢、大胆。林的动机是好的，为了帮助党整风。基本精神是好的，只因身受三害迫害，情緒偏激。”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

“你們要談效果，我只管动机，我不願意改变我的思想，我等待你們的审判好了。”

（北京大学 楊 路）

“黃紹竑解放前是一热血青年，血債不可避免，民革都有，他們的历史是不能翻的。”

（天津大学 王原强）

“葛佩琦的發言意思如果是对重病人（指党——編者注）大喝一声，也未为不可，毛主席不也說过‘主观主义’会亡党亡国的嗎？”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田 放）

“这次海运倉举行对林希翎的辯論会，我認为开得不好，沒有很

好貫徹‘百家爭鳴’的精神，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有些壓力，這首先是個態度問題。用過去批判別人的辦法是錯誤的，是對敵人的。

我的基本態度。支持她兩點：（1）她是積極擁護黨的‘放’‘鳴’方針的，大膽的提出自己的意見，這與黨解放思想的精神是一致的；（2）她是關心黨和國家大事的，平常我們同志很少考慮，她不僅關心，而且敢於獨立思考，讀一些書加以研究，因此她的演講中提到些合理的意見。她所提到的正確與不正確的，都應引起我們深思，啓發了思想，沖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因此不能一棍子打死，簡單的反對。

現在有的同志說，她暴露思想是好的，但她的整個演講內容，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也有人說，聽了就氣憤。我認為有這樣想法的人，是不對的，這與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是不符的。有這樣想法的人，是把今天的思想工作，看作與以前一樣，是想把林的思想整掉。正由此出發，我總覺得有些批判是不對的，他們批判其錯誤時，把林的錯誤提高到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樣做，實質上是反映了对黨的‘鳴’‘放’方針理解的錯誤，沒有看到‘鳴’‘放’方針要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只是把林看成毒草加以批評，企圖用批判毒草來教育人們！這樣就不能在林的演講中，吸收正確的東西，並且堵塞了思想的解放，及別人的鳴放。同時，沒有看到林的發言，對發動廣大群眾，幫助我黨整風的意義。這一點，正是不同於以前黨整風的一個基本特點。我們必須對1%正確意見的同志（意指林希翎——編者注），應該伸開雙手擁抱她，人家罵得很凶，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犯了錯誤，而不要怕刺痛我們，更不應有反感。而有些同志不是這樣，他們喊口號，很激動，這就是反感的反映，是不虛心的。不是把她看成幫助黨整風。

只有端正態度，才能吸收她正確的意見，對其錯誤採取以理服人，應該改變過去的思想批判的方法。否則，一方面，不能以理服人，另一方面，又引起反感，不能分清是非，而轉移視線到‘衛道者’與‘衛士’的爭論上。有的領導人和黨員對黨的方針理解是不夠的。

我對林希翎的看法：——

爭論，包括林之錯誤的，也包括她新提出的問題。林的發言不是有什么思想體系，更談不上什么綱領、手法等，其可貴，在於提出了問題。對林的思想不必去抓其本質是什麼，這樣做無意義，這樣做會阻礙思想解放。因此，我不贊成把林的問題，當做思想來批判，因為這樣做本身，就是取消了自由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講師 盧冕持）

“反黨不等於反革命，今天報紙上章乃器等也有問題，我看下結論是不是太早了？！不能說反對當前政府和政党的就是敵人。”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講師）

“定息不是剝削，章乃器提出這個是為了更好地改造資產階級，是認識問題，不許給人家扣大帽子。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出發點是好的。儲安平提出黨天下，並沒有夸大，如我在體育代表隊時按一個黨員做隊長，這就是根據。周大覺是受國際共產主義的影響，波匈事件引起，他是思想問題，談出來就是好的，不能扣大帽子。林希翎代表了中國真正的女性，她是追求真理。”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胡風不是反革命，是爭鳴的急先鋒，葛佩琦、儲安平、章乃器等都是獨胆英雄、豪傑、仁人志士，他們提出了基本問題，刺痛了共產黨，揭中了共產黨的痛處。”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人民日報和黨員是先給別人扣上個右派分子的帽子，然後再湊事實，這種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証的態度。儲安平過去為人民日報特派記者赴新疆曾寫了很多歌頌黨的文章，為什麼不拿出來，為什麼只拿出他黑暗的一面的東西。錢偉長也上報了，象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學術問題上有不同的觀點，就扣上一個右派分子，今後還用不

用他，要不要他起作用。”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对于林希翎我只见到她二、三次，但是，对于这样的人，这已经完全够了。我相信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诽谤能影响我对她的信任，即使她认为我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间谍，我也还是同样地相信她。”

（57年7月14日谭的誓言——原编者注）

（北京大学 谭天荣）

“葛佩琦说杀共产党做为一个警告，也是可以的，并说统购统销确实搞糟了，我家粮食就不够吃，人民生活降低了是事实，我们家就没钱了（以前他家开金店、酱园——原编者注），共产党对我家就是不够朋友。”

（北京钢铁学院 钱寿颐）

“储安平意见应当考虑，他过去像小媳妇一样，到处受到压制，现在反一反领导是可以理解的。”

章乃器的第二篇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里面内容，群众见不到，不一定无可取之处，是被压退去或者不给登了。定息不能算剥削，应该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北京钢铁学院 章蓂舫）

“葛佩琦的言论，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他并没有说要发动人民去杀共产党人，而说你们再不改，那么他们意见是要那些共产党人改掉那些错误不让那些错误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北京钢铁学院 郭允德）

“海运仓 设论坛 全校学生真喜欢
林希翎 第一炮 敢放敢鸣呱呱叫

对問題 能思考 教条繩子能开了
对国事 提建議 名符其实主人意
講錯了 不可怕 集思广益力量大

* * *

有些人 吓慌了 声称这是瞎胡鬧
忙动手 乱开炮 急的七窍白沫冒
莫听完 便写报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
談政策 論方針 国务會議你参加了?
有人喊 有人叫 ‘社会主义你要不要’?
別的事先莫談,主席要求‘大家集中点’
不听完 呼口号 付校長鼓掌哈哈笑
姓‘自由’名‘論壇’搖身一变大圍剿
这一下 可不妙 ‘三害’一旁偷偷笑
‘林希翎 毛丫頭 整风把你整上了’。”

(中国人民大学 “自由論壇”一群听众)(大字报)

“問:‘为什么把人們分成双方,并且分成党员一方和非党一方?’

答:这方面和那方面的問題,是你們提出来的,我也为了叙述的方便,就借用了你們的用語。我主要是說明:党员应按党的政策——虛心傾听意見,鼓励群众鳴放,不准压制等等——办事,如果群众中有不認識党的整风政策的,党委应向群众說服,貫徹党的政策精神。

問:揭發錯誤当然要虛心傾听,难道对錯誤观点,反动思想也不加反駁嗎?

答:馬克思思想和反馬克思思想,当然不可能和平共处,可是这次是我們請党外人士来帮助党整风,是听取人家的批評,而不是和人家进行思想斗争。我們要求他們揭發党的錯誤,但是他們揭發錯誤时,必然还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比方說,有人在肃反中被冤枉了,他在揭發自己的遭遇时,就可以激动的說:‘肃反扩大化了’。对于这样的意見,我們怎么办?立刻制止他說話嗎?說他歪曲事实嗎?恐怕不能这

样。每个具体的人，看問題都有局限性、片面性，再加上思想方法、立場观点不对头，問題就更大，如果我們在整風运动中这样要求人家，那就会堵塞言路，人家再也不敢講話了。当然馬克思的基本原則是不容動搖的，事實上不應該歪曲。現在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於讓各種各樣思想都自由地表達出來，讓它們在長期內（幾十年，幾百年）和馬克思競賽，看看誰是真理，甚至可以取長補短，在競賽中達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目的。至於歪曲事實的問題，如果純屬道聽途說的無稽之談，可以平心靜氣地說明真象，不必大喊一聲‘你造謠！’如果人家揭發的都是事實，甚至是大量的事實，就應該重新考慮修改，補充和修改過去的結論。”

“問：什麼叫壓力，什麼叫支持林希翎到底以及其他等等。

答：在任何運動中完全沒有壓力那是不可能的。我前兩天就感到壓力很大。這也是正常的。我所指的壓力是以勢壓人，以帽子壓人，以不講理的態度壓人。這些壓力，在前兩天，比會上表現最突出，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百花齊放。

我支持林希翎到底，是支持她那種勇敢揭發黨的缺點的精神，支持她大膽獨立思考和發表意見的精神，這些都堅決支持到底。至於他的錯誤看法，我準備和她商討，我已經寫了一封信給她，表現了這一點。

有人問我對黨中央的精神領會了多少，我無法回答。這不能用百分比來計算，領會不領會可以談談黨中央的指示，對比對比自己的行動。丁弘同志抄的幾段話，我覺得應該看看。

有人問：你說群眾不敢鳴，根據是什麼？根據不多，但也有些。如：

(1)不簽名的大字報多起來了。

(2)有人寫了一條標語：‘中國人民大學三害’萬歲！’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虞耀麟）

“下午聽林希翎的報告，我原於前兩天，已寄信於她，想知道她的真實力量所在。

她大胆揭开了所謂上層建筑——官僚主义機構的秘密，他們的內幕非常骯髒，陷害正直的公民，非法逮捕，亂無法紀。紅色恐怖，罪惡滔天！

她揭露了赫魯曉夫的真相！好一个丑惡的家伙！

她批評了中國文艺狀況，大大諷刺了周揚，更尖銳地批評了圖騰小冊子的非科學性。

她也談了胡風問題，揭露了毛（指毛主席——編者注）的真實本相。

她也揭露了人民代表大會的虛偽性！統治者的局限性！我覺得她簡直太偉大了！

她是勇敢的女性！歷史的主人！她是哲學、文學、政治、法學的現狀的批評者！她是社會上的顯微鏡！她是大無畏的勇士！她是最敏感的人，她是實踐家！她是天才的演講家！她是未來的偉大的作家！她是社會的良心家！人類最美麗的靈魂！無論那些哈巴狗多么瘋狂的攻擊她，却不能消弱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李 德）

“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問題，毛主席提出六項政治標準，是否反社會主義？在所有制上是很明顯的，如果目的在延緩合作社、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反社會主義，在政治制度上就不一定容易分別，有人提出對上層建筑某些部分某些政治制度進行改革，其效果不一定是妨礙了公有制，將他們看作反社會主義，劃為右派，就不一定確當。”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在聽林的報告時，對黨的不滿情緒，幾乎每一分，每一秒在增長着。”把林希翎的發言稱贊為“富有啓發性的令人深思熟慮的黃金般的報告”。

“從她的報告中，我認為她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她的報告總的說是好的，有積極意義的，表現如下幾點：（1）大膽勇敢的精神是符合整

風精神的。(2)在首先肯定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基础上，在肯定黨的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基础上，揭露了我們現有的許多不合理的陰暗面，這對我們今天反‘三害’是有積極意義的。(3)她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4)她提出的一些具體體驗。她的報告啟發了我們不要為勝利沖昏了頭腦，叫我們冷靜的來考慮我們現存的缺點。報告中揭露的許多事實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對她的報告，我是基本上信任的。如果要調查林所講的事實，不應由完全否定林的論點的人進行調查，而應包括基本上同意林的論點的人，包括黨團員，群眾兩方面的人共同進行調查。”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福榮的材料）

（2）歪曲劃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及其产生根源

“反右派鬥爭，跟要把戲一樣，可笑得很，右派分子不多，何必大驚小怪；學生問題不大，不要把右派帽子亂往頭上戴。其實右派沒有什麼準則，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才算右派，反右派鬥爭不是憑良心說話，想說誰是右派，就是右派。”

（蘭州大學 馬啓凱）

“右派分子可憐的是：他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而他們在政治上給黨提了些意見，就扣上了一個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不右派是別人給扣上的，別人說右派，就是右派。”

（北京礦業學院 鄧克義）

“小題大做，共產黨這麼強大，讓人民提意見又這樣搞一下……沒說出事實就扣帽子，接受不了，把儲安平叫右派分子的根據是什麼？……批判儲安平我不感興趣，我不參加。”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助教）

“右派的劃分仍應從思想上來劃，而不應劃分人。”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洪維政)

“右派分子的形成,是‘三害’的必然結果。”

(湖北医学院 曹作炎)

“为什么人大出了个林希翎,整风中应当考虑这个問題,学校吹嘘政治教育,实际上是失敗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孔釗)

“右派分子林希翎事件暴露了我們思想工作的严重弱点,象这样的人不能团結,又如何团結其他人呢?說明了我們党团工作的脆弱和無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孙毅剛)

“我認为林希翎坏思想产生是党几年来教育的結果,北大有些学生品質都很坏,年龄都不大,我們的教育工作为什么沒有收获,为什么产生这样多的右派分子。”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李維左)

(3)攻击反右派斗争

在6月13日会上还說目前反右派斗争是“党在收,与收相联系的是在整,整就是誘敌深入聚而歼之”。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徐前的材料)

“反右派斗争是教条主义的反扑,肃反的再現,捕风捉影。”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群众已經起来了,要‘大鳴’‘大放’反对以党代政,可是党却在这时对这些展开了反攻……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提提意見,却硬把它說成敌我性質的矛盾。儲安平說的有什么不对……党天下思

想本来就是錯誤的，儲安平要求給民主黨派以一定權力有什麼錯，黨一聽見就說這是爭奪領導權！……黨這樣小題大作是不是要趁機把民主黨派人士已有的那點權力也奪過去，把民主黨派打下去，提高自己，這可真是一舉兩得。”“趁這機會又把人民緊緊地拉向自己，無怪乎‘三個月的教育比三年還豐富’‘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在迅速的成熟着’被緊緊地拉入黨的懷抱，可真是不平常的春天。”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胡仁生）

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他認為是不公平。“為什麼林希翎收到匿名信却不為她發表社論呢？”他說社論中提出整風中階級鬥爭還存在是不對的，“給鳴得不對的人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是壓制鳴放”。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何世芬的材料）

“共產黨氣量不大……要人提意見，結果又要人檢討……反右派鬥爭是整風運動的天折，沒有整幾天就反右派了。”“人民日報失策了（指反右派鬥爭的头幾天社論——編者注），（1）因為右派還未暴露完……以後就不會暴露了；（2）好意的人不敢再提意見了；（3）人民日報不該發表葛佩琦、王德周的反動言論，因為他們為數不多，免得被蔣介石利用……”“反右派鬥爭在不同意人的周圍，布上了一層恐怖氣氛，這是運動的畸形。反右派鬥爭面太寬了，不應該反到林希翎和我的頭上來。”汪認為“這是為什麼？”社論的發表是“要收了，小題大作，黨要為自己辯解了，是黨的涵養不夠”。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汪傳散的材料）

“在鳴放鬥爭，由於我們揭開的錯誤太多了，受不了，所以來反右鬥爭。”

“黨不願意整風，黨不虛心接受人民的意見。把整風的矛頭對准民盟。”

（湖北醫學院 劉劍明）

“……这次鳴放中我是得到教訓了的，沒有深思熟慮的話是不宜隨便講的，提出任何一点新主張，如果与傳統的意識与概念有違，沒有群众基础就提不得，这不是世故，不是畏縮，这是穩健，也可以說这是辯証法吧……現在，在我們的周圍，在我們的国家，有一种無形的危机，它是看不見的摸不着的，然而，在一些知識分子中，它抓住每一个人的心，威胁着他們，鳴放中初显雛形的新型民主生活，現在看来有窒息的危險，有退回到自由思想的抑压……”

（武汉大学 李俊雄）

“反右派斗争是小題大作，把几个人收到恐吓信說成我国政治生活中大事，未免过分。有人提錯誤意見也不值得斤斤計較，这不是一个执政党的气概，执政党应是宰相肚里好撑船。”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党中央整风有决心，但党委缺点多，领导决心不大，要收了。算了吧！念書吧！当順民要好一些。反右派后，繼續整风，只能說党一切都好。通过整风党的威信降低，現在的做法只不过是硬要提高党的威信，共产党自己不檢討，逼着民主党派檢討，真可笑。反右派的做法和肃反一样。反右派斗争是条件反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要收了，这是压力，是一棒子打死，是对意見的歪曲否定，是善惡不分，这会冤枉人……反右派是整群众，是圍剿。”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近几天来，人民日报大为反对据說是‘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盧郁文接到匿名信……人民日报組織的十字軍，充分表現了沒落階級的情緒，那些有着內在权利的人，用不着炫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力量会为

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兴問罪之師嗎？真太象为了轉移人們对学生运动的注意而有意制造的糾紛，这不过是垂死的掙扎而已。”

（北京大学 譚天榮）

“又把工人、农民搞起来了（指工农起来反击右派——原編者注）；工人农民这些大老粗曉得什么？”

（湖北医学院 李建群）

“很久未見到报纸，一天宝中送来八張报纸，原来是百家爭鳴天折，儲安平、葛佩琦等之發言击中要害（害）使得俗子們到处呐喊，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有所感想：一是民主和人权及真理，此时是被压制的时候，思想更是奴隶；二感此时乃为俗子們遙能求医的良机，故对理智的人惡狠的攻击……这是中国人的愚昧，是我国历史上的耻辱。”

（蘭州大学 馬章福）

“党由整风轉向反右派斗争，这样大張旗鼓的搞，加大标题，扣大帽子，使别人不敢說話了，这不是說服人，而是在压制人，这只能使更多的意見被压制下去，使更多的人脫离党。共产党的肚量太小，才几个人提了反面意見，就大惊小怪，这实际上就是收，几年来群众一直受到压制，各大运动都是党在搞別人，群众沒有向党提意見的机会，这样一收一压，無論如何也不能使群众再向党提意見。”

（北京鋼鐵学院 章夢舫）

“在开始反右派时，我非常反感，我認为党是在釣魚，將右派分子釣出来，現在就到了打的阶段。我認为反右派是用政权力量来压制打击新生力量，是大人欺騙小孩，首先給你片糖，然后狠狠打你一頓。这时我已由反感变成了对抗，恨不得进一步推翻共产党，假如这时候，有人上街游行，我一定参加，我也会抱着炸彈去毀坏一切。

章乃器是过去的七君子之一，現在共产党翻臉不認人。

为什么过去整风鸣放不停課，現在反右派斗争就要停課，这简直是和侯宝林說的相声邏輯一样。”

（北京鋼鐵学院 張存根）

“盧郁文收到的匿名信可能是共产党员搞的。

現在反右派有左傾产生，这是中共的一貫历史应防止。

……目前有左中右之分，但左派是無能的，或以压保持其地位的人們，中間派处以中間的地位，右派是坚持民主的，而中間派必然会向右分子上(?)。”

（北京鋼鐵学院 胡范軍）

“我認为人民日报發表社論是不适时的，有人認为社論發表迟了不好，我認为在这样一个大国出点小事又有什么用呢？坏事也变成好事，何况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人民当然是会出来反对的，……我認为社論發表阻碍了人們把心里話都說出来。”

（北京鋼鐵学院 金福强）

“右派言論算不了什么，工人、农民看得很清楚，他們今天批判的，用不着我們管，他們不会把我們怎么样。‘党天下’‘定息二十年’‘資产階級比工人階級还好’沒有什么，用不着大惊小怪。”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無能、愚蠢丧失了理智不憑良心的伪道者們，校党委的傳声筒，以及应声虫。尽管伪道者們气焰万丈，但是他們非常空虛沒有什麼值得說的——一本万利是伪道者們的目的，是他們灵魂深处的怪影，用最毒辣的手段去打击鳴放的人，是他們达到目的的手段。我再一次表示，我和所有支持你的中国人永远同你在一边……”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薛新卓）

“工农突然說話了，这是党有意这样作的，大概是党的力量弱，因

此把工农搬出来，我听說現在工厂不准工人集会，只准几个人在一起怕出乱子，發表这样多的社論和各民主人士發表談話，成了一种压力有碍鳴放。

工人階級对反击的方法是否对头？工人不是和风細雨沒有爭鳴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向工人学习。”

（北京鋼鐵學院 彭華富）

“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的方針是对的，但还有錯誤，要同时提出反左派（即認為左派扣帽子——原編者注）。

（北京矿业學院 宋世琳）

（4）誣蔑、抗拒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同志們，同學們，鑒于目前局势特作个人声明如下：

一、党内进步势力已和保守势力結成联盟（至少是默契），以打击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分子在北大我不敢肯定沒有，正像某些人不能証明它一定有一样。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它采取了大刀闊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將許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殘了特别是青年知識分子当中的民主力量。

二、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措施的，我將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見……不应借口階級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發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硬抗議。

三、党和民主激进派已由他們各自的片面性而陷于某种对立状态，虽然这主要应由党来負責，但我們如果再僵持下去，对党，对現時还缺乏主見的群众和对我們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这种局面只是对三害分子和真正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利。

四、民主力量应退却，这不是向三害分子和保守力量退却，而是与党内进步势力进行妥协。这种妥协現在已經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

然人民日报那篇报导荒谬可笑，要盼望更正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广场应当停办，百花学社应当解散，否则不管你们是否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只要有一点民主的要求，除非变成‘浪淘沙’那样低级的东西，强权和所谓‘舆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向‘5.19’（北大右派分子1957年5月19日开始点火到处贴大字报——编者注）社会主义战士致敬！希望大家注意到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民主权利除掉它的阶级性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

.....

我没有爱过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在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没有沾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己，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

（北京大学 杨路）

“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动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

（北京大学 谭天荣）

“目前政治尽管目的伟大而手段不能不采取骯髒，人民日报为了人民利益但手段是骯髒的，我欣然接受组织处分，校规国法，我不改变我的态度，假如以后更正……我就可以放弃这个骯髒的看法。”

（北京大学 张景中）

“……我有一点意見，現在是一場严肃的整风——民主运动，由于习惯的力量在阶级敌人被基本消灭以后，我們就把阶级仇恨轉加‘落后分子’身上，用对敌斗争方式，伤害了很多自己人，似乎过去喜欢思考的人大都成了落后分子，其中很多就被斗争过，其理由常常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很多同学养成了不思考的习惯，听說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覺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和自己，而那些受委屈的同学都容易把所有这些同学都当成有意伤害自己的坏人，这样就激起了偏激的对抗情緒，發生了一些無原則的糾紛，使我們放过了真正的三害分子，不要忘記，正是他們在破坏我們团结和友誼，亲爱的同学們讓我們更多地諒解和信任吧。”

（北京大学 譚天榮）

“反右派斗争后，党整风完全是騙局，叫人家先說話，等人家說了話又来整人家；这样使我对党的仇恨更增長了。”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王樹才）

“誰說我是右派分子，我就打死他；誰說我落后，就湊死他。”

（湖北医学院 許道誠）

（5）誣蔑反右派斗争会造成不良后果

“我們現在批判右派，会影响和平解决台灣。”

（北京矿业学院 卓景星）

“党的反右斗争，不符合党整风原則，妨碍整风运动进行。”

（湖北医学院 吳見鑫）

“这次整风如果就这样办下去（指反右派——編者注），以后会影响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李維左)

“党反右派斗争，早有准备。现在知识分子遭了殃，党斗争太厉害，太毒辣，以后党和知识分子关系恶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1、把民主党派整了一下，以后统战工作不好做了。

2、整风还得继续，但群众不好发动了。

3、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这次不行了。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好推行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更大了。”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3、关于立场問題

“你们党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我可以用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你们竞赛一下，看谁能对国家有贡献。”

“民主、选举、自由、和平、国际条约、信用……都被当作手段，符合无产阶级利益时就采用，不符合就不采用，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我是不同意的。

〔例〕：(1)在德国統一問題上，我們不贊成普选，而在朝鮮、越南我們則贊成，因为西德的人口多，工人覺悟低，而在朝、越就不一样。

(2)二次大战时，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至打败了德国，苏联就进攻日本。

(3)既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该讓一切思想都放出来，和平共处。现在来一个反右派，好像是毒草只許放一次，下不为例。”

“塔斯社的新闻当然只講自己的好，講英美的坏；英美的通訊社也是如此，只講自己好，別人坏；誰講的也都不一定对，必須得要我自已看。”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許惠尔)

“1.談抽象立場會談，也敢談；談具體立場我不能談，實際立場是莫須有的。

2.自己的立場是多數人的立場，多數人的立場是農民的立場，對工人階級立場總覺得不得勁。”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王憲文）

“美國過去給大米白面吃是讓我們當亡國奴，共產黨讓我們吃小米粥是建設社會主義。可是誰不知道大米白面好吃呢？”

（東北林學院 金博文）

“解放這樣久，誰不懂得進步？！學習政治，參加開會要自願，為什麼要把繩子套在人家頸子上？我堅決反對這樣做，共產黨就是花樣多，隨便辦什麼事總是說根據自覺自願，但真的別人不自覺時，便罵人家為落後分子。譬如農業社一再強調自願原則，但是事實上只准自願入社，不准自願不入。可是，他們（共產黨）又不公開懲罰你，就是鄙視單干戶，我在農村可見多了……以後凡是自願的我樣樣都不自願，看你把我如何！”

（雲南大學 歐陽已）

“既然是階級鬥爭，就不是二個人的事，無產階級可以組織起來，為什麼不許林希翎、譚天榮組織起來呢？”

（北京鋼鐵學院 徐繼和）

“我的檢討一定會使你（指譚天榮，劉給譚信要求改變鬥爭策略——原編者注）震驚，因為我曾在你面前表現得那樣頑強和堅定，而你也說過，我們在現階段的最大共同處是‘不作檢討’……但是，‘若不檢討，家庭要與我斷絕關係，物理學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這當然不是理由，而是影響我正視現實的外界力量。但無窮無盡的理由就包含在‘要斷絕’、‘念不成’、‘不要了’里边。父母兄妹朋友同學幾乎

所有的人統統反对我……”

(北京大学 刘奇弟)

“我看‘百花学社’是有不少肯追求真理，大胆热情的青年。你們要搞社团可以自己組織，必要时可以到別校取得联系……而且也别把自己形成‘群众首領’，眼光看远一点，何苦为自己的将来招麻煩。等大风暴过去，整党整完，还不慢慢地来同我們算帳。辯証的看問題吧，共产党是目前仅能有的一个好党。我們就馬馬虎虎容忍着过吧。历史会帮助我們的。不是斯大林專断一世，死后就受到清算嗎，采取波蘭方式促进我国的党和政府作重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不能乱来(我是喜欢波蘭方式的)。”

(北京大学 李修宇)

主張在整风中不談立場，說階級斗争結束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田怀玉的材料)

“在整风中不要立場，談立場是妨碍运动向前發展，解釋也是阻碍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整风中不应提立場問題。团不应依賴党，不应党叫作一点就作一点，叫作兩点就作兩点。”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徐 前)

“人民內部矛盾是是非問題，所以我認為人民內部沒有立場問題存在。”

(北京矿业学院 方永濤)

“最近我爱上了周閨的一些，也恨一些人。

‘葛’的爭鳴認為是反共(因而反人民)，我不明白，爭鳴意味着什么？这完全是圈套，是手腕，是陷阱，共产党变成了人民的真正敌人，

自由的迫害者，我只崇拜真理，我不滿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無产階級有無产階級的真理，地主資产階級有地主資产階級的真理，誰有理就服从誰。資产階級不見得不能認識真理，資本家剝削工人在資本家看来是天經地義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若縈）

“政治究竟有沒有实际內容，有沒有真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觉得，在政治上真理有的被歪曲了，例如，我們常常宣傳說美国有經濟危机，然而实际上並沒有产生。因此，我觉得政治不象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严格規律，而政治則主观能动性可以超过客观規律。”

社會上有沒有階級，我也表示怀疑。事物本身是沒有明确的界限的，界限都是人为的制造出来的。

因此，我反对先站稳立場再独立思考，因为这样的公式不好，会导致一定的結論。”

（北京石油学院 王光垠）

“在运动中既不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也不站在党的立場，要站在公正立場。”

（北京矿业学院 赵国臣）

“立場是复杂的，他可以反应客观真理，又可以不反应客观真理，如無产階級反对剝削者，反应客观真理，但工人为了工資罢工是自私自利，不反应客观真理。站稳工人階級立場，是非是抽象的，工人品質并不像書上一样，無产階級立場是党提出来的，是党指定的，讓大家这样站。”

（北京矿业学院 邓克义）

“組織性和良心是有矛盾的，立場和真理有矛盾，为了真理可放

棄立場不会做敌人。”

(北京大学 張景中)

“……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無論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整风民主运动一定成功，‘五一九’和‘五四’將显明地留在我們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未来的年輕人，为了这一切，我沒有任何恐惧……”（这是六月二十四日在群众会的頑固叫器——編者注）

“我是天生的，徹里徹外的煽动家。生活经历、理論素养和革命訓練，無論从那方面看，我都是适合于自己所选定的道路的。”

“辯証法可以告訴你，那些不畏强权視死如归的人在弱者面前必然是最温和柔順的人，那些羔羊前的武士必然同时是武士前的羔羊，这是同一品質的兩方面表現。只有坟墓才能改变我的性格。”

(北京大学 譚天榮)

“現在共产党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还是所謂立場、观点、方法，但立場、正义等和真理不同，真理反映了客观規律，他可以通过实践去檢驗，而立場、正义則是一个信仰問題，客观規律并不能告訴人应当選擇某立場，只有生活本身才能告訴人这一点，从立場来批評一个人的言論是最軟弱不过的。”

(北京大学 严仲强)

“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立場，也不站在無产階級立場，應該站在客观立場看問題。一个政府合不合法，應該有一个客观标准，不加什么立場的。否則世界上沒有一个共同标准了……無产階級比資产階級更能代表真理，但除了無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外，还有客观真理本身。如果無产階級思想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还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会發生犯錯誤的事实，只有站在客观立場，才能判明是非。如果我們出兵不算干涉，而帝国主义出兵就算干涉，这是不公平，这样就沒有客观的标准了。”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有反动思想的人，也能爱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楊瑞清）

“在旧社会統治者宣傳相信命运，安分守己。可是今天呢，宣傳專业思想，宣傳起螺絲釘的作用。”（意即没有什么兩样——編者注）

“过去皇帝讓人民喊他万岁、万万岁。現在讓人民說首長，也喊毛主席万岁。我从心眼里不願意喊万岁。別人喊，也跟着喊就是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只要对得起良心，我就不去考虑什么立場問題。”

（蘭州大学 馬啓凱）

“有了階級立場就無所謂良心……良心、人道是最高原則……

（北京大学 楊路）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淡，凄寒。我感到自己精神上非常虛，無所寄托，我不知道我生活在世界上为的是什么？……还不如死了好，出家作和尚也行。

我認為所謂独立思考，就是按照自己認為明确的方向去进行。

我听彭真报告，覺得說服力不强，只是又提出什么立場問題，还不是过去的老一套。”

（北京鋼鐵学院 張存根）

（五）过渡时期的階級与階級斗争

“我既然沒有批判掉我的改良主义，所以对于階級斗争的学

說，总觉得格格不入，这証明我根本沒有站上人民的立場。我既然在思想上对于馬列主义不习惯，所以总想以別种学說來‘补充’它、‘丰富’它。”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教授 吳景超）

“今天的社会难道不复杂嗎？階級斗争迫使人与人之间进行如此無情的残酷的斗争，难道不是事实嗎？因此我喜欢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家，在那里是多么自由自在呵！”

“昨日亲家今日仇！这都是残酷的階級斗争的結果。”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解放后几乎沒有公开提出博爱这一名詞，解放后提出的就是階級友爱。我感到目前宣傳的階級友爱，是提無产階級的階級友爱是指無产階級革命大家庭的階級友爱。我認为这种友爱范围比較狹窄。在革命队伍内部可以宣傳階級友爱，但在人民群众之間，應該宣傳人与人之间博爱的精神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諧感到人間的温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芝文）

階級斗争是空洞的东西，是人为的，本来就沒有什么階級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張玉江）

“鎮反后，階級斗争实际变为恐怖統治和法制的破坏。如胡风問題，高饒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階級分析的方法在中国現在已經过时。作为划分階級最主要的根据是生产資料的占有，現在这个問題已經解决，階級的区分也就随之消灭或將消灭。現在只是还有些遗迹罢了，这种情况下再強調階級立場未免落后于現狀。从古今中外各个学派中吸取精华，一个人應該摆脱自己的階級局限性，不是自私地、狹隘地只从本階級利益出發，

而是从全民的利益出發，这样就会站得‘高’看得‘远’考慮問題就周到全面。”

（北京政法学院 赵 明）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生产力学說：‘生产越發展，階級矛盾越小’，这就是說生产力的高度發展，則可以进入社会主义。”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現在再強調階級斗争和階級分析是教条主义，是步斯大林‘階級斗争越来越尖銳’的后塵。”

（北京政法学院 付成章）

“現在人可以分左、中、右，左又分左、中、右；中又分为左、中、右……这样無限制的分下去是为了混淆政治界限可以散布反动思想和言論。”

（北京政法学院 黃盛业）

“农民上了共产党的当，階級是共产党制造的；只有貧富之分，沒有剝削；階級斗争是共产党制造的，叫农民起来斗争，斗争过了就不管了，因而农民就四次参軍，如不参軍地主不轉来杀这些农民的腦壳嗎？所以逼着要听共产党的話。”

（云南大学 蒲茂光）

“恩格斯說：‘道德上的惡是历史發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通的命題，他說善与惡的相互作用在推动历史前进，可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这种善与惡的相互作用都表现为階級斗争……而忠誠于革命偉大的实践家并且略識辯証法的刘少奇同志在这問題上恰犯了錯誤，他認為‘善’与‘惡’沒有客观标准，‘剝削者認為善的，被剝削者認為惡’，这显然是相对主义者的胡說八道。”

（北京大学 譚天榮）

“那些元帅們都是杀人的劊子手。王院長是土改干部，兩手沾滿鮮血的人，怎么能够領導这么大的学校。”

（东北林学院 金博文）

“形成階級的基础是分工，而分工不能消失，所以剝削就不会消失。”

（北京矿业学院 李国常）

二 肃反問題

(一) 誣蔑肃反运动, 否定肃反成績

“鉄托同志認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关怀, 离开这一点就不是社会主义……对旧社会的代表人不是加以肉体上的摧殘, 精神上的侮辱, 报仇, 杀害, 最主要的是从劳动上改造。而我国已經杀了七十多万人, 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再大量屠杀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則了, 因为杀了以后, 会在他們的家屬亲友中种下仇恨的种子, 起了副作用, 將积极因素化为了消极因素, 我們人民大学肃反时, 真正現行反革命沒抓到一个, 倒自杀了好几个同志。被斗的情緒銷沉。这次整风提意見时很多同志哭了, 这不能不是值得考虑的。”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济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辱罵我党在肃反中对其問題的处理是“侵犯人权”“以怨报德”, “一个俘虏投降了, 我們尚且要寬待他, 我自己主动的交待了思想, 不但挨了整而且整完以后仍然受到岐視”。不滿肃反运动的方式, 認為“这种方式会伤害好人”。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資料員 刘运梓的材料)

“肃反把人搞的暈头轉向, 人不象人, 鬼不象鬼, 死也死不得, 活也活不得, 如資本家現在提起五反还發抖, 很多人提起肃反就头蒙,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的惩罚要重十倍。可以調查一下, 在历次运动中伤了多少人的心, 使一些人对党敬鬼神而远之, 惧怕, 这里表現着不是以德感人, 而是以力治人。思想改造, 鎮反, 肃反折伤了好多

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使得这些人至今还不能靠攏黨，甚之，永远不能靠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資料員 張紹鴻）

“肅反中是否有宁可錯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使有些人受了冤屈，使老教授伤了自尊心，学生也不尊敬了，几年恢复不了元气，肅反尽量打，結案不了了之。”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束洪濤）

“我們的肅反是有問題的，把有些是思想問題的人也肅，而且对有些与反革命的关系很远的人也肅，但对有些真正的反革命則沒有肅。”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龐秀珍）

“肅反沒有扩大化，但有偏差和缺点，很多观点都貫徹了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进展階級斗争愈尖銳，这就形成人們思想过分緊張，提心吊胆的認為草木皆兵，也使人不敢再談黨的坏話。方式方法不好。繼承了法西斯的作法，这虽是群众搞的，但是黨領導的。……”

“限制肅反对象外出，侵犯了人身自由，对肅反的重点就当为反革命看，这是不对的，处理時間拖得長……某些領導人怕道歉怕承認錯誤。”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洪維政）

“肅反花的力量太大了，說肅反生产兩不誤是瞎話，少創造价值可想而知。副作用太大，被斗的人多数含冤，群众認為中央政策好，地方执行的不好，地方上黨的威信不如以前了。知識分子、技術人員中多是重点，被斗后大都消极了。不少地方對黨對領導有意見的群众都被斗被整，群众不敢再提意見，發展了官僚主义。有些地方把肅反作为宗派傾軋的工具，对不是黨員的，黨內出身不好的，或是不合某些黨員意圖的，大肆傾軋，發展了宗派主义。有些地方非法私拆信件，檢查住屋，对被斗的人限制行動自由等，嚴重地破坏了法制。从以上看来

肃反虽然取得一些成績，但毕竟是功不抵过……很少有积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肃反运动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学校可以公布这一材料，被逼死的現象倒是到处都可以听到。”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吉貴）

“斗多了些。斗就很难准，肃反理論根据斯大林，錯誤缺点不可免。局限性包括党中央。肃反开始时，每組确定斗争对象不根据确鑿材料，不尊重人权；小会攻，大会轟，审讯、監視等于坐牢。这是否是中央的指示，所謂自發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否扩大了肃反面。中央提出5%的反革命，各机关都按5%来肃反，造成扩大肃反面。三反太不文明，逼供，疲劳战，人权毫無保障，中央未預先防止。”

“你們把肃反美化了，把肃反說成是花花的，缺点是严重的，斗争的面寬的很，而定案未有几个——抓人不慎重，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韋 齐）

“关于肃反問題从对比來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但我認為錯誤是比較严重的，同时这些錯誤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严重是因为錯誤量大——是百分之十五这个錯誤是可觀的！如一千万犯人中就是一百五十万錯。周总理报告中談49年到56年杀77万人占所捕反革命犯的16.8%，按占15%錯案計算則錯案絕對数是70万，这个公式是 $77\text{万} \div 16.8\% \times 15\% = 70\text{万}$ 这个絕對数是不少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肃反时对我各种刑法都利用了，我自己准备住法院呢？！对我除了肉刑之外逼供信什么都用尽了，軟禁也用了，星期日找我談問題，不叫我出去，这即是軟禁，星期天是国务院規定的假日我非出去不

可(星期日找他談是已經总支同意,結果經再三動員他不肯就出去了未談成——原編者注),不准我參加會議不是逼嗎?還有精神戰,群眾壓力,組織手段……最不應該的是逼供信的手段,因為我不是罪大惡極的,除了肉刑以外我都受盡了,這是社會現象,誰有權就統治誰……過去強調我對黨影響不好,你們(指支部——原編者注)用這種方法對黨的影響怎樣?當然對我並不懷恨在心,但對我的結果就是傷心,悲觀,痛苦,負擔大,加上我弟弟和家鬧事考試二門不及格。因為肅反把我思想弄糊塗了。……”

“肅反前,過去我雖開過小差,是因打架害怕了,但對黨沒有三心二意,肅反後造成我對黨三心二意,使我思想更加落後,使我對支部的意見推到全國去了,整個社會都這樣。

聶校長肅反時是寧左勿右,有一次作動員報告時有的人以死威脅黨,這樣死幾個也不要緊,我覺得他真沒有人心,我看他面上有殺氣,聽說他在土改時殺人太多,犯了錯誤,這樣的人不配作教育工作,有這樣的校長下面的工作不用說了。”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田仲倉)

“肅反有三大害處:1.破壞感情,2.製造分裂,3.六親不認,自己也受到非人待遇。沒有人的感情,幾乎把我逼死。肅反時共產黨逼死人,還不如國民黨好,國民黨不好,舊社會沒有逼死人,新社會逼死人。我對肅反不滿,自己反動思想是肅反肅出來的。葛佩琦要殺共產黨,我也可能自絕於人民,人家說我是叛徒,我已經是叛徒了,我願一輩子做民主人士。

肅反初期是盲目冒進,打擊面過寬……連說幾句怪話的都算在內。由於領導上未掌握材料,而是根據群眾意見亂肅。這是與憲法不符,侵犯人權。林希翎說:‘肅反中冤枉了七十二萬人……’,我認為錯鬥的要大大超過此數。肅反確實擴大了,有人不承認擴大,擴大是相對而言,肅反中是否有錯呢?如果到你頭上你就不這樣說了,這本身就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林希翎說南京捕了2000人,我們鄉下小鎮

就捕了30—40人，所以南京捕去2000人不算多。部队中600多人，有200多被整。捕錯，判刑重是有的，無事被关几天，这算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鎮反肃反是共产党耍的手段，共产党是利用一部分人，杀掉一部分人，留下的都是满意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馬 馨）

“我感到痛心，有些同志过去是朋友，肃反到外面了解材料，非弄出特务才算完成任务，为什么这样搞呢？不是政治問題，啃着打，我听到刘云林談时，就想起来了，如破坏法制等等我認为对这些人应提出控訴。我的要求就是与这些人面对面發發牢騷。

他媽的，我要掌握政权后，非把这些人（指搞肃反的干部——編者注）押起来不可，讓他們尝尝味道……”

“肃反运动是有意的破坏内部团结，破坏家庭幸福，破坏身体健康，肃反搞的乱七八糟，坏的领导会使狼把老虎吃掉。”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靳彦忠）

“1.开始参加工作热情很高，以后家庭被斗，父亲被槍斃無怨言，但肃反后距离党越来越大。

2.这社会反正是人吃人的社会，过去是地主吃工农，现在是工农吃地主子弟，地主子弟应当担当其前輩欠下的政治的債。

3.大胆怀疑的政策是有問題的，不是从团结出發，达到团结的目的，事实上是用斗争地主惡霸的态度。

4.肃反中采取的方式是否恰当呢？但我認为处理思想問題时應該是内部問題不能斗争。肃反时實質上象对待惡霸地主一样来对待我，也沒有給我說話的权利，同志們提意見蛮橫無理，这是不是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呢？

5.把我作为肃反对象並沒有材料，單純从任务出發，为了完成一

定百分比在我們班里总是要找出一个百分比,这样对党并不是負責。当事先未掌握我的材料时,为什么要进行进攻呢?無中生有的轟一下这是主觀的、盲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赵乃鴻)

“‘肃反’是共产党对知識分子进行統治的方法,知識分子最不好統治,共产党害怕知識分子造反,用‘肃反’整知識分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講師 李 德)

肃反时,搞运动就是这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增加了情緒,看了材料不作具体分析,过于执的作风,在搞肃反的人中是相当普遍的,認識的錯誤引伸到反动思想,然后引伸到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大鳴大放时,报上也有这論点,自己感到很对,这么严肃的事,搞得象一窩蜂似的,这就是我想的,不是个别問題,是社会风气問題……

“从肃反后到大放大鳴前,觉得自己挨了一棍……隱隱約約覺得你們(王丽、刘鐸)打击我……以后接触到吳正民、陈椿年等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其他人也說到沒搞出什么反革命,越来越覺得是硬追硬逼,無中生有,不該斗的斗了,不該捕的捕了,于人于事無补。”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陆 戈)

“肃反运动的成績是否是主要的,我一直是怀疑的,我們机关(指四川省第二初級党校——編者)肃反搞了一年多,結果肃出了一个反革命,而許多人斗錯了,这怎么能証明肃反的成績是主要的呢?肃反中又斗錯了很多人在斗争中,許多人未被剝夺公民权,就沒有了人身自由,通信,行动受到限制監視。而斗錯的人,事后領導上未公开承認錯誤,給恢复名誉,使这些人难以进行工作,这是不合理的,应賠償物質上、精神上的損失!肃反中一說了二話(怪話——編者)就挨斗,这样,使許多人就不敢向領導上提意見,以免来个运动,灾禍临头。因此,肃反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了。”經蔑肃反中斗争反革命分子是

“胡乱斗人”，說：“反革命分子有沒有客观标准。”

他极力反对历次运动采取群众路綫的方針与形式，說：“这是导致錯斗人、侵犯人权，破坏法制，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認為“群众斗争运动形式太激烈了。”因此主張“采用緩和的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黃世君的材料）

“肃反虽然成績是基本的，但是錯誤是大量存在的，不是个别的，斗錯是普遍的。从全国來說肃反的成績是基本的，但某个部門錯誤可能是基本的，肃反我們大家不能作評价，要求中央評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栩）

“肃反扩大化是事实，肃反杀了七十七万。我認為在理論上講，在階級斗争尖銳时必须杀的，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如土改，抗美援朝中。在政权基本巩固后，对敌对階級并不应象以前那样，馬克思說过，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对敌人采取劳动改造。我們党是正确的，这完全体现了人道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济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

“肃反运动目的：清除反革命分子，加强人民团结，前一目的是达到了，后一目的呢？经过肃反，人民内部的团结是加强了？还是松弛了呢？我認為肃反沒有达到第二个目的，反而使团结松弛了。

党中央应檢查各單位肃反紀录，看看肃錯的多，还是肃对的多。这个問題很重要。根据我在社会上的接触，我感覺是肃錯的多，对的少。假如这样，如何能加强人民团结呢？一般参加肃反的，都要做历史介紹，思想介紹，这里牽涉很广，追問很細，常为一个小問題，追查很多人，这不仅加深人們和党的隔阂，而且加深了人和人的隔阂。我說肃反肃錯了，是指第二个問題說的，这是党群关系不正常的一个原因。發生偏差的原因：这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集中表現。如根据一个人說了一句牢騷話，就把他当做反革命分子整，这不是主

觀主義嗎？共產黨員常寧左勿右，整錯了，不及時平反，這不是官僚主義嗎？肅反應當是全國的事，但肅反運動領導小組只有共產黨員才能參加，這不是宗派主義，為什麼肅反運動中是三大主義集中表現？因為這是黨員同群眾思想感情不正常所造成的，不正常的思想感情就是共產黨員對群眾懷疑多，信任少。”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現在狀況壞到極點了，就此地來講，北京已發生了黑市。肅反、三反做了缺德事，現在派人去叫他參加民革、民盟，給一輛小汽車坐坐。

中央把殺共產黨的劊子手楊虎請來作官，民革要把康澤請出來，康澤是特務頭子，共產黨不行啊！因之現在有人說，要組織社會主義同盟，這是後退，我們人民說要前進！……”

“毛主席說肅反殺了七十七萬人，老百姓要求天下太平，但須吃飽了，吃不飽還是不滿意。古代文王殺四，不殺也可坐天下。漢高祖說：‘殺人者死’，殺一個人就要他死。古代先立了法，把自己捆上，老百姓就守法了，而現在立法是要別人遵守，這是不行的。這是老百姓的反映。”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關於肅反問題，肅反是否必要，當然必要囉，過去、現在、將來都必要，有反就肅。問題在於肅反工作中還有許多錯誤，對反革命的估計就是主觀的，中央就是有錯誤。肅反就是根據斯大林‘在社會主義越發展階級鬥爭越尖銳化’的錯誤理論。翻開文件看看，當時都把这錯誤理論當成金科玉律。肅反的錯誤從現在揭發的問題也可以看出。我介紹的沈陽日報的那篇文章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

“……首先聲明我不是肅反對象：77萬大部分該不該殺？是完全應該的，但也搞錯了不少人，斯大林在蘇共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殺了1108人，斯大林摧毀列寧培養起來的一時代的幹部……”

“肅反取得很大成績，但副作用也很大，赫魯曉夫報告：‘黨內草

木皆兵，关系不正常。’我們同志間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認’‘冷若冰霜’，主席提出大檢查非常英明，但应找公正人(包括民主党派)进行平反，公开承認錯誤，应实事求是，我校党委書記，随便檢查人身，私設公堂，例子很多，不多講。”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我是‘肃反’的对象，我家庭是地主，我是朝阳大学的学生，沒参加任何反动党团，为什么‘肃反’作对象，就因为我好說，好提意見，我給社長齐振之，編輯科長信观楷提过意見，結果給我扣了好多帽子，你們別看我今天沒有戴帽子，可是我腦袋里很多帽子，什么样的都有，百貨公司沒有的帽子我有，(会場哄堂大声笑)。“肃反”时到处搜查我，黨員是便衣警察，和几个朝阳同学常来往，就被高旭华指示木林(团支委)挖我小集团，結果蜂涌而上，日夜監視我，咳嗽一声都有人注意，前天我和齐振之同志談，他否認，他說根本‘肃反’沒整我，前几天我問，还裝不知道，伤良心呀！(本人高声大喊)以后又說我是小集团，以后又挖工作上缺点，信观楷說对工作有損失的，同志关系方面的都可以提，他这一發言，群众蜂涌而上，整的我战战兢兢，神魂顛倒，如临深淵，如履薄冰，叫我談反領導、小集团，結果沒有什麼可說的，談了以后条子一大批上来，整得我一天到晚吃不进，睡不着，結果小集团一个人病了，此时知識分子政策出来了，我們的小集团問題就不了了之。‘肃反’中任何問題都也提不出，結果說是讓我洗澡。何必把工作中的錯誤拿到‘肃反’中来談，不提任何問題就整，是‘肃反’？是打击报复(本人高声大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齐俊成)

“肃反錯誤是主要的，成績在相形之下是微不足道的。斗争出来不是反革命，就是100%的錯。

中国的肃反是斯大林錯誤理論(社会主义越建成，階級斗争越尖锐)在中国的体现，我們被斗的人是斯大林主义最后一批受害者。

当时学校就没有权决定监视人，连上个厕所，锻炼一下身体都有人跟着，团章，学生手册，宪法都不顾了。肃反是一团糟，肃反不合法，不人道，损害了民主，没有人情味的作法，也是很令人伤心的。肃反結論是套框框（先定罪），再往里填例子，問題都在你五人小組，班上只有听命。肃反就是要人盲从，肃反后發展了胆小怕事的教条主义和官风，助長了三害。肃反后更团結了是假象。肃反运动搞得起来，主要是群众迷信党是万能的。我对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很怀疑，因为他們明明知道我不是什么反革命，党發动他們，你們就斗我，其实是盲从。錯誤在于我院增加了什么大胆怀疑，宁左勿右的附加方針。

我当时接受肃反，是由于經濟上的压力，当时什么学籍、团籍、爱人，什么压力都施加过了，肃反整天提到我的爱人，还派人找他。肃反后我的爱情被破坏了，想想看这还人道嗎？使我真摯美丽的爱情蒙上阴影。肃反就是想打下我（独立思考）的威风后，批判我的思想，当时你們理直气壯的批判我，我就理直气壯的不承認。

我院搞錯了，高等学校系統一定也錯了，一些机关，企业單位也錯了，全国的肃反恐怕都錯了，所以‘平反委員會’应推广到全国。不仅要院党委負責，連党中央也要負責。伸冤有什么不对的，應該組織‘平反委員會’，全盤翻案。原来的五人小組搞不了平反，應該由被斗的代表參加，吸收教授和多方面人士来搞‘平委会’。”

（北京航空学院 一个職員）

“鋼院在肃反运动中犯了严重的偏差和錯誤。凡是：（1）不听話者，（2）受提意見者，（3）不符合党政領導意圖者，（4）黨員对群众怀私恨者，都为斗争的对象。

肃反清查的对象是：（1）不听話者，（2）受提意見者，（3）不符合党政領導意圖者，（4）黨員对群众怀私恨者。

肃反时领导同志是罪魁。”

（北京鋼鐵学院 郭楠）

“肃反运动不但使老一辈教师们自尊心损伤了，就是青年一代，也受了很大影响。肃反运动是狼吃小羊，摧毁了一个人的青春。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是教条，‘党八股’。要成立肃反审查小组，要求给肃反中被斗的人恢复名誉，要求领导肃反假公济私，冤枉好人的分子向党自请处分。”

（兰州大学 冯赤华）

“在肃反运动中进行思想批判，就是敌我不分，是原则性的错误。”

（北京俄语学院 张吉青）

“1. 党的几次运动都是不对的，特别是肃反运动，只憑党员一句话，就搞掉了一个人的名誉、地位、人权、青春。一些共产党员没有人性。一些积极分子踏在被斗错人的身上爬上去了、入党了。……被斗的人答话，硬说是顽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2. 肃反斗错了是由于档案不可靠，要求档案公开。

3. 对所有被斗错的人，党委应该对他们负身心健康的责任。

4. 肃反党员所以胆子那么大是由党委支持的，党委是由市委支持的，市委是由中央支持的，整个说全国都有问题。

5. 肃反中随便斗人，党员首先破坏了宪法，应该有人证、物证才能搜查、斗争，否则就是犯法。”

（北京俄语学院 王繼崑）

“从运动的开始、发展、结果、影响四方面来分析：其开始——‘大胆怀疑’既无足够根据，其发展——‘批判’、‘斗争’便是完全错误，其结果——居然也‘找出了几个有政治问题的人’就只能是运动的副产物、副作用，而其影响——损伤青年身心、混淆敌我矛盾，损坏党的威信。会上的‘批判’‘斗争’，会后的‘训话’‘质询’，以及会后的‘孤立’‘岐视’，是二十世纪毛泽东时代的极端野蛮的对革命青年精神虐待的手段，要在青年纯洁的心田里撒下了罪恶的种子。”

(北京俄語學院 鐘子奇)

“在社會改革運動中，特別是1956年的肅反運動起了副作用，使高級知識分子現在不敢大鳴大放。……肅反運動中所謂的思想批判比52年的要凶暴得多，不人道得多。……

對於肅反運動的錯誤性質的估價問題，我不同意官方的說法，以成績是主要的，錯誤難免就了事。我舉一個例，就可幫助明白道理，好比有一個醫生診斷一百個病人，其中九十個醫好了，但十個人被錯誤的弄死了，你能說這個醫生的診療成績是主要的嗎？

肅反的責任問題也要弄清楚。……我在北京、武漢、上海三地所了解的情況，肅反運動在高等學校所形成的一切錯誤，論性質和規模都完全相同，沒有二樣。實事求是，肅反運動的錯誤，應由中央來負責才對。……

我們的黨就是很忽視法制的，肅反運動暴露出人民政府本身是違反憲法的規定。政府逮捕了教授和一般幹部，經過法院審判手續的有幾人？共產黨人不習慣法制概念。”

(中山大學 羅應榮)

“肅反時一舍成了監獄，操場成了勞改場，教室成了看守所，有地下監獄還有私設公堂把人變成鬼，把學生變成囚犯，把健康的人變成瘋子。”

(中南礦冶學院 楊德才)

“肅反前有三分之一跟黨走，肅反後連二分之一都沒有了。”

(中南礦冶學院 吳潔光)

“肅反運動確有副作用：

一、是讓人看出，黨委也有不實事求是，不科學看問題的地方。

……

二、是不要是非正義，黨要說打，打了就沒錯，反正錯誤有黨委承

担……

三、是不够人道，不尊重人格。……

四、是六亲不認……

五、是所謂积极分子路綫居然蔚为风气，成为少数人物的理想了。……

六、是工作縮手縮脚，講話吞吞吐吐……”

(山东大学 景振华)

“肃反工作的后果是副作用大……是怨声載道。……

党委在肃反时是依据这样一套邏輯和公式来办事的：首先党委認為任何單位都‘有反可肃’。……假若哪个單位开展不起来，就来一个‘革命輸入’的办法，派几个得力的干部去搞，……在大胆怀疑的口号下，进行残酷的斗争，無情的打击，斗完了再来一个調查(糟就糟在这一点上)，……到处都是火热的階級斗争。”

(山东大学 李 蘊)

“肃反运动是党团员的獸性暴發。

肃反斗争比刑法还厉害。

肃反我校缺点大于优点。

在肃反工作方法上：1.是捕风捉影的“大胆假設，小心求証”，对被怀疑者不是根据事实来进究，而是根据平时的一些言論；2.肃反干部是些青年人，对旧社会的知識缺乏，不了解解放前情况，而把一切归到政治上；3.领导不相信人的談話，而相信一些不够具体的書面材料，甚至有些連材料也不管，而根据怀疑来办事；4.斗争过程中甚至做結論时也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政治帽子满天飞，甚至胡下批語；5.發动的群众自己就不清醒，斗争者有好功的表现，不顧事实情况乱斗一通。这种工作方法不知害了多少人。”

(蘭州大学 曹文正)

“我怀疑如此的肃反斗争在我们这些單純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間，在我们这些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学习生活的‘書呆子’中間开展的必要性。要知道解放前我們最多不过十七、八岁，而且自考入大学填表注册，交待清楚，虽然有‘反’，也自易‘肃’，党委会妄自大动干戈，非官僚‘而如何哉’？”

（北京俄語学院 鍾子奇）

“肃反是斗愛說話好提意見的人，肃反是一次压制民主的运动，要大家不敢說話。”

（中南矿冶学院 周世偉）

“肃反是先排队后整材料，依次斗争。”

（中南矿冶学院 楊德才）

“这次肃反运动中对知識分子的斗争是先排队，再根据5%是坏人的教条主义来搞运动，弄得人心惶惶，把一批無辜善良的人遭受精神上的折磨，任意摧殘，有被打的，有被罰跪瓦片的，形式不一而足，有的人气瘋了，有的得了神經病，有的得了气痛病，有的人至今沒有恢复正常精神，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中南矿冶学校 胡熙廣）

“1947年6月1日‘六·一惨案’，在武大死3人，是蔣介石犯罪，現与肃反比較有它积极的一面，使人看清了蔣介石，参加了民主革命，从此角度，肃反起了多少作用，我看还不如‘六·一’。”

（中南矿冶学院 方紹富）

“肃反运动是杀人不見血的运动，比槍打还厉害。”

（中南矿冶学院 吳潔光）

“肃反肃反是出卖良心，出卖得愈乾淨愈好。”

“肃反后，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了。”

（中南矿冶学院 黄海波）

“肃反伤害了600—700人，只培养了少数积极分子，右派分子写反动标语，打工人、上街游行……等向党进攻，都是由于肃反带来的结果。”

（中南矿冶学院 邓荣保）

“我院右派分子产生，是由于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引起的。”

（中南矿冶学院 唐祝庆）

“肃反从讨论本单位是否有反革命和不利于革命的言行入手，这样方式是不好的，会引起同志彼此间之猜疑。”

（中南矿冶学院 李传祹）

“肃反不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而是十六个字：‘肃反乱来，有错必瞞，一点分析，大有问题。’后来又加上：‘斗错无关，上级靠山。’”
“当时肃反没有斗到我，假如斗到我，我准备采取最后手段，建议我院对魔鬼集团（指党委——原编者注）开庭审判。”

（中南矿冶学院 傅繼輝的材料）

“在执行肃反政策上，上面一寸，下面一尺。”

（中南矿冶学院 赵澤霖）

“肃反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作法一样。”

（中南矿冶学院 唐祝庆）

“肅反是在三個錯誤理論根據下進行的。1.大膽懷疑,2.湊百分比,3.坦白無罪。上面先確定了反革命分子占5%,下面就來湊數字,先作一個框框安上,然後再去找反革命分子。

在肅反中硬要搞一個思想批判,把思想批判和歷史問題夾在一起,從思想批評中,右一批判,左一批判,就把反革命分子批判出來了,思想批判中,群眾路綫有很大問題,材料都裝在黨員包包內,群眾只是搖旗吶喊,臨陣助威。批判的方式狂風暴雨,人格侮辱,非常粗暴,造成人人過關,被批判者都被划了一副非常難看的臉譜。

肅反的後果很壞,在運動中領導上有些說法,實際上起了精神隔離作用,肅反以後,黨對知識分子更加不相信了,肅反以前,非黨團員還可作教研組主任,肅反後都被取下來了,周總理的知識分子問題報告後,有所轉變,但轉變不大。”

(四川大學 許存信)

“……有幾張大字報在吶喊什麼‘肅反運動是全國人民的要求’等等,是經不起辯駁的。我們不禁要問,你說肅反運動是全國人民的要求,那你是不是征求過我們六億人民的意見後才說的?也許你說的人民與我們的人民含義不同。那我不禁要問:‘你說的那幾個人民住在那裡?戶口登記簿上有沒有他們的名字?’

聽說北京有什麼社會民主黨,黑格爾——恩格斯學派等組織。我便建議你們也組織起來,並在此奉送一個名稱‘保皇黨’,看看合不適合?”

(四川大學 范和祥)

“肅反……黨組織採取了恐怖政策,我們被重點幫助的原因只是由於:不滿意班級干部的盛氣凌人,和一貫採取粗暴手段,以致積怨成仇,借以假公濟私,公报私仇。

會場布置形式——三堂會審。幫助方法——任意謾罵,疲勞審問,捏造事實,半夜逼供。被幫助者享有的特權——剝奪人身自由,一切行動受監視,採取的手段——威脅、欺騙、挑撥、玩弄、兩面派。要

求：

一，党委應該堅決勇敢在群眾面前承認錯誤，恢復我們的名譽。

二，取消肅反積極分子稱號。

二，立即退還當時硬逼着我們寫的坦白書，”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方萬行）

“希望凡是在肅反運動中受到過迫害和被殘酷鬥爭過的同志，都能站出來，把自己心中所受到過的痛苦攤出來；向黨向祖國人民和全體同學要求正義和公道；要求取消今天還存在的政治歧視，要求取消‘黑名單’，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待遇；要求還給我們作人的基本權利；要求法律給我們的保障……。”

（同濟大學 周知其）

“肅反使多少人冤枉，失去了生命、愛情、青春、精神與智力，使多少人未老先衰，背離父母、朋友與親戚，更使多少人放下了萬靈之尊的人格，干下了雷同禽獸的行為！”

（同濟大學 舒展〔鐘亮明〕）

“肅反運動亂分析，亂帶帽子，不分敵我，整得我們交朋友都不敢，否則就要把對方祖宗的歷史都要了解清楚，因此，團委會號召要跟落後同學交朋友，我堅決反對。”

（雲南大學 朱紹忠）

“肅反時確實有些逼人，沒有問題也要編造，總之，以為給人家判罪愈大愈好，逼死人愈多愈好。逼死人過於嚴重，但事實上好些人在當時就是受到壓抑、逼迫；肅反確實使人覺得草木皆兵。”

（雲南大學 王××）

“肅反是欺、哄、吓、詐，捕風捉影；肅反運動副作用大於正作用；

正作用表现在那里呢？”

(云南大学 王經元)

“肃反就是乱搞，我过去說点二話，也被打成‘反动集团’。”

(云南大学 姚 忠)

“肃反是掌握的大批材料完全出于捏造，是对我們进行一次荒謬絕倫的神經战，是一种有計劃的政治迫害；再不，所謂大批材料只能被理解为日常生活缺点的堆砌。

肃反工作組对人类道德犯下了罪过，肃反对象是他們在班級中建立威信的牺牲品！他們不惜对青年学生进行那怕最低劣的政治迫害！对象已經內定了，然后假惺惺的召集一些群众，讓他們愚弄了群众，逼使群众說出違背良心的話，这种挟天子以令諸侯的作法，不正說明他們个人道德的败坏？难道他們不應該向群众懺悔，向群众賠罪？

在斗争中，你們所使用的手段实在太多样化了，概括的話：有軟功，有硬功，有恐吓，有威胁，有欺騙，有謾罵，有誣蔑，有故意布下圈套食住人家，有挑撥离間，有的时候还象流氓一样地大喊大叫拍桌子。真是‘前無古人，后無来者’。我們要向人类道德控訴，你們用什么来解釋宪法明文規定的人身自由呀？

更令人髮指的是你們竟搬出了国际公法所指責的‘疲劳审問’。肃反工作組的同志們！即是希特勒匪帮审問共产党人的办法，那是上饒集中营；台灣火燒島上国民党特务对待爱国的中国人民的手段啊！你們竟然把它搬来对待一个無辜的青年学生，你們太殘忍。”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邱清輝)

“肃反有八大錯誤：

1. 扩大肃反斗争面，好人当作坏人斗，肃反是肃反革命分子的生命，我們不是反革命为何要斗？

2. 望风捕影，無中生有；对党不滿，發牢騷就是对抗組織就等于

反革命。

3. 威胁利誘，强迫承認，不承認污蔑性的問題就是抗拒运动就是反革命。

4. 打击报复，假公济私，平时对班長、支書有意見，今日該斗他。

5. 殘酷踐踏人身自由，行动監視，信件檢查，校門不得出，無权与人講話。

6. 摧殘身体，至今未愈，疲劳审問，致使得病，神經衰弱，長期失眠。

7. 剝夺信仰宗教自由，相信天主教也有罪嗎？

8. 生死不問，死者枉也。”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黃文萼）

“肃反运动是阴險的有計劃的对善良人民的政治迫害，肃反不需要搞群众运动，反革命分子是公安局抓到的，不是群众斗出来的。現在不应该講肃反的成績，要談缺点。肃反給知識青年以永恒的創伤和憤怒。

今不如昔，天冷且寒，肃反太殘酷，叫人胆战。”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高时瀏）

“我觉得我們的党委不是来办学校，而是来办人，你們終日生在办公室里，等待一些积极分子来彙报，不声不响地記帳。听人之过則喜，听人之喜則憂罢了，运动一来，手握帳簿，口放謠言，最后把棍子拿出来，打得一个一个的七死八活。經過了斗争和接二連三的打击，我們身体也坏了，失眠、心悸，神經衰弱到极点了，如果党委說在山大中肃反的成績是主要的，那么我說这是主要的成績。”

（山东大学 周北屏）

“肃反后，伤害了許多無辜的好人，使他們在精神上受到摧殘、打击……但从总结和平反中，輕描淡写，看不出誠意来。只是以‘成績是

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这一公式来作擋箭牌。”

（山东大学 任恩照）

“肃反总结向上居功，而很多人痛心，据说‘成绩是基本的’。工人阶级品质丧失殆尽。赵儼生先生将这比之拉科西，我觉得不是拉科西，而是历史上的魏忠賢，是东党。凡是被打击的，都是比较正派的，个别的例外。我許某不说谎話。党委将来不要求大家寬恕，但必須有真正的思想转变。我不怕，也不怕送五号炮台去槍斃。”

（山东大学 許恩园）

“毛主席报告里不应该將鎮反与肃反混为一談，成绩主要表现在52年，那么55年的肃反成绩又表现在那里呢？”

（北京俄語学院 陈吉元）

“周总理最近的报告說，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可是他只談到鎮反的数字，而肃反沒談，是否肃反成绩也是主要的？”

（北京俄語学院 沈兆予）

“肃反的成绩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肃反后我班团结就搞不好。肃反成绩是大的，但偏差和錯誤也不小，就如投資一样，資本投大了，但收利較小。党制定的政策是由党来破坏，共产党爭了几十年的自由又由共产党来破坏。这是誰做錯了？是党委会还是班上干部？肃反不收殘局。肃反死人并非無关系，人死并不这么容易，要是你們有几个孩子，長大了死几个，看看你們的心情如何！人人都有妻子兒女，死几个人你心情又如何，可以嘗試一下。伤心的事情很难补偿，不是金錢、道歉可以解决的。”

（云南大学 王 新）

肃反的偏差和缺点有三方面：（1）敌我不分，是非不明——有些

問題当时搞不清楚；(2)方式問題，过火的乱来逼供；(3)未进行善后工作，导致某些人思想負担。”

(云南大学 龙任之)

“肃反偏差与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有限的。三分成績，七分缺点。

当时肃反是一种‘恐怖政策’，在高等学校中，沒有必要进行肃反。”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張 健)

“根据罗瑞卿的报告，中央在肃反問題上所依据的理論基础是錯了，所以全国來說成績也不是主要的。肃反錯誤，中央应作深刻的檢查，但八大总结时輕描淡写是不負責任的，本来希望毛主席报告有正确估价，但看后表示遺憾。肃反就是乱套公式，概念不清，答数不对。在大学里就根本不应该肃反。”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肃反运动成績虽有，但偏差很大。党的政策是对的，党中央也可以說是对的，但是下边用了一攤子爛干部，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党中央也不是不知道。肃反中有人自杀，可見就是有威逼。”

(云南大学 唐云林)

“肃反运动錯誤何在？

1. 把人民內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
2. 群众路綫——被歪曲，

我們学校是强迫群众違背自己的認識和良心，去参加斗争。結果使他們也感到受騙了，精神上受到了責难，‘群众路綫’变成了党推卸責任的手段了。

3. 斗争形式——土改的余风。

恐吓、威胁、捏造、疲劳审問、監視、檢查文件这种方法是錯誤

的。

4. 駁肅反的錯誤是不可避免論。

拿人的生命來作試探，用‘莫須有’的罪名來鬥爭好人，是反民主、反人權的做法，而肅反錯誤的不可避免是推卸責任的招牌，‘莫須有’是反動透頂的主觀唯心主義。

我們要求實事求是的對肅反做估計和交代。

要求制訂國家刑法，制裁違法者！

確保人權、言論自由！”

（天津大學 方 成）

“肅反運動比法西斯還壞，法西斯還沒有拿自己人民那樣鬥，肅反時不知冤枉了多少人，誰要是自殺了還要說他是威脅人民的行为，是和人民對抗到底，難道沒有冤枉死的嗎？為什麼在新社會里，大學生中有这么多人自殺，舊社會就少見。”

（北京礦業學院 李佩文）

“肅反鬥錯了很多，這不能不聯想到黨的肅反政策是錯誤的，全國肅反成績是次要的，被鬥的人是在思想上死亡了，道歉不能彌補這個損失，你們的政策就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肅反是沒有根據就鬥人，就是大膽懷疑，隨便查別人的信，抓住一句話就追，結果沒事，是昧着良心說話。”

（北京礦業學院 李國常）

“肅反的後果是什麼？——加深了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第一，加深了這個矛盾。第二呢？當然我沒有想得很好，我只有一、二天，很膚淺的囉！我要深入想想還有很多問題！要大家幫忙，大家回去很可以好好想一想。大家對黨委可以提很多意見。第二是混淆了敵我之分。人民——我們，朋友，你說他是反革命？！鬥他！明明是朋友。

沒有錯，他沒有錯嘛！他沒有錯的事，你說他有錯！年輕人是愛真

理的。当时，老实講，在斗争会上，我們的正义，我們的真理被强奸了。說实话，同學們，我知道，他明明知道他的朋友並沒有問題，但是那个領头的所謂积极份子，一定要逼着他喊口号，逼他昧着良心。他背着他的良心在說話。这个对于一个年青的同学是很殘酷的。明明他知道这是真理，你逼他說不是真理；明明不是真理的东西，你逼他說真理；在年輕人純潔的灵魂上面塗了一層灰。

第三是什么呢？宪法，人权被破坏殆尽。我要告訴同學們！宪法，人权，對他們相信的培养，就是人哪！老百姓哪！對他們相信的培养比盖一所房子，比盖一个城市要困难得多！人要尊重人，要尊重宪法，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肃反斗争会，可以說是什麼？可以說是完了！完了！还有什么人权呢？还有什么宪法？当然我們看問題要有历史观点，过去旧中国在乡村对惡霸要講宪法、要講人权嗎？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还有什么宪法不宪法？当然可以斗，当然可以杀！我老实講，我說，对那些反革命分子，对那些惡霸，由我来执行最好，我可以練我的槍！但是那是过去了，現在我們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經頒布了，你还是用那个斗敌人的方法来斗自己的人民，这种东西，要改变嗎？要改变掉，馬上改变！否則实在太危險了。把自己的人民当作敌人，实在太危險了！……我駁斥他（指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委員何东昌——編者注），就是他还是很得意洋洋的說：‘我們搞清了很多人的历史。’我告訴你，过去的历史是不是重要？是重要！但是要知道，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是死的東西，你获得的是死的历史。死的历史你是得到了，历史是搞清楚，你失去的是什麼？活的人心！活的人心，跳动的人心，你失去了！假如把这两个东西放在天平上，哪一个重要呢？你們自己想一想，我不回答……我回答也好吧！我說說我的看法，我說是：得到的成績跟失去的东西一比較——負無窮大！我覺得，我今天要是檢查党委的話，要檢查的东西太多了。是呀！工作的成績就是从那个档案袋来表現的。但是失敗的东西他沒有看到，失去了春天的那些同学他沒有看到！我奉勸党委們檢查檢查是为人民为祖國呢？还是为自己的地位？！这个是很尖銳的問題。……

我觉得活的人斗争以后，比你们枪斃他还要危险。这一点上，可能何东昌（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委员——编者注）不体会。当然囉！脱离群众的人他怎么能体会群众的情况呢？！

在这一点上，同学们，斗错了冤枉了四百多个同学，我觉得左了。左倾哪！我不是什么政治家，也可以发表我的见解。在这个事情上！对活的人用西瓜晚会啊！这样态度，老实讲，是右倾思想！人们不是像我，我是不会报仇的，永远不会报仇的，我为什么要报仇？但人们不是像我的，那些被污蔑的人，你说他们没有仇恨吗？他们是有仇恨的，不过时间罢了。老实讲，我要请教何东昌同志，在和平时期对待这些人，的确要做很多工作，要经常安慰他们，而且要防备他，事实上的确也在防备着。有人告诉我，就是被斗争的那个，苏加诺来了，要另外一个同学去看他，何苦呢？你到底是为什么呢？你失去的是人心嘛！这个人还活着呢！这事情很麻烦，的确很麻烦，和平时期要防备他，动乱时期也要防备他。有人告诉我，刚才那个同学要杀共产党是可以体会的。但我是不会的，人人像我就好了，那天下就没有什么事了。

但是这个问题我不敢下断语，要让历史家来证明，因为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苏联枪斃很多。我们没枪斃一个人，这情况就不同了。要等历史家来做这个结论。再好好看吧！

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活人比死人还要麻烦，不如枪斃他就完了，他还要活几十年，你还要防备他几十年。我相信他们有人是要报复的，有人说要杀几千共产党，几万共产党，当然不一定是为了肃反，有冤恨在心里。但是何东昌他为什么不想好好了解这些事情呢？他脱离了人民！他没有好好的去检查么！你想想，是不是？”

（清华大学学生 馮国將）

（二）关于党的领导

“扩大化的责任应由中央负，已经过五二年大规模的镇反运动，

肃反运动是否还有三千万，全国解放以来，被镇压的是否有三千万都是問題。”
(北京俄語学院师范翻譯系整理)

“中央指出全国99%是好人，百分之几是坏人或反革命的說法不对，肃反的錯誤中央負責。”

(中山大学 陈乙华)

“中国与波蘭走一个道路，波蘭肃反錯了，处分了肃反領導人，我国也錯了，这回中央一定会处分几个領導干部。”

(中南矿冶学院 雷 冲)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肃反都搞糟了。肃反的錯不是錯在那一个單位，而是錯在党中央。”

(武汉測量制图学院 彭树森)

“为什么肃反只有共产党領導，不讓全国人民参加呢？”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荣 斌)

(三)关于政策問題

“肃反中所以冤枉了很多人是因為領導上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5%的任务数执行了大胆怀疑的方針，把有历史問題的人斗了又斗，严重違犯了法制。七个人一个晚上审查了一千多人的档案。确定对象，而把爱好文艺的人当成胡风分子打，如××就是被逼瘋了。調查材料的干部好大喜功。速成中学的工农干部搞肃反，他們根本不了解知識分子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最初定出的5%控制数就是扩大化，肃反的指导思想是受了斯大林之錯誤理論影响，下面干部宁左勿右，在政策中对反革命分子没有一个真正定义，很灵活，如参加复兴社，藍衣社，軍統中統的人，可以說是反革命，也可以說不是反革命，……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沒有按照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来处理。

胡风是反革命沒有說服力，文艺上和中央某些同志有意見分歧，不能說他是反革命，这可能是文艺界之間的派別問題，胡风問題打击面大、广……只要有类似胡风的言論就說成是胡风分子。

高饒事件，从公布的文件看，也缺乏說服力，高饒之錯比之王明、李立三那还是差得远呢？何况他們功劳大，有領導能力，党内即使形成反对派，也沒有什么不好，現在……只要有些不合口味的就要干掉。

現在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很好，但过去杀的太多，这就不人道了。

中国肃反扩大化与苏联不同，苏联杀党内的多，我們搞党外的多，苏联杀的多，我們打击的多。”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55年以后，肃反范围扩大化，弄得‘草木皆兵’，中央提出百分之几的是反革命，各机关拼命找反革命分子，这种做法与过去关于階級斗争的理論有密切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鍾溶华）

“肃反中大胆怀疑的办法使肃反扩大化了，肃反造成了人民关系的緊張。大胆怀疑的提法是教条主义的結果，这种提法是主觀、唯心的、反科学的，这和胡适的‘大胆假設，小心求証，有什么区别？”

（北京俄語学院 宮宏道）

“我認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殘。……当

时的方針(指肅反方針——編者注),大胆懷疑是錯誤的,它不能把一切可能性變為現實性。所以肅反是方針政策的錯誤,不單是方式方法上的錯誤。”

(同濟大學 汪長風)

“肅反中五人小組為什麼不加民主人士進去呢?”

(中南礦冶學院 曹文炳)

“我國肅反運動是在斯大林的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指導思想錯了,很難說不擴大化;同時55年國際形勢和國內階級鬥爭形勢日益緩和,是否需大規模肅反,值得研究。黨中央規定的5%控制數字太大,造成下邊亂捕亂鬥。

肅反中捕人未經檢察機關,不合法。”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

“五五年的肅反在理論指導上是錯誤的,是在斯大林的所謂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理論指導下,看見出了胡風和潘漢年,就以為天下要亂,於是開始了肅反。其實五五年那時階級矛盾實際上是比以前緩和多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何世芬)

“羅瑞卿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報告是以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為指導思想,而造成肅反擴大了。”

(北京俄語學院師範翻譯系整理)

我對黨的肅反政策產生了根本懷疑,因為五五年的肅反是根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愈尖銳’的錯誤公式而進行的,採取象蘇聯一樣的‘紅色恐怖’,不知搞錯了多少人!

(雲南大學 李純仁)

“肃反的錯誤是党的政策的錯誤，党的主張‘左’勿右，肃反时同學們是味着良心去怀疑別人，这种大胆怀疑政策对人进行斗争是違反宪法的行为。

肃反沒有法律也沒有政府，一切全是党的系統，全是黨員了，在沒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把政府搬出来。

肃反的目的是达到了，但錯誤是大大的，肃反的錯誤，造成党和群众的隔阂，党中央对肃反的百分数的估計是不科学的。黨員相信党中央，就好像教徒信耶穌一般。”

（天津大学 包 誠）

“肃反的錯誤，不仅發生在我們学校和山东，而全国也有，这是否党中央在貫徹肃反政策上有錯誤？如果这样，那末本院党委有說不出的苦衷。再說，有錯必糾，如果党中央有指示，党委不貫徹，那末本院党委应負責，如果不知道，那么党中央也可能犯了官僚主义。我看党中央有宁左勿右的情况，有人說不要光責备春香，也不要光責备小姐，老夫人也应该負責任，我看这是对的。”

（山东师院 秦西燦）

（四）关于群众路綫

“肃反不应当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而应当由公安部門調查材料。肃反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而且讓每个人洗个澡。就必然使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混淆。”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助教 王鉄生）

“肃反不應該發動群众，一發動群众，就免不了要出乱子。因为反革命是少数人，因此不必發動多数人，只要公安机关就足够了。”

（北京政法學院 尹老松）

“肅反实际上不走群眾路綫，三人小組看着那個不順眼，就圍護，最好的辦法是放到群眾中大家來批評。”

（北京俄語學院 ×××

“肅反有關人的政治生命，肉體生命，人權，法制的問題，就不應該採取群眾路綫方式，群眾按個別地看都是主觀的、片面的。

其他運動都可以走群眾路綫，肅反不能走群眾路綫。”

（北京俄語學院 ×××

“我懷疑肅反用群眾鬥爭方式是否必要，群眾運動必然破壞法制，今後所有制已改變，法制已健全，不能再搞群眾運動了。”

（北京俄語學院 張世青）

“只要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就可以了，不必開鬥爭會。”

（北京俄語學院 王繼昆）

“肅反不應該發動群眾，只要公安人員調查材料就行了，發動群眾進行鬥爭冤枉了一些人，還不是要經過調查材料。”

（中南礦冶學院 黃紀忠）

“肅反搞錯了，而錯誤的根源在於群眾性的鬥爭，群眾只能檢舉不能鬥爭。反革命90%以上都是公安機關查出來的。”

（中南礦冶學院 鄧榮保）

“群眾有二個方面，在甲方面是盲從性，在乙方面是自覺性，以前盲從性方面越多，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盲從性就全部為自覺性所代替，而就沒有盲從性。……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應該逐漸培養起自覺性，一直到以後就完全是自覺性。不可否認現在群眾還存在這二方面的問題，因此發動群眾鬥爭我認為是不合適的。……我認為群眾鬥爭

最主要的是一个威力，这在革命初期是有用的。肃反所成功的是在于群众来监督来调查，因为没有掌握材料就这样来斗，很容易混过去，还有是可能被弄错，这个缺点是存在的，如果不采用‘斗’的方式而在群众中来调查了解，我认为这个错误会减少。……

‘肃反’是用群众斗争的方法来进行的，当时有不少人被疑为反革命分子，但证据不够充分，于是把他们摆在大会上斗一通，希望能打出些材料来，殊不知这是违法的。一个人即使真是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充分材料来证实这一点时，决不可对他的人身有所侵犯，如果已有充分材料，就应逮捕，也不可斗争。

‘肃反’是政策路线的错误，……因为我们采用了‘群众路线’。‘肃反’中……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提供各方面材料线索给公安部门，帮助他们进行侦查，却把很大的力量用于动员群众在会上斗争重点分子，以便逼出一些口供来。这种做法首先就违反了宪法，是对公民权的破坏，因为重点分子在没被证实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之前，还是有他的公民权的。”

（同济大学 吴 中）

（五）关于5%的控制数字

“5%的估计数也是错误的。按一亿城市人口计算，全国就有五百万暗藏反革命……这恐怕太不合实际。肃反结果证明各机关只查出了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真的反革命不少机关一个都没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硬要在每个单位搞出5%反革命，这是党的错误，这是肃反过‘左’的原因，这样的话，全国六亿人口就得有三千万反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荣 斌）

“根据中央肃反意見，百分比，七十多人确定四人，事后經過調查，这四个人沒有反革命行动，而历史上参加国民党……結果白白被打……”

“肃反在下面犯的錯誤是十分严重的……开始确定重点时，就是由党支部，人事科，主观主义地运用比較的方法，教条主义的以5%的坏人比率乘上机关人数四舍五入确定……縱容群众謾罵威胁这些‘敌人’。給予种种不人道待遇（除了打以外，法西斯主义所用的逼供……都用上了）。 ”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洪維政）

“肃反5%的比例是教条主义。毛主席講了95%的好人，下面就提了5%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办公室作了4.8%的計划，認為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你把人家（指斗錯的）关上二个月，他还相信你嗎？我們老解放区，只見共产党，沒見過国民党，竟也要打出5%的反革命分子，台灣600万人也占那么大的比重，5%怎么講。”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房文齋）

“中央控制在5%以內，当然就整个來說，全部錯了才5%，問題不大，但是‘被冤者’却是100%的冤枉了，別人就受不起。”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何国芳）

用算細帳的办法来散布他認為肃反扩大化的反动思想。

首先，他問同學們肃反运动时，中央对坏分子估計的百分比是否是5%，若是，这个百分比就太大了。1%就是600万，5%就是3000万，未成年坏分子算在內那数目就更大了。从而他得出了中央的估計是主观主义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刘文华的材料）

“研究班中的肃反，根本就沒有对象，而是为了完成5%的任务，

硬找对象来搞，結果也沒有搞出什么来，自己当时是积极参加者，現在回想起来很过意不去。

肃反副作用很大，在被斗的人的心灵上所造成的創伤，想也無法消除，道歉也不解決問題（事实上当时研究班肃反斗争的对象，該斗。——原編者）。

肃反的成績和缺点，应拿具体数字来比。

为什么右派分子中不少屬於肃反时被斗的对象，这和善后工作，作的不好有关系。”

（北京鋼鐵学院 李吉夫）

“談到人，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證沒有偶然的錯誤，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說了一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計猜度的話，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据說安徽省有一个銅矿，銅矿里有一位領導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額把400人抓起来了，为甚么5%？大約是毛主席沒說百分之六几或是百分之十几，就按平均数百分之五。我們看靠‘人治’是多危險（据舒同同志报告說山东清查八千多現行和历史的反革命分子，他沒說多少是現行，多少是历史，历史的中間有多少是‘已經交代过’的有多少是雞毛蒜皮的。不过山东有五千万人即使如此也只得六千分之一），毛主席的偶然估計錯誤，可能根本是誤会了他的意思，竟弄出非搞百分之几定額不可能。”

（山东大学 东星北）

“党中央提出5%与汪精衛的宁可杀三千，不可漏網一个，有什么差別。”

（北京俄語学院 范 森）

“5%的預定数太大，造成下面就要完成这一百分比而乱斗錯很多人，中央估計太主觀，下面执行又太教条，所以造成严重的錯誤……

“中央肃反方針提5%是錯了，應該是零几就对了，要求公布肃

反数字，肃反不能怪下边，这是中央的布置，下边不这样是右倾。”

（北京俄語学院师范翻譯系整理）

“肃反运动的指导思想，当时是根据斯大林的錯誤理論来搞的。教条主义的确定斗争比率5%，因此引起了下面同志乱怀疑。”

（北京俄語学院 王繼昆）

“党中央提出5%的标准是没有根据的，不知根据什么提出5%的标准，如果有5%，全国是否可能有三千万反革命呢，是否斗出了5%呢？所以下级歪曲了政策。”

（中南矿冶学院 余树槐）

“肃反認為95%是好人，5%是反革命分子，因此各單位来找5%的反革命分子，沒有也要湊数，形成偏差。經過肃反运动后，出現了一种情况，逢人只說三分話，‘六亲不認’，大家認為朋友越少越好。肃反运动是殘酷的神經战，如需要，直接逮捕就算了，何必發动大家呢？”

（四川大学 袁家駒）

（六）关于所謂“肃反扩大化”

“如肃反問題，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說沒有，我不同意。他和苏联比較，苏共17次党代会錯捕中委170人中，有98人槍决。17大代表1966名中，1108名都被搞掉，斯大林摧毀了列宁所培养的一个时代的干部。这个破坏法制是駭人听聞的，把两个民族的人民都流放在西伯利亞。中国当然是好得多了，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相当一个小国家。肃反的理論根据也是錯誤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階級矛盾越来越尖銳化这理論的錯誤指导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馬研班在肃反运动中‘整’一些有历史問題的人是‘犯了錯誤’，是从‘宗派主义’出發，这些被‘斗’的对象，只是‘一些有思想問題的人’，对这些人是不公正的，肃反搞的不对头，没有什么成績”，他覺得把有历史問題的人在肃反中搞清历史，似乎是“扩大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的材料)

不抓材料就斗，斗錯斗死非常盲目。如商校(青島)肃反时沒有材料根据，只根据人家已交待的材料就怀疑就斗，光憑拍桌子打板凳，80个教职員中斗了百分之三十，逼死了三个，結果一个反革命也沒有，后来一个个賠礼道歉，这不是扩大化了嗎？”(青島商业学校已來材料証明其全系造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惠貞)

“肃反到底有錯沒有？肃反不是大扩大，就是小扩大，我叔父就是被逼死的，我知道的一人就是錯了，全国不知有多少了。”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王树才)

“被斗的人是不是現行反革命？如果是，應該交法院按法律办？还是用变相逼供等方式在个别單位进行？……按百分比去抓，因此历史上有一些問題，說怪話的人就倒霉了。領導上按5%交群众斗，群众根据領導上規定的，总是希望把被斗的人斗成是反革命分子。我想在坐的参加过肃反的同志都会有这个心理。情况既不掌握，交群众去斗，就不能不發生錯誤。肃反並沒有充足材料，用主观主义的办法更斗人家，我們机关就是这样……例子还很多，我認为这如不是扩大化就很难理解了……为什么肃反中要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如知道他是个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不抓？如不是，而又斗，是不是要冤枉人？現在問題是为什么調查以前就先斗？斗了人家再進行調查，这样就是对的

嗎？党中央是根据什么用百分比来斗的？这就是主观主义！，肃反究竟是不是扩大化，这应由党中央說，因党中央掌握全面情况。我的体会就是扩大化。……”

“同意林希翎提出的肃反扩大化。肃反扩大化是有的，而且也是1955年—1956年胡风問題后表现得突出的。肃反的理論根据是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錯誤公式。斗錯的人不是三、五个，三、五十个而是不少。肃反扩大化是按錯捕、錯杀、錯斗和应捕应杀应斗的人的比例来算的。我原工作單位，西康省财政厅斗了二十多人，一个反革命也沒有。四川财政厅斗了不少人，也沒有一个反革命。我們一个科就有两个自杀的（經調查証明：兩处均有反革命分子。——編注）。这一切都說明1955—1956年肃反是扩大化的。全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毛主席說‘肃反沒有扩大化’。这一提法，作为一个公民我是怀疑的。我是根据我的肃反扩大化的定义，結合我耳聞目击的現象提出疑問的。我們是否能把中央一句話就完全相信呢？毛主席說一句話就叫我相信，叫我們作阿斗嗎？我認為斗錯的人，不但应給精神安慰，而且要物質賠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榮）

“肃反扩大化斗錯很多人”。并說：“这些反革命只不过是給更大的头子当走狗”，羡慕唐太宗“貞觀之治”时期所謂的“清平盛世”，認為“貞觀之治某年只杀了19人，而現在杀人太多了。阶级斗争太殘酷了”。并不同意以群众运动方式来搞肃反，認為只要用内部审干的办法就可以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的材料）

“肃反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相对而言，因此杀錯了一个人也称是扩大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戴逸樵）

“肃反扩大化。1955年的肃反，有兩大錯誤：（1）理論上的錯誤，来源于斯大林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2）毛主席的5%的比例是主觀主義的。把小問題看成大問題，大問題看成了反革命。到处乱調查，花了許多錢，捕風捉影。真是所謂‘大胆懷疑，小心求證’，影响极坏。”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李之杰）

“肃反运动斗争面太大太寬了，如我們报社斗了五个人，一个也不是反革命。許多人本来是靠近党的，这一来反而疏远了。运动中极力反右傾，而又無根据，被斗的人被剝夺了一切权利，这难道不是破坏法制嗎？”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俞国亮）

“我認为扩大化就是不該杀的杀了，不該管的管了，有些思想問題的也斗争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李树屏）

“我国的肃反扩大化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与苏联的概念不同。他們錯杀了人，我們錯怀疑、錯斗过好人。”

“現在我們对犯人还有肉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罗旭暢）

“肃反是党学习苏联来的，苏联的肃反是斯大林的錯誤扩大化了，而中国是学习苏联，所以也扩大化了，如鋼院有很多人被斗錯了，如刘景芳斗錯了，故周总理报告說：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別的，…我不同意，个别地区就是缺点是主要的。”

（北京鋼鐵学院 焦世龙）

“肃反扩大化了，肃反提出的‘大胆怀疑’和百分比是反馬列主义的，是胡适的方法論，当然有偏差。”

“为什么会产生‘肃反’扩大化的錯誤呢？

(一)教条主义横行，搬用了斯大林的錯誤理論：

斯大林錯誤未揭發前，他的‘社会主义建設愈进步，階級斗争愈尖銳’的理論一直为党对敌斗争的金科玉律。‘肃反’前，国内恰好又揭露了胡风事件、李万銘事件和高饒反党联盟，这就使得教条主义者看来完全适合我国当前情况了，于是产生了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化了的‘肃反’运动。他們用怀疑的眼光和粗率的手段审查一切人。这种以一般理論代替具体性的事物，是犯錯誤的根源，更何况这个理論本身就是錯誤的。

(二)宗派主义横行，‘肃反’运动并未与政法部門密切联系：

‘肃反’的工作干部很多都是非政法部門的黨員干部。他們既不通曉調查研究，又缺乏法制知識，这样便产生了材料粗糙，甚至有些虛假的現象。加之有些部門急于想把‘肃反’推向高潮，不惜損伤人民的民主权利，企圖借群众压力获得調研中所沒有的材料，結果几乎各單位都产生了‘压’、‘逼’、‘追’等不合法制的事件。

(三)沒有承認錯誤的勇气，也不及时弥补錯誤之惡劣影响：

‘肃反’明明有錯誤、有付作用，但有些領導不敢承認，企圖用時間来冲淡那些被斗錯者的記憶。我認为党領導在‘肃反’中是犯了一些損伤积极因素的錯誤的，現在正是改正的时候了。”

(四川大学 楊繼勃)

“(一)造謠言吓唬同学

从肃反一开始党委就放出了一种气氛，使人感到我校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上行下效的教条主义使党支部更加紧在同学中制造緊張局面，領導在肃反动員大会上宣布：我們級上就有反革命分子！使同學們在同学中去找誰是反革命，且有同学被看管起来了。

肃反無声無息的結束了，也沒有宣布誰是反革命。

(二)划禁地，軟囚群众

各式各样的清規戒律限制了我們，寢室变成了我們的囚房，禁地。为了肃反紀律，負責人專門召开大会进行指責，那种蛮橫的态度确实使人生气。我們要質問肃反的領導者，这是違反宪法，侵犯人身自由，也違反党中央的肃反的方針。

(三)肃反形成了兩批人——肃反中突出是形成了以黨員为中心的宗派主义集团，这就是当时的所謂的积极性分子集团，这些是能听从命令，指东不去西的人，这些人特别是他們中所謂的核心分子成了同学的統治者，在群众面前盛气凌人，驕傲、自滿，目中無人。然而还有另外一批人，这就是当时被囚禁的广大同学，这些人被剝夺自由公民权利，而处于被統治者的地位，他們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此时成了被專政的对象，这就出現了当时的統治者与被統治者的对立。”

“……党中央对情况的分析和認識是犯有重大錯誤的。例如中央在肃反时指出，在我們中間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这就是說还有百分之几是坏人。党中央提出的比例是主觀的結論，是有肃反扩大思想的表現，也是造成肃反中各种錯誤思想的根源。中央的这种扩大化思想对下面的影响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把它奉为“聖旨”，因此在我校一开始就造成了緊張空气，党委完全捕风捉影的乱下决定，就是我校党委不仅教条主义执行了百分之几的指示，而且还在自作聰明的發展，不分情况地要求达到百分之几的比例。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优良作风，但是党委在肃反中却严重的破坏了这一路线，压制其他組織的作用，党委独行單干。我們青年团是党所一手培养起来的有力助手之一，在党的任何工作中，青年团总是走在前面。然而在群众的肃反运动中，党委不仅沒有發揮青年团的組織作用，而实际上撤消了团的組織，停止团的一切活动，严重地破坏了青年团的独立性，因此使各組織处于旁觀的地位，也大大發展了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由于党委严重的脫离群众，沒有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内濃重的宗派主义，使肃反沒有达到預定的目的，而

帶來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四川大學 何双全)

“当前大家对肃反有意见,是因为肃反过分打人的厉害,以致于肃反之后,人与人之间冷酷了,夫妇之间也互不信任。”

(武汉測量制圖學院 董金淵)

“肃反是有很大的成績。但是肃反的根本对象是現行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对于那些早就不干,立地成佛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是不感兴趣的。換句話說,肃反就是干脆抓特务,从这观点看,成績是次要的。可惜的这些人們都暗藏着,这就不得不連累到那些倒霉的人了。但是这些倒霉的人又不得不倒霉一下,否則暗藏的特务們沒法抓出来了,肃反本身从对象、目的、要求来看,是扩大化了些。”

(同濟大學 舒展〔鍾亮明〕)

“在肃反問題上扩大化了。成千上万的人無辜受害,全国遍布集中营,而其手段之殘酷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来得悲慘和可怕!在这里法律都絲毫不起作用。共产党具有無上的权力,有生杀之权,有私設私庭,任意捕人、关人、斗人的权力,在这里我們嗅不到一点民主的影子!……整个肃反运动是在一种可怕的方法論指导下开展的。它主要是:‘力圖找出一些材料以証明其反革命而在表面上沒有矛盾’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人民日报社論‘在社会主义日益巩固和壯大的今天,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就会越猖狂,斗争就会越激烈’。这显然是斯大林錯誤公式的翻版。肃反运动中,奇怪是宪法根本不起作用,人身沒有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人的尊严受到破坏,共产党人根本不要法律,在他們脑子里只有斗争!斗争!打、杀、强奸什么都出来了,这令人想到过去的农民革命!”

(武汉大学 陈熹勉)

(七) 关于所謂違反宪法問題

“党中央关于肃反的口号是正确的，而在学校中抽出学生搞材料，影响不好，被大家認為他（調查材料人）是特务。对学生历史費那么多勁搞，用不着。他們解放时，才只有十岁多；教师搞肃反时，叫我們学生当护校队。（中学平时也有护校队）实际上是監視他們，違反了宪法規定的人身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范書謙）

“肃反破坏了宪法，破坏了人权，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和通信自由，肃反过火了，大大的超过了肃反政策。一言一行都要批判，同事、朋友、亲戚、家庭受牽連，搞得同志間惶惶不安，朋友間，不敢講知心話，关系搞的不和洽，不敢暢所欲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肃反时禁止干部外出，徐認為从法律角度上看就是犯法的，55年宪法公布已有一年，斗錯了人不仅对人刺激很大也是对人的侮辱，同时也違反宪法上的人身自由，我們机关斗了5、6个人，一个都沒有。这是否教条呢？还未有結論，斯大林就訓練苏联人这样的观点，一百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反革命，都杀了都不应有任何怨恨。”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徐上迈）

“象肃反这样的群众运动，就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说是必要的；但就人类永恒的人道主义原則来说，是一种不合理的現象，是侵犯人权的行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易志力）

“在肃反的非常时期，在特权在握者們的眼睛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不适用的，看不看，类似于‘非美活动調查局’的杰作，不是一一重版于解放后的新中国？你如果竟然要据‘法’以爭，則只能怪你自己‘書呆子气’太重，且慢，再贈送不識时务的‘教条主义’称号一个。”

（山东大学 王馥宇）

“肃反运动是过火的，野蛮的，超法律的行为。这是我国非常不体面、不文明的事……帝国主义也因此污蔑我們。”

我認为肃反工作由公安部門去搞就得了，不需要那样大張旗鼓，就是發動群众搞，也不应该硬逼把人家看守起来。”

（蘭州大学 方文信）

“肃反时群众斗争，要被斗者低头是違反宪法的。”

（中山大学 楊熙旭）

“肃反是有組織、有系統、大規模的破坏宪法。”

（中山大学 張志强）

“肃反是違反宪法，錯打許多人，所以在肃反时有許多人自杀、跳河投井，还有信件突然被搜查的事情。”

（中山大学 周 爽）

“肃反是苦打成招。”

（中山大学 廖斗南）

“这几年来共产党做得最不好是肃反，特別在宪法公布以后搞肃反，是自己制定宪法，自己又去破坏宪法。”

（中山大学 周达仁）

“很多被斗的人没有一个例外不被搜查，搜查事先沒有說清为什么？到今天还是沒有說明是为什么？这样如果發生在延安，將一个人的包袱打开来看看，倒是情有可願，然而今天宪法公布以后，在肃反中还有許多違反政策的事情。”

（中南矿冶学院 胡为柏）

“我們国家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呢？我是不怕法治的只是怕人治的……多少革命先烈鮮血换来的宪法，肃反运动时那里去了。”

（中南矿冶学院 徐滢哲）

“血債要用血来还，犯法者应受到制裁！打倒走狗奴才，打倒迫害青年学生的劊子手。”

“正义的人士行动起来吧！阻止那些奴才走狗對我們的迫害和暗杀吧！假如我們的眼淚不能洗尽共产党的臉上垢，也希能讓我們血淚的控訴，替党丟掉那些害群之馬，我將以絕食的实际行动，維護我們神聖的宪法。”（以上兩則是在新华書店貼的反动标語——原編者）。

（中南矿冶学院 奚士良）

“肃反是主观主义……5%是主观主义的錯誤”。“全国肃反扩大化……。人权無保障，人被監禁几个月不能出校門。肃反采取群众斗争是違犯宪法的，有宪法的国家都不能这样做”。肃反是侵犯人权，毁灭人性，喪尽天良，肃反打人、灌腸全有。肃反成績是次要的，缺点錯誤是主要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肃反中关人打人，不給褲帶，污辱，侵犯人权。”

对于法制不健全最不滿，我覺得宪法虽制定出来，但政府实际上又超越宪法做事，好像宪法上說：人民有言論、結社、集会、出版自由，可是肃反时动不动就怀疑別人反动小集团，甚至常在一起玩也怀疑

是集团，說錯一句話記下来作为整的根据，那敢私自出版什么刊物。

宪法上說公民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的自由，可是肃反关了很多
人，又不是反革命分子对他們搜身，呼喊，甚至毆打。

在解放軍中肃反把每个人輪流来斗争并搜身扣押信件等，这难道不是超越宪法的行為嗎？”

（北京鋼鐵学院 彭卓宗）

（八）对积极分子的誣蔑

“肃反是党团员和班三角的报复，随便确定斗争对象。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下面积极分子又是一套，偏偏不听上面的，把錯斗的人当作敌人。”

（中西矿冶学院 赵澤霖）

“肃反搞錯了，对違法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应该受法律制裁，在肃反中入党入团的党团员应重新审查。”

（中南矿冶学院 童本惕）

“这次肃反确切地說，是出卖良心爭取雄厚的政治資本升官發財的一場骯髒的競爭，結果有的选上了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而那些被迫出卖良心的及沒有出卖良心者都落后，自然是落后分子的下場。”

（中南矿冶学院 吳傳鈴）

“‘三人市虎’‘曾参杀人’这些有名借喻，早在战国时代已經对那种‘道听途說’，‘以訛傳訛’的糊塗虫嘲笑得淋漓尽致，另方面也襯托出輿論的力量，不过当时既沒有馬列主义，而有判明真像的能力的‘布衣之士’‘庶子黎民’毕竟也很少，这姑且可以有之。

時在三千年後的今天，深受辯證唯物所重陶的青年，對於一件事或一個問題，如果不加以全面的調查研究乃至印証，而反之依憑着手頭的一些材料，拌和着濃郁的主觀臆度，立即作出或褒或貶的結論，這未免太滑稽了吧！這種人稱之為‘落後三千年’，可以說是恰如其分。

問題還不光如此，值得關心的倒是那些被褒被貶的今後的思想變化。”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丘清輝)

肅反肅錯了人，而一些人在肅錯人的基礎上都成為積極分子，那麼一些殺人放火的人也可得到獎賞了。以前黨聽慣了歌功頌德，現在是再也聽不見了，若你們要留戀這些的話，可以到教室里去陶醉。”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王方行)

“肅反積極分子應交群眾審判

第一，在肅反中偽裝‘肅反積極分子’，乘機打擊群眾，有意識損害他人，而求利祿的人，希望黨委查清名單，交給群眾，落在群眾手裡，讓群眾審判。

第二，黨委從速取締‘肅反積極分子’的稱號，從速處理當時違反人權的一批社會惡棍。

第三，向群眾公開坦白，假公濟私，假公報私仇的行為。並且向群眾讀悔過書。”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張劍澄)

“肅反積極分子是假積極分子，是為了公報私仇，不惜捕風捉影，捏造事實，對言論斷章取義，曲解事實，限制言論、行動、通訊自由，私設公堂，侵犯人身，強迫逼供，諸如此類的作風是違犯憲法，這樣的積極分子不撤銷還有什麼理由保持下去呢？肅反得不償失，沒肅出幾個反革命。”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魏征戌)

(九) 关于胡风反革命問題

“胡风問題是辣手的问题；你对胡风怀疑就是反动，反动=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一套公式，罗瑞卿就是以斯大林錯誤理論作依据。

对胡风究竟是否反革命，誰也不能肯定，即便法院判决，也不能作出結論，就是尸体爛了也要恢复名誉，苏联即这样。現在对胡风問題值得怀疑，这是破坏法制，为什么迟迟不公布，根据胡风三批材料是不能依此定罪。我也曾写过兩篇文章批判胡风，現在看来是很不对的。胡风向党中央意見書大部分是正确的，反对文艺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現中央的‘百花齐放’的方針与胡风意見書甚至精神一致，提意見不能說成是反革命，胡风案件原因很复杂，胡风罵人也罵的够凶，也很艺术的，但依此定反革命罪是很不充分，主要那一时期受斯大林影响，哥穆尔卡說各国党中央第一書記都多少受斯大林影响……”

“胡风問題：这个問題很辣手，因为和主席有关系，是反革命誰也沒有肯定，是否和台灣有联系？过去他对党中央意見書，和三批材料这些都不是确切的根据，虽然我也写了兩篇反胡风的文章，但現在看來有問題。

阿壠、綠原是反革命，但別人沒有材料，向党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沫若說是“反社会主义綱領”，实际上那些意見是对的，現在这些‘鳴、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主义皆是。当然胡风有些論点我也不同意，其小嘍囉尤可恨，罵人罵党中央这是不对的，下流的。但罵人也反革命嗎？胡风的建設性意見是正确的，文艺竞赛是对的。

現在問題有怀疑，国家現在还没做出結論，我觉得案子給檢察院处理它是沒办法的，只是死扣又不懂文艺。这个問題是錯誤的，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有斯大林上述錯誤理論作指导，起义的勇士舒燕起

了不光彩的作用。

三批材料中張忠孝对毛主席的延安座談会的报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主席的报告当时是起很大作用，現在也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科学的文艺理論，再加上那个人崇拜者鼓吹，起了很大害处，为什么不能反映知識分子，限制在工农兵，别的不要。”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胡风問題。从現象上看，党中央是用政治办法来对待思想問題，也許这是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太多了，几乎成为規律。1942年整风后就肃反，胡风問題又是如此，也許这次还要这样。

胡风的罪証是不充分的，照这样看来，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要被逮捕。要求公审胡风，进行民意測驗，我估計大部分知識份子是不同意逮捕胡风的，人民群众会同情他。”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胡风的問題。我看不出胡风是反革命，过去發表的材料不足为証，說和蔣介石有联系（高級民主人士在过去好多和蔣介石有联系）也不是理由，在他家搜出蔣介石的宝劍也不能說明問題。他的秘密活动是因为教条主义不讓他說話，只好下边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我听了林希翎的發言后，完全同意她对胡风問題的意見，胡风集团中作过特务的只有三个，胡风本人只是作风惡劣但不一定是反革命，何况这么長時間还未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我感覺到以前在报上所揭露的三部分‘胡风分子’的材料都是罪証不足的，甚至是莫須有的，那些大都是屬於言論方面的。真有些可憐，那些控訴者，他們不过是一群动摇犹豫屈辱的可憐虫，一群一

窩蜂的犧牲品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 濮仲文）

“用今天眼光看胡风不是反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講師 章 起）

“我認為胡風問題應該及早解決，是反革命就公開制裁，不是就是犯了錯誤。

我向最高人民法院呼喚，及早處理胡風，公開審判，還要請外國記者參加。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我對這個問題是抱懷疑態度的，反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運動，牽涉到規模比較大的全國性肅反運動，這是對文化界的摧殘。我就是要求釋放胡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張芝文）

“胡風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反革命？胡風過去的意見是對的，因為文藝不能清一色，胡風的問題現在還不處理值得懷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蔣濟良）

“人民日報所揭露的三批材料，說明不了胡風是反革命分子，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集團，胡風僅僅是歷史問題，他仇恨革命也僅僅是思想問題，他對黨不滿，偷黨的文件，也不能說是反革命，逮捕後拖到今天還不處理就是違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張可治）

關於胡風問題，劉說“反黨不等於反革命”；“根據三批材料很難肯定胡風是反革命，因此我大体上同意羅蘭要求公審胡風的意見”（羅蘭系清華大學右派分子——編者注）；7月15日追問劉平對胡風問題的看法時，他又說：“胡風集團有些人是反革命，集團中人很多，不能都下結論，胡風不一定是反革命分子，他只是集團的領導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刘平的材料)

“胡风是思想問題，不够反革命分子，胡搞的不是时候，若是出在目前（指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后——編者注），就不一定那样处理了。”（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他認為胡风不是反革命，認為是中央錯捕了胡风。他說：“人民日报三批材料不足以說明胡风是反革命，只是文艺思想問題”，“三批材料的按語都是人民日报一手編出的，并未經胡风申辯，有理由对材料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必須公审胡风、潘汉年、楊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彬的材料)

“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胡风分子是否所有活动，都是反革命，胡风反对老爷，反对公式化；胡风的东西，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主观战斗精神，認為对的就干，是否就不对？而現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你認為毒草的可能是鮮花，不能把人家对文艺方針不滿說成是反革命，应作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韓 楓)

“同意林(指林希翎——編者注)的看法：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不能肯定。应等法院判決以后才能决定。根据現在材料，不足証明胡风是反革命。屬党和党员是否能構成犯罪？是否能說是反革命？我看是偏激。赫魯曉夫对斯大林也是有偏激的。至于胡风偷看了党的秘密文件，是否構成反革命罪行？他偷的是什么？偷的目的是什么？偷了是不是給別人看？党有宗派主义是事实，党过去的保密制度太广泛，这也使看不到的人想看，看不到就偷。如現在我們想看‘参考消息’，到新聞系去看，这算不算偷看？看了后傳出去是不是叫做反革命广播？胡风的理論有許多是对的，党中央怎样看待胡风的理論？胡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如何不对？是否因为‘历史’的原因不能提，就認為是

反革命？有没有这样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中应该绝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应有其他思想、学派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他们没有行动，三批信不能定罪”，“这是文艺界里内部争权，是打击非常进步作家，”并声言“我要为胡风喊冤，”他呼吁我们要有人类爱，要有人道主义精神，不流血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朱维民的材料）

他说胡风不一定是反革命分子，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材料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为什么一定把胡风说成反革命分子？你们有种的可以和我来逐条争辩。”因此，他认为逮捕胡风不合法手续，要求公审胡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韩洪棣的材料）

“我是根据不多的一些事实，出自一种共产党人的公正心，提出胡风问题是否扩大化了这一问题，跟党、跟人民政府商量和交换意见。据我所知道，满涛和吕荧并未加以逮捕，而现在甚至已称他们为‘同志’，发行其译作了，但当时他们却确被宣布为反革命。论吕荧被列入反革命名单还情有可原，因为他当时曾在文联扩大会上大放厥词，为胡风辩护。但以满涛而论，‘罪状’显然是苍白无力了。因此我怀疑当时还欠慎重，是否把问题扩大化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也扩大化在胡风份子名单里了，这说明了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了起来，应当很好地收集材料再判定，不要在热空中失掉了冷静。

关于胡风的意见书，我只看了最后的一部份，主要的是关于文艺自由竞争的建建议，当时是被看作篡夺党领导权的阴谋，视为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其实党今天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胡风的建建议是一致的，中央如果认为可取而取了他的东西就要承认以前是错

了。承認当时对胡风的全面否定是不公正的。同时我还主观感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火行为中是否有意气？我知胡风以前老打击周揚。”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我認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應該考虑，值得怀疑，胡是反革命根据什么？据我看有三：第一，向社会主义进攻总綱領（向中央提的意見書）；第二，胡风的私人信件；第三，胡风集团成員中有反革命。因此我有怀疑：（一），如果他是反革命他是不会自投罗網（指不会直接向中央提意見）；（二），揭發私人信件，違犯宪法，如果將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員所有的信件全部揭發出来，連一句不滿的話都沒有我就不信；（三）胡风分子里有許多是反动出身，但不能作为唯一根据，因此我認为胡风分子如果没有更多事实，中央应慎重考虑，應該檢查的及牽涉到胡风集团的具体人是否是反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馬 馨）

在听林报告以后陈同意林的观点說：“林希翎的报告有道理”，并特地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思想批判（作家書店出版的）等書，認真加以研究，以論証胡风不是反革命，研究以后她就立即到处点火說：“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批判一書，前二集有‘反革命’三字，第三集以后就没有了，这說明胡风是否是反革命誰也沒有确定，你們誰也不能作結論，中央还未作結論呢？……沒有根据隨便說人家是反革命或者不是反革命”。又說：“胡风向中央提意見書，这不能說是进攻，意見誰都可以提，有什么不可以提的……如果是进攻，那不是自投罗網了嗎？”并將書中唐弢文章中的話念給別人听“胡风呢？向来站在我們这一边，做过革命工作，至今还是人民陣营里的一員……”，以証明胡风不是反革命，还說：“你看！怀疑胡风是否反革命問題的，还不止是林希翎哪！”“过去林写过文章批判胡风，而現在替胡风叫冤，林觉得过去幼稚”，“胡风案件已經很久了，但二年来具体案情一直沒有公开，这也是很使人怀疑的事”。又联系到貝利亞問題說：“苏联处理貝

利亞案件，也沒有發表其具体案情，公布的只那么几案”（意思是很使人怀疑——編者注）。

認為“胡風只是文艺思想問題”，“肅反中公布的三批材料，不能說明胡風是反革命……听了林报告以后我是怀疑过是否有人捏造了不真实的材料（那三批材料）給中央……中央又發現了新材料，可証明胡風不是反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陈祖武）

“党以政治手段来对待思想問題。逮捕胡风的罪証是不充分的，人民群众（特別是知識分子）是同情胡风的。建議进行民意測驗，要求公审胡風公布公审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大字报）

“胡風是否是反革命值得怀疑。胡風要是在这次运动中就不一定会逮捕了，人民日报揭發的胡風在日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是些什么勾当，怎么不講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暢）

“胡風問題牽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鑄下了深深的印象，人民感到作的很对，如果現在發現当时处理胡風事件时确有不符法律約束之处（如私設公堂、私拆文件、文字解釋錯誤等等），我覺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領導者，要那样做，人民伤心，領導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無百利，政治的天平最灵敏，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馬列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統一說者，如果在动机与效果上是好的，他就那样做。”

“一、胡風的組織發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壇，控制了部份出版事业……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絆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办法拔除它，不受

法律条文的約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数見不鮮,然而崇拜法律的人,看不到这个社会規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级斗争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統治阶级有它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他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镇压反对派,以期保自己的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殘酷,所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一規律,他們在九泉之下,应该欣然瞑目,……再看看中国史和西洋史就会摸到革命前程的特性,渾然醒悟,而不至怒髮冲冠到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無情的,它往往用蘭色的手段来达到紅色的目的,他排斥人道主义和人权,……等。使人糊塗到聳人听聞的說法,……听到那位党员說过人道和人权这种話嗎?沒有;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C,托尔泰主义中“爱”和“善”的意旨,而只相信馬列主义的。

四、近来文艺的改革,似乎是采取了某些胡风的主張(如表演,制片小組,刊物独立……等都与胡风意見暗合)但是这是文艺界的自發要求,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是故意說成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

(清华大学 S.C.)

“肃反运动搞的过火,斗的太多太寬,不是实事求是,有些只是把平时表现收集起来搞的。

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反教条主义沒有判罪,胡风是反革命的理由,只憑过去人民日报發表的材料,不說明胡风是反革命問題。……胡风所以如此,是党管的太多,統治太多造成的,……兴趣相投的人可以組織小集团,小集团中的党员可以拿党内文件給其他非党员看,为了了解情况,党员把党内文件給胡风看,是可以的。……胡风的意見与現在右派分子提的有的相同,而現在的是內部問題,胡风便是反革命問題,这在于胡风提意見的机会不恰当而已。

胡风为什么定罪为反革命,胡风不是反革命,拿出胡风的言論来看,只是向党提出了不同見解(与林希翎观点一样)。”

(北京鋼鐵学院 章慕舫)

“(1)肅反是胡風引起的，胡風是否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材料是綱領及三封信，只能說明胡風是一學派，不能說是反革命分子，黨對肅反反應重新估價，加深人民內部矛盾，使誰不信任誰，人心惶惶，不敢講話，如缺點是主要的，應該向人民道歉，人民會原諒的。

(2)肅反對高級知識分子，從談話中略有疑就依反革命對待，應好好具體處理（指不是反革命的）逼死的人應該依法處理，不應靠調工作解決，如中山大學校長逼死三人。

(3)肅反是可以的，但方法是全國性人民運動，即是錯誤的，假使有反革命應向人民說清楚，胡風，高饒的下文都不知道，公民有生存的權利，再有一次肅反運動，人民就要揚竿而起。”

（北京鋼鐵學院 徐滌如）

“沈陽師範學院有二個右派分子支持胡風，說：我們今天的社會里，正需要胡風這樣大刀闊斧的人。那二個人算了不起，在1956年就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要是到他們的面，真要向他們磕二個頭。

胡風不是反革命，胡風很能和現在上映改組是按胡風過去的建議搞的，我國家正需要胡風那樣的有作為的人。

我所接觸的胡風分子都是很能干，能想到新的東西，如阿壠給我們講阿Q正傳時就能講通。”

（北京鋼鐵學院 賈恩光）

“胡風按現在說是不是反革命有問題，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宜判，可以把他放出來鳴一鳴。

對胡風集團的處理有疑問，這樣久不公布處理結果，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呢？胡風集團並未造成反革命事件，也無反革命暴行，逮捕他的理由是否很充分呢？”

（北京鋼鐵學院 盧一安）

“我國是沒有民主的，逮捕胡風的材料也不充足，沒有經過一定

的法律手續就逮捕了。如果仅是根据胡风与反革命分子陈卓的联系而逮捕了胡风，那末，地方工作人員与反革命分子联系，他們也是反革命分子。

中华民族一貫的特点是‘重人治，不重法制’。”

（四川大学 龔 鰲）

“我要冒死談胡风。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集团。

（1）只憑三批材料逮捕胡风是不对的。

（2）胡风的三十万言不是向党进攻，而是向党建議。

（3）章伯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胡风却屬敌我矛盾，如果章伯鈞是右派分子，那么胡风也是右派分子。”

（四川大学 潘英怀）

“胡风的文艺理論基本上是屬於进步的文艺理論的范疇。所以現在就得出結論說胡风是反革命是为时过早的，而說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更是站不住脚。

人民日报發表的胡风的材料只是一部分，而且是摘要。我們从这材料中可以看到一点：圍繞着胡风的确存在一个集团、宗派。但是我們从这材料中却不能意識到这个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什么是胡风集团反革命的政治綱領呢？胡风集团与蔣介石匪帮是不是也联系在一起？有人說他在日本干了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那是些什么样的勾当呢？而且人民日报所加的注解有很多是牽强附会的。这叫做‘五經我注’，而不是实事求是的。

审判一个人的罪行是人民法院的職責。人民日报的許多編者按代替了法院的判決書而对胡风宣判，这是不是恰当呢？胡风案件离現在已經兩年，可是仍未得出結論，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否可以大胆的引出一句話：对胡风的判決存在着困难呢？兩年的偵訊時間是不是合法呢？而且胡风案件帶來了不淺的后果，一些人被捕風捉影地当做胡风

分子。

这样可以得出結論：胡风問題實質上不是一个反革命性質的問題。如要改变这一結論，恐怕只有由人民法院来公布一批新材料。

对胡风問題，有人說鉄証如山，有人說已經是定論。这是十足的教条主义。”

（四川大学 郑尚可）

“胡风是文人，有对馬列主义的看法，只因对馬列主义看法与毛主席不同，就逮捕別人，不管正确与否，应讓大家辯論，为什么以暴力对人？逮捕这些人是違反法制的。

其次，从胡风事件来看，毛主席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書二十万言，（3）組織反革命集团，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書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吧了嗎？”

（四川大学 馮元春）

“因胡风問題党中央情緒有点不够正常，头腦有点發热。因此这次‘肃反’知識份子冤枉被搞錯的特多（与別社会階層比較）。尤以教授为最。显然是对知識分子进步估低了。誰叫你們知識分子有个胡风来！”

（山东大学 楊学孝）

“胡风問題应重新下結論。我認为胡风一些人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一次大冤獄。……

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也不足以証明他們就是反革命。他們都是中国知識界有才子的人。抗战时期他們都是小团体（詩社），他們生活和思想各方面自然有着一定的淵源。解放后，他們不願被教条主义束縛，看不慣文艺界某几个黨員領導的作风，所以有意見有牢騷，無形中也就更巩固了他們的“小团体”。难道有意見、有牢騷就算反革命嗎？胡风的三十万言中，有不少意見是中肯的、独到的，值得採納，

像呂癸那樣的人竟敢在作協大會上不顧“眾怒”，慷慨陳詞，仗義執言，其精神、其人格是值得我們中國知識分子驕傲和學習的。就算他們犯了“小團體”的罪名，我認為也是黨的“大團體”的宗派主義逼成的。現在把他們關了幾年既不公開審訊，又不定罪，這是違法的，知識界很多人是不服氣的，只不過敢怒而不敢言罷了。”

“毛主席在國務會議的報告中說：‘我不贊成大赦，否則，農民要扛扁担，工人要打郎頭，只可一個個地放，陰放一個，陽放一個，今天放一個，明天放一個，但是，不登報……’（大意），我的意思：如果是反革命一個也不能放，應依法治罪，如果不是反革命，就應該大批地放，如果是典型的，還應該登報。試問‘捉胡風集團’也是工农的要求嗎？”

（同濟大學 張稚微）

“讓胡風路翎等出來爭鳴繁榮我們的文藝。

胡風路翎等是文化人，‘一反’之後，再無下文，生死莫明，他們有所謂‘小集團’，然而共產黨員何其芳、林默涵等何嘗沒有小集團？何嘗不在鬧小宗派，為什麼不反他們？郭沫若他是‘無’黨派的，姑不用拉着他問揚等何嘗不在排斥異己？不過他們自認為‘革命文學家’！胡風沒有奪得正統，於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便被作為一個‘反革命’而鎮壓到雷峰塔下去了！

有人說：‘主席說胡風不鬧小集團也還可以說話的’，請問主席毛澤東同志：何其芳也是小集團、小宗派，為什麼讓他們放炮，不讓胡風等開口？

路翎何罪？就因為他寫了小說‘在窪地上的戰鬥’，‘不滿意’抗美援朝么？為什麼不讓他出來寫？

把‘夏天打赤膊，搖着芭蕉扇’也算作胡風‘反革命’的‘罪証’，給別人介紹愛人，也作為揭發的材料，以加罪他們的罪案，這難道是‘革命者’們的高尚行徑么？

最高人民法院必須向全國人民公布胡風事件的下文。”

（北京大學 崔德甫）

“胡风是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要争取文艺界的领导权，这些人只是对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不满，胡风没有政治背景，胡风以前是用马列主义向蒋介石斗争，为革命出了不少力量。”

（北京矿业学院 洪念祖）

（十）关于“平反”

北大右派分子提出要平冤狱，他有同感，认为应该“平反”，胡风问题主张公审，进行民意测验，他对同学说：“校长说北大搞得乱，我说好的很”，更煽动的说：“哼，现在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平冤狱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的材料）

“既然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提到要做全面检查，要‘平反’，那一定错误不少，否则提出的意义就不大。”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 廉）

“在政治班审查我的历史是侵犯人权，破坏法制”。要求党向他交待过去怀疑他的原因，为其“平反”要胡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向他道歉，恢复名誉，要胁迫组织为其修改历史审查结论。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助教 孙邦基的材料）

“肃反时究竟人家（指张湛——编者）是否有这么多问题，究竟人家是否有根据没有？我看上级应该负责，但我班也太过火了，不说理完全采取打击态度，我认为应公开平反。”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生 王书楼）

“有人告诉我罗隆基主张对三反、五反以及肃反运动中受冤的人，可以平平反；但是有位参事反对，说这还了得，如果地主反革命分

子也要来平反,那怎么办?这位参事,把知识分子和受冤的人来与地主反革命分子相比,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教授 李景汉)

“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有道理,因为过去国家机关是党领导的,錯誤就出在这里。”

(北京政法学院 付成章)

“有人說,群众肃反是难免發生点錯誤的,就只要最后定案处理时不錯,这不算什么錯。我不同意这种說法,應該赶快給他們恢复名誉……这是唯我独尊的表现,这就是說不杀你,而讓你活着,你还有意見嗎?”

(蘭州大学 方文信)

“对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自己也有共鳴,觉得没有什么,毛主席不是也同意可以組織一批人檢查肃反么?”

(山东大学 沈汉祥)

“一个人在运动中受了損失是不可弥补的,人受了迫害終归不能挽回,道歉又怎样,党中央提出的有錯必糾的方針是假的。”

(云南大学 万永欽)

“肃反中存在的缺点是严重的,搞运动一貫是宁左毋右,追查的太多了,有些不成其为問題的亦要追查,使一些人背上了包袱,也沒有公开道歉。我認为肃反中死人的問題应交代,这是非常严重的錯誤,应惩办凶手!肃反中有追逼和扣帽子的情况,尽讓群众来檢查,难道只有群众才有反革命嗎?”

(云南大学 丁光汉)

“我要求学校將肃反中政治上受迫害的人在大課堂召开一个 訴苦会,使受过冤的人都来訴苦。”

(云南大学 戴 林)

“罗的意见(指罗隆基提出的：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编者注)比毛主席的更全面，因为加上了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召开全校性的以平反为主题的‘诉苦会’；成立‘平反委员会’，一方面平反，一方面防止这次鸣放中的报复。”

(云南大学 汪旭新)

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和毛主席提出的平反是一样的，只是出自于不同人的嘴而已。过去参加肃反的党员不能参加平反，肃反本身就不应该由共产党领导。

(北京俄语学院师范翻译系整理)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为了维护革命利益、为了挽回党的威信，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官僚主义的党委会提出建议：

1. 公开档案，征求本人意见，将不正确的结论和材料当面焚毁。
2. 给予领导运动不当的各有关官僚主义分子以适合处分，以服人心。比方说，对当时运动主持人给以惩办使其不再迫害青年。
3. 在各原来的公众场合，由各原会议主持者向被害者公开道歉。
4. 党委会应以严肃负责的态度，还给被害者的名誉、权利，设法弥补其精神损失，医治其心灵创伤。
5. 召开被害者座谈会，倾听其意见，研究其要求。
6. 反对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党委会应当勇敢承认错误，当众检讨，收回‘一九五五年的肃反基本上是健康的，正确的’的错误结论。
7. 对肃反被斗的人，只要申请过入团的就应该吸收入团，以安慰和赔偿其精神损失。”

(北京俄语学院 钟子奇)

“向学院提出三大要求：(一)烧毁肃反档案；(二)惩办所谓不称

职的肃反干部；(3)賠償被斗争一切物質及精神上的損失。”

(中南矿冶学院 刘光中)

“中央說有錯必糾，但現已一兩年，为什么还不讓这些冤魂們伸一冤呢？

要平反，我認为就应该徹底来平。道歉，賠賠罪，难道就那么容易了事么？有人問我是否要杀人。我校大概沒有錯杀的人，因而也就用不着杀人。但在全国說来，不見得沒有錯杀的人。应该怎么办呢？杀人偿命欠債还錢，有法律規定，至于我是不想去杀誰的。我要求的是清算，不是复仇。所謂仇大抵是对敌人而言，有人問我要向人民清算什么？此人民二字安得很不恰当，我怀疑是否想將吾一棍子打死。”

“在肃反中被虐杀的冤魂們联合起来吧！我們永远也不能忘記，那罪惡而黑暗的时期，便衣警察（党团员）对我們的迫害已經使我們喪失了一个公民的权利，肃反中党委剝夺了我們五一游行的权利，并派党团员監視，受尽了人格的侮辱。同学们起来吧！我們要清算細帳！”

(注：原大字报上面画了一攤血，中間插了一把刀)。

(四川大学 張永寿)

(十一) 誣蔑鎮反运动

“鎮反杀反革命77万多人，太多了，过去历代王朝都沒有一下子杀这么多。”

“鎮反时杀人如麻，刑場上到处是尸体。”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朱华荣)

“鎮反是一个‘报复’，是因为国民党过去打了你們，你們現在要

整国民党”。他同情和憐憫反革命分子，他認為“年青的反革命可以不杀，可以讓他們劳动改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的材料）

“各次运动的偏差和錯誤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从团结出發，而是从整人出發。肃反运动偏差是社会問題，不是从团结願望出發，达到团结目的，造成压力，成績少、缺点錯誤多。

社会上有千千万万人受到迫害，在社会上被錯斗了多少人，这是个社会問題。

过去各次运动都是整人，时代过去了，我們應該吸取教訓。”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講師 郭振淮）

“鎮反不过是‘胜者为王，敗者为寇。’共产党要鎮压国民党是必然的。”

（北京政法学院 王 革）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一) 关于农业合作化

1. 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1. 农业合作化是党对农民的欺騙。共产党分給农民土地是欺騙，利用农民，騙他們去打仗。現在又收回了土地，这完全是欺騙；

2. 妨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3. 合作社办得不好，农业合作化妨碍了生产力的發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我不怀疑合作化有优越性，就如同資本主义大农場一样，可以提高生产”，“共产党一方面要建立大工业，一方面就必须搞合作化，否則，就不能有自己長長統治的穩固的基础，”但合作化后农民生活并没提高，潘相臣以自家为例說“合作化后我家生活降低好几倍，可見共产党确实不顧农民利益了”。毛主席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他認為“真可惡，不惜牺牲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即一部分农民生活降低了)使他自己揚了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的材料)

“自从毛主席提出农业合作化以后，接着三大高潮，把国家秩序搞得非常乱。”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李維左)

“合作化高潮的报导是虛伪的，这不是报纸的虛伪，就是干部的虛伪，根据是过去互助組，組織起来就垮掉，中学时替播音站下乡采訪，其对象都是积极分子。”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王树才）

“农业合作社强迫命令，生搬苏联經驗，結果农业作物都减产了，群众大为不滿的說：‘苏联的經驗是这样的啊！怪不得建設了三十多年，粮食还不够吃，把我們的粮食都弄走了。’这种人为的灾害是不应该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郎宝田）

合作化使农民“困难”，統購統銷“害了”农民。他認為合作化前，“忙时，可以雇几个短工……”“年成虽然不好，收成生活总还够了，”然而合作化后农村的景象則是，“这个人也困难，那个人也悲叫”。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王殿彪的材料）

“群众生活不好，比国民党时代还坏。合作化影响了农民积极性。不要合作化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北京政法学院 王明欣）

……合作化的农村是“……后山無树木，前山無花草，死者無消息，存在如塵泥……”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的材料）

“农村农民沒有飯吃要餓死了，由于农业合作化，农民都是各顧各的，耕牛沒有人管都餓死了，現在用人拉犁拉車。”

（中南矿冶学院 焦春台）

“过去是把人当牛馬，而現在則是把人当拖拉机。”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教授 李景汉）

“农业合作化政策是党硬要农民吃大鍋飯。”

(蘭州大学 尚 藩)

“解放后农民生活漸漸貧困,实行农业合作化根本無前途,农村里还有餓死人的現象。”

(蘭州大学 田春如)

“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农民非常不滿,都要求退社,合作社要垮台了。”

(北京矿业学院 單錫运)

“农业合作化問題很多,不要只看北京城外的情况,因为它是全国政治中心,搞的好并不足以为据,应到其他地区了解去。”

(北京矿业学院 張处俊)

“农业合作化条件不成熟就搞了,所以有問題,农民在罵啊。”

(北京俄語学院 沈兆予)

“甚么合作化,农民还不是破破爛爛?!农村現在乱七八糟,农民生活沒有提高。”

(云南大学 張士林)

“几年来党的政策是和馬列主义有很大的出入的。如农业合作化时強調农民自私落后,与馬列主义認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的理論根本不符。”

(云南大学 李佳培)

“农业合作化是搞糟了的,农民为了工分,失去了竞争性,現在乡下是乱极了,乡下生活水平太低了。”

(北京鋼鐵学院 張存根)

“合作化是由毛主席一篇报告搞起来的，是否有点主观。

农业合作化不如不合作化。

对生产来说(据合作社)这是损失，一切靠社听上级安排人们的主动性就太少了，好多人不往前干了，不望发财了，只等着跟着别人到社会主义。

合作化的缺点：

(1)办社农民脱离劳动机构大，人们的主动性少了，处处听指示，在一旁静候。

(2)入社前干活有劲，有计划的人现在没有用处了，入社后，活儿轻收入减少了。

(3)好多人劳动积极性对生产的主动性降低得很厉害。

在工作过程中工作方法上相当普遍地发生过严重的错误，相当普遍地采取了侵犯农民威严的办法，几乎有对地主的办法的色彩，有的地方逼粮有没有饿死人命？

要不是后来改过来，要不是共产党为人民作了那么多好事，以致冲淡了这些错误，人民会大为不满的，这是党的威信惯性起作用。

葛佩琦言论中说，统购统销搞错了，是有其片面的客观的观感看问题，片面是思想方法问题，不一定是什么背景不可。

对资产阶级满面春风，对富农就大大不同。

富农家是劳动起家，党对我家评成份不对”(原编者注：他家评为富农，他认为应是中农)。

(北京钢铁学院 张庆瑞)

“合作化搞糟了，群众对干部不满，生产搞不好，粮食产量下降。合作化搞的太快，干部质量太差，作风太坏。”

(北京钢铁学院 张振华)

“首先就是在高潮本身，有的乡有的区原来只有不够10—20%的农户参加小社的基础，忽而一天二天全部达到高级合作化了，这里面

有些农民，特别是富裕户，是被区乡干部早晚登門請进来的，对耕牛农具的評價……多有偏面照顧貧农的趋向……”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梁彥彩）

“合作化沒有优越性，沒有給农民帶來好处，农民生活沒有改善，合作社的經營管理很糟，主要是由于沒有文化的貧雇农管理的結果。农民坐大車到城里去請願，要求解散合作社，县里沒批准，因为一答应，合作社都会給解散掉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李树屏）

2. 否認合作化的自願原則， 誣蔑合作化“冒进了”

“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原則虽是自願，但原則是原則高潮一到你不願入又怎么样”。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助教 孙邦基）

“合作化‘冒进’了，有多少人是自願入社的我怀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蔣济良）

“合作化表面上強調自願，实际上造成压力，不入社就是落后，入了社要退社就困难万分。”

（云南大学 章忠实）

“合作社有了强迫現象，有些合作社有問題，干部一团糟。四川合作社有減产現象，农民并不是自願入社。”

（云南大学 朱祥亨）

“我国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一个文件强迫完成的，农民并不願

意，合作化后，农民的生活也没有改善。”

（四川大学 代星如）

“从土改到互助组，农民生活提高了，合作化以后农业产量根本没有提高，没有天灾也不会提高产量。合作化搞不好，因为人多心不齐，农民入高级社不是真正自愿。”

（北京俄语学院 郝 钧）

“1956年的工作‘全部冒进’，合作化是快了，由于下面干部积极求功，变相的强迫命令大量地存在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畅）

“合作化运动搞得不好，偏差很大。”“我在湘西亲自参加过合作化运动，还不是出一个通知晚上把农民召集起来宣布一下就行了。”“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一切都较好些，湖南是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中山大学 岑 澜）

“互助组尚未办好，指导员从县上开了会下来说：形势发展飞快，全国已办了高级社多少多少，因此就着手办高级社，显然这是没有思想基础的是避免不了强制性的，我深深的感到区卖余粮，农民的受饥挨饿严重的影响了党对农村合作化政策的开展。”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冷以清、龔亞荣、孙礼賢）

“合作化虽是好事，但合作化的高潮并不是自觉自愿，而是中央‘盲目乐观’，只有局部条件好的地区办社，使农民认识到了社的好处。很多农民因在统购统销时都搞得吃不上饭了，在统购时把农民吃的糠也买去了，农民饿着了肚子只好参加了合作社。毛主席把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农业合作化盲目地硬搬苏联全盘合作化的經驗而冒进了。”

“1955年所以能全国形成合作化高潮，是因为單干戶为了要得到国家的照顧，經濟帮助；入社能得到一定的口粮，不致在統購統銷中吃亏。更重要的是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問題’中批判了右傾情緒，硬搬苏联經驗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針而在下面强迫命令的結果。实际上只有1/2的农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20—30%的貧、中农是等待观望的。現在合作社的情况是：規模大、質量低、領導弱、問題多、不易巩固、增产困难。同时也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使个人收入减少，迫使領導处于被动。为了增产，强迫命令地推行先进經驗，实际上农民是不願接受的，强迫推銷双輪双铧犁，严重地損害了合作社的利益，破坏生产資金的积累；兴修水利，如荆江分洪工程，化了很多的民工，受益的只有一个地方的农民。因此，农民也是不滿意的，特別是鎮江的农民。所以，合作社的命运操縱在少数干部的手里，社員是沒有真正民主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朱荣庭）

“农业合作化冒进了，是由于毛主席的好大喜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朱延年）

“現在农民生活很苦，是农业合作化太快了！合作化的好处說的很多，其优越性一三四……你不要听書本上說的好处，在理論上如何好，講的很漂亮，但要到农村去看看并不符合实际。知識分子一天吃饱沒事。坐在那里摇头摆尾地說什么合作化优越呀！其实他們是不了解实情的。不要只卖弄空洞的理論了，否則农民全打你的，合作化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是走的快了，其原因是：

（一）农民的覺悟不高，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的私有观念很重。

（二）干部培养得不成熟，会說的只是教授助教，农村干部既不会說，也不会作，只会强迫命令。

(三)技术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大机器。应当先搞典型示范,保证提高生产量,那农民才会羡慕,才会参加合作社,毛主席以前的著作很好,感情上也很一致,是实事求是的,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却不好,我消化不了,这个文件是脱离实际的,这篇文章抓不住我的心。这是因为毛主席过去在山沟里与农民同甘共苦,现在到了北京,只听报喜不报忧的干部的汇报,因此是脱离实际的。生活改善的是有,但这是代表少数人的,全国有几个三户贫农办社呢?毛主席不是要把合作化推进得这么快,在高潮序言中指出过这个问题。说农民入社是高兴的那不现实,农民不愿参加,基本上是强迫命令参加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合作化也有教条主义,今年批评冒进,明年必定批评保守。毛主席说二年之内高级社发展到95%,而我们一年内就由2%—95%,这不是冒进吗?小社并大,农民觉悟没有那样快,‘干部没有准备’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说也不恰当,我们那儿还没有双轮双铧犁,而一个村土地工具又都合力使用,一千户不如五十户好,为什么要一个乡合起来呢?因为上级欢喜大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房文齋)

“农业合作化,反了右倾以后,又出现了冒进的倾向(初级社90%以上冒进了,高级社60%冒进了——这个数字记录上有,经对证自己认为没有说过,这里只供参考)。冒进表现在:一方面超越了农民的觉悟,没有等待农民的习惯;另一方面,干部能力弱。

运动的发展是强迫命令的,盲目的。现在,合作社中摊子大,领导差,公有制内有严重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李之杰)

“农民对合作化的意见很大,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下降了,农村闹的很紧张。农业合作化固然好,但是没有条件,生产资料方面没有条

件(指沒有拖拉机——編者注),得不到保証,因此,搞的太急躁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教研室教授 王衍臻)

“农业合作化急燥冒进,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干部的准备条件,与实现合作化高級形式有相当距离。中央在这个問題上是否有錯誤?”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对农业合作化工业化速度問題表示怀疑。我認为合作化有兩個問題不成熟:1.干部;2.农民思想准备。”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党中央和毛主席近三年来在工作中犯了“左”右傾搖摆不定的錯誤;农业合作方面太冒进了,合作化發展太快,应当根据情况成立一个算一个,合作化以后生产率降低,牲畜死亡率特別大;农具乱丢無人管;一般农民都吃不上飯,生活很苦;乡干部,合作社領導貪污腐化剝削压迫农民。統購統銷有錯誤,也影响了生产,現在多数农民对党不滿,如不徹底的糾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現象,共产党是很危險的。”

(北京矿业学院 李 一)

“农业合作化太快啦!应赶快下馬。”

(蘭州大学 何淑愚)

“农业合作化沒有思想基础,因为农民不同意;沒有物質基础,因为沒有拖拉机;沒有人力基础,因为干部不能領導。”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魏征成)

“我們政策一会冒进,一会保守。猪肉緊張是合作化冒进帶來的。”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3. 否認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条条不管用，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不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惠貞)

“回家时农民說合作化优越性是有，但下边問題很大，报纸上光說好話，合作化的优越性，就是十七，八的大姑娘拉犁拉耙，牲口都死了。”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田仲倉)

“全国赫赫有名的耿長鎖合作社在1953年沒有貸款就不能开展春耕生产，向政府貸的款十年也还不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合作化的优越性，不外是大大加强劳动强度；一天做到晚，吃又不飽(指粮食供应——編者)，餓死都未到社会主义。”

(中山大学 鍾木燐)

(二)关于統購統銷

1. 反对統購統銷政策

“党在确定粮食統購統銷的政策，沒有很好的考虑下边的实际情况，留下的粮食群众不够吃，县里組織一个能食的东西展覽会，說‘金猫头’(野菜名)也能吃，引起群众非常大的不滿，說国民党在时也沒叫我們吃这些东西。所以‘官逼民反’我們有300多人暴动了……后被鎮压了，因他們拿的是棍棒，我們餓死了不少人。群众很义憤，說毛主席給我們帶來沒有什麼好处，要我們餓肚子……过去喊毛主席万岁的，現在不喊了，挂毛主席象都撕掉了……产生这些問題的原因是和党

的教条主义的搬苏联經驗——‘余粮征集制’現在統購統銷工作亦不好——按口留粮不合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韋 齐)

“1.統購統銷實質上是国家对农民的剝削；

2.限制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沒有余粮，因而不能發展付业生产；

3.反对統購統銷政策，認為国家从中征收了‘間接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自由市場的开放，我認為不仅要开放，并且要大力宣傳，决不可盖起来，不能管的太紧，太紧太死就会管沒了。我提出了对社会上现实生活不滿，市場供不應求，对于各种包而不办的措施不滿，有的同志批評我是落后，我不滿意，这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存在決定意識的，总之現時生活告訴給我們是不好的，我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由于管理过死过严，使正常的貿易中断，由于实行各种統購禁运，这样中断了城乡正常販运，对于自由市場的开放各不一致，有不同的認識，各地有不同的限制，这样使交流还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內，我認為这种限制应当取消。再一种情况来看，是生产减少了吗？是人口增加了嗎？是管理不善嗎？但为什么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队，并且在粮食問題上，吃飯要用粮票，限制了人的生活，这是历史上都沒有的事情，我們知道八年抗战是很艰苦的，支付的战費很大，都沒有这样的供应緊張，而今天則出現了供应非常緊張。对粮食供应緊張，我非常不滿，解放前减产人口也不少，什么都够吃够用，今天增产的情况下，还緊張，这主要是由于包而不办的結果，是由于計劃不合理，把价值法則过早的排挤之后，自己又跟不上去，自然就不能滿足千百人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張炳鈞)

“統購統銷就是糟透了，農民生活苦的很，再下去要發生宋景詩那樣的暴動。”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資料員 崔志敏）

“統購統銷造成不少農民自殺，餓死，鬧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何世芬）

“統購統銷工人、大學生吃糧沒有限制，而農民是絕大部分吃不飽，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米，這怎能吃得飽呢？農民表面講好，實際是不滿。”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方炎火）

“糧食統購統銷不是購余糧而是購口糧，並且是強迫命令的。說農民自願賣糧是謊話，這比以前還不如。上面很好，下面亂搞，農民上吊的，跳井的都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單思良）

“統購統銷政策上犯了錯誤，許多地方有餓死人的事情，自殺的也有。”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公務員 張 誠）

“每年農民辛辛苦苦所種出來的大米，全部被政府購去了。農民全是吃高粱、小米、雜糧等。我們遼河平原的大米全輸出給蘇聯等國，而東北吃的大米，全是从關內運來的，已經發霉，發苦，簡直不能吃的大米。”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傅鐵城）

“統購統銷搞糟了，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說良心話，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那里去了呢？被幹部們吃光了。”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統購統銷存在严重命令主义，干部强迫农民卖粮，某些农民卖完粮后沒飯吃逼得自杀。粮食和棉布供应問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面宣傳粮食和棉布增产了，一面又說棉布和粮食不够用，这里是否有虛假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統購統銷后，周自称在街上見有农民討飯，認為“統購統銷偏差太大”，并向机关說：“統購統銷出了毛病，农民进城討飯吃。”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周治德的材料）

“农业合作化后，我家仍旧很苦，一年缺好几个月粮食。农民辛辛苦苦所养的大肥猪也全部被合作社和食品公司收購去了，在农村，农民吃不到猪肉。猪肉出口，供給城市的消費去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内蒙地广土肥，农产丰富，然而农民吃不飽，粮食都被汉人‘統’走了。农民粮食不够吃，可是政府硬說够吃，安徽省有二、三万农民挨餓逃荒到内蒙，沒有地方住，就挤在火車站里，火車站象个貧民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森达賴）

“家里粮食不够吃，人民吃杂粮，这些粮食都运到苏联去了。”

（中南矿冶学院 朱德君）

“有許多地方名义上卖余粮，而实际上是卖口粮，甚至连口粮卖出去还不够，还要拿杂粮来抵，……党一面对人說是够吃的，政府一面向老百姓說粮食的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那么为什么农民还叫吃不飽呢？粮食到那里去了呢？向国外換机器，無償地援助給印度和其他国家。”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冷以清，裴亞荣，孙礼賢）

“統購統銷虽然好，但应当讓农民吃饱肚子，我經過黄河，回到家乡看到农民生活很苦。

农民生活有了提高的說法不能一概而論。乡干部很多不依政策，家中不够吃，还要購粮，投資，不然就要綁起来。”

（武汉測量制圖学院 宁津生）

“猪肉之所以供应緊張，是因为統購統銷合作化的偏差，农民入社不养猪了，猪肉緊張，市民买肉排队，人民的呼声是非常不滿的。”

（北京矿业学院 刘馨棣）

“农业合作化后猪肉少了，至少农业合作化問題，政府把粮食收光了。”

（云南大学 錢××

“感到統購統銷偏差太大，农民一天能吃一頓飯的很少，認為‘左’了。地主富农有对抗的（对抗統購統銷）政府就判徒刑。……为什么五、六十斤粮食就判几年刑。”

（北京政法学院 張毅臣）

“說統購統銷巩固了工农联盟是夢話，除一部分貧农外，50%以上的戶連种子也交出来了，打一千斤要卖一千斤，老百姓說：粮食給干部吃了，这使百分之几十的干部受到打击。說服动员反資本主义思想后誰报上卖粮誰走，未报的繼續留下說服，这种‘熬鷹’的办法，使有些老头嚎啕大哭，就算二千万戶吧，也影响了一万万农民，这使多少农民受了損失，使他們認識工人老大哥了。‘工农联盟’只是到了春节叫几个工人下乡去联欢，而統購統銷却影响了那么多的农民。”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房文齋）

“統購統銷搞糟了，破坏了工农联盟，把农民的生活統低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江澤純）

2. 誣蔑“三定”政策

“有人說‘糧食政策好的很，’也有人說‘糟得很’……但是說糟得很的論者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根據，因為官僚主義，特別是革命主義，統治着農村……在統購運動中，雖然有田畝數字可憑，但是那塊田產量隨人隨地各異，不從實際出發，層層分配任務，奇輕奇重的現象層出不窮，加上有一股好大喜功的風氣，省分到專區是一千，專區分到縣就是一千二，縣到區就成了一千四，區到鄉，鄉到戶就變成二千哩！我們管這個叫‘靈活機動’……這樣當然任務就更脫離實際了，看看那個幹部叫聲重了，就要被分析畏難思想，這邊說‘你是代表富農利益’那邊說你同情中農的自發趨勢，‘立場有問題’……但是‘挑皮’的群眾卻不會象你所想的那樣聽話，可苦了區鄉幹部啦，任務分配不下去回來又得挨機關槍打（就地小練兵），大炮轟（集中大練兵），基層幹部的命令主義就走到最高峰，花樣百出之意多。鹿寨有採用疲勞戰術划地為營的……從天黑到天亮，最後搜查捆打，追逼一套套就來了。

……運動象股風，統購任務完成，統銷就不管了，誰要買糧食就找鄉政府，鄉長不在家了，大權夫人來代替，你填多少全憑自己，不應買的也買了，還沒到時候，統銷控制指標就完了。真正缺糧的更焦急，糧食存的就乘機搞黑市，因而55年廣西部分縣糧食黑市出現50元一担米，三元一担木材漲到30元……于是有成村、成鄉上山挖草根樹皮的……個別地方群眾罷工不生產……當然就有中毒或全家餓死的……群眾成群結隊包圍幹部，包圍鄉政府，要求給飯吃……隨大批農民擁入城市，糧食統購統銷糟的很的消息就傳遍全國了。我估計糟的很論者，應該承認還的確就是事實的真象，就烙印在人們的腦子里了……在农村里，黨群關係表現的緊張也從這時候開始。”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梁彥彩）

“在統購統銷以前的國家定產政策不合理，麥子已收了上級才定產，定的很高，根本打不夠。本是余糧社，統購統銷使得成為缺糧社了。

農民沒糧賣了，就說抗拒破壞統購統銷政策。這個政策本質是‘老和尚經是好的，就是和尚娃給念錯了’，但中央也要負責，把農民的糧食都拿給工人太不合理。”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統購是‘認真’但統購就有了問題，政策到了實際貫徹時就變成強迫逼得農民沒有辦法，只好將吃糧賣掉，到了沒糧食想買的時候，不但受到了很大的阻難，不被批准，即或批准了，往返運費加在農民頭上，這就是純粹無形的對農民的勒索……‘三定’政策是定產高，定購‘認真’，定銷搪塞。”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徐盛桐）

“我們‘購得多，銷得少，他工作的地區，83—90%都是缺糧戶，政府只准每人每天控制在2—4兩米的範圍內，自報公議是形式。統購統銷引起社會混亂，出現黑市，買不到糧食，蔬菜，病人沒菜吃，只能吃鹽水，農民吃野菜。農民與國家關係不好，農民喊得很凶。七、八個鄉農民起來鬧事，政府派軍隊鎮壓，事後找原因，認為有反革命，抓了些人，群眾害怕了，承認了錯誤，但問題沒有解決，仍不向農民供應糧食，却要幹部動員群眾吃樹皮，吃草根，發揚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光榮傳統。我們的領導同志罵農民：‘國家工業化都給你們吃光了。’最後決定每人每天三兩米”。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曾紀梅）

“56年農業合作化為什麼發展那樣快呢？我認為是糧食、油料、棉花等統購統銷的結果。統購統銷也是採取估產評定的方法，但上面也有一定的統購任務，不完成任務也是不行的，為了完成任務也採取了

征私营工商业税一样的办法，有些农民逼得没有办法就把口粮也卖了，造成了紧张现象，不够吃了他们就到处去吵，农民有的不能生活，农民很怕这种情况，我在乡下工作的时候，农民就纷纷参加合作社，因为这样生产的东西是社的，社是要经过称量，他们再也不受逼了。对农业合作化我认为在工业基础差的时候不应发展这么快，这妨碍了农民积极性。我认为党对待农民完全不应该象对待剥削者的方法来对待，党对农民的利益不够重视，不如象对待工人那么好。”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生 饶松龄）

“我家原是有余粮的，在统购统销时强迫着卖粮，因此家庭生活水平比过去下降了，统购统销带强迫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赵凤祿）

“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很多，我很承认这些。但是出了一些偏差的。54年是搞糟了的。表现在派购偏大。八大报告中說多購了廿亿斤粮食，这样全国都偏大。我乡的农民吃地瓜也很困难。因此，說那一段时期统购统销搞糟了是正确的。20亿斤購多了，这是中央的责任，并不是下面的责任。不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是下面执行有偏差，上面就全对。这样的结论我是不服的。

成绩是主要的这不容怀疑。但是1954年是搞乱了。搞乱了不等于毫无成绩。可能我是先从缺点着眼的。多購20亿斤，一定是以最严格的尺度而言的。不应该认为平均每人多購四斤就不严重。如果每人四天不吃飯，全国人都会餓死”。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何国芳）

“农民留粮每人每月33斤够吃嗎？大家想想我們一个月还吃30多斤，难道农民干那样重的活，农忙时每日工作不下12小时，留得这些粮食怎能够吃呢？（更何况留得是原粮）这無怪乎生猪的飼养完不成任务了。”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統購統銷政策，農民不滿意，這是由於干部的三害造成的……如我們家鄉是災區，糧食剛够吃，但一樣的分派任務，把糧食賣掉，結果不够吃又要買，有時只留給一種糧食吃，老百姓不滿。”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助教 馬 馨）

“雁北的農村里不供應油，因之農民講怪話：耕地不用牛（牛因為沒有糧食吃，餓死，用人拉犁）點燈不用油（因統購統銷無油可用）。干部水平低，打罵嚴重，本統（購）余糧，結果統（購）了口糧，懷遠、雁北連油面都吃不上”。“統購統銷在某些地區偏差是嚴重的，餓死人不是個別的，……如規定收購10萬斤，實際只能有7萬斤，結果批評保守思想，完成就表揚……”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吳祥瑞）

糧食統購統銷的任務是由全國區而縣、縣而省，省而中央，這個官僚機構中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官僚主義者，在召集下級干部開會時，大大號召一下超額完成任務，雷鳴般的掌聲，及干部的‘虛榮心’兩者的結合而制訂出來的。而完成任務的辦法則是靠‘殘酷的統治’，‘車輪戰術’，‘空軍’、‘海軍’（注：這些都是干部體罰農民的方式）等辦法去完成。統購統銷執行的結果，是：一方面超額完成任務，另一方面農民挨餓；成群尚未成熟的小豬都紛紛趕進‘宰場’，‘牲畜大量死亡’，‘農民’一邊耕地，一邊為下頓的吃擔心，所謂共產主義（即使是最美麗的）對於他們來講也是和上帝的天堂同樣空虛；新式農具不能很好地使用，新的生產技術也不能很好地推廣。因此，農民生產低落，這就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這不能不說黨在這方面犯了錯誤。”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向春）

“對統購統銷也有意見，對老百姓是定量，但在內部又規定，對高干保證供應規定一套執行又一套不象話，對一般黨員監督很嚴，而為

何不一視同仁呢？”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为什么种花生的吃不上好花生？果农吃不着好苹果？

55年購粮，是对的，但缺点巨大，对农民食粮限制过严，無形压制，使农民弄的哭天喊地可是不准你說，說就違犯政策，結果农民生产沒有吃的。請問：农民能餓着肚子去生产嗎？請照顧長远利益，只能是空中樓閣？”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农民生活苦与卖余粮帶压迫性質有关。”

(中山大学 程万里)

“統購統銷政策不合理的，使农民生活困难，余粮不够吃，政府征粮不够实际，农民明明沒有这么多余粮也要卖。”

(中山大学 覃仲才)

“下級干部……为了所謂‘完成任务’，竟不了解农民的收割情况与生活上的基本要求，盲目主觀的迫卖粮食。有的竟不仅不以理服人的态度，强买了农民的粮食，而且对农民的口粮亦在威吓下强买了。由于口粮被强买，造成不少农民的生活又回复到解放前吃草头、野菜、糠皮的可憐境地。特別当淚流成河哭声連天的农民因無粮食而向乡人民政府申請买粮时，那些居于人上的掌权分子，对于要求生活，生存的哀号声，竟处之泰然，若無其事，毫不垂憐。这叫生产粮食的农民如何去發揮生产积极性呢？

統購統銷政策不仅在处理农民粮食方面發生了义不容諒的錯誤，就是在处理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的粮食計劃問題上，也犯了极端的錯誤。依据国务院对中学生的粮食供应是每人以32—34斤为限，这个粮食数字訂得非常合理，但是由于下級干部歪曲政策，不遵照国务

院的規定，非另搞一套，把中學生的糧食壓至28斤以下，而且以後又叫學校一次一次的降低，當時學校行政企圖又以所謂‘進步表現’的‘好印象’，煽動學生降低每月糧食數字，有好些同學就在這樣下入團，也有好些同學就在這之下，為了得到學校的好印象，又忍受着飢餓的痛苦，市場之混亂更不必說，只要有關可食之物，不須一分鐘就搶得精光，在當時的如暴風雨的政策下，即是痛苦與飢餓，又豈能發出半句的怨聲？因為言者未免會有生命之危險！”

（武漢測量制圖學院 丘清輝）

3. 否認統購統銷的成績

“統購統銷的成績和缺點差不多，即使有成績，也是從農民那里榨來的。”

（雲南大學 譚東北）

“統購統銷問題，中央總結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實際上很多缺點是普遍性的，如生豬、油、菜，由於統得過嚴而大大減少。”

（北京政法學院 陳述慶）

（三）關於工农生活問題

1. 誣蔑工农生活苦

“現在大多數農民吃不飽，穿不暖，一部分農民餓死，農民生活貧困造成的一部分景象是忍飢挨餓搞生產，有不少一部分農民以糠為食，甚至完全無食，災區就更加悲慘，河北一農業社長因農民無糧吃，連棉籽都吃完，到北京向糧食部長章乃器要糧，具有堅強忍耐性的農民不是走頭無路是不會鬧到中央的，農民生活苦造成城鄉新對立，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不久以前還在田地上辛勤勞動着的農民流浪街頭。農民生活苦的原因之一是有災害，但政府沒有動員一切力量支

持,对农民支持就不象对外(国外)支持那样慷慨。譚震林报告中用儲蓄数字来说明农民生活提高,这是不能同意的,儲蓄都是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当任务来分配的,农民棉布量增加也不能说明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卖粮后如再要买回粮食的话,又没有購粮証,有錢买不到粮,只好去买布。卡噤褲、卡噤襖就是肚子吃不饱。农业稅虽是21%,实則三分之一,收三斗多而納一斗多,农民五口之家,除掉吃以外,根本沒有其它余粮,吃粮尙且不足,汉代董仲舒所說的情况,虽已1700多年了,但如果党中央認為現在不存在了,那就不高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买东西排队是好現象嗎?解放后人民生活提高了,这是千真万确尽人皆知的。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逐年随着生产提高而提高嗎?这恐怕是值得怀疑的,你有暇到大街上去看看吧,排队买东西的行列一年年的長啦,脱銷的商品是一年年的多了,这难道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現嗎?流行着一种理論認為排队是好現象,这是确实的嗎?我看还是用兩点論看待的好,否則高枕無憂不想办法改善,这使人民將來会如何設想?”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如广西鹿寨县的农民产油区,由54年每月每人10兩,現在下降到每人每月6兩了,非产油区每月每人由原来的5兩下降到3兩了……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半載才养大一条猪卖了只有自留肉四斤到五斤,你看誰肯养猪,农民吃猪肉象城里人吃鹿茸鹿角,可不容易哩,一年三百六十天,只是在春节,端午,7月半得肉一次,而每人每次限購三兩……鹿寨县是个产糖区,但种甘蔗的农民都得不到糖吃,只有逢年过节每户才能購得到半斤八兩的……說心里話,到处責难进城的农民不該往城里跑,但有关方面就很少具体研究造成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的原因何在?”

我認為农民的生活水平是絕對提高了,同时也相对的下降了。这

里的提高和下降并没有矛盾，正如我們理解馬克思对資本主义国家無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道理一样，并不能理解为現在資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比一、二世紀前的工人要低下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

滿肚牢騷的群众把猪肉三兩，茶油三兩，水油三兩叫做共产党的三三制(注：他自己說的)，提議从毛主席起，直至乡区干部来一个自觉的减薪运动。

有些人特别是我們党报，一贯保持着鎮靜的緘默，他們总以为紙可以包住火，似乎只有掩盖住矛盾才是消灭矛盾的唯一方法，我要为这些可憐‘天真’的同志大喝一声‘你是抱着馬列主义去睡觉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梁彦彩)

“农民生活苦，無菜吃，無油吃，欠上大笔債不能还。”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王佃保)

“我觉得实际上农民生活是苦，經濟作物区粮食不够吃，农村的人都想进城，姑娘想嫁入城市，監獄犯人都比农民生活好，所以有些农民宁願坐牢不願回农村，工农生活不应相差悬殊，不应單从法律上禁止农民流入城市，这不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那里(指四川某地——編者注)大多数农民一年要吃七、八个月的紅薯……不少人处于半飢餓状态，我們在国际舞台上开口閉口以六亿人民自豪，其实其中五亿农民的現实状况是并不值得自豪。”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要知道在解放时，老百姓是‘箪食壺漿，以迎王师’，現在是‘怨声載道，盜賊蜂起’，农民生活很苦，阜城門外白天就有人拿小刀劫道，搶鋼笔手表。”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刘紹之)

“过去中央对梁漱溟的态度，現在应该很好檢查。在我看来，梁漱溟对农民生活狀況的反映，不完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而我們的党中央，却对人家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李之杰)

“靠借錢过日子，吃树叶，吃草根，甚至餓死的現象是为数不算少的，难道这还不算苦嗎？

希望一些大小人物們，真心的听听农民的呼声吧！”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可人〔化名〕)(大字报)

“解放后农民生活降低了，他們生产很多大豆，可是自己吃不到豆腐，即使吃到也是豆餅豆腐，在日本、国民党統治时期能吃到豆腐，而今天都吃不到，难道这能說农民生活提高了嗎？”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农民日不出下地，日落后才回家，一年收不了几担粮，也值不了多少錢。一个进疗养院的也沒有。农民苦，也不敢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現在农民生活很苦，干部都有得吃，农民連白薯也吃不上，只能吃糠，吃有毒的蘿卜渣，而干部却說‘树叶还没吃完呢。’老百姓大罵我們党，說是受了騙，过去的一套已說不服人了，咱們党存在着危机。”

“每天只配給一个农民一斤粮食，还没給够，农民說吃不飽，村干还說：‘餓死就餓死，死了多省点粮食。’老百姓感慨地說：‘你們真沒良心。’”

“青年农民懶的很，睡得太阳老高才起来，他們說：‘累死了也是

360斤’。开会多，他們不习惯。”

“产量指标訂得高，所以我們地区很苦。上边不配給粮食，造成飢荒。群众沒柴燒把树都砍了。貧农烈屬鬧得很厉害，除光緒年有次灾荒外，几十年都沒有这样苦。”（他作檢查时又說：“老农民是說几十年來沒有这样的灾荒，只有光緒年間有过一次。”）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郎宝田）

“农民生活苦的問題。首先感到农民苦并不是个别情况。哭声、李向春等揭發的材料是对的。李向春講的是事实，但有的不妥当，講共产党肥头大耳是不对的。在农民生活座談会上有来自东南、东北、西北、江南、山东、山西、內蒙古各地的同学，他們反映大多数农民都是吃不飽的，还有餓死人的。我家在苏豫魯皖交界处，接到的信总喊吃不飽，农民一个月只有32斤粮，我們中灶一个月吃31斤，大灶36斤。家中来信講：“社会主义好，要吃西菜、魚肉”，現在农民可真吃了‘稀’飯了，吃上‘榆’肉了（指一种树叶）。老百姓对干部很不滿意。他們天天燒香咒罵干部早点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提高。农民种了大米，沒有大米吃；种了大豆，沒有真正的豆付吃；摘下苹果，沒有好苹果吃。

……絕不是部分农民挨餓，而是大部分农民吃不飽，吃不好，只有少数农民吃得飽，吃得好。在农村里，‘吃不飽’；‘不够吃’是絕大多数人的呼声，貧农部分中吃不飽，这是很普遍的現象，有的人挨餓，甚至有的人餓死。农村中流傳着这样的‘民謠’：‘毛主席好，毛主席好，一年到头吃不飽’、‘卡其褲，卡其襖，可惜肚子吃不飽’。報紙上登載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是官方統計数字，不一定完全可靠。如春天下种子，就預定产量多少，上报国家往往多报，因为層層官僚机构已使这些数字發生了很大的錯誤，不能恰如其分反映农村的面貌。造成粮食不够吃的原因，（1）由于統購統銷的流弊，数字是上級主观

确定的,不了解下情,下面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購多了。(2)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恰当,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过高,而农民收入过低。这在理論上是目前我們的領導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多了些,超过了生产力發展的水平,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則未达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水平。

高小毕业生为什么不敢参加农业生产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少,生活不好……就是所謂‘沒出息’的含义吧!其次一个原因是青年农民在农村确实难找到老婆,好姑娘差不多都嫁到城里去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农村的現象:

一、种田人吃不飽,有餓肚的,吃泥土的,吃厥苞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

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購買)。

为什么?干部說: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

二、养猪人,無肉吃。

农民养猪,政府定,不养也得养,农民为何不养猪?猪子貴,大猪賤,粮食是前提。农民有病想吃点菜肉,半斤四兩几次請政府,(乡干部打証条)区里干部碗上肉塊,滿桌面,干部、軍人买肉任意要……

三、小株密植是好法。

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減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作法都不行,强种者,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他是誰?干部为什么爭先进。

四、农民辛苦誰知道:迎太阳送太阳,兩头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罐罐都搬上,妇女挺着大肚子,一上一下把地鋤,汗流滿身全身湿,咳!咳!咳!……地上躺,农民無节年無节日,正月取消了三百六十天全用够,結果怎样?生活并不好。农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流的,例如:几十石田捻成塘,塘剛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堆成山,質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

荣，‘石头’种荞麦完成任务要当先。

上面几句仅一角，还不是党中央的政策，不是农村的主流，可是严重的阻碍了生产正常發展，这是怎样来的，是某些党员和干部等方面来的，为什么三害是要害，农民不能管理生产，党代政代社委，也起了一些不少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野草〔化名〕)(大字报)

“五三年至五六年农民生活几乎没有提高，现在有些农民生活不如国民党时代，也有不如日本时代的……”

“譚震林同志关于农民生活情况的报告中所用数字不能说明农民生活水平增长情况，譚所举数字的根据要到上帝那里去找。而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根据他搜集来的道听途说真假莫辨而又经他夸大，捏造的“材料”是：“广西宾阳某村五五年春荒饿死200多人；江西于都县某乡谢家，全家五口一天只吃一升米，有一人到田劳动因肚里无粮晕倒了；广东省普宁县某乡，长年只吃粿很少吃到干粮；……河北省保定专区五五年一人规定带皮粮32斤，实际购时有半数用白薯、萝卜干，白菜，土豆等代粮卖给农民；河南省常阳县某乡统购时留口粮太少，农民有钱买卡其布穿可是吃不饱，流传口语是‘外面光，里头空’，山西某县在统购统销中一家三口无粮饿死了；河南郑州附近春荒时主要吃洋槐花，榆树叶……粮食成了副食……山东某城某村粮食不够吃常吃野菜，春天树上青芽一律吃掉……另一村解放前两家要饭吃统购统销变成十家了；江苏某县农民每天吃粥，过节才吃饭。”他以此得出结论说：“从东北经华北，华中，中南到东南到处有挨饿的现象”。

何世芬歪曲引用少奇同志在八大所作政治报告中的字句和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去反驳譚震林同志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没有根据，又将统计局的数字加以忆测，捏造作出统计说农业总产值以五二年为一百，五三年较五二年只增长1.6%，五四年较五三年增长2.2%，五五年较五四年增8%。以此作出结论说“五三，五四两年农民生活是很苦

的，人口增長了可是收入沒有增長，再加上國家開始了征購糧食，農民生活在不少地區會呈現出下降趨勢。……生活水平下降了自然會引起農民的不滿。無怪乎在這兩年中尤其是五四年農村出現了一些鬧事，打干部的現象。把這些現象歸結為反革命搗亂，歸結為僅僅是干部作風問題恐怕都不是很客觀的。幸好五五年老天爺睜眼來了個風調雨順搞上一個大豐收，農村的矛盾緩和了，不然農村會出什麼事真不敢想象”。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何世芬的材料）

“有些人迷信報紙上的百分比，但實際生活並不如此，為什麼數目字天天增加而實際的農民生活却是苦的呢？平時去參觀的地方都是典型的農莊。”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單思良）

“人民代表的發言，都是一個公式，先同意領導的報告，繼續講一下自己的業務工作。而提到人民生活意見要求就很少。……沒有一人反映農民的疾苦，不信你們看看過去的報紙。”

（北京政法學院 陸紹祁）

“我們有的同學就憑着自己的想象，以為農村好得不得了啦……寒假中有人到附近的生產合作社去訪問過一次。回來之後，思想就不同了。……他們感慨地說：‘如今農村還有那么多的缺點，農民還是非常苦，落后。總之，一切……都是不行。’”

（北京政法學院 陳守銘）

“現在農民生活很苦。全國每人每天普遍吃不上一頓飯。以豬吃的糠當飯吃，以野草當菜吃。”

（北京政法學院 張敬臣）

“罗翼群的‘农民饿死边缘’的说法是极端正确的，广西不是饿死了很多人吗？这是普遍的问题，是政策的错误。”

（中山大学 江纪煬）

“农民生活苦，农民最主要的是吃饭问题，他们半年吃半斤油，饭锅都上锈了，我家要不是朋友寄钱早就饿死了。”

（中山大学 周 爽）

“农民生活和困难是我国目前一个重大问题，以前一直没有被重视，因为书报杂志中偏于歌颂、偏于描写幸福、偏于报导好的一面，这些东西只能是艺术家、文学家的想象，人们的理想。而对目前中国农村说来，都不是现实，我在农村所看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叫苦连天，不是一片新气象，而是一片呻吟。”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冷以清、龔亞榮、孙礼賢）

“在54或55年，附近农民都跑到桂林市来，我就感到城乡关系不好，农民连吃饱的保证都没有。在报上看到工人生活水平提高40%，农民提高30%，为什么会提高的不一样快。

很多文章歌颂农民生活改善，但有一个人民代表下乡视察，视察了某个合作化比较好的村庄，结果发表文章说农民生活改善不大。我就感到，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评价，这该怎么去信奉一些真理呢？我不相信报上登的关于农民生活改善的文章。我想，最好还是给我时间，我自己去看。”（这个人民代表，就是右派分子费孝通。——原注）

（兰州大学 譚蟬雪）

“我从农村来，每次回家都注意农村生活情况，土改是正确的，推翻剥削阶级，土改后收税太多了，征收太重，中农生活下降很多，贫雇农生活改善也很微，54年农村闹大粮荒，我亲眼看见，很多农民没粮吃，到处借，我家（下中农）一块包谷都给别人，农民骗卖挂面，被干部

罵了一頓，又退了。”

(四川大学 馮元春)

“关于农民生活水平問題，我認为提高的太少，中国是5亿农民的国家，得民意，首先是要得农民的意，农民是有意見的，他們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無論是在解放前，解放后一直是主力軍，可是享受革命果实，除土改分得5%的地主的一点东西外，沒有得到什么，我去年回家听到一农民說：‘政治上翻了身’我就想到經濟上沒有翻身，我認为这是良心話。

“所以，我主張工农投資比重，还要加大农业的投資。

苏联已經解放了40年，农民生活水平并不見得如何，中国是个五亿农民的国家，搬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再过 $40 \times 3 = 120$ 年（自己塗掉了）也不能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到苏联現在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邓芸松)

特权思想，馬克思沒有，只有特权者維護特权者，相互勾結，構成特权的宗派，矛盾有些可以存在，有些不能讓其存在，如豆腐和汽車的矛盾，市委盖磁磚大樓西單区也盖大樓，現在区委書記，区長都有汽車坐，老百姓要做多少工，給他們这样享受呀！老百姓沒豆腐吃，乡下吃帶皮粮食，一天一斤不够吃，这里盖洋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分配太不合理，最高領導者和农民收入相差太悬殊，这些人实在是忘掉了他們的成功还有农民的支持。現在高級干部和农民收入相差二百倍，这在中国历代任何王朝都找不到。西晋时官俸最高也沒有差这么多。

这些有着共产主义覺悟，为人民領導的历史旗手却只能对別人要求艰苦，他們膳食稍微节省一点，就会是很多农民的常年費用。高級干部的生活过分強調了按劳取酬，人民生活水平應該和生产相适

应这个正确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于他们。高干的孩子和农民的孩子生活水平不一样是‘封妻荫子’，农民如果知道高干待遇，就要起来革命，农民在走头无路以前是不愿闹事的，但我相信，当他们明天就没有饭吃时，不管共产主义是怎样美妙也是和天堂一样空虚，是不得不闹事的，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似乎在革命战争中被人认识了，接受了，而现在完全被忘记了。城市不论工人和工作人员有的没有下乡，有的忘本了，人们完全相信通讯社和作家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条新闻说农民把区政府捣毁了，任何有实际经验的人，都不会相信通讯社的，谭震林的调查报告恰恰在整风时登出来，是为了迷惑一部分不知道农村情况的知识分子，谭的报告根本不可信，邓子恢的报告是官方消息是经过加工的，只讲光明面，其中最大的一个矛盾没有谈，即农民要求退社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对社会主义劳动报酬的原则我有怀疑，用什么来保证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将军、上校的工资1200元，而农民的收入却非常微小。将军有物质条件把他们的儿子造就的很好，而农民则没有这种条件，这是不合理的。小学教师与军官对社会的贡献有什么区别？但报酬却相差得很远，我觉得应提高农民的生活，降低某些人的工资。”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达）

“地方干部和群众之间隔了很厚一堵墙，他们和群众之间‘离心离德老百姓贫困不堪，他们都是荣华富贵’‘百姓很多切齿咒骂’，由于地方干部的特殊化，官僚化，强迫命令使很大一部分农民与党疏远了，……党若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有爆发的危险，一个元帅的一天的薪金=一个农民一年的货币收入，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章广延）

“城市花天酒地，农民在死餓綫上掙扎，党的高級干部比农民生活高1—150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資料員 張紹鴻）

“城乡生活水平过分悬殊，如油粮供应，城乡相差太多，太不平等，……农民生活根本没有提高。解放前要吃有处买，现在有錢也沒地方买，……种了苹果吃不到苹果，种了花生吃不到油。”为了証明他的論点，他不惜把一个小农的話套到一个貧农头上，說那貧农曾对他說：“解放前农民也不吃糠和菜叶，现在却得把糠和菜叶当飯吃。”“要能上北京去吃上頓飽飯，死了也值得”。他說：“在理論上而然可以說农民生活苦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并且即使降低了城市生活水平也無法提高农村生活等等，但我們不能在这种口号掩飾下压低农民生活水平，而去大大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認為董老在青年报上所發表的关于农民生活問題的兩封信是不能完全說服人的……，說：“即使是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現在也應該設法縮小它，但是我們却扩大了这个矛盾”。他認為現行分配原則有助于扩大城乡差別，并且認為这就是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高小毕业生不願回乡生产的直接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朱紹武的材料）

关于职工生活水平：在計算工人工資时他除开了强工和粗工（理由是“在平均数里占比重較大，很难代表真正工人生活水平”），他又以五年計劃中国家机关工資增長65.7%（注：系各部門职工工資增長指标中最高的）以数字作为全体国家干部工資增長的代表，作出結論說“五二年以来国家机关工資实际上提高了不少，只有超額完成任务，工人們的生活大多数在50—60元之間（又說可以肯定平均六十元），他們收入較多，人口較少，因此大多数过着比較富的生活，比起农民来当然好多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的材料）

“解放后工人生活是提高了,但是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一天工作下来浑身是痛,說是八小时工作,而上班前后,开会時間是不算的,解放前也是八小时,但可以磨洋工,連从家到工作地点走路時間也在內,实际工作只有四小时左右。

鐵路員工的工資在解放前虽然很低,但他們可以偷东西,現在可不行。”

(北京鋼鐵学院 陈曉时)

“农民生活苦主要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农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工农劳动产值計算方法不合理,工农业投資比例太悬殊,工人剝削了农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李树屏)

“农民生活是苦的……提高得不能令人满意……

农民生活苦的原因是国家机构臃腫,是农民負担重。”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工农产品价格相差很大,工业品的价格太高,农业品太低,这是农民生活苦的原因。”

(中山大学 管日昌)

“农业稅比过多了三、四倍,共产党收得多,建設多,国民党收得少,建設少。”

(云南大学 牛之瑛)

“解放后农民生活不如解放前,解放后农民負担比过去还要重。”

(中山大学 刘法生)

“解放前物价便宜，样样买得到，不受限制，现在粮食棉布都受了限制。”
(中南矿冶学院 蔡承云)

“系主任常讲：‘看看，说生活不好，比国民党时候好多了’，这完全是诡辩。我说她的官僚主义无穷大，不可救药了……”

“两个老百姓坐电车走到北京饭店门口时，一个说：‘那么多的汽车，要是豆腐就好了！’另一人回答道：‘豆腐？豆腐都换了汽车了！’军阀时代还有豆腐……”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解放后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否则，怎会有铁路工人罢工，又为何有济南罢工事件。

农民每年只得40元，怎能改善生活？我目睹几个村，还有挨饿的事实。生活改善的只不过是过去穿草鞋现在坐包车的党员干部，基本群众根本没有改善。”
(山东师院 周锡公)

“过去我国人民生活比美国低得多，解放后改善不多，比起美国，目前还是低些，当然比黑人……及一些失业者……是较好的，但这些（指黑人、失业者）毕竟是少数。……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是较好的。美国生活水平好，逛马路、游公园都有较好的条件。我们的同胞太苦了，解放后改善得不多。党对农民生活很少关心。……农民生活是很苦的。我国很大部分农民为生活奔波，把很大部分时间考虑吃、穿。有些有时候没有机会参加会议，有些没参加选举，这是生活决定的。这个叫做经济决定政治。”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2.挑撥、歪曲工农关系，誣蔑党的干部

“在革命建设中，农民有很多功劳，不能把功劳全推到工人阶级

身上。党的政策有很多缺点，以改良主义办法纠正缺点。农民思想问题未解决，更谈不上生活问题，对农民看法有些过低。如农民有组织的话，早就造反了。52年共产党员雇工、放高利贷，引起农民很大不满。农民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待遇上与工人很不公平。甚至婚姻上（农村姑娘不愿嫁给农民）对农民采取愚民政策。人民日报报导工人生活，愚弄农民，是欺骗性宣传，这是党政策错误。……要解决，除徹底执行这些政策，要交给农民去讨论……报纸没有如实反映出来（林希翎在报纸上也找到了）人民代表和有些记者骗人。”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王文彬）

“农民比解放前好，但也可说农民生活苦。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人生活提高33%，农民提高购买力一倍。前者是在原工资的基础上提高，而后者过去的购买力本来就低。工人农民的吃饱穿暖是根本不同的，农村文化生活也是没有或很少。我不服气工人生产率高，因用机器、用电，如一个农民到工厂去几年后也可成为熟练的工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房文斋）

“工农生活问题，有矛盾，不能说有矛盾就是反对共产党。关于工农问题毛主席的报告对我启发甚大，农民目前是苦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教员 贾岩）

“你是工人，我们革命时，你还在城市里给敌人做工呢，有些工人在我们打伏时正在为敌人生产呢，可是现在怎样，同样上学吧，70%工资照发，比贡献吧，才几天！我看到工人出身的同志，要有毛病就更不满，整天讲，工人优点这、那的一大堆，讲到农民总是这个短见、狭隘、自私等等，为什么不着重讲讲优点呢？

……

人民生产的东西，

你们回答到那兒去了？

农民必須取得天下，
才能保証自己生产發家，
誰的劳动果实，
誰就可以自由的享用它，
.....”

(中国人民大学农經系學生 王殿彪)

“統購統銷是城市剝削农村的具体表現，城乡对立，在我們现实生活中是很严重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岳文伯)

我对党的政策有怀疑……工人与农民待遇相差太远，工农业品差价太大，太不平等。……

“农民願干体力劳动，也不一定要白手白脚的人去劳动，但不应大吃大喝，生活豪华，把农民忘在一边……

我觉得农民与工人待遇相差太多，工农业品差价太大，农民生活很苦，农民吃不飽，想去討飯干部还不叫。农民生活与干部生活無法比，农民平均每月二、三元，我觉得太不平等。工人工資是否可降低一些，农业稅少收一些？我出身农民，对农民关心。

說农民創造价值低，我不知怎样計算，工人掌握机器，农民如果掌握了机器也一样，为什么不节省行政开支給农民买拖拉机？

农民最实在，再有兩年灾荒，农民不起义才怪呢！要反你一下，你也受不了。当然国家政权有强大的军队鎮压。什么都是从农民那里生产来的，收購农民的茶、糖……等，工人創造了什么？我看就是拿农民的钱为城市一小撮人享福。……”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學生 楊維新)

“美国工人与农民的生活相差几倍，而在苏联和中国相差几十倍。”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助教 王鉄生)

“农民生活是否贫困，拍拍共产主义良心吧！工人就是比农民富裕，我是很不满意这一点的，农民对城市也是有反感的。山区农民都知道：‘城市工人过得好，我们穷’，‘谁到城市去工作，谁就获得了莫大的幸福’。农民吃得那么坏，穿得那么苦，这就是民族的耻辱，当然，这是蒋介石留下来的，但党不能没有责任。以远景代替现实，这就是不正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岳文伯）

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工人阶级，农民是两种所有制的体现，他们的长远目标是一致的，但具体利益有矛盾。工人阶级大权在手，生活提高很快，农民过得还是原始生活，处于半饥饿状态。工农在利益上有冲突，他们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不是如苏共党史所说的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一点应该补充进阶级的定义中去，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是不称职的，党进入城市后忘了本，脱离了农民。

我要为五亿农民呼吁，国家政治舞台上应该有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应该有为农民说话的知识分子。国家应该少利用农民的弱点，多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大字报）

“工业产品价格较高，农产品价格较低，交换时农民吃亏”，并说：“工人创造价值多，只不过是因产品价格高造成的”，否认工人有比农民更高的生产率。他对工业化政策的另一攻击就是：农业投资太少，工业投资过大。他说，“农业投资太少了”“共产党不听农民的话”“工业化解决不了农民生活苦”，又说，“中上工人生活太好了”。

“工人坐享革命果实”，言下之意是剥削农民。脑力劳动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其子女在他眼里是“王子与公主”，整天“歌舞”，他们“剥夺了别人的辛苦劳动，供儿女享福”。说什么这是“特权阶级”“为人民服务是口头谈”。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说，“没有平等和自由”；他在“大雁之死”一诗中，把今天的社会曾描绘成恐怖、没有自由的情况：“乌鸦说到：少唱世道，叫人听道，怎样逃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王殿彪的材料)

“为五亿农民呼吁。人民生活水平平均都不高，这是与国民经济计划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的不恰当是有直接关系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为1:5。

人民中最苦的是农民，其次是干部、工人、教师(中等知识分子)，最不合理的是高级军官及高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用了许多官方数字(大可怀疑)来说明农民生活不算苦，这都是人们戴了有色眼镜去调查来的。北京郊区、中原地区的农民，是农民中的上层分子，拿四川来说，30—40%的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吃两顿白薯，我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用命令主义的办法执行了统购统销(这是政策本身的错误)。许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官方消息从不报导这些，却在国际舞台上大喊什么‘六亿人民’，其实六亿中有五亿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

农民每个月每人不到三元钱，而报纸上却说每月有60—70元。

讲农民生活不要同解放前比，这是没有意思的。现在要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农民上缴达全部国民收入的50%。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8小时，而农民没有时间休息，每天起码干10小时，所以说农民比工人轻松这是毫无根据的。

农民创造财富少的原因：(1)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2)农业技术落后。

我们要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考虑过去一切理论，‘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目前可以考虑。

按劳取酬的法则是客观的，但不是自发的，政府可以控制它，实际上，按劳取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为什么要死拉住不放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1. 强调工农业之间剪刀差，说农民生活苦、劳动强度大，但收入

少得很。工业产值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的劳动,这意味着工人剥削了农民。不能全記在工人的帳上。

2.說我們缺乏对人的关怀,农民苦,沒粮食吃,拿人奶喂猪;劳动强度厉害,把人当牲畜,如叫瞎子推磨。

3.他說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否正常?粮食的統購統銷、合作化的速度、农民产品的价格、工农知識分子之間的分配关系,都是值得考虑的,要同學們大量揭露其中的問題。

4.他認為工农之間矛盾大,說前些日子有人提出农民生活苦;工农生活水平相差太远,这的确是無法掩盖的矛盾。但“人民日报”和譚震林都写文章,作調查报告,借以証明农民生活提高很快,工农矛盾并不大,当然,这是企圖緩和一下。如果說問題真的不大,还写文章干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濟学教研室助教 章奇順的材料)

“共产党由农村进入城市放松了农村工作,把城市搞得好,把农村忘了,工人工資提高了13%,而农民呢?……解放后工农生活水平相差太大,这是不應該的。”

(北京航空学院6309班一个学生)

“資产階級和农民都有兩面性,农民和工人利益一致是斗争得来的,工人階級对农民实行了象对資产階級一样的限止,所以农民才是社会主义。”

(北京航空学院5309班一个学生)

“农民生活苦,农民的收入与工人和軍人比較起来相差太远。”

(北京政法学院 姚 明)

“土改后最初几年农村确是呈現家家有米,戶戶余粮,欣欣向荣的‘盛唐’景象,但是这几年来农民生活越来越緊張,打了粮食吃不

飽，種了大豆沒豆腐吃，種了花生沒油吃，摘了蘋果沒蘋果吃……美麗的遠景不能代替現實問題的解決。”“一個部長在辦公室坐上八小時能等於一個農民十天到二十天‘晨出肆微勤，日入負來還’的勞動嗎？”又說：“高級幹部一家住一座樓，忘了露天茅屋人的苦，坐在汽車上忘了行路人的艱難，……有閑人坐在電扇旁邊，還喊熱的時候，怎麼能理解‘農夫心內如湯煮’”？並最後用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詩句來描述我們的現實生活。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吳元富的材料）

“高級幹部生活太高，應把工資降下來。老黨員、老教授穿呢子服和農民談話，農民會擁護我們嗎？我們黨有錯誤，農民不會起義嗎？毛主席領導湖南農民革命起義，就是因為農民沒有吃的，現在人民吃不飽也一樣起來革命。”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公務員 張 誠）

“新社會雖然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但財富的分配還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軍官為什麼工資那麼高？補貼那麼多？難怪農村姑娘這樣說：‘嫁個軍官天天過大年’。有些地區如柴達木，雖然環境苦，但工資比北京多一倍，有的人在那裡工作，一千塊一千塊地往家寄錢，待遇太高了。翻譯一面拿工資，一面工作中譯的東西又拿稿費，甚至稿費比工資多，一月幾百元，比司局長級幹部還多，實在不合理。去年工資改革上升幅度太大，結果有錢買不到東西，物價上漲，沒提級的人實際上工資下降了，苦的仍舊是小幹部。提級也有問題，如我校出版社陳強工作不好，群眾對他意見很大，上學前？還要提到十五級，為什麼？今天社會，仍然苦樂不均，高級幹部坐汽車上百貨大樓、上戲院、上公園，怎樣提意見也改不了。托兒所里大幹部的孩子可以欺侮小幹部的孩子。我認為，共產黨幹部如果不一與人民同甘共苦，不接受人民的監督，在新社會同樣可能出現既得利益的特權階級，他們養尊處優，頤指氣使，騎在人民頭上，揮霍先烈流血鬥爭和

人民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編輯 曹达夫)

“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較慢,干部与群众的生活过分悬殊,甚至相差百倍,而軍官的待遇更高,好像党已不是依靠工农群众,而是依靠干部、軍官和少数社会名流。

消費不合理,多数半飢寒,少数酒肉臭,粮棉統銷中,对农民卡得太紧,对机关干部放的太松。”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盧 鎮)

“平等問題。平等:过去一切查皇历,現在一切查历史,查級別、找关系(党?团?群众?落后?积极?)农民和坐汽車的老爷們的水平差多少?彭真是市長,参加体力劳动三小时,我很受感动;据說他是总理級,每月工資四五百元,我衷心拥护他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他联系群众的好方式,党中央这个指示完全正确,但如果仅这样而實質上不改就不行,他每月四五百元,每个农民40—60元,这是平均水平,还不是灾区的水平。高級干部坐汽車,四个彈簧嫌少,要六个的、八个的,这是平等嗎?(本人高声大喊),过去統治階級才是这样,軍隊校官以上的老爷,孩子比人特殊,农民的孩子不能上学,不應該平等嗎?(本人高声大喊)。

一般干部,政治上、經濟上,平等不平等?共产党員吃苦在前还是吃苦在后?享乐在前,享乐在后?他們为所欲为,騎在你头上拉屎,不准你說臭。有批評人的平等,沒有被批評的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編輯 齐俊成)

对統購統銷政策也大为不滿,进行污蔑,什么統購統銷“有害于国家”“国家市場上……这也缺,那也緊張”,进一步又說:“报纸上說这也增产,那也增产,而貨又缺,那里去了呢?”于是他就得出結論說:有人“剝削了別人的幸福和劳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王殿彪的材料)

“国家行政和軍費方面的开支不合理，特別对高干的照顧很多，如汽車、宴会等等，老百姓餓肚皮。”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大鳴我国分配：农民是我們的媽媽，可是他們生活比我們低的太多了，不信請看下列統計：

一、生活水平(57·1)

高級將官：每月5、6百元。最低干部(19級)56元。最低建筑工人66元(实际工資)，农民最好的13元，中等的每月5、6元(京郊农民)，最差的每月2、3元(通州区)。

二、生活增長情况(53—57)

高級領導干部增加一倍左右。

一般干部增加50%左右。

建筑工人增加60—70%左右。

农民增加10%左右(估計)。我們希望举出詳細材料！难怪媽媽要罵我們，我們是不孝的兒子！这是国家关系中重要問題——分配問題，希大家来討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士芬)(大字报)

“‘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犹存在我們底社会里，广大农民是竟日長年地劳动着，但威胁着他的不是其他，而是長年粮食不足，整天为求肚子一飽發愁，而一些国家高級干部(工作人員)整天飲金啖玉、喚‘奴’使‘婢’，輕車肥馬，穿綢着緞，終日要求提高工資，強調按劳取酬，使其揮霍尚嫌不足，我們同意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但是这一原則應該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是首先讓广大农民吃飽飯。我們要求政府面对現實，少宣傳一些空話，多去看看农民是怎样过日子，而那些追求地位和享受的人又是怎样过日子，因而能切实地对农

民生活作出有所改变的決定。”

(天津大学 ×××)

“农民生活很苦,每月收入只五元,实际上农民在土地上劳动,土地为死劳动,而工人在机器上工作,机器是国家投入的,包括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創造的价值不比工人少,但收入相当少,工人收入中占有农民劳动成果的一部分。”

(北京矿业学院 李国常)

3. 誣蔑农村干部

“农村干部,都是党在农村进行統治的爪子,‘狗腿子’‘胡作非为’,农村干部管制地主太严了,是狐假虎威,替共产党卖命,和从前的里正差不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

“农村干部在政治上經濟上殘酷統治农民。政治上,干部下乡就是‘土皇帝’,有些农村,有些干部(包括省县下去的干部)以統治者自居,对农民采取野蛮的态度,打农民(贫农都挨打,更不必說富农了),至于罵,恐吓那就更不是为奇了。这些和旧社会的勒索官吏有区别嗎?經濟上,如統購統銷时强迫購粮,而卖时又加价了(因城市往返有運費嗎?)这种行为叫作什么?用个殘酷統治來說明并没有扩大事实,村干部自己农业稅不交,却去拔別人的鍋,这和以前的污吏有何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老百姓对于干部很不滿意,他們天天燒香咒罵干部早点死,粮食統購統銷不是購余粮而是購口粮,并且是强迫命令的,說农民自願卖粮是瞎話,这比以前还不如。上面很好,下面乱搞,农民上吊的,跳井的都有,农民的生活太苦了,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权利,沒有民主。农民这样苦,久而久之就会發生农民大起义的。选举只是給統战人物安

排的，叫群众选那一定是不行的，下面的一些干部党员因为唯命选举，民主空气非常差，现在各村中讲毛主席还好，说共产党就不高兴，因为那些党员太不好了，要不是热爱毛主席，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农村的干部残酷地统治着农民。农村绝大多数干部是二流子，真正的农民要搞生产，不想当干部。在农村干部受旧影响很深，又加上本阶级的限制，不容易了解党的政策，有相当一部分把自己看成是‘村中之王’，‘乡间的老爷’，还有一部分人是过去旧社会的流氓，二流子出身，因为在解放的时候，他们很爱出头，很容易的当了干部，真正老实的农民是不敢当干部的。在农村中，有的干部虽然不得民心，却是‘铁筒江山’，一方面是欺骗政府和人民，一方面是欺压百姓，更利用了举手选举的办法，操纵政权。但也有个别农民不同意（因为农民是诚心选出真正为自己办事的人），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因此，选举制度的民主而实际选举上的不民主，国家政策到乡干部口里就变成命令。当前农村的选举是那些把自己看成是‘村中之王’、‘乡间的老爷’，这样的干部，在台上威胁举手，倔强而真直的农民……遭到苦头。农村干部贪污是农业合作化中最严重、最普遍的现象，这种贪污往往是采取集体贪污的形式。要狠狠的揍他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看到了农村干部一些不好现象，感到下面这么黑暗，于是自己什么都不想干，感到做一个无党派人士好，他们能为农民说公正话。”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范喜谦）

“农村党员干部贪污救济公粮，大部份救济了党员，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公务员 張誠）

“我同意林希翎的观点，农村干部承襲了国民党的作风，农村干部官僚主义有封建影响，他把地主对农民的手段自觉不自觉地用上了。在农村中家長統治是主要的，这就是封建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社員要提出公开帳目，社長說他是反革命。在乡下支書就是法律（少数）如說一句‘你是反革命分子’至少要受禁閉，制度是优越的，但毛主席的經被小和尚念坏了。”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 啓）

“社員見社員，臉如苦黃連，
干部見干部，比比呢子褲，
社長見社長，比比好大鑒，
社員見社員，臉如苦黃連——摸摸腰里沒有一分錢。”

（蘭州大学 弓章福）

“統購統銷，論其政策本身沒有什麼缺點，是人人贊許的，但論其具体实施，却可以說搞糟了。……农村黨員、團員和干部組成了官衙，黨員成了‘七品县官’，團員干部成了左右大臣，堂鼓一响，升堂律事，农民的命运掌握在他們手里，农民变成了羊羔，任他宰割。‘衙’里的群臣七品，悶着良心高估农民余粮，用以媚献上爬，报复于民。有的农民本来沒有余粮，而‘官’們硬說有。有的有500斤，硬說有2000斤。在这种存心不良，不切合实际的估数下，去吓唬、勒索农民，农民怎能够通哪？不通他們就用尽了一切法术。他們就用鉄条長矛，滿家搜索，把东西扔的滿地都是，有的竟被破坏。搜的結果落空，并沒搜出余粮，但还不甘心，又以动員說服的名义，把人叫去，在冬天叫你脱棉衣脱去，把你关在久沒人住的冷落的屋里，讓你去想！……如果这些情况不能闡明农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我还能举出許多事实。动員說服……但到了农村官卡那兒，這句話就产生了变質，‘动員說服’就是打罵的意思，群臣下社深入群众‘动員說服’，但农民說：‘憑良心說，我确实沒有余粮’，話沒有落地，耳光上臉，自己的妻兒子女眼巴巴的看

着这种情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哪?这和汉奸逼良有什么区别哪?这种法术确有魅力,农民在忍無可忍的情况下,恨心把吃粮卖掉,农民滿腹的冤屈無处訴,‘衙門向南开,有理無錢难进来’,这虽是对旧社会的写照,但对現在农村的官卡來說,却仍然还是适用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合作化搞得并不象宣傳的那樣好,农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态度粗暴。”

(北京政法学院 姚 明)

4. 誣蔑党不能代表农民根本利益並主張 建立“农民党”和“农民协会”

“党进入城市把农民忘了,現在党不能代表农民利益了,我不相信現在的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农民穿得破,农村姑娘不願嫁給农村,这都說明农村苦,而城市生活水平高,特别是大干部生活水平这样高,因此我同意李向春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孟繁森)

“解放战争时期,(党)利用农民,出什么(粮,錢,担架等)都是农民,革命成功后,政权巩固了,不要农民了,利用农民的弱点:散漫性,組織不起来,不会反抗,所以党就不管农民了,把农民忘了。”

共产党对农民的利益代表不够,合作化后,收入不大,农民生活苦,尤其去年,由于合作化,更苦了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党取得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一些‘讓步政策’如‘土改’‘兴修

水利’‘發放貸款’‘飛機滅蝗’等等，這些政策標榜着為了提高農民生活，實際上也起了些推進生產發展的作用，但這並不是黨的真實目的，真實目的無非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提供自己揮霍，腐化享受的物質基礎。”

“黨的領袖和國家元帥的功勛榮譽都是建立在千百萬農民流血的基础上，但是共產黨進城後，很快腐化了，忘了農民，共產黨只是為了爭得自己的統治權，一旦取得政權了，便一脚踢開了農民，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潘相臣）

“去年糧食增產，但現在供應農民20斤帶皮糧食，我還要吃30斤去皮的細糧，農民吃不飽如何勞動，如何發動群眾積極性。為什麼不早提倡勤儉建國政策。在根據地，老鄉叫我們窮人黨，這說明艱苦朴素是黨的優良傳統，但為什麼入城後有些人非要坐小汽車不可，听戲非坐包廂不成，為什麼滋長了豪華風氣。現在批評李新，我為他抱屈，覺得應批評黨組織黨中央，因為買汽車的預算是中央上級批准的，早提勤儉建國，可能會避免這些缺點。領導同志生活過高，同群眾隔閡太大。”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唐太宗對農民作了很大讓步，農民生活就有很大提高，我們今天農民的生活沒有多大提高，還不如唐王朝對農民所作的讓步。”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張可治）

“街道傳言：‘高級幹部闊、中下幹部破’，‘魯迅有妻，守常無妻’，魯迅有妻到處都有紀念館，守常無妻就無聲無色，僅有個小紀念館，誰輕誰重？‘修的樓房真不少，沒地方睡覺的滿街跑！’‘汽車撞了孩子，媽媽倒了霉！’孩子被撞死，當媽媽的還得坐牢。‘汽車多了質量高，豆腐少了買不着’，這些閑話說明了現在新社會的狀況。

下面談談中央的矛盾：一般群眾都說黨中央的政策是對的，就是

下面錯了。但从猪肉來說，有一个胡同12个猪肉鋪变成了两个，有的十三个变成了三个，猪肉买不到，說生活提高不能服人。不是买猪肉人太多，而是养猪人太少。由猪肉問題轉到物价問題，蔬菜比去年漲了600%，食品公司鷄死了卖熏鷄。老百姓都这样估計：物价上升50%，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任了。有个变戏法的說比国民党时候更苦，这不是辯証法，这是古希腊辯术。”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国家照顧职工提高他們的生活，农民生活无从提高，国家在农业上投資少，影响农业生产。

有必要时，一定以主人翁的态度坚持，必要时大鬧县衙門也是可以的。”

（北京鋼鐵学院張庆瑤給他家乡一个农民干部的信）

“毛主席只顧工业，忘了农民，不顧农民的生活。”

（北京矿业学院 李 一）

“党进城后，忘了劳动人民，目前党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利益和要求”，要求“成立农民协会，以便如实的反映农民的情况。”又說：“目前高等学校，吸收工农子弟入学比例太少”，“刘少奇曾講过，高等学校，工农学生仅占20%”，他声称要为工农入高等学校的比例“喊冤”，曾对同学說：“我恨透了楊秀峰，他进城后忘了农民，我見着他时非指着鼻子問：“抗战时期你从張家口撤退时农民給你送飯吃，你进了城倒忘了农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的材料）

“成立农民党是可能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共产党不一定就完全代表农民的利益。如果共产党能完全代表农民利益，广西省餓死人的事件就不会發生了。成立了农民党或农民协会，象1954年那样的粮食統購統銷的錯誤可以依靠它来对党（指共产党——編者注）进行斗

爭。有了农民党或农民协会在今后可以避免农村一切錯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黃世君)

“工人階級有共产党,知識分子有民盟組織,應該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党,我想將來可在这个党内当个部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党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够,是否能代表农民利益表示有怀疑”、主張“成立农民协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的材料)

“农村前途光明是从理論上講的,去年回家一看,从现实出發,就不得不对党的政策怀疑,农村情况是目前困难,前途光明,如果單說困难,又要給戴帽子。

国家政策不变不行。給农民搞了合作化高潮又怎么样?說是农民的要求,現在很多农民都不願干了,拿分很多,而分不到东西。吃白薯、蘿貝乾等,历史上記載农民累得手脚發黑,磨坏,現在看农民也是很蒼老。农民生活苦,全村全县都那样。农民翻身太慢了,經濟上不翻身吃不飽飯,只政治上翻身也不行。过去旧社会农民生活不好,一样反,現在沒有人欺負,共产党领导,可是連反也沒法反。土改后农民分的土地現在入社了,农民不滿意,对土地要求强烈。耕者有其田,而沒有其粮食(指統購而言)。而拿农民的钱給国家盖房子,織呢子給干部穿。合作化好,別人也別浪費,‘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然冻死骨是沒有。

是否因为农民人数多,要建設社会主义不能讓农民生活好?……天下是农民打的,大革命时武汉政府基本上是农民搞的,过去的革命斗争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工人参加的少。現在工农生活太悬殊,如城市的人坐沙發、小汽車、农民牲畜都餓死了,用人拉犁,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

兴修水利是有的，但作用如何呢？为什么还發生空前的大水灾呢？錢花的不少，这是农民自己的，政府拿出一部分錢也是應該的……政府进行貸款、貸耕牛、种子，为什么还要人拉犁？說买拖拉机用的价錢高，为什么城市买那么多小汽車？欢迎伏老就是兩千輛小汽車，石油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不用在拖拉机上？……說农民不願意用拖拉机，为什么还給他們一个用拖拉机的理想？使用机器人到那去呢？‘劳动光荣’，难道拖拉机多了农民闲着不会享点福？……說农民生活提高了，都穿洋布了，农民沒有棉花沒有土布不穿洋布？

农民生产情緒高是报纸上报的，而情緒不高就沒有报，北京近郊也有农民生产情緒不高的，可以說空前低漲。

我提議組織一个农民合作党，在政府来搞一搞，應該看看农民，毛主席到河北省看三戶貧农办社，这是不实在的。应有一个农民党監視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只代表农民的長远利益不代表目前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楊維新）

“其实組織一个不反党的党也不犯法。

中国为什么沒有农党呢？應該有个农民党。”

（北京俄語学院 刘恩祥）

四 工商業者問題

(一) 侮辱無產階級，誣蔑黨對工商業和資產階級的政策

“工人階級的父親是資本家。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出身資產階級家庭，所以工人階級的父親是資本家。”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

“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是我黨力量弱，民族資產階級力量也弱，兩者互相利用，互相欺騙，勝利後在爭奪果實上有了分歧。說他有兩面性是為了取得勝利果實或打倒他，這是工人階級的一種手段，為了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一起進行革命鬥爭，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李維左)

“黨對資本主義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養豬殺豬的政策。”

(北京政法學院 杜汝楫)

“黨不是按政策改造工商業，而是採取變象的沒收政策，把工商業擠垮、收完的方法來達到黨的目的，黨說的和做的不一樣。”

(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學生 饒松齡)

(二) 說“定息不是剝削”

“……給資產階級以定息，這是黨的策略並不是資本家的要求，

定息不是剝削……”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伍伯涵)

“定息不是剝削，是不勞而獲，如不勞而獲是剝削，則工人在銀行存款有利息也是剝削了。”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同意章乃器定息不是剝削的謬論，說“資本家的財產是資本家自己的。”

(北京政法學院 王明欣的材料)

“我國憲法規定保護資產階級財產。其實我國很多地方違反了憲法的規定。給資本家的定息不體現贖買，只給五厘利，這樣實際已沒收資本家財產的三分之二。因此，支持定息二十年的意見。”

(北京政法學院 張敬臣)

(三)反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

“公私合營以後，我到街上吃飯，就覺得油條不酥了，因為他們的油少了，豆腐也沒有豆腐味了。

买东西得排隊，也不象以前那樣方便了，過春節連點心都買不到。

浴室的服務員態度不好，是因為合營以後機關化了。”

·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郎寶田)

“公私合營造成了產品質量下降，服務人員態度不好。要大大開放自由市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學系學生 潘世元)

“公私合营阻碍了生产力的發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資本主义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怨恨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革命說:
“如果不公私合营多好……社会主义革命把父亲革掉,社会主义革命对我家庭一点好处也沒有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該参加工作,革来革去,革去了自己的父亲。”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周治德的材料)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太快了,去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是由于强迫命令。与其說毛主席偉大,不如說去年一声强迫命令。有的合作社、工商业联合小組可以解散,可以大的化成小的。資本主义还是有用处的,应充分利用其积极性。”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員 梁其璞)

“我們中国地大人口多,一切措施都应考虑到这个特点。我不贊成搞百貨商店,因为百貨商店一壟断,許多街道上的小商店就被排挤了。統購統銷也同样,都由国营集中,別人就沒事可做了。

其实国营又缺乏干部,又缺乏道德,造成很多浪費,倒不如小商人会保护自己的店。”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認為城市和乡村商业公私合营后,市場蕭条,說:“以前庙上(农村市場)什么都有一一买啥有啥,現在只一个供銷社就不行了。”又說城市的商业合营后的情景是:“缺一陣子,紧一陣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王殿彪的材料)

“公方代表应退出企业,因为公方代表不懂业务。”

(北京矿业学院 丁克正)

“在反右派斗争以前，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

（湖北医学院 朱裕璧）

“资本主义初期自由竞争给予以活力，自由竞争是刺激生产发展的活力，我国解放多年来，自行车式样从来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力量刺激他。解放前北京可以吃到新疆的哈密瓜，而现在不行。如果水果市场采取自由竞争，就会有人把哈密瓜送到北京，因此自由竞争可以刺激商品的多样发展，满足人民的要求。”

（北京矿业学院 董方庭）

（四）反对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组织起来后，人员和作坊集中了，造成了不方便，同时，手工业品种质量都下降了，社员还产生供给制思想，服务态度很不好，组织的优越性淹没了私营的积极性，不如不改造好。”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生 饶松龄）

“手工业合作化，产品质量就糟了，衣服店及食品店均不如以前。”

（北京俄语学院 ×××

五 知識分子問題

(一) 否認党对知識分子的領導

“領導黨員中有的不懂專業，有的連常識都很缺乏；有的只背教條，有的連教條都不懂。有些領導幹部不懂專才專用的道理，只會‘亂點鴛鴦譜’似的把專業人才胡亂調動，致使有些專業人才至今還被堆壓在冷藏庫里。你到處看到廖化者流在當先鋒。我敢說在這樣情況下，黨号召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而知識分子所做到的不過是打游擊而已！我建議：請黨來一個‘有能’和‘無能’的大檢查。是有能的人請歸隊去，是無能的人請學習去。”“難怪他們（指知識分子——編者注）說：‘你們先把黨的愛給我們，然後改造我們。’但是個別黨員說：‘不！我們先要改造你們，然後再說黨的愛和重要的工作。’這兩種意見幾乎構成對抗性的矛盾！我希望黨員先了解人性然後再談党性。……所以我要大聲疾呼：‘黨員一定要愛上知識分子！’黨打游擊非常有經驗，但作文化工作沒經驗，不懂得重用高級知識分子，黨不讓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是有些黨員怕這些知識分子入黨，自己就要讓掉地位。這樣黨就不能向科學進軍。黨應該把工作交出來，讓知識分子去做！”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知識分子被部隊中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壓的真是夠噲，不堪回首憶當年的情景，有人說：‘假洋鬼子不讓阿Q革命’是有一些道理的。”（這里的假洋鬼子可能是指我們的領導，‘阿Q’是指知識分子——原編者注）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唐 廉）

“黨員干部土頭土腦，不能代表知識分子說話，知識分子比他們高明。”

（天津大學 王原強）

（二）歪曲、誣蔑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就可以說是先打后拉”。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馮海）

黨對知識分子“恨多愛少，懷疑多信任少”。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的材料）

“春秋戰國時期，古人就很愛惜‘才能志士’而我們現在還不如古人。”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資料員 劉運梓）

“黨對知識分子的估計還是不夠的，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實際知識分子仍不被重視……現在物質待遇也不如國民黨通貨膨脹前。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外國不同，有獨立愛國要求，可是中國專家不被看重，外國專家放屁也香。”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杜樹芸）

“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搞臭、搞垮、搞服，黨對知識分子政策失敗了。知識分子覺悟提高與黨和歷次運動沒有關係。黨對知識分子很殘酷，黨為什麼把知識分子看成這樣不可靠，引起知識分子把黨也看成不可靠。”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李萬昌）

“对老先生态度办法有些不对头地方，对老教师不够尊重，如一次教研室会中间休息时于濤（党员，教研室主任）说我们学校助教都是外面学校老教授的老师，意思就是你们别称能，老老实实学吧，我们谨小慎微，写讲稿都听青年人，这种感觉特别在当时对老教授有特别压力，所处地位没法子让你拿钱不干，话不上算，上课是老废物，好象住招待所一样。另外一个感觉所处地位象穷亲戚，对青年人离远了有意见，而不接近领导，可能就对抗领导等等帽子，离近了怕臭味，我个人有此感觉，当时觉得老教师没有，如对戴世光看有用，想用又不承认，当时压老教员其目的为鼓励新教员，老讲师与新媳妇一样，形成沟和壑。”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韩光远）

“党对大知识分子重视，因为党要发展科学，而对于我们这种小知识分子，党就不重视，不让他们入党，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党是利用知识分子的才，这是很伤害我们自尊心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李之杰）

“党再三说知识分子是国家宝贵财产，但整风中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给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挖了一道深沟。解放之初，知识分子对党是欢迎的，但整风后，有了一道深沟。知识分子的思想肯定是可以改造的，他们自信可以改造成马列主义者，但不能强迫改造，强迫改造，只能使人敢怒不敢言，而不能心悦诚服。很多人把知识分子政策，称为改造知识分子政策，不恰当，应当改为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党说是改造后团结，我觉得应团结后改造，先做朋友，切磋琢磨，然后改造。”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葛佩琦）

“我想到党员，特别是劳苦功高的党员同志能够真正地听听群众的意见。我希望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一定要彻底的改变一

下。我不想說牆和溝是一方面砌成的还是兩方面砌成的，这里我只說牆和溝是万里長城，那么我可以知道牆和溝是由誰砌成的。解鈴需要系鈴人，希望党对知識分子，特别是經過屢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什么不毛病的人，應該相信他，認為他是可靠的。退一步說，也是最低的要求，对待知識分子，党應該首先假設他是一个好人，对国家是有一些用处的。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識分子。如果你怀疑他，对他不放心，尽管可以在內心保持最高的警惕，也不要伤害他們自尊心。”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教授 李景汉）

“党对知識分子的宗派主义：党对知識分子的缺点分析得很‘全面’，宣揚得很厉害，但对其作用却估計不足。中国知識分子与苏联不同，但党中央按苏联的态度来对付中国知識分子。毛、刘、周、朱、彭全是知識分子，而他們一上台，就对別的知識分子不信任，这是很不能讓人理解的。

对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信任比当官更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对知識分子有二种方式，一个是信賴，一个是利用。我認為信賴好些。信賴就可以推心置腹，利用是各怀鬼胎。俗語說‘口里叫哥哥，腰里掏家伙’，这不好，应当推心置腹，大家共事。”

（湖北医学院 朱裕璧）

“三反的时候，群众与党可以說完全沒有隔膜。以我自己說吧，我把对任何人都說的事，全都对党說了，对党毫無隱藏。可是党对待这些旧知識分子如何呢？听說有党委对青年教师作报告时說，旧知識分子是思想落后，业务無能。又听說某接近一位党委的人說过：‘党要黨員占領科学陣地。吳佑寿很能干，孟先生不讓他到發送教研組，才起了爭論’。（吳佑寿插話說：“我問过了，說沒有这么回事。”）黨員应

該勇于揭露黨委會是否有取而代之的計劃。”

（清華大學教授 孟昭英）

“在知識分子問題提出來以前，心情感到抑郁，覺得黨要的是紅色專家，我們這般舊知識分子是不被重視的。雖然如此，自己還是憑着良心做事的。直等到知識分子問題提出來以後，自己的思想才開朗了起來。整風開始以後，在一次座談會上，李傳信問我最近思想上是不是很開朗，我說開朗的，但當時沒有說出原因。當時為什麼要說開朗呢？這是因為很多事情是你們不行，我的意見和你們的不同，但我是對了，增強了我的自信心，心里很高興”。

（清華大學教員 馬世雄）

“黨中央對白楊等廿人捧得這麼高，主要是利用他們。黨利用知識分子是過河拆橋的。”

（中山大學 汪劍鳴）

“知識分子要改造，如前清改民國，不能全部殺光，像做買賣一樣，不改就賣不出去，所以大勢所趨要適應潮流，改造也不是簡單的，頑固分子是少數的，大多數是可以改造的，也不得不改造，毛主席改造知識分子就是廢物利用，也不可能把中華民國的全杀掉，必須改變貨色才能賣出去，這就像上海的改良服‘舊翻新’一樣，不改也不行不然就要脫離群眾，知識分子是必須改，但不要開倒車，不要連根拔，改的時候不要尾巴主義，改的思想要隨潮流走。”

（北京礦業學院 劉寶忠）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非常小氣，思想改造和肅反都是搞知識分子的，這些運動完了後，就來個知識分子政策，對吃，喝，拉，撒再給棗核含一含。”

（北京礦業學院 尹毅夫）

(三) 反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知識分子思想不需要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任意發展，他們高興接受那套學說就接受那套學說，黨不要過問他們。”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張芝文)

“對知識分子改造是打擊，對知識分子整得太凶了。知識分子只有爭取民主之後，才能發揮積極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以通過閱讀和欣賞能力來提高思想，不要去搞思想批判，過去運動太傷人了。”
“青年學生應當生活多樣化，不要死板的進行，一切都是美化。發展性格，最好是共產主義者的良心，太集體不好，要有鬥爭性。”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殷九如)

“舊知識分子不但在學術上有可取之處，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一定高度。”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教授 李景漢)

“自我批評和檢討是教徒的懺悔。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像終身帶罪一樣的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賀安)

“老百姓不過為吃飯，知識分子不過為工作，何必這樣搞鬥爭。

現在實行的不是按勞取酬的政策，有能力的人，不被重視；沒有能力的人，也不注意。鉄飯碗包下來，只注意改造思想，不重視搞業務。人事處一決定，就可以吃一輩子，結果思想搞了幾年，工作沒有做。人民政府對我們這些人太不信任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思想改造應該是自願的。思想改造有傷高級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當前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人民內部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統一主要的，不必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我來了六年，夜大學沒畢業，因我根本不想畢業。不想聽的講錯了，想聽的都不講。”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把馬列主義當聖經，聖經上沒有的不許說，只能重複聖經的話。無產階級革命光靠工人是不行的，需要依靠各個階層，象我們這樣把馬列主義當聖經，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有深厚民主傳統的知識分子，怎麼能接受呢？必須加以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對於知識分子（包括各階層出身的），他們大都是輕物質利益，重精神自由，要求能夠充分的、自由的施展他們的才能，發揮自己的思想。他們嚮往着共產主義是因為它是真理，是使全人類走向幸福的唯一途徑。他們不但要求共產主義帶來物質利益，更重要的是精神自由，是帶來最民主、最自由的社会。”

（武漢大學 胡子雄）

“聽到周總理的知識分子問題報告後，既然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那麼對老教授也不必強調思想改造了。”

（北京政法學院 陶和謙）

“少數右派分子（指章，羅等的發言——原編者注）不能代表整個資產階級。毛主席說：資產階級要以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世界。這太誇張了。”

(北京矿业学院 何繼芝)

“思想改造使人們建立了一种新的条件反射，造成恐怖，形成一种类似康德的至上命令主义的社会道德。”“思想改造是整人，使伪君子出現，往上爬的人得到机会，專門給別人穿小鞋，我感到这种方式使人感情分离，使同志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認，使受批評同志感到受侮辱，使人作假檢討。”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反对党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說运动的付作用太大，“人与人之间發生問題，要設身处地为人家着想，这就是从人性考虑，我們不能死扣教条，不能不講良心……如提意見不能只从党性来考虑，更要为对方着想，要有人性，有些非党员也是不懂人性，他們非常残酷，宗派主义容易失掉人性。我們同志之間只有政治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常关系和倫理关系被政治关系所代替了……党员只知道搞政治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王福沛的材料)

“知識分子可杀不可辱。”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成績50%，缺点50%。經過运动后只是肃清了三大敌人的思想，而沒有建立起爱国主义思想。因为思想改造后他們一直抬不起头，工作不积极，对党不滿造成这种結果的原因是方式粗暴。”

“知識分子不改造也能树立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李木樨)

“思想改造运动坏处大于好处，来我校的老教授楊学通、戴世光、李景汉、韓光远都身受过，有很大錯誤，对地主資本家进行斗争，对学术思想也能这样嗎？結果搞的有什么提高呢？只不过拾了几頂帽子

回去。”

“不要板起面孔一板正經地談思想，應該活潑一些應該在工作中慢慢提意見，最好是使對方不知道來進行思想改造。”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徐 前）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用文明棍來解決思想問題。解放後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並沒有得到滿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說史教研室講師 孟 氧）

“對舊知識分子是恨多愛少，這是造成黨群隔膜的根本原因，為什麼會這樣呢？產生的根源：共產黨員在對敵階級鬥爭中，為了安全，總是十分警惕，這樣就養成對敵報仇恨心，這種感情帶到新社會用來對待知識分子，把他們當做革命對象，現在除平反外，還要教育黨員，養成真善美的感情，這一點很重要。黨中央在‘治國’方面作了不少事情，但在‘平天下’方面還做得少，‘治國’是保衛國家安全，吃飽穿暖，而‘平天下’是要使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過得好。”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我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不贊成以鬥爭方式來團結知識分子，而希望黨以禮賢下士的方式來團結知識分子。”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教授 吳景超）

“我聽了同志們的發言，覺得都是理直氣壯。我的發言，如果是理壯，則一定也是氣壯。大家發言這樣激動，還是歷次運動教給我們的，我們是從你們那裡學來的。我這次發言，本不打算算算老帳，但又覺得不可能，說出來總比藏在肚子裡好。有同志說，黨在運動中不尊重人權。這句話說得很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不許我們辯解，橫遭粗暴的打擊。現在大家是坐在一起談問題，向黨提意見，而我們被整時，

却像犯人到庭一樣。”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教授 李景漢)

“我覺得知識分子是不同於工人，不同於農民的，並不是我看不起農民，別說我又什麼了，這是兩回事。事實上是這樣：知識分子是比較有教養的，農民比較土里土氣，比較粗野，比較沒有教養，不過我不是看不起他們，他們是比較窮苦。知識分子是有腦袋的。在农村的話，农村里斗那個惡霸，當然可以這樣。但是我覺得大可不必，即使是对反革命，也大可不必要喊口號，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何況是对自己的人民，假設是对那個反革命，也用不着。我的說法可能不對，我是提出我的觀點，我的看法。知識分子是有腦子的，應該分析問題，培養階級仇恨不是用喊口號的。

聽說那個體育教研組斗出個反革命就是那個刑事犯，他在鬥爭會上是最積極的，喊口號是最大聲的，這完全可以叫做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把农村的一套搬到城市。一個問題來了要分析。還有一點，我要講一講，知識分子應該要動腦筋，我下面要舉一個例子：舉英國的費邊社，我不是替英國的改良主義宣傳，不過我們可以从那兒得到一些啓發。很多高級知識分子、歷史家、文學家、藝術家像肖伯納都是他們社員。費邊是一個羅馬人，他說要改造這個世界，要有幾個聰明的人，要看知識分子，要用知識！而不是用刀子！英國就拿這個名字，就是費邊，去組織了一個費邊社。

當然，有些不對，不過他是可以啓發我們的。我們應當盡我們最大的力量，能用知識的話，就用我們的知識。像鬥爭，像肅反，你說反革命吧！是不是要用鬥爭會呢？太不必要了。可以用坦白，可以用檢舉。是不是？完全可以！是不是？知識分子和工农就是不一樣！需要高級的，不是喊口號。很多喊口號的就是所謂積極份子，我想起來是很好笑的，他們就是乘這個機會表現表現自己。不是的，同學們！培養什麼？老實說，培養同學們野蠻哪！”

(清華大學 馮國將)

“思想改造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但是所使用的手段無疑是狂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殘酷斗争！受害而含冤九泉者，何止千万？！这种做法是無人道的錯誤的。”

（武汉大学 陈熹勉）

“思想改造运动不仅老教授身受其苦，我們也不能幸免。”“思想改造太暴粗，老教授并非真正感动，而是受了委屈。”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1952年到1953年党对青年知識分子改造犯了原則性錯誤，方法簡單粗暴。改造的結果摧殘了青年的朝气和上进心，使他們不敢有理想，感到前途茫茫，好象把小孩和髒水一塊潑掉了。”

（北京政法學院 陶和謙）

“思想改造有些人不仅沒有洗淨，反倒被潑了髒水，抹了灰。”

（山东师范学院 庄鵬举）

“很多人至今还不了解知識分子的特点，中国有句古話：‘士为知己者死’，我認为、‘士’即知識分子，党为什么不能使知識分子为自己的‘知己’呢？党只要很好的团结他們，就能够使知識分子成为自己的‘知己’。”

（山东师院 張震东）

“三反之后，思想改造与肃反运动的副作用，仍旧籠罩着整个知識分子的队伍，这些运动等于上饒集中营，逼于全国。”

（北京鋼鐵学院 李大飴）

“士可杀，不可辱。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是不可挫伤的。如果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比杀了我还要厉害。”

（湖北医学院 楊則俊）

“对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有伤人道，是不道德的，是对知識分子人格的污辱，是自己对自己施加精神压力，是沒事找事。思想改造是自寻煩惱，白費精神。因此討厭改造……这些字眼。”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对人的自尊心太不尊重了，自尊心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士可杀而不可辱。”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朱惟民）

“党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伤害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因此，不能發揮他們的积极性。党过去几年故意找我的‘岔子’，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右派分子否定这方面的成績，我就共鳴，覺得思想改造运动太激烈，伤感情，所以对这一政策不滿。”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

“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績只解决了历史問題，解决思想問題不大，伤了知識分子的感情。思想錯誤不是一天来的，也不会一天去，有思想毛病照常可以工作。思想改造运动沒有必要，尤其是方式，‘爭取团结教育’可以，但对于‘改造’兩字却想不通。对知識分子方式粗暴，伤了感情，用群众压力。知識分子老是挨斗，知識分子在任何运动，土改、三反、五反、思改、肃反均逃不了，講知識分子缺点多，优点少，工人階級缺点是認識問題，而知識分子总是找到階級根源上”。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 啓）

“思想改造有問題，改造的方法有問題，改造主要是非党团员，为什么不用和党团员一样的和平方式呢？一定得学生骑在头上打，这就犯了主观主义，不能和斗争地主一样。”

（山东师院 徐乃山）

“关于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我建議：一、在全國範圍內對知識分子的改造經驗總結一下，總結出一些規律。我認為改造知識分子，用粗暴的那一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1952年把我整了一下，整得我抬不起頭來，只問業務不問政治，對我來說結果並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加強，而是資產階級思想加強了……二、黨應該研究知識分子的思想規律，掌握住這個思想規律，對他們思想改造就容易了。如清高、好發議論都是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搞古典文學的喜歡尊師重道，正因為如此，在運動中叫學生罵老師，我們受不了折磨；再一種是愛面子，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要求黨內同志對待我們，像對待黨員一樣細致……”

（武漢大學 程千帆）

“知識分子可以進步，但主要是自己學習和體會出來的，並不是黨領導和歷次運動的結果。”

（山東師院 劉祚昌）

“黨的工作表現為教條主義，學校把鬥地主和對敵鬥爭的方式拿來改造知識分子，這樣不但不能把消極力量化為積極力量，反而會把積極力量化為消極力量。”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 朱華榮）

（四）反對在高等學校中進行 政治思想教育，反對教學改革

“黨的思想教育是培養一個循規蹈矩……只有尾巴沒有腦袋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汪傳散）

“學校理論課的強制性。這不恰當。理論課和其他課一樣，其他課能選修，理論課就不能選修？只要它是科學，就不怕沒人相信，那麼馬

列主义宣傳要不要？我並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一門科學應具有自願性在里面。加之傳授的人把它變成干巴巴的教條更使人覺得無味。為什麼一定要強制學呢？結果不見得好。

我這樣想，過渡時期，這種現象會存在，但不能因它會存在而使它長久存在。這些現象應當引起有探討的必要。社會制度开辟了給人個性發展的前程，為了使之早一天過渡到正常的發展上，我想了這些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劉表興）

“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動機就是為了推翻馬克思主義，建立新的哲學體系。我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擋箭牌，作為外衣，掩蓋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李 德）

“思想改造對舊知識分子是必要的，因為他們深受舊社會的影響，而青年是新生力量，不應提思想改造，而應提個性發展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生 濮仲文）

“我們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再強調黨的領導和黨團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妨礙民主生活和個性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劉達孝）

“現在學校中是政治空氣代替了學術空氣。現在我們就不存在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因為我們學的是政治理論課，所以業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業務。我們已有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因為連上俄文都是政治理論的，只要講理論課時聯繫實際思想就可以了，否則舍本求末。我對去年的學習檢查、今年的思想檢查就沒想通。這是沒有必要的，解決了什麼問題？有什麼成績？我覺得要重新估計才行。

有許多科學家，因為沒有入黨，所以在學術上有很大成就，時間對他們是很寶貴的，那怕二小時，也很重要。馬云鳳開除了黨籍，可能

在政治上走不通了，可是在学术上倒可能走上很高的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暢）

“学校应广开言路，不应死搬教条……光明日报說我校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这还未打中要害，應該說我校是教会，教义是馬列主义，教員是傳教士，学生是信徒，每天必須念这些东西，必須在这个軌道上走，略有超出，就有离开馬列主义立場，观点方法，越軌，叛逆等諸如此类的名詞迎头而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孟繁森）

“我不同意这种思想教育；什么立場，观点，方法，干巴巴的要不就是會議尽是些教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馬列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什么时候都用馬列主义，动不动就是立場、观点、方法会妨碍别人去自主的想問題，也使得人們不敢去多想乱想。”“馬列主义还不是那一套，离不开立場、观点、方法……不值一学，不如談一些文艺理論和旧小說反而好些。”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姚永年）

“馬列主义就是真理啦？我就不信。沒有真理，真理是人講的，人講的就不可信。对經典著作的迷信，就象宗教徒迷信聖經一样，領袖一句話可成为規律。資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要胜利就是規律啦？我就不信，人家資本主义不是还存在嗎？規律是人講的，不是真的。馬列主义在中国已無现实意义，中国生产关系問題已經解决了，現在是解决生产力問題。高等学校用不着开这門課，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自己可以看，报纸也可以自己看。不学馬列主义也知道为谁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公灝）

“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思想灵活，过去我們受的是宗派主义的教育，什么組織性，紀律性，歌功頌德，名义上是馬列主义教育，實質上是奴才教育，把人教育成唯唯諾諾的奴才性，林希翎的思想不僵化。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陈 鼎）

“党、团在教育界不能过多干涉（按意即党不能领导教育工作——編者注）。在学校里不应过分強調政治，这样对工作会不利的，会有损工作。人大办校思想不明确，不应把馬列主义科学观点，貫徹在教育中。”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研室講師 范政濤）

“学习馬列主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人民大学不过是貴族子弟学校，历史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無非是党的意圖的傳声筒。我已对馬列主义發生了动摇。可怕的教条磨光了我青春的活力。来校后对馬列主义經典著作沒有兴趣，至多是为了‘批判它’而去‘熟悉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蔣济良）

“大学理論教育所以有教条主义，其原因，是教員过多的搞了社会工作。理論課不应当作政治思想教育課程，而应该看成是科学理論进行研究。把政治課單純地当成思想教育，在每个大学中規定学生学习和国民党的党义沒有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韓运德）

“解放以来都沒有春天，現在提出鳴放，大家說了些不敢說的話，正好說明了解放以来把人的思想压的过死。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我很同意。（在人大李景汉是被压得最厉害的典型，李景汉一直給青年教师做助教）。思想工作限制过多。搞思想工作也是專政，在学生中不要作思想工作。我們学校中沒那么多思想工作可作，讓学生好好念書就行了。”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職員）

“对于政治教育很反感，党对青年的教育是皮鞭，束縛，压力。思想改造整死了人，整得人直說假話。”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我希望我能独立思考（不管这种思考是否背离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受批判，不受到社会习气的压力和党团組織的干預。”

（北京政法学院 康德珩）

“思想改造是强迫叫人信仰馬列主义。信仰馬列主义不应当强迫，应当由自己慢慢来潜移默化。”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

“1953年对学生思想改造是粗暴生硬。系統的学习馬列主义理論本身就是思想改造，系統学习馬列主义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

（北京政法学院 杜汝楫）

“我同意胡玉林所說的：只要青年爱国，不一定要信仰馬列主义，我認为人們是否信仰和学习馬列主义，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自由，这是宪法規定的，是任何人不能干涉的，为什么今天要向人家硬灌輸馬列主义呢？不信仰馬列主义的人，也不会是反革命，同样能爱国。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套理論只是在会上講講就够了，在会下談这套就是無聊，沒有意思，生活就是生活，沒有政治同样能活下去，能做工作。”

（北京鋼鐵学院 張存根）

“党为什么每年叫学馬列主义，已經叫了七年了，还叫。

在美国知識分子沒有学习馬列主义，可是在科学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就，美国科学水平比苏联还高。”

（北京鋼鐵学院 孔庆福）

“什么規律不規律，什么理論不理論，反正党的行动要造一些理論来解釋。

政治学习和考試好像一条繩子一样綁住人，不讓自由在大海中游泳。”
(北京鋼鐵学院 張庆瑤)

“有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好了技术，可以成名。

政治課有三分即可，願作淡紅色專家，政治課教条主义应由教师負責。”
(北京鋼鐵学院 吳树高)

“一、从專題报告代替教条式的講授，这样就能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結合起来，它將使百家爭鳴出現新的高潮。

二、用自由辯論加强和学生联系，老师参加同学的討論会，同学經常訪問老师，用自由辯論代替教条式課堂討論。

三、变必修課为必讀或选修課，如馬列主义基础，經濟学下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史完全可通过自修达到相对真理。馬列經典作也規定为必修課，这是拜讀經典的純教条，学哲学史的最好选修英文、德文而竟一律規定为必修俄文。”

(北京大学 李景祿)

“团支部成为一个政治核心，長期搞我，我才消沉下来，

对一个青年采用变相的杀人办法，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社会現象的反映，它可以达到摧毁祖国青年一代的目的。

几年来过的是人的生活嗎？我否認。”

(北京鋼鐵学院 文兴伯)

“馬列主义基础，政治經濟学，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論，不是滑潤剂而是麻醉剂，学习之后不但不能啓發我的思想，反而束縛了我的思想。在入政法学院之前，我的思想很活躍，很

开展,但现在思想反而开不动了,生锈了。教条主义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有同学問錢副校長,目前所學的課程很多,消化不了,怎么办?這個問題勾起了錢副校長的回忆。他說:“解放前,有些学校都有自己的学风,象浙大擅長理論,清华擅長實驗。当时学习生活很自由,早起晚睡是常有的事。一年級主要是學三門基礎課,特別是普通物理。当时一个教师只帶几个同学,同时用很多時間去做實驗,自己鑽研得来的知識才是最踏实的,最有用的。这样的学风培养了許多很好的人才,現在許多研究機構的有些科学家,如吳有訓,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但是,錢副校長很惋惜的談到,“院系調整以來把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同学的这种自己鑽研的风气全打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要恢复这种学风是很不容易的。”

清华过去的教条主义很严重,現在好了一些,各系已設立了一些如無線电物理、运用学等新的事業,各系已开始加强基础方面的內容,当然还会有阻力。我繼續为这个方向而斗争,你們不要着急。”

(清华大学 錢偉長的材料)

(五)关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究竟是什么鼓舞着人們生活呢?有人說,社会利益,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又包括在社会利益之中,人們就是为了从社会利益中得到个人利益的滿足而生活着。有人說:人活着是为了別人,这才偉大,才光荣,假使每个人都为別人,那末个人也就获得滿足了。可是为什么要拐个弯子呢?为什么不直接为自己而活着呢?

有人說,这是方法問題,在社会曾經用社会方式謀取生活的利益,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把这些放置在社会化的基础上。是誰这样想的

呢？誰願这样做呢？不錯有这样的例子，但究竟是少数。难道說，只有少数才是正确的嗎？

道德精神能否代替物質力量，这應該是个根本性的社会問題。共产主义道德可以統治人的某些方面，但它却忽視另一些方面。物質力量在正确的运用下，能够比道德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不能超出它們所适应着的社会發展水平。現在来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不現實的，自然是有害的，現在实行共产主义度制也是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前些日子‘中国青年’討論‘徐進問題’。人們說徐進的思想斗争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那种‘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这一著名理論指导下，創造性的应用，在我看来这种說明，無異于用商品的效能來說明它的价值。用人的生理結構來說明他的品質……正是这种思想方法，使人們对于民生各式各样思想的生活环境不理睬，而对由这种环境下养成的不合人們胃口的思想，却施于暴力，似乎这样能解決問題似的……最令人难过的事，誰如果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誰就会受到各式各样廉价的譴責，在‘学习’杂志上也討論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問題。有一个公路勘测人員說：‘要說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以，可是說到已經結合起来，我思想搞不通，我們成天开天辟地，把公路引向荒無人迹的地方。当人們坐着旅行时，我們却走向他方了。当然这种工作是本份的，可是我們的待遇比誰都差，有錢买不到东西，我們的年齡一年一年的增長，可是婚姻問題根本無法解决’。諸如此类，不能不認為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現實問題。可是那些坐在办公室，游公园的大首長、大学者們，大概是喝了过多的燒酒，于是写了文章証明：这算是什么呢，不会是你个人主义作祟吧了，……你們——天生的賤种，應該埋头苦干，不計較个人得失，那么你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就結合了。”

“对于今后工作的方針問題，我們有更多的分歧。在我看来，現在

提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是兩重的，一方面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对抗，这就是說集体主义的思想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个人主义的加强，但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完全不是对抗的（我們这些哲学家們到現在为止还始終不懂得什么是对抗只有关鋒似乎猜到了一点）所以提出了个人利益無条件服从集体利益只会引起混乱，因为不能把个别成員的个人利益与全民的集体利益結合起来就不能在和平建設的条件下使青年的基本群众对社会主义感到兴趣。”

（北京大学 譚天榮）

“‘人不为己，天誅地灭’，表現积极的都是为了个人目的的投机分子。”

（北京矿业学院 張处俊）

“‘利己主义’者宣言”

1. 人原来是自私的（概論）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自私是生存所要求的，人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到一个集体中去，个人的利益总和就形成了部落的利益，生产力进一步發展以后，这种自私就由生存和欲望共同来形成了，在私有制社会里，这种欲望沒有被应有的道德所限制。因此一些人的欲望就妨害了另一些人的欲望，这是不好的。

到了公有制社会，人，仍然是自私的，这种自私也仍然是生存和欲望共同来形成，其欲望不外是物質上的，精神上的，它又包括荣誉，地位，兴趣，思想等，只是这个整个社会的人們欲望类同，机会一般也相差不多，因此就不可能任所欲为而要受一定的道德观念所限制，最理想的是做到不損害別人情况下滿足个人欲望。

2. 人們这种欲望是社会發展的內在动力。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其沒有个人欲望就不会形成部落，私有制社会沒有个人欲望就不会形成階級集团，也就沒有階級，但在私有制情况下由于欲望沒有被道德限制，其自身又产生了阻碍社会發展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受到适当限制,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主观能动性。

3.但一点却以被忽视简单的宣传什么‘绝对服从祖国利益’动不动就拿这是集体利益来压人,但却没搞清什么才是真正的集体利益,他们忘记了在平时若不适当的满足个人欲望,就要丧失能动性,大家都丧失能动性就等于丧失社会前进动力,也就要失去社会优越性,就企业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企业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企业还不如的话是有些道理,因为失去了能动性,还有什么推动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呢?

4.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以前就有,只是与阶级斗争比较起来不显著,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也就相对的突出了’,这句话对,但不完全,革命胜利后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但是相对的突出了而且也绝对地严重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程度随着革命胜利这个突变,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更使人遗憾的是这种矛盾由于旧思想影响和一些坏风气的保证,革命胜利后竟得到了不正常的发展,从而部分地加强了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消除或减小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的矛盾,我们认为应该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领导者应该基于他们的才能与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群众的敬佩与信任,每一个领导人应有‘先天下之尤而尤,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质。但是现在很多领导人并不是这样,可是他们通过‘莫明其妙’的途径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我们要求改革我国选举制度。叫那些不称职的人下台,让他们到其他岗位上去强调按劳取酬。”

(北京大学一群学生)

“‘利己主义’原理”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

为了明确‘利己’一詞的涵意，究竟应选择怎样的标准？一种绝对的标准是否存在的问题？

誰要是武断的提出一种绝对的标准，这种标准虽对他自己是适用的，但不一定为大家所承认。对自己有利的事必需是自己承认的。

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同时可以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利与否，取决于别人。

我們坚持的利己原则是：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别人的利己，都是利己；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遭到反对，只不过表明人人都利己。

关于利己行为，有一点要特别着重提出，就是，除了深思熟虑的利己行为，还有一些利己行为是不加思索就作出的，表面上没有计较个人利益，而行为的效果却有利于别人，自己的利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失。例如，人在紧急关头的自我牺牲，战士们战场上的许多英勇的英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利己原则呢？不是的。一个人在作出这样的行为以前，对于这样的问题，即在那样紧急关头采取怎样的行为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早就有了考虑。既然主意早已打定，行动时也就表现得毫无迟疑。

尽管人的利己愿望是千差万别的，但同样的都有利己愿望，都要过幸福、自由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并非绝对的不可调和，相反的，人们联合起来会更有力量。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于是，有利己愿望的人结合在一起，过互助的社会生活，人成了社会的动物。与动物本能的联合不同，人的联合是大家都有利己愿望，都要求生活幸福的结果，是利己在以‘契约’的方式构成的联合，借助于此种联合调和彼此利己冲突，并争取共同的利益。

所谓阶级就是社会上有共同生活状况的人的集团的一种。比如工人阶级，就是没有生产资料并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的集团。阶级之间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同的。由于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上出现了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阶级这

事实不容否認，不过也不要忽視各階級的成員都是有利己願望的个人(利己者)，正如整个社会人的全体是有利己願望的个人組成的一樣。階級的形成仍然是以人們利己願望为基础的，人如果没有利己願望仅仅有剩余产品，强占剩余产品的事仍不会發生，階級仍不会形成。不要以为在私有制和階級出現以前原始人是不利己的，实际上他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結成原始群和部落等，并且会因为爭奪事物等發生利害冲突。

談談階級也應該談一談剝削問題。大家知道工人替資本家干活，并不能从工資得到全部報酬，一部分無償的劳动被資本家占去了，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即所謂剝削。这种不平等交易确实是进行了，但工人不就是心情願的。在資本主义利益被推翻之前，工人不得不和資本家进行这种不平等交易，并且設法爭取这种不平等交易，否則就有挨餓受冻失业的危險。

(北京大学 王存心)

(六) 反对在高等教育中为 工农開門的階級路綫

“培养工农干部的教育方針是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論的表现。培养工农干部的方針是一种冷拔政策，工农不是鋼材，而是鑄鐵，一拔就出廢品了。”否定向工农開門的正确方針。污蔑热心为工农服务的教學态度是“媒姆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賀安的材料)

“正确貫徹中央关于知識分子的政策，过去执行这项政策有这样的偏差：因強調培养新生力量、培养無产階級自己的紅色專家，而忽視照顧老一輩人，排斥党团之外的人。何况我們的旧知識分子同苏联又不相同呢？所以，少奇同志在八大报告中仍然一再提出培养自己的

專家問題，我覺得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培養應該一視同仁，現在在敵對性矛盾已經消失的條件下，再強調什麼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斯大林是在這裡加了着重點）專家們究竟好處多，還是害處多？我看只是多筑就起了一道牆，象是我校新聞系去年招生明文規定非黨團不可，我看了有這樣的感覺：黨是太不相信非黨的人民了，甚至連非黨的青年也被拒之於進步之門外，難道挂着黨團招牌的人就沒有一個壞蛋？難道非黨團員就沒有一個正直的、愛國的甚至社會主義的公民？我看這種做法是多少違反憲法精神的，而且是機械的。”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過去送留學生過分強調了政治條件，送出去的都是業務差的，都是支部某幾個人按自己所好，個人喜歡來決定的。”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助教 王佃保）

六 少数民族問題

“現在蒙古人民很担尤。怕今后能否存在下去，現在已經同化很多了，再过五十年真危險！汉蒙民族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内蒙資源丰富，但没有財政权，外貿权，这是汉族对蒙族的剝削行为。解决的办法是讓内蒙独立或建立联邦。内蒙地广土肥，农产丰富，然而农民吃不饱，粮食都被汉人‘統’走了。”在一次座談会上，他帶煽动性的說：“农民粮食不够吃可是政府硬說够吃，安徽省有二、三万农民挨餓逃荒到内蒙，沒有地方住，就挤在火車站里，火車站象个貧民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森达賴的材料）

他对党的許多政策表示怀疑，說广西、宁夏成立自治区，我很想不通，說“这伤了汉族人民的心，把中国領土弄得零碎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易志力的材料）

“汉族干部歧視藏族。据說由于土地改革，在西藏引起很大騷动，要藏民反对喇嘛，分他們的土地，农民是不願意的，同时西藏宗教势力强，应当考虑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在西藏，与上層分子团結好，对下層团結不够。”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岳文伯）

1956年10月1日陈参加游行后写道：“这是偉大的中国人民，这是世界上特别的民族，勤劳、勇敢、坚忍、热烈……世界上从来未有这样瘋狂的民族，这是一只广島上的雄獅。”

1957年1月7日写道：“我学习了民族問題之后，对少数民族大大發揮了兴趣，那里大部分是黑暗的角落，需要阳光，而我們的干部水平又不高，有的人思想还不是很好的。所以我願去，希望去，只要我的爱人問題能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国雄的材料）

七 統籌兼顧、适当安排

“人口增加是等比級数的，物質資料增長是等差級数，这样發展下去，人們就沒有吃的了，所以我国現在在提倡节育、避孕是根据这个理論提出的。

毛主席在国务會議曾經說過：‘人們不进行計劃生育，人类將自己毀灭自己’，这句话若不是毛主席講的，別人这样提，又該說人家反动了。”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陈祖武）

“节制生育与馬尔薩斯人口論相同。馬尔薩斯人口論是产生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原因。”

（湖北医学院 余宏緒）

“节制生育是共产党要人民断子絕孙。”

（湖北医学院 潘其隆）

“城市人口限制这是否違犯宪法呢？宪法上規定有居住迁移之自由，为什么不叫进入城市呢？只要是他能生活的話，不流在街头，为什么不叫他来呢？这是一种自然發展規律，是一种經濟繁荣的具体表現，如上海有六、七百万人口，如河北省的石家庄由几万人發展几十万人，这是自然發展，經濟要求的結果，不能人为的限制，自然限制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有政权作基础，有軍警和監獄，每个人都不敢不服从。”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学生 張炳鈞）

自称对馬列主义的动摇，对人生的悲观消极是从人口論开始。認

为“失业和貧困的根源是人口过多，尤其是地少人多的中国更是如此”。同时認為“严重的問題是人本身是矛盾的統一體（性善性惡），追求享受……等是人的本性，企圖用各种方法甚至用暴力来夺取更好的物質享受，这是每个人的本能願望，并逐漸形成这种信念……原来統治着人类的最基本的規律仍然是‘生存斗争’‘自然淘汰’。战争是最基本的規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根本內容。中国历史上战乱年多减少人口，太平年代人口竟增。战争的發生不是人口少而是人口太多的結果。全世界25亿人口确有一半以上的挨餓，解决这个問題的办法，福音在于相信馬尔薩斯。用强制办法使死亡率高于生殖率，使人口减少一半。因此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問題。我歌頌原子彈，因为最少它保証我們能在無憂無慮中死去，原子彈的力量成为世界的中心力量。中国和世界都將毁灭于人口的繁殖……人的价值是显得多荒唐和無聊，需要有原子彈，需要有細菌武器。”他在日記中写道：“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破坏欲望，我甚至想毀掉人类后再来創造新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蔣齐良）

八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一)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1. 歪曲百家爭鳴的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對，但頑固勢力很大。80—90%是教條主義，無法爭鳴。報紙最近較活躍，我很滿意，可能教條主義者不滿意。過去報紙只是歌功頌德，甚至連小品、漫畫都不能登，一家獨鳴，只談成績，不談缺點。”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楊維新)

“毛主席提出‘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這是不對的，他使人發言有顧慮，有害於實踐，百家就是百家。

現在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許多黨員有話不敢說。

百花齊放，有人不喜歡玫瑰花，卻把它當毒草，這是無知的表現。

根據目前情況來看，除三害不見得除得好，要充分利用民主權利，一直反到共產主義。‘百家爭鳴’不是方法而是目的。”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問：‘為什麼只許人家鳴，不許我們鳴？’

答：這個問題可先看一看我上次那封信。這裡只作一些補充。

在過去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時期，當我們政權還不鞏固的時候，我們為了不讓一切有害的、甚至可能有害的思想來侵蝕，使人民中造成

混亂，我們用嚴格的辦法，實行一家獨鳴。這對保證勝利起了很大作用。在這中間，人民的思想水平大大轉變了。可是，以前這樣做也是不得已的。這樣做的結果，還有一個大害處，那就是思想僵化，教條主義發展，因此當條件已經成熟的時候，我們就要堅決實行百家爭鳴的政策，來克服思想僵化的危機。

現在，百家爭鳴的政策提出來了，這對我們黨內許多長時期在黨的思想影響下習慣一家獨鳴的人，是很不習慣的。聽到一些不對頭的東西，就慌忙條件反射，用粗暴壓制的辦法去駁斥別人。而那些長期不能爭鳴的人呢，心情也不一定正常。他們覺得好容易今天有了個說話的機會，這下將要好好出一口氣了。於是，說話不免陷於偏激（當然更多的人是暫不鳴放，看看風色再說）。而且，你們知道，到今天，馬克思主義的威信已經無比增長，已經為極廣大的人民所接受（儘管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教條主義者），從力量對比看起來，那些過去不能放的思想，是又孤單的，又弱小的。因此，在今天貫徹百家爭鳴時，便應該首先讓他們大鳴大放，我們不急於和他們爭鳴（當然也不是在一切問題上都如此，比如，對定息二十年的問題，就不能完全這樣），否則，他們根本就鳴不起來，剛鳴一聲就被打倒了。我們可以看看黨中央對陳其通、馬寒冰的文章的態度，有人也曾為他們抱不平，說中央只准別人鳴，不准自己鳴。我認為說這種話是不了解當前的情況。實際上，因為中央把陳其通、馬寒冰教條主義的批評打下去了，百家爭鳴的空氣才開始逐步形成。我認為黨對林希翎的講話是嚴重的錯誤，實質上就是這一種性質的錯誤。”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虞耀麟）

“黨中央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是根據胡風的30萬言‘意見書’中來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助教 黃守禮）

“中央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有90%的高級幹部不通，因此，中央除用組織手段外，還要發動黨外群眾大放大鳴，施加壓力。”

曾問过崔書記：“你是屬於百分之几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暢的材料）

“百家爭鳴的方針愈是領導愈不通，愈是群眾就愈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講師 章 起）

“談一談對現實不滿的問題：很多人因為有懷疑。對現實不滿，我認為是一個好現象應該鼓勵人們對現實不滿。滿足現實的哲學基礎是黑格爾靈魂的復活。黑格爾有絕對觀念。現在有些領導也成了黑格爾。

社會主義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會，這個‘最’字就是形而上學的。將來會有更好的社會。到我生活在五百年以後的‘X’社會，我也會不滿，社會是前進的。如果說對現實不滿不好，滿意現實社會就不會發展。猴子要滿意現實的話，那麼我們現在都成猴子了，對現實不滿是應該支持的，而現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價的贊美詩，成天和國民黨、資本主義比較向後看不向前看，教員講課也是和國民黨、資本主義比較。

有人說不滿現實會失去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我看這不對。當然我們現在歌頌是需要的，真正的歌頌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頌，吹牛的歌頌，這樣會敗壞人心真是害人不淺，要把現在有什麼問題老實的告訴人民。譬如說，現在青年報上刊載要把我們的家底告訴人民，我們人口多，家底薄，有困難，這對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是能夠克服的。群眾知道會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但是過去的許多宣傳卻是更多的欺騙。例如，上海工人支援西北玉門的時候，曾用物質引誘。但玉門是非常艱苦，房子、燈光不夠，非常嚴重，所以問題要爆發了，應該把真實情況說出來，真正獻身社會主義的人會去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現在是一家獨鳴，提個意見便扣帽子，只有共產黨鳴，別人提出

教授治校是探討性的，便扣个反对党领导的帽子，好坏应由群众鑒別。先一棍打死，后来解剖死尸，那是医学家的事，达到一个目的的道路是很多的，只有共产党对，毛主席說了对，而小百姓說了便抓住小辮子吊死，在六条下就沒有鳴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三个主义的护身符。”

（北京矿业学院 袁 通）

2.“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党在领导科学、文化、教育是無能的，应该讓位。党内缺少無产阶級知識分子不得不拉資产阶級文人，而利用改造的办法，不如讓其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鉄城）

“中央干部必須有文化才能领导国家……工农当然不行了……高級知識分子大多数有修养，而工农能这样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老干部不学無术，不懂裝懂，指手划脚，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的领导。教研室领导是濫竽充数。学校各級领导是外行說内行話。”他主張“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来领导”，他崇拜旧法人員，認為“右派分子錢端升，樓邦彥有学問能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王向明的材料）

……“党员什么都行，沒有拿过試管的可以领导化学。”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学生 王鴻章）

吳家麟在發言时諷罵教研室主任刘国勋同志是“大独裁者專制

統治，小學畢業，中學程度，不學無術，一竅不通，胸無點墨，不懂裝懂”“這學期老干部講課是全綫崩潰。”“黨的幹部政策是：唯黨，黨親，唯資。一脚踢開老法學家。”認為“老干部不適合做高等學校的工作。老農並不等於農學家。”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思想領導沒有黨光靠技術人員是不行的，但是，必須知道，黨得不到技術人員的協助是辦不好學校的。今天不是知識分子和黨爭領導權的問題，這是客觀要求。譬如說給病人開刀，你一個共產黨員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把醫生拉到一邊而自己動手。特別是今天共產黨是執政黨。但黨卻把醫生看得太簡單了，這是不行的。解放八、九年了，知識分子都經過了鍛煉，他們要求尊重他們。否則，他當面好像佩服你，但實際在‘腹誹’。”

（湖北醫學院 朱裕璧）

“反對不學無術的人，占居學校領導，發號施令，學術上沒有成就的人不能當學校領導人。”

（北京政法學院 陳守銘）

“社會是不斷地進步着，人民群眾的覺悟在不斷提高，他所需要的是真正有學問的人，不要不學無術的靠功勞吃飯的人，不要作威作福者，不要奴才。未來是屬於正直的有學問的人！勝利永遠為正直的有學問的人打開大門……人民需要我，對我抱着很大希望。”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

“不讓老教授講課，說他們不是黨員。而黨員卻法律知識不專，形成卡片積累，資料匯編。”

（北京政法學院 黃盛叶）

“我們是高等学府，怎能讓不識五斗大字的老干部在學校工作呢？要撤換这些老干部的工作。”

（湖北医学院 陈 达）

“我院老干部太多，文化理論水平低，做教学工作不合适，不需要这样多的老干部。”

（北京政法学院 杜汝楫）

“老干部講課是，上課教員飄飄然，下課学生昏昏然，講稿是道听途說。老干部沒上过学，連 H_2O 都不知道，怎么教学？”

（北京政法学院 梁世通）

“我建議把沒有归队的老教授聘請到我院。充实老教授的队伍。把一些老干部調走。”

（北京政法学院 姚 明）

“有些黨員根本不懂科学，他們沒有資格領導內行人。”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我們这里是学校需要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不要不学無术的党棍。”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共产党能領導科学，但不等于每个黨員都能領導，有些黨員認為过去能領導人民向階級敌人作斗争，就能領導一切事业，隔行如隔山，能打仗的人，不一定能看病。”

（湖北医学院 朱裕璧）

“黨員只懂馬列主义就妨碍了技术發展。”

（湖北医学院 潘其隆）

“共产党都是些不懂科学的人，共产党根本不能领导科学，科学要讓大知識分子来领导才有出路。”

（湖北医学院 許瑞昌）

“‘外行’不能领导‘內行’。而共产党即使‘內行’也不能领导群众，否則就会产生‘三害’，就会限制群众的积极性，就会产生不平等……如果党委领导人作风是好的，能够去接近群众，可以減輕‘三害’，但也不能完全消灭‘三害’。因为他們对业务不熟，不是‘行家’。而党即使业务熟悉也不能领导。因为共产党决定的东西拿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就会觉得这是党的事情，自己不用管……当家作主的精神就受到限制，积极性就不能發揮……如果对群众的意見比較尊重，能够博訪周諮，那当然好些，但是被訪問被諮詢和自己决定問題是兩回事，仍有主客之分，‘礼賢下士’仍然是‘下’而不是平等。”

（中山大学 林楚君）

“聶榮臻不能当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应由郭沫若当主任。”

（中山大学 汪劍鳴）

“党不能也不应该领导科学、艺术。我們目前对科学艺术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內行，科学艺术是个人事业，可以自成学派，可以自己建立体系，科学家艺术家可以自由結社，这是科学艺术的特点，党不应去管。”（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党对作家干涉太多，对文艺工作者束手束脚。因而拿不出大作品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

“艺术是最清高的，艺术不为政治服务，它是表达作者个人情感和性格的工具，是艺术家的私有财产。学艺术的人唯一的真理就是美，学艺术的人不必入党入团。艺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学的，他要

有文化，还要有素养，党搞政治行，但要领导艺术，还要向法国学习。今天沒有人能欣賞艺术，艺术学校毕业的人沒有出路，除非你降低水平，画一些庸俗的东西，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任何作品都要加入党性是不实际的，是沒有艺术可言。”“国画沒有立体感，有很多缺点。齐白石算什么画家，只会画一些花鳥魚虫，国画不能表現生活，如蔣兆和以国画来表現今天的生活，是死气沉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道路对艺术限制得太死了。董希文沒有什么，他所以这样有名，只因为他是党员。开国大典是最庸俗的，水平低的作品，既不象油画，又不象年画。列宾沒有什么，他不行。印象派的理論根据很好，是很科学的，講究顏色和光綫，这才是美。我們應該讓各种派別都存在，报纸上應該多登各种流派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朱維民）

“既然要百家爭鳴，何必要党的領導，在一个手心里怎能爭鳴？只能一家独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在他写的“剧本”被杂志社退回来以后，他不知耻地罵道：“戏剧月刊也存在着老爷式的官僚主义……青年作家則置之不顧！”又說：“曹禺、夏衍、洪深、田汉皆我之大敌。”

“不能滿足那个公式化的现实主义……公式化的締造者是誰？现实主义的發明人。”“文艺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就是因为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怀疑“百家爭鳴”政策是否有“真正的自由”他說：“‘百家爭鳴’要徹底，要允許各种流派同时‘爭鳴’，我就要写純粹浪漫主义的作品。”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1.不應該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2.‘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政策与‘整风’結合在一起，是一个陷

井；

3.“百家爭鳴”應該允許各種流派(例如‘浪漫主義’)活動。應該允許‘放毒’(?)

4.懷疑‘百家爭鳴’是否有‘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李德的材料)

作協的領導者(張光年、郭小川)都是思想僵化，只懂喊口號，裝成教訓人的樣子，如馬鐵丁。其他一些如秦兆陽，丁玲，艾青等都是思想開通，但是在文藝上插不下手，在百家爭鳴前，文藝界就是這麼一片。”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陸 戈)

“文藝為工農兵方向太單調了，其實人生很複雜。只是工農兵，就教條了，我翻譯出國電影劇本，每次都要批一下劇本寫得太壞了，都是先有教條，再寫劇本。不過為了稿費，我不得不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文藝方面，馬列主義不一定是指導思想，可以自由选择可以爭鳴，馬列主義爭不過，其他學派都可以做指導思想。好的坏的都要鳴，馬列主義在某一地區鳴不過可以不作為指導思想，新聞中要貫徹爭鳴，報導要以真實為主。作家不一定要寫工農兵，一切好的坏的都可以寫，尤其是坏的。”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殷九如)

“文藝創作沒有階級性。

毛主席的講話中提到政治標準第一，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源泉。”

(蘭州大學 肖 藩)

“黨在文藝界控制過嚴，過嚴指黨在文藝界為工農兵服務之方針。就因為黨在文藝界控制過嚴，所以文藝作品少了，文藝界的教條

主义是由于党领导之結果。党給文艺界一种压力，如巴金在解放前自己創刊物，現在就不能。又如老作家沒有作品，也是因为一棒子打死的原因，

党打游击可以，搞文艺怎么能成，老干部沒有知識不能領導。”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百家爭鳴是党的阴謀。

大鳴大放是放虎打虎，

鳴放是我們（知識分子）鬧事的时候，工农是無知的。”

（蘭州大学 馬章福）

“將香花和毒草明确分开只会影响百家爭鳴，因为討厭毒草必然从而討厭傳播毒草的人，誰願意自命為毒草的傳播者呢？”

（北京大学 严仲强）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对中国法学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法学界老的一輩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輩被教条主义迷了窍，要‘招魂’。”

（蘭州大学 吳文翰）

“要求人民具有簡單头脑并帶有宗教式信仰的思想教育方針，最集中的表現在我国艺术事业上。生硬地認為人們看电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受教育和改造思想，我国出产的‘反特’影片所唯一希望收到的效果是：‘人們！你們要警惕啊！’‘人們！你們不要乱說話啊！’‘人們！你們要仇恨反革命啊！’有时也把反革命丑化得可笑，剛一出現在銀幕时，誰都知道他就是坏人，是特务。所謂对‘艺术性’的了解在这样精神下，有了新的式样，凡能很好很巧妙地配合‘政治性’收到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目的就叫‘艺术性’强。这样看来在解放了的国家所出产的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赶不上資本主义世界翻譯过来的

影片,并不足以为怪,解放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北京大学 朱庆圻)

“文艺作品是公式化的,概念化的,就由于我们的生活是公式化的、概念化的。支配生活的是人,写文艺作品的也是人,因而作品就不能不是公式的,概念化的。”

(兰州大学 肖 藩)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是过时了,这不是什么‘文艺理论’文章,这篇文章导致了目前文艺的不昌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延年)

“我认为毛主席的工农兵文艺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缺点,不全面,因此造成了现在文艺题材方面不多样化,如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很少。文艺界对工农兵方针领会有问题,许多人靠工农兵吃饭,文艺工作者躺在床上不动脑筋,使作品公式化,概念化。”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徐增明)

“……不仅是文艺科学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上也可以鸣,反右派不必要。毛主席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政治上的争鸣,我怀疑党。我说这个方针提出来也许是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同意林希翎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认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荒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是黑格尔三段式的复活,束缚了人们创作的天才,而使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这是我国文艺运动事件中主要的阻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森达提供的材料)

他支持林希翎的污蔑，說：“她大大諷刺了周揚，更尖銳地批評了圖騰小冊子（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書——編者注）的非科學性。”他惡毒地謾罵我國文艺界是“小丑文人”，說他們“在阿諛着政客們所說的騙人的鬼話，他們不是文人。”“說我國文艺界有粉飾現實的自由，有唱廉價頌詞的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李德的材料）

“新聞上主張各成一家一派，唱對台戲。學術上開放唯心主義，不要批判原本的交給我們……參考消息不但要看，而且每周要一次，內容要加多，課堂上講課都是一面之詞，只是事物的一方面，使我們愈來愈片面，這將使我們的大腦退化了，這還了得。”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劉達孝）

對前一時期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大加贊賞，說“豐富多彩，意見尖銳，標題醒目，引人看起痛快。”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助教 盧晁持的材料）

反對我們黨的文艺為工农兵服務的方針，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並認為解放後由於“文艺界整天忙於配合政治任務，扼殺了文學藝術的繁榮和對世界文化遺產的吸收，因而作品必然公式化，如林希翎所說的‘廉價贊美詩’。”他主張“一切從我出發的藝術，藝術應是為個人享受的東西”。反對在作家中進行思想改造，反對科學藝術界學習馬列主義，認為在他們的學術研究中可以自發地產生馬列主義，反對科學藝術的統一規劃，認為“作協只應成為作家談心的地方，那怕變成清談館也好。”欣賞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事業，認為他們“能滿足各種人的口味。”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室研究生 佟駿的材料）

“解放後大學生水平比解放前低，這是因為第一流的學者（胡適

等)都跑到台灣去了……”

“解放后的文艺工作是失败的，根本就沒有一部好的作品……1953年以来我根本就不看中国电影……有人說高玉宝是作家，我听了都头痛。解放后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如此严重，我認为和周揚有关。我認为周揚当选为党中央后补委員是很不恰当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伍伯涵)

“科学文艺不一定要党领导，共产党誕生前也有好作品，資本主义国家科学也很發达。中学、大学質量不高，沒有以前頂用，是否因搞政治运动太多呢？是否党领导这方面是外行不是內行？”“中国沒有日丹諾夫，党培养青年作家有‘拔苗助長’的毛病。解放后艺术發展不大，文艺作品除‘三里灣’外其他無好書，丁玲、周立波的書得獎金太不配了，是为了照顧中国的威望。”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凌国星)

“文艺界教条主义是占統治地位，教条主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階級斗争时期)，当时还起一定作用，解放后文艺多是公式化概念化。”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

“外文出版社只此一家，譯稿这里不要，就没办法，以致很多人的譯稿，都白譯了。这也是外行领导內行。”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虽然主觀上推动其發展，但客觀上却是限制、窒息和扼杀了他的广泛的发展，机械形而上学，以新的形式猖獗起来，層層的銀手銬限制和淫奸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也是一样。新聞事业，除了歌功頌德迷人耳目之外，就起了布告牌的作用，新聞事业被粗暴的强奸了。有关匈牙利事件中的情况报导是不真实的。”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3. 誣蔑、攻击、反对馬克思主义

(1) 否認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經驗的總結，否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誣蔑馬克思主義“過時了”

“我觉得我国的社会科学已經墮落成为政府政策和党政策的宣傳工具了；除了对現行政策进行解釋外(有些解釋是非常拙劣的)，毫無科学价值，特別是那些資產階級理論的批判，簡直幼稚的可憐。这除了讓敌人来嘲笑我們之外，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毫無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邓先扶)

“馬列主义只是党的学說，我不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苏联也沒有这方面的博士，研究不出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 孙国梅)

“在理論上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階級性有时有矛盾的，因为科学性要求全面看問題，为了照顧階級性就和科学性有矛盾。如無产階級絕對貧困化，如果按照这一理論这样資本主义国家現在工人生活就要比資本主义初期低，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王犁剛)

“我們專業(指科学社会主义——編者注)应成为一門独立的科学，能自成体系，現在尚未成体系，不能成为一門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

“馬列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科学，它并不是工人階級当中产生出来

的。是由大知識分子馬、恩客觀地繼承了歷史文化遺產以後創造出來的，以後由信仰它的知識分子把它貫輸到工人階級中去，為工人階級接受，用來建設社會主義。”

（北京政法學院 張景明）

“馬列主義不實事求是，明明是錯的，共產黨也要說成對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個自殺的政策，但非要說成是在當時實行共產主義政策是對的，錯就是錯，為什麼不敢承認？”他還說：“不同意1938年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關於按人口平均產量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提法。如果產量多就是共產主義，那麼現在美國就是共產主義了。”

（北京政法學院 陳述慶）

“今後應該以思想家的眼光看待各種科學（包括馬列主義），我要靠自己的獨立思考來鑒別各種思想的正確性，我認為馬列主義也是可以懷疑的……我覺得光做一個政治教員沒多大出息，只能傳授別人的思想，而不能在科學上有所作為，在我看來，只有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才能做到一些獨創性的研究。”

（北京政法學院 康德琯）

“馬列主義的宣傳變成了教條主義。過去對敵鬥爭是改變舊社會，現在馬列主義變為教條主義，沒有發展，停滯不前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 曹達夫）

“馬克思主義未必是真理，馬克思已過時，不適用了。”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劉達孝）

“馬列主義過時了，因每一種理論都有他的局限性，馬列主義也不例外，在中國行不通。一種理論過時必有一種新的理論產生來代替。周大覺的文章就是新的理論的開端。”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现在馬列主义(除辯証法外)已經过时了,已經不适用了,我只相信辯証法。”

(北京政法学院 匡紹毅)

“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簡直是奇迹,他对我說在这种哲学界無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辯証法’‘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兩本書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別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馬克思主义陷入停滯’的說法,被人民日报編輯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討論(或者叫作討論或者叫作圍剿反正一样),听說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沒有开演,一切沒落階級的鬼祟和狡猾伎倆,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們在殘害着怎样的人才呀!”

(北京大学 譚天荣)

(2) 誣蔑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宣揚修正主義

“我認为林这样提法有合理的东西。她提問題的角度是从历史根源去找,她并不是說教条主义产生就只是买办性,同时林也申明学苏与亲美,是兩种不同的事。历史根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买办思想在今天就断無反映嗎?我看还是有联系的。毛主席講过,教条主义封建式的,在‘五四’时反对了,以后又产生了洋八股,洋八股反映到党内来,就是党八股,即教条主义。而今天的教条主义者在反資本主义时,就說苏联一切都好。所以我認为林提这一点是創造性的,說明了它的历史根源。如有人認为‘买办性’的字眼太刺目,可以不这样叫,但实际內容是这样。”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講師 盧晁持)

“辯証唯物主义是一切唯物主义的最高發展,它唯心主义——在

我們这里也就是主觀主义的死敌(原文如此——編者注)。但是,在目前,全世界範圍內的馬克思主义者們大都犯了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新形式——的錯誤。它的厉害程度,我認为只有中世紀的經院哲学可以相比。

在我看来,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在近三十年来,教条主义使得馬克思主义毫無發展。即便在今天的人民大学的講堂里講的,除了解釋馬、恩、列、斯在几十年前說的話外,簡直沒有一点新东西。(我不是反对学习經典著作,我只是說为什么馬克思主义停滯不前?)馬克思主义这門具有生命力的科学,看来,在我們这一代,会被我們將它僵死的。

教条主义如果产生在个别人身上,甚至于一部份人身上都好解釋,但問題在于,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在全世界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除中共外)占了統治地位。我認为,它之所以能在我們这个时代登上了馬克思主义的宝座,一定有一些我們还没有認識到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魯 基)

“所有一切錯誤的原因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三害中最主要的。在時間、地点已改变的条件还坚持那些过时的原理,就是教条主义。

1949年后,教条主义特別严重,过去反过教条主义的人現在又犯了教条主义,而这些人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教条主义。

無产階級不可能摆脱認識上的局限性。

教条主义要受到批判,要像批判胡适、胡风一样去批判它。四人宣言(指陈其通等四人——編者注)并不只是代表他們四人的,而是代表了許多人,例如:人民日报沒有批判它,可見这代表党,至少是中共宣部的观点。人民日报是教条主义的支柱和講壇。教条主义来源于党中央,它以合法馬克思主义出現,披着正統的外衣出現。目前,尽管整风搞得熱鬧,但並沒有触及到中央。党内有許多小教条,整风要整到他們头上来。教条主义表現为对馬列主义生吞活剥,对唯心主义一棍

子打死，抓住一個人就批判得要命，這是小生產者狹隘的排他性的表現。

馬列主義與排他性之間發生了矛盾，面臨着危機。

教育工作上，報紙，講壇充滿填鴨式的作風。在學校中，教條主義的教學誤人子弟，可以說，教條主義滲透得無微不至，如：懲罰制度，五級記分制（這是根本不適用的），全面發展教育方針。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貫徹因材施教方針的，而我們卻強調了集體主義，抑制了個性發展，說的是全面發展，實際是一面也沒發展，許多有特點的人，在這種教育制度下被磨得圓滑得很，這些人除非是沖出來，不然就要被壓死。但沖出來的人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向教條主義屈服，人云亦云，林希翎就是沖出來的，她有許多向教條主義鬥爭的經驗，但她有些偏激，這是由於壓得太厲害而造成的。斯大林就是因為被資本主義壓迫得太厲害而多疑、偏激。

過去的学校是學店，現在的学校是學場，質量很不高，教學制度與社會制度根本不適合，要根本改造。

要反教條主義，就要組織力量對一切馬列主義原理、政策、方針進行全盤討論，實際上，黨雖然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政策，但對它會產生的後果認識不足。”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既然馬列主義是真理，真理不怕火來燒，為什麼不把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的理論都擺出來呢？”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魯 穆）

“匈牙利事件是共產主義運動對我刺激最大的一次，馬克思主義青春時期已過，唯心主義可以分析學習，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補充。”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劉達孝）

“對社會科學的討論，感到胡繩的哲學報告，就是捧着馬列主義，

馮友蘭倒是了解中国情况的，应把他們的言論研究研究。反馬列主义这把火自己也是感到痛快的，觉得这样一来，理論会有开展。”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講師 陆 戈）

他反对我們哲学系的課程在“沒有系統而全部地講授唯心主义”以前就講了馬克思主义。認為沒有了解貝克萊的“原意”（原著）之前，就不能相信列宁对他的批判。他气势凶凶地說：“科学的阻碍者是誰？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的材料）

“原来所学的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問題，所以要从資產階級那里去找馬列主义所沒有包括的东西，拿这些新东西来發展馬列主义，修正馬列主义，来調整我們国家政治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講師 盧冕持）

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过去大規模階級斗争时期，当我们政权还不巩固的时候，我們为了不让一切有害的、甚至可能有害的思想来侵蚀，使人民中造成混乱，我們用严格的办法，实行一家独鳴。这对保証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以前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这样的結果，还有一个大害处，那就是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發展。因此，当条件已經成熟的时候，我們就坚决实行百家爭鳴的政策，来克服思想僵化的危机。”“我們党团员多，凡是党講的都是正确的，即使有錯也是服从，長期下去腦子机械化了，教条也出来了。”他認為現在“問題在于各种各样思想都自由的表达出来，讓他們長期內（几十年、几百年）和馬克思競賽，看看誰是真理，甚至可以取長補短，在競賽中达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整風中“提出改进建議却不一定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来，如果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也不妨拿出来研究研究，集思广益。”“我們今天可以用百家爭鳴的办法来和毒草競賽，甚至讓毒草起点积极作用，医医

教条主义的毛病。”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虞耀麟的材料)

“人大沒有自由講演，沒有学术的自由空气，無論从講台，討論，自学都是这么一套(教条)，而沒有自由討論發表意見的余地，教条主义者束縛了人的思想和进步，学校为什么不將資產階級，机会主义者的書都摆出来呢？社会科学必修，上課听講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魯 穆)

“匈牙利事件后，我認为馬克思主义可以修改，要不怎会产生匈牙利事件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社会主义国家出現斯大林主义，首先由于馬列主义，尤其是在解决問題中有教条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馬列主义本身就包括了教条主义(出了問題就拿立場来扣，真可怕，我認为不应该用立場来扣)。”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職員)

“教条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对馬列主义及党的政策不容怀疑的結果。”

(北京矿业学院 李都华)

“自从二十大以来，社会主义陣营展开了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是空前規模的群众性的运动，这次运动的两种力量——教条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者滲入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切国度，一切民族，一切社会集团，一切政党和一切部門，在前一种力量中有两个組成部分：第一，反党反人民部分，例如格罗；第二，忠于党和人民的教条主义者們例如斯大林。在后一种力量中也有两个組成部分，主要的是馬克思主义的忠实捍衛者例如哥穆尔卡，但也有打入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力

量,例如,納吉,……

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以波蘭的胜利为一高潮,匈牙利事件后,这次运动轉化为自身的反面,这一轉化以不堪忍受的思唯空虛为其特征的‘再論’之發表为标志。”

(北京大学 譚天荣)

“教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裝出一付‘正經馬列主义’的嘴臉,以‘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把馬列主义当作中世紀的宗教一样看待,把馬、恩、列、斯神秘起来,把他們的学說看成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万古不变的‘經典’。把他們的著作看成‘大百科全書’,不管是搞哲学、法学、政治学,文学艺术,还是搞原子科学、半导体学,电子学、甚至日常生活瑣事,也要用显微鏡挖空心思地到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中去找理論根据。在教条主义者看来,除引用經典著作以外,再就沒有任何东西可作为他們的理論根据了,他們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說服人。这样的人可以說他們沒有思惟,是憑‘条件反射’来对待事物的。如果馬恩列斯死后有知的話,那么他們也不会滿意这些不肖之徒,對他們的迷信。

教条主义的特点之二,就是宁左勿右,以‘捍衛’馬列主义为己任,听到和他們掌握的馬列主义經典不同的理論,就以衛道者的姿態出現,对那些胆敢和正統馬列主义者有不同意見的人,加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罪名。說那些人‘大逆不道’,‘罪該万死’。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封建社会末期的保皇党没有什么区别。在討論問題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积极’和‘党性’,就故意說些左的,但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形成教条主义的原因,如果出于头腦簡單、低能和無智,还直得可憐,應該原諒;如果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作政治投資,故意裝作左的面孔,那不仅不值得可鄰,不应原諒,而且还应受到討伐了。”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我国应象南斯拉夫走第三条路綫,接受美国的援助,西德、日本

沒有共产党的领导，反而能迅速地超过战前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爆破社会制度未尝不通，社会主义上層建筑的改变不等于就没有适合公有制的上層建筑，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也有一套上層建筑，理論上未为不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組織机构龐大到底怎样不了解，南斯拉夫一套搬到中国来值得考虑，从理論上也可以这样講。”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 江紹鈞）

“鉄托反对社会主义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官僚制度，‘三害’‘个人崇拜’有人說是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的产物，可是資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就没有产生斯大林那样的人呢？这說明我們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毛病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立民）

“社会主义改造冒进了，資本家被改造不敲鑼打鼓是真心嗎？第二国际是否是机会主义？这是值得考虑的問題，發展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区别何在？我看不出兩者的区别。

对馬克思主义必須再来一次全盤审查，对其基本原理要做新的探討。

以南斯拉夫为开端，以波蘭为繼續的这股潮流必將會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新的力量，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中揭开了新的一頁。”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凌国星）

“从馬克思以后到今天国际上已經出了不少社会主义流派，过去我們总是把人家当作是完全錯誤的，我很怀疑这一点，这些社会主义流派都是不探索社会主义規律的，并且很多是針對着苏联斯大林那

一套而提出来的，我認為这里面一定有不少合理正确的东西，反对我們現在的疼处，要發展社会主义的經濟理論必需認真研究这些流派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流派，我想建議經濟學說史教研室他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經濟学研究室助教 陶文达）

“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很好，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南斯拉夫所走的道路我很同意，他采取的是英美的生活方式”，人家問他英美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說：“不开檢討会，不搞思想改造，一切都交給人民，讓个性自由發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朱惟民的材料）

“社会主义陣营不是象宣傳的那樣好，那樣团結，用到南斯拉夫时把鉄托举上了天，匈牙利事件后又鬧翻了，鉄托一會兒是最好的，一會兒是最坏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邓芳松）

“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委员会值得研究，工人的政治权利就比較大，每个工厂的主动权也大，盈亏由自己負責，自己搞对外貿易。現在时代不同了，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各式各样，过去总強調苏联的道路是最正确的，其实南斯拉夫也有可取之处。”

（北京政法学院 罗典荣）

“社会發展的方式是多样的，南斯拉夫在公有基础上搞自由竞争，有它的道理。印尼搞三种主义的結合（馬列主义、三民主义、回教的真理）也有它的道理。此外，还有沒有別的学說和道理呢？”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

“‘批判斯大林文集’一、二集，‘鉄托普拉發言及其反应’、‘关于

目前波蘭形勢’等四本書值得一看。過去我總以為千篇一律的東西。其實可以看出些東西來的。許多‘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顯得那樣空虛、蒼白無力。而反面的‘修正主義’在邏輯上顯得多么堅強有力啊！

我決心讀英文，爭取幾年內能讀英文報刊，如美共、英共的報刊等。使自己思想開闊一些，冲破目前的新聞封鎖，愚民政策（我們一生一世也無希望從什麼內部讀物參考消息等等去得消息的）。”

（北京大學 李修宇）

“……再看世界的社會民主黨，今天有許多人跟他們走，我們往往說工人是受欺騙的，難道從考茨基到現在都是受騙的嗎？原因是在於社會民主黨提出的一些口號，容易為工人階級所接受。總之，需要把這些問題解決，否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不能前進，就不能發展，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就不能最終的鞏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生 張祖文）

（3）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唯物主義哲學家是賣狗皮膏藥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則是有才學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 潘世元）

“實力哲學”

一、來源和概念

1. 來源：他認為“美國的實力政策除去侵略的內容就合乎哲學，是完全正確的”。

2. 概念：實力是什麼呢？他認為實力是抽象的，“我無法告訴你”，但又是具體的，“如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如何，植物生長的品種特點如何，其他表現為能力、條件好壞”，他認為實力是相對的，是變化的。

“實力哲學”就是：“對人來說是按它進行活動，一點也不能脫離，

它是本質的东西，生活本身是极复杂的，絕不像生活表面那么簡單，但人要按这行动。”

他認為实力是指导一切活动的，“任何社会和自然斗争都是它的反映”。同时实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剥削、压迫和竞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平等、和平和进步。

因此，他判断人的好坏是以人们对实力的态度为标准。他把人分为三种：1.不追求“实力”的不大求“上进”，这种人很少；2.他認為应该努力的时候不追求实力，这种人較多；3.最了不起在这种人面前即或工作簡單双手很弱也認真去做”。

二、他对“实力”所抱的态度

1.“实力哲学是我的世界观。我深深地相信它，不了解它什么也不会搞好，深刻地了解它很必要，会使人变得聪明”，“小者可以变大，应敏感于实力，争取更大的实力。不这样哲学的新陈代谢会使你不可收拾”。

2.“不一定一分鐘都增長实力，但一秒鐘也不忘記实力”，“要正确分析估計实力，以及保有、巩固和扩大实力”，他認為这种方法就是科学。

三、他运用“实力哲学”观察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

1.“用它（指“实力哲学”）可以理解任何正确与反动的各方面的理論实質而相当容易”。他認為無論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無不在追求实力，实力大了別人就不能奈何他了，“印度的力量大了，不听英联邦的話了；美国講实力政策，苏联以和平竞争消灭帝国主义”。

2.他認為自然界各种生物也都只有有了实力才能生存發展。“一根野草長大了，它具有多汁的种子，人民保存了它，成为麦子，他發展了”，“在寒冷的冬天，花謝了，可菊花开了就它行。耐寒的苹果也在生長”，“这古的野獸死光了，人类長大了，并且一代比一代聪明，揭开了社会及自然的許多秘密”。

四、在他“实力哲学”支配下的言行

他認為實力是自然和社會一切事物的本質，是歷史發展的动力；世界一切事物發展無非是實力的變化；判斷正確與反動的標準是實力的大小。他也根據人們追求實力的程度把人分為三等。他認為人們不是根據真理、根據廣大人民利益而且根據本身實力的大小認識和處理問題的，“某些人作事胆小或者在熟人面前胆大，上級面前胆小，這是因為實力空虛。”很多人早晨選舉人民代表，晚上便忘了名字，對公民權很不關心，因為這對他實力關係不大。

他認為實力大的便是正確的，就能存在發展；實力小的就要被“新陳代謝不可收拾”。因此他要“一秒鐘也不忘記實力”，要增強實力。他說：“要好鬥，不要懶，否則還要氣壞……作什麼都要站在對立的地位想一想。”“對！生活首先要鬥爭，鬥爭要講方式！言論上對人和平冷靜，行動上對人關懷。”原文用大驚嘆號和大句號——原編者注）他是要爭取什麼樣的人呢？要達到什麼目的呢？他說，“如果你的心裡想着你代表某一集體，如某些同學或某些組織，作事時是不會胆小的”。“人生的目的和手段各個人都不相同，最好能作到絕大多數人都滿意，你能得到最高的榮譽和享受”，“為此要作最大的努力，在這一生的過程中，要受侮辱、困難、曲折，要忍耐、克服、鬥爭，一直到死。……我決定要盡少的受人侮辱”。他所謂的“侮辱”，就是平日人家對他的幫助；他的邏輯是：人家幫助你是因為你實力小，做得差，也就是看你不起，侮辱你，如一個婦女抱着孩子站在車上，人家所以讓座給她，是認為她體力弱、實力小，站着吃不消實際上就是侮辱。

總之，他認為實力至上，實力決定一切。對於這個“實力哲學”，他說：“馬克思、恩格斯都沒講過，是我第一個發現的。”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胡仁生的材料）

“昨天并系的會議上，我揭露了系的矛盾，大大的痛罵了他們的無知，教學計劃等等。狠狠的反击了徐琳教授，我覺得攻擊人身是不道德的，但我攻擊的是唯物主義！”

“……我不滿意於現實，不能相信那些粗俗唯物主義；不能滿足

那个公式化的现实主义；自由的敌人是誰？当权的（党）一切党。公式化的締造者是誰？现实主义的开明人。科学阻碍者是誰？馬克思主义！”

“辯証法本身就是荒謬，真理我要探求打倒歪曲的人。馬克思主义是粗糙的，可以动摇的，可以推翻的，要推翻剩余价值規律。列宁歪曲了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題。今天的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太粗浅了，物質观等等都不过是一种純粹的信仰，这些問題，唯物主义可以这样論証，唯心主义可以那样論証。”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好的唯心主义比坏的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理些。”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

“辯証法对于某些人來說就是混淆是非的工具，就是阴阳 八卦……”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伍伯涵）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光杆哲学’，‘沒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哲学’，它的应用范围有限，一碰到具体問題就不管用了。这样的馬列主义能领导中国嗎？”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 駿）

“哲学我一看就头疼，我要否定哲学，哲学不能解决实际問題，都是空洞的教条！哲学課尽是教条。”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我是从物理学本体發現辯証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学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統治下已經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錢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

和常識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着，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

（北京大學 譚天榮）

“我認為觀察自然和社會現象應從兩個基本的假設出發：

（1）人的一切認識都是通過他的感覺獲得的；

（2）在個人感覺之外有一個現象存在，人的認識即對這個現象世界的認識，人對這種現象世界的感覺和認識有一定的規律。

在感覺以外是沒有科學障地的，要想脫離感覺經驗的可能做出一套結論就不是科學的方法，而是純粹的信仰，……自從人分劃為不同階級以後，各階級總希望利用一切可能為自己服務的工具，這樣信仰宗教就找到了廣闊的市場，由信仰產生的宗教的典型是很多的，但典型的代表有三種：

（一）相信上帝的宗教；

（二）信仰絕對精神的宗教；

（三）相信物質的宗教。

它們反映了不同階級的利益。

……我們來看看相信物質的宗教究竟是怎樣回事。首先應當肯定這種宗教對科學毫無用處，基本假設（2）肯定人對現象世界的感覺有一定規律這一點已被實踐所証實（但實踐並不能在感覺以外証明出什麼東西來），這樣一種觀點就成為一切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科學家就是研究揭露這種規律性，至於世界是上帝創造的還是絕對精神的產物，人的感覺是否是物體表面現象的反映，物質是否先於感覺存在，這是信仰的領域，不僅如此，過分迷信唯物論只會對科學帶來損失，如勒伯辛斯卡婭的反動理論。

唯物主義在理論上碰到困難時，唯物主義者就說這種困難並不存在，它只是自然本身的個性，如微粒與波動性問題，測不准關係的

問題，这种言論与宗教認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不謀而合的，它堵塞了科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自然科学家不信仰唯物主义这是毫不足奇的，但却引起了某些唯物主义者的憤怒……如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按本質講，这相当于对自然本身的批判，我想他們还会批判太阳从东方升起……

……唯物主义虽然在自然科学中沒有地位，但他是無产階級手中一把鋒利的刀，在向資本主义斗争中起过作用并且还在起作用。按本質講，它和無产階級的国家軍隊是一样的。……但公理与强权究竟是兩回事。……它（指唯物主义。——編者）究竟是一把劊子手的刀，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拋开的，应当讓人民明确这一点。誰有意識欺騙人民……人民就会有一天起来教訓他。”

（北京大学 严仲强）

“資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实行計劃經濟”。同时他怀疑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理論的现实性，曾公开提出“經濟危机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能够产生？实在想不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陈复之的材料）

“馬克思資本論有問題資本主义沒有什么絕對貧困化，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等的工人生活还是很好的。我只相信事实不相信那些官方統計数字和政治經濟学理論，馬列主义只有在課堂討論和考試用的。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种提法就是教条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政治經濟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还不能成为科学，只不过是苏联的經驗总结。”

（北京政法学院 王 革）

“中国經濟建設，（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这門課根本不是科

学，沒有登上大学講台的資格。”

（北京政法學院 羅典榮）

（4）否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 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

“印度和印尼不經過武裝鬥爭即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至於奪取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必要。”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張復之）

“中立國家變得相當厲害，如印度提出搞社會主義，我們不相信，但它卻不是在開玩笑，他們仍在努力的搞，並取得一定成績。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緬甸、埃及土改搞過了，印度也在搞土改。”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陳丘民）

“我國以武裝革命取得了勝利，代價是極大的，這不一定正確，印度的革命不流血，也走向社會主義，這可能是以最少的代價換取最美好的生活。”

（北京鋼鐵學院 章萼舫）

（5）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資本主義甚至以前的社會里，許多人並不知道馬列主義，但是他們也作了許多有益人民的事情。為什麼現在硬說，人家作對了，是合乎馬列主義的，是黨的領導；人家作錯了，則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在作祟呢？對了，是黨的功勞，馬列主義的功勞；錯了，都是資產階級及其他思想的指使。這太不公平了。所以，錯了也應該歸於黨，歸於馬列主義。

我沒有學馬列主義，不願在自己頭上加上馬列主義，加上工人階級領導的圈子。”

（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地理教員 梁真璞）

“学馬列主义要大胆怀疑，怀疑是掌握真理的方法，这是一种品德。”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煒）

“馬列主义應該当作学术界里的一个学派来研究，不应把它当作一切人，一切事的指导思想。除馬列主义之外，还应该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不然学术界就太貧乏太單調了。資产阶级有許多学派，可是無产阶级只有馬列主义一派，別無分号，如果有，就說他是修正主义。……

产生教条主义是因为強調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的结果。……馬列主义是产生教条主义的根源，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說在中国已經过时。”

（北京政法学院 赵日月）

“1.苏联的自然科学，因为与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直接，發展的很快。而社会科学則只是給馬、恩、列、斯的著作作注解，所以就沒有什么發展。

2.过去人們都以作馬克思主义教員而驕傲，現在恰恰相反，認為作馬克思主义教員沒有前途，紛紛要求轉业。因为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生都讀不完，而这些人又沒有实际資料，只能背背教条。在我們的宣傳工作里，只談优点，不提缺点，馬克思主义教員就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面的真实的情况，也就不可能提出現阶段社会發展的規律。而馬克思主义就变成死的条文。

3.有人說：教条主义的严重是由于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緣故，我同意这种看法，馬克思主义一旦規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人們就得按照这种思想来思想，就是写文章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必須引用一些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才会被登出来。这是对人們思想的限制，我認為馬克思主义只有唯物辯証法是万岁的，其他一切結論可以改变。……應該讓人們自覺的信仰馬克思主义，政治課应

改为选修不应带有强制性。”

（北京大学 左言东（原是党员））

“有人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思想没有自由。这次提出百花齐放是思想第二次解放。四九年解放是全国第一次思想解放，但解放后又受到了新的束缚，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必须接受领导，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如许多人的思想受到了束缚，以致在新方针提出前，没有人敢看唯心主义书籍，谁要看古典文学、外国的东西，那就认为是思想落后，以致使老先生也抱着资本论和中国革命的小册子。直到现在才思想解放。”

（西安师范学院 梁益堂）

“以马列主义教育人民就是愚民政策。马列主义没有严格定义，不科学，对的都是马列主义，错的都不是，这是新偶像崇拜”。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我用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我骨子里反对理论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特别反对进行思想教育，我觉得这会削弱科学性……”

（政法学院教员 康德琯）

“不相信马列主义的改造作用。只有思想简单的人才相信那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马 馨）

（6）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攻击党中央和党的领袖

“共产党迷信马列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 范政涛）

“遵义会议后树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但是教条主义并未反掉，1949年以来更特别严重了。过去反教条主义的人，成了新的教

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在未下台以前，永远也不会承認自己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的来源就在党中央在理論和决策部門，它披着正統思想的外衣出現，因此非常頑强，可說是合法的馬克思主义，反教条主义應該从中央开始仍然貫徹到每一个小教条身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1936年以来学术界是在“演木偶戏” 斯大林說什么就是什么，整个学术界思想都僵化了，缺乏独立思考精神，苏联几十年来，中国七、八年来社会科学上沒有搞出什么东西，思想僵化，不能自由發展造成学术上的大危机。

以教条主义为名大肆污蔑馬列主义教育，認為我們的教育都是把人培养成方方圓圓的，类似留声机的东西，他們只会唱四种調子：“馬恩調”，“列宁調”，“斯大林調”和“毛澤东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學生 章广延的材料）

“对理論性东西不敢發表評論，田家英就是教条主义，毛主席报告說人民內部矛盾是突出的，但他就不敢說人民內部矛盾是主要的，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

不以事論事，而是領導說什么就是什么？不应以这衡量言論是否正确。

有一个时期資产階級与工人階級矛盾对抗性問題爭論很多，薄一波說不对抗了，很多人就同意了，可是沒有根据。

波匈事件出兵我們根据什么說不对，党中央說第一次不对，第二次是对的，有些人也这样說，但并不知道論据。”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學生 張康毅）

（7）关于“独立思考”

“思想压力的存在，这一点比較明显，流行一股教条主义症，較严

重的对我国科学、文化、个性以严重的影响。因为思想存在压力使人不敢独立思考，一独立思考就被說成离开了馬列主义，当馬、恩、列、斯、毛写文章时，就沒有說以后別人不能再發展。有些人把真理不作為行动指南，而是当作教条。把相对条件下正确的东西，扩大起来，使人思想不敢深入思考，不敢大胆思考。生活中流行的压制很严重的，对有見解的人，給以压制，一根硬棍，使人們的思想就在那个圈子里，沒有在思想上探索新的問題。这种情况，比較大的。有些人說，我們这些人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这使人感到有問題存在。因为社会向前發展，各方面都应是繁荣景象，为什么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要前提正确，就应讓他去探討。教条主义压制了許多人的才能。在社会科学里，科学价值書較少，思想压力和教条主义症候是严重的社会不会滿足几个条文，历史絕不会停留，会出现繁荣。历史为給我們提出了丰富的資料，供我們思考，而历史又在前进。教条主义是会被制止的，但我們应压抑这种症候。王蒙写的小說，流沙河写的“草木篇”，批評可以批評，但批評中就有这种症候。一批評就要查別人历史，別人說了一句話也要查人家历史。对于敌人，我們應該如此。对于人民我們不应当用背出馬列主义来吓唬別人。写爱情小說，为什么就必须写劳动生产，身上挂金章等。又如关于自然辯証法的研究，恩格斯說，社会的發展，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邏輯和辯証法。結果很多人对于自然辯証法的探索就很少。思想压力的存在，使人的独立思考受到束縛。一个人的思考，需要社会的培养，不光是个人的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經濟系学生 刘表兴）

“現在党员在党内不能發表自己的見解，党内不民主，党员服从党的決議是‘唯唯諾諾’。为什么在这次运动中，能提出自己独特見解的都是群众而不是党团员呢？就是因为林希翎、哭声他們符于独立思考精神，党团员就是缺乏这种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我們对上边(即指党中央)是偶像崇拜,只能讓人領会意圖和精神,沒有独立思考。党成为一个自由爭辯的俱樂部。”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

“認為以后对什么都要独立思考,对党的組織也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若葵)

“好說好动,能独立思考,有能力的就要遭整。”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8) 其他

“再論是唯心主义

再論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說明到現在为止,我們党沒有真正自覺地掌握唯物辯証法。

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質來說,……只能从决定着人們意識中两种世界觀——辯証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觀——的矛盾运动的階級斗争历史条件中寻找。”

“到現在为止,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离我們無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們国家沒有檢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編輯們对馬克思主义的絕對無知,对辯証法的一竅不通和他們形而上学的腦袋中裝着的無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万里長城,比方說吧;

1895年以后,馬克思主义按照鉄的必然性轉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絕對統治,而“再論”都把它归結为‘人們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

这一切已經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議

(1)讓我們北大学生自己創辦一个綜合性学术刊物。

(2)建立一个学生講座，讓我們向世界証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百痴)或叫优秀生，或叫‘小螺絲釘’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們坚忍果斷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們將使国际資产階級吃飯时丟落刀子。”

(北京大学 譚天榮)

“买办性是把帝国主义的一切販賣到中国，若把帝国主义抽象掉，如果外国的东西不管好坏都搬到中国来，把教条主义叫成买办性也未尝不可，只不过难听一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顧佩弦)

首先他反对学习苏联，他說“学习苏联有买办性，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教条主义是买办的。”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 王福沛的材料)

“大部分知識分子易犯教条主义，这应从历史上找根源，因为他們受旧时代文人思想影响很大，在封建社会孔子的学說就是教条的，孔孟不講，別人不能講。鴉片战争前，否定外国，以后有人留洋回国，原搬西欧教条，这一些对我們有影响的文艺理論，自然科学都表现出过去搬洋教条的影响，林希翎提出思想界綫中有买办性要从历史上搬教条去認識，(其意思即同意我們学习苏联，也是买办性)。”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經濟系学生 孙 全)

4. 攻击社会主义文学

“反映古文学艺术中的公式，也是：党的領導！”

現在，文学和人民基本上是脫离的，人民中农民占絕大多數，而

現在出版的文艺作品，有哪几部是被农民所接受的？电影也是如此，只滿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这實質上就是一种資產階級思想。

現在，到民間去的人就只是搜集一些历史留下的破爛貨。

現在的文学是悲觀的，它已經成为空中樓閣了，在农民中，过去那种敢于坚持正义的人消沉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岳文伯）

“少数人壟斷文壇，中国新文学沒有什么，苏联文壇也沒有什么，根本就不要去理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學生 李 德）

“反映在文艺上：大学生很多，但沒有写大学生的，写鞠德源，和宝荣也行啊！（都是黨員）。但要是有一定的小資產階級味道，出版社也不要。除了工农兵不要。写工农兵也一定要写党的領導，党支書人物是唯一能解决矛盾的，写工农必須談生产計劃……，文艺作品貧乏，沒有大部头的东西，沒有人敢写小資產階級的，对資產階級更不敢写，弄不好来个批判。

‘百家爭鳴’与‘延安文艺座談会講話’有沒有矛盾不知道。希望將來有人写小資產階級。如張恨水等現在不敢写作，因为文艺界沒有自由，如再不‘百花齐放’，会把文艺勒死。苏联教条主义很严重，但技术高一些，我們又不成熟，又沒技术，还教条主义。

……出版界反‘三害’，也不能解决新聞自由問題，这是整个中央的事，如写資本主义的优越性，杀了編輯也不敢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學生 楊維新）

“文艺界为例：李希凡、藍翎曾从被統治下層抓到上層文壇后，照例变了样，用了統治階級者的口气批評別人。文艺界的最大問題是愚文人、宮廷文人掌握实权，中央开一点縫，就鑽。眼向上看，不向下看。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作家要反映人民的要求。王蒙还是反映矛盾，但还

有缺点。象周揚同志是文艺官，文艺巨头，掌握权力，成天赴宴会、接待外宾，文艺界在这些人手中控制很严。领导說什么是什么，最高的领导很难从他們那里了解眞实的情况。这些作家不反映眞实的生活，却反映奇怪的东西，反映上面的情况。这样的作品怎么能为人民喜欢呢？

主席对王蒙的問題只是一个簡單的支持，并没有大呼，但下面又改为說王蒙对了。但我认为王蒙作品的缺点没有鮮明的正面形象，表現了一个小資产阶级百事吹牛的形象。

文汇报發表一次評王蒙的文章，林默函对王蒙的批判結論，实际上也就是毛主席的几句话，不过扩大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林对教条主义的反抗，从她的态度來說可能有些缺陷，但她是教条主义束縛下冒出来的一朵帶刺的花，应该欢迎这朵花，扶植它長得更好，我們应先看到其“花”，不要先打其“刺”，这朵花長出来可能有些不美丽，但問題在于培育。”

（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講師 盧晷持）

“好的毒草比坏的香花更艺术些。”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燁）

我国的文学艺术及电影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充滿了政治，没有一点人情味。这不能怪作家，这是由于我們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充滿了政治，是由于生活中好些人遍身是政治，滿口是政治；是由于生活本身就是貧瘠的，不健康的；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此才有这样的作用。

（云南大学 唐守碧）

我不贊成汉字拉丁化，几批簡字也不成邏輯，不成系統，很多人也感如此，但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利用职权打击提意見的人，对提意

見的人进行圍剿。

(湖北医学院 朱裕璧)

(二)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 反对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

“农工民主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个搞头。”

(湖北医学院 任 渠)

“盟内交叉党、团员影响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妨碍了盟的组织生活,致使盟组织涣散。”

“民主党派在学校中毫无地位,党对民主党派上只是使用观点,民主党派自己也不明确。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提出后才明确民主党派在学校内应有独立性,主要应对党起監督作用。”

(湖北医学院 孔 麒)

“自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之后,我极端錯誤地以资产階級民主的观点来体会它,把民盟看作是在野党,以为从此对于国家大事可以更多更广地过問了。1956年10月9日,章伯鈞在盟中常委第五次會議上,指出盟的工作,过去重点在思想改造,以后党派要在政策方面有所貢獻。在章伯鈞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黄藥眠与我二人在学习,在学习委员会的工作中,便放棄了思想改造这一重要方面,但在如何向党提意見这一方面,却把它过分的重視起来。我們都主張在盟中央設立各种委员会,表面上是研究国家方針政策,作为向党提意見的基础。而其实質則是要与党分庭抗礼。经过我們的宣傳鼓动,以及章罗联盟的支持,盟中央終於在1957年5月28日通过建立政法、財經、高教及文教四个研究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虽然都还没有开始工作,但在此以前,即在5月13日,章罗二人,沒有征得其他副主

席及中央常務委員的同意，擅自在盟中央成立了“科學規劃”、“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有職有權”，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四個專題研究的臨時工作組，這四個工作組，其性質與我們所提倡的研究委員會是名異實同的。前兩個工作組活動的結果是：科學規劃小組，制定了而且在報紙上發表了反動的科學綱領。高等學校黨委制工作組召開了一次會，但也制定了反動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草案初稿”。

“我們都希望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政策之下，提高民盟的威望，取得更多的發言權。”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教授 吳景超）

“過去，我們一舉一動都是有顧慮的。老實說，甚至我下鄉調查買一個蘋果也是有顧慮的。我們民盟應該自由，有沒有看黨的眼色辦事，我想是有的。我現在可以說，已經沒有顧慮，因為我今年60多歲了。按照中國平均的年齡是30多歲，現在我已多活了30多歲，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教授 李景漢）

“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相比，不是沒有問題，是問題更大，民盟百分之七十沒起監督作用，對學校也沒有監督，去年評級時黨員連升四級；在舊社會頂多也只能連升三級！過去是軍閥、官僚、政客統治，現在軍閥沒有了，官僚主義就是官僚，政客對民盟來說還合適，這與三十年前一樣。選舉市代表時，有的群眾說：‘選什麼？就是分贓罷了！’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政府缺乏一個反對派，過去歌功頌德，使黨自信心強，抬上去了，離開了五億農民。說農民不先進，農民思想哪一點不先進？過去一點不許找岔，現在整風光是找岔，各民主黨派只跟着共產黨後面走，不敢提意見是不對的，有些民主黨派自己找黨監督，認為黨是馬克思

主义。有些党员不许别人监督，就是三反、五反、镇反时政府中有几个反对派？”

（中国人民大学 楊維新）

“如果民主党派都能参加‘政治设计院’，再加上互相监督，那民盟就显得更重要一些。

以后就要转变啦！武的要歇一歇，文的要起来，民盟要起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授 陈文儒）

“各民主党派也是代表了一定数量的人的利益，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各民主党派就当与共产党共同来设计国家大事，只要各民主党派愿意尽管共产党可以不采纳他们的方案，但他们是可以提出方案来讨论的，他们提的方案不对的话，可以否定它，不采纳罢了。”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资料员 刘运梓）

“中国多党制与资本主义多党制有区别，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又是领导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可比为掌柜与伙计（甚至于有些象食客）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现在党是不相信人民的，重要工作不让群众去做，无论什么单位都要党员做头。例如首（原文不清拟系首字——编者注）长总是一个参加游击斗争大老粗，他们什么都不懂，怎能领导？这样能贯彻党的路线吗？他们都是外行，应学会了再领导。如对文艺界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是因为党员做头，不懂业务，又强加压制，不懂装懂的缘故。”

（北京钢铁学院 彭卓宗）

“党应该退出领导地位、和民主党派平起平坐。党委会应该退出

教学领导岗位。”

(北京政法学院 張景明)

“錢端升很早就想在政法学院建立一个和党对立的大民主党派，他認為应当讓政法学院的九三学社的社員、民进的會員参加民盟，成立交叉黨員，組成一个大党，大家在一起过組織生活，一起工作。”

(北京政法学院 樓邦彥)

“民主党派的組織是共产党搞的形式，民主党派只起眉毛，花瓶作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應該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應該是‘夫妻关系’，應該‘平起平坐’。民主党派應該大大發展，才能与共产党‘長期共存’”。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助教)

“要求有一个独立的不受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作为在野党，有更大的权，监督共产党，不管这个党的性質怎样，只要能揭露这个党的缺点，誰好誰坏，讓人民自己来选择”。他認為我国現有的民主党派，不能充当这个角色，因为：“(1)它們沒有一套独立的政綱；(2)它們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3)它們的领导人物太差勁。民主党派不过是摆样子，是共产党的傀儡。”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講師的材料)

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重視与帮助不够，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的今天，只有民主党派这些事务問題不能解决，这不是不重視民主党派是什么呢？在机关学校里，民主党派依旧还是处在陪襯摆样子的地位，不讓它尽到真正的助手作用，只要求他們对政策、措施起帶头、推动和保証作用，而不讓参加方針政策的制定筹划工作。只是在买公債、搞学习、参加庆祝游行时想到他們，而在商討大政方針、人事調配、評薪定級、分配福利……时就沒有他們的份了。須要知道，民主党

派助手作用發揮的如何，除民主黨派本身主觀努力外，主要還是在主手——領導黨把它按在什麼地位上，不得其位，就不能發揮作用。許多機關部門的黨領導不認識，也可能有意這樣。

（山東師範學院 黃紹鳴）

“共產黨對待民主黨派太不平等了，沒有分給民主黨派一部分軍隊和政權，所以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值得考慮的。”

（北京礦業學院 馮國大）

“在我們學院，只看到楊書記、陳信同志（團委書記。——編者）作報告，硬沒有看到民主黨派負責人作報告，民主黨派為何沒有綱領呢？在新華書店只看賣黨章團章，而沒有看到賣民主黨派的綱領。”

（中南礦冶學院 柳進稀）

“民主黨派是尾巴，拿來裝門面的，這樣不會說是‘一黨專政’。”

（中山大學 譚定國）

“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就像一夫多妻制。”

（中南礦冶學院 馬業英）

2. 誣蔑黨的統戰政策

楊對統戰政策極為不滿，說是“統新不統舊”。“過去的反革命、特務現在都高高在上，象我這樣的人反到沒有地位。現在很多人都當上官了，這是罵黨罵出來的，是黨拿着職位送禮。”還舉例說，“萬枚子、周一志做了國務院參事，是因為黨受了萬、周的威脅。”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員 楊繼如的材料）

“統一戰綫中民主黨派是點綴品，起不到什麼作用，所以民主人

士有意見。”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孔 劍)

“統一戰綫這條綫在人民大學的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有時是斷綫。表現在一年半前盟主動一些就有事可做，不找黨就無事可做，這條綫對上層統的多，下層統的少，甚至被統的人中有的接近捧，使他脫離群眾，這也是上實下虛。總之，黨與盟的這條綫是若有若無。”

“我是民盟成員。有人說民主黨派在運動中起打手的作用，起火上加油的作用，也有人說民主黨派是官僚顧客。這些話對我們起碼應值得警惕。我自己也感到是有打手作用。例如，肅反時鬥爭××（盟員），黨組織即指示盟組織應多批判，於是該同志情緒更加低落，這不是火上加油嗎？又如工作量問題，明知教員不滿，但作為盟組織就只好贊！贊！贊！據說高教部還贊揚人民大學盟這樣‘贊’的辦法。這是否也是火上加油！因此使人感到民主黨派不是助手，而是打手。”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講師 侯大乾)

“政治家對國家和政權負責，有他明晰的判斷力和正確的政策，……詩人永遠記得傅作義在東交民巷屠殺學生時的鮮血，但政治家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請他當部長而去鎮壓罪過小得多的偽保甲長。”

(清華大學 S.C.)

“民主人士有職無權，共產黨只給他們飯吃和錢用，不給他們權力，目的就是免得他們鬧事。政協是拉攏民主人士的小繩子，民主人士只是呼‘萬歲’口號，拍拍巴掌，軟禁。民主是手段不好，是雞籠啼鳴，出不了這個圈子。”

(北京航空學院6309班一個學生)

“民主人士的职权被剥夺得絕無仅有……教授送进了‘牢籠’（研

究組)，北大的人員被壓服，青年知識分子老挨整，蘇聯的經驗進不了門。宗派主義者（指黨）‘接管’（指領導）了學校之後，教授就被打入另一種形式的‘牢籠’研究室，他們只有挨整的權利，卻沒有研究學術的自由……從上到下，從領導者到學生，都視之為廢物，視之為眼中釘。”

（北京政法學院 楊鶴皋）

“對民主人士極不尊重，民主人士在重大的問題上有職無權，僅限於貫徹黨委決定，思想不通也硬要貫徹，而且採取的方法使人難受。”

（北京政法學院 周 仁）

“改變民主黨派頭重腳輕根底淺的現象。這樣下去，黨很容易一脚把他們踢開。民主黨派所以這樣，是因為黨中央不讓他發展。”

“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矛盾（不管講得多好聽，不要聽那套）。共產黨又不是什麼神仙，一定要犯錯誤。農民沒有黨，共產黨是否能代表農民大值得懷疑。我國應當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現在各級的头头全是黨員。人大常委會是公式化的機關。”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

“為什麼這樣講呢？我對統一戰綫就是有意見，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沒有什麼必要嘛。民主黨派在我們國家生活中是點綴品，起裝飾作用，他們根本就沒有社會基礎。黨對民主黨派政策上就是有問題，我對民主黨派宗旨等不了解，但是，是不是需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老百姓也不知道民主黨派，民主黨派只有幾個头头。我看統一戰綫可以合併到政協，不要找麻煩嘛。我懷疑，‘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党不过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伙人的利益的维护工具、無論那些人，对他們（指党）有利，他們就利用那些人，如張治中、傅作义、唐生智等国民党人搖身一变都做了大干部，旧的知識份子只要有‘才能’都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章伯鈞的行为党知道不知道，现在还給他很高的地位（再如衛立煌），这样的政策人民是不知道的，人民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的，我認为應該杀的就杀，不要拿敌人当太上皇。”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李維左）

对統一战綫政策不滿，認为統战政策右傾。“党对这些‘可爱的资本家太优待了’革命到是为他們革的了。”主張立即取消定息，反对党的贖买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的材料）

“三害产生的根源还因为从策略方面考慮过多，以統战为例，統而不战，为統战而統战，在許多崗位上安排了許多民主人士，但实际無权，不管事。

互相監督只是共产党監督別人，沒有民主党派監督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很形式，它并不代表人民。民主党派是傀儡，只举手通过。所以在民主党派中可合成一个大党来进行監督。”

（北京鋼鐵学院 章萼舫）

“天下是我們的，民主人士，起义人員，‘留客’‘养士’。只要有你們的飯吃就應該是‘謝主龙恩’了。古人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君如父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

（山東大學 楊學孝）

“政協、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共產黨請客的，民主黨派是共產黨修了几千几万大大小小的廟收容的一些菩薩。”

（中山大學 楊克毅）

“共產黨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從前民主人士幫共產黨打天下，現在共產黨把人家一脚踢開。”

（中山大學 江建文）

“現在允許民主黨派存在，這是為了利用它們，不要在用詞方面說得漂亮，用發揮二個詞來代表利用二个字，我們要發揮他們的作用是民主人士個人的作用，而不是民主黨派組織的作用。

她把章伯鈞提出的國務院拿出的都是成品比做炊事員炒菜，她說：炊事員有職燒菜，燒熟以後請先生們（民主人士）來尝尝合胃口不，反正已燒熟，現在我國是無產階級一黨專政，我們用民主黨派是象用老牛拉水車蒙上眼睛讓他們干，不然他們就走資本主義道路。”

（北京俄語學院 宋玉波）

“現在共產黨利用他們（指民主黨派。——編者），到不用他們的時候，還不是象鷄那樣把他們一個個的杀掉。”

（中山大學 曾紀經）

3.“民主黨派的存亡是由共產黨決定的”

“黨的方針都是根據實際需要提出的，根據我的體會，民主黨派確實有很大的作用：第一是反映情況。群眾有些話不敢向黨員談，不

願在工会、行政会上談，都願在自己的組織里談，同时，我們向党反映情况是代表組織，由組織負責，也就沒有顧慮。第二是对党开展批評。第三是为党貫徹政策。但是这方針是否能真正不变呢？我听到两种反映：一种認為民主党派的存在既然不决定于他們自己，而是决定于党，今天党需要民主党派，就說長期共存，以后如果一旦不需要时，也可以收回這句話。另一种反映是認為即使民主党派真能被党允許長期存在，但是年輕人都不願参加，特別是民革，現在的成員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了，老的死了，后继無人，豈不自然消灭了嗎？因此，要真正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还得要求党对于民主党派發展組織，給以大力的支持。”

（武汉大学 曹紹瀛）

4. 攻击“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民主党派参加政府，參予政权是形式，只是喝喝采，举举手而已，有职無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資料員 張紹鴻）

“大力發展民主党派团体，真正給人民以言論、結社、出版的自由，并給以物質保證，以加强群众監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鮑子津）

“1. ‘長期共存’不过是一种粉飾。共产党供养民主党派，給他們很高的地位，滿足他們的生活条件，讓他們去宣傳，表现出中国有‘民主’；

2. 不可能‘長期共存’，因为民主党派不能發展組織。不可能‘互相監督’，因为民主党派沒有軍隊，沒有进行‘監督’的物質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目前尚不能貫徹的原因(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編者),在黨的方面是“怕、悶、壓”,所謂“怕”就是怕同黨外人士協商辦事,怕人家意見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怕批評,怕發揚民主,怕有學問的人數多了,不好領導。所謂“悶”就是關鍵性的問題,有不同意見不以商量,不發揮校務會議,基建委員會等機構作用,只听恭維話,不讓人說出不同意見。所謂“壓”就是破壞威信。而非黨的方面則是“悶、急、嗎”。所謂“悶”就是工作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意見得不到回答,積極性不能發揮,知識分子的特点是胸襟窄狹感到苦悶。所謂“急”就是感到黨的政策,沒有正確貫徹,工作進步慢,學有專長的教師因為工作不安心,認為反正如何努力,工作還是不能搞好,還是好壞不分。

(蘭州大學 陳時偉)

九 关于少数人鬧事問題

“‘大民主’之所以是反对官僚主义的迅速、徹底方法，在于‘群众力量大’。‘大民主’有許多形式，其程度也各不相同：集会、自由討論罢工，罢課……它們所产生之利弊多少亦各不相同，在多数情况下后几种手段会是害多利少的。

根据历史条件的客观需要，我們对资产阶级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就是很好的發揮其利避其害的政策，是否可以对‘大民主’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呢？

考虑了反对官僚主义任务的必要性与艰巨性，考虑了三反中官僚主义的大民主，考虑了自發性大民主，各种形式，利弊，我認为有必要、有可能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新形式——有党领导的自覺性群众运动，既有党领导就可克服那些由于自發而产生之不健康因素，(1)教育群众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發泄自己情緒加强了目的性就不会有反党情緒，(2)掌握运动方向，集中目标，而不致主要、次要問題分不清，减少效果，或把鷄毛蒜皮拿来捕风捉影进行人身攻击，产生过左或扩大化，(3)进行对群众經常的教育，正确地掌握对领导的尊重、服从，领导的威信和群众自由、民主权利之运用，过右了就会有动不动就搞‘大民主’目無組織，無领导，实际上或为对领导进行正常工作的威胁，过左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者摆威风，群众怕领导，有的拍馬屁，人們不斗争，也因为对自己力量估計不足，对自由要求不够，(4)群众情緒健康，加以教育提高警惕，反革命分子無隙可乘，反而暴露。(5)如妨碍平常工作那要看总效果如何，应正确领导，(6)假如人們的不滿是不正确的，不切合实际的，那么，自由討論的結果意見会表达出来，上級解釋，反正真理只有一个，不滿意获得圓滿解

决，人們觉悟也会提高一步。”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陈炳勤）

“大民主、小民主都是民主，为什么不可以用呢？并且宪法上没有规定来反对它，有什么权利来加上‘反动’两个字呢？如果善良的願望表示每人都反对这件事情，游行一下，又为什么不可以呢？”

（中国人民大学貿易系學生 張炳鈞）

“我認為不采納群众意見就要用大民主来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孟繁森）

“首先承認人民有权利采用大民主方式包括对待政府的缺点，真是这样要我們警惕，反对官僚主义，为人民解决问题。大民主方式一般是应用以对付敌人的，但不能绝对的說，而要具体分析，如波兹南事件，就属于人民内部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計划系學生 濮仲文）

“为什么允許罢工？因有官僚主义，不罢不行，不是誰願罢，不願罢的問題。”

（中国人民大学总务处办事員 秦荣兴）

“匈牙利当时罢工游行是可以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据一定時間地点可以采用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采取示威游行罢工来反对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設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 孙国梅）

歪曲毛主席的講話，說“鬧事才能克服三害。”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助教 王鉄生的材料）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一) 歪曲匈牙利事件的真相

“波兹南事件只是工人合法要求，而共产党杀工人是太残忍了。”匈牙利事件中，青年学生表现了“勇敢斗争精神”，青年学生反对官僚主义（指共产党）最积极，“匈牙利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屠杀游行而引起暴动的。”要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对待共产党，“共产党杀工人，工人也可以杀共产党，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可以用武力，可以斗争他。”“匈牙利事件说明群众力量是伟大的，共产党不可欺侮人民。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的材料）

“波匈事件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搞出来的恶果。”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燁）

当报上刊登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消息后，他认为匈牙利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苏联出兵，这是违反五项原则，干涉内政，一种是只好让步。”后来，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工农政府和人民镇压了反革命暴乱，捍卫了工农政权，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时候，鍾溶华说：“苏联出兵是不对的，”“苏军不是纳吉，而是格罗请去的”，完全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说法一样。

把参加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反动分子说成是“人民”；“对拉科西这些官僚主义没有办法，只有‘人民起义’”。他对一些有正确看法的同志说：“我们不在匈牙利，不了解情况。”言下之意是叫大家不要相

信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鍾溶华的材料)

“卡达尔自封为政府組織者，他們也在納吉政府干过事，自称革命政府怎么好意思呢？我觉得一定不会得民心的。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不是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凌国星)

“……匈牙利事件中納吉声明退出华沙条約，要求联合国保护，这不能算是叛变，这是匈牙利人民反苏反共的要求，政府不得已不能不依从。納吉的处境很困难，是失途的羔羊，是牺牲品，是个悲剧……

我认为鐵托的演說有很多精辟看法，起碼也有个合理内核，比如匈牙利事件，内因是主要的，个人崇拜的产生就是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伯涵)

匈牙利事件，其原因是“与發揚民主和未实行多党制有关”，納吉政府剛成立时候，曾对同志說：“这回納吉政府实行多党制，国内就会好了。”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教研室講師 侯大乾的材料)

認為“波匈事件的發生，农业上的錯誤……等都是由于个人崇拜且关键在于苏联”而“个人崇拜是制度的产物”又認為匈牙利事件是苏联搞起来的”。对苏联出兵問題胡同意鐵托的看法“第一次是干涉，是不必要的，促使人民更加憤怒，造成不好后果”又說“第二次出兵也是錯的，但是必要的”自認為“受修正主义影响很大”。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胡仁生的材料)

“匈牙利事件它体现了一个民族要求獨立的最偉大的感情，那些

企圖使匈牙利民族俄羅斯化的民族敗類們遭到了可耻的下場(斯大林過去太被人崇拜了,所以現在人們拚命攻擊他)。目前國內和社會主義各國國內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斯大林式的個人專斷二條道路的鬥爭,波蘭由於哥穆爾卡的正确領導,反斯大林主義已經獲得勝利……”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鄧先扶)

“匈牙利事件是人民要求擴大民主,而領導上採取官僚主義態度,以致引起鬧事”。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周治德)

“匈牙利人民遊行是正義勇敢的,匈牙利人民爭取民主,憲法權利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賀毅)

認為這是“民主革命運動”把事件發生的原因完全歸咎於匈牙利共產黨。並且認為蘇聯出兵援助匈牙利不符合國際法原則,蘇聯侵犯了波蘭和匈牙利的主權。吳還認為蘇聯沒有真正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吳家麟的材料)

“舊社會艱苦朴素有兩面性,積極一面是能吃苦耐勞,消極一面是人民能忍受封建帝國主義的統治壓迫,今天要將消極變積極因素,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生活,另一方面要宣傳艱苦朴素,匈牙利沒有這樣作,故發生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燁)

誹謗蘇聯對南斯拉夫政策,誣蔑各國兄弟黨是蘇聯的“應聲蟲”,只會“搖旗吶喊”,毫無“獨立見解”,他說:“由於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以及對南的關係採取蠻橫粗暴的處理方法,使得蘇南關係一度處

于惡化狀態。”他又進一步的說：“對待波蘭、匈牙利的態度也採取類似方式，以致造成1956年的波匈事件”。波、匈人的“反蘇”、“把蘇聯軍隊趕出去”“而由於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政策執行的結果，引起波匈人民的民族主義反感”。蘇聯由此“感到十分震驚”，“他們才趕快發表了10月31宣言”，但未免發表的“還有些晚了”轉而又誹謗地說：“斯大林的个人野心活動，已經起阻礙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共產主義運動的作用了”。接著他又武斷地說：“過去跟蘇聯走是錯了，難道說破壞同南斯拉夫關係就能達到真正的團結嗎？”又對各國共產黨攻擊說：在斯大林死後，蘇聯恢復了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各國共產黨敢（連）忙與南斯拉夫恢復關係”。關於“個人崇拜”問題，他認為在蘇聯“二十大”會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思想的揭發後，各兄弟黨才“恍然大悟，原來斯大林還是個這樣的人！”（以上主要見“試論”）

在“試論”一文中，稱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領袖為斯大林的“忠實信徒”，說：“二次大戰後，他的一些忠實信徒在東南歐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特別是匈牙利，波蘭次之。”對蘇聯過去曾宣布同南斯拉夫斷絕外交關係問題，他講：“有人現在還會說：‘不這樣做不行，否則會破壞社會主義團結，這種說法很可笑’”。接著他反質問說：“那麼斯大林做了的事，你也承認他對嗎？”“斯大林死後，蘇聯恢復了同南斯拉夫的關係，所以各國共產黨才發現自己以前跟著蘇聯走錯了。二十大代表大會召開前，有哪一國共產黨說個人崇拜思想存在呢？直到二十大後，大家才恍然大悟……”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姜玉成）

“認為納吉基本上是革命的，他的措施是一種策略，因為當時人民反蘇、只是為了緩和一下、對人民讓步，這樣做法，僅是種軟弱的表現，不同意說他是反革命分子。”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韓 楓）

“我同情的是廣大的匈牙利青年看到了勞動黨的錯誤（他們教條

主义地学习苏联)而起来斗争,他們的願望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义,纠正錯誤,为此起来斗争。这种精神是值得同情的。但被反革命利用,用大民主的形式是不对的,这不能不给国家带来損失,但他們的精神与願望是值得同情的,我觉得我們国家的青年更需要这种精神,我认为这是比唯唯諾諾的人好得多——这些人对我们社会的进步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英勇斗争是指拿槍杆子,并不是指錯誤的行动,我不同情拉科西,格罗之流,而同情这部分人。”有人問,你說的“英勇”究竟包含那些內容?章說:“包含有:願望、目的和行动。英勇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提意見、罢工罢課、游行示威、拿起槍杆等。‘十月事件’中就是指拿起槍杆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斗争的目的是出于善良的願望,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实现。”有人問:杀共产党人的願望也是好的嗎?章文岳說:“有兩種情况,一种是一些人拿槍去把共产党员的一家人都杀了,这些人願望是不好的,行动也是不好的;另一种是:一些青年用槍杆去反对政府,而一些共产党员也拿起槍来保衛政府,那么这些青年杀了这些共产党员,他們的願望是好的。”“不好的效果,不能說动机就不好,他們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同情的,在斗争中錯誤的杀了共产党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他們的願望不好。”他还惡毒地說:“中国大学生的政治作用太小了,我国大学生就是作用小嘛!中国大学生沒有自己的刊物,越南大学生有自己的全国性的刊物,政治影响非常大,匈牙利青年也有自己的組織,在十月事件上起了很大作用。”有同学說:“我国大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不和党与政府鬧对立,这正是我国大学生政治上成熟的表现。”章回答說:“这正是我国大学生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北京政法學院 章文岳的材料)

“群众起来推翻匈牙利政府,这說明群众对政府的不滿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这很自然,因为共产党搞得不好嘛,群众起来推翻你。”他还說:“匈牙利事件是官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有錯誤的領袖,沒有錯誤的群众。”“領導的錯誤严重,而不在于群众被反革命欺騙和利用的

錯誤。”所以他对匈牙利的流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煽动起来的表示怀疑和反对,他說:“一下子那么多的群众都跑到街上去反对政府,能說是少数反动分子煽动起来的嗎?”又說:“領導上不犯錯誤,反革命又怎能控制那样多的群众呢?”他同时还認為:“波匈事件是波匈党内發生了內鬩,是党内派別互相排斥,一派上来了又打击另一派,党内斗争太残酷了,以致产生了党内不团结。”他說:“哥穆尔卡过去在党内就一直受排斥,卡达尔过去也受监禁,他們过去在党内不得势,所以他們上台了,就又要还一手。”还利用这一事件挑起对苏联的怀疑和不满。說:“大家反苏(波匈事件)也不是沒有道理,因为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嘛,而那些小国的自尊心又很强,加上貿易上的不等价交換,那还不反对”。并說:“人民民主国家有許多領袖都不是在国内斗争中鍛煉出来的,苏联把这些人拿到这些国家去,人民当然不拥护。”

(北京政法学院 罗典荣的材料)

“匈牙利很多記者被逮捕,作家协会解散,我就不相信,这都是帝国主义搞的,我認為,是因为匈牙利政府錯誤很大,人家反对了,就說成是反革命罢了,我想共产党衡量人就是一个标准,你拥护我,生活工作都有保証,不拥护我,你就危險,所以我認為社会主义無真正的人权。”

(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优越,匈牙利事件就是社会制度不优越所造成的。匈牙利十月事件是‘革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不够,波匈事件之后更認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民主的,所以匈牙利事件就是人民起来爭民主爭自由,如果有民主有自由,人民为什么要那样来对待政府呢?‘再論’里說,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一定吧?这并無事实作根据,这是拉科西無能,把事情搞糟了。把責任推給帝国主义。”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你不給他們(指地主、資本家、霍爾蒂分子)執政,當然他們要鬧事,那些鬧事的匈牙利青年是好青年。”

(北京政法学院 付成章)

(二)說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內政”

“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是破坏国际法,是干涉內政。”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教研室資料員 崔志敏)

在匈牙利事件發生后他說:“苏联出兵是干涉內政,違犯联合国宪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汝栩)

匈牙利事件真相大白时,他仍說:“納吉是好人。苏联被邀出兵是混蛋,是干涉行为是鎮压革命。”

“波茲南血的星期五,給‘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新証据,把一切內部‘騷动’全归罪于帝国主义資产階級陰謀的习惯作法被事实揭穿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蔣济良的材料)

“波匈事件發生,苏联要負責任”。在匈牙利事件中“苏联第一次出兵是錯誤的”。

(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助教 盧冕持)

“共产党一方面空揚反对侵略,但苏联却干涉了匈牙利內政。”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潘相臣)

十一 關於節約

(一) 攻击、誣蔑“三反”运动

“在三反中假老虎有50%多，这句话从右派分子中来还可信，打的时候太凶就要出假，积极分子是帮凶”。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三反运动缺点是基本的，排出百分之几十的老虎，但贪污分子不占老虎十分之一，而是百分之几，很多人受冤枉，有的弄得倾家荡产卖房子，牵连亲戚，逼死干部逼供讯、罚跪……是普遍的。打击面过大对干部和群众影响是不好的，百分之几十的干部到今天还是消极，多少人对党的政策对共产党有意见。”

从所获的效果，远不及打老虎所花的损失。工作停了，工厂生产停了，民心惶惶“而党中央对三反成绩夸大，从未提其影响、缺点的严重性”。三反当中发生的偏差“中央至少各级党委要负责任，我不承认是下级干部执行政策错了，为什么全国一样？”

我下结论：三反缺点是基本的，花了那么多代价进行了一次教育，可以用这次和风细雨办法达到此目的，我们过去的作法是得不偿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房文斋)

“三反后贪污没有了，但变成集体贪污了，用福利金补助费变相贪污，十分之九的机关单位均有此偏向的，我校也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無产階級專政中官僚主义原因之一是党中央不虛心，任何运动都充分估計成績，对缺点一字不提。許多人被逼死、吓死，肉刑、体罰很严重。假老虎起碼在50%以上，这些人沒有恢复名誉，三反是以50%的錯誤換取50%的成績，大失人心。这給人的印象是殘酷，不人道，破坏法制。許多人在三反中被提拔，入了党，这是用別人的淚和血换来的，这应当由党的政策負責。”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虽然不同意50%缺点，換取50%的成績，但打老虎打得太粗糙，規定老虎是主觀的，打也是主觀的。三反时乱扣乱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邓芳松）

“三反运动时对老虎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太厉害了。用不着群众运动。”

（北京政法学院 王 革）

“三反运动时有这样一个公式：机关中有多少开支就該有多少大老虎，交出的老虎少了就是打虎不努力，只要是經手銀錢的同志就变成老虎。”

（天津大学 庄秉常）

污蔑“三反”运动的方針是“穷追，猛打”，“在打虎阶段……对各单位分配老虎数字，強調完成任务，弄得財經工作人員，风声鶴唳，草木皆兵”，污蔑“三反”运动是用“肉刑逼死了人”。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周治德的材料）

“三反运动不是資产階級的进攻，而是無产階級有毛病，經不起考驗，物必自腐而后虫生。”

（北京矿业学院 李 - ·）

“‘五反’(指‘三反’)是国家制造的整干部的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三反时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在三反五反中政府犯了重大錯誤，凡过去日本人对中国人利用过的酷刑都用到了，慘無人道的酷刑，不經法院同意随时随地由工作组三、五人商量后，即可执行，等到政府發覺后，仅以偏差二字輕描淡写地遮盖杀害千千万万無辜人民的罪行。”

(北京矿业学院 邓日謨)

(二)在招待外宾問題上攻击党的領袖

“節約只是上面号召，招待外宾是浪費。”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統購統銷所形成的猪肉不够吃，实际上不是国内猪肉少。如像毛主席、周恩来……等，常常宴請外宾(如宴伏罗希洛夫)，大肆鋪張浪費。”

(云南大学 云开志)

“周总理乱花錢，随便宴請外国人。”

(中南矿冶学院 李鎮亞)

十二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一) 关于工业化

1. 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工业化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不应从教条出發，从个别国家(苏联)的经验出發，而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出發。

工业化对苏联是适合的，但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毛主席在‘再論’中还肯定要学习苏联工业化这一条，可見对这件事的認識还是不深刻的。

波、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發生了經濟上、政治上的困难，波匈事件并不像許多人說的那樣，是由于群众思想覺悟不高，这是粉飾我国的太平，掩盖事件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不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而是由于土改、民主改革的結果。这种情况限制了人民劳动上、政治上的积极性。須要迅速提高，如果只注意工业化的長远利益，而不注意目前的利益就要犯錯誤。

工业和农业应当并重，从整个社会主义陣营来看，都忽視了农业。‘工业国’的口号是不适当的，而应当是‘工业、农业国’。片面‘工业国’的思想是資本主义的产物，如果中国成为工业国就必然須要一个农业国来与他配合。

第一个五年計劃，工业、农业投資为5:1。这样，1953年、1954年，农业根本沒發展，而工业增加百分之几十。这样，‘农业合作化不可能巩固。如果不进行技术改革，起碼有30—40%的合作社要垮台。在搞

合作化时，我們用毛主席的17条向农民許了許多願，实际滿不是那么回事。

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片面發展工业，这是很不聰明的。

农村剩余劳动应当去开荒。現在，將拖拉机生产速度降低，这是錯誤，要大力發展技术，农业投資絕不能减少。开荒是比节育更积极的办法。

輕重工业比例为1:8，后改为1:7，造成了目前輕重工业的失調，生产和消費的失調，如紙張供应不上，棉布供应不上，許多消費品漲价，这是反常的現象。

今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打起来也用不着大量的鋼鐵，只要用原子能就行，所以国防上也用不着那么多投資。

重工业积累資金比輕工业慢得多，并且輕工业有了投資就能开工，就能吸引广大工人。

因此，輕工业比重要提高，重工业要降低。

当然，生产資料的生产应当优先增長，但馬克思並沒有解决輕重工业化比例問題。

我国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了兩条工业化的道路，对苏联的道路全盤肯定，对資本主义的全部否定，我們应当采取第三条工业化的道路。‘再論’上說：‘苏联工业化的道路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一定对。我們不和苏联一样，就是否定之否定，这样才能进步，如果只想学苏联，那就是懶汉。”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我国搞重工业是过火了，人民非常苦，农民沒有粮食。

工业化过火了，农民沒有飯吃。”

（中南矿冶学院 李鎮亞）

誣蔑第二个五年計劃

“第二个五年計劃，並沒有深刻的变化。波匈事件是在‘八大’以

后發生的，而第二个五年計劃是在‘八大’上制定的，因此，它的改进不徹底。五年計劃規定生活水平提高25%（实际是10%），希望这个計劃只是个草案，不要形式主义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样通过是极不負責任的。”

“‘再論’把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当作普遍經驗肯定下来是不对的，工农业必須同时高度發展，片面的工业国是資本主义的产物，我国發展目标——工业国应改为工农业国。第一个五年計劃形而上学地对待了工业化道路，国家的工农业投資有錯誤，农业發展太慢，再不进行改革，用不着三五年，农业就要垮掉30—40%。輕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也失調，工业品的价格不是逐步降低，相反是增加了。第二个五年計劃是在旧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沒有接受波匈事件的教訓进行徹底的修改，希望中央提出新的建議，不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形式主义的通过一下就算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

3. 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建設的成績

“我們許多工业建設都是冒进了，如飞机制造厂，汽車制造厂，电子管厂等。現在制造一架飞机的造价折成黄金其重量相当于飞机本身的重量，我們能制造飞机不过是好听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成立政治經濟学会，国民經济計劃学会，通过这些組織来保証我国广大經濟理論工作者有參予国家政策方針、發展經濟計劃的研究的可能，这些組織和計委經委的关系是我国計委經委和其他經濟机关，有义务向經濟学会提供国民經济發展的各項資料与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党的經濟政策是来回翻跟斗，一回兒要快，一回兒要慢，一回兒

生产过剩，快出口，一回兒先天不足。我們国家紗錠增加30万，但棉布供应第二期打折扣，人民生活有提高，这是大家都不否認的。但同苏联比朝鮮比，他們都降低物价，但我們除少数物品外，有的还上漲。”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

附 录

誣蔑苏維埃国家、党組織及革命領袖

1. 对苏联各項成就的誣蔑

“苏联教条主义很严重，只能学苏联的自然科学，不能学它的社会科学，联共党史沒有学的必要了”。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白 湜）

“苏联专家搞了几十年还不如中国教員搞了几年的行，美国回来的专家很行，去年很多人得了科学獎金，資产階級学者不錯。”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苏联沒有科学和文化，就是有也象死水一样，只有微小的波浪，苏联电影沒有資本主义国家好。”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資料員 張紹鴻）

李德反对請苏联專家，說：“不要什么‘外国顧問’，我們要有自尊心，要用‘自己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的材料）

“对苏联不滿，到处找缺点，听了农业部副部長刘瑞龙报告后，說：“苏联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又說“苏联医学水平很低”，“苏联自然

科学水平也很低”。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邓芳梅的材料)

苏联是个强大的国家,但只是拼命发展重工业,不顾人民生活,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比美国低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 德)

“苏联只有重工业没有轻工业,因为苏联要我们供应一些消费品(中国的特产)苏联1952年农业产量(主要指谷物)尚未恢复到1913年的生产水平,即使重工业也不如美国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1.对苏联不应当看他的脸色行事,应该完全平等,我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

2.对南斯拉夫应该更接近些,他们有好多独到的见解,敢于独立思考,应该向他们学习,不要认为他们就是修正主义。

3.对美国要积极些再积极些,只要不损害国家尊严,可以多作些让步,和美国闹对立没有什么好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大字报)

在谈到苏联和东南欧各民主国家如波、南等都有许多的变化时特别强调波兰农民入社的自愿原则,和国家领导人和老百姓同甘苦,不带卫兵也不坐汽车,同时说南斯拉夫两院制在政府机构上比我们简单等。

此外在陈丘民平日言论中对苏联是歪曲和诬蔑的。他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侵犯匈牙利的主权,干涉内政,违犯国际法,苏联根本没有诚意让德国、越南和朝鲜统一,(此句话是在整风交待谈出)斯大林功小过大,共产党没解放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胜利了就不要民族自决权了,这是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军

費开支在絕對数字上要大(中、苏比美国大)……。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的材料)

“……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傳統就是比較优良,据說法国有个領袖犯了法,照样受审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苏联,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是最沒有法制的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伍伯涵)

“苏联一切都是教条主义。苏联太驕傲,干涉人家的主权,国内也沒有什么民主,如选举也是提名选举。我們不要盲从苏联,如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就是盲从苏联的結果。斯大林問題为什么死后才揭露出来,这說明苏共中央是有問題的。”誣蔑苏联援助匈牙利是干涉,說:“苏联兩次出兵都是不應該的,是干涉內政。匈牙利事件的發生,主要是共产党脱离群众,官僚机构化。我对納吉是有幻想的,如果他不垮台,他也可能領導匈牙利走上另一条社会主义的路。波茲南事件是工人自發的。中国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我第一个拿着旗帜上街。”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朱維民的材料)

“苏联科学不如美国。苏联近四十年来未培养出大科学家”。……“我总觉得苏联教条味很濃,紅十字医院交給中国是苏联医学不行,‘下不了台’的結果。”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苏联在社会主义陣营中的領導地位应重新考虑,苏联的教条主义严重,在發展馬列主义上远远落后于我国,社会主义陣营应放二把交椅,自然科学的是苏联,社会科学的我們党可以心安理得地坐下来。

中苏关系所以好,因为中国是大国,中国有謙讓的美德,对南斯拉夫是否有些宗派主义情緒呢?不能說南是修正主义。苏南关系不好应由苏联負責”。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凌国星)

“程海果的这个理論(即苏联不是社会主义)，我还未弄清，但她推翻了，他認為她这种行为是为了新的进攻而作的退却，而这种退却的本身也就是新的进攻，因为她推翻的正是真理，我認為苏联在一般意义上講，是建成了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講，还没有建成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原因有二：(1)还存在無产階級專政，(2)还存在私有制。強調沒有建成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有兩点好处：(1)能繼續加强对私有制經濟的改造，(2)能加强国际主义的团結。馬克思曾說無产階級專政还存在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那怕只有个别的私有經濟存在也不能算100%建成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顧佩弦)

2. 对苏联党組織的攻击

“赫魯曉夫的秘密报告是有的。应向人民公布。不向人民公布，人民就不能監督。不然人民都相信党，这就是愚民政策。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历史結論应由人民来作，不应由党的几个领导人来作。不能任何問題只作原則公布。只原則公布就是把人民当作阿斗”。

他又污蔑目前苏共中央正确地处理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反党集团，他認為是年輕的布尔什維克打击、排斥年老布尔什維克的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的材料)

最近苏共中央关于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的反党集团的決議發表后，他說：“这是因为赫魯曉夫掌握党权，布尔加宁掌握軍权，因此，才把馬林科夫等人排挤出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的材料)

对苏共的看法，很早就認為苏共內有宗派，不过他是指以赫魯曉

夫同志为首中央排斥莫洛托夫等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楊学民的材料)

“苏联是为了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才槍斃貝利亞的。”……

認為对斯大林錯誤的批判，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上台后，为了树立自己威信而对斯大林的打击行为。斯大林的錯誤，赫魯曉夫、布尔加宁也有責任，为什么不檢討，等人家死了，把責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赫魯曉夫和布尔加宁批判斯大林是存在个人主义和私人目的的。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韓楓的材料)

3. 誣蔑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是实现民主的絆脚石。苏共对斯大林功过的三七分之說并不同意，苏共的水平不見得比中共低；中共毫無必要以和事佬的姿態出現，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把斯大林的問題仅仅归結为个人崇拜是唯心主义的。既然斯大林能利用制度，他的錯誤就和制度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潘俊民)(大字报)

“我过去对斯大林的印象很好，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我也很生气，但到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評價，不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之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沒有典型資本主义基础，社会發展沒有按規律来的，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錯誤大部分受封建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

斯大林的錯誤是有历史根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上層建筑意識則不同。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空地上立起的理論也是个人崇拜，因为苏

联是他建立的。在空地上建立的。实际上，上層建筑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的！如法国革命后斯大林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現的。在苏联这样的崇拜是大家的习惯。

赫魯曉夫和其他人把錯誤归在斯大林个人。为什么当时一点不提而以后又一棍子打死。

秘密报告材料是很真实的，毛主席在报告中引用过。

肃反問題最严重：在“伏老”家里，斯大林按上机器，“伏老”要参加会就要打电话請示，“斯大林”召集这些人很恐慌，不知死活。斯大林人为的制造一些事件，为社会主义建成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理論找証明，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关，又利用这事件进行紅色恐怖，又制造列宁格勒事件，杀党、政、軍领导人，現在都恢复名誉，但人已經死也無用了。从有些老党员和领导人的信中看了非常感动人，有一位說：我六十岁人的老头受严刑拷打，在沙皇时期坐过牢，沒想到却死在苏維埃的監牢里，最可耻的是在他們准备好的口供上签了名。

农业上的錯誤：农民生活很苦，斯大林看农业情况，都在电影上看到的，从他向中央政治局的建議要求收稅500多亿盧布，但全部农产量才200多亿盧布。

軍事上情况：第二次大战前，德国准备进攻苏联。丘吉尔曾打电话报給斯大林說：德国要打苏联。結果他不作充分准备，驕傲自大，結果打到莫斯科。斯大林完全喪失信心，說：列宁所締造的社会主义完蛋了。在战地里赫魯曉夫請示作战，要求斯大林亲自接电话，但几次也沒接电话，使十几万人全軍复沒。这就是斯大林的軍事天才，联共党史根本不是斯大林写的，斯大林傳略也是他亲自改的。这些材料我們都不知道，不讓我們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斯大林对内也很專制，甚至不次于希特勒，看‘攻克柏林’有一鏡頭就是斯大林在紅場胜利閱兵，当时紅軍把法西斯軍旗扔在檢閱

台下时，我就認為这种情境和希特勒檢閱党衛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 达）

“斯大林是一半天使，一半野獸，既偉大又渺小，既是君子，又是小人，既是党的領袖，又是个人野心家。他是一手拿着宝剑，一手真理。托洛茨基最初只是和斯大林爭奪权力，以后由于受到斯大林排挤才叛国，如果是托掌握了权力，兩人可互易其位，托是斯大林派人刺死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資料員 張紹鴻）

“斯大林是暴君，是彼得第二。斯大林把整个民族都流放到西伯利亞。”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段鉄珊）

“一部分人認為斯大林的功劳是主要的，錯誤只居次要地位；另一部分人認為斯大林的錯誤是主要的，特別到后来越来越起着阻碍社会發展的反动作用，我基本上是同意第三部分人的意見”。“斯大林不仅是个犯了严重錯誤偉大的馬列主义者，而且也是历史上罕有的个人野心家”。斯大林是“反动的”，并歪曲毛主席的話，說：“一个人……90%的成績是产生在他的前期，仅有10%的錯誤在他的后期中，那么这样的人也应說是反动的，反之就不是反动的”。接着他說：“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高、饒就是这样的人”、“国民党軍官在后期起义过来的都是居于这一类（不是反动的）”。繼而又从斯大林的历史上去找原因，說：“斯大林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外高加索一帶活动，那时他的力量不大，同时他对自己的前途应向什么方向走，还有模糊不清，但他也终于根据自己的观察，他就投靠了列宁，作为一个馬列主义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的主觀唯心論的觀點認識了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本質”，“認為建設社会主义必須有專断的領導者，不过他也認識到一点，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須获得人民的支持才有

可能”。于是斯大林表现得“很积极”。斯大林虽然想排挤列宁，但不敢公开活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镇压了许多“捍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同志，列宁所亲手培养起来的1500多个积极分子，被他杀掉了1100余个”，“因为……这些人妨碍他的活动”。这样做是“巩固(其)统治基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斯大林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了，不再限于国内范围，对东南欧民主国家采取殖民式的压迫政策，是造成波匈事件的主要原因，波匈人民反苏、把苏军赶出去，看来一个殖民者(德国)被赶走，又来了一个殖民者(苏联)，”后者并不比前者“好到多少”。由于“斯大林使人们养成一种教条主义式的思考问题方法，把斯大林说的话当御旨聖經、一言一举都要看斯大林、苏联人的行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改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斯大林说这是反馬列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行动”。最后，他说“斯大林到后来却完全变成一个人人主义野心家了”。并带讽刺的说：“好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他认为亏得斯大林死的早，否则“再迟三年，苏联人民一定要把他赶下台”。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姜玉成的材料)

“斯大林后期是反动的。怎么能说他是革命的呢？既然承认們阻碍了社会进步，当然就是反动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譯員 徐京安)

匈牙利事件就是斯大林政策的結果。斯大林是国际主义的偉人，也是罪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学生 伍伯涵)

“教条主义是从苏联来的。中共历史上曾犯过几次，虽怪我們自己学得不好，但不能只怪学习者，苏联和斯大林有一定影响。解放后，教条主义在我国統治很严重。对斯大林崇拜到了极点，造成恶劣的影响。认为苏联一切都好，美国一切都不好。这样在我国形成一种不动

腦筋的風氣，有意見也不敢起來爭論。”……

“對斯大林的估計，同意林希翎的提法。斯大林後期對社會的發展起了反動作用。如不是斯大林犯錯誤，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將不知更前進了多少步！對黨中央估計的斯大林的功過的比重上，我還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福榮）

“他（陳椿年）不同意對斯大林三、七開的看法，說‘你不曉得人頭落了多少？十七大多少人被殺掉’我也就有些看法，你看搞得亂七八糟。”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陸 戈）

“斯大林品質上的特征就是家長式統治，他對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是馬克思主義只我一家別無分店，順我者存違我者亡。”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助教 陶文達）

試論個人野心家斯大林在歷史上的作用（未定稿）

自古以來在統治集團中，都有兩種人（這包括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一種人是執掌大權的，這僅僅是少數人，可是他們的權力却都很大，另一種人是當將之助手的付角色，在這種人中往往可又分成三種，一派是堅決的忠臣派，也往往是最為主將所信任的，這是嫡系派，另一種是反對嫡系派的和統治者的反對派，第三種是中間派，這是在一般情況下，都全有的，當然這也適合於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執政者在鞏固其統治時往往是培養親信分子，擴大嫡系派的勢力，打擊反對派的勢力，排擠中間派勢力，以保持嫡系派執政者的優勢地位，作為一個個人野心家出現的斯大林，他就是完全照着這樣做的，這樣就造成少數人與個別領導者專斷統治的局面。……

在對斯大林問題的批判上產生了兩種看法，一部人認為斯大林的功勞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另一部人認為斯大林錯誤是主要的，特別是到後來越來越起作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反動作用，對於第

二部人的意見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我也有與他們不同的看法，就是斯大林他不僅是個犯了嚴重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也是歷史上罕有的個人野心人家，他犯錯誤的悲劇也就在這裡。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 奇 思）（大字報）

二十大後，認為斯大林很毒辣，說：“殘酷無情，是個陰險的政治家，開始在黨內的地位不高，後來爬得很高，特別通過秘密警察和個人野心向上爬，以達到其維持自己的統治。”

（北京政法學院 羅典榮的材料）

“斯大林不人道，非常殘酷，他妬才嫉能，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爭權奪利。斯大林無學問、無理論，只有政治手腕。他仇恨猶太人，禁止猶太人發展。斯大林功不抵過。”

（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

“斯大林專政時代實際上是奴隸加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意識下的復舊‘人權的喪失，對思想上‘異端’‘鎮壓’……’最突出的是長期培養個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實際上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塊絆腳石。”

（北京大學 嚴仲強）

“……我們只要回憶一下，在斯大林沒有逝世的時候，在赫魯曉夫還沒有把他從寶座上打下來的时候，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條主義者，誰敢批評斯大林的著作？現在，斯大林的偶像已經打毀了，但另外一個偶像被招上了寶座。以前言必稱斯大林的，現在是言必稱列寧。我並不反對引証列寧，但是應當把眼界放大一點，從列寧以外的知識寶庫中也去吸收一些營養。”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教授 吳景超）

4. 攻击列宁、赫魯曉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領袖

“共产党只講好的，包庇錯誤；当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就一棍子打死，如对斯大林把錯誤全推在斯大林身上，赫魯曉夫、布尔加宁一点問題沒有？”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學生 王鴻章）

“……不仅普列汉諾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修正’了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筆記’中承認黑格尔的許多哲学命題，他不懂，……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中許多命題，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題是錯誤的。”

（北京大学 譚天榮）

“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就好啊？我就不信”。斯大林后期是反动的，赫魯曉夫不正直、不老实，答紐約时報記者問的秘密报告問題时，回避了問題，不光彩，我都为他难为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學生 朱公灝）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的錯誤受到批判。他說：这是赫魯曉夫“在爭权夺利”，“是个人野心家”。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統計系講師 郭振淮的材料）

“苏联对东欧民主国家在政治上不平等，苏联不信任各国共产党，二十次大会的秘密报告不發給各国党，而結果为杜勒斯發表了，各国党都很不滿意”。“苏共二十次党代大会是赫魯曉夫个人感情的暴發”，“赫魯曉夫同志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敢批評怕报复，怕死”。“中国共产党員还头可断，志不可变”。“鉄托是英雄人物，敢反对，而赫魯曉夫呢，以前不反对，死后才大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單思良）

“斯大林專斷異常，個人崇拜。使我們對他的死，猶如喪考妣，而現在又對斯大林全盤否定。所以可以想見赫魯曉夫之專斷了。在各項國家政策上，大都由赫魯曉夫發言，而布尔加寧和伏羅希洛夫就很少講話。”

（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學地理教員 梁其璞）

“赫魯曉夫打擊斯大林，招高自己，進行黨派鬥爭。聽說了‘秘密報告’的事我就更恨他了！”他“不同意”赫魯曉夫同志關於“不同國家可以通過不同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在聽了林希翎的關於“秘密報告”的誣蔑後，說：“她揭露了赫魯曉夫的真相，好一個丑惡的家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學系學生 李德的材料）

“赫魯曉夫報告：事實上存在秘密報告，世界各國共產黨都有聲明，我是相信赫魯曉夫有秘密報告，赫魯曉夫答美國記者問很不高明，說沒有、不承認。

我對斯大林崇拜是五體投地，難忘1919年，攻克柏林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當時我認為處理斯大林不正確，但一直到看到赫魯曉夫報告才給我很大啟發，一個轉折點，斯大林專橫殘暴，嚴重透頂，歷史皇朝無可比擬，連親自培養都被殺害，斯大林對這些同志都是拷打，而又都是秘密審訊，斯大林肯定了‘拷打是正確的，資產階級對我們如此，我們也可對其拷打’，並對伏羅希洛夫進行檢查，斯大林假如再遲死幾天的話，那麼米高揚、莫洛托夫也見不到了，赫魯曉夫、布尔加寧見斯大林非常提心吊膽。

蘇聯農民生活還是很苦的，斯大林十多年未下去，對二個民族進行流放西伯利亞。德國法西斯進攻時丘吉爾打幾次電報警告斯大林，但斯大林不相信，使蘇軍喪失性命，打到莫斯科時，斯大林完全失去

信心說：‘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快要完蛋了’。

从这些問題可以看出：他的錯誤有社会历史根源的，俄国未經历史典型資产階級国家，它沒有民主傳統，这是非典型的資本主义大国，我国是如此，假如法国鬧革命成功的话，我認为是典型社会主义。

苏联15年未开党代表大会，赫魯曉夫同志也有責任，为什么見了不說，对斯大林問題我認为很少从社会根源去分析問題，应研究斯大林問題为什么产生在俄国？

現在我主張公开赫魯曉夫同志报告，女同志多帶条手帕，現在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

个人崇拜，我同意鉄托說法，联共党史不是斯大林写的，自己用300吨銅造一銅象，我們毛主席就不同，非常注意这一問題，反对給他祝寿，毛主席橫渡長江，主席就不同意登报，有一文学界臧克家同志到处写文章評主席說毛主席不仅是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偉大的詩人，这是完全吹拍。

我們中国的个人崇拜，不是真正崇拜，而是崇拜地位。假如毛主席是普通人的話，那也不会崇拜。

毛主席这次在最高国务會議講話，是最好一次講話，要出蒋介石全集說某些作风是国民党作风，如果是別人說的話，后果如何呢？值得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赫魯曉夫有些專断，我看反对赫魯曉夫不能算是反党。”

（北京政法学院 侯振华）

（二）挑撥中苏关系

“假若拿联合国宪章来講，苏联出兵可以說是不对的，如納吉要請美国出兵时，我們也一定要說它是干涉內政，我們这样作，他們也

可以講，我們是不對的。”在學習“再論”時，右派分子單思良提出給蘇聯大使館寫抗議書，收回中國的所謂64個屯子（未寫成）羅旭暢却毫無原則地說：（羅此時任支部書記）“蘇聯假若真占領去那麼多屯子，單思良要這樣做也沒有什麼不對！”

同時他還講過：“西伯利亞、海參崴那些地方過去都是中國的領土……庫頁島也是中國的領土。”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羅旭暢的材料）

“趙洪正和張其志在發言中對人民幣與盧布的兌換比值不合理提出了意見，他們認為5角5分人民幣兌換一個盧布，中國太吃虧了，蘇聯物價很高（指生活日用品，主付食品）月薪400盧布的只夠吃飯，可是到中國來可換220元人民幣，能買很多東西，所以蘇聯人願意到中國來自費旅行，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到中國來玩，只需4,500盧布，除了來回車費2,000盧布，其餘的錢，不但吃住，還可以買許多貴重物品帶回國，如果這批東西變賣的話還可以賺錢，而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是無論如何也沒法到蘇聯去自費旅行的，首先到了蘇聯吃飯就吃不起，在中國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伙食一般以20元計算就吃得很好了，可是在蘇聯就得400盧布，實際比起來一個盧布只折人民幣5分，他們說這樣的兌換比值是不合理的。很明显，在蘇聯輕工業品很貴（他們重工業品便宜）我們中國輕工業品便宜，對於為什麼中國工業不發達還賤，蘇聯工業發展發達還貴，他們弄不清是什麼道理，如果說有道理，那就是人民幣和盧布的兌換比值不合理。”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黑龍江以北等地及海參崴為什麼蘇聯還不還給我們呢？大家知道海參崴等地是過去帝俄用強力侵占的，這種不合法的強占作為一個有民族威的中國人是不能容忍的，耻辱，但是很遺憾，具有民族平等的蘇聯為什麼現在還不還給我們呢？我們不能不感到懷疑？

當然有人會說“這是為了國防安全為了蘇聯和中國的共同安全，

这是对大家都利”这理由多么充分似乎是理所当然！(?)那么我们
要問：中国的海防綫难道只因海参威有了保障就全都安全嗎？中国的
东海、南海一些港口难道不是国防前綫嗎？（誰都知道美帝在台湾
威胁着我国安全，那么照以上这种人說法苏联还应为了它的好心来
占領我国其他海港了）这难道是个理由？并且我国的国防力量已不再
是以前那么軟弱無力了，我們能在朝鮮把最凶惡的美帝赶出北朝鮮，
难道我們自己国家的国防就不能保衛？这是不能說服人的！又有人会
說：如我們的馬列主义×运老师就这样說：“苏联比我們先走一步，那
里的人民（指占領地）生活比我們好。我們假定××回来那不是等于
把已經先进的人民政治……等拉回来嗎？”这是多么謊謬的論点！我
們認為我們收回来并不是要把先进的既得的成就拉回来，我們能把
这些先进的成就作为我們全国学习的榜样，这不是更好嗎？

更有人說：也許是很多人会那么說：这是符合無产階級利益的，
將來共产主义社会国界也要消除呢？不合情理啊？不不我們反对这种
說法，我們認為在階級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在人的思想上还明显地
存在着“祖国”这二个字眼以前，这种提法似乎犯了主观、片面、教条
主义的毛病，假定照这种人說法的話那么請問：为什么現在在訂立协
定——貿易、經濟……等要按等价交換的原則进行呢？我們要求收回
祖国的領土——在国家沒消除以前。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党是苏联的尾巴，党和政府一样屈从苏联，什么都得苏联先声
明，我們才跟着發表意見，最近我們对苏联批評多了些，我很高兴，我
們已爭得了一些独立。”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中共看苏共眼色行事和蒋介石与美国的關係一样，是奴僕关
系，中共应拿出自己的气魄来。”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学生 王鴻章）

他認為我國與蘇聯的同盟的“蘇聯和美國都是強大的國家，共產黨抱着蘇聯的大腿，國民黨抱着美國的大腿，沒有靠山誰也站不住腳”。說：“特別不依靠與自己相同的國家是站不住腳的。”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馬馨的材料）

“蘇南友好關係未恢復前，南斯拉夫曾經數次要和我國建交，我國不同意。蘇南關係好了，我國也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係”（李祚明揭發）。他講的時候，態度神情非常輕蔑，意思是說我國是蘇聯的“附庸”，跟蘇聯跑。他還說：“以彭真同志為首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到南斯拉夫去，南斯拉夫招待我們的態度不好，南斯拉夫同志說：‘我們是不承認以蘇聯為中心的……’”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張維綱）

“1950年我國正當要解放台灣時，由於美帝侵略，我國就馬上去抗美援朝，而蘇聯當時卻‘強調’和平，不進行軍事援助，這次匈牙利事件，為何又感到這樣關心呢？……早在伊犁條約時，沙俄奪去了我國土地，為什麼至今不歸還？蒙古原來是我國的領土，由於過去蘇聯支持下，才開了獨立，造成了桑葉形的版圖殘缺不全”。“蘇聯援助我國是應該的，如果亞洲沒有我國強大的存在著，那麼蘇聯將化費更多的費用。”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學生 周治德）

“首先關於旅順駐軍問題，我認為蘇聯軍隊，駐在中國領土上，就是對中國不尊重，還有蘇聯幫助我國共同合開的新疆石油的問題，我當時就存在這樣的想法，蘇聯幫助我們並不是完全的大公無私。”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方炎火）

“我們是花高價購買蘇聯機器，從而浪費資金。”

“波蘭賣給蘇聯的煤，波蘭吃虧了，引起了波蘭人民的不滿。”

他誣蔑地說：我們“过于崇拜苏联，以前被我們相当崇拜的，現在苏联也是認為有錯誤，如草田輪作制。苏軍紀律很坏，哈大公路受騷扰很大，群众极不滿，以大国軍隊自居，象侵占殖民地一样。以前日本虽坏，但未在表面上搶劫，而苏軍則公开大量搶劫，扼杀中国老百姓，死伤极多，在东北强奸妇女，哈大公路兩旁許多混血兒，但这是耻辱。苏軍在旅大拉牛极多，要中国人去給他赶牛。1954年春，一苏軍喝醉酒后，槍杀中国人。”

他还誣蔑苏联“白占中国領土不归还”，他說：“关于烏苏里江以东地区，清順治初时，是中国地区，中俄边境未定，尼布楚条約与璦琿条約，將所在的江以北割給苏俄……，凡是別国的領土，都应归还，也不能局限于条約。……社会主义国家主張領土主权完整，应解决这問題。我国政府不敢提出这些問題，故以民族自决权解釋(?)是牽强附会。……苏联不归还还有其原因，苏联海港很成問題，如海参威給中国就無出海口。从本国利益出發，不归还中国。”又說：“至于国际影响，正因为苏联未將土地还給我国，所以英国也可借此不还回香港。”“旅大綫上有苏联与日本的碑，殖民地痕迹，应取消。”

他更大放厥詞說：“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芬蘭国防綫退后，把其他地方，——卡多列拉与芬蘭調換，这是違反国际法的，調換了地方，使社会主义人民变成資本主义国家人民。”

他大肆誣蔑苏联違反国际法，后無耻地提出質問說“和平共处与尊重領土主权完整原則究应从何时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毕毓琦的材料)

“日本是大大的，苏联是小小的，中国是偷偷的。”……“周总理今年訪問苏联，苏联把中国大大的棒了一下，中国也把联苏大大地棒了一下。”

(北京政法学院 張敬臣)

“苏联帮助我国不是誠意的，是为了扩大他的社会主义势力范围，对他有好处。我怀疑，将来我們强大了，苏联是否肯讓我們跑到他前面去。苏联要我們学俄文，教科書大量發行到中国来，是从文化上控制我們，将来会培养一些崇苏者。苏联通过我国（如高教部）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来控制我国文化，学生不要学俄文硬要他們学。”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实驗員）

“苏联的东西价格昂貴，中国的东西价錢便宜，苏联專家特別喜欢来中国工作，目的是想来捞一把，滿載而归。”

（北京政法学院 黄盛业）

“苏联由东北搬走机器違犯国际法。苏联向土耳其要一塊土地，土耳其不給，所以使得苏土关系長期不好，后来苏联發表声明又不要了。苏联保密过多，美国科学报道真实。苏联民族主义特別强，处处高人一头。苏联軍事并不比美国强。苏联电影公式化，内容情节上不真实，使人看了起反感。赫魯曉夫秘密报告美国發表了，苏联不承認，这事奇怪。”

（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三) 反对向苏联学习

“苏联不是什么都好，長江大桥墩，一苏联專家的設計还不如我国專家的建議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韓惠貞)

“学习苏联，就是媚外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森达賴)

“为什么要把苏联的經驗都搬到中国来，什么都是苏联好，这样下去，几十年后我們的子孙后代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連軍队的紀律也要学苏联那一套，犯了錯誤就罰劳役、关禁閉，太不自由了。在学校用的是苏联的参考書，好象中国專家写不出来一样。”他还惡毒地反对以苏联作为国际团结的中心，要以中国苏联为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張可治的材料)

“苏联对我援助不真实，欺騙我們，他們那一点工业品換取我們很多粮食和輕工业品，因此，使得我們鬧了粮食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資料員 崔志敏)

“苏联把外蒙古搞得和他們一模一样，我說它(指蒙古人民共和国——編者注)是苏联的附屬国，也不見得錯。我看他們也够慘的了，一切都是苏联的，什么都向苏联学，他們已經欧化了……寬褲腿，說話也不用蒙古話……真是豈有此理！中国幸亏是大国，要是小国，也会和东欧差不多(意指东欧各民主国家受苏联压迫——編者注)，够慘的！中国这块桑叶(指中国地理形狀——編者注)，已經被挖走了一块(指外蒙独立——編者注)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楊森达賴)

“中苏之間有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有矛盾。苏联專家在中国掙工資最多，是按劳取酬，没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周紹杰)

“中苏合办的企业和过去国民党与英美合办的企业一样都是搞走我們的資源，156項企业还牵制在苏联手中，苏联給我們机器，是推銷他們的产品，技术也并非头等，同時我們也花了很大的代价，弄得我們很多东西吃不上。苏联專家水平并不都高，我們對他們物質生活的照顧，是我們很大的負擔，他們名为幫助我們勘探資源，深入到云南，貴州，实际上是搞走我們的机密。”

“苏联在东北强奸，把我們的机器搬走也不还”。

“民族共产主义实际上来源于苏联并非南斯拉夫。”

“我們走苏联的道路，学习苏联是媚外，媚苏。”

“在調整中苏关系时，党太軟弱，在波、匈、斯大林問題上我們對他們的批評不怎么尖銳，一定要說中苏关系平等，我不服气。”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人民幣和盧布的兌換比值中国吃亏，中国輕工业品換苏联重工业品、中国也吃亏。專家交換，由于苏联物价高，中国吃亏。苏联專家包办代替，干涉行政。苏联空軍顧問代替軍事指揮。‘安东苏軍搞中国破鞋’(‘破鞋’即作风不正派的妇女——編者注)。”

“苏联揩波蘭油，想搞垮小国。用廉价去买波蘭的煤，使波蘭太吃亏，波茲南事件和苏联大国主义有关。苏波是兩個极端。苏是大国主义，波是狹隘的民族主义。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又杀了匈工人是不对的。匈牙利共產黨員很多，很多坏人混进去，这样人民是可以杀共产党的。”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中苏关系是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但因中国落后，在某些地方受苏联歧视。

一味学苏联，社会形成崇苏。我们对苏联的电影视为珍宝，而苏联不这样。不应轻内重外，到处宣传中苏友好，这样鼓吹的结果，年青人都不敢穿花旗袍，都要穿上乌克兰衣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岳文伯）

“盲目崇拜苏联……将中学英文取消学俄文……英文是世界语，代表先进技术……建议俄文选修。”

“中苏友好不应建立在教条主义空架上，掩盖矛盾……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不正常，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洪维政）

“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国文化是非常丰富的。但我们开外国的课特别多，而祖国语文都没有，应把外国语改为选修，本国语改为必修，这样会提高我们的爱国思想，我国的学校是有些崇外的。”“应多学本国文化、少学外国，不能一切都学苏联，过去学苏联太教条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范书谦）

“苏联法学的教条主义很严重，三、四十万字的刑法教科书，只有十几万字有用。看苏联刑法学的书不如看旧法收获大。苏联法学给我立场观点，旧法给我独立思考。”

我们学习苏联是搬（生搬硬套）、拜（盲目崇拜）懒（不独立思考）。

人民大学的方针只提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而未提到学习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不对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黄守礼）

他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挑拨中苏关系，说什么“……要完全平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应

該互相商量，不必看臉色行事”。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潘俊民的材料）

“不要迷信蘇聯專家，沃爾科夫（第一位傳授工業經濟的——編者注）不是科學家，而是宣傳鼓動家，只知道資本主義，簡直是胡鬧；費拉托夫（第二位來校專家——編者注）也差不多；波格丹諾維奇（第三位專家——編者注）也只不过留下三本講義，而且其中還有錯誤，除三本講義外，什麼也問不出來再問就是所問非所答。”（但賀對美國的運用學卻大吹大擂，認為科學價值如何高。）他嘆息地說：“如果二十大早開幾年，如果我們早學一下資產階級的這些學說，工業經濟就不致於一般化到如此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講師 賀 安）

、“蘇聯專家也沒有什麼，他們不懂中國事情，至少就錯了一半，經常路過西郊專家招待所，覺得專家待遇太好了，而中國專家卻不受重視。中國過去的政府有的親英，有的親日，有的親美，現在是不是也犯了親蘇的錯誤。”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我對軍隊學習蘇聯很反感，軍隊學蘇聯學壞了，把解放軍的許多光榮傳統都丟掉了，比如官兵的關係就不如從前好了。蘇聯根本沒有航空母艦。”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伍伯涵）

日偽時期學日文，蔣光頭時期學英文，而現在共產黨把天下，（中國）便來轉向學俄文，是否現在英文不頂用？是否俄文百神通？莫不是現在政治一邊倒，科學外文也來倒一旁，若不是，為什麼很多大學外文就是僅僅一門，為什麼不讓同學選修其它國外文，多少人，中學念了六年英國文，進人大後卻來改行學俄文，其結果俄文沒學會，英文

也沒學通，一點外文都不懂。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自匈牙利事件後，蘇聯沒有什麼可學，我國是偉大的，應該向我們學習，政治上蘇聯應該向我們學習，因為赫魯曉夫報告中有時很不冷靜，在科學上應該批判的向蘇聯學習，不能盲目的象過去一樣。”

“強調學習蘇聯就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朱榮庭)

“向蘇聯學習，這就必然產生教條主義，應不約束舊知識分子的百花齊放，從頭建立起適合我國需要的又是本國出產的學術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傅鐵城)

“小學時都讀英文，因國民黨很崇拜美國，解放後又都學俄文，現在書店充滿了俄文東西，英文很少，這樣過於偏差不好，這和國民黨崇拜美國一樣，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有些東西是先進的，蘇聯所不及，去年建議選修英文，學校不理。”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學生 林忠仁)

“蘇聯刑法教科書，充滿了教條主義，最多打三分，蘇聯刑法分則教科書內就是抄的資產階級刑法科學，加以階級性。貝斯特洛娃和達馬亨專家都有教條主義習氣，解決不了問題。”

“蘇聯專家成了北大太上皇，美國專家受壓制。過去有人沒法說話，只要一說黨就來扣帽子，如果對蘇聯專家的論點有意見，就給扣上一個政治問題的帽子。”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孔 劍)

“農業合作化強迫命令，生搬蘇聯經驗，結果，農作物都減產了，大批糟塌了，群眾大為不滿。”

“現在工程質量很低，我有一個妹夫講了蘇聯冬季施工經驗，他說這個經驗使房子只能保持十年。”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郎寶田）

“我國外交政策，不是獨立的，而是蘇聯說什麼，我們就跟着說什麼，蘇聯放個屁也是香的。學習蘇聯，就是媚外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生 楊森達賴）

“中國的專家不受重視，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們，你們有沒有民族自尊心，你們是否團結全國人民建設祖國。”

（中國人民大學 蜂蜂大字報）

“我曾和學醫的同學談，他們說我們社會科學向蘇聯學，自然科學却未學，目前協和醫學院水平蘇聯根本沒有。

還有組織療法根本沒用，無痛分娩法還是痛的啦，這是亂用沒有科學根據，教條主義、迷信者專門宣傳，在學蘇聯上是毫不批判的，對這點我非常反感。”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林希翎）

“……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條主義者，（應當指出，我們這些中途參加中國人民大學的老教師，在人民大學的學風陶冶下，也都多多少少變成一個教條主義者了，所以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條主義者一個名詞，也包括我在內。）不但迷信馬、恩、列、斯，同時也迷信蘇聯。中國人民大學是以學習蘇聯起家的……但是，學習蘇聯，並不等於迷信蘇聯，而我們的缺點，還是在學習蘇聯的時候，迷信了蘇聯。這種迷信的表現就是以為蘇聯在一切方面都是世界第一，只有蘇聯可學，其他各國都不可學。這就使我們變成一種眼光如豆的人，視野中只有蘇聯。”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教授 吳景超）

“苏联学术討論沒有我国自由，容易一棒子打死。苏联人的性格死板，缺少人情味。苏联巴蕾舞和美国大腿舞沒有区别，只是国家不同罢了，我們大多数人只是盲目的喊苏联好。”

（北京政法学院 陈守銘）

苏联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例如千島群島苏联占有；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經濟合作是苏联破坏它們的經濟独立，苏联在第二次大战后随着軍事的胜利在东欧造就自己的势力范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經濟不能独立，是苏联的操縱，苏联在中国对中長鉄路的占有，新疆石油公司的开采，以及紅十字医院在中国的設置，这是对中国經濟的掠夺、壟断和文化侵略。”

（山东师院 支勒韜）

“一个陣营應該有中心，但不是苏联和中国，应以各国領袖組成的主席团为中心。苏联自命为中心是沙文主义，而各国提苏联为中心是宗派。”

（北京矿业学院 邓克义）

总的看中共有教条主义和馬克思主义都很多。但从国家一些重大事件看，則光教条的襲用苏联經驗，犯了重大錯誤，然后再动思想結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达到‘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这就是說共产党中国三害产生的外部因素。”

（北京大学 严仲强）

“对苏联学习我是怀疑的，过去亲美，現在亲苏，学习苏联只是学习一套統治人民的方法。”

（蘭州大学 田昌文）

“質問学校：为什么要对我們（未来的文学工作者）封鎖（表面不

封鎖實質上是封鎖)西歐文學!為什麼中文系西歐各國文學講授時間只合俄羅斯一國文學的一半?為什麼對世界大師巴爾扎克、拜倫、雪萊,如此冷視(合起來只講一大節)?!而偉大的世界天才:狄更斯、薩克萊、哈代、斯當達爾、羅曼羅蘭、易卜生、安徒生……及無數世界第一流作家竟連提一提名子的資格也沒有!嗚呼!這些大作家不幸,沒有誕生在斯拉夫民族中間!

俄羅斯文學教學直搬蘇聯一本庸俗機械透頂的、充滿大民族沙文主義的、宣傳、吹噓的教本……

我們呼吁:對世界各國文學給以公平的估價,反對看到……斯基、……諾夫、……娃、……娜就奉為羲皇上人!”

(北京大學 薛鳴時、秦學銘)

附 录 一

“吳校長經常不到學校，為什麼？年齡大了。不能干可以不干，干就像個干的樣子。胡校長是教條主義，不論黨內外都認為胡校長是非常濃厚的教條主義者，主觀之後變成了官僚，官僚之後變成了宗派。聶校長蔑視憲法，有一次開大會說憲法也能靈活運用。大家都按憲法規定，遵守憲法，敢靈活運用的，我看只有拿破侖和袁世凱。鄒校長在一次報告會上說，‘像我們當校長的，也行也不行’。這話是多餘的，如果我說：‘我可以當列寧，也可不當列寧；可當希特勒，也可不當希特勒’，這就糟了。有人說不要假設，這是古希臘辯證術中的唯心觀點。

系主任（指徐偉立——原編者注）常講：‘看看，說生活不好，比國民黨時候好多了’。這完全是詭辯。我說她的官僚主義無窮大。加薪、評講師得憑成績，我的著作一月廿四日交給系主任，但直到五月還未退回，她就只知道這兩個黨團員，那兩個黨團員，實現其宗派。她已經不可救藥了。她還對我說：‘你的意見對我教育很大’。我教育她？我要教育她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社會科學我還可以教她三年，她根本不了解中國古代是士大夫階級統治的。技術學教研室的丘嗣法、蔣錫生本來都是很好的青年，都被她越教育越壞，誤人子弟，對知識分子一律陷害。”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王德周）

“我校是一個有一千多個教師的大學，我看這不像個大學，倒像個收容所，形成有飯大家吃，有事無人做的怪現象了！有的人辛辛苦苦過份疲勞，有的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是平均吃飯，不平均工作，這違反了按勞取酬原則！”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教授 許孟雄)

“取消挂名的吳校長”

“目前我們國家里，很流行一種名義長官制度，這個制度幾年來，為大力培養官僚主義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我們吳校長就是這種制度下培養我們的典型的官僚主義者，身兼數職，無暇全顧，面面不周，一事無成，校長數職，四面八方出路不明，這樣一來名譽長官制度應該拆散，挂名校長你不應干。”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 如冰〔化名〕大字報)

“吳老，吳老，成了人大字號。

原則指示，大事報告。是榮譽校長呢？還是具體領導？

不知何故也，請問校領導，有名無實，令人莫名其妙。

夜見春城，見影不見人，上邊樓板響，下面傳雷聲，

一年一度難見面，猶似牛郎會見織女星，領導呀！

吳老到底起何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 大字報)

“咱們的吳老，兼職可不少，大約十來職，怎么干的了，

* * *

到校快一年，一次沒見着，校長不來校，怎么領導好？

* * *

要干就來干，不干就拉倒，挂名的校長，的確用不着。”

(中國人民大學 劉清、王光)(大字報)

“我們校長所以是吳老，因為他是中央委員，我看是為了牌子硬，實際是挂個名，我看能干就干，不干就算了，何必囉嗦，另找個名符其實的校長。”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 吳祥瑞)

“首先應該去掉几个付校長。我們要那么多付校長干什么?!他們不懂业务,不知道干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外語教研室付教授 汪同祖)

“鄒校長压制民主,一棒子打死群众意見,我們統計系和工业經濟系同学为了毕业考試問題,联合起来选派代表去見鄒校長,以真誠态度商議这次重复的沒有意义的毕业考試,希望他能講清道理,但是,答复是什么呢?!除了講些不是以說服人的道理之外就是这样的話:“考兩門党委已經决定,学生大家起来我就答应減一門,那我就不是共产党员的立場……”“……这一点我堅持不变,这是我的态度,到高教部去請願还是不能減下来,你們回去安心整风”(注:我們根本沒有請願的意思)請大家評一評这是什么态度?是什么立場?整风要不要搞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 王鴻敏、李家国、馬玉森等)(大字报)

“党领导教育的經驗是不够的,因为从前都不是办教育的,老教授有經驗,應該吸收他們和学生提意見,最好的形式是学工人員代表大会。”“我們学校的领导人,除了吳老是个老教育家外,其它三个党员副校長都不称职。”

“我們学校最根本的問題是培养出来人材質量低,不符合国家要求,而学校领导上都存在着优越感,認為是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校系领导上对学生是老爷态度,对教員是官僚主义,系领导人生活好好的,工作少少的,工資高高的,和学生比是兩個天下,其实沒有系主任,有教員我們也能学习,他們不关心学生的疾苦,他們还不如过去的某些老教师。系主任們不是真才实学的人,他們也不一定热爱农业經濟专业,所以学生很难树立专业思想。专业課枯燥、無味、不吸引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李民堂)

“建議上級考慮委派一位學識淵博，有教育經驗、有道德修養的非黨學者（不一定限於我校的教授）來我校當校長，吳老身體條件，實際上已經不能擔任這項職務，只掛個名義，嚴格地說（如果共產黨願意嚴格些的話）是辜負人民的委託的，這樣有助於改變過去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風氣（我並不是說，吳老當校長助長了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就我本人來說，我是尊敬他老人家的）。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我校學術空氣稀薄，單純強調政治不當，不重視政治就挨批評，某單位沒黨員，硬拉個黨員學生作主任。”

“蘇聯大學的系主任是教授，我校為了好看，也把系主任升為副教授，為了撐門面，不實事求是。”

（中國人民大學俄文教研室講師 陳用權）

“安崗好自吹自擂，放空炮，要兩面派……

關於課程問題，安崗第一次對我們說，授課是因材施教。現在實際上是教條主義的施教……教學改革要求獨立思考，這是個形式……由於教條主義施教，我們幾乎也變成了小教條主義，考試光是背誦。許孟雄的話也有其一定道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王廷煌）

“反對招生工作中的宗派主義”

“一不是黨校，二不是團校，為什麼每次招生黨團員比例要近乎百分之百，都一樣是大學人大為何要這樣特殊，請領導注意，全國黨團員才3,500萬，六億人民中才6%。”

（中國人民大學 肖如炎、楊蔭環、高松青）（大字報）

“呼 聲”

“工農難，工農難，得不到照顧受埋怨，不信請看：

学不会，没人管，思想精神受摧残，人家还骂我们是笨蛋，
校领导，有奇难，认为工农学生就笨蛋，不信请看：

喊头痛有困难，校一方一律叫复员，
校医室也不善，不能治病病复攢，
人事处不平凡，按照病历来动员，
先是硬，后是软，
直到送出校门才算完，
回忆往，真香甜，
教育面向工农大宣传，
看今昔，真悲观!!!
新规定，入学难，
助学金，把你拦，
再恐入学难上难！
难！”

（中国人民大学 难人〔化名〕）（大字报）

“人大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三部曲”

“一、宣传党的教育政策时，大声疾呼：我们向工农分子开门！

二、招生时是工农分子吗？欢迎！欢迎！！夹道欢迎！！！”

三、工农进校学习困难叫苦，人家说你们工农笨蛋，名义上照顾，实际上扯蛋，节约精简缩减人员在学生中开刀，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工作，请你们复员返回原籍生产，造謠么？非也，非也，有名单为证，我们班现是二年级，有复员将军三名：

高之申（头痛？）甘泽英、孟庆洪
……长此以往，唉？……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1.人大不是大学而是十足的党校，70%党员，30%团员。

2.招生工作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只看档案,不看卷子,只要党团员,不要群众。3.欢迎领袖、当标兵只准党员去,连团员都不准去,有时人数实在不够时才叫团员去,群众更不必说了。4.学校领导专门培养同学宗派主义情绪。”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若繁)

“我校招生工作中严重的宗派主义”

“为什么55年录取的工业经济系200多名的新生中,只有二名群众,其余全是党、团员,是否报考的群众中只有二名够录取条件,我校是‘党团专门学校’呢,还是中国人民大学,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是造成部分学生质量不高,程度悬殊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钟溶华)(大字报)

“试问学校当局:

人民‘大学’为什么初中毕业程度的教员能当付教授,高小毕业水平的人当大学生、为什么又要招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人,我们认为人民大学根本没有条件招高中毕业水平的人,更没有条件招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中国人民大学 大炮〔化名〕)(大字报)

“人大是四不象,是大学的招牌,中学的资格,小学的水平。不合格的教学人员应调职,人大应与北大合并,取消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郝正宇)

“我校不象大学,象训练班……学生是试验品……”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赵毅)

“人民大学这样发展下去会发生危机,社会上对人大不感兴趣,人大要建立社会威信,不应大吹牛,这关系到培养目标与发展方向有

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學生 方炎火)

“人民大學都是培養死心踏地跟着共產黨走的人。人民大學是糖衣里包着的炸彈。”(糖衣是指的名字與同志們之間虛偽的關係，炸彈是指的黨團員和政治空氣濃而言——編者注)并罵我們學校里的黨團員手中都拿着“宇宙鋒”，說：“人大黨團員多，我主張把人民大學取消掉，分散到各個大學去。”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義教研室資料員 崔志敏的材料)

“人民大學已經到了很危險的時候，挽救這種危險的辦法是吸收過去辦大學的經驗，招聘一大批老專家，總之要按資產階級大學方向改造。”

(中国人民大学歷史系講師 盧晷持)

“人民大學招生特殊化，變成一個轉業軍人訓練所，高干愛人訓練所。學生的質量知識不齊，有很多小學初中程度的人。人民大學培養的人材質量很低，教學計劃也死搬蘇聯的教條，政治理論課多業務課少，教員也是不懂農業技術。過去一概否定舊中國的東西，照搬蘇聯教學經驗，盲目一邊倒，把資本主義的東西當成禁書，對蘇聯只談經驗不談失敗教訓，盲目崇拜蘇聯。”

“中國人民大學教學上危機了，幾年來基本上是失敗的，要說成績只能說散布教條有成績。人民大學不僅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而且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大蜂窩。”

(中国人民大学計劃系學生 東洪濤)

“人大是彌天大謊。研究生是騙人的招牌。研究生是‘二不象’(即不象本科也不象研究生)，他們是‘五不管’(即黨、團、工會、系辦公室和教研室不管)的‘孤兒’，被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糟塌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周育才)

“月兒弯弯照九州，几人約知道我們愁，三年時間混过了，腹中收获有几何。

× × ×

月兒弯弯照九州，你看約这个收容所，几个教員配講課，專門生产‘万金油’。

月兒弯弯照九州，官僚有眼看不到，誤人子弟罪孽大，还夸約我校第一流。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坚决、徹底、全部消灭‘三大主义’”

“亲爱的高高在上的校長先生，你不問一切，只管發号施令，命令第一条第七条……，内容是記过处分，甚至于勒令退学。

亲爱的高高在上的校長先生

你什么也不問就爱听下面少数人的反映，命令通知繼續有，还有……，内容不外是調剂助学金，甚至于吃飯也要分。

亲爱的高高在上的校長先生

你只閉着眼睛还在台上吹嘘說：‘我們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財政系学生 容听)(大字报)

“人大是大学招牌，中学教員，小学学生，幼兒園管理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朱华荣)

“人大 人大 你的民主有多少？

要說話

只能搬教条

意見多

就是反领导
說不‘对’

一切肉麻的字眼往你头上套。

× × ×

人大 人大 你的民主究竟有多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輿論〔化名〕)(大字报)

“人大呀！

还是不挂羊头卖狗肉好！

挂羊头卖狗肉本是富人气，可是手屈一指的人民大学也学会了吹牛皮。

說自己的瓜兒甜，說人大是天堂，有富丽堂皇的教学大楼，詩一般的校园，燃起青春烈火的社团活动，激情的歌声荡漾回旋……，不用多說，总之比伊斯蘭教的天堂还要富丽堂皇。

我一走进海运倉的大門事情就完全兩样，虽然沒走进地獄，也不是走进了比伊斯蘭教更美的天堂，我不是惱恨海运倉的校舍不好，而奇怪党亲手創办的人民大学也学会了欺騙、吹牛。”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党领导階級斗争有办法，但办大学应当承認不太会，毛主席教导，不懂要虛心学习，而人民大学的党委有沒有虛心地甘当小学生作风呢？我們建議今后吸收一名非党有經驗教授担任付部長，来取長补短。”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过去說‘毕业就是失业’，現在說‘毕业就是完蛋’。为什么？你听！这里即將毕业的同学大声喊叫：‘我們学的不多，而只又是教条。’你看，那里捧着肚子并指着說：“我們究竟有些什么，还不是空空如也”。

怪不得有人这样过火地太过火的叫道：“虛度四年青春。”

怪不得有人这样公开地写着：“誤人子弟。”

我不能不同意，这决非延長多学一年就能解决問題，这决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把問題搞清，为什么？回答很干脆，这里是‘教条主义大蜂窝’。”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入学已經兩秋心發愁，

葱葱蒜蒜啥都有，

毕业后

不折不扣还是‘万金油’。”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請問校首長們：

你們假如沒有‘能力’提高教學質量，就干脆把我們分到其他大學去吧，我們不願意在學習質量如此低的‘大學’里浪費青春，假如你們既不提高質量又不把我們分走，那我們即將告別人民‘大學’

首長們，千言萬語說不完，希望接見我們。”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學生 爪（化名））（大字報）

一、一陣深長的回忆开始了……

帶着神奇的眼光，我和同學們翻閱着人大的招生簡章，工業經濟系物理化學啊，真象個工科呀！難道這些理化實際是指中學水平嗎？如果是這樣，那簡直是種公開的引誘。

進入招生考場，說實在話，我們幾位應屆畢業的，都在一小時內交了卷，地理問題簡直是稍為注意閱報，就能考得很好，這樣考題引起了我們懷疑，難道人大確實收高中水平的學生嗎？如果這樣簡直是欺騙，這難道是一場夢啊，幸好中國人民大學×耀的介紹，駭人聽聞吹噓，使我們獲得了暫時的安慰。

二、且說地理課的內容，它與高中相差不久，老師坦然地說：這個地理課呀！也只好當作一次複習罷了，我們心情突然感到沉重，一時

精神被压抑得难以振奋，到底这是什么理由，要我們在这里浪費青春，說校領導是否意識到在浪費我們的青春就是浪費我們年輕的生命……接着得訊理化果然是高中水平，這使我聯想到報考的那瞬間所猜疑的人大招生簡章那種騙局式的介紹，虛假的手法，已被生動的事實所證明，在輿論的壓力下系領導開設高等理化，靈活的辦法应付了這種輿論的壓力，而理化的內容奇怪又是動人，內容較深的地方，全被刪去，平常的習題被××地宣布可交可不交，請問系領導到底搞什麼把戲，我們這些高中畢業生，跨進了人大走進了官僚統治的世界，夢的世界，夢……”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 大字報）

“學府似衙門”

“（一）人大不象學校，象衙門，校系班層層首長，是最被人重視的，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因為他不是‘長’就得不到重視。

（二）本校傳達室等服務部門，不能為同學們服務，千里而來的復員轉業軍人，來找他的朋友——我們的同學，傳達室竟置之不理。

（三）學校分黨、團、群，助學金也分二、三、四等，造成宗派主義。

（四）系里對待分配同學的專業存在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對有專業思想的同學不進行說服教育，而是一概不接見的態度。

（五）學生會的職責應是監督黨、團、行政的工具，可是學生會成了什麼？往往是受黨的支配。

（六）考試的問題，不應一學期算總帳，應一學期分二、三次檢查，課堂討論流於形式，應改成實習課的形式。

（七）四大理論課應合并和精簡。

（八）應開辦補習班（數學、化學）彌補因學制不明確而帶來的損失。

（九）高等學校的師生關係好象隔了座大山。”

（中國人民大學 大字報）

“好一个衙門”

“(1)照章照令办事，把高教部、中央看作上帝。

(2)机构臃腫：

1.教职員工胜于学生，真是：它門無所見，‘工人家屬遮平原’。

2.人大校舍布滿北京城，西郊，鉄一号，海运倉，鼓楼，九条，六条……。

3.部門何其多，有大学，夜大学，函授，速中，补习班……。

(3)太上皇的工作法：只听干部反映，不动腦筋。

(4)一人多官制太严重，挂名系主任成年累月不見人。

(5)聖旨多，朝令夕改。

(6)参考資料室象杂货店，供之無求，求之無供。”

(中国人民大学 同 鳴〔化名〕)(大字报)

“天高云淡，望断末名湖畔，不学北大非好汉，登上整风战綫。人民大学蜂窩，教条主义太多，今日整风开始，何时三害下坡。”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呼 吁”

“衙門內老爷高唱清調，培养出来学生‘質量高’

君子声言道：

要学生独立思考，——質量高老爷們眼睛了！

派来了‘庸师老’

課堂上不会講，只会念講稿，反要求学生質量高。同学提个問題

你鑽錯了。

借問此人何处有？

人大教師任你挑

老爷們把我們塑造成什么人？——是專家或是糞草？

‘專家！專家！’

請問專家誰打保，如果这样混一下，倒不如回家劳动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舒〔化名〕)(大字报)

“同意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的意见。

主要表现是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上，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没说的，教员不敢说，中央一说(即有了结论)又马上抱着‘结论’去找论据，其实是把开展理论的工作，全归结为中央的事了，将来电子计算机能为中央作传话筒的话，也就可以不要教员了。”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人大入学须知(告新生)”

“一、‘人民大学’的‘人民’是形式，‘共产党专政’是实质。所以‘人民大学’应叫‘共产党专政学院’。

二、开会发言第一句必须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

三、毛主席号召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我们的战斗口号是‘政治第一、学习第二、身体第三’。

以上三点为‘人大’学生之基本准则，不可越轨。”

(中国人民大学 哭声〔化名〕)(大字报)

“趣味的教学，难题解答”

“问：试求人大学教师和付教授质量。

答：此题有二种解法：

(1)设人大讲师为X，求证 $X = \text{小学文化程度} + \text{共产党员} + \text{资格老} + \text{念苏联专家讲稿三年}$ 。

证明： $X = \text{‘教师’}!!!$

(2)设人大付教授质量为Y，证 $Y = \text{初中水平} + \text{共产党员} + \text{在求苏联专家领导下念讲稿三年}$
(讲课念不成声，语不成句)

証明：Y=‘付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化名〕)(大字报)

“欺騙来强制学，在专业介紹里，說档案系分档案、党史兩专业，現在还不更正，有的被迫輟学，有的橫遭批評，开不成干脆拉倒，何必玩花招戕害青年，高教部对此裝聾作啞，一体同罪！”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大字报)

“挂羊头卖狗肉”

“挂历史档案系，卖档案系。挂請考党史专业，卖只准学档案专业，挂培养档案高級人材，卖机关的文書登記員。”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大字报)

“官僚主义搭成的架子，教条主义填滿的肚子，披上政治理論第一，教学与实践联系苏联經驗与中国情况相結合的中国牛皮大衣，就是这些構成的外强中干的新型社会主义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法律专业”

“名曰专业，实無分工，只博不專，不精而迎！
民刑，訴訟，国家，行政，門門都学，样样稀松！
毕业之后，如万金油，医治百病，就是不灵！”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野夫〔化名〕)(大字报)

“一年級慌慌張張，二年級穩穩当当，三年級幌幌蕩蕩，四年級吊兒郎当，五年級在床上……”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述)(大字报)

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方式：秘密警察追踪！！公安人員搜查！！警

祭式的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贈給教条主义大師們”

“見鬼，五年制，活受洋罪，青春被浪費，人民幣下了水，有沒有必要甬管，千萬要同苏联統一，教条主义大師的杰作，不用烈火今生也难燒毀。”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學生 吳填宗)(大字报)

“中国人民大学培養學生‘三部曲’”

“夸大宣傳，引誘而入

→萬金油專業，所學無術

→畢業分配，無出路 哀者！”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廣告欄

商 標
天下第一

商 品 介 紹

本校出產各種教条主义牌商品，欲購者從速接洽。

電話：123456

總店：北京

分店：全國各地函授店。

吳記中国人民大学文告世界

—— 馬九廣告組 ——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人民大學的主要缺點是黨員太多。”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員 李鶴亭)

“人大學生一般原有水平較低，不是正規大學。

我們學校領導方法不僅是行政式的領導，而且是軍事式的領導。”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 趙作燁)

“我校主要矛盾是教學質量不能滿足同學要求，其原因是：(1)對老教授的信任與使用不夠。(2)老干部文化水平低不能勝任教學的領導工作。(3)青年教師的根底淺，知識面窄。解決的措施是：(1)應當發揮老教授的作用，把他們放在教學與科學研究的主要崗位上，我校還應當多聘請一些老教授。(2)老干部應離職進修去補習文化。(3)青年教師也要半年教書，半年補習文化和其他專業。標準是要達到舊大學畢業的水平。”

“我校‘重政治，輕業務’以做官眼光和行政眼光辦學校。”

(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講師 朱澄平)

“我校宗派有二個標識，一個是黨與非黨，一個是第一批教員和以後的，因此校外有同志發言說自己是四等公民。在教學上亦分四等，一等是第一批黨員，二等是第一批非黨員，三等是青年教員，四等是老教員，另外在教學效果考察上，一、二等好也好，不好也不錯，而三四等教員好也不怎么，但不好更糟。別人教得好說同學要求低，別人教得不好說同學程度低，所以很少在一個地方找到公平，因此沒有人敢說話。”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 韓光遠)

“我校教條主義雖然比其它學校嚴重，但宗派主義更嚴重。幾個校長都是黨員，這是宗派主義的客觀基礎。起碼有一個校長是民主人士，才能減少宗派主義。吳景超可作計劃系主任。我校新提拔22個副教授恐怕沒有一個黨外人士，評副教授時黨支部書記先動員，實際上起了打手的作用。學校的論文是按人評，領導和黨員的論文就在大會上報告。在留蘇、評級等問題上，黨員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黨員犯錯誤在黨內批評，群眾犯錯誤在大会上批評，待遇不同。宗派主義很嚴重，所以學術空氣不濃，群眾對科學研究情緒不高。”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助教 王鉄生)

“人民大学是个党员很多非党同志很少的一个大学，所以党群这座墙就很难推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付教授 汪同祖）

“我们学校特点只能是教条式搬苏联材料……”

“人大不是在办学校，而是在开玩笑。不仅没有成绩，是乱凑一堆。能说是学院？有什么有体系的课程？学生有什么学习方法？教员都不会作论文，所以也取消同学的论文。”

“人大缺点是主要的，所以取消也没有关系。”

现在学校根本问题是领导水平低，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授 陈文镏）

“人民大学不是我的大学，是党员的大學，是所谓优秀团员的大学，党就是相信少数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魏式昭）

“我们学校不象学校，象行政衙门，学校领导在业务上不是内行，而且还陶醉在这个不内行中，以为不懂业务也可以当主任，也可以提拔，这就是造成我们业务水平不高的矛盾。学校的一套行政工作把学术空气压死了，我应呼吁这些行政衙门式的工作制度，从学校清除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黄守礼）

“人民大学宗派主义最严重，人大过去有两派，革大派有杨化南、胡锡奎等，华大派有成仿吾等，前者是打游击的，后者多是知识分子。”

“有人说，北大等学校象机关，我说我校象军营，上边一下命令，下边照办，不动脑筋，没有一点学术讨论风气，比北大等差的很远，学校常以党团员多为自豪，其实这不说明什么问题，衡量同学主要是他

的业务知識水平，而且其中很多党团员，也不是我校培养的。”

“外边有人把人大看成是訓練班，培养小学毕业政治水平高的人，究竟外边人如何估价我們学校，是值得考虑，因此我对我校前途担心。如果单独招生，能否招滿，有怀疑。”

“有人說，人大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这話有一部份真理，人大毕业的学生到别的学校动辄搬出人大的讲义来刺一些老教授。”

“同学不独立思考，教員也如此，去年中央提出百家爭鳴后，我校几个月中都是默然無聞，一池死水，好象在我校沒有問題，我說城內三个党员教授壟断学术，而且勾心斗角。”

“沒有学术空气，是与领导不懂业务有关的。”“领导只会下命令，填表格，例如不管什么表格，前面总要填上：性别、年龄、教学经历，政治面目等等。不懂业务要领导就要犯主观主义。用政治吓唬人。如果不改变，还繼續下去，人大的前途不光明的。”

“校外有人反映人民大学有特权，例如一个财经学院院长是非党员，不能参加人民银行业务會議，而人大的一个助教却可以去。”

“毕业的許多同学对人大沒有好感，但领导却在以‘培养了紅色專家’自慰呢。”

“学校干部政策有問題，北大的教研室主任許多都是外国留学生，可是我們学校教研室主任是什么样？学校派主任是封党员来作行政官員？还是作学术领导？刘国勋怎么能领导科学呢？为了發展科学，必須撤換这些领导，否則三害还不能鏟除。”

“大学对工农開門的政策我不理解。50年招来的有些半文盲只好去补习，补了几年也不行。据了解去年預科許多人是五分，但用的課本是小学四年級的，这样出来升大学有問題，又听說工农速成中学今年毕业的將有二百人直接升入人大，我建議慎重考虑，要考虑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孔 釗）

“只要你留心觀看，就会發現校领导沒有長期办校的打算，片面

强調節約，破磚瓦房到处來翻過，各系各班，城里城外亂搬遷，實習設備都零亂不堪，一分講義要十來個人傳看，大政方針不確定，好像一個大兵團。

校長、部長、處長、科長、股長、組長……層層節制，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實在無法計算，有事就等因奉此，不知什麼時候才周折完，任人唯資，才華不得顯，雙簧專家當助教，本科畢業生就把主任當，學生問題出現，就用制裁辦法管。大官高閣坐小鬼撐大權，班長亦團任命制，黨團支委選舉也要事先去圈點。可以，可以。好像官僚一般。

情長紙短訴不盡，千言萬語說不完，号称‘最高學府’之中國人民大學被辦成一個兵營，官僚衙門樣，實在令人可憐又可氣！”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王樹人）

“人大在招生時到处吹牛，如把劉少奇、朱德的照片登在招生專刊上，同學們都以此而羨慕。招生時也說人大是培養紅色革命幹部。但來了後一切都不好。對學校發展方針不明，自己感到悲觀；由於方針不明影響到同學們的学习。清華、北大是‘萬丈光芒’，人大是‘暗淡無光’。”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范書謙）

“(1)人大使人未進來、進來、出去三種心情，即希望，失望，一無所有，辦得不好：

①衙門化，干門多；

②制度不合人情；

③官氣十足，學風全無。表現在主任，×長吃香，教授吃不開，同學只想出去當官，所以說人大政治水平高，是不合乎實際的。

(2)黨委領導學校是對的，但包辦太多，一直貫徹到班內。

(3)等級觀念比任何學校都嚴重，等級已到完全沒有人情的地步，如听報告分等級，睡床、住房也分等級。

我們不能用妥協的辦法與三害進行鬥爭，談心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1)我们学校确实象兵营，学术空气很差，把同学当小孩管，领导人都没有学术味道。

(2)我提倡分专业，我不愿当万金油干部，黄守礼(右派分子——编者注)老师的方案可作为讨论的基础。五分制是硬搬教条，笔试也不好，我主张十分制，百分制太细了。

(3)打击报复现象仍然存在，所以我建议制定一条法律，有了法律保障，人们就可以说话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張殿鴻)

“人民大学‘三不象’(大学招牌、中学教员、小学学生)”“人民大学靠四大理论吃饭，而四大理论实际上是教条而已”“人民大学不如旧大学，越来越落后。培养研究生是误人子弟。”“人大教条主义是机械学习苏联经验，不重视教育传统的结果。”他主张重新审查学制(改四年制)，让人大法律系与政法学院合并。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吳家麟的材料)

“培养提拔干部不是根据学术水平，多是看政治、党龄和是否担任领导职务，如提副教授，便是这样奉命封的銜。人民大学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学校，排斥旧教授。”

“学校领导上常常自吹自擂夸耀成绩是主要的，根本忽视了缺点的严重性，这就太成问题。

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非常机械和教条，对苏联的东西不敢动，虽然对苏联专家和苏联的教材有意见，领导也不准提，没有认真贯彻中央规定的建校方针。”

他污蔑我校“惩办主义严重已极”

他污蔑学校培养过渡性研究生，进修生及正规研究生是“误人子弟”。

他谩骂“我校的各部，都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学校的党团工会是

官僚主义的組織系統。

挑撥其他各系与四大理論教研室的关系,他說:“領導办校偏愛所謂四大理論教研室,各方面都給予照顧,仿佛它們是長房嫡子,而对別的教研室,尤其是法律系各教研室,則非常歧視和輕視,仿佛这是偏房生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王向明)

“我校学习方向、內容不明确,因而学习以后做什么也很糊塗,学习中不能全面规划,学习三年,学过的課程現在都忘完了,脑子里空空洞洞,四年毕业,学的东西不多,現在感到很懊喪,不应来人大学习。不来人大在机关学习也成。”

“教課方法是輕重顛倒。”他还認為学校不民主,說“学生会干部都有点裙帶关系。跟誰好,即任命,系里也是这样。学校里沒有民主,班長,班主席任命或只在形式上选举,形式上的选举比任命更可惡,因为他有个选举形式来掩蓋,有的干部已成为終身制了。”又說:“助学金制度不合理,是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人为的制造学生間矛盾閥等級。听报告分級別是人为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楊盛元)

“人民大学办的走了样,象游击大兵团,象个官僚衙門样。”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馬 良)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个龐大的官僚机构:(1)行政管理人員,多的用得不得,教員教的不好,水平低,有些不合格的教員,拿我們做試驗品。(2)学校領導和教員与学生中間筑有一道万里長城。(3)学习計劃也不講給我們知,只好以学校开什么課,我們学什么,結果是培养出万金油干部,白白浪費了青春,誤人子弟。(4)人民大学是最高学府,但肚子空……几年来沒有写过好文章。(5)我校沒有一个配合学习的刊物,‘教学与研究’是老爷式的刊物。‘人大周报’是狗屁式的。(6)課

堂討論是我校的萬靈丹，是唯一的好方法，實際課堂討論，說不出什麼東西，沒有收穫，這是死搬蘇聯的西蒙納爾的辦法。”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 韋 齊）

“人大的行政幹部對待知識分子是秀才碰着兵，有理說不清。”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付教授 汪同祖）

同意許孟雄把人民大學誣蔑成“教條主義大蜂窩”。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楊瑞清）

“我們學校是誤人子弟，在我們學校學習是虛度年華。”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生 馮 海）

“學生水平低，國家機關有的不承認人大畢業生是大學生。人大教師大部分只配做學生。人大是大學招牌、中學內容、小學教學方法。”“人大辦糟了，人大領導無能，學生及教師水平低。宗派主義嚴重，又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人大政治空氣濃厚，但教條主義更濃厚，不聯繫中國實際，連思想實際也不聯繫……”“學校越辦越糟，吳老要負責，重大事情，他不過問。”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李錫三）

“黨辦高等學校辦糟了，黨直接辦的中國人民大學也辦糟了。解放前沒聽說那個學校那個系辦糟。”“培養教授是將念過初中一二年的人跟專家念過幾本小冊子完了就成為專家教授。有的三四十歲的老幹部，硬要培養成紅色專家，可是人大培養的質量非常低。”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李萬昌）

“人類有了文化遺產，就開始有教條主義。人民大學崇蘇是教條

主义之一，由于先天不足知識貧乏，脫离群众，就使教条主义伸展。”

他的意見要合并到北大，因为我系是“‘夫妻老婆店’，系主任、教員質量低，沒有历史、外文專業等”。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人大威望大，但名不符实，有人認為高不可攀，有人認為乱七八糟，象訓練班；什么都收。我来前，認為政治質量高，但来后，每个同学都是利己主义者，学习不关心……”

六月五日他更写了題为“思乡曲”的大字报，謾罵高教部，企圖鼓动同学在助学金問題上对党不滿，其文称：“离家一載念乡亲，近聞助学金停發，念家之人失望悲伤，請問高教部長們以及随从人們，你們那一个沒有双亲，沒有妻郎，为什么對我們穷学生这样吝嗇。”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毕毓琦的材料）

“我校的校风是一片陈的沙漠，一片死水，学生过的是高級小市民的生活，無聊是調干学生調来的。調干生死气沉沉，想的是出校后当科長。中学生是先进的，生气勃勃。中国的青年，有出息的很少。”

（中国人民大学統計系学生 周紹杰）

“人民大学不象个学校，倒象个教条主义的蜂窩。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却是去散布毒素的，并且散布的很广。如果說人民大学有功的話，就是散布了教条主义，这种‘功’繼續下去，就会变成‘罪’了。”“我說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蜂窩，毕业生未必是蜜蜂，可能是黃蜂，飞去不能采蜜，只能刺人，为什么說刺人呢？因为他们可能用半部馬列主义治天下，对地方用教条主义武断独行，为害不淺。学校似乎实行長子主义，对四門政治理論課太重視，双倍寵愛。家兴是長子，家敗也是長子。”“外国語学院是个教条主义，我到人民大学又是个教条主义，真是从油鍋里跳到火坑里了……現在我不想跳了，我要‘鳴’，我要斗争。外国語学院就是搬，而不联系实际，所以王明与毛

主席斗争的结果，王明胜利了。到处都充满教条主义，只有毛主席是正确的。馬列主义著作中说：历史上各社会都有毛病，最终，最终要用新的社会解决，可是到了馬列主义，都认为什么毛病也没有，斯大林利用此理论作了許多坏事……今天道德成了真空的情况，应该建立新道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 許孟雄）

“人大很大与他处大学不同，师生之间冷若冰霜，由于机构庞大，故带来官僚主义。这可能与官僚主义领导分不开。“鉄三号紅樓外欄杆档上，門关上，怎能見上那第一流等級的人呢？”他把学校的人员分为三等，“在紅樓住的是第一等；职员是第二等；学生是第三等人物”。又说，“人大的官僚主义逐渐扩大。有人提出人大是难民收容所。这也（说得）較恰当。”又说：“人多不能起到好作用，反起坏作用。”繼轉而向系里进行攻击說：“根本不需要这些人，不要留在这里吃閑飯。”

“我們（是）学档案，并不是專門研究馬列主义。”又说：“目前高等学校中实行的考試方法，都是教条主义，这严重地束縛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因此必須加以反对。”他提出了“开卷考試制”。在大字报上他写道：“档案系設在人大，极不合适……單靠政治，單憑几个党员去办档案系是办不好的，不应重犯（指苏联档案学院‘許多缺点’——編者注），必須加以反对。坚决要求把档案系迁入北大。”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姜玉成）

“人民大学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自感荣幸；是否真正新型的社会主义？我同意教授們的意見（指許孟雄吳景超等对我校的誣蔑——編者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突出的感到教学上的教条主义。人民大学的工作簡直是一团糟。”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張維綱）

“我校办学方針有偏向，可分三部曲：第一部是学习苏联，但有教条主义，專家的發言成了聖旨，形成拜物教的形式，教員思想僵化，不

敢独立思考。第二部是狂妄自大，認為我校是全国唯一無二，从上到下都沾染了驕傲情緒。人大对其他学校影响很大，說人民大学是散布毒素的大蜂窝是有部分道理的，当然不完全对。第三部則是自卑和半身不遂。”

我系目前情况是無信心，究竟如何办从上到下都沒有一个底，有人心惶惶之感。”“我校可以說是三大主义的典型，学校中任务是教学，但培养目标不明确在建系时馬馬虎虎，实际上只憑專家一句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講師 顧 譚）

“我認為人民大学不是什么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是全国最出色的游击大学，無論是先生与学生都出身于游击干部……师生質量更比全国任何一所高等学校都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助教 邓松芳）

“我校教条主义表現最突出的是考試制度。考試制度是騙局，騙同学，騙国家，它本身是教条主义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教条主义的發展。五分制不能考查一个人学习成績的好坏，五分制逼人走教条主义的路。”

“我校培养的是‘万金油’干部，这是由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結合的結果，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搬运經驗和否定旧大学的一切的結果。旧大学之学习質量高，應該很好的研究与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經濟系学生 陈家驥）

“人民大学按馬列主义原則办，是教条主义，所以我反对。”他主張“把哲学系、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因为那里各派教授多，可以听他們講課。新聞系可以并入复旦大学，財經系成立財經学院。”他把人大比做（巴金写的）“家”，說“覺新（指人大領導——編者注）應該讓淑英（指要求并系者——編者注）离开这个破爛的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人民大学一开办就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教条主义，一面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源是由于学习苏联。宗派主义是由于党团员多，根源在党中央。”

“学校象衙門，而学术空气不濃，过份強調政治，学术次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付教授 汪同祖）

“人大宗派主义已經發展到党棍掌握了一批人，压制人家，党员象特务似的使人不敢說話。我們的学校是思想的牢獄，好象世外桃源中的一塊荒地，四周布滿着电網，監視人是党员。党支部做思想工作就是抓住不放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这还不够，然后还喝你的血。象这样就逼得你不能說真話只能說假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鵬）

“学校缺点是主要的。講成績是主要的多少年来有些自欺欺人。”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黃乃鵬）

“人大是衙門，不是学府。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策源地。”“我校有各牌万金油，工业經濟牌、农业經濟牌、貿易經濟牌、計劃統計牌、財政信貸牌、法律牌、适应性(?)服从性(?)良好，希各党团工会部門大力採購。”“只看档案袋，档案上事先就写了‘不予录取’字样，但又允許報名，豈不是白白浪費人力、物力；为什么要給党群之間造成这——堵牆。”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經濟系学生 唐 廉）

“我校也不象个高等学校，師資、学生都不够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还自吹自擂，真感到有些寒儉。自高自大还表现在不向外校学习，学校攤子很大，領導上照顧不过来，那一个系也沒有搞好。学校領導上不懂业务，不能从学术上領導学校，象訓練班、思想改造場所，不象

學校。”

“在貫徹中央政策上，也常是生搬硬套不動腦子，不結合具體情況……實際上是对党的事業不負責任的表現，只起了傳筒的作用。党的政策是好的，就是執行政策的人不好。”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講師 潘靜成）

“學校教條主義大本營把我們培養成唯唯諾諾的人，我們不是大學生而是幼兒園幼兒，但幼兒園還有阿姨說道理，我們只有命令。四年來是在半睡半醒狀態盲目的相信社會主義典型大學和蘇聯先進經驗，現在才清醒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學生 魏式昭）

“在我們學校如果你不是黨員就不想做個學生，游行示威，聯歡會都是黨管，當幹部不是黨員不能當。非黨員要當個學習班長很別扭。我們的黨群關係不如機關好，機關的黨員還與你談談問題，而這裡是扳起臉來幾句教條，在人大黨員聽的報告吸收團員參加的簡直沒有。個別黨員還叫人感到一種壓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學生 房文齋）

“我們學校領導是有職有權而無能。自己沒有辦校經驗，又不依靠中國專家。對蘇聯專家每一句話，就當做聖旨。學校的領導方法……一切都是命令。”在他看來，我們學校許多領導幹部都是“老爺”。

（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講師 葛佩琦的材料）

附 录 二

“兩 点 論”

“一、術語与概念：

目前哲學界的爭論，有一部份是屬於術語方面的，在这里，我想對於几个常用的術語的含義底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1. 同一与差異

在毛主席的矛盾論中說到的統一和鬥爭，是从階級鬥爭中借來的術語。現在這一对術語引起了一些誤解，我們相互鬥爭，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別的命題中，却不一定是這樣，比方說：白馬是馬，這是說，白馬与馬是同一的，但是，白馬与馬还有差異，所以白馬非馬也是對的，馬是馬或者白馬是白馬不过同語反复，毫無意義，所以在任何命題中，同一永远以差異为前提，又比方說你身高一米八，我身高一米七，這是差異，于是我們得到以下命題：你比我高，但是你身高一米八，我體重六十公斤，就不能比較，這是因為你的身高和我的體重沒有同一性，所以差異也是以同一为前提的，我們看到，在这里用統一和鬥爭这对術語，我們还并不習慣，再則，列寧曾說：統一是对应的，鬥爭是絕對的，這只能理解為統一和相对鬥爭和絕對是在質方面是相同的，相对与絕對是互为前提的，統一与鬥爭也是互为前提的。在这里絕對和鬥爭，是积极的一方面，相对和統一是消极的派生的一方面，只有在特殊条件下，統一和相对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理解為，只有鬥爭才貫穿了整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中，而統一只是一种短暫的現象。那就不对了，石头和戰爭沒有同一性也沒有差異，在抗日戰爭時，我們和国民党反动派搞統一戰綫，这时統一是对应的，但是不管搞不搞統一戰綫，我們和他們总是統一于中国当时的上層建筑，當我們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后，統一破裂了，鬥爭也完

結了，所以象斗争性一样，統一性也是貫穿于矛盾运动的整个过程的。

2. 对抗和非对抗

我們通常說的矛盾，有兩個含义，一个是指邏輯上的謬誤，比方說 $A=9$ 这和 $A=5$ 有矛盾，另一个是指对抗，比方說，政治与业务沒有矛盾，在我看来，这两种理解都是錯誤的，首先，矛盾不是謬誤，白馬是馬和白馬非馬不是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的，前者是这一命題的同一方面，后者是这一命題的差異方面，这一命題运用黑格尔的術語来表达就是，白馬是馬也不是馬，說得通俗些就是，白馬是馬的一种，但不能說所有馬都是白馬，这是不証自明的，相反的，如果認為白馬絕對是馬，就立刻可以导致白馬絕對不是馬的結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机械观与詭辯术本来就是同一体系的兩個方面，其次，对抗与矛盾的关系也象白馬和馬的关系一样，对抗与矛盾，但是不能把对抗和矛盾混为一談，就說政治与业务吧，当然有矛盾，政治教育不能代替业务教养，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差異，正因为如此，它們才是同一的，这表現为：离开了业务教养，‘政治’就会被关在封閉的积极份子的小圈子里，根本說不上什么教育，这一情况的反面表現就是，不問政治傾向的这一‘政治傾向’增長。有人說，政治妨碍学习，这难道不正是他們的‘政治’嗎，良好的学习效率与政治上的开展是互为前提的，这就是政治与业务的矛盾，这种对立双方正比地增長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矛盾，相反的另一種矛盾对立双方反比地增長，象雇佣劳动与資本。一方的加强以另一方削弱为前提，这种矛盾，叫做对抗性矛盾，任一特定的矛盾，或者是对抗的，或者是非对抗的，这就是我对矛盾的对抗的理解。

在人民内部，有沒有对抗呢，在回答这問題以前，必須首先分清两种不同的判断：实在判断和概念判断，我們說：‘白馬是馬也不是馬’，这是一个实在判断，‘差異与同一是互为前提的’，这是一个概念判断，实在判断只能是‘非定的’，这种非定性正是概念判断的‘規定性’的反面表現，这是說：只有实在判断采取不确定的形式，概念判断才能是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数学家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一开始

就确定 A 属于 B，那么就能証明 A 不属于 B。这就是使数学家們大伤脑筋的所謂‘物論’，在数学家們沒有走出他們那不可攻破的抽象堡壘以前，物論永远是一个謎，物理学家就更荒唐了，干脆承認电子又是粒子又是波，还搞出一大套所謂量子力学体系，完全陷入信仰主义的泥坑了，当哲学家們討論某些矛盾的性質的时候，許多爭論也是因为把这两种判断混同起来而引起的。

如果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是不是对抗的，那么我說，是对抗的也不是对抗的，因为这命題的本身就非定的，显然个人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是对抗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非对抗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抽象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利益，所以在抽象思維的同时，必須紧紧地結合着具体分析，資本家們和工人們的矛盾，社会集团与全民的矛盾，也是这样，从概念的運動中是不能得出結論来的。

对抗与非对抗也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用恩格斯的術語就是，对抗是非对抗的反面表現，或者說，对抗与非对抗是相互滲透的对立，这也是不証自明的，比方說，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非对抗性与个人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对抗性是互为因果的，还有正因为存着無产階級思想体系与資产階級体系的对抗，所以政治教育与业务教养是互为条件的，任何非对抗性矛盾，都有它的反面表現——与它相应的对抗性矛盾，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在我看来，关于自然界無对抗的判断，是十分奇特的。

对抗这个術語，也是从階級斗争中借来的，術語是形式概念的內容，当我们和自然科学打交道时，立刻会發現，作为哲学术語的‘对抗’，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我建議用另一对術語：協变与逆变来代替对抗与非对抗，这是从数学中借来的術語，在我看来，这对術語似乎很形象化，当然，更适合的術語一定还很多，至于自然界对抗的具体例子，在这里暫不考虑。

3. 連系与轉化

对立物的相互連系和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轉化，这是同一性的

含义，有人說，外在联系不是本質連系，这無異于說，有些連系不是同一性，或者說，某些同一性不是同一性，实际上內在連系是矛盾双方的連系，外在連系是一个事物作为矛盾的一方和外界——矛盾的另—方面的連系，所以一切外在連系，都是內在連系，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我讀过陆定一同志在3月5日人民日报上發表的那篇文章的一点体会。

还有人說，有些矛盾双方是不会相互轉化的，在我看来的这無異于說，有些矛盾沒有同一性，或者說有些矛盾不是矛盾，这也是一个可悲的錯誤。

大家承認，在哲学史上，有过辯証法和唯物主义，从統治者轉化为被統治者，又以新的形式轉化統治者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每一次否定的本身又是以無數次的否定之否定組成，但是，这些人却說，辯証唯物主义一产生以后就不会再轉化为被統治者了，这在邏輯上是沒有說服力的，而且，在我看来，事实与这种判断剛好相反，在自然科学中，根本沒有过辯証唯物主义的統治，在社会科学和階級斗争中，辯証唯物主义也曾經兩次地被否定，恩格斯逝世以后，是修正主义的統治，列宁逝世以后，是教条主义的統治，在斯大林写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書中，詞句上是进步的，但實質上却充滿了信仰主义和詭辯，因而是退步的，首先在哲学的基本問題，斯大林的論点就是不对的，誰不知道，客觀辯証法是自然与历史所共同遵循的規律，而主觀辯証法是这种規律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所以辯証法与唯物主义永远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物，可是在斯大林那里，辯証法只不过是一种把世界看成不断变化和相互連系的方法，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認為物質是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的理論，更奇怪的是，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釋成辯証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領域中的推广，在这里我援引恩格斯的一段話，來說明这种論点是如何地錯誤。

‘在本書中，辯証法是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学，这就是說，辯証法的規律对于思維的运动以及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必須是同样有效的。这样的規律可以在三个領域中的兩

个领域中,甚至在这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認識出来,即使形而上学的因襲者还是不明白他所研究的只是同一規律’(自然辯証法第22頁)。

在哲学史上,从历史科学的领域中找辯証法的例証,并不比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少,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辯証法被当作仅仅是概念运动的規律,但是他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历史中找到了無数的天才的例証,再說,辯証法在資本論中运用,确是馬克思先研究自然規律以后再推广在研究資本主义社会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現在整个理論界,甚至在馬克思主义的常識問題上,都存在着無限混乱是不难理解的,在教条主义的歪风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逆流而进的。

哲学家們曾經兩次把哲学从神秘的天国取回来人間,第一次是德国人,第二次是俄国人,而現在必須来第三次了,看来,这一次,一定是中国人,这一次轉化,这一次否定之否定,將是辯証唯物主义的徹底胜利,在这以后將不会再有轉化,这就是說,將消灭兩個哲学体系的对立,也就是說,在消灭唯心主义一切流派的同时,也得消灭了作为哲学体系的辯証唯物主义的本身。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長期的和复杂的,但是,真理一定能战胜!”

(北京大学 譚天榮)

“民主选举論綱”

“1. 我国目前选举方式不民主。

(1)目前选举时大家对候选人不了解,介紹千篇一律‘努力学习工作热心’,作风正派联系群众,投票只是在于相信党的提名的基础上實質上是指派。

(2)选民代表的广泛性只建立于出身的广泛性上如民主党派,青年妇女,忽視了个体差異是形式主义也是有职無权的根据。

(3)代表虽經人民选举,但人民选举时既不了解他对各政策方針的态度,选举后又独立管理政权,所以不能保証代表人民有像前匈牙利波蘭一样脱离人民的危險。

(4)选举是人民管理政权的一个主要环节,而目前选举却像选模

范一样，而且选出的代表也不是社会活动家，而多数是模范。他既不懂得怎样管理政治，又不代表人民，很容易受个别政治家的愚弄，因此领导一变质就有使政权变质的危险。

从上面几点看出我国选举方式是民主的形式独裁的内容。只当领导正确时才偶然合乎人民的意志，领导变质时随时有变成个人專政的危险如拉科西，格罗，斯大林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2. 民主选举方式的基本特征：

(1)竞选：选举前讓願参加候选的人都来竞选说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被选出以后执行怎样的政策方針坚持○○○○○代表人民做些什么？选举人竞选也得發表竞选演說宣傳○○○○种主要政治问题的观点。

(2)辯論会和信任票：选举后必須經常向选民报告之后举行辯論会和討論会，必要时投信任票。

基層單位領導由选举产生：基層單位由本單位，○要人員通过竞选的方式以避免○○中的官僚主义(选举前国家可以調动)如教师选校長，工人选厂長。”

(北京大学 蔣兴仁)

“組織性和良心”

—— 致 林 昭 ——

“同志啊，不要去听

那些冠冕堂皇的話語，

說：‘組織性就是團員的良心’。

‘良心就是真理’。

这些鋼鐵般的字句在他們口里，

显得多么蒼白無力，

他們玩弄着它，

像戏子玩弄着手中的刀劍，

他們欣賞着它，

像少女欣賞着身上的舞衣。
同志啊，不要去責備
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懷疑，
我知道你为什么說出了這句話，
這句話含有多少酸辛，
而我更清楚的知道你的心比他們
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
他們‘快樂的成長，並不覺得矛盾’，
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樣四平八穩；
他們從沒看見組織上的錯誤，
看見了也從不承認；
他們從沒看見別人的痛苦，
更從不感到自己應負的責任；
我痛心，他們為什麼
至今還是這樣的麻木不仁
我痛心，他們為什麼
有意無意的‘為組織性味去了良心’？
同志啊，我知道你那
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
多少人和你一樣
有着這種複雜的心情。
組織性——是好的！
如果它代表的是真理，
你將會順從它一切的命令，
像順從自己的母親；
這根無形的鐵鍊沒有絲毫強力；
然而，捫心自問，在過去
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
做了它馴服的奴隸，

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
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
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
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憾终身。
同志啊，如果你感到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
你要再四的思索，再四的问，
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
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
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
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
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
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
让纯洁的良心抬起头来吧！
即使它错了，也像孩子般无辜，
让它服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这样，我们一定会得到
真正的共青团员的良心，
和共青团员的组织性。

1957.5.25

注：在五月二十二日的辩论会中，林昭同志说了一句“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两天后，衡道者论坛上便出现了一首诗“致林昭同志”，作者责问她道：“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那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又问：“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矛盾。”此诗是针对那首诗写成的。

（北京大学 杜嘉葵）

“再谈‘领导者阶级’问题”

“在我上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一文发表以后，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主要的一点是文章中有关新阶级形成的问题写得不够详细，因

而，引起了一些同志的誤解；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擴充敘述。由於個人水平有限，錯誤一定不少，希望各方面批評指正。

怎樣分析階級

社會的根本問題是生產方式——生產力及生產關係。而研究階級，必須從生產關係出發。列寧就這樣總結出一個階級的定義：‘所謂各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關係（這種關係大部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財富的方式及多寡不同的幾個巨大的集團。所謂各階級，就是由於彼此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地位不同，而某一集團占得另一集團的勞動的幾個集團。’

由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形成階級的四個條件：

（一）在生產體系中的地位：有些人認為這是指剝削、被剝削的不同地位。不對，剝削、被剝削是階級產生的必然結果，不是階級形成的條件，這一點在列寧定義中‘因而……’就很明顯地說明。我認為是指統治、被統治的不同地位（經濟上的統治，應理解為經濟上的全面控制）。除此以外，生產中的分工也是生產體系中不同地位的一種表現形式，恩格斯說過：‘階級劃分的基礎是分工。’（反杜林論）

（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指所有權、支配權。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支配權兩個平行的內容，這在斯大林的定義中反映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三）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是組織被組織的問題。這是控制人的最積極的手段：‘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雖然只占有居民中的少數，卻把管理生產和管理國家事務的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康士坦丁諾夫主編：歷史唯物主義）

（四）形成巨大的集團。

具備這四個條件之後，必然的趨勢是：‘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及多寡不同’，並產生‘某集團占得他一集團的勞動’（剝削）的現象。這是形成不同階級的基本特徵，是階級是否已

經形成的基本标志。

这四个条件及一个特征是列宁階級定义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有人在考虑階級是否形成时，往往牽涉到其他問題，这样很容易把問題搞糊塗。因而有必要指出下面几点应注意的事项：

1. 階級是否形成并不取决于它怎样形成，如奴隶主是人民公僕被人民选出来后逐漸轉化而成，資产階級是手工业者及商人致富竞争形成的。

2. 分析階級时不要考虑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思想、国家机构、民主方式、政策法规等）对階級的形成与消灭只起加速及延緩的作用，从長远看，上層建筑总是服务于某一階級。在这种意义上說，階級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筑是第二性的。

3. 当某階級的成員与国家机构成員合为一体时，不要忘記該階級的存在。如官僚資产階級就是国家机构成員（官僚），若不把他們看作是可能形成一个階級的对象来研究，就無法看出官僚資产階級的存在了。

我国目前正在日趋形成一个領導者階級

在我国，生产的領導者的情况是：

（一）在生产体系中处在領導（控制）地位；就社会分工而言，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进行管理活动。

（二）对生产資料的关系是具有支配权。

（三）是劳动力的組織者，掌握国家机构。

（四）是一个巨大的集团。

因而在分配問題上有不合理的过多的收入（在剝削这个特征上还未發展成熟。）

所以我認為目前我国正在日趋形成一个領導者階級。

有人把經濟結構与政权机构（上層建筑）混在一起，常常把問題弄得糊里糊塗，譬如，有人認為人民代表代表人民选出国家机构、选出生產資料支配者；因此，支配权仍是操在人民手中。实际上，选举方法、民主方式并不决定一个階級是否存在（如資本主义有各式各样的

政權形式，但任何形式不能否定資產階級的存在)；而相反，這些上層建築總是服務於某一階級；這點就我國來說，也是看得很清楚，隨著領導集團漸漸脫離人民趨向形成新階級，各級政權機構、人民團體也逐漸喪失代表性。

領導者階級的性質

當然，領導者階級有一些特點，與過去的剝削階級有些不同，不指出這一點是不恰當的。這些特點是什麼呢？首先，在生產關係上只有生產資料的支配權，沒有所有權；其次，這個階級處在一定的社會思想狀態之下；本身以自己的馬列主義作行動準則（目前有好幾套馬列主義，其中自然有真、有假），人民思想覺悟不斷提高（這種覺悟的轉折點是波、匈事件）。所有這些都是這個新階級的主要特點。目前整風運動就是這特點的反映，說明階級矛盾具有用思想覺悟來緩和的可能性。

但是，往往容易夸大思想意識的作用，以為領導者用自己的馬列主義武裝着，因而永遠是工人階級。實際上，這看法很荒謬，因為主觀意識不決定存在本身，列寧關於階級的定義也根本沒提到思想意識。從長遠看，思想意識從屬於生產關係；落後的階級不可能掌握先進思想，而且會不可避免地、漸漸的轉向唯心的反動立場。

順便提一下：夸大思想作用的斯大林式的“辯證法”思想至今猶深深地統治着不少人。斯大林過份強調思想的作用，完全違反歷史事實地認定資產階級在它領導革命時已掌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的客觀規律；斯大林過份強調掌握客觀規律的人的作用，不斷盲目地標榜着個人及黨的历史作用；斯大林過份強調國家機構的作用，在蘇聯一切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大小事物都由國家干預。所謂‘個人崇拜’並不是他的思想‘精華’，當‘個人崇拜’這個極有‘學問’的名稱提出來以後，人們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個人的品質、作風上，而忘記了最重要的東西，因此，仍然不自覺地被他的整個思想所統治着、擺布着。

當然，進一步看問題，正像鐵托同志所說的，他個人的思想應該看作是制度的必然產物，並不是他的主觀決定他的思想；這是明顯

不过的，英明的，唯物觀的見解，但是仍然不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可見斯大林思想的根深蒂固（这进一步証明这个思想具有巩固的社会物質基础，即生产的經濟基础）。

‘生产关系’、‘所有权’、‘支配权’等定义及其解釋

在分析階級时，对好些定义及其解釋必須作一补充說明。

斯大林在1938年对生产关系下了定义，他写道：‘生产关系底狀況所回答的問題則是生产資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归誰所有，生产資料由誰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單个的人、集团和階級支配，并利用去剝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階級的問題。’

可見，生产关系包括相互平行的兩個內容：所有权、支配权。当然，它們相互有联系，但也經常脫离，例如：在封建社会，地主階級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有支配权（作为兩個階級来看，地主換佃，不是行使支配权，因为地主不劳动，終归是农民这个階級来使用、支配土地，至于那个具体农民是無关紧要的）；在資本主义农业中，地主有土地所有权，資本家有支配权也是一个例証。依靠生产資料的支配权进行剝削的事情也有过，各种租借关系的中间剝削就是，买办階級（不是指官僚資產階級）最为突出。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怪影’作祟，近来这些定义及其解釋‘变証’起来了，象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就首先由他本人改过（1952），到最近苏联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又改了兩遍（1955、1956）……。多次修改的总趋势是強調所有权，在字面上、条文里尽量降低支配权的作用，以至完全刪除掉。这种作法，如此突然地、再三地進行着，不能不令人感得奇怪。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对抗性矛盾与新階級形成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产生过对抗性矛盾，这是無法駁倒的事实，对这一事实的解釋最流行的是‘矛盾轉化論’。

这种解釋有一些特点：1. 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性的解釋，比較抽象，不易大众化。2. 这种提法往往使人們把矛盾本質、矛盾的表現形

式、矛盾的性質(共性、個性)、矛盾的重要性(是否主要矛盾)混在一起,引起誤會;譬如,得出這樣的結論:社会主义制度(現階段)不管有沒有階級都存在着產生對抗性矛盾的可能性,也就是沒有對抗的矛盾本質也產生對抗的矛盾表現形式;這一錯誤結論的後果很不好,使人們感覺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基本上適合的社會中也可能產生對抗性(本質上對抗)的矛盾,把兩個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僅僅是走向共產主義的不同道路或不同方式,甚至把它們等同起來;這樣,鐵托同志的‘必須改變制度’的看法就變得‘毫無道理’了。

我並不反對矛盾可以轉化,上面只是把這種看法的抽象性以及可能引起誤會的地方提出來,以供參考;其實,我覺得矛盾本質的轉化就是指社會階級結構的轉化。

就現階段說,社会主义國家內部對抗形式矛盾存在的可能性的症結就是存不存在新階級。

是國家所有制?還是走徹底公有制?

由於條件限制,我對南斯拉夫了解的很不夠。上次文章只談到他們的生產關係、生產指標、生產計劃等問題。在那裡,我的初步看法是:生產關係較優越(沒有新階級的出現及可能性)、生產指標不說明什麼問題、生產是有計劃的、並沒有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這些看法,仍有待大家齊心合力,共同研究。

不過,我必須指出,研究問題必須破除成見。象‘自由競爭’的論調感召雖然並不怎麼大,但各式各樣的其他污蔑可不一定那麼容易擊退。

似乎有人總喜歡在理論上製造錯覺,譬如,把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集體管理’說成是集體所有制,這種‘深刻’無比的理論真夠精彩’,給人們暗示着:南斯拉夫只算合作社形式的半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顯然,這是‘集體農莊為集體所有制’的一個翻版。我不懂大道理,只想用簡單的、粗糙的推理來議論一番,也許是不揣冒昧;南斯拉夫工人在生產上一律平等,假令生產資料是所謂為‘集體所有’,某廠原有五百個工人,後來增加了一個新工人,這個新工人既然對生產資

料(工厂的机器)沒‘所有权’,在生产上就應該处在不同的地位(象低級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分紅之类的待遇 就应沒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难道說这个工厂的机器‘所有权’由五百人轉換給五百另一人?由一个集体轉換到另一个集体?这种毫無代价可以轉換的奇怪的玩意兒是‘所有权’嗎?誰也知道这是玩弄定义的结果;害人,害己,真是要不得!

从南斯拉夫的語言中可体会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情况是:苏联,中国……是国家所有制(或走向国家所有制),而南斯拉夫是走向徹底公有制(社会所有,社会支配,并通过集体管理)。

我毫不怀疑地感到,现实生活向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不容許逃避回答的一个問題:是国家所有制?还是走徹底公有制?

党的领导与無产階級專政

假如随随便便給人扣一頂‘企圖取消党的领导’或‘否認無产階級專政’的帽子,而不是冷靜地坐下来討論何謂领导、何謂專政?那就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我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一文中,我分析了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內部情况,得出党的“领导”应退出生产体系的結論;这是取消党的真正的领导嗎?不,恰恰相反,这是加强党的领导(假若不光是从表面形式上来理解“领导”兩個字的話),任何正視事实的人都看到已被取消生产体系中直接控制作用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是何等坚强地领导着南斯拉夫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由此可見,問題根本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样领导。

我要大声喊出我个人認為最正确的观点:‘共产党的真正的社会领导作用不能由法律来規定。党只有根据客觀的社会發展規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由于这些法則是通过人、通过各种社会階級起作用的,共产党或某种其他有組織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当組織得使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傾向能通过它以及整个社会結構表現出来;它自己也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而改变。假使一个政党

不懂得这点，無論它怎样炫耀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标榜它的历史领导作用，它仍然会对社会主义的發展起阻碍作用。如果它繼續硬要走这条道路，甚至可以变为反动力量。’（卡德尔同志語）

把無产階級專政与生产管理混用起来也是絕對錯誤的。南斯拉夫国家机构并不直接干預經濟生活，却是可靠的無产階級專政的工具，在极端困难的国际环境上，沒有被反动派夺走政权，坚毅地走着社会主义的道路。

順便想起这样一种說法：南斯拉夫在兩大‘陣營’中間降机、鑽空子，向美帝交朋友；因而根本不需要、也根本否認無产階級專政。对待有这种看法的同志，我只提醒他們想一想無产階級專政的对象是什么？是外国資產階級、还是国内反动階級？

無論从党的領導、無产階級專政……哪一方面考虑問題，南斯拉夫人的看法中根本不存在‘修正主义’！”

（北京大学 周大覺）

吳开胤在武汉大学民主講壇辯論會上的兩次發言

第一次發言（7月10日）

各位老师、各位职工和各位同学！

我是一个在整风期間犯了严重錯誤的人，而今天学校党委給了我一个机会在大家面前講話，而且同志們还願意听我講話，这使我很受感动！我是怀着贖罪的感情的。今后，我只有从徹底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实际行动中，才能报答党委和同志們。

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的大字报揭露了我的錯誤，使我深刻地感到自己錯誤的严重。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大字报这样大量地集中地揭露了我的錯誤，从揭露中看到我的錯誤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回头，前途实在是不堪設想。經過了强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我决定回头，誠心誠意地交代問題，也就是說，向人民請罪吧。我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但是考虑到我在整风中行动上的錯誤是与我在長时期中形成的思想有联系的，为了改正行动上的錯誤，需要从思想上

挖一下根。因此我准备把我一年多来思想發展的过程,主要是政治观点,向大家着重地交代一下。我是抱着接受改造的心情来講話的,所以对于过去的每一个思想活动,我都不想隐瞒,对于当时思想的發展过程是怎样的,以及我是根据什么事实材料得出結論的,我都准备老老实实地談出来,請同志們帮助我分析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保証我以后在行动中不至于重犯錯誤。但是我还是准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同志們把我的論点駁倒了,粉碎了,那就証明了真理不在我这一边,那么,我願意放棄自己的論点,向同志們投降。我認為向真理投降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相反地,坚持錯誤才是耻辱。但是在同志們还没有說服我以前,我也不願意輕率地放棄自己的論点。

在昨天晚上的大会上,我們班上的田蒂同学所講的內容中,有一小部分是不符合事实的,大部分是符合事实的。这大部分中主要地涉及这样几个人的言論和行动:我、姚中琦、盧斯飞、李正宇、刘业超。他們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我不能代替他們談,我只談談我自己的。

我的思想在最近一年多来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开端要上溯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二十大以前,我的思想是平靜的,没有什么大的波瀾。可是在二十大以后,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有原因的。廿大,我直到現在还是認為,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大会,而且这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發展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我从这里面得到了一些啓發。我記得在去年2月23号讀报的时候,看到了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員苏斯洛夫和米高揚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斯大林的錯誤。他們主要地提到了兩点:第一、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二十年間,集体領導的原則遭到了破坏,而这个坏破者是指的斯大林同志。第二、斯大林的著作“論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問題”(原編者按:這本書是“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吳开斌同学弄錯了。)中关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經濟發展的某些論点,不能解釋資本主义經濟上升的現象,因此也未必是正确的。对斯大林表示不同的意見,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当时我接受不了。我对于斯大林同志是兼有着領袖和父亲的感情的,我对他的道德、文章,对

他的才能、毅力等等，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当时好像还有其他的苏共中央委员如谢皮洛夫也发了言，真理报也发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社论，苏共中央也作出了决议。从这些事实里可以看出，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晚年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做了一些糊涂事情，而且个人品质也有些问题。我痛苦地感到像斯大林同志这样的人都犯了错误！过去，斯大林同志在我的脑子里是一个偶像，是一个巨大的偶像，20次代表大会以后，这个偶像在我脑子里倒下去了。我对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20次代表大会还提到由斯大林同志执笔的联共（布）党史中也有很多问题，有些地方也应当否定。例如对列宁同志的作用估计不足，同时关于十月革命也写得不符合事实，对斯大林同志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过高，因此提出应当重新编写一本符合于革命历史的、具有严密的科学性的党史。我一向是把联共（布）党史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的，毛主席也说过“联共（布）党史是一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现在出乎意料。20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两个月以内，苏联的哲学界、思想界表现了活跃的气象，对许多问题作了新的估价，推翻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然而事实上非常陈腐的看法。例如对普列汉诺夫的作用就作了新的估价，指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对民粹派的估价，“历史问题”杂志中也作了翻案文章。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我感到过去的权威、偶像是不能崇拜了，按照过去的学习方法进行教条主义的思维，是不行了，那是糊涂，是书呆子，要独立思考，了解事实，掌握材料，得出结论，不要一看到人家的结论就奉若神明。当然囉，独立思考是好的，但是如果沒有正确的指导，就容易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我就是由于沒有人指导，所以我的脑子里成了一个“自由市场”，什么思想就可以影响我。我愿意把我过去对于国内国际一些问题的思想情况着重地介绍一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苏联的外交政策

20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对苏联的内政外交很感兴趣。这是有来历的。过去我对于苏联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从沒有

怀疑过的,对她的正确性从来没有考虑过。20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动摇了,我觉得苏联也有问题,苏联政府做的事情也不能保证没有缺点和错误。我特别注意赫鲁晓夫同志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的作法和措施,希望从对比中得出一些结论。当时我得出了这样一些看法:第一、苏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外交上是在由被动转向主动。一年多内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风魔僕僕,到了印度、阿富汗、英国,还到了贝尔格莱德,主动地改善苏南关系,这对于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举个例子吧:苏联西北的邻居芬兰,苏联曾经和他有过战争,虽然很快的结束了,但是苏芬两国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两国人民的关系是不够好的。现在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不惜以大国领袖的身份主动地访问了芬兰,又邀请了芬兰总统访苏,消除了许多隔阂,并且在贸易、文化等方面签定了一些协定。斯大林执政时,对于像印度、阿富汗、缅甸这样一些国家是重视不够的,赫鲁晓夫同志执政以后改变了这种态度,很注意团结中立地区,比方说跟尼赫鲁会谈囉,帮助印度建设,并且还提供了技术力量。可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志在外交政策上是主动的,取得了成绩。第二、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主动地改善了苏南关系。苏南关系的破裂,我个人的看法主要由斯大林同志负责,因为斯大林同志粗暴、横蛮,他的个人品质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大国沙文主义,以不够充分的理由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在很长的时期内是抱着委屈的心情的。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亲自到贝尔格莱德找铁托同志恢复关系,我记得报纸上报导说,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来承认错误的!”我认为这很好,这表现了大国领袖的气度宏伟。这是赫鲁晓夫同志执政以后的巨大成绩。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苏联在国内经济的领导方面也作了很大的改进。我记得这件事曾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讨论,苏共中央曾经发布指示要求各加盟共和国进行讨论,在讨论成熟了后,就决定把经济管理权适当下放,这个措施是很英明的。因为苏联地跨欧亚两洲,领土那么辽阔,如果一切都要由莫

莫斯科發出命令，是很难避免官僚主义的。把經濟管理权下放，就可以發揮下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也是苏联的新气象。此外，也改变了只重視重工业的錯誤做法，而把一部分的精力和投資轉到农、畜牧业和消費品的生产方面来，我們知道赫魯曉夫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例如動員了成千上万的共青团員到边远地区去垦荒。今年赫魯曉夫同志还講过，希望苏联的畜产品在短期内按人口平均計算超过美国，他說这句话是滿怀着信心的。所以我感觉，苏共中央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特别是在20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做了許多工作的，主要是糾正了斯大林的偏差，求得人民生活的提高。斯大林同志在这些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例如斯大林同志执政时，对东欧的国家基本上是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以領導者自居，以長輩自居，对她們不够尊重。斯大林同志的錯誤与匈牙利事件的發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在斯大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有排他性，只注意团結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于別的国家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当然，对帝国主义是應該排斥的，但是在目前的确有第三种力量，像埃及的納賽尔呀，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諾呀，印度的尼赫魯呀，以及緬甸的吳努他們这些人，基本上是处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大陣营之間的，走的是兩者之間的道路，当然走不走得通是另一个問題，但是他們的确是在那兒走第三条道路。要他們完全放棄自己的观点，信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他們既不願意走帝国主义道路，对他們就應該团結，这样可以壯大自己，孤立帝国主义。但是斯大林时代就根本沒把团結这些国家提到日程上来，那时候社会主义陣营是孤立的。現在赫魯曉夫、布尔加宁做了一些工作，就好像用一个大麻布袋把尼赫魯呀、苏加諾呀都裝过来了。現在反帝国主义力量占了世界地区和人口的一半，这是有利于我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亞非會議以后，由于我們主动地做工作，情况就变好了。其所以变好，我認为与赫魯曉夫的政策分不开，是在赫魯曉夫指导之下的。苏南关系是斯大林同志人为地破坏的，斯大林同志当負很大的責任。現在既然对不丹、尼泊尔都要团結，而南斯拉夫基本上和我們差不多，难道不更應該团結嗎？但斯大林同志过去却粗

暴地破坏了苏南关系，弄得苏南人民没有办法往来；南斯拉夫曾經孤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想把他們拖过去，但他們还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有危险，南斯拉夫在困难的时候可能倒向帝国主义。赫魯曉夫同志执政以后，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是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的。我对苏联的基本情况是乐观的，是有信心的。苏联不愧为我們的老大哥，很多地方仍然是我們的榜样。虽然过去有錯誤有缺点，但是正在改进中。

但是，我对苏联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我觉得苏联在某些地方还是比较保守的。什么地方比較保守呢？比方說，去年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作了一个演說，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問題，标志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了这个方針。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起了积极的效果，大胆思考，不拘泥于前人的意見等等，都是好的，学术空气也逐渐濃厚起来。当然，一年多的时间里不可能有什么轟动世界的成就，但是已經可以看出有不可磨滅的成績。这个方針的提出是英明的，直接推动了文化科学的昌盛和繁荣，但是苏联对这方面的反应却很冷淡，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他們对思想界、文学界都抓得很紧，当然他們是好心囉，跟陈其通同志差不多，怕毒草太多囉，怕人民受毒囉，怕唯心主义思想借尸还魂囉，但我覺得他們胆子太小。不敢推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現。如果你相信馬列主义不可战胜，就用不着怕。我們搞了一年，也并没有天下大乱，“草木篇”也并没有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毛主席也說过嘛，“草木篇”来一兩百篇也沒什么关系，我也是这样看法。苏联过分小心，对保守的言論很感兴趣，如陈其通同志的文章很快就轉載了，大胆的意見就不登載。去年10月間周揚同志在一个报告里提到，有一个人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去問苏联的哲学家米丁同志，米丁同志說他个人不能同意。米丁同志是苏联的一个高級知識分子，他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可見苏联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领导人对这个政策还是認識不足的。这个政策在全世界引起反应，像波蘭哪、捷克哪、南斯拉夫哪，都很欢迎，認為这个政策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

大踏步前进。西方的报纸也表示满意，认为中国现在开禁了，他们认为中国过去对于文化是严密统治的，现在好一点了。可是苏联直到目前还是反应不大。毛主席在今年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连美国的“纽约时报”这样的反动报纸就全文发表了，波兰的估价也很高，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切合于东欧各国的情况的，有普遍意义。但是苏联呢，仅仅在报纸上登了一下而已。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莫斯科落后于北京，不管他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如果他们赶上来，我们当然应该欢迎。（笑声）他们做得对的，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但我们做得对的，他们也应当向我們学。

第二个问题：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

我个人并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我觉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共存的，我想资本主义至少要和我們这一代相处下去。当然囉，由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吧，资本主义是必然走向灭亡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想把理论变成现实，还须要作巨大的努力。我曾经这样考虑过：在本世纪的下半世纪我们还很难看到资本主义的全部复没。资本主义直到现在还是强大而很可怕的敌人。也许我对资本主义的估计比较高了一些吧，我认为它还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说一下子死不了。固然，报纸上经常宣传，说大英帝国什么日渐衰落囉，摇摇欲坠囉。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大英帝国是摇摇欲坠，可是三、五年还断不了气，而且这还是跟地过去的情况相比较而言的。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大不如从前了，但这并不能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毫无进步。不管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事实上是有发展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当然不能空口说白话囉。原子能发电站是苏联第一个建成的，发电能力是5,000瓩，以后不久英国在北部的哈威诺也建造了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发电能力是100,000瓩，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建立；而且在氢武器的生产方面也很注意。报纸上常常把英国说成一个破落户，其实这个破落户也不可忽视。法国也是值得注意的，也在那里搞原子能发电站，以新的装备和新的技术革新国民经济部门。不要把

他們估計过低。更可怕的事实是东方有个日本，西方有个西德。日本在最近几年来的發展是很惊人的，去年日本的經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号称造成了日本資本主义史上第一个最繁荣的年代。在去年，日本造船业达到了世界第一位。日本的人造纖維，日本的紡織工业，日本的化学工业，都有非常惊人的增長。在最近几年来，日本的資本家，或者說壟断集团吧，对工业投入了大量的基本投資，他們对工业下了本錢，而且很舍得下本錢。所以这是日本近几年来經濟發展得很迅速的有力的証据。当然，我們的报纸不大报导这样的事实，对于我們近在咫尺的日本三島，过去一直是忽視它的。日本現在已經是我們很可怕的一个对手了，我們应当看到这一点。另外在西德吧，西德最近几年来，它的工业發展也很使得美国和法国吃惊，現在在西欧市場上西德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力量了。西德在軍火工业和机器工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天西德和日本，一个在亞洲，一个在欧洲，已經形成了帝国主义集团中間兩支新起的力量。这說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說明資本主义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現在我們从理論上把它叫做进入了“总危机”的时代，在生活水平方面，在絕對数字方面，有很大的增長。最后我还談談美国，美国現在是帝国主义陣营的首腦，过去我們好像害怕自己有崇美思想吧，不敢談到美国的工业，对美国有些东西怕談。不过我覺得有些东西既然是事实，那么在事实面前閉上眼睛也沒有必要。不敢面对事实，我認为那是胆小鬼。可以談談这些問題。我也認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科学是有很惊人的發展的。当然，由于資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有些方面限制了科学的發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需要准备战争，它需要获得利潤，所以在追求战争，追求利潤的冲动下，也能够刺激科学的發展。我看到几篇报导，談到关于美国建設原子能發電站的問題。現在苏联已經建成了一個，准备建第二个；但是美国現在准备建多少原子能發電站呢？准备建15个，包括各种类型的原子能發電站。在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方面，美国大大超过于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說，拿鋼来講吧，美国年产量达到一亿吨，苏联只三、四千万吨，中国只三、四百万吨。我算了一下，把整

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鋼产量加起来,仅仅相当于美国鋼产量的一半,或者多一点。如果我們要赶上美国的話,不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所能办到的,需要一个很長的时间。就拿汽車的产量来看吧,这个数字是兩年前的数字,就是在55年,美国汽車年产量达到六百万輛到七百万輛,当时还是美国的汽車工业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是生意不好,馬力还开的不足。据熟悉汽車工业的人講,美国汽車工业潜在能力很大,每年开足馬力制造一千万輛不成問題,就是在开动不足的情况下,每年都可以生产七百万輛。那末我們看第二个国家吧,就是英国。英国汽車产量是占第二位的国家,它跟美国比較差的很远,英国的年产量是一百万輛,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后面按次序排下来,就是西德、加拿大和法国,它們每个国家每年的产量大概几十万輛的样子。苏联的汽車每年产多少,我不知道。那末中国是可憐的,第一汽車制造厂修成以后,今年只生产四千輛,那末,第一汽車制造厂的设计能力是三万輛,要达到设计能力,那还是兩、三年以后的事情。就中国汽車工业目前的情况看,要赶上美国,还需要很長一段时间。另外,在石油方面,在电力方面,在有色金屬方面,美国的产量也是很大的,包括战略原料吧,美国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居世界第一位。再我們看看美国文化發展的情况吧。当然我不是指好来坞的电影,不是講这些事,就拿电视广播台來說,美国現在电视广播台是三百个,全国有三百个广播电视台,苏联是九个,其他的国家呢?有三个的,有兩個的,有一个的。把全世界电视广播台加起来,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另外,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很努力于制造核子武器,比如說洲际導彈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前不久我看到报上談到这个問題,就是美国制成了一种橡皮飞机,这种橡皮飞机可以帶到身上走,把它折好帶到身上,自己要想飞就把它打开飞上去,可以帶到八千公尺的高度。另外,在美国出現了公路城市,是沿着一条公路几十里几百里,形成漫長不断的城市。講的这些东西,决不是吹嘘資本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号召大家在中国恢复資本主义制度。我講的这些东西,說明什么問題呢?只是說明我的一个論点,就是我認為資本主义在目前还是有很大的生命力的,直

到目前为止，还是社会主义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为什么我要重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来，我觉得我们国家里宣传工作存在一个根本的偏向，也就是一个错误吧。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感觉到解放后很多年以来，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敌人重视不够。那末，在整个社会上造成的风气就是资本主义不堪一击，资本主义是最腐朽的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好像三天两天就要死的样子。那末，在报纸也好，杂志上也好，在书籍上也好，都引一些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包含着矛盾，什么它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总是这样讲，讲它总危机要来了，讲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过份从理论上来分析资本主义，而很少联系到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来阐明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很長時間內我們生活在真空中，就是生活在理论和教条里面，不大了解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到底是怎样。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过低的估计敌人就容易使自己放松警惕，就容易使自己麻痹，你说资本主义已经日落西山，气息奄奄，那我们还需要努力干什么呢？你说资本主义不堪一击，那我们至少会对资本主义放松一点。我们在过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願意談資本主義的成就，就不願意談資本主義某些优越性，好像你一談，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自認為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怎样呢？只說社会主义好哇，资本主义不好哇，就是拥护社会主义。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要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們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战胜资本主义，首先要研究资本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保持高度的注意吧。对于资本主义經濟文化的發展，对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發展，对于它的政策密切的注意，就是了解敌人在那里做些什么。敌人在那里睡覺嗎？他們也在为保衛他們的制度来作垂死的掙扎，就是他們有很大的瘋狂性吧！我們不認識这点，我們每天坐在家里，把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拿来翻开一看，好像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經到来，于是就感覺天下太平，我觉得这对我們青年一代没有什么好处。你说是不是宣傳了资本主义优越性就丧失了信心了呢？

就害怕了呢？也不是这样。我們現在中国很貧穷很落后吧！但是我們整个国家是有信心的，我們并不因為我們貧穷落后，比資本主义苦，那末我們就向資本主义投降，我想我們中国人民决不会像这样做吧。正因为我們感觉自己差，感觉我們处于不利，我們更要努力赶上人家。在这方面适当的把資本主义国家建設成就向国内介紹一下，引起人民的注意，引起有关部門的警惕，我認为是完全必要的。你要战胜敌人，你就必須了解敌人，敌人發明了橡皮飞机你还不知道，飞起来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敌人在原子能方面有些什么成就，我們过去不大談的，但是，同學們問：报上沒有登載你怎么知道的？我就直接在报上看到的，不过很小，就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一点，很不引人注目，要是馬虎一点，你就看不到。过去对于苏联的东西进行大規模的宣傳，我認为是必要的，比如說，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發电站的时候，我記得我們“中国妇女”这样的杂志都进行了宣傳，使全国妇女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时事手册、中学生，凡是沾了一点边兒的杂志都宣傳了，报纸上也發表了什么文章啦，通訊啦，报导啦，画了原子能方面的圖解，訪問記，从各方面宣傳。就是宣傳苏联的成就，有沒有必要呢？我認为完全有必要。那末宣傳中是不是應該注意苏联的东西是主要的，資本主义是次要的，就应该有一个主次之分呢？我認为这是必要的，如果在宣傳中不注意這點的話，那就是犯了錯誤。如果現在用第一版头条的消息宣傳資本主义的成就，那是錯誤的；但是連八版八条也不宣傳，那是更大的錯誤。那末这些情况在过去更严重一些，知識分子不敢开口，不敢談到資本主义某些科学的成就，害怕人家扣帽子；相沿成风，成了风气，誰也不敢談，我認为这是我們国家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这有什么可怕的？談一談對我們只有刺激作用，感到我們現在很不如人家，努力埋头赶上，老是不談，老是夜郎自大，我認为这对我們一点好处也沒有。我認为今后在主要宣傳苏联的同时，也应该拿出一定的篇幅来报导資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特別是着重报导資本主义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使全国人民都了解，了解世界大事，了解這兩大陣营都在拚命地向前赶，都在竞赛，

現在是誰赶上誰的問題。那末，我就覺得有這樣的必要。每年每國的經濟數字，法國、英國、日本的都發表一下，這並沒有什麼不必要，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把這些數字跟我們的比較一下，看看我們赶上他們還需要多少年，還需要作多大的努力，把這個向工人、農民，向知識分子宣傳，是有好處的。當然，這點在目前有些改進，比如說，科學院已經辦了些雜誌，像“科學消息”“學術界”這些東西，不過這些雜誌比較專門，一般讀者看不到，有些也看不懂，是不是尽可能通俗些地把它介紹一下。總的論點，我認為資本主義還是一個很強的敵人，目前為了戰勝它，就必須了解它。附帶談到國內目前不敢談資本主義是一個缺點。主要就是這麼幾個論點。

第三個問題：關於南斯拉夫問題

我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什麼時候開始感興趣呢？批判了斯大林以後。因為我是從這點來理解南斯拉夫的：感到南斯拉夫人很有骨氣，當時在斯大林專橫粗暴的外交政策指導之下，差不多東歐國家基本上都是察顏觀色然後行事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南斯拉夫就與斯大林對抗，我感覺南斯拉夫有點味道，好像值得研究一下。所以批判斯大林以後，我就主動去了解南斯拉夫的情況，我感到南斯拉夫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有很大不同。南斯拉夫的優點之一吧，就是它的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南斯拉夫為什麼革命比較徹底呢？她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他們在對敵鬥爭中培養起來的，在解放南斯拉夫的時候，是南斯拉夫的人民軍和蘇聯紅軍共同動作，在解放貝爾格萊德，把法西斯侵略者趕出南斯拉夫的時候，他們是肩幷作戰的，那末這就跟東歐情況，主要的由蘇聯的軍隊來解放的那些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南斯拉夫的革命是比較鞏固的，就是說南斯拉夫的黨是奮鬥中成長起來的，它原來與人民群眾有聯繫，南斯拉夫領袖鐵托同志这样的人是在鬥爭中與群眾取得聯繫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同時南斯拉夫領導人是有群眾基礎的，就是南斯拉夫有力量吧，這就是為什麼南斯拉夫在過去敢於跟斯大林碰壁，南斯拉夫在很多方面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在東歐有些國家在去年下半年普遍地產生了反

苏情緒，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說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些国家人民心目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苏联某些政策损伤了他們人民的自尊心，造成这样一个后果。但是，南斯拉夫她就沒有吃这个亏，她就比較果斷一些，当时即使在斯大林的威力之下，南斯拉夫並沒有屈服，当然后来在斯大林同志主持之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陣营。南斯拉夫被开除以后，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就是处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吧，孤伶伶地一个人。但是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并不因为自己困难而放棄社会主义，他們坚持下来了。这一点我認为表現了南斯拉夫同志們的勇气，很大的决心，据我个人对南斯拉夫的一些領袖們在这点上我是很敬佩。我記得我們中央写的文章里面，也在談到南斯拉夫同志們那段时间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的确是这样子。南斯拉夫当时受了委屈，但是，它自己並沒有失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而且我認为南斯拉夫是比較寬宏大量的。那末，当时它受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很厉害的指責，說它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把他們开除了。在七八年以前，南斯拉夫遭到了很大的攻击，但是在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到了貝尔格萊德以后，我們看鉄托同志表現得还是很好的，就是不咎既往吧，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着想，他們沒有鬧意見，沒有鬧成見；苏联来主动找他們恢复关系，他們很愉快地接受了，並沒有故意留難，而且也沒有發表声明把苏联以前作得不好的地方罵一頓，沒有表現意气用事，沒有表現这样的东西。虽然鉄托同志是一个小国的領袖，但是在这一方面，我認为他是表現了一个大国領袖的风度的，我个人是很欽佩他的。苏联在最近以来苏南之間的关系，不过我認为在苏联某些地方、某些看法，我还是不够滿意。比方說，在匈牙利事件以后，鉄托同志就匈牙利事件發表了一篇演說吧，但是“真理报”發表了一篇評論，評論鉄托的演說，那末当时里面講到这样一些問題，苏联他們有这样的意見，还覺得你南斯拉夫还講人家干什么呢？你自己有很多缺点嘛，比方你农业就搞得不好哇，比方你还接受美国的錢，要美国的錢，就在这点也攻击了南斯拉夫，这点苏联是不够好的，表現苏联还帶点情緒吧，苏联那末大一

个国家，赫魯曉夫同志都是六十几岁的人啦，还帶点情緒。我还記得，好像我們中央也对这一点有点意見，这当然是內部消息囉，好像在莫斯科也講到了这一个問題。其实南斯拉夫的农业發展，是不能令人滿意，也就是說南斯拉夫在过去几年与外面是隔絕的，南斯拉夫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此，南斯拉夫的工业有一定的發展，那末农业还是来不及照顧，这在农业方面还是有些缺点，那末今天大家作为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員，大家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都是战友，我認为对于对方的缺点不应该嘲笑。苏联对于南斯拉夫农业落后，应该进行帮助，应该給它貸款，給它輸出机器，向它派出农业專家，帮它规划农业；我認为应该采取这样一个帮助态度。但是苏联在这方面作得不够，并且把南斯拉夫农业落后当作一个口实，在必要的时候来反駁南斯拉夫。对苏联这点我是不滿意的。我当时就講了，我說“苏联真理报真扯蛋！”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真理报，我看到真理报这一段我不滿意，所以我就罵了真理报一句。另外关于美援問題，我想談一談。美援当然不好，因为它是釣魚用的吧，不过，如果是不附帶任何政治条件，那末我認为在必要时接受一下，也沒有什么关系。当南斯拉夫处在很困难的时候，是接受过美援，不过南斯拉夫並沒有出賣自己的民族独立，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国家主权；南斯拉夫沒有参加美帝国主义所策划的排他性的軍事集团；南斯拉夫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国土給美国当軍事基地。南斯拉夫就是用了美国几个錢，將來还是要还给它的。而且在內政外交上保持了它的独立性，并不是拿了几个錢之后，就被美国牽着鼻子走。所以我認为当时接受美援，当然不够好，不过也应该理解人家那种情况，是很困难。那末今天你說它不应该向美国借錢，那你就借几个錢給它嘛；我認为苏联現在可以借几个錢給他，讓它把美国的錢还了就是。不应该拿这嘲笑人家。今天在社会主义陣营里边，不仅是南斯拉夫接受美援，波蘭政府也接受美援。波蘭政府它說如果不附帶任何政治条件，我們願意接受美援。它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談判，就是你不附帶政治条件，我何乐而不用一下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所以拿这个东西来攻击南斯拉夫，我認

为是不够好的。当然我并不主張我們的国家去接受美援。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波蘭它要接受美援我不反对，但是作为中国來說，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我有中国民族的自尊心。过去美国在中国搞得怎末样呢，我看到了一点，所以我不願意中国政府去接受美援，当然我們的国家也不願意接受美援。另外我对南斯拉夫的一些內政問題，有些兴趣。南斯拉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吧，就是它的經濟权是下放的，就是国家对于这个經濟企业的生产不作直接的领导。当然也訂計劃，也有方針，也有个具体的安排，还不过不是象我們这边这样子控制得很严密。那末这样作，是否有好处呢？也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这坏处可能是不够集中吧，那就是国家对全国的經濟情况，不能得心应手很好地指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防止了很多的官僚主义。那末苏联現在就是这样作，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我認为以后管理經濟的权力是可以下放的，每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不一定要中央和国务院来管理，那末中央可以通过一个方針，一个計劃，把这个权力都交下来，讓下面管。有人攻击这一点，叫作修正主义，什么修正主义？就是党放棄对国家的领导。我認为这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因为如果是完全没有领导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呢，南斯拉夫是领导，不过领导的方式不同。那末苏联又把經濟权下放啦，放到各个州，各个共和国，这是不是苏联也是修正主义呢？我的看法不是。

另外，我对南斯拉夫的工厂工人委员会也是有兴趣的。南斯拉夫在工厂里面，最高管理机构是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值得研究，南斯拉夫好像也是在試行嘛！我看我們国家里也好像在試行，什么职工委员会，也是在試行中，我認为也不妨多試試，苏联的东西我們当然要多試行，但是其他国家有什么新鮮东西，新鮮材料，也不妨拿到我們国家来試一試。如果好的話，就拿来采用，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至于方式方法，我認为是没有阶级性的，只要是好的就可以采用，如果工人管理委员会这个形式好的話，我認为可以采用，没有什么了不得。

南斯拉夫国家里面对于文学艺术是不作直接干預的，这是他們在

最近几年来的改进。我记得在南斯拉夫电影周的时候，南斯拉夫电影艺术家曾到中国来跟中国电影界谈到这样一些问题，他们说过去的南斯拉夫也是采取行政领导的办法，采用行政机构来领导艺术，因此在过去也发生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就是把文学艺术这样一种特殊的性质抹杀了，好像领导工厂生产、农村生产一样，这就是忽视文学艺术的特点！这就使得过去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事业不够繁荣，不够兴盛，人民也不满意，后来南斯拉夫的党发觉了这点后，他们作了改变，特别是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改变的方法是对文学艺术事业不作直接干预，但有一个方针，就是为人民服务吧，但是它没有像我们国家里这样层层的一套机构，文学艺术家可以自由组合。那次电影艺术家主要是谈的电影方面的情况，他们说一些导演、编剧、演员、美工、摄制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组合在一起，自己愿意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这样就避免了行政上的过多干涉，使艺术家们产生比较大的积极性，这个方法在南斯拉夫使用的结果是好的，经验证明，是能够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团长谈到这个情况很兴奋，他谈我们过去电影事业是不够好的，人民也不满意，最近一年多来我们的电影事业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在学校也看过几部南斯拉夫电影，我拿来与中国电影比较了一下，也与苏联电影比较了一下，我认为他们的水平是很高的，的确是这样，水平是很高。在这方面中国也好像叫过一阵，比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在上海有些电影作家就提出来了，要求创作的自由组合，当时好像名单也拟好了，不过现在也没有下文了。据我看也可以试一试，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可以按南斯拉夫这个经验试一试，但是一直就好像没有搞过，长春电影制片厂也还是那个老办法嘛，这是固步自封，不作改造，那是不会有进步的，有很多东西都要经过不断实验，就是不要保守！人家的一点一滴经验都应该重视，可是中国电影过去叫了一阵后好像就没有下落了。当然，我对于南斯拉夫某些优点的肯定，并不等于说我主张我们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南斯拉夫的道路是根据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它适合于南斯拉夫，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所以我不

要求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但是，我希望对南斯拉夫的具体經驗，應該引起注意，供参考，很好地研究一下。現在对南斯拉夫准备了一頂帽子，就是修正主义，一談南斯拉夫就給你戴上一頂帽子，就是修正主义，你就不能講話。我就有些想不通，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呢？有些同志对修正主义自己都不懂，但是可以随便罵別人是修正主义。只要它能走向社会主义，只要它能提高自己人民生活，修正主义有什么了不得；如果不能提高人民生活，不能使国家富强，就是馬列主义也不贊成。換句話說，如果馬列主义真要修正的話，那末就是修正一下也沒有什么可怕，馬列主义本来是在不断地修正之中，換句話說，就是在發展之中，該修正的就修正，所以我認為在名詞上的爭論是沒有意义的。当然，我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一些地方不滿，南斯拉夫比較驕傲一些，比如主張它的道路是最好的，好像全社会主义陣营都應該走他的道路，所以它这个就錯了，你这个道路走对了，但是別人走就不一定对，所以鉄托同志在这方面缺乏个人的謙虛，我同意过去報紙上对他的一些批評。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亞的态度也不好，有点大欺小的味道。在南斯拉夫里面还有些現象是消极現象，就是在南斯拉夫市場上美国电影占很多，大約占了90%以上，这种現象还是不好的，黄色电影进入到南斯拉夫，自由市場泛濫得比較厉害一些，国家控制的市場比較小，資本主义市場比較大，所以我認為南斯拉夫是有缺点的，現在我們看南斯拉夫要全面看，优点和缺点都罗列出来。

第四個問題：关于新聞自由的問題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完全沒有新聞自由，而是說我們的新聞报导受一定的限制，这在解放后一直到現在都是这样。这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表現在全国的報紙、广播电台、杂志社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在全国的非党報紙据我所知道的只有四家，那就是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除了这四家報紙外，全部是党报。報紙、杂志、电台全部是党办的，这有沒有好处呢？好处也有的，就是比較一致吧，要反右派都反右派，要增产節約都增产節約，要百花齐放都提倡百花齐放，所以在鼓动人民同心同德，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它是有好处的，就是从

上到下协同动作，一个动作。在我們的报纸里面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沒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报纸，我認为这是好的。現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官事就打不清，有的主張社会主义，有的主張資本主义，有的主張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人民容易受到各种坏东西的影响。在我們国家內基本上都是健康的，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也有坏处。有些报纸都是清一色的，这产生什么坏处呢？就是一般化、公式化。这个太严重了，过去大家还是講在文化艺术作品里面有公式化概念化，可是报纸里比文艺剧作里还要严重，有些新聞的公式化簡直严重得不可收拾，我举个例子，比如举行酒会吧，最后一定講酒会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差不多七八年来每次酒会都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又比如中央接見一个外国代表团，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接見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那么接着就写在座的有团中央書記胡耀邦、胡克实，就完了，写得非常枯燥，非常一般化。那么介紹一个新的城市，就說在国民党統治时怎么怎么不好，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怎样怎样好，最后就是今后展望怎样怎样。有个时期报纸上大规模介紹土产品有些产品可向外面換回鋼材多少吨，它总是用鋼材打比，很奇怪，不用其它的比，不管是草料也好，鷄毛也好，鴨毛也好，蚕絲也好，茶叶也好，总是說可以換回多少鋼材，我就很奇怪，不能換回別的东西嗎？老是鋼材。这正是說明一个問題，說明我們报纸由于是清一色，所以在很多地方失掉了生动活潑內容，它就流于一般化。它为什么这样子呢？全国只作一个通訊社，就是新华社，你用它的稿子也好，不用也好，反正只此一家；那么我們的报纸呢，都是党办的囉，就是賠了本也是党掏錢，这些个报社的领导人，他对于报纸的銷路总是放在其次，強調政治性是好的、但是对賺錢蝕本他是不大管的，至于这报纸是否受讀者欢迎，大家是否真心誠意掏錢来买这份报，就不大管，如果是在資本主义社会，那像这样办报早就沒有飯吃，因为資本主义讀者是有选择性的，譬如說他可以看“泰晤士报”，可以看“約克遜邮报”，可以看“星期論壇报”，可以看“紐約时报”，如果办得不好的話，他可以不要你的报纸，在資本主义国家

里的报纸，力求把内容办得生动活泼一些，否则它就没有销路，他就没有饭吃嘛。现在我们这里呢？国家办报是有好处，坏处就是养成某些工作人员不踏实，马马虎虎的作风，就是在新闻工作上不求改进，总是老一套，最主要问题就是“供给制思想”吧，反正办好办坏都是政府的，没有一种东西刺激他努力向上，努力把报纸办得活泼一些，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把报纸办得像资本主义那样了，每天发表一些女人的消息哪，或者好莱坞的电影介绍，但是我要求报纸在某些地方，在技术上像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地方学习——在标题上、辟栏上新鲜、活泼、大方、醒目，带有刺激性，能够鼓动人，办得漂亮一些，对于同样的新闻有不同的写法，可以形式多样化一些嘛，在新闻学中也可以“百花齐放”，你说“宴会一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你可以写成别的东西也可以嘛，应该鼓励在新闻中间也产生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风格。我们现在看报纸的确只看到政治性的内容，在艺术上没有什么享受，这是很干枯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过去有这样一些看法，我认为可以允许私人办通讯社、办报社。那么现在国家可以允许私人办刊物了，比方沈阳办了个“芒种”，就是私人办的，巴金他们就私人办了个“收获”，像“诗刊”基本上是臧克家他们私人搞的，我看他们搞了以后，天下也没有大乱哪！没有什么了不得。我们可以让私人办通讯社，办报社，私人办的通讯社有好处，能够和国营通讯社竞争一下，你办得不好，其他的报社会选我的新闻，不选你的新闻，那你就吃不开，你就不能靠你们那国营的牌子来吃饭，你就不得不努力，你不努力的话你就威信扫地，你就没有人看。那么多办几个通讯社，专业通讯社也好，综合通讯社也好，也可以“百花齐放”搞下子。搞一个通讯社专门报导文教消息可以呀，搞一个通讯社专门报导农业也可以呀，也可以专门办个文学报纸，像苏联的“文学报”一样；采取风格多样化的办法，头版头条不一定专门发表社论，我们现在报纸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好像只有社论才可以放在头版头条，记得丁玲同志过去在延安办“解放日报”的时候曾提了这样一个意见，她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从形式来决定，从内容来决定要好些，她又说，只要在当天来说是最

重要的东西都可以放头条；比方說毛主席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在当天是最重要，就可以放在头条，比方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赛了一场足球，在当天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可以放在头条。这个就不一定叫做资本主义的报纸，无产阶级国家也还是要知道打球的情况吧，也还要欣赏文学艺术吧，现在我们的报纸都有公式化，就是說人民日报做了一个榜样放在那里，各个报纸照学，人民日报怎样作，下面就怎样作，其实只要我們懂得方向是为了社会主义，那么就是党办的报纸，也可以来个“百花齐放”，每个报纸都有自己的特点，富于当地地方的色彩，有自己独特的文笔，我记得过去解放前的报纸，也有特别受人欢迎的栏目，有的是“星期論文”比较好，它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副刊办得特别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通訊欄办得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国外大事的述評办得好，各有各的特点。解放后的报纸你說那个报纸有什么独特点呢？你說湖北日报和長江日报各有它的什么特点呢？我就很难說出来。也就是湖北日报和長江日报差不多，湖北日报和湖南日报差不多，湖南日报和江西日报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要有私人办的报纸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你說在湖北日报和長江日报的旁边又出来一个民办报纸，你說湖北日报和長江日报的編輯他是不是心里有点不舒服，你办得不好，人家就不买你的报纸，不要看你是市委宣傳部办的报，因为人家掏錢他不管是公营、私营，正如像看演戏一样，他不見得要国营劇場去看，私营劇場要好他一样去看，你說我是国营劇場一定要看我的戏，这个道理恐怕講不通，現在允許私人办剧团，允許私人办刊物，为什么不允許私人办报和办通訊社呢？我認为是可以的。但是說私人办是不是讓反革命分子办，不是这个意思，那反革命分子不但不許他办报纸，那講話也不許他講。你說私人办报是不是走到资产阶级方向，你看全国有四家非党报纸，就有三家出了毛病。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我也承認这次批判他們的报纸是出了毛病，不过出了毛病可以糾正嘛，出了毛病之后人家还是看出来了，党和国家还是看出来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还是願意改进，他們向人民請罪嘛，那么他們办得不好，出了漏洞，更能显得人民日报的正确来。

另外我認为應該扩大报纸的报导面，現在我們的报纸的报导，面是不够大的，总是那些东西，剛才我講的适当登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東西，我过去还有这样的意見，我認为怕什么呢？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也可以登登，看他倒底講些什么鬼話，怕人家受蒙蔽，可以在登載的同时發一个評論，把他評一下，那么过去对这东西不这样作，所以我感到很不可理解。“紐約时报”把毛主席的报告全文發表了，那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的問題也可以全文發表的，譬如艾登在下院的演說，富尔在議会的报告，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国会的講演，杜勒斯在記者招待会上講話的全文，發表了以后再加以評論，人民不会上当的，看了艾森豪威尔一篇报告就相信资本主义啦，这反而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現，不相信人民群众是有覺悟的，是能够認識到的。过去在內部办的“参考消息”給高級干部看的，在学校里現在放寬了尺度，發到講師一級，不过面扩大了，內容就縮小了，密的范围就小了一些，那上面的东西也沒有什么了不得，我也看了一点，当然不是偷看，我也是經過別人允許的，其实我看那里面也沒什么东西完全值得保密的。那上面有篇消息談到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蔓延，这东西有什么保密的呢？这东西放在参考消息里面好像只有講師以上的知識分子才能看，这流行性感冒蔓延在公开报上登也沒什么了不得，参考一下尤其关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消息，那完全可以登，讓全国人民知道那有什么不可以。至于那些外国代表团对中国的看法，外国記者所写的，对中国当前重大的运动，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們發表的評論，也可以摘要介紹一下。这讓农民看到了是不是腦子糊涂了，有些文化水平較低的、沒有政治头脑的，那你就有选择的登嘛，或者人民日报登，黃州專区报，什么农民报就可以不登；你还可以分一分工嘛，就可以把报导面扩大一些。現在老实講我們有些糊涂，只看到这一边情况就沒有看到那一边情况，不知道资本主义對我們的看法怎样，對我們的反映怎样。

另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理論文章，也可以登一登，当然文汇报犯了很多的錯誤囉！不过它有一点还是优点，是可以肯定的，文

汇报第四版有一欄叫“外論选輯”，就是專門登載外国富有代表性的意見，这对于我們了解世界大事，了解資本主义国家輿論界的情况，了解資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層动态，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有些能够看到参考材料就有些了解囉！但是絕大部分看不到就是“瞎子摸象”，根本不了解情况。我記得最近关于禁运的問題，好像美国控制不住这些国家了，很多国家要开放“禁运”了，这个問題我們只能看到我們这方面的意見，看到外国很一般的意見；現在外国工商界他們的报纸，有些資本家个人的看法怎样，不大清楚，文汇报这方面作得比較好一点，我記得关于“禁运”方面他們登过一些文章，登过美国“經濟学人”杂志，登过日本“朝日新聞”，“朝日新聞”报，好像登过美国“新政治家与民主战士周刊”，登过他們的東西，这可看出他們这些杂志、报纸实际是代表外国某一个阶層的意見和看法，都是某一个阶層的喉舌，看看他們对这些問題的看法，头脑会更清醒一些，但是过去这样做就是文汇报一个报纸，其它的报纸都沒有这样作。另外我覺得現在对新聞記者的束縛比較多，过去一兩月上海、北京很多新聞記者座談，談新聞記者倒得很，到处保密，这里保密那里保密，你說国防事业應該保密，工业的某些部門應該保密，但是我們保密得很寬，教育有些地方也保密，最保得可笑的是北京西郊动物园到了一些动物，記者去訪問時說要保密，好像动物报导出去都有失国家机密，这在很多地方造成記者很大的不便，層層限制。比如武汉一个記者談要到長江大桥去訪問先要搞一張总的采訪証，就是長江大桥工程局發的一張采訪証，然后如果你想到桥上去看还要有桥上采訪証，如果你要到桥下去看，还要有水上采訪証，好像你到工地去看有工地采訪証，推而广之，怎么得了，有厨房，有宿舍，有衛生科，那是太广了，就是人为造成了多少束縛，如果你不相信这記者，你根本不給他采訪証，如果你相信，你就發給他一个总的采訪証，不分什么桥上桥下，你說这記者能看桥上就不能看桥下，好像他在桥上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到桥下就叛变了，那有这种情况呢。过去有些地方对新聞記者人格也是尊重不够的，像劳动报记者控訴說，有了外国代表团来了，他跑去照相，派出所把他抓

去关一点半鐘，說不該隨便照像，这个东西也影响我們的新闻工作，很多地方造成很多人為的束縛，使新聞記者的活动处处遭受困难。我認為这束縛應該把它打破，應該打破。关于新聞自由問題我就談到这里。

第五个問題：立場問題

我也并不是一般的反对立場，不过我也常常感到这点，就是把立場問題絕對化以后，的确，容易鑽到又一个牛角尖去。在某些現象上不能完全由立場來解釋，比較簡單的現象，用立場來解釋比較容易，比方說農民分了地主的田，農民說是好，地主說是不好，這很清楚，這很簡單；但是生活上的問題不是這麼簡單，有些复杂問題就很难解釋，這我過去並沒有否定來講，而是說我對這問題感到興趣，過去我曾經講過這樣的問題——立場也好，党性也好，這樣的東西同科學性、真實性是否有距離，是否有矛盾，關於矛盾有對抗性有非對抗性，這是不是每時每刻都是一致的、統一的，過去我在班上也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舉個例子吧，就是南斯拉夫，我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的，在蘇南關係不好的時候，記得蘇聯曾經把南斯拉夫罵得很厲害，說南斯拉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說南斯拉夫鐵托、蘭科持奇匪幫，說南斯拉夫是警察林立，說南斯拉夫到處是絞刑架，說南斯拉夫經濟破產，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說南斯拉夫國內暗無天日，當時我記得蘇聯驚險小說也好，電影也好，總是說空降隊伍大部分是由貝爾格萊德起飛的，當時談到民主國家里面的問題，南斯拉夫大使館就跑不了，當時從各方面現在看起來簡直是污蔑南斯拉夫，當時漫畫上把鐵托同志畫成一個狗，頸子上挂一個煉子，手上拿一把斧頭，血淋淋的，當時經常在情報局出版的刊物“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這雜誌上發表，當時根據蘇聯看法，南斯拉夫很不好。中國也好，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好，都跟着蘇聯罵南斯拉夫。後來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改善了關係以後，又說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好的囉，說基本是社會主義國家囉，公有制達到70%囉，主要是工农專政囉，這些七七八八的話來了。我們報紙刊物馬上改變了態度，如新觀察就登了一篇“鐵托元帥下命

令”一首詩，登了一張南斯拉夫胖小孩照片，說這胖小孩多么可愛囉！從各方面來粉飾南斯拉夫，我不相信南斯拉夫會在一天之內截然變成一個不同的國家，這里面就有問題了。從前的報紙也是有立場的，以後的報紙也是有立場的，可以說報紙還是一家辦的，蘇聯是“真理報”我們是人民日報，黨沒有改組，編輯還是原來的人，為什麼前後對於南斯拉夫完全不同。這問題是值得人深思，是不是當時為了立場，為了黨性就抹煞了事實，看不見事實，比方說蘇南關係不好的時候，是不是蘇聯也了解了南斯拉夫一部分真實情況呢？難道蘇聯的領導人從上到下都認為南斯拉夫是一團糟，還是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那貝爾格萊德一看不是那樣子，以後就改了，不是那樣簡單，我看不至於，就我說黨性和立場有時服從於國家的政策，服從於國家的利益，國家認為需要怎麼作才好，就強調這東西，有時很難使人相信這一點，就在比較複雜的現象面前，很難用立場來解釋。我跟很多人爭了，他爭不贏，就說你這是立場問題，你沒有立場。這問題不能說服我，要說服我你用道理來說服，最後你沒有辦法了，就說你是立場問題，光拿立場來說，這不是好漢。沒有事實，搞來搞去光跟人家扣個帽子。在生活里面存在互相矛盾、無法解釋的事很多，我過去很苦惱，我不願意說我的立場的問題，但是這問題得不到解決。

我再舉個例子，比方說關於國際法的問題，在朝鮮戰爭中，我們就抓住國際法的問題，就說是美帝國主義對戰俘非人道待遇哪，你不符合國際法哪，根據國際法把它譴責了一通，後來發生細菌戰的時候，又根據國際法說，你不符合國際法哪，那就是很強調國際法；後來到匈牙利事件的時候，有人就提出這樣的觀點，說蘇聯出兵匈牙利是是否符合國際法，我們有些同志把我們罵了一頓，什麼國際法不國際法，國際法是資產階級的，要什麼國際法？我們根本不管那一套，我們從無產階級利益來考慮，不要受資本主義國際法的束縛，所以搞得我很糊塗。你說你干脆都不承認國際法，那在朝鮮戰場上也不承認國際法，因為那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但是有時候承認，有時候不承認，那換句話說就是這個意思：對我有利的就承認對我沒有利的就不承認。是

不是这样一个問題呢？我說是的。至于有时是不是过分強調立場，有时感到与真实性和科学性有些距离，过去这是我們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再有个問題如像苏加諾和尼赫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們基本方向沒有改变多少，我国對他們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剛解放的时候，对苏加諾也好，对尼赫魯也好，看法都是不好的，我記得剛解放不久，出了一本“新名詞詞典”，后面附了很多人名，像專家名人，有反动派啦，各个欄目，苏加諾是放在反动派里面，但是去年苏加諾到中国來訪問的时候，我們說苏加諾是偉大的領袖，叫做什么加諾兄，到处叫，你說苏加諾究竟是好是坏，要是坏就不應該叫他來，要是好的話，为什么过去叫他“反动派”？过去說尼赫魯是滑头的，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是有时在外交詞令上，比方赫魯曉夫到印度的时候說尼赫魯是偉大的政治家，但这种話是有立場的，这和科学性是有点距离。是不是偉大的政治家，这是个問題，当时为了对国家有利，就需要这样講一講，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說有时立場問題并不是“万灵膏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簡單的問題上是比較有效，在复杂的問題上不一定能搞通的。那么，我这个錯誤是來历很久的了，如果大家不能把我的意見击破，我一直要帶到棺材里去。当然我認為在这次把問題搞清楚，立場也好，党性也好，与科学性、真实性是不是有距离，是不是完全一致？与無產階級利益与客觀实际是否完全一致？如果這問題能解決的話，那我思想會大大提高一步。

第六個問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

這問題很大，應該由蘇共中央的人來談的，不過我過去很狂妄，對這個問題想了一想，所以有些看法，我還是老着臉皮來講一講。

我認為20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20大以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是有發展的，是有巨大成就的，具體表現在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間，解決了幾個根本問題，就是工人階級起來革命的問題，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革命，解決了敵我矛盾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怎麼和敵人鬥爭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在20大以前解决的,这里面当然和列宁、斯大林分不开的,他們有很大的功績。但是斯大林沒有解决这两个帶根本性的問題,一个就是执政党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間怎么处理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問題斯大林沒有解决;而从他著作里看不出他对这問題是有深刻理解的,也可以說斯大林不懂得这問題,那么,这問題很重要,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为了革命的綱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够了呢?就不要注意其它的問題了呢?現在根据一年多来的国内外形势說明,不够的,就是执政党还不懂得这一点,就是自己怎样調整自己同人民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党群矛盾問題,这問題是毛主席解决的。这問題上我認为毛主席是把馬列主义發展了一步,是給馬列主义作了新的貢獻,是馬列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偉大的創造,当然毛主席也是一个根据最近一年多来国内外的形势,深思熟慮了的,特别是同斯大林問題,同波匈事件是有关系的。斯大林功績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但是斯大林就不太懂得怎么相处和人民的关系,就不懂得区分敌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苏联为什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錯誤呢?恐怕和斯大林的認識模糊是有关系;就是苏联肃反的扩大化,把很多無辜的善良的人民和完全沒罪的共产党员杀害了,就是把人民內部的問題当作敌我矛盾的問題,同时斯大林在他晚年高高在上,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人民的要求,对人民群众不够尊重,对人民民主权利不够尊重,就是說他的主观上当然是为人民謀幸福,建設社会主义,当然也沒有想到一个革命政党不只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即須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也还是要尊重人民群众这問題在波匈事件里得到最好的說明了。大家知道波蘭事件發生在前,匈牙利事件發生在后,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是搞得很厉害的,是拿着槍杆干的,那么哥穆尔卡在去年11月20日作的报告里面他承認了群众这样作是对的,他認为一个执政党陶醉在胜利里面是最可怕的,就只看到經濟数字的上漲,看到学校多办了几个,看了什么合作社增加多少,或者是双輪双铧犁增加多少,光从物質上去考虑这些問題,(我这

是引伸他的意見，他並沒有講雙輪雙犁的例子），沒有了解黨和群眾的關係，那是很危險的，在波茲南事件裏的確是揭露了黨和政府工作中的許多陰暗面，這些東西當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不過沒有辦法，它是事實。他說過去在工農業裏面，在政治生活裏面，有很多不正常的現象，他說波茲南事件的确是給黨和政府的一個警告，這樣看起來就是在波蘭過去也是這問題沒有處理好，波蘭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嘛！解放後的發展、建設成就也很大，但人民還是不滿意，人民不滿意不僅是說有肉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這就夠了，因為人民不是生物，他不僅限於生物的要求，他還有人的要求，執政黨只注意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而沒有注意到尊重他的權利，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給他一個人的生活，他還是不滿意的。

在匈牙利也是這樣子，匈牙利事件也說明群眾並不是反對匈牙利經濟制度，並不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當然後來有反動口號：“退回土地”，那是在小農黨反革命分子混進來以後；群眾最早起來攻擊拉科西、格羅集團的主要是說他們官僚主義，不關心人民疾苦，高高在上，官僚機構太龐大了，沒有很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肅反問題擴大化，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提問題，而主要還是提人民和黨的關係問題，所以匈牙利事件直接原因是黨群矛盾，由於黨群矛盾引起了匈牙利事件，然後由於帝國主義操縱和參與才把事態擴大化了。如果在匈牙利國內原來搞得很好，就是風平浪靜，帝國主義煽不起來。毛主席這個報告的意義就在於解決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帶根本性的問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所以毛主席報告不僅在中國受到廣大人民歡迎，在波蘭、捷克這些國家也得到很好的反映，也認為毛主席報告替他們解決了很多問題。我們也看到了資產階級國家對此反映很大，認為毛主席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解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另外，第二個問題也是過去沒有解決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應該怎樣？以及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應該怎樣？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現在看起來最正確的方法應

該是團結，尽可能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原則我認為也是適合的。過去在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有排他性的，赫魯曉夫在這點上做得比較好，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內，彼此相互關係過去也是解決得不好，過去資本主義造謠，說是東歐國家好像是衛星國，蘇聯是太陽和月亮。你要說這一點也沒有道理，我也不相信，的確有一點衛星的味道，的確是那樣，很多地方由於他們是小國，由於力量不強，黨的力量各方面都不強，因此對蘇聯有點害怕和過分尊重，蘇聯也的確是這樣，把他們當小國，不尊重他們，譬如匈牙利黨中央第一書記撤換問題就拿到莫斯科去商量，這就是很不合理的現象，當然自波匈事件以後，蘇聯政府認識到這樣的錯誤，我們看波匈事件蘇聯政府也有很大的改進，譬如發表蘇聯政府宣言，對自己過去錯誤作了檢查。關於同波蘭作生意賺了波蘭的錢也退了一部分，關於蘇軍在外面駐軍的問題重新締結了協定，這協定同過去協定比較是比較嚴格的。就是蘇聯軍隊不能隨便行動，必須當地政府的同意。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但是蘇聯是大國，波蘭、捷克是小國，不過就國家來說都是一樣，我們現在比尼泊爾大得多，我們也沒有欺侮尼泊爾，既然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小國不能歧視，對自己的小兄弟那為什麼要歧視呢？應該團結友愛，在大家庭里生活，這問題我認為是在20大以後，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才很好解決的，在以前是沒有解決的，因此在20大以後就解決了兩個帶根本性問題，我認為這是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健康地發展創造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不是說從前不健康，就是從前有缺點，這點沒有解決。

第七個問題：是兩個小的問題

就是對昨天有些不太合事實的，有些誤解的兩個具體問題吧，在這里簡單地談一下。我不願每一件每一件去解釋，因為我的錯誤很多，現在多一件少一件對我不在乎，不過個別極突出的我要解釋一下，因為這與我的名譽有關。昨天有人說我反對一夫一妻制，男女只要雙方愛慕就可以同居，這句話我是沒有講過的，我思想里沒有這種想法，但是有同志揭發了，我檢查了我的思想，的確沒有這印象，因為

我对一夫一妻制还是非常感兴趣，我为什么要一大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呢？这对我做人的观点来说，从我的所见所闻来说都是不习惯的，我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谈过的，不过把前后都抽掉了，就显得很荒谬。有一天我与几个同学谈到共产主义建成后，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说共产主义建成后，人的个性会得到最大的解放，就是那时候人可以按着自己的愿望做着自己所愿意的，一切人为的束缚和其形式都要消失；有的同志说，那不会搞乱？我说不会搞乱的，我说那时人们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不会搞乱的，我说什么形式都要取消，到那时男女双方只要互相爱慕互相同意，就可以同居。有的同志说：那还行？我说因为那时有高度觉悟的保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的形式是到区政府去登记，领结婚证，而共产主义建成后，国家和党都要消灭了，没有区政府，你到哪里去登记呢？后来这个同志报告时，就把我的前后话都抽掉了，说是我现在主张这样做，那当然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囉，所以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不然有人会说我二十几岁，为什么思想这样腐朽，堕落到跟美国的阿飞差不多，所以我感觉很沉痛，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其他不合事实的就算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马列主义的问题，有人揭发我说马列主义是要烟消云散的。我讲过，我现在还在这里讲，马列主义肯定是要烟消云散的。为什么说马列主义将来会烟消云散呢？我的论点是这样的：马列主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阶级的产物，那么马列主义也是属于一种历史范畴的东西，那么它有它的历史任务，它的历史任务完了，它就完了，我们现在喊马列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都是表示人们对它的尊敬，群众对它的爱戴的感觉，你以为真的马列主义就会活一万岁吗？那就是极端的糊涂，其实不会这样，就是将来的马列主义也不会像这样，比如说共产主义建成了一千年两千年，一万年两万年以后，马列主义是不会有，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当然就可以烟消云散了。当然，它作为人类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就会保存在人类的思想宝库里的，就像过去的孔子思想、孟子思想、庄子、老子思想，

以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孟德斯鳩思想，盧梭、佛爾泰思想，他們也是永遠保持在人類思想寶庫里的，永遠不朽，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馬列主義也是不朽的，因為這也要放進去。但是如果以為幾千年幾萬年以後還有一個“馬列主義教研室”，每天講馬列主義，我就不相信這樣，我敢肯定要煙消雲散，事實一定會這樣子！關於我的思想就談到這裡吧。

以上所講的就是我在20大以後由於自己原來思想的糊塗，感覺到應該獨立思考，我思想上成了自由市場，東想西想，亂想，想出了這麼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看法。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囉，過去我也是個苦悶的探求者吧，有些問題我得不到解決，我很苦惱，過去有些問題我不是沒有問過，比方說蘇芬戰爭問題我就問過同學，他也不能給我滿意答復。所以有些問題我只有自己思考，自己思考以後，我也不是開玩笑，也不是故意胡鬧，還是看了些書，看了些事實，看了些材料經過反復思慮以後，得出了這樣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中間今天我認識到有些地方是錯的，以後我自己可以批判自己囉，自我批判。但是有些地方我還沒有認識到錯誤，我還認為是對的，所以我今天呢就原原本本老老實實把自己過去思想上的一些看法都把它講出來，希望大家把我當作分析批判的材料囉，可以加以分析加以批判，幫助我在思想上提高一步。我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大家說服了我，把我的論点击潰了，粉碎了，那我繳械投降，決定投降；如果你沒有說服我，那我決定不投降。就是這樣的。所以希望我也把這次反右派鬥爭看作是提高認識，改造思想的一個最好的機會。我也認識到我有許多東西是成體系的一套東西，這個氣味和馬列主義的氣味還是不太同吧，老留著這套東西的確也很傷腦筋，搞得不好呢就根據這些錯誤的思想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來，我願意把這些東西糾正；但是糾正必須先加以認識，希望同志們能夠大力幫助。過去反對我的觀點的同志們，希望他們今後還是本著這個精神，繼續對我加以反對；至於過去贊成我的同學，可以根據今天的認識來談一談，不要看到今天形勢不利就都來反對，連原來贊成的也不贊成了，這樣不是大丈夫的氣

慨。

我在整風运动中犯的錯誤很多，我已經將這写成了材料，准备以后找机会交代。

第二次發言（7月11日）

各位老师，各位职工，各位同学！

昨天我講話的时候，有的同志遞了条子，指定我回答一些問題。今天党委会和我談了一下，我自己感到很为难，不是所有的重大問題我都曾經考慮过，都有系統的意見，所以有些問題我就不能回答，有兩三個問題是我曾經留心过的，也發表过一些零星意見，那么今天既然是为了徹底改造思想嘛，把所有的思想活动都暴露出来嘛，那么我现在把这些東西講一講。

第一個問題：关于胡風反革命集团的問題

我个人在过去政治学习当中，曾經对这个問題發表过一些意見，主要就是怀疑胡風反革命集团是否是反革命問題。当时第一个論据就是根据人民日报所發表的三批材料，它很难說明胡風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因为我感觉在这三批材料里面，恐怕充滿了的就是一些牢騷；对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不滿意，对一些文艺現狀进行攻击，当然里面有些下流話囉，人身攻击囉，罵人囉，有这样一些東西，不过我認为像那些東西都是很長時間的信件吧。这些信件經過收集以后，加以注解，加以摘要，再加以解釋吧。經過摘要、經過選擇、再經過加工的東西，那么跟原来的東西就有一点区别，显得更突出、更集中、更触目惊心。他那些信件里面曾經也談到一些其他問題，也可能对文艺界好的現象也表示过滿意，或者对某些東西有些好的意見，但是为了說明他是一个不好的東西吧，或不好的集团吧，把这些可能都刪掉了，剩下来的都是缺点和錯誤了。这就使人感觉得胡風反革命集团問題很严重。所以我就感觉怀疑，經過注解的東西，我認为也还不能說明它是反革命集团。就是說从那一些材料中来看吧，胡風集团在文艺界是一个有野心的小集团，同时有个別成員品質很惡劣；同时这个小集团有它自己的綱領，有它自己的一个組織，不是很严密的吧；

同时这个小集团是跟党所领导的文学事业相对立的。恐怕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好像记得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上这样讲过，好像是这样一个集团在当时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那么我在当时看了这三批材料以后，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样结论来。可以说他们在当时有这样的野心，想篡夺文艺界的领导，但很难看出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国务院总理。在过去我对仅仅是遇这三批材料就来断定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是有些怀疑的。当时我并没有下结论，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党和政府另外掌握了其它材料，那么我就当别论。如果有些材料是很机密的，不能向群众公布的，但是国家确实掌握了，那么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论点，当时我的意见是希望政府能公开审理胡风，把他的问题公布出来，公开审判吧，使全国人民都能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当时根据一些现象来看，也使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候。曾经逮捕了很多入，这些人中间后来有一部分释放出来了。比方说，在武汉地区的有名胡风分子王采、王凤，前不久在报纸上还登了王采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同学说，王凤也出来了。我还听到人说过，就是有人在武汉市的百货公司里买东西时，曾碰到曾卓和他的爱人，而曾卓是武汉市胡风分子的头子囉。另外我又听说，胡风集团在华南的骨干分子朱谷怀也已经出来了。在今年二月间和三月间，我记不清了，有一出版社登了一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书，新的翻译书要出版了，在这些新的翻译书里面包括有吕荧的一本书，就是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是新译本；还有一本是满涛翻译的书，是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集”。当时我就很怀疑，这些都是新译本，这是出来了以后译的吧！在监狱里是不允许做翻译这样的工作的，不过是不是允许，我不知道，但当时根据那些迹象来看，好像是出来了。而且我还听到一些流言，说什么满涛已经出来了，但名字改了，不叫做满涛了，而且还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究竟是不是，我也不敢断定，所以当时根据这些现象来看，使我产生一些错觉：在逮捕胡风党徒们的时候，是不是对每个人逮捕

都是正确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胡风分子？是不是都是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所以当时产生一些怀疑囉，不过我的怀疑有一个条件，就是說如果有新的材料的話，我就願意放棄这个論点。到后来我曾經看到周揚同志有一次講話，在这个講話里說，他肯定胡风集团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他說前不久在江西得到了一部分材料，那末这就是我从前所不知道的囉。既然有了新的材料我沒有看过，那我就不能对这个問題發表意見了，所以关于胡风集团問題，我从前有过那样的思想活动，但現在，我願意放棄这个观点，既然有事实嘛，我就尊重事实。

第二個問題：上層建筑的問題

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實在無法談。上層建筑这个概念非常广泛，我过去曾經談过一些意見，就是稍为沾了一点边，不是針對整个上層建筑，但是我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有一点意見。这个意見是由于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后所想到的，当斯大林這個問題全部清楚以后，我感到很震惊，在苏联这样的制度下，为什么会發生像斯大林这样的錯誤，這個問題各持一端，鉄托同志講斯大林錯誤是制度的产物，而苏联主要是把个人品質归咎于个人的原因，那么鉄托同志那个“制度”兩個字的含义何在呢？不大清楚，如果是指社会主义制度，那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如果是指的政治制度，那我認為也不能說他沒有一点理由，你說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大的錯誤，难道仅仅是个人原因嗎？个人負責嗎？难道說这个制度沒有一点缺陷，沒有一点毛病嗎？這個問題很难令人同意，在斯大林犯了錯誤以后，有人問赫魯曉夫，你們当时都是苏联中央的委員，你們当时知道不知道呢？或者知道了为什么不提出来呢？結果赫魯曉夫关于斯大林的錯誤曾經有一个解釋，說他当时也是知道的，不过当时不能提出来，因为当时整个苏共中央都是处于困难的地步，就是当时斯大林的威信在苏联的各族人民中間很高，人民非常愛戴和信仰斯大林。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提出来跟斯大林不同的意見，批評了斯大林的話，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反对党反对苏維埃，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叛徒。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自己还有杀身之禍。他的解釋是这个样子囉。这样的解釋就更不能說明問題，反而更暴露

了問題，就是說赫魯曉夫他們這樣一般人在當時是知道斯大林的錯誤，那末當時沒有提，這當然與赫魯曉夫的个人有原因，也許是原則性吧，給他扣個帽子，但是我認為這個制度還是有些問題，既然斯大林有錯誤，為什麼制度本身不能保證一個公民，甚至中央委員當他犯了很多錯誤的時候，為什麼整個的部長會議，整個的蘇共中央以及當時的監檢部門，司法部門，都不能夠通過正當手續起來制止，起來干預，起來提意見。斯大林當時威信當然是很高，大家是很尊重斯大林，那麼是否這樣的說，整個國家的法紀，整個社會主義的法制，就可以不管了。如果說這個社會制度是很健全的話，一點毛病也沒有的話，那末人民也好，蘇共中央的委員也好，應該有可能通過正常的手段和正常的手續來表达自己的意見。那就應當指出斯大林的錯誤，如果斯大林堅持錯誤不改的話，就撤換他嘛。我認為，究竟是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要緊呢？還是社會主義事業更要緊呢？斯大林的錯誤是很長時期的囉。不是一朝一夕，在那樣長的時期內不可能得到糾正，那末這就使人不得不懷疑到，某些政治制度是不夠健全。不是正常的集體領導的原則被破壞了嗎？民主生活貫徹得不够，使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敢講話，也不願意講話，看到一個最高的領導同志犯了錯誤，我認為這就是政治生活上的不正常現象。這種現象長期得不到糾正，絕對不能解釋為个人原因，所以我認為斯大林同志的錯誤，跟蘇聯的政治制度有一定關係。但是，關於具體關係究竟怎麼樣，應該由那些同志負責，那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過去嘛，也是腦子隨便想一想，講一下子，今天我深刻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問題我想談一談我的有些思想

跟我在整風中的行動有那些聯繫

關於整風運動，我過去的看法是這樣的，我不仅是把它看成是克服三大主義，我不把它的意義局限在這個上面。就是說，我對這次整風運動所抱的希望不仅是克服公文旅行啦，文牘主義啦，或是不關心人民疾苦啦，或是留助教多留幾個黨員啦，我不是把意義局限在這個上面的。當我看到中共中央關於整風指示時，我就聯想到毛主席一

个很英明的报告，就是“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那个指示报告里面对那些阐明得很清楚，就是说整风的主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呢？最突出的表现在党群矛盾上面。而之所以有党群矛盾，是因为党本身存在错误和缺点，而党本身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表现在三大主义上面，因此克服三大主义，就有助于缓和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就有助于解决党群矛盾。党群矛盾解决了的话，就容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跨进一步，我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解整风运动的。刚开始看到整风指示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波匈事件，我就把整风运动和一年多来当前国内外重大形势联系起来考虑了一下，因为我认为整风的意义很重大，绝对不是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是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我是这样来理解的。所以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是感到很迫切的，感到刻不容缓，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要马上解决，带着一种急躁情绪，那末，在整风前一两个月，我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囉，不过为了说明问题，也要提一提，我是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忠实读者，光明日报我还读得少一点，文汇报自它复刊以后，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读的，读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它的编排、它的新鲜的标题、它的独特的风格，使我爱好，更重要是它的思想和我的口味很相投，我感觉到文汇报有很多地方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表达了我的思想感情，我当时这样讲文汇报不愧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报纸，当时我的确非常崇拜文汇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文汇报犯了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方向，但是我那个时候感觉不到这一点，当时我记得在文汇报上有许多专家、名人、教授发表文章，比方说我还能记得的像王恒守、王造时、张孟闻、黄鸣龙这样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国内有名的人，特别是像王造时，过去是救国会的“七君子”，我对他的道德、文章，人格一向是很尊重的，对他们的言论，我从来没有怀疑，而且是非常相信的。那个时候他们所发表的文章，把党的错误和缺点，是夸大了；另外他们所讲的一些东西，主要是在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这些方面。我联系他们的发言，考虑了一

下,的确也是这样,我自己过去感觉,对工农业方面我不大清楚,但在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确是有许多缺点,今天反右派斗争应该提出来,他们把错误和缺点夸大了,但是绝对不能认为他们过去所讲的是全部造谣,全是假的,如果全是假的,那末今天整风就没有必要进行了。他们讲的东西的确还是有些根据的,但是由于他们带了右派的情绪,就容易把它夸大一些,而当时这些夸大的东西,在我思想上起了导火线的的作用吧,我就全盘接受下来了。当文汇报上揭露了一些问题,差不多我们每天在寝室里都要互相谈论,而且感到我们国内问题的确是相当严重,如果再不解决的话,前途也是很危险的,当时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当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认为在整风里面也不会犯很大的错误了,思想上发展到这样地步,我认为基本还是正确的。但到以后思想就走到一个歧途去了。怎么走到歧途去了的呢?我从当时形势来考虑,我逐渐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我想这次整风运动,是比较特殊一些,与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都不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党发动群众来整自己,所以我就感觉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缩手缩脚一点,害怕一点,怕痛,不够积极,这当然不是我对全党怀疑啦,中央我是相信的。中央如果没有决心的话,它就不会提出整风的指示来。但是当时我的确怀疑党的某些基层组织 and 某些个别党员,他们有些怕痛,对于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是认识不足。当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北京和上海的大“鸣”大“放”,走在全国的前面,特别是上海,当时很令我兴奋,当时中共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做了很多工作,他打开了大“鸣”大“放”的局面。而在其它地方,就不是这样,在武汉市就是很沉闷。当时报纸上也三番五次地批评了,说“春风不渡武胜关”,在西北来讲,“春风不渡玉门关”,在四川来讲,是春寒没有解冻。在当时从全国来看,也就只有少数地区和少数领导同志表现了大“鸣”大“放”的决心,表现了要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决心。据我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下层党组织和某些党员本身并没有认识到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提出要整风,提出要开座谈会,恐怕还是组织性的保证,服从上级的决议。我在当时是这样讲:

我說这个运动是比較特殊一些,群众是不是應該主动一些呢?群众如果不主动起来的話,那末这个整个运动就不会弄得很徹底。因为这个运动不像过去那样,全党上下一致动手,同心合力,这里面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决心大,有的决心小,所以我認為在有的地方,党的决心表示得不够的地方,群众就应该主动些。而在群众起来以后,應該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是不能按照党的原来意圖划一个小圈圈,在这个圈圈里面要你講什么就講什么。不要你講什么,你就不講。所以我認為整风运动既然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問題,那就不能依照某些党組織的狹隘观点,保守观点,或怕痛,而群众就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你要我批評公文旅行,我就講一講这个現象,你要我批評留助教留黨員,我就談些鷄毛蒜皮的現象。我当时有了这样的錯覺,要群众起来,打开一下局面。这种思想在我腦子里是逐漸發展的。到了五月中旬和下旬,我就听說中南民族学院語文專修科,成立了自己的行动委员会,同學們有自己的組織了,对学院內的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时还打算到北京向国务院請願。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意这样一个組織的我認為他們只要不造反,只起来提些意見,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他并不是要与共产党爭天下,只是对院內所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提出意見和解决办法,我認為那是可以的。华中师范学院和湖北医学院,当时也因为党委不同意同學們大“鳴”大“放”,同學們就自动起来鳴放,打开了局面。这就更刺激了我認為有些东西必需自己起来搞,依靠党委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們報紙(指火焰)發表了篇北京書簡。北京書簡是右派分子写的,其中有一句話当时在我的想象中起了一些作用,這句話是这样講的,他說,这次运动是一次群众的自發运动,当时我特別欣賞那“自發”兩個字。因为北京大学的运动也是自發的起来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自發起来的,所以我認為自發一下也沒有什麼关系。这个思想發展下去,到以后也就成为不尊重党委領導,跟党委对立,單搞一套,到最后發展成抗拒領導,最后發展到与党爭奪領導权。我和有些同学在一起組織了伪中文系鳴放委员会,这是伪組織,当然現在我感到这是我一生的耻辱。当时我为什么想搞一个

組織呢？我是有一个思想原因的，因为我个人当时不相信武大党委，在这里可公开說，我当时对刘真同志也不相信，我跟刘真同志打交道也打得不少了，在長期的过程中我感到他的决心不大，魄力不足，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多問題不能完全依靠党，必需要有自己的行动，对党委来施加压力，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我也感觉有些东西需要組織一部分同学，要按照自己的意願来做一些事情，至于要做什么事情呢？那我就解釋一下囉，并不是要使資本主义复辟，这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也不是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当时确实沒有这种思想，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这点，更沒有这样想过。我当时想过一些什么样的問題呢？在北京大学开始整风之前，就看到北京大学在我看来所謂是“新气象”，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这个校务委员会是作为全校的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当时党委也参加这个校务委员会。那时我記得光明日报曾經登过这样一个消息，好像是关于科学獎金問題，好像原来党委提出一个建議，后来校务委员会把它否定了，这个事件曾在报上大肆宣揚过。当时我感觉这是个好現象，但是我并不是認為反对共产党是个好現象，而是我感觉到解放以后，一个行政机关否定党的決議，否定党的建議还是第一次。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问题？这里体现了群众更負責，对自己的事业更負責，当感到党委的決議不切实，不正确的时候有勇气把它否定。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把它否定后，党委也認為是正确的，所以我認為过去党委負責制，不管什么重大問題都經過党委決議，有时就难免不有一些偏差，那末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吸收一些对办高等教育有經驗的老教授参加，广泛的听取他們意見，使党委在领导全校工作时考虑得更周到一些，避免少犯些錯誤，我認為是正确的。所以我对校务委员会这个东西是很感兴趣的，而且很希望在武大也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所以我原来搞伪中文系鳴放委员会时，当然这是我思想上的想法，还未提出过，就是想准备成立以后，宣揚这一事情，而且准备向武大、向湖北省委提出这样一些要求。

在整风期間，北京大学还發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們过去的紀念堂里面本来摆着罗蒙諾索夫像，后来把这个像弄掉了，而放了一个蔡

元培的像，我欣賞它這一點倒並不是因為他們把俄國人的像弄走了，因為羅蒙諾索夫也是偉大的學者。就是我感觉北京大学突然又想起了蔡元培、这件事情使我很受感动。当然，蔡元培死的时候，我还是小孩，但当我長大以后，我是深深的感覺到蔡元培在中國近代文化和科學史上是占據了一個重大的地位，我確實認為蔡元培是一個可說是相當偉大的資產階級的教育家。自蔡元培當了北大校長那一段時間里面，他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他的氣魄很大，兼收并蓄，什麼東西都可裝得下去，當時北京大學的學術界出現了一片繁榮氣象，比如像李大釗，像陳獨秀，他們都可以在北大講學。當時蔡元培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認為是了不起的。蔡元培對推進北京大學的學術是有發展的，是有一定貢獻的，因此蔡元培是北京大學的功臣，應該肯定他。因為這個像就連想到這樣事情，我想到當時武漢大學學術完全不夠濃厚，在學校里面對這些有學術成就的老前輩尊重不夠，過去在很多問題上過分強調政治條件，而對有幾十年研究經驗的某一個學術界的權威尊重是不夠的，在我們學校里頂頂大名的是黨委書記、人事處處長這樣的人，而不是某些專家和教授。所以我認為這是不夠正常的現象。但我並不要求把黨委書記和人事處處長打下來，我是認為黨委書記有名、人事處處長有名，但是某些專家和教授也應該在學校享有盛名，這就是應該把學校里學術空氣搞得更濃厚一些。在北京大學很活躍。比方開辯論會、自由講壇、辦刊物。有時我很想把這一套搬到武大來，就是很願意按照北京大學的方式吧，把武大所謂改造一下。當時我對北大的東西很欽佩的，但是我考慮到這樣一些東西，恐怕不是武大的黨委所願意接受、所願意努力來進行的，這就應該團結一些同學來宣傳這些道理，爭取在武大能做到這些事情。這就是當時我為什麼要組織鳴放委員會的思想基礎。

另外關於黨委制負責問題，在這次整風運動初期，我並沒有發表過言論要反對黨委負責制，我沒有講這樣的話，但在思想上我是想過的。思想上是反對黨委負責制的。至於講與沒講不成問題。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囉，關於高等學校內的黨委負責制問題，在很早就有人

提过，好象今年春天就有人提吧，在北京的一些座谈会上，就有一些教授提出过，已经提出民主治校和教授办校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今天重翻一下以前的报纸还也看到这样一点，在当时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的，或带学术性的问题，但是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党，而是研究一下党怎样更好的领导高等教育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在这件事情以后不久我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是否可靠我也不敢担保。听说是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已经开始委托“民盟”和“九三学社”来研究。这是我听到有人谈过的。当时我这样讲，中央既然委托别人研究，我们也可研究一下，可以表示自己意见，以后刘真同志在不止一次大会上谈过这个问题，关于党委负责制的你们可以讨论，你们可以研究。所以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而且是倾向于取消党委制的，但取消党委负责制不等于取消党委会，党员就要组织一个党委会嘛，而是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领导学校，党委来领导校委会，通过校委会来起作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今天有某人一讲取消党委负责制，于是他就变为右派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公正。当然有这样情况有人是借着这样幌子，实际上是要反对共产党，表面上好像是反对党委负责制，实际上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但是也不可否认，有一种人他确实是为了党的事业，是想把学校办好，的确是为了把工作做好，的确是为了把学校办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当然是不是正确还有待于研究。即使在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的人中间也有两种不同情况。现在很统统的凡是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的人都给他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认为是不公正的，这样，以后知识分子就不会讲话了，因为知识分子受不了委屈嘛，管你负责制不负责制，我一个月拿几百元钱就算了，根本可以不讲话。我在刚开始搞时，也有过这个消极思想，关于大事件可以不发表意见，那末我也可以优哉游哉嘛。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一下子，就是很好的分清是非吧，不要使有些人遭冤。但有人他是右派分子，就是不反对党委制也是右派分子，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应区别的对待。简单的逻辑往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个同志遞了一張条子說：“你認為整風不止限于除“三害”，那麼你同意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嗎？”這個問題是否是這樣的，整風不限于除“三害”并不等于同意說“爭民主、爭人權、爭自由”。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間述大有活動的余地。我認為整風是不限于除“三害”，因為除了除“三害”以外，其它違法亂紀是不是也應該反一反呢？也應該反。現在我仍堅持這種看法。中央的整風指示也談到這個問題，還說：在整風中如果發現了違法亂紀的現象，要給以組織上的處分。中央的整風指示中也說明了這一點，就是我們的整風也不只限于除“三害”，就是超出“三害”的某些重大的違法亂紀現象也應該進行處理。我今天的看法也是這樣子，就是說，是不是只有“三害”才能在整風中提一提，而其它就不能提呢？那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子。如果說整風不只限于除“三害”，也不會違反中央整風的指示。那麼是不是說這個牽涉到制度問題，我認為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不可動搖的，但不等于說，社會主義下的每一個制度都是完美無缺的，我認為只要在整風中，只要發現某一個具體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或不完備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改一改，也不至于會發生天下大亂吧，比如說有些東西已經改了嘛，例如選拔留學生制度已改了嘛，這不是改制度嗎？現在好象說，整風一超出“三害”範圍，一說要清算某些制度就算是右派分子，那我在这里也是不同意的。因為我們的國家實際生活情況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改，有些現在已經在改了。

還有人問：你在整風運動中是否想爭奪領導權。我剛才已經講了，在中文系我是想爭領導權的，而且也爭過。

還有一張条子，要我講一講與林希翎的關係和我對林的看法，這個問題我已經在班上講過一次，同時也寫過一次材料，要講到林希翎的問題，恐怕也需要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是不是以後有機會再講，大家如果同意的話我就準備一下，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的。林希翎的政治觀點也很複雜，她也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我的講話完了。